中国教案史

张力　刘鉴唐　著

ZHONGGUO JIAOAN SHI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K105
2133
26284

中国教案史

张 力 刘鉴唐 著

XWTS 0027675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四·成都

责任编辑： 彭朝贵
封面设计： 张复祥

中 国 教 案 史

ZHONGGUOJIAOANSHI

张 力 刘鉴唐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成 都 市 书 林 印 刷 厂 印 刷

开 本：850×1168毫米1／32
印 张：29 插图：12
1987年4月第1版成都第1次印刷
字 数：756千
印 数：1——6,500册

ISBN7—80524—005—1／K·3
（书号：11316·69）定价：6.60元

绪　论

一

在当今世界上，流传着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它们创立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大多数人心目中，对伊斯兰教和佛教并不陌生，可是一提起基督教，便会联想起那造型别致并带有可怖感的教堂，联想起那“信的赏升天堂，不信的罚下地狱”的天主说教，就不免使人感到它带有神秘的色彩。其实，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基督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要了解基督教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只能从当时的社会中去寻找，以揭示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归属问题。

基督教究竟是怎么创立起来的？长期以来，基督教会各派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是：为了拯救世人，神的化身耶稣，从天降临，由童贞女玛利亚借圣灵受孕而生，他行了许多神迹，后被罗马帝国驻犹太的巡抚处死，三日后复活升天，将来还要降临，拯救世人摆脱苦难①；至于基督教，则是耶稣在公元一世纪于巴勒斯坦一个小村庄的拿撒勒人中创立的②；而基督教

---

① 见《新约·福音书》。

② 见《新约全书》。

会却是由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建立起来的①，等等。

实际上，基督教并非是由神的化身或者某个英雄伟人所创立，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基督教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②公元前30年，屋大维建立的罗马帝国靠着残酷的奴隶主专政来维持，受压迫最深的是地中海沿岸的犹太民族。这里的奴隶起义和民族反抗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但每次起义都失败了。于是，起义者当中出现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③。有一部分人不再拿起武器，而是仰望苍天，希望一位弥赛亚（救世主）从天而降，拯救他们跳出苦海。从此，形象模糊的耶稣基督④，便成了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而那些盼望者就成了早期的基督教徒——救世主耶稣基督准备挑选脱离苦难的人——"选民"。这些作为耶稣基督"选民"的教徒们，都在忍受着苦难，等待着拯救。随后，信仰者越来越多，于是便出现了信仰耶稣基督的团体，并有了专职人员，有了戒律和经典。这个团体就是在二世纪出现的早期基督教社团。

基督教社团产生以后，信仰的人日益增多，其成员大多是下层劳动群众和奴隶。由于信徒们向救世主捐献的款项和物品的增加，社团内便出现了有文化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帮助总结经验、传播教义和戒律的"智者"，他们便是早期的长老和主教。也正是出于上述这种原因，基督教社团逐渐变成宗教上层人物渔利的工具，而且，有产阶级分子也渗入到教会之中，逐渐取得了长老和主教的继承权。从而把一个本来是宣传拯救教徒脱离苦海、伸张正

---

① 见《新约·哥林多前书》。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

④ 希伯来文的词意是"救主"。

义的耶稣基督，演变成了教导信徒忍受苦难的榜样。

基督教会宗旨的变化，使当政者也改变了态度，不再对基督教进行迫害了。基督教文献中所宣扬的“忍让”、“顺从”、“爱那些恨你们的人，这样你就没有敌人了”、“爱你们的仇敌”①等等，正好迎合了罗马帝国当权者的需要，因而对基督教采取了保护政策。公元392年，罗马帝国皇帝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国教，其它任何宗教皆被视为“异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最强大的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克洛维，在496年利用罗马教皇征服了高卢地区，遂“皈依罗马教会，并命令士兵全部受洗”②。后来，查理曼帝国统治时期还规定，凡是被征服地区的当地居民，都一律要信奉基督教，拒绝受洗者死③。到了八世纪，欧洲各个国家都信奉基督教。而教会本身因为得到国家的支持，便逐渐成了大封建主。同时，教会的封建教阶制也开始形成：在国家范围内划分教区，每个教区设主教，下面有若干教堂，每个教堂所管辖的范围称作“牧区”，由主教向教堂派遣神甫。在主教之上，又有大主教。

欧洲封建化的过程，就是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基督教会由于充当封建主进行扩张的补充工具，它便从封建国家那里取得了各种各样的特权，从而使基督教会成为欧洲中世纪的“国中之国”。

基督教最初是比较统一的宗教组织，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了分裂。早在395年时，罗马帝国由于东部经济的发展，就把京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久而久之，帝国便逐渐分裂成为以罗马和

---

① 以上见《十二使徒遗训》，第1章；《马太福音》，第5章。

② 〔德〕斐帕：《日耳曼史记·远古始祖篇》，柏林1883年版，第6卷，第2册，第75页。

③ 〔英〕钱伯斯：《基督教会史》，伦敦1950年版，第2卷，第414页。

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充当帝国统治工具的基督教也随之分裂，出现了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但是，长期以来，罗马主教拒绝两个城市的主教地位平等。451年，罗马主教利奥提出："罗马教会是耶稣门徒中居领袖地位的彼得所创立，因此，继承彼得任罗马主教的人应享有最优越地位。"①560年，罗马主教佩拉吉权势炎热，自称"波普"——教皇，这就是罗马教皇名称的由来。而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自九世纪开始也积极进行对外传教活动。980年，东罗马帝国以皇族公主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作妾，弗拉基米尔便受洗入教，并强迫全国居民到第聂伯河里受洗入基督教，并于988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10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又为争夺意大利南部的教会势力发生了冲突。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派红衣主教到君士坦丁堡，宣布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迈克尔·凯鲁拉里开除教籍；而迈克尔·凯鲁拉里也召开宗教会议，谴责教皇使节"象野猪一样来到圣城诬蔑真理"，宣布将罗马教皇革除教籍②。从此，基督教的东西方教会正式决裂，欧洲西部仍称基督教，欧洲东部改称东方正统教（简称东正教）。这就是东欧及俄国等十几个国家把东正教定为国教的来源。

基督教出现这次大分裂后，到了十六世纪，又出现了第二次大分裂。这次分裂是由基督教本身的日益腐化引起的。从三世纪以来，基督教会日益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主教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经商盈利，放高利贷，侵吞教会公产；神职人员与"属灵姐妹"同居，甚至连杀人犯、娼妓、妓院老板鸨母等都入了教③，"教堂竟成为他们满足淫欲的场所"④。卜伽丘的《十日谈》就是揭

①② 鲍尔温：《十三世纪前的基督教》，第181页。

③ 杜许奈：《初期基督教会史》，第1卷，第378—380页。

④ 赫斯特：《基督教会史》，第1卷，第50页。

露基督徒腐化堕落的代表作。基督教会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以及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引起了人民的广泛不满和不断反抗，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1517年，德国维登堡神甫马丁·路德无意识地触及到“赎罪券的买卖”问题，便点燃了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烈火。各国新的教派纷纷出现，与罗马教皇及教会对立。这些新的教派中著名的有：德国的路德派新教、再洗礼派，瑞士的慈温利派、加尔文派，英国的安立甘宗派，等等。它们统称为只信仰耶和华一神的基督新教（即耶稣教、更正教）。而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仍坚持信仰原基督教的圣父、圣母、圣子三位一体的天主教义。从此，基督教中又分裂产生了基督新教。

基督教经过两次大分裂遂一分为三：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这三大教派原本同出一宗，但在当今世界宗教交往上，三者却是水火相交，互相抵牾。

二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进入中国的时间不同。基督教在尚未出现两次分裂之前，曾两次入传中国：一次在唐朝，另一次在元朝，后来都自行湮灭了。到了明清时期，三大教派才相继传入中国。最早把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是耶稣会的方济格·沙勿略教士，时间是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基督新教来中国大陆之始，当推马礼逊，时间是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而东正教则早于基督新教而晚于天主教，时间是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由东正教教士马·列昂节夫于北京建堂。

天主教下属各修会、基督新教下属各差会以及东正教布教团在中国传教的分布情况，分别列表介绍：

表一：1581—1840年天主教各修会来华传教简表

修会名称	在华传教范围
耶稣会	香港、澳门、广东、广西、江苏、安徽、浙江、陕西、四川、山西、河北、京津、内蒙、福建、山东、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甘肃、台湾
巴黎外方传教会	澳门、香港、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东北三省、西藏、北京
西班牙多明我会	澳门、香港、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东北三省、西藏、北京
方济各会	澳门、香港、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
遣使会	自从1773年耶稣会解散，清乾隆朝严厉禁教，此会接收耶稣会所辖的传教范围有：河北、江西、河南、浙江。总部设在上海徐家汇徐光启墓址

表二：1842—1933年天主教各修会来华传教简表

年份	会　　名	传　教　地　点
1842年	耶稣会（重来）	江苏、安徽、河北东南部。
1858年	密良外方传教会	河南
1865年	圣母圣心会	蒙古
1870年	教学会	香港
1879年	奥斯定会（重来）	河南
1879年	司带尔圣言会	山东一部
1883年	苦修会	河北杨家坪
1885年	圣伯多禄圣保禄会	陕西
1893年	圣母小昆仲会	上海
1902年	慈幼会	澳门
1904年	巴尔玛外方传教会	河南
1917年	伊苏登外方传教会	贵阳
1918年	玛利诺外方传教会	广州、江门
1920年	圣高隆庞外方传教会	汉阳
1921年	苦难会	湖南辰州
1922年	比布斯二心会	琼州

（续前表）

年份	会　　名	传 教 地 点
1922年	圣心司铎会	云南大理
1923年	救世会	福建邵武
1925年	本雪尔凡尼的本笃会	北平
1925年	印五伤司铎会	河北易县
1925年	司格包罗勃塔夫外方传教会	浙江处州
1925年	开培克外方传教会	辽宁四平街
1926年	洛本的本笃会	四川西山
1926年	方济各特规会	陕西西安
1926年	白冷外方传教会	黑龙江齐齐哈尔
1928年	奥斯定重整会	河南归德
1928年	赎世主会	河南驻马店
1928年	圣奥迪尔的本笃会	吉林延吉
1928年	圣若翰保第斯大小兄弟会	安国（华人自立）
1930年	主徒会	宣化（华人自立）
1932年	奥斯定常律会	西藏
1933年	圣母心子会	安徽徽州

表三：1842—1931年天主教来华传教女修会表

年份	会　　名	传 教 地 点
1842年	仁爱会	
1848年	沙德圣保罗女修会	
1860年	加诺萨女修会	
1867年	拯亡会	
1869年	圣衣会、隐修会	上海
1875年	包底欧上智会	
1886年	方济各圣母传教会	
1889年	多明我女修会	
1904年	安老会	上海
1905年	司带尔圣神忠仆会	山东兖州
1905年	加拿大圣母始孕无玷会	广州
1910年	埃及方济格女修会	湖北老河口
1920年	玛利诺多明我外方传教修会	香港
1920年	山林圣玛利亚上智汀会	河南开封
1922年	包勒杜玛利若瑟会	热河
1922年	勒奶维尔天神母后会	贵州贵阳

（续前表）

年份	会　　名	传教地点
1922年	圣若瑟小姐妹会	山西潞安
1922年	罗马圣乌苏拉会、罗马联合会	广东汕头
1923年	南林劳莱笃会	汉阳
1923年	圣母进教之佑会	广东韶州
1923年	鲁文奥斯定会	宁夏
1924年	加拿大宝血会	河北献县
1925年	奥斯定第三会教学修女会	湖南常德
1925年	吾主仁爱会	湖南辰州
1925年	方济各会服务医院会	山东济南
1926年	圣高隆庞传教修女会	汉阳
1926年	毕资堡圣若瑟修女会	辰州
1926年	圣母赎携会、传教修女会	芜湖
1926年	加罗萨圣母会	献县
1926年	耶稣圣心会	上海
1926年	圣心会修女会	浙江嘉兴
1926年	救世主会	福建邵武
1927年	巴尔玛乌苏拉圣心会	安徽蚌埠
1927年	卢森堡方济各第三会仁爱会	湖南永州

（续前表）

年份	会　　名	传教地点
1928年	奥斯定重整会	归德
1928年	永久朝拜方济各会	武昌
1929年	沃海洼若瑟山仁爱会	武昌
1929年	圣十字架修女会	齐齐哈尔
1929年	巴伐利亚方济各沙拉诺修女会	山西朔州
1929年	奈缪圣母修女会	武昌
1930年	美国本笃会修女会	甘肃平凉
1930年	嘉布遣会第三会圣家会	
1931年	门斯德圣母始孕无玷会	山东济南
1931年	耶稣孝女会	安庆
1931年	善牧会	上海

表四：基督新教宗派系统表

大差会名称	公圣宗	礼漫宗	公理宗	信义宗	监理宗	长老宗	内地会	其　它
下属分会（小差会）名称	圣公会英加公华	复来会美礼英礼新教友会美信瑞信安浸	公理会伦敦会美普协公	巴色会	美福音会循理会美道会美以美监理会美道圣公循道会	苏福音会	内地会	贵格会
	圣公会圣公会北圣公会英	浸会浸会那音约会爱会浸会浸会息礼		德信义会		英长老会	德女公会	宣道会
				丹路德会		加长老会	女执事会	公谊会
				北美信义		艾长老会	自由会	美女公会
				中美信义		纽长老会	德华盟会	使徒信心
				芬信义会		北长老会	瑞圣洁会	上帝教会
				自立信义		南长老会	立本宣会	弟兄会
				长老教会		归正教会	挪威会	美基督会
				挪美遵道		复初会	挪华盟会	五旬会
				信义公理		约老会	北美瑞挪	南直福音
				豫鄂信义		基督同寅	瑞华会	复临安息
				信义长老		苏长老会	瑞华盟会	瑞美会
				挪路德会				救世军
				挪信义会				
				礼贤会				
				瑞美行道				
				瑞信义会				
				瑞行道会				

表五：1807—1921年基督新教传教区域表

年份	会别	创立者	创立地点	传教区域（按教区统计）
1807年	伦敦	马礼逊	马剌甲	港澳、江浙、河北、湖北、福建、陕西、湖南、四川、京津
1830年	公理	裨治文	广州	粤东、福建、华北
1830年	礼贤	郭实腊	澳门	香港
1830年	巴陵	郭实腊	澳门	广东的博罗、惠阳、韶关
1835年	美圣公	韩、骆二人	爪哇	江苏、湘鄂、皖赣
1836年	浸信	叔米士	澳门	广东、江苏、华北
1838年	北长老	何、密二人	新加坡	关东、华北、河南、粤广、粤西
1842年	归正	雅俾理	鼓浪屿	龙岩、漳平、永福、华封、宁洋
1843年	浸礼	马高温	宁波	宁波、金华、绍兴、杭州、湖州、上海
1846年	巴色	黎力基	香港	香港、广东
1847年	安息	卡、华二人	上海	上海
1847年	美以美	柯林斯	福州	华中、江西、华北、华西、福州、兴化、延平
1848年	美圣公	戈柏、陆赐	宁波	浙江、福建、港粤、华北、山东、四川、湘桂

（续前表）

年份	会别	创立者	创立地点	传教区域（按教区统计）
1848年	监理	秦右	上海	上海、苏州、常州、湖州、松江、太仓、南浔
1850年	英长老	用雅各	厦门	闽南、关东、两湖
1852年	循道	柯克斯	广州	汉口、武昌、湘阴、平江
1860年	圣道	郝慧廉	天津	天津、甬瓯、肇庆
1864年	南长老	应斯理	宁波	江苏、浙江
1864年	美公理	儒理	北京	1909年并于美普会
1865年	内地	戴得生	杭州	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山西、贵州
1867年	美普	马维廉	张家口	青圪塔、蔚县城
1868年	苏长老	郭布伦	宜昌	宜都、董市、双莲寺
1880年	英浸礼	仲均安	徐州	青州、开封、济南、汾州
1882年	福音	视名扬	上海	铜仁
1886年	基督	马林	南京	南京、滁州、庐州、芜湖、南通
1887年	美瑞丹	宽夸伦	广州	南海、香山、高要、博罗
1887年	贵格	义自礼	南京	南京
1887年	瑞华	符励恺	河南	山西、陕西、河南
1888年	宣道	赖普	武昌	长沙、常德、汉寿、武昌、甘肃、蒙古、梧州

（续前表）

年份	会别	创立者	创立地点	传教区域（按教区统计）
1889年	同寅	梅灵	广州	新塘、小榄、大杭、九州、基右镇等处
1890年	德华盟	奔德	处州	丽水、松阳、缙云、龙泉、抚州…等处
1890年	行道	韩宗盛	武昌	武昌、沙市、荆州、黄州、襄阳、南漳
1890年	信义	李立生	汉口	关东、豫鄂、豫东、豫中、兴安、滠口、广东
1891年	北直隶	爱君	宣化	保安州、多伦、张家口、下花园
1892年	英美	赫斐邱	成都	成都、重庆、涪州、自流井
1893年	协同	孙芝城	兴平	咸阳、马嵬…等处
1895年	救世军	罗开泰等	源昌	双门底
1897年	约老	梁多马	广东德庆	德庆、罗定、云浮、太平…等处
1898年	来复	慕向荣	南京	南京、和县、芜湖
1899年	圣洁	高乐生	山西浑源	庄窝、西沟…等处
1899年	酬恩	李道辉等	山东登州	山东，后合并于长老会
1899年	恩典	金乐满	浙江塘栖	1922年合并于杭州长老会
1900年	德妇女	吴香珠	四川	万县、开县、岳溪…等处

（续前表）

年份	会别	创立者	创立地点	传教区域（按教区统计）
1900年	复初	海维理	岳州	辰州、永绥、湖滨、长沙、湘潭、常德
1902年	基督徒	谢洪赉等	上海	上海、香港
1902年	遵道	德慕登	湖南	长沙、湘潭、醴陵、攸县、茶陵、枣阳、桐柏
1903年	同盟	王耀基	陕西商县	龙驹寨、山阳、雒南…等处
1904年	循理	安培生	四川	郑州、开封、荥泽、杞县、河阴、荥阳、陈留
1905年	自立	俞宗周	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湖南
1907年	救恩	挪心清	河南泌阳	泌阳
1908年	友爱	库范恪	山西太原	平定、寿阳、辽县
1910年	自理	甘素贞	云南楚雄	补雄、姚安、牟定、监丰、大姚
1910年	坎圣公	怀伟廉	河南	开封、商邱、郑州、兰州、虞城、睢县
1911年	清洁	簿清洁	直隶濮阳	大名、濮阳、清丰、车名、南乐、长垣
1911年	孟挪浸	卫英士	汕头、上杭	上杭、永定
1912年	海面传道	何丽臣等	香港	香港、广州

（续前表）

年份	会别	创立者	创立地点	传教区域（按教区统计）
1912年	中华基督教	孟省吾等	北京	天津、北威、烟台、青岛、济南、太原、星洲
1917年	滇南教	富力敦	云南猛烈	普洱、思茅、墨江
1917年	五旬节	马锡龄	云南	蒙自、缅宁及卡瓦山裸黑族、白苗族中
1921年	国内布道	李素贞等	云南	云南、黑龙江

至于东正教，自从进入中国后就把外交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仅在北京一处有一个布道团。到了1860年，为了侵略的需要，东正教把外交与宗教分开了。义和团运动后，东正教开始向各省大肆扩张，相继把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地作为自己的传教范围。其中大的据点有：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迪化（乌鲁木齐）等地，并在各地设有不少教堂。到1938年，东正教在中国所设教堂竟达67座，还设有许多礼拜堂。

上列各表只是反映了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进入中国传教的一般分布情况，而且有些教派并未列入表中。但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基督教三大教派到中国传教的派别是很多的。仅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修会就有三十余种，另外还有八十多个女修会。

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制

约下，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变化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基督教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向世界各地传播，始终没有离开过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和当时政权的力量。这一点，在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入传中国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科学技术尚未发达的欧洲中世纪，乃至十九世纪前的资本主义前期，众多的不同国籍的传教士涌入中国，在为耶稣基督而献身的精神支配下，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进行宣教的，是为了要宣传他们认为是无比正确的基督教教义的。他们心中的圣灵是耶稣基督，他们所遵从的是教皇的意旨和教廷的命令，很少有为本国政治和政权服务的。这是因为，欧洲各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教皇在各国君主心目中有着绝对的权威，有的国王本身就任大主教，这种政教合一的性质，加固了东来的传教士们为耶稣基督而献身的精神，这是其一；又因为欧洲地理环境和民族融合等缘故，种族和国家的观念在民众心中并不强烈，尤其是整个欧洲各国之间在王位继承上，经常打破国籍的界限，而且各国国王及其贵族往往在别的国家里有自己的封地、领地和臣民，因而使得国家的观念和形象在民众心中越发模糊，这是其二；再有就是，那时的欧洲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也仅仅是在经济上强大，还没有能力把处在没落、腐朽的封建制度彻底打碎，这一任务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伴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殖民和垄断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象征时才完成的，而那时的中国，时值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这是其三。以上三点就是十六、十七世纪，乃至十八世纪东来的传教士很少为本国政府服务，而更多地是宣传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在为耶稣基督献身精神鼓舞下，虔诚布道的重要原因。

为了达到东来宣教的目的，传教士们自然要设法使他们的教义变为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哲理。这样，介绍西方当时尚属先进的科技文化就成了他们的手段之一和能在中国立稳脚跟的“唯一

武器”，这也是他们初来中国，屡屡受到帝王、权臣、士子文人及统治阶级的欢迎，乃至青睐的重要原因。宣传西方文化，传播东方文化，尽管并非是他们的本意，但在事实上，他们却成了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往的媒介，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立下了难以磨灭的功绩。值得提出的是，早期不少的虔诚的西方布道者，身体力行，为了使基督教能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播，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点，是历史，是实际，是不能否认的。我们应该把后来本国政府支持下的教会活动及个别教士的劣行与上述情况区别开来，并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既然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中华文化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什么自唐朝基督教入传起，一直到清朝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前），在中国时而出现驱逐教士、迫害教士的“教难”现象呢？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由于封建主义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自远古起，一向抱着自守主义。历史上，尤其是在盛唐时期，虽然也有欧亚交通的踪迹，然而外国哲学思想、学术思想的输入甚是微薄。因为，从传统的文化和民族心理看，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之一，文明制度粲然可观，因而，自尊心理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以为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惟有中国为堂堂大国，惟有中国为文明之邦（如以明清两代为例，皆以天朝大国自称）。此前，在中外交往中，对于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因有其相似之处，故对他们的文化屡经传播，深为中国民众所了解，故极少出现抵牾。如佛教、伊斯兰教入传，即为一例。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相率东渡，其所抱宗旨，固在宣扬教义，而中国人当中，除少数人接受外，绝大多数却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这是由传统的民族心理造成的。

其二，正如本书正文中所说的那样，几千年来的中华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所有的纲常伦理无不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从来都是祭祖、祭天以戒后来，从来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各安其位，不得造次。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正统思想，一旦受到外来的摈君弃祖疏亲的一神论思想的冲击，必然产生抵牾，必然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信仰受到冲击。而依赖于这种正统思想进入仕宦之途的士子文人首先受到威胁，诋毁教义、反对宣教、驱逐教士也就成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了，这在明代万历年间黄贞的反教学说及沈潅驱逐教士的奏疏中，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

第三，封建帝王及其统治阶级深恐外来思想会动摇封建的“忠君”统治术，因而，对于主张只能信仰耶和华一神的基督教，大多数帝王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都进行排斥。如唐武宗灭教诏中所言的“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又如雍正禁教时所说的“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等，都表明早期传教士尽管虔诚布道仍不免引起“教难”。这是原因之三。

第四，为了能使自己在中国立住脚跟，早期的传教士们除了用西方科学技术作为接触达官贵人的手段外，再有就是尽量地使天主教教义儒学化，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这在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聚集民众、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等诸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故此，也赢得了部分帝王及统治阶级的青睐。但，却也在镇压人民对封建王朝的反叛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因而在下层民众中斥责教会的舆论世代不绝。这是原因之四。

总之，早期传教士意欲进入中国传教者，绝大多数可谓是虔诚甚笃的基督徒，仅有一小部分人带着“淘金”目的东来中国。

十九世纪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伴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进行，资产阶级掌握了欧美各国的政权，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生产地，掠夺落后国家，便成了资本主义各国最迫切的要求。而宗教，在政权的庇佑下，为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财团服务的色彩更浓了。因而，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把宗教作为它们推行侵略政策的先锋和开路者。这

正如一个西方国家驻中国的领事所说的："当记住：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着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随之而来的就是外国军舰、大炮和侵略军。所以，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传教来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目的方面，在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血腥历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鸦片——大炮——传教士，实际上是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来掠夺中国的三位一体的工具。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赋予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横行的特权、掠夺的特权，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福音"的传布者变为政治的骄横者、经济的掠夺者。他们的种种劣迹自然给几千年来过着"田园生活"的中国人民造成信仰、生存和民族的危机。为了生存，中国人民必然要进行反抗，因而与中国人民接触最多、在侵略中又是首当其冲的传教士就自然会成为中国人民反对的对象和主攻方向了。于是爆发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洋教侵略的斗争。

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列强们瓜分中国的野心日趋明朗，政治和经济侵略日益加深，教会势力更加猖獗，造成中华民族的信仰、生存、民族的危机也愈加严重，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日渐激烈。最后，"隐忍有四十年余"的中国人民，被逼到了"横竖总是死"，不得不拼出性命以求生存的地步。全国范围内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后总结。腐败的清王朝苟且偷安，充当了"洋人朝廷"，血腥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就是最好的证明。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完全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在这一重大的变化中，又是西方传教士起到了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侵略军和炮舰所起不到的作用。那时，他们完完全全地撕下了"布道者"的遮羞布，干尽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把这一

切善恶如实地记载了下来，才使后世能公平地评论其功过是非。

做为全国性大教案的义和团运动，确实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从而迫使充当本国资产阶级侵略政权工具的在华传教士不得不改变手法，以图继续欺骗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孰不知，在帝国主义吞噬中国过程中，传教士们所干的那些与其教义和身份不相称的坏事，不但使一般的百姓看清了，就连那些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基督教徒们也觉醒了，遂有反抗运动出现。当然，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持下，传教士从来就没有放弃征服中国的企图。这一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他们所扮演的极不光彩的角色，就是充分的证明。随着中国革命的步步深入，他们的反面作用就愈加明显。

历史是无情的。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国大地上升起来的时候，就宣告了他们在旧中国横行日子的结束。而数以百万计的爱国的宗教徒们在社会主义雨露的滋润下，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贡献着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力量。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实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基督新教、天主教不仅存在而且还得到不断地发展。以天主教为例；到1986年12月底止，中国的天主教教徒达330000人之多，全国教堂48座，神父计约100名之多。在教徒中，许多人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1982年到1986年的四年当中，有1700名教徒获得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的称号，12名主教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名主教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另有959名教徒担任了各级政府的领导工作。目前大约有700名学生在7所神学院中学习。活生生的现实给了那些认为中国不允许“宗教自由”的谎言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于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的功过是非以及由此引起的教案，给予公正的恰如其份的评价，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八国联军侵犯北京途中

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广州人民火烧美、英、法等国商馆

乾隆爱妃香妃油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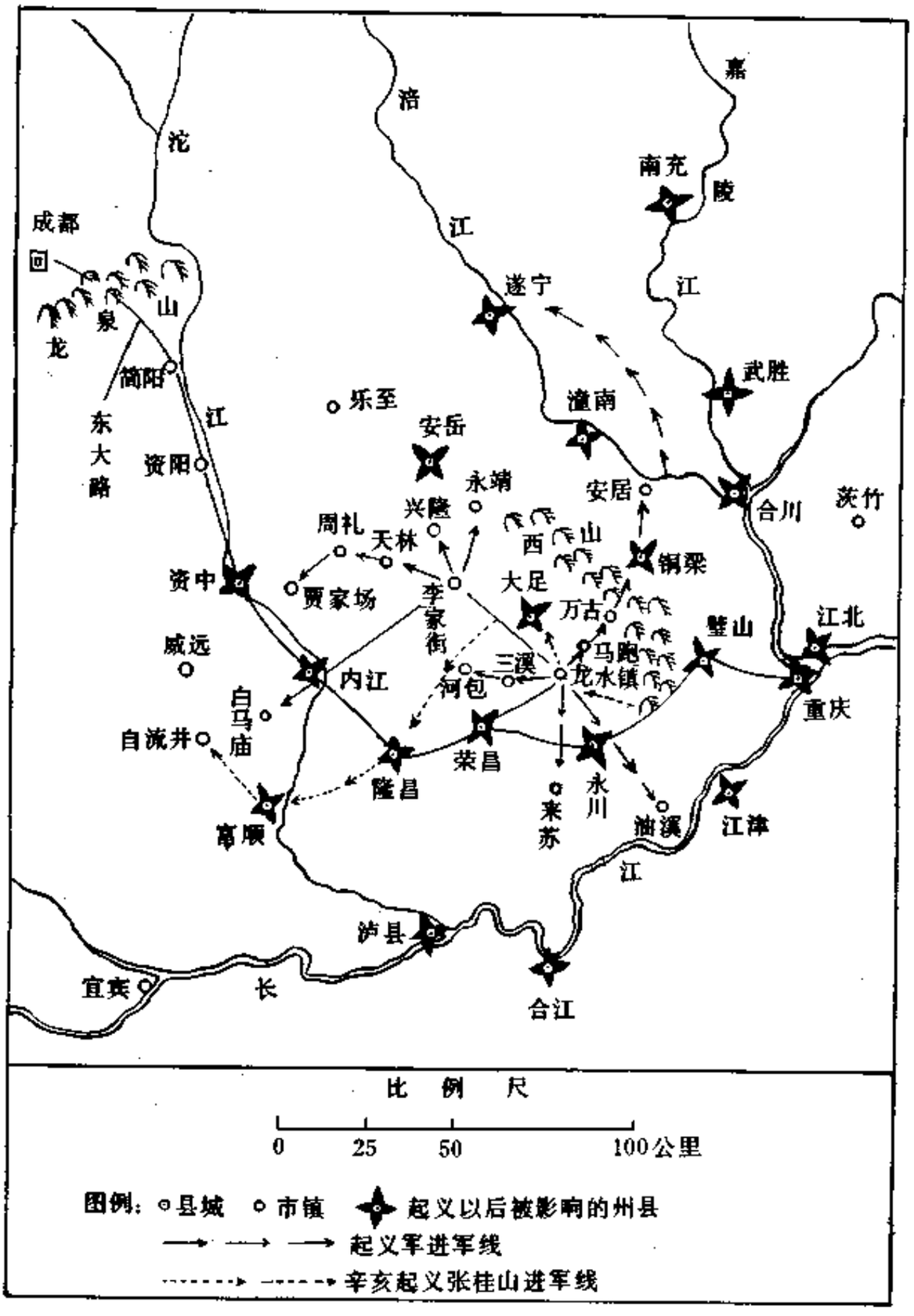
意大利画师朗世宁绘

带有西欧风格的希腊神话故事画——乾隆粉彩双口瓶

江西景德镇出品

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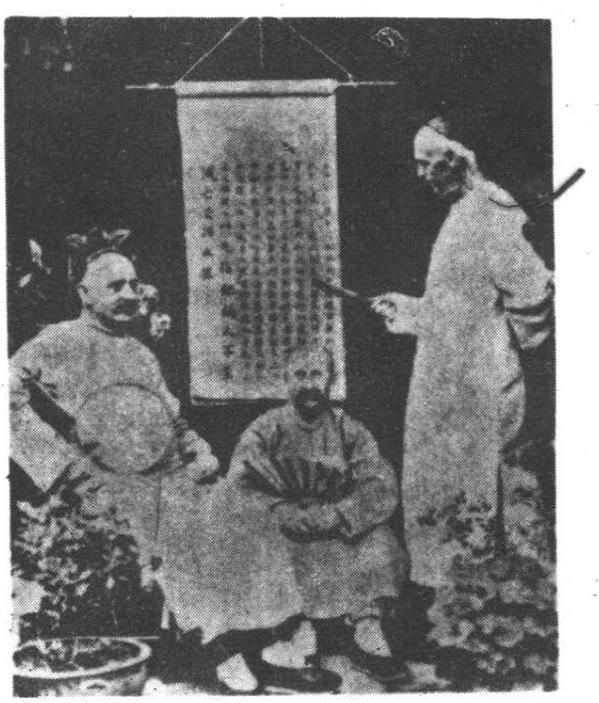
大足人民仇教反帝起义地图



1704年遭康熙皇帝遣送澳门的多罗主教

康熙朝钦天监监正南怀仁

第一个把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大陆的英人马礼逊牧师



鸦片战争后，穿着中国服装的外国传教士

一七一九年，由耶稣会士参加测绘的『皇舆全览图』（河北东北部，地名用满文表示）

南怀仁绘《坤舆全图》

几何原本第二卷之首

泰西利玛窦口译

吴淞徐光启敬受

界说二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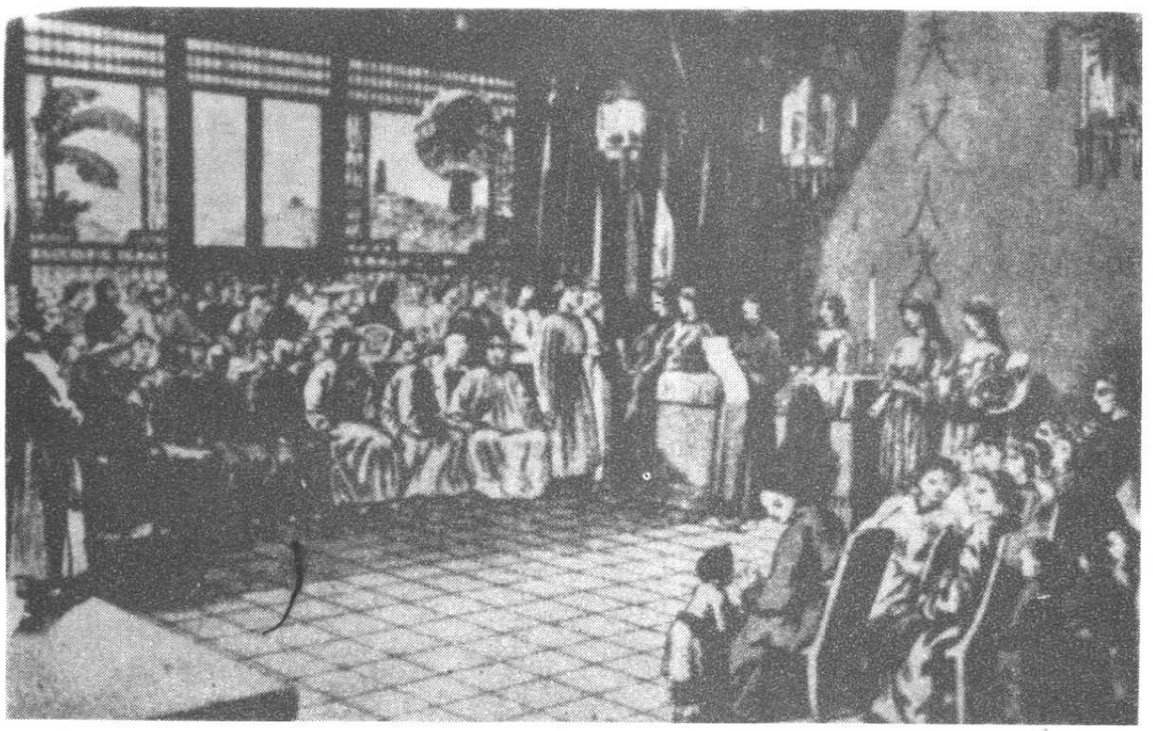
第一界

直角形之两边两一直角形之直角形之矩线

利玛窦译几何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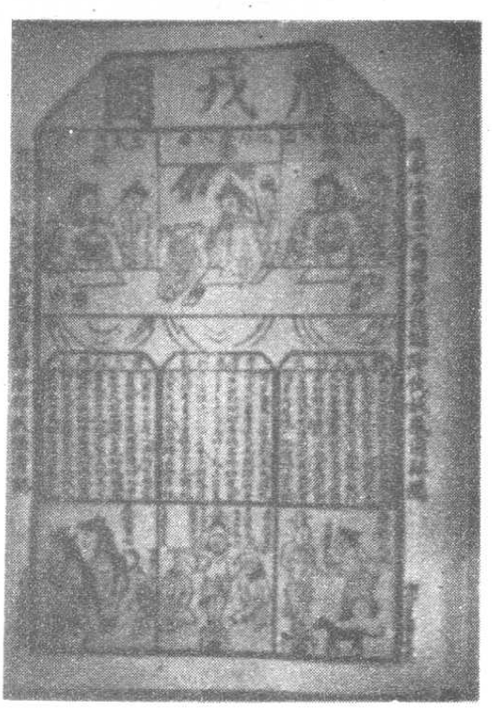
十七世纪末在雅克萨（阿勒巴金）的沙俄东正教教堂

1856年法国教士马赖非法进入广西西林县被捕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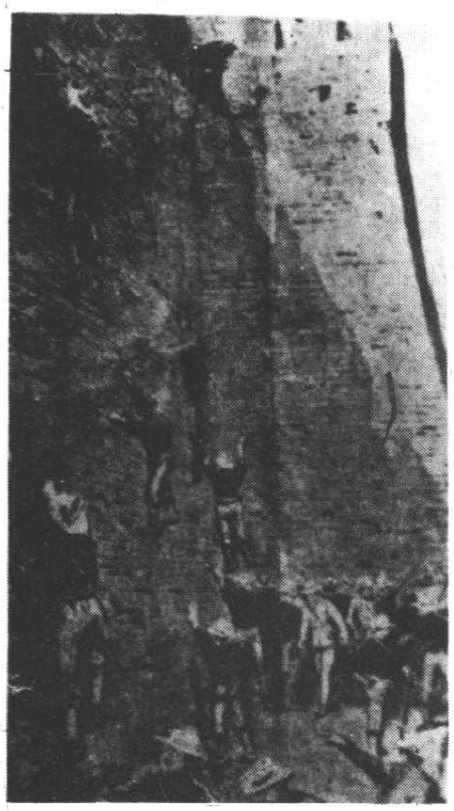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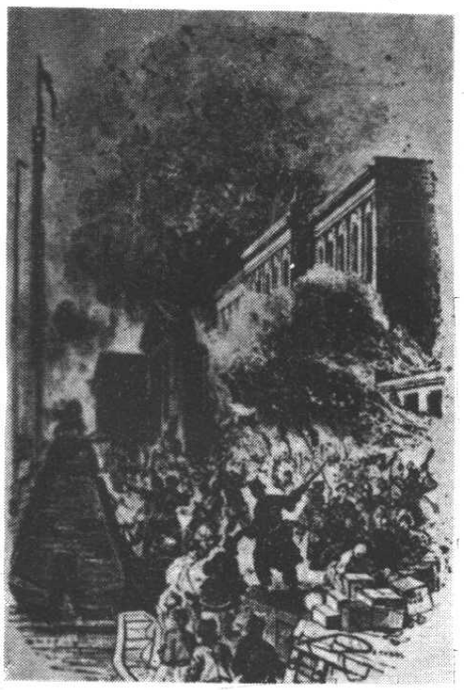
反洋教宣传品
《打鬼烧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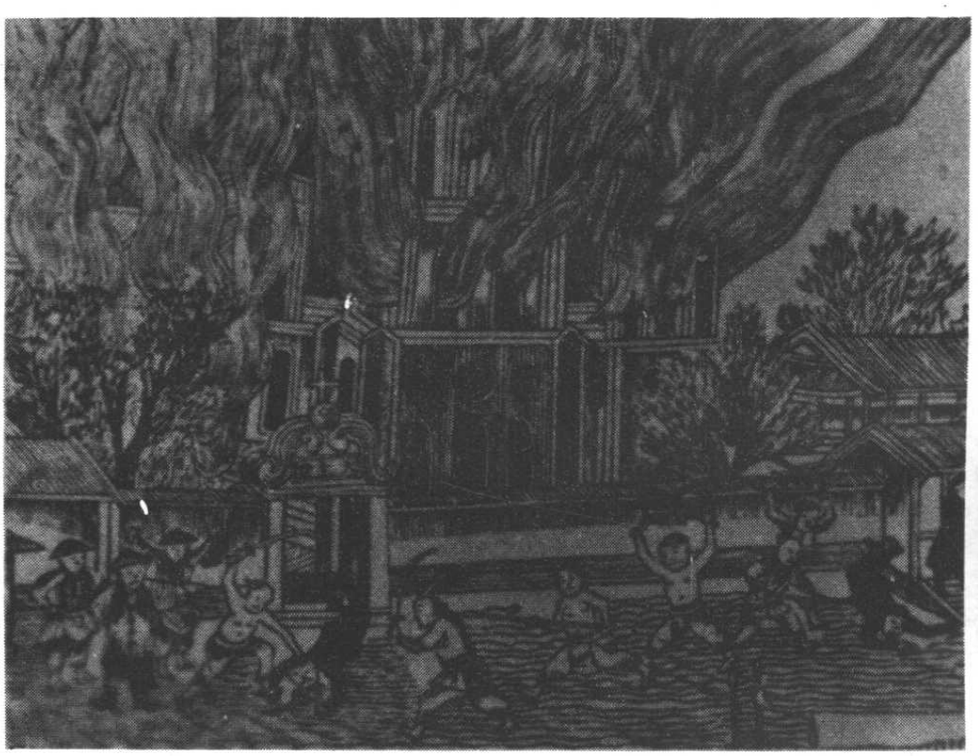
反洋教宣传品
《膺戎图》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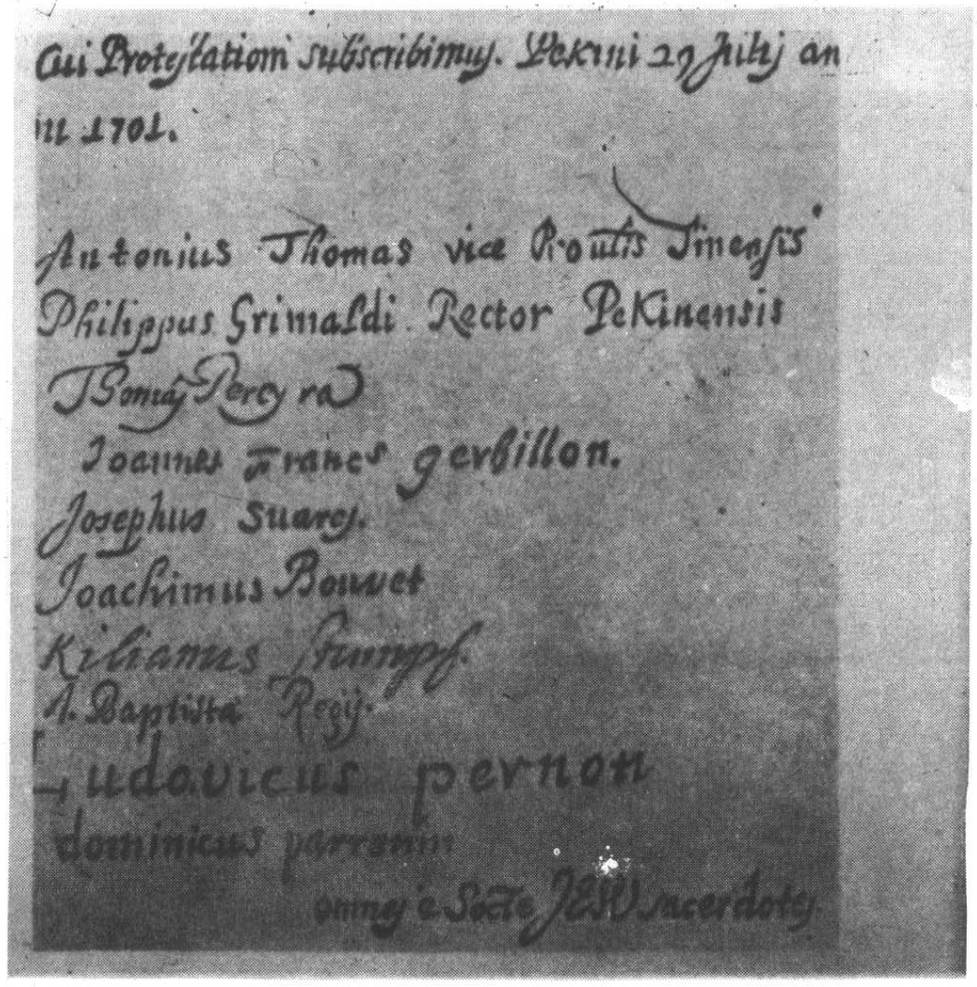


《北京条约》后中国人民
焚烧外国商馆



1870年天津教案时教士被杀、教堂被毁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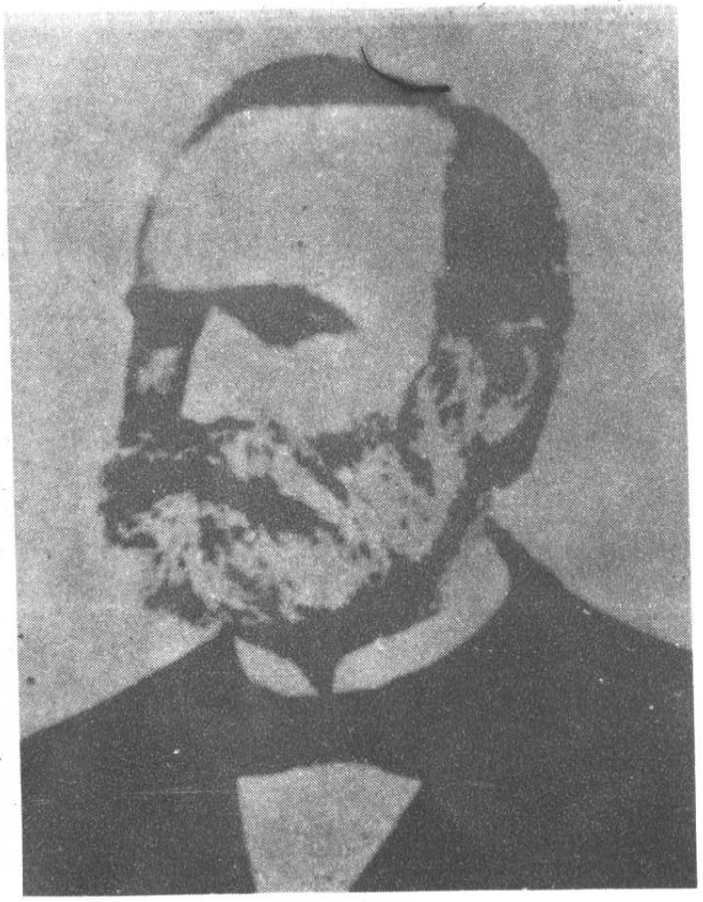
耶稣会士何大化著《耶稣教徒雪冤录》，为康熙朝汤若望“历狱”申冤


Qui Protestationi subscribimus. Pekini 29 Julij an
ni 1701.

Antonius Thomas vice Provtis Sinensis
Philippus Grimaldi Rector Pekinensis
Thomas Pereira
Joannes Franc. Gerbillon.
Josephus Suarez.
Joachimus Bouvet
Kilianus Stumpf.
A. Baptista Regis.
Ludovicus Pernon
dominicus Parrenin
omnes e Soc. Jesu Sacerdotes.

康熙朝“仪礼之争”中在廷传教士的签名（1710年文书）

热心于医疗事业的传教士——派克医生



主张瓜分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目　　录

绪　　论……（ 1 ）

第一章　基督教入华之始及中国封建王朝的对策
（唐代——清初）……（ 1 ）

一、唐代基督教入传中国……（ 3 ）
（一）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明证——大秦景教碑…（ 3 ）
（二）唐代帝王崇奉景教……（ 4 ）
（三）唐武宗禁教与景教的湮没……（ 6 ）
二、元代基督教再传中国……（ 7 ）
（一）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 7 ）
（二）元代基督教的盛行……（ 8 ）
（三）基督教在中国再次匿迹……（ 10 ）
三、明代天主教各派传教士涌入中国……（ 12 ）
（一）耶稣会士沙勿略第一个来华传教……（ 13 ）
（二）葡萄牙传教士伯来笃、公匝勒始居澳门…（ 13 ）
（三）西班牙奥斯定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受阻……（ 15 ）
（四）意大利耶稣会士进入广东浙江传教……（ 15 ）
（五）利玛窦——杰出的意大利传教士……（ 17 ）
（六）天主教在中国广为传播……（ 20 ）
四、天主教教义的儒学化……（ 26 ）
（一）适应中国民俗的传教方式……（ 26 ）

（二）天主教教义与儒学异同之比较……（ 30 ）
（三）利玛窦推行天主教教义儒学化及其结果…（ 33 ）
五、明代南京教案……（ 36 ）
（一）导因 ——中国传统信仰与天主教教义的冲突……（ 36 ）
（二）黄贞等人反天主教学说的建立……（ 39 ）
（三）沈潅反教奏疏与万历逐教……（ 41 ）
六、明末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再兴……（ 48 ）
（一）明末王朝及晚明政权对传教士的依托……（ 48 ）
（二）外国教会势力渗入宫廷、王室……（ 51 ）
七、清初是在华传教士的黄金时代……（ 52 ）
（一）传教士在王朝更迭间的对策……（ 52 ）
（二）汤若望——第一个出任钦天监监正的外国传教士……（ 55 ）
（三）顺治帝的宽容政策及传教事业的发展……（ 56 ）
（四）传教士南怀仁主持编修历书……（ 61 ）

第二章 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明末——康熙朝）……（ 66 ）

一、传教士是西学东渐的媒介……（ 68 ）
（一）传教士著述与西学东传……（ 68 ）
（二）西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73 ）
二、中华文化西传及其影响……（ 74 ）
（一）语言学……（ 75 ）
（二）经　籍……（ 76 ）
（三）舆　地……（ 77 ）
（四）中国史……（ 77 ）
三、耶稣会士修正中华古老天文学……（ 81 ）

（一）传教士对西方天文学的介绍……（ 81 ）
（二）李之藻、徐光启等对守旧历家的斗争……（ 83 ）
（三）传教士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 85 ）
四、欧洲数学入传与徐光启的贡献……（ 86 ）
（一）几何学……（ 87 ）
（二）三角学……（ 89 ）
（三）对数术……（ 90 ）
（四）代数学……（ 90 ）
五、西方地理学的传入……（ 90 ）
（一）世界最新探险的成就与地圆说……（ 90 ）
（二）世界地理学……（ 92 ）
（三）天文地理学……（ 93 ）
（四）绘制地图术……（ 94 ）
六、西方物理学、水利学、机械制造学的传入……（ 99 ）
（一）物理学……（ 99 ）
（二）水利学……（ 100 ）
（三）枪炮制造术……（ 101 ）
（四）机械器物制造术……（ 103 ）
七、欧洲哲学与宗教思想的传入……（ 105 ）
（一）西方哲学思想的入传……（ 105 ）
（二）基督教思想与中国理学的异同……（ 106 ）
（三）基督教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差异与斗争…（ 108 ）
八、传教士在发展古老中华的医药学、音乐学和语言学中的作用……（ 111 ）
（一）医药学……（ 111 ）
（二）音乐学……（ 116 ）
（三）语言学……（ 118 ）
九、中西绘画艺术的结合……（ 120 ）

（一）西方宗教绘画艺术的传入……（120）
（二）中西绘画艺术的相互影响……（123）
十、早期传教士的功过是非……（126）

第三章　“礼仪之争”与康熙政策的变化

（1644年—1722年）……（129）
一、在华天主教教派间的争斗愈演愈烈……（129）
（一）西班牙多明我教派的教士与耶稣会士之间的冲突……（130）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组建及其势力进入中国（130）
（三）罗马教廷对于东方传教事业控制的增强…（131）
二、康熙初年的大教案——“历狱”……（133）
（一）杨光先发难……（133）
（二）鳌拜兴狱……（134）
（三）康熙昭雪……（135）
三、“礼仪之争”及其实质……（139）
（一）“礼仪之争”的导因……（139）
（二）“礼仪之争”的焦点……（140）
（三）多明我派等对耶稣会士的攻讦……（141）
（四）康熙与教皇对“礼仪之争”的干预……（143）
四、康熙政策的变化……（147）
（一）康熙开始禁教的原因及措施……（147）
（二）教皇公文激怒康熙严行禁教……（152）

第四章　雍、乾、嘉三朝教禁（1723年—1820年）……（154）

一、雍正严行禁教与罗马教廷遣使来华……（154）
（一）疆臣斥教奏疏与雍正严厉禁教……（154）
（二）雍正为什么要严行禁教……（156）

（三）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碑记》……（161）
二、苏努教案……（166）
（一）苏努家世……（166）
（二）清宗室皇位之争与苏努家族获罪……（167）
三、雍正教禁下的传教活动……（175）
（一）天主教暗中扩展教会势力……（175）
（二）传教不绝的原因……（177）
四、欧洲教廷事件和乾隆朝的“闭关政策”……（179）
（一）罗马教廷取缔耶稣会组织……（179）
（二）乾隆朝禁教与“闭关政策”……（180）
五、1784—1785年乾隆朝大教案……（186）
（一）教案起因……（187）
（二）教案经过……（188）
六、1805年嘉庆朝大教案……（192）
（一）教案的肇端……（192）
（二）教案的经过……（199）
（三）教案的余波……（206）
七、嘉庆中后期发生的重大教案……（208）
（一）1811年搜捕旗人教徒案……（208）
（二）1812年西藏马吝事件及贵州驱教案……（211）
（三）1813—1814年湖北、广东驱教案……（213）
八、沙俄侵华别动队——东正教挤入中国……（214）
（一）沙俄东正教在北京建立传教据点……（214）
（二）“布道团”及随团“学生”的不光彩行径……（216）
（三）“汉学家”的真面目……（219）
（四）东正教士大肆进行经济掠夺……（220）
九、雍、乾、嘉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222）

（一）缪勒、戴倍洛等对东方学研究的建树……（ 222 ）
（二）伏尔泰等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介绍与推崇…（ 223 ）
（三）中国文化对西欧社会生活的影响……（ 224 ）
（四）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226 ）
（五）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论争……（ 227 ）

第五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方传教士(1821年—1844年)（ 229 ）

一、十九世纪前期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的变化……（ 230 ）
（一）拿破仑支持法国天主教会与葡争夺保教权……（ 230 ）
（二）法国天主教会鼓吹侵华战争……（ 236 ）
（三）德、意与法国争夺传教保教权的实质……（ 238 ）
二、基督新教入传中国及其侵略活动……（ 242 ）
（一）马礼逊——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基督新教传教士……（ 242 ）
（二）英、美教士的侵华活动……（ 248 ）
（三）《中国丛报》——侵略中国的喉舌……（ 251 ）
（四）传教士与鸦片走私贸易……（ 255 ）
三、“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258 ）
（一）美国牧师伯驾的战争叫嚣……（ 258 ）
（二）英、美等国传教士在战争中的罪行……（ 260 ）
四、另一个侧面的评说……（ 267 ）
（一）传教士在华出版书籍和创办报刊……（ 267 ）
（二）传教士在华办学、兴医……（ 270 ）

第六章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传教运动”的兴起（1844年—1860年）……（ 275 ）
一、不平等条约使禁教开始解冻……（ 276 ）

二、“给还旧址”交涉与教士反攻倒算……（279）
（一）传教士擅自潜入内地传教……（279）
（二）传教士刮起“给还旧址”的风潮……（280）
（三）孟振生神父抢夺北京“教产”……（284）
三、“传教运动”的兴起……（287）
（一）《天津条约》与清廷“传教宽容”政策…（287）
（二）在华各教派为争夺传教势力范围明争暗斗（290）
四、“洋兄弟”与太平天国……（295）
（一）基督教义对洪秀全的影响……（295）
（二）“洋兄弟”的美梦……（301）
（三）“洋兄弟”寄希望于洪仁玕……（305）
（四）罗孝全访问天京……（308）
（五）“洋兄弟”的“庐山真面目”……（312）
五、在华各国传教团体及其活动……（315）
（一）基督新教在华传教团体……（315）
（二）各差会来华传教的目的……（325）
（三）东正教的传教活动……（327）

第七章　近代早期教案及民教矛盾的激化……（330）

一、弛禁后的早期教案（1844—1860年）……（331）
（一）福州黄竹岐民教斗殴（1848年）……（335）
（二）青浦教案（1848年）……（336）
（三）定海教案（1851年）……（340）
（四）西林教案（1856年）……（341）
二、“还堂”事件的恶性发展……（342）
三、《栢德固协议》掀起掠夺房地产的高潮……（347）
（一）强买恶索……（348）
（二）强迫捐献……（355）

（三）盗买盗卖……（357）
（四）低价骗索……（358）
（五）强占垦地……（359）
四、一些传教士、教民的劣迹……（363）
（一）大肆网罗社会渣滓入教……（364）
（二）建立“国中之国”及教士干政……（368）
（三）大肆聚敛财富……（373）
（四）“劝人为善”与“慈善事业”的背后……（376）
（五）列强的经济侵略激化了民教矛盾……（382）

第八章　教案席卷神州大地（1861—1895年）……（388）

一、第一多发期的典型教案（1861—1870年）……（389）
（一）贵阳教案（1861—1862年）……（390）
（二）南昌教案（1861—1862年）……（392）
（三）衡州教案（1862年）……（396）
（四）第一次重庆教案（1863年）……（397）
（五）第一次酉阳教案（1865年）……（398）
（六）第一次扬州教案（1868年）……（400）
（七）台湾凤山教案（1868年）……（401）
（八）第二次酉阳教案（1868年）……（403）
（九）安庆教案（1869年）……（405）
（十）建德教案（1869—1870年）……（406）
（十一）天津教案（1870年）……（409）
二、第二多发期的典型教案（1875—1889年）……（413）
（一）延平教案（1875—1879年）……（414）
（二）建平教案（1876年）……（414）
（三）宁国府两次教案（1876年）……（415）
（四）邻水、江北、涪州教案（1876年）……（419）

（五）济南教案（1881年）……（421）
（六）呼兰教案（1882年）……（421）
（七）第二次扬州教案（1886年）……（421）
（八）第二次重庆教案（1886年）……（422）
（九）第一次大足教案（1886—1887年）……（425）
（十）第一次冠县梨园屯教案（1887年）……（426）
（十一）镇江教案（1889年）……（428）
三、第三多发期的典型教案（1890—1895年）……（429）
（一）第二次大足教案（1890年）……（430）
（二）芜湖教案（1891年）……（432）
（三）丹阳教案（1891年）……（434）
（四）无锡教案（1891年）……（435）
（五）武穴教案（1891年）……（436）
（六）宜昌教案（1891年）……（437）
（七）热河东部教案（1891年）……（439）
（八）古田教案（1895年）……（443）
（九）成都教案（1895年）……（443）
四、甲午战前三十年教案的趋势及其特点……（447）
（一）斗争的趋势及分期……（448）
（二）第一阶段斗争的特点（1861—1885年）…（449）
（三）第二阶段斗争的特点（1886—1895年）…（457）
（四）作用和影响……（461）

第九章　义和团运动前的教案（1896—1899年）……（465）

一、三大危机的加深……（466）
（一）信仰危机……（466）
（二）民族危机……（467）
（三）生存危机……（469）

二、大刀会的反洋教斗争……（476）
（一）大刀会势力的发展……（476）
（二）曹县大刀会与曹州教案……（478）
三、揭开义和团运动序幕的三大教案……（480）
（一）巨野教案（1897年）……（480）
（二）第三次大足教案（1898年）……（486）
（三）第二次冠县梨园屯教案（1898年）……（494）
四、其它教案述略……（499）
（一）濮州抗教事件（1898年）……（499）
（二）永安教案（1898年）……（501）
（三）南充教案（1898年）……（502）
（四）合川教案（1898年）……（503）
（五）铜梁教案（1898年）……（504）
（六）宜昌、长乐教案（1898年）……（504）
（七）利川教案（1898年）……（505）
（八）沂州教案（1898—1899年）……（506）
（九）即墨教案（1899年）……（507）
（十）海门教案（1899年）……（507）
（十一）郯城神山教案（1899年）……（510）

第十章　义和团运动中的教案与传教士（1900—1901年）……（512）

一、以反洋教为导火线的北方义和团运动……（513）
（一）义和团在北京……（516）
（二）义和团在天津……（519）
（三）义和团在山西……（520）
（四）义和团在直隶……（522）
（五）义和团在内蒙古地区……（523）

（六）义和团在山东……（525）
（七）义和团在东北地区……（525）
（八）各省人民纷起响应……（528）
二、传教士——八国联军的特种部队……（529）
（一）传教士在洗劫北京中的罪行……（530）
（二）传教士直接参加侵华军事活动……（536）
（三）传教士瓜分中国的叫嚣……（541）
（四）传教士与《辛丑条约》的形成……（545）
三、义和团运动高潮中的北方重要教案……（549）
（一）巨野张庄教案（1900年）……（549）
（二）奉天教案（1900年）……（551）
（三）辽南、辽东教案（1900年）……（551）
（四）辽西、辽北教案（1900年）……（552）
（五）内蒙萨拉齐教案（1900年）……（552）
（六）内蒙四子王旗教案（1900年）……（553）
（七）内蒙鄂托克旗教案（1900年）……（554）
（八）冀中安平抗洋捐斗争（1900—1901年）…（554）
（九）陕西宁强燕子砭教案（1900年）……（555）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教案……（557）
（一）1900年初中国南方的民教冲突……（559）
（二）两湖人民的反洋教斗争……（560）
（三）赣、皖、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562）
（四）浙江教案……（563）
（五）福建人民的反洋教斗争……（567）
（六）广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567）
（七）四川人民的反洋教斗争……（568）
（八）其它小规模的打教事件……（572）
五、各阶级、阶层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态度和作用…（576）

（一）地主阶级……（576）
（二）农民阶级……（588）
（三）会党……（590）
（四）资产阶级……（594）

第十一章　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的教案(1902—1911年)（597）

一、教士、教民的复仇活动……（597）
（一）继续进行抢劫活动……（598）
（二）霸占估买民产……（600）
二、危害亿万生灵的“庚子赔款”……（606）
（一）大赔款……（606）
（二）地方赔款……（610）
（三）无名的赔款……（613）
三、清室覆亡前的重大教案……（614）
（一）广宗教案（1902年）……（615）
（二）辰州教案（1902年）……（619）
（三）第二次宁海教案（1903年）……（620）
（四）桐庐白布会起义（王锡彤起义，1903年）（621）
（五）四川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1902—1903年)（623）
（六）施南教案（1904年）……（630）
（七）霍山教案（1905年）……（632）
（八）巴塘教案（1905年）……（634）
（九）犍为教案（1905年）……（637）
（十）南昌教案（1904—1906年）……（638）
（十一）开县教案（1907年）……（640）
（十二）大凉山教案（1911年）……（641）
四、这一时期教案的性质和特点……（643）
（一）斗争口号和斗争方式的变化……（643）

（二）斗争形式的多样化及爆发地区的广泛性…（644）
（三）参加阶层的广泛性及与民主革命的关系…（645）

第十二章　中国教徒的自主运动与西方传教政策的变化（649）

一、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运动与非基督同盟运动…（650）
（一）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运动的兴起……（650）
（二）非基督同盟运动的产生……（655）
二、天主教的“中国化”与基督新教的“本色运动”……（659）
（一）天主教的“中国化”……（661）
（二）基督新教的“本色运动”……（666）
三、教会征服中国的新策略与中国民众的抵制……（671）
（一）“迅速传播基督教”……（671）
（二）中国民众为何要抵制基督教……（675）

第十三章　1912—1949年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680）

一、教会兴办的“慈善事业”……（680）
（一）教会学校的宗旨、目的及其发展……（681）
（二）教会医疗事业的大发展……（690）
（三）创办“慈善事业”的目的……（696）
二、大革命时期教会的破坏活动及北方人民的收地运动……（699）
（一）传教士破坏中国革命的活动……（699）
（二）北方人民的收地运动……（703）
三、天主教、基督新教在华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比较……（707）
（一）天主教、基督新教势力的发展……（707）
（二）天主教侵略手段的改变……（713）

（三）基督新教扩大教会势力的花招……（714）
（四）天主教、基督新教侵华活动的比较……（716）
四、土地革命时期外国教会的反共政策……（721）
（一）天主教的“反共扶蒋”政策……（721）
（二）基督新教反对中国革命……（723）
（三）外籍教士刺探红军情况及三边人民的反抗斗争……（728）
五、抗日战争中传教士是日军的帮凶……（733）
（一）基督新教教会扮演的不光彩角色……（733）
（二）天主教教会为日本侵略中国出谋划策……（736）
六、解放战争中传教士的罪恶活动……（743）
七、大陆解放前夕外国教会的“应变计划”……（748）
（一）天主教的“应变”手段……（748）
（二）基督新教的“应变”措施……（754）
（三）外籍传教士撤离大陆……（757）

附录：中国教案及民教纠纷简表……（762）

后记……（890）

第一章　基督教入华之始及中国封建王朝的对策

（唐代—　清初）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究竟最早是在什么时间传入中国？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人又是谁呢？这有好多种说法。

在中国明朝中后期来东方和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教士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是：耶稣的十二宗徒之一的圣·多默（ST·Thomas）①。这就是说，早在中国的东汉初年，也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刚出现早期基督教社团时，基督教就传入中国了。

德国基督教信义会在湖北省漳口地区创办的学院曾经出版的一本书中也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东汉，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后汉马援征交趾时，基督教已入中国。"②

乍看起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东汉的说法似乎也有佐证。其实这种说法来源于民国年间流传的《神仙道鉴》章回小说。这本书是近代道教中人所著，记载开天辟地以后的中外历史，把伊斯兰教（回回教）、佛教、耶稣教、道教放在一块讲，写到汉朝

---

① 《Monumenta Xaveriana》，vol.1，第407、414页。

② 德国基督教信义会编：《路得改教始末》。

时，竟莫名其妙地把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和马援征交趾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并列在一章的回目中加以记述。于是，德国信义会的神父们便认为马援和耶稣教有关系，进而推测出中国在汉代马援时即已知道基督教了。

另一种说法是，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在三国时代。法国天主教驻北京的主教樊国梁在光绪年间著了一本《燕京开教略》，其中说“三国时，关云长奉基督教”，从而证明三国时基督教已入传中国。关云长奉基督教的根据是：在唐宋文坛八大家之首的欧阳修的家乡卢陵发现了一个作叉状的徽号遗物，十字架上有副对联，写着什么“四海庆安……”，还有“赤乌”的年号，此年号是三国时吴王所用，遂以此证明三国时基督教就传入了中国。

但是，也有很多人否认上述说法，甚至认为在唐代时基督教也没有传入中国。如中国元朝时被教皇派驻北京的天主教总主教乔伐尼·蒙高味诺（Giovanni da Montecrvino），曾于1305年从中国寄信到欧洲，他在信中说：“宗徒们，或宗徒的子弟们，从不曾到过这个地方。”①十六世纪中叶，第一个在中国沿海地方登陆、并住过几时的耶稣会士伯来笃（Melchion Nuneg Barreto，S·J·），于1555年11月23日在澳门作了如下记载：“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②

以上诸说，均无确凿的史料作为佐证。笔者认为，要研究基督教入传中国之始，必须以中外史料都有记载，并且尚有实物存在作为根据，这样才能互相印证，视为信史。

①②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页。

一、唐代基督教入传中国

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就现在已经证实的史料而论，准确地说，要算七世纪时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Nestorians）为最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谈起。

（一）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明证——大秦景教碑

大秦即东罗马帝国，景教即基督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陕西西安西郊出土。碑文撰写者是大秦寺僧景净，字体为汉文和叙利亚文。撰刻日期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四日。碑上刻有1780字，碑之上端刻着十字架，两旁有莲花云霓，碑高四尺七寸半，宽三尺五寸。碑侧刻有僧人（传教士）姓名65人，皆叙利亚文。这个石碑被埋在地下的时间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九月三十日颁发了灭教（佛教与景教）谕令之后。碑文记述了景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大意是：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和罗马教皇对立，不被容于欧洲，东徙君士坦丁堡，辗转入波斯，渐东传而至西域（今新疆）。

《基督教纲要》一书对立此碑记述颇详，书中说：

> “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波斯人阿罗本奉其教入长安。太宗命房玄龄西出郊迎，留诸宫中，翻译经典。那时的中国，正值胃欲亢强，广揽文物，百宗万派，汇合来归底灿烂时代。贞观十二年秋七月，太宗命有司，立波斯寺（复改名大秦寺）于京师义宁坊，度僧21人，定名曰景教。高宗时，更命设景寺于诸州，封阿

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至德宗，亦命建寺于灵武等五郡，且於建中二年（781年）特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长安，以志隆盛。”①

石碑出土后，碑文并未剥蚀，所以曾有人疑为伪造。此碑经多人考证，并非赝品。钱谦益的《景教考》②，杭世骏的《景教续考》③，钱大昕的《潜研堂集·金石文跋尾》（卷七），还有意大利人艾儒略的《西学凡·大秦寺碑篇》，都对此碑作了专门的考证。还有若干旁证，如姚宽的《西溪丛话·僧史略》(卷下)，和《释门正统斥伪志》、《唐会要》、《册府元龟·贡元释教录》，以及新旧唐书的记载，均可印证唐代流行景教，是确有其事的。1901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世尊布施论等，也是可靠的证据。

从635年到845年的二百多年中，景教在中国的势力较大，相传房玄龄及郭子仪皆为其信徒。但到了武宗登基，迫害佛教，景教亦受波及，并“勒大秦穆获祆二千余人还俗”④。随即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埋在地下，传布于中国二百多年的景教，便至此湮灭。此碑至出土相隔785年之久。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及其它史料佐证，可以说明基督教在中国唐代有二百余年的兴起与殒殁的历史。

（二）唐代帝王崇奉景教

自唐太宗至武宗的二百一十年间，景教颇得当时帝王及大臣

---

① 谢扶雅：《基督教纲要》，第106页。

② 钱谦益：《有学集》，第44卷。

③ 杭世骏：《道古堂集》，第25卷。

④ 《唐会要》，第49卷。

的赞助。碑文中所举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等，对于景教皆有相当的敬意；其大臣如房玄龄、魏徵、高力士、郭子仪等，亦皆奉命款待。贞观九年，“帝命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十二年又诏令建寺。《唐会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典，来献上京，祥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宣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①

碑与史料所载大同而小异，可见太宗迎阿罗本，是确有其事的。

后来，皇帝还同意把自己的肖像画在景教寺庙的墙壁上。碑云：“旋命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高宗也有同样的尊崇，碑云：“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命宁国等五王，亲到景寺中设立坛场，并且把五代祖宗遗像陈列寺中。碑云：“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又有“天题寺榜，额戴龙书”的话。肃宗又重建景教寺宇，碑云：“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还在耶稣圣诞时送香赐馔，以表他的庆祝。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先景众。”德宗也很推崇景教，碑云：“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唯新景命，化通玄理，视无愧心。”可见景教之兴盛，与佛教相伯仲。

关于景教传教的方法，这在景教碑里，找不出多少材料。不过，当时已有很多西来的教士，是可以在碑文里看出的。与阿罗本同时来中国的有“度僧廿一人”。此后有“僧首罗含、大德

---

① 《唐会要》，第49卷。

及烈”，玄宗曾诏僧罗含、僧普论等17人，与大德佳和。碑云两侧又列名僧徒65人，可见当时西来教士之多。

（三）唐武宗禁教与景教湮没

唐代景教，亡于武宗会昌五年。当时武宗下令毁灭天下佛寺，强迫僧尼还俗，由此而波及到景教。据记载：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阐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明显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①

武宗为什么要摧残宗教？大部分的原因，是经济上的问题。他认为佛教僧尼及景教穆护等，都是些分利坐食的人，应该加以取缔。所以他在毁佛的诏谕中说：

“……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於土木之功，夺人利为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②

但是武宗毁教的理由，其重要的意义，还不是在经济方面，他在诏谕中说：

“是逢季时，传此异俗。……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③

诏谕中所云“异俗”、“西方之教”，可知武宗毁佛之举，是出於排外的思想。佛教是印度来的，景教是大秦来的，都是外国教。所以他毁灭一切宗教而独不及道教，就是这个原因。

景教至此，乃告一段落。而景教徒并未因此而绝迹于中国，有一部分人退入蒙古境。艾儒略《西学凡》中有“祆教至宋之末

① 《唐会要》，第49卷。
② 《旧唐书·武宗本纪》。
③ 《旧唐书·武宗本纪》。

年，尚由贾舶至广州”的话。可见唐代以后，外国人来中国传教仍未间断，景教也不例外。

二、元代基督教再传中国

景教经唐武宗之禁，此后史书少有记载。至宋代又有“祆教”名目，亦为基督教在当时的别称，但活动很少，不另立篇论述。元朝建立以后，有“也里可温”教，据前人大量考证，此即基督教。

（一）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

唐武宗后，中国内地已无基督教存在，但在中国的西北方与南方边远地区，仍有基督教教士的足迹。尤其是北方的蒙古，由于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有特别的关系，基督教士便随蒙古人的势力再度进入中原。据载：

> “当十三世纪时，蒙古的元太祖征扫西域，进迫欧洲东境。欧洲方屡起十字军，与回教国的土耳其人争战，他们认为元帝亦是‘圣教’的同志。那时欧亚之界，已成通道。1345——1347年间，教皇英诺声四世（Innorent）特派柏朗嘉宾（Plano Carpini）访谒钦察汗拔都于萨来，并晋觐元定宗于喀喇和林，对于传基督教事有所接洽。”①

元世祖入主中华，基督教又传入中国。蒙古人呼基督教为Arcoun，名之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是蒙古语，意思是“福分人”，或“有缘人”，或“奉福音之人”。《元史》中屡有“也里可温”、“阿勒可温”、“耶里可温”的文字，均是基督

① 谢扶雅：《基督教纲要》，第107页。

教的音译。据清人洪钧的《元世各教名考》说：

“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

他又说：

“多桑译著《旭烈兀传》，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剌比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①

（二）元代基督教的盛行

元世祖对宗教抱宽容的态度，实行宽大政策，佛、基、回等宗教，他都能容纳，其母别吉太后就是基督教信徒。所以元世祖接见马可波罗后，便命其携书致教皇，并请求派遣道行高深的教士百人来华，还要求取来耶稣墓前灯油作纪念。从此，基督教又在中国盛行起来。

麦克纳在《中国基督教四大危急时期》一文中，在叙述景教之后说：

“基督教在中国本部，未及推广；其在中亚，则继续传布，至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时，东方基督教（指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辖下的教派——引者）日渐来华，重整旗鼓。”②

也里可温教在元朝盛行的情况大致是：蒙古国改元前的1253年，法王路易第九派出教士罗伯鲁（William of Rubruquis）来中国谒见蒙古大汗，请求传教自由。1293年，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会士乔伐尼·蒙高味诺（1247——1328年）奉罗马教

①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

② 见《马可波罗游记》。

皇尼古拉四世之命，以宗教钦使名义，航海来华，赴北京谒见元世祖忽必烈。后来，元世祖的孙子元成宗（铁木耳）接待他极为恭敬。他得到传教许可的明令，就开始了传教活动。1303年，另一位德国籍传教士亚诺尔德·谷洛尼（Arnold of Cosgne）来华，和他住在一起，进行传教活动。

在中国建立第一个大教堂，并在中国设立第一个天主教区的创始人是乔伐尼·蒙高味诺。1298年，经元朝皇帝同意，他在大都（今北京）修建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其中，“有高耸云际之钟塔，内悬钟三具，每时一鸣，以唤信众之祈祷”。1305年，又建立了第二座教堂，1318年又落成第三座①。他还收买7—11岁的男童150名，成立神职班，教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为神职班译出蒙古文和维吾尔文的《圣经·新约》。他在自序中写道：

> “余来华后，未闻西方之消息者，已十二年矣，体日衰颓，旦夕为奄穸中人矣！余之老迈，非因年龄，因余今年止五十有八耳，乃因于劳动及外来之逼迫也。余习蒙古文字，攻其书籍，已译《新约》及大卫之圣诗为蒙古文字，且传基督之道，未尝稍隐。”

他来华的头十一年中，收信徒六千余人，为此他于1307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中国大主教。到1328年（元文宗天历元年），由他布道而信教者，竟达三万多人，连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都成了他的信徒。在此期间，基督教盛行于中国各地。基督教盛行于镇江、杭州的情况，保存在《至顺镇江志》中的《镇江大兴国寺碑文》中有详细记载。

当时基督教流传盛况和势力，从元朝的官制记载中看得更为清楚。《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中有一条记载：

---

① 蒙高味诺：《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等开读了圣旨的上头……。杨暗普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的勾当多有，便有壹佰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

这个记载只反映江南一部分地区的情况。《元史·职官列传》中记载了基督教已遍及全国：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江浙……等省，皆有也里可温居住，并修造了礼拜寺（教堂），如甘州的十字寺等。马可波罗说：“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二所。”同时，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各阶层的人都有。据《元史》记载，“所见某某者，也里可温人”，有达官，有孝子，有良医，有学者，有义士，……而且他们的名氏，又多与古基督徒相同。元代著名的文学家马祖常，原本是聂斯脱里派中的望族，其祖也是历代的大官。从他所著的《曾祖月合乃神道碑》中便可以知道他们是元代大族，都是信奉也里可温教的①。

元代皇帝对也里可温人十分优待，常特诏免租税，除徭役。朝廷还设置崇福司，专门管理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顺帝初年，顺帝还曾与教皇通书信、派使节。

（三）基督教在中国再次踪迹

天主教驻中国第一位大主教蒙高味诺于1328年去世后，罗马教皇又选派方济各会中法兰西斯克派的教士尼克拉继任中国大主教。他来中国时率24名教士做助手。1336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遣使到罗马教廷，教皇又选派了教士若望·马里诺利(Giovanni de Marignolli）为教廷专使，出使中国。若望·马里诺利于

① 《元史》，第134卷。

1342年来到中国时，看见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大起义前的危机，认为元朝统治不会长久，因此他只住了三年便启程返回欧洲。临走时，元顺帝苦苦挽留，他却置之不顾，执意要走①。他取道马剌甲、锡兰、耶路撒冷等地，于1352年到达亚昧浓（Avignon），向教皇陈说继续派遣教士至中国的必要性。虽然后来教皇先后派过三个人〔1362年派出的叫多默（Tomasso），1370年派出的叫伯拉多（Prato），1426年派出的叫加布阿（Capua）〕，但他们都没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便无形地停顿了。

元朝凭藉武力所创建的国家，不到一百年便被推翻了。同时，在中亚细亚等地的汗国也被回教所占领，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着阻碍。不但元朝的国运从此告终，传教士在中国惨淡经营将近百年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击。

罗马教皇本想把中国天主教的工作，继续地保持下去，他在1370年以后曾多次派主教准备来中国。可是，考斯米萨来亚（Cosme Sarai)没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 of Prato)带着60名同伴，也不知下落；佛兰西斯波多(Francis of Pedio)带了12个同伴，也失踪了。从而使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无法继续下去。

关于这一代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情况，现在很难加以考证。根据一些不很确切的报告，说中国归化天主教的有三万人。不过这些人都不是汉族人，而是以维吾尔人及蒙古人居多。当时民众还没有受到天主教的重大影响。模勒氏（A.C.Moule）说："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信徒们的故事，并不是天主教的教会在中国开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义上或是在实际上，是信奉耶稣的外国人，在中国久居，或是暂居的记载。"②他又根据古经上题着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② A C. Moule：《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没有中国字，断定蒙高味诺大主教所付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亚细亚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汉人。所以，那些方济各派的教士，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可供人们考证的确实很少。唯一可佐证的只有现在保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老楞佐图书馆中的一本拉丁文《圣经》。

最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元朝基督教会和唐朝景教一样，为什么会“失踪”？为什么它们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会这样小？当然，情况和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元朝挟带了蒙古民族的习惯来统治中原地区，处处与汉人显得异样。由于汉族人民的民族思想比较浓厚，对蒙古民族的统治持反对的态度，所以对元朝皇帝与官员所热烈提倡的基督教，汉人总感到格格不入，十分冷淡。尤其在唐朝与元朝这两个时期中，基督教的活动都在君王与贵族之间进行，与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发生什么深厚关系。因此，君王的权势一倒，基督教的势力也随之削弱乃至被消灭。这就是说，当汉族人起来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时，盛极一时的基督教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原来就与基督教站在对立地位的儒、释、道三教，此时反倒发展了起来。所以，基督教不能在华迅速传播的原因，并不全是中国人一概排外。

三、明代天主教各派传教士涌入中国

蒙古人的元朝政权颠覆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就沉寂了，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不久，欧洲基督教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天主教徒受着文艺复兴的鼓动，随着商人的足迹，图谋向外发展而东来。传教士东来时，踏着“征服海外者”所走的路程，有时还和他们坐在一条船上。远征的利益，一步比一步地显露；商业的竞争，也随着一步比一步地激烈；传教士叩开东方大门的信念，也

愈来愈迫切。叩开中国大门，是十六世纪天主教对华的态度。

（一）耶稣会士沙勿略第一个来华传教

十六世纪中，第一个叩扉于中国这扇关着的大门的，是被传教士和教徒们所推崇的“东洋宗徒”——耶稣会士沙勿略（Xavier）。1542年，他到达了印度的果阿城，因为他听说到中国去经商的人很多，也就到了马剌甲。后来，他凭着与一个叫雅吉洛的日本人的信教关系到了日本，并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渊源于中国，所以他决心先到中国。他曾希望从日本国王那儿得到一张护照，能把他送到中国皇帝那里。但是欲得护照，必须请求诸侯们盖印，而那时日本的诸侯们非常专横，无法取得护照，他只好孑身离开日本。1551年，他到了中国广东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当时，倭寇正在骚扰中国海岸，闽粤海岸海盗横行，沿海居民、航海商旅往往惨遭劫掠，或遭监禁，或被杀戮，尤其是对欧洲人的危险性更大。沙勿略冒险前往，侥幸安全到了中国。他到了上川岛，曾设法与当地中国商人联络，希望他们能够把他带到广东，费了不少周折都被拒绝。后来，他花了二百块钱雇佣一只小船，想秘密进入广东。许多教士都规劝他，认为这种做法有两个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人为避免官府耳目，有把他扔在荒岛的危险；第二，若被广东官员发现会把他送进监狱，因为那时凡不得皇帝许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沙勿略不得不改变计划。后来他又想冒充暹罗公使馆人员随暹罗公使一道去北京。因他在1552年12月3日死在上川岛上，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

（二）葡萄牙传教士伯来笃、公匝勒始居澳門

继沙勿略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来华传教士是葡萄牙籍耶稣会

士伯来笃（Barreto）。他是明朝建立后，第一个正式得到官方许可在中国登陆的传教士。最初他计划去日本，途中遇到了风暴，被迫改驶中国海岸，1555年7月中旬抵达三年前沙勿略到过的上川岛。8月到11月中旬，他曾两次进入广州，目的是去援救三个被拘囚的葡萄牙传教士。在他去广州时，与他同来的另一个耶稣会士公匝勒（Gonzalez），随同葡萄牙商人，自动从上川岛移住澳门。

澳门是一个极小的半岛，面积不过四百八十公顷，在香山县境，当时属广东省肇庆府管辖。澳门起初是个荒僻的地方，后来竟变成世界著名的商埠。传教士公匝勒是最早受马剌甲司铎的委派，到那里去传教，他便成为澳门的开辟者之一。

伯来笃从广州回来后便寄寓澳门。后来，他对居留在澳门的300多名葡萄牙人举行圣祭，不久因病返回欧洲。伯来笃到广州时，曾给停留在澳门的传教士们带来叩开中国大门的希望。当时一般谈论中国传教问题的人都是抱着乐观态度，认为中国人并不是固执地拒绝外来宗教。但是要把一个新的宗教传进中国，必须得到官员及皇帝的允许。所以，有人主张由葡萄牙国王派遣公使团向中国皇帝进贡，是藉以取得皇帝许可的根本办法。

后来，伯来笃被调往别处，另一教士克卢斯返回葡萄牙，只有公匝勒一人，留在澳门传教。到1563年，澳门至少有八个耶稣会士，外来人增至五千左右，其中九百个是葡萄牙人。在这些葡萄牙传教士中间，有许多人计划进入中国传教，所以那些希望到中国传教的教士们，都在澳门等待机会。那时的澳门已经成为非正式的居留地。他们既然不能进中国内，就只好在澳门经营宗教事业，到1565年已经有五千以上的教徒。公匝勒在这里建立起会所及教堂。耶稣会士卡内罗（Garneiro）奉教皇之命，于1568年来到澳门作第一任中国主教。已在澳门经营教务十一年之久的公匝勒，被马剌甲主教召回马剌加。卡内罗为了请求中国官府允准在

广州成立会所，曾两次前往广州。由于中国人总是怀疑葡萄牙人有占领土地的野心，因而官府没有允许他在广州建立会所。传教士无法进入中国内地，只得在澳门劝人信教。

（三）西班牙奥斯定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受阻

1575年，明朝统兵王望高为征讨海盗林凤(即林道乾)，到了马尼拉。马尼拉当局便把传教士欲到中国的事情与之商量。结果，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拉达（P.de Rada）、马林（Marin）随王望高到了福建泉州，并至福州谒见闽省大吏，要求居住在中国传教，未得允许，两教士返归其殖民地吕宋。不久拉达与同伴阿尔部开尔克（Aluquerque）又随王望高的军舰欲到中国，中途为王望高所戏弄，把他们抛弃在桑提阿哥（Santiago）海岸沙滩上，翻译及仆役皆被杀死，两位教士也奄奄一息。但奥斯定会并不因此沮丧，仍旧不断地努力，这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嫉妒。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深恐西班牙人的势力膨胀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便秘密地和罗马教廷商议，把中国、日本及附近各岛，尽归澳门的主教管理，这使西班牙人受到了许多限制。及至1573年耶稣会士范礼安被任命为远东视察员，带领四十多名新会士（其中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居多）到了澳门之后，国籍的隔阂才渐渐消除。

（四）意大利耶稣会士进入广东、浙江传教

范礼安是意大利人，1566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在他带的四十余人中，罗明坚与利玛窦二人后来成为著名的传教士。熟悉华语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被范礼安选中以后，于1578年偕同巴范济（Franeois Pasio）、利玛窦(Mathien Ricei)

同来澳门。罗明坚回忆范礼安时说："他用谦逊坚忍，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第一个用中国语言文字，将耶稣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更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玛窦领入中国。"①

当时，葡萄牙人与中国人贸易被限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贸易场所在广州城廓，日落后葡萄牙人必须归舟，不许逗留在中国境内。罗明坚呈请许其居留陆上，中国官吏认为这个请求正当，而且喜欢他善汉语，乃允许他在暹罗贡使的驿馆居住。1582年，应两广总督之邀，他与巴范济同至肇庆，获准居于东关某佛寺中。这座佛寺便成为中国内地的耶稣会第一个会所。后来总督黜职，二人被迫返回澳门。巴范济赴日本，次年偕利玛窦重赴肇庆见新总督。一日，他们见城墙下有一老年病者，便叫入寓所为之诊治，病愈，令受洗入教。这是第一个受洗的中国人。1584年11月21日，在广东肇庆给一个福建籍的秀才进行公开洗礼，洗名保罗。同时受洗的，是一个肇庆青年，姓氏写作Kin Ni Ko或写作Cin Ni Co，受洗之名称若望（Jean）。后来，两广总督调任，便带罗明坚至其故乡绍兴，总督之父因此接受洗礼。

当罗明坚第四次寄寓广州城的时候，西班牙籍的耶稣会修士桑彻斯兹（Alonso Sanchez）从马尼拉来到中国。他于1582年3月14日由马尼拉起程，随身携带各种礼品及致广东总督的书信，4月6日被狂风刮到福建海岸，经过三个星期的艰苦航行，5月2日抵广州。但，桑彻斯兹等却被认为是"为调查中国海口而来的侦探、小绺、盗窃等"②。香山知县把他和他的同伴都关进监

---

① 〔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② Pierre du Jarric：《Histoire des Choses les Plus Mémorables Arrivees Tant ez Indes Orientales que Autres Payo de la Decouverte des Portugais Bordeaux》，1610年版，Vol. I，第663页。

狱，经过罗明坚再三请求，才得释放。1582年5月31日，他们一同回到澳门。巴乃拉和罗明坚离开广东省城（肇庆府）的时候，万人欢送，总督暗中派人通知他们再照上次所送来的货物送礼。后来，罗明坚身染重病，不能远行，只好令教士巴乃拉一人前去给总督送礼。罗明坚嘱咐他务必将望远镜送去，这是中国很重视的一件东西。他又许诺在病体复原之后，要亲自送一架带车轮的大钟给总督。这架大钟是印度果阿城的耶稣会会长司铎得自欧洲，转送给中国传教会的。两广总督收到礼物后随即把两座佛教寺院整修好，作为传教士们的寓所和做圣祭的教堂之用。这样，1583年9月10日，罗明坚偕同利玛窦、巴范济等，正式移居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创立了在中国最初的传教基地。

（五）利玛窦——杰出的意大利传教士

自元代灭亡，基督教随之消失，至明代末年基督教卷土重来，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第三期。在参与第三期传教的教士们当中，成绩最著者，要算意大利的利玛窦。利玛窦身着僧服至广东肇庆，便在那里学习中国语言。两广总督代为奏请朝廷，许其留居肇庆。奏请的理由是：

> “因澳门商旅杂沓，市阛喧闹，为交通孔道，而不便于研究学术。拟在肇庆建筑房屋，设立教堂，得以祈祷求学、幽居、默想，对于所学，必更能增进。”①

从此，利玛窦便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并逐渐扩展，大力进行基督教宣传。第三时期的基督教宣传，与前两期大不相同：前两期都是受着皇帝的欢迎，大官的提倡；这一期则纯靠教士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借助帝王的推崇。

---

① 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

利玛窦（Mathien Ricei），字西泰（依照中国习惯，于姓名之外特题字号），1552年生于意大利马知拉打（Macerata）。他的父亲曾做过高官，希望儿子能步其后尘，所以叫他到罗马京城去学习法政，但他在十九岁时却有志于修道。他不愿婚娶，摒除名利，产生传道四方之志，遂加入耶稣会。他把自己的意愿写信告诉父亲。他的父亲坚决反对，打算往罗马去劝阻他，正欲动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他的父亲以为这是天主的意思，便写了一封回信慰勉儿子。利玛窦除研习文理科学知识之外，还进圣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学。他立志要到印度传教，1577年辗转数国至印度。1580年受司铎职，次年与范礼安等一起至澳门。这时，中国政府已允许葡萄牙人把澳门作为居留地。耶稣会士在这里已创立会所一座，并且建立了主教区。利玛窦到澳门之后，范礼安便命他学习汉语。范礼安认为，前此诸教士工作未获成效，皆因不懂汉语之故。罗明坚、利玛窦等努力学习，能操汉语，获得两广总督嘉许，才使耶稣会得以由广州进入肇庆，打下传教的基础。

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两广总督刘节斋得知利玛窦欲去内地传教，遂行文韶州府，给与附城河西官地建造天主堂。数年后，利玛窦又去江西临江府传教，受到皇室的建安王的热情招待。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随大吏入京朝见皇帝。其时，日本丰臣秀吉用兵朝鲜，形势危急，没有朝见机会，只好南返。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初，利玛窦偕伴八人同入北京，向明神宗献天主圣像、天主经典、圣母像，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图等物。

利玛窦有才识器量，且善于交际，当时许多名公巨卿都与他结识。他又重视学问，常把西方天文历法、舆地数理知识告诉士人，受到倾慕。他还研究中国经史，习文章，通书法，以此与士子文人相赠答。对他及他与士子交往情况，当时就有人作了记载和评价：

"利玛窦，字西泰，以入贡至，因留不去。……往时予游京师，曾与之邻，果异人也。初来即寓香山澳，学华言，课华书者凡二十年，比至京已斑白矣。"

"利西泰发愿，力以本教诱化华人。……性好施，能缓急，人亦感其诚厚，无敢负者。饮啖其健，所造皆精好，不杖于母术，而日用优渥，无窘状，因疑其工炉火之术，似未必然……"①

温陵李贽（卓吾）是当时名士，在南京时曾访问过利玛窦，谈论甚洽。李曾赠诗一首：

"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首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②

另一名士李日护也有赠诗：

"云海荡落日，君犹此外家，西程九万里，东泛八年槎。蠲洁尊天主，精微别岁差。昭昭奇器数，无本浩无涯。"③

1609年，利玛窦在华首创信徒团体——天主母会。利玛窦除了为入教者领洗、讲说教理外，还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学，造诣很深，四书五经都能熟读，与人交谈常引经据典，阐明本义。许多教内外人士致书请他解答问题，他都亲自裁答，虽缕缕长言，亦不惮烦。在北京建筑大礼拜堂时，他亲自督理工程。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年仅五十七岁。遗命以龙华民(Longobardi)继任。万历皇帝以北京二里沟佛寺及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赐为利玛窦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处）。在北京与南京、南昌、韶州的诸士大夫都来参加葬礼，京都兆尹王玉沙撰文立石以

---

①②③ 见《万历野获编》。

资纪念。当时朝廷内臣中，有人认为外臣赐葬，向无此例。宰相叶向高说："遑论利氏之道德学问，即就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亦足当葬地之赐。"

利玛窦之死，对基督教在中国以莫大影响。临终之前，他曾致书同僚，云："我思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之良法，莫如我死。"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为广布基督教义而献身，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作出的卓著贡献，中国的史书上过去和现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六）天主教在中国广为传播

到利玛窦逝世时，已开设教会的，有下列几处：（1）肇庆府于1583年建一住宅；（2）韶州府于1589年建立教堂与住宅。郭居静于1590年到此工作，到1606年已有教徒八百人；（3）南昌府于1595年有一小屋作教堂，1607年李玛诺又以百金买一较大之屋；（4）南京于1599年建造堂宇；（5）北京于1605年以五百金购一屋建立教堂，即南堂；（6）上海于1608年由徐光启、郭居静开教，建立堂宇，两年中付洗者有二百人；（7）杭州于1611年由李之藻、郭居静开教。

当时奉教人中有名望的有：（1）瞿太素，江苏常熟人，太宗伯文懿公长子，1604年领洗于罗如望，圣名依纳爵；（2）徐光启，上海人，官至礼部尚书，1603年领洗于罗如望，圣名保禄；（3）李之藻，杭州人，1610年病笃时在北京领洗于利玛窦；（4）杨廷筠，杭州人，1611年经耶稣会士郭居静领洗入教；（5）冯应京，安徽盱眙人，读《天主实义》而受感；（6）李天经，河间

吴桥人，以进士仕京师，由徐光启劝道而入教；（7）张焘，李之藻门人，与其师同受洗于利玛窦，圣名弥额尔；（8）孙元化，嘉定人，在北京受徐光启感化于1621年领洗，圣名依纳爵；（9）王徵，陕西泾阳人，官至布政使，圣名斐伯理；（10）韩霖，山西绛州人，在北京与徐光启同时受洗，圣名多默；（11）段衮，山西绛州人，在北京做官时奉教；（12）金声，安徽休甯人，崇祯进士，与徐光启善而奉教，其女守贞不嫁亦奉教；（13）瞿式耜，为瞿太素之侄，万历进士，受洗奉教；（14）张庚，福建晋邑人。

与利玛窦同时到中国传教的人，除上述罗明坚为先躯外，还有：

麦安东，是葡萄牙人。他的号叫立修，在1585年偕孟三德到澳门，协助罗明坚、利玛窦在内地传教，曾随罗明坚至绍兴，并与利玛窦共事于肇庆、韶州，1589年病逝。

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也是葡萄牙人，号甯环，1572年至印度，奉范礼安之命，辅助罗明坚、利玛窦传教于澳门。后被罗明坚带往肇庆，总督曾面询其曾否思家，乃答曰："永与华人处，是我愿也。"后因肇庆教士为总督所逐，至韶州劝青年华人入教。不久，孟三德遣返澳门，1600年病殁。

石方西（Fracco de Petris），意大利人，号镇宇。1590年奉范礼安之命至澳门，以麦安东病殁，赴韶州继其职。抵韶不久，有盗夜劫其室，被盗斫伤其头，并伤仆役三人。官府捕盗，判处死刑。石方西等请宽其罪，仅杖二十，释之。石方西助利玛窦传教，体魄虽健，然未三年，病终。

郭居静（Lajzare Callaneo）亦意大利人，字仰凤。石方西病殁，利玛窦独居韶州，乃召郭居静来助。利玛窦第一次赴南京时，留郭於韶州管理教务。后偕利玛窦同赴北京，及还南京，被遣归澳门，报告旅行经过，事毕遂携庞迪我至南京。利玛窦最

后离开南京时，郭居静留居南京，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处教务。后来范礼安卒，郭遂继其视察之职，留居澳门。其时，荷兰人因嫉葡萄牙远征得利，乃遣海盗扰沿海岛屿，并欲谋据台湾，进取澳门，于是葡人设防以备。当地居民见此情形，遂有外国人谋据中国，并推郭居静为帝的流言。时有不良教徒，以教士们不袒庇其讼事，怀恨于心，从中煽动，酿成焚烧教堂的暴动。流言既炽，教士等处境甚危。两广总督派人调查，召见郭居静，欲观其武器库。郭居静导之入图书室，指其藏书曰："此我所持以谋据中国之武器也。"又导之学校，而指其学生曰："此我将率以侵据中国之兵卒也。"这件事发生在1606年。后，郭又带熊三拔（Sallathin de Ursis）来中国。到南昌后，三拔赴北京，郭赴南京。1608年，徐光启因父丧回上海，道经南京，邀郭居静同往开教。当时的上海，商业兴盛，已成为重要城市，居民约四万户，人口约三十万人。以徐光启位高望重之故，易以号召，得以建一华丽教堂。郭居静居上海两年，受洗者有二百人，后又奉耶稣会会督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之命，偕同金尼阁（N.Trigault）、钟巴相赴杭州开教。李之藻是杭州人，已在北京受洗，时也因丁忧在籍，力助开教事业，并劝其友杨廷筠入教。徐、李、杨三人，是当时开创教会的三大柱石。杭州建堂，施洗日臻兴盛，两地教会，皆由郭居静主持。郭住杭州约三十年，1640年逝世，年八十。

龙华民，意大利人，号精华，1597年到中国。先在韶州传教，遭受甚多困难，仇教的民众、和尚对他屡加诬陷。1603年在韶州靖村建立教堂，此为中国明代建立最早的教堂。因其尚在利玛窦所建北京教堂之前，故于1609年被召至北京，任中国全国耶稣会会督。其第一项工作，即为编纂洗礼用语，因其意见与利玛窦不合，成为引起后来礼仪问题讨论的导火线。1616年发生南京教案，在华教士尽被驱逐，龙华民也在其中。及至1626年熹宗帝与满洲争战，乃召回

诺教士，谋军事上的帮助，龙华民得与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同至北京，仍做传教工作，并常至山东泰安传教，劝化受洗者甚多。龙华民九十五岁时因跌伤去世。其时已为清朝，顺治帝赐葬银并致祭。

罗如望（Jean de Rocha），葡萄牙人，号怀中，1598年被派至韶州，后派至南京，曾为瞿太素及徐光启施洗。南京教案时，罗如望偕中国修士邱良厚避难建昌，曾为翰林万玛窦全家施洗。随后至福建漳州开教，又至江苏嘉定传教，并建立教堂一所。他在南京教案时曾与徐光启起草奏疏，辨明沈潅之诬，熹宗召其回北京并任耶稣会会督。1623年去世，葬于杭州方井南。徐光启全家持服，如遭父丧。

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西班牙人，号顺阳，1599年至澳门。范礼安遣他往南京与利玛窦共事。利玛窦第二次入京，携以同往，得其助力不少。曾赴北京近郊各村庄传教，领洗者数十人。利玛窦死后，为之奏请葬地，并奉朝命改正历书，被暴徒殴击，几濒于死。南京教案时被驱逐。1617年甫至澳门，得病而死。

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意大利人，号有纲。1606年被派至北京，利玛窦令其精研中国语言。当时，因中国钦天监推算差错，朝廷命庞迪我与熊三拔共同修历，著书推算经纬度数与日食结果。虽遭官吏嫉恨，却得万历帝的欢心，及至南京教案起，熊、庞二人同被驱至澳门，1620年病殁。

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号海岳。1585年至印度，1596年任澳门会团长，并视察韶州、南昌、南京教务。1604年至北京，偕郭居静南下，次年携中国修士邱良厚返南昌传教，受洗者有二百余人，并劝化一明朝宗王的全家受洗。四年后重返澳门任澳门会团长职，后又奉命视察各处教会。1637年曾上书主教，自言居东方五十一年，任传道长或咨议愈四十九年。1639年

病殁于澳门。

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葡萄牙人，号揆一。曾至北京协助利玛窦工作，专事培养教徒，自任讲授之职，因而受洗入教者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后与阳玛诺共管韶州教务，曾在建昌建一教堂。清兵入关，乃往广州传教。

上述教士，皆与利玛窦有直接关系。与之同时工作的人，尚有若干中国人士。在当时传教工作上有相当贡献的，除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外，还有：

钟巴相，一名铭仁，是第一个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他的号叫念江，广东新会人，懂西方语，曾任利玛窦翻译，从行数年。当时，华人信教颇易遭意外困难，他在韶州曾受刑负枷被驱逐后，又在杭州受杖而囚禁。至北京后，复受第三次禁锢，皆因其宣传福音之故，在南京教案中受苦最多。1622年殁于杭州，入教三十二年。

黄明江，与钟巴相同入耶稣会，偕传教士入内地传教，在南京曾劝说瞿太素入教。曾至南昌传教，并奉视察员之召至广州。当时正流言葡萄牙人谋反，新入教的背教人向总督诬告，说黄明江是郭居静的间谍。1606年黄被捕入狱，倍受苦刑，问无实据，本可释放，诬告者以私藏火药，再被囚禁，受重笞，体无完肤，次日复遭刑讯，抵狱即死，年仅三十三岁。

游文辉，字含朴，澳门人。1598年随利、郭二教士在南京传教，1605年得范礼安许可，入耶稣会为修士。后随利玛窦至北京。利玛窦临终时，游曾在身边。1630年殁于杭州。

雷安东，澳门人，在北京入耶稣会，常偕庞迪我传教京师近畿各村庄。虽体弱多病，仍能不辞劳苦，为费奇规赏识，遣至韶州休养。1611年又由韶州赴澳门，殁于舟中。

邱良厚，字永修，澳门人，父母皆基督教徒，故自幼即入教，后为副教师，偕罗如望居南昌、建昌数年。1621年随毕方

济（F.Sambiasi）至北京，为龙华民的勤劳伴侣，受其劝化而受洗者甚多，其中有曾经龙华民施洗的太监庞天寿。就是邱良厚劝化的。1640年殁于北京。

钟鸣礼，字若翰，与其父念山、其兄鸣仁同在澳门入教。当其兄随利玛窦赴北京时，他留居在江西南昌，后从传教士王丰肃于南京，遂入耶稣会。利玛窦死，曾往北京会葬。在南京教案中被刑残废，几濒于死，但在1621年却被耶稣会除名。

石宏基，澳门人，字厚齐。1612年随郭居静至杭州，次年随林斐理至处州，又曾在南京、绛州、建昌等处传教。

邱良禀，字完初，生于澳门，是邱良厚的兄弟，1610年入耶稣会。在韶州修院肄业时，被拘入狱，倍受苦刑，后被释放，曾派往安南南圻。长于口才，劝化多人入教。

倪雅各，字一诚，生于日本，由范礼安遣回中国工作。1604年随李玛诺至北京，入耶稣会为修士，居北京多年。

以上诸人，是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传教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此后在明末清初之间，尚有几个重要的外国教士：葡萄牙的阳玛诺，在1611年与费奇规同至韶州。法兰西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0年至澳门，次年被派至南京，又工作于杭州、北京等处。意大利人艾儒略（Jules Aleni），1613年被派往北京，曾至开封访求犹太教经典，后劝化扬州某大吏信教，教名伯多禄（Treire）。因伯多禄任职陕西之故，随赴陕西，后由陕西至山西，劝化若干人信教，赴常熟为瞿太素之侄、进士瞿式耜施洗，名公巨卿与他往还者甚多。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也是意大利人，1613年潜入北京匿居徐光启宅，后至上海、松江、开封、南京各处传教。葡萄牙人傅汎际（Francois Furlado Heurtado）1618年随金尼阁来中国，后至杭州与李之藻相识，李死后他便至陕西西安建立教堂一所。他曾经与艾儒略分主南北两教区：南区包括南京、福建、湖广、浙江、江西、两广，由艾儒略

管辖；北区包括京畿、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由傅汎际管辖。日耳曼人邓玉函，也与金尼阁同来，被召至北京，助熊三拔等编修历书，因南京仇教事起，乃南归。迨事平，复召西士修历。时在北京者，仅龙华民与邓玉函二人，乃命邓主其事。邓玉函于1630年卒，汤若望、罗雅各继续其未成之业。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von Bell）也是日耳曼人，邓玉函卒后，朝廷召他入京编修历书。中国历官颇嫉恨他，幸得徐光启以阁老地位加以庇护，故未遭意外。徐光启将死，曾托其他信教大臣保护若望。当时汤若望曾为若干太监施洗，其中以若瑟与庞天寿为最著名。若瑟在宫内传道，宫内妇女、太监及后妃因此而信教者有二百余人。汤若望的活动大多发生在清兵入关以后，在本章第七部分还要详述。

以上大多数中外传教士，都能恪守教规，诚心广布基督福音，并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很少带有侵略的目的。他们在中国是受排挤和虐待的。但是，他们在中国所开创的传教事业，为此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了最早的信息和依据。当然，这不能由他们负责。至于少数传教士借教行私，亦不乏闻，这是基督教的根深蒂固的老毛病，也是不治之症，非马丁·路德等人可以力挽。他们和十九世纪为殖民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批不法传教士相比，确有较大的区别。

四、天主教教义的儒学化

（一）适应中国民俗的传教方式

从沙勿略教士叩扉不开，到利玛窦进入内地传教，受到达官

贵人的赞许，士子民众的领洗，不过只有30余年。是什么缘故使中国人能接受教士们的说教呢？是中华民族风习改变了？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发生了变化？还是中国闭关的大门自动打开了？都不是，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原因是，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改变了传教的方法——使天主教的说教中国儒学化，从而符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这一点，正如利玛窦自己所言：

> “为了使一种新宗教的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神父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接待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然而，他们努力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教导这个异教的民族，那就是以身作则，以他们圣洁的生活为榜样。他们用这种法子试图赢得人们的好感，并且逐步地不用装模作样而使他们的思想能够接受不是用语言能使他们相信的东西，但又不危及迄今已取得的成果。当时传教尝试的最大困难是不懂语言，还有百姓的天生毛病。从他们入境时起，他们便穿中国的普通外衣，那有点象他们自己的道袍：袍子长达脚跟，袖子肥大，中国人很喜欢穿。”①

利玛窦从1582年8月7日登岸以后，就立刻从事于这种广博的探求。他帮助范礼安编辑了一部书，名叫《中国之奇异》，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各种风俗，如人民城镇，天然物产，土地肥瘠情形，朝廷收入，各地财富，内地税收，手工业管理，政府及内政等等，应有尽有。这是一部了解中国的较为完备的参考书籍。范礼安在叙述中国人民种种卓绝的特质以外，还提及几种中国民

---

①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卷，第5章。

性的缺点，如官吏的残暴，兵卒的怯弱，惧外及排外的心理，奸盗邪淫等紊乱社会的事情，也都有具体的报告。与这部书一起发行的，还有一张由利玛窦按照中国典籍绘成的中国全图。为介绍这部书，范礼安还写了几篇关于中国的衣服、文字、礼仪、宗教、语言的论文。

为了使传教工作顺利进行，他们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对宗教的看法及宗教在中国的地位，剖析了中国人的宗教心理。范礼安在著作中说：

> “中国有许多教门，差不多全是根据从日本流入中国的几种名叫‘释迦’（Xaca）的佛经而成立；但是因为官僚阶级读书知理心地透亮，知道这些教仪是虚构的，是哄人的，并不加以重视……他们更喜欢为一般民众应用的宗教，把中国古时的几位哲学家言及道德与良好政治的训言当教仪。”①

在中国民众中，僧侣的种类极其复杂，他们不如日本僧侣那样被人重视，一般说来，朝廷、官府、官吏对他们极为藐视，对他们如同对待下等的百姓一样。据载：

> “可是在他们当中，时常也有几个有势力而又被人敬重的僧侣，但是他们大多数是凶暴的、不贞的，总要比日本的僧侣恶劣些。还有一种遁世的僧侣，隐居山寺，持斋修苦，度过清贫的生活，在中国人的眼中，看他们如同圣人。至于提起偶像，除去一些下级民众对它们略施表面的虚礼，并无人诚心挚意地敬事，官吏更是丝毫不会注意这件事……。总之，中国人主要的偶像，就是他们的官吏，尊敬、崇拜，胜过敬畏偶像一百

① Monumenta Xaveriana：《Dans La Collection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Jesu》。

倍”①。

利玛窦的看法和范礼安完全一样。1583年2月13日，他在澳门写道：

“中国人可是敬礼偶像，但是在他们得不到所要求的恩惠时，便对它们大加毒打，不久，又因着恐惧魔鬼的报复，而重新虔诚尊敬；他们对于神的敬畏心，实在太薄弱，所以对于僧侣也就不大重视。”②

在1584年9月13日，利玛窦又自己承认他的无能，说：

“若是谈及中国的派别及宗教，我请求大家容恕，因为在中国没有一门宗教，没有一种教仪，不是万分糊涂的，就是本教门内的僧侣也不知其所以然。除去从远古流传的教门以外，在中国还有三种不同的教派，内中以儒教最为通行，大概这些崇奉儒教的学者，都不信灵魂不死，并且不信有鬼神。他们只知道尊敬覆载养育人类的天地，并不盼望得到天堂上的幸福。”③

利玛窦来中国之初，未谙中国文字，后经苦心学习，逐渐通晓。他对六经子史等书，也苦心研读，求通其意。当时有钟明仁、黄明江等，系粤中人，跟随利玛窦习基督教义，此为利玛窦入中国后领洗的第一批奉教之人。其后宣教韶州，遇姑苏瞿太素，深相契合，瞿也从之游。利玛窦始入中国时，衣饰略仿缁流，瞿太素劝其改易儒服。利玛窦曾将中国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其国人读而悦之。孔孟之书，得播西方，实乃利玛窦之

---

① Monumenta Xaveriana：《Dons La Collection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Jesu》。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卷，第5章。

③ 〔法〕裴化行（H·Bernarb）：《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功。厥后，利宣教南雄府，遇王应麟等，亦深相爱慕。再后，又沿赣江北行，宣教金陵，因为所遇不合，乃离开金陵到南昌。一日，上谒建安王，王宾礼之，说："凡有德行之志，吾未尝不友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乡，愿闻其友道何如？"。利玛窦著《交友论》，献给建安王，深得王的欢心。从此使利玛窦等人懂得了若要使天主教盛传中国，首先要使天主教的说教和中国的孔孟儒家学说杂揉在一起，投达官贵人、士大夫之所好。

（二）天主教教义与儒学异同之比较

这里要探讨的是两种思想能否揉合在一起的问题。天主教出现在西方欧洲，而孔孟儒学出现在东方古代中国，两者都是伴随着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整个过程而逐步规范化、性理化，都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从它们的信仰道德等方面来看，两种说教有着杂揉在一起的共同点，即存在着使天主教教义儒教化的可能。

第一，基督教的一神崇拜，与中国固有的对天的观念，原本没有多少冲突。在中国的对天的观念中，虽不免有多神崇拜的倾向，但在多神之中却有一个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执掌着统治全世界的大权。这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同是一个创造宇宙、管理万物的主宰，并无任何区别。这只要看一看中国古人怎样解释'天'字就清楚明白了。《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含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诗经》类的古书里，有不少"上帝临汝"、"赫赫上帝"等句子，可以证明古代人民具有以"天"为主宰的信仰。到了春秋时代，在一部分学者的思想中，从哲学范畴的角度上，把主宰的"天"变成为义理的"天"了。如孔子的天行思想，老子的自然主义，庄子的天钧天倪，孟子的天与人归……等等，修改了对天神的观念。但是孔孟并不把对天神的崇拜根本推翻，还承认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的主宰。即使机械唯物主

义的老庄思想中犹有“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其有真君存焉”一类的话。特别是那个保存古代信仰的墨子，他在《天志篇》里所描写和阐释的‘天’，不独是一个赏善罚恶的主宰，也是一个爱人利人的父亲。

第二，基督教的教义都包括在一个‘爱’字里，从基督教的“牺牲”，彰显了上帝的爱。耶稣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可见在基督教“爱”的含义里，不单是赈济贫乏，还有两点重要的意义，就是：（1）为弟兄舍命；（2）爱仇敌。保罗在《哥前》十三章阐明‘爱’的意义中，包括着自我的道德：在消极方面，他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欢喜不义”；在积极方面，又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

这些道理，在中国古圣贤的教训里，也有许多相同的说法。孔子所主张的“唯仁”的道德中，就有“仁者爱人”的说法。张西铭的“凡天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的思想，不也是基督教济困扶危的爱么？尤其是墨子的“兼爱”主义，他所说的“兼相爱”必须从“交相利”上去实行，也有“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等与耶稣相类似的话。孔孟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不也是基督教的道理么？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不少真正“杀身成仁”、“以德报怨”足以动天地、感鬼神的事情。而中华民族精神，始终认为“乐善好施”为一大美德。

第三，基督教的道德主张，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价值不是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圣经》中载：“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饼，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话”。由此可见，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

要。同时，基督教也不主张让人轻看肉身生活，保罗很明白地要人知道："身体是上帝的殿，若有人毁坏上帝，也要毁坏他。"

提到改造自我，基督教认为，第一件要紧的事就算是悔改。在祈祷的含义里，最重要的成分是检查自己，叫人觉悟已往的错误，树立一个未来的新志愿，然后，努力向上，追求到完全的地步，把个人完全的道德看成为建立天国的基础。总之，对自己方面而言，爱人如己，为道德的标准；悔改、信仰为建德的力量；祈祷、默念为修养的功夫。

中国也注重精神生活，注重道德修养，与基督教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视富贵如浮云，求精神之逸乐，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士子文人的人生观。"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非功利态度，也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来人们所共守的准则。儒家所主张的"反身而诚，慎独克己"等，无异于基督教的祈祷、忏悔。儒家的人格阶梯，包括于"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三句话。圣人是人格上的完人，而圣人却是法天的。尤其是道家、墨家，更是毫无掩饰地"以道以天"为道德的根源。这与基督教的以上帝的道德标准相一致。要建立完美的道德，先须从自身起头，所谓忠恕，所谓洁矩，都是正己而后正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由个人而及于社会。可见，中国在道德上的主张，并不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而是利人的大同思想。

基督教是要建立起地上的天国，没有国家的界限，没有人种的区分，是一个绝对平等的世界主义。这是基督教的特点，也恰是中国人所服膺的教训。我们看孔子的大同思想，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墨子的"视人国，若其国；视人家，若其家"等等的主张，这正与基督教若合符节。

（三）利玛窦推行天主教教义儒学化及其结果

从上述诸点来看，两者确有互相融通的可能。那么，利玛窦在使天主教的宣传和中国儒家学说杂揉上究竟采取了哪些作法？对这一点，传教士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的札记中，说得很多，总括起来有：

第一，他善于交际中国朝野的学士名人。当初到香山澳的时候，便得制台陈文峰的邀请。及至端州，又获交郭制台、王太守，赠以地图、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报时具等物，所以才能把肇庆作为立足之地。后来，获交名士姑苏瞿太素、京兆王玉沙。在江西得谒中丞陆仲鹤以及建安王，作《交友论》以献。显官如王忠铭、赵心堂、祝石林、王顺庵、吴左海、冯琢庵等，名儒如李心齐、李卓吾、李公素等，皆与他交往。据艾儒略记载，共不下百人。他曾经刘心同的介绍，入京觐见，又获交京中名士，并使徐玄扈（即光启）、李存我（即之藻）、杨廷筠等入教。此三人为当时中国天主教的柱石，称为“圣教三杰”。利玛窦著作皆出此三人之手。

第二，他努力研究中国文化，主张融通儒理。利玛窦住端州约有十年，专习语言文字，诵读中国书籍，六经子史，无不通晓。不仅能写出流畅的中国文字，并能摹拟中国下层社会谈吐，熟悉各种风俗礼节，了解中国人原有的宗教信仰。对于儒家的祀祖祭天，极主容纳，并且尊崇孔子学说，所以得到士大夫的欢迎和朝廷的宠遇。但也因此引起教会内部的反对，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后来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他努力介绍西方文化，启发中国人的闭塞思想。当时，中国人不知道世界之大及有科学之名，一见世界地图、时辰钟等物，咸惊为见所未见。自从利玛窦首先以西洋学说输入中

国，才使中国在天文、历数、舆地等等学术上开了新局面。他所译著的《天学初函》、《分理器》两编，一是发挥天主教义，一是介绍格致之学，对当时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信教者日见增多，1585年仅有教徒20人，翌年增至40人，1589年有80人，1605年有1000多人。到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中国人经他付洗的基督教徒已有2500余人①。

值得注意的是，最先被劝化受洗的教徒中，多数竟是精于孔孟儒家经书而进入仕途、并占着社会上最高位置的士宦，他们为朝廷所重用，是一些鸿儒硕学、高官显贵，这是发人深思的。南京的都指挥秦某全家及亲友全都被接受入教，这位指挥的教名为马丁②。另一位是万历年间的太仆卿李之藻，他是在利玛窦去世前夕，卧病在床时领洗的。还有一位是万历神宗时期礼部尚书瞿文懿之子瞿汝夔，他是当朝著名的学者，洗名依纳爵。最著名的是1603年领洗的徐文定公徐光启，洗名保禄。据载，徐光启十六世孙为徐福运，徐福运的外孙女之女——宋倪氏的哲嗣宋子文和她的三位东床孙中山、孔祥熙、蒋介石，都是徐光启的戚属。而孙中山、孔祥熙、蒋介石皆奉基督新教，是否与此有关呢？

天启崇祯年间，天主教传布的情形，其详情未能尽考。据言，1624年（天启四年）耶稣会在中国有重要的教会六处，自1610—1629年（万历三十八年至崇祯二年），在中国布道的耶稣会士共19人，1627年（天启七年）各省共有信徒13,000人。天启间开教似较万历增加。《破邪集》中载崇祯年间黄贞的《请颜茂猷先生辟天主教书》云：

“艾氏（艾儒略）言会友二十人来中国开教，皆大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

德一体也。今南北两直隶、浙江、湖广、武昌、山东、山西、陕西、广东、河南、福建、福州、兴泉等处，皆有天主教会堂，独贵州、云南、四川未有耳。嗚呼，堂堂中国，鼓惑乎夷邪？处处流毒，行且亿万世受殃，而今缙绅大老士君子入其邪说，为刊刻天主教会义，为撰演天主教序文，贞目睹所及甚多，此其可愤可慨者五也。”

黄贞所说，虽出于反教，但并无过事夸张之意，反映了崇祯间天主教盛行中国的实际状况。考当时教会的创立，除肇庆、韶州、南雄、南京、北京等处是利玛窦生前已经开教之地外，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天主教士的活动。如杭州开教在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其时郭居静、金尼阁应李之藻之邀，行教其地。其后，此地教会因李之藻、杨廷筠等提倡，颇为发展。山西绛州开教，始自高一志。河南开封开教，始自毕方济，其后罗雅各也曾主持其地的教会。扬州开教，始自艾儒略。陕西、西安开教，始自汤若望，进士王徵奉教甚笃。福州开教，也自艾儒略始。山东开教，以龙华民之力为多。武昌开教，始自何大化。此外，嘉定、常熟、上海等地，也均有教会的建立。崇祯十三年，神甫利类思到四川传教，后因张献忠入蜀，只身逃归①。总之，崇祯末年，天主教已遍布中国各重要地域。

在利玛窦去世后，传教事业有较大的发展，1627年中国天主教徒有13000人，1636年有38200人，1650年竟达到150000人②。1664年，教士们向教皇报告说，有三十位耶稣会士在中国各省传教，已建立的教士住院四十二处，教堂一百五十九座，教徒

① 《圣教入川记》。

② Intorcetta（殷铎泽）：《Compendiosa Narratione》，1672年刊本。

248180人，平均每年增加新教徒7000余名。1671年4月18日耶稣会士殷铎泽向罗马教廷的报告中说：1667年，仅耶稣会所管辖的教友有256880人，教堂一百五十九座，教士住院四十一所；多明我会教士于1650至1664年间，付洗华人3500名，管辖教堂二十一座，教士住院十一所；方济各会教士于1633至1660年间，付洗华人3500名，管辖教堂三座，教士住院一所。这样看来，止于1667年，中国天主教中教徒已有263880余人，教堂一百八十三座，教士住院五十三所①。

在这近27万名教徒中，有许多是当时朝廷的要员，甚至封疆大吏。据1636年统计，明朝的天主教教徒中，一品大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余人。在晚明桂王时代，司礼监总揽军政大权的宰相庞天寿就曾领洗入教，洗名亚基楼（Achille-ne）。

1700年时，中国天主教教徒增至30万人。到了康熙末年，教徒稍有减少。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虽严行禁教，但教徒也不少于20万人，而清廷却无所察觉②。

五、明代南京教案

（一）导因——中国传统信仰与天主教教义的冲突

当利玛窦等从广州到肇庆、端州，再进入南昌、南京、北京等地顺利地进行传教时，一股抗拒欧洲人在中华大地传教的思潮

---

① Intorcetta：《Compendiosa Narratione》，1672年刊本。

② 《通报》，1920—21年，第123页。

在潜行滋长和扩大，最终导致了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传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教案——南京教案①。此教案发生前十年，在教士活动频繁的江西省就已经出现了要求驱逐教士出中国的事件。据统计，整个明朝时期发生的这种事件达54起之多，而且每次事件都首先发生在士子及官吏阶层。这就说明，尽管教士们为了避免在传教时引起中国人的怀疑和反感，努力把天主教教义儒学化、中国化，但它毕竟是来自西方的宗教思想，从根本上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相抵牾，使后者受到冲击，使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信仰受到挑战。因此，当着天主教教士踏上中华土地的第一天起，这种冲击与反冲击的矛盾就出现了，而且随着传教的深入而日益尖锐，最后势必造成教案纷起。

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怎么会被冲击？民众对宗教的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首先，罗明坚、利玛窦等并未真正了解中国各阶层对宗教的传统观念。诚然，罗明坚和利玛窦都是具有聪明、锐敏、清晰头脑的人，但是他们毕竟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曾被那些接近自己的一些仕宦、学者的精神状况所感动，但事实证明，这些人对于任何教义都采取同样的态度，对于超物质的领域，根本无诚笃的信仰。于是教士们不得不把传教的重点转向平民身上去，并且过于乐观，小看了将来面临的困难。他们“以为中国的民众若是有上主的许可，可以很容易地归化”。这句话表明，他们并不了解弥漫在中国下层民众中的迷信气氛，是怎样的深厚，它有时能征服高傲的学者。在中国，并没有坚定的、完全的、纯粹的信仰，没有象天主教经典上所明白确定的信条，更没有为实现信仰而甘愿牺牲生命、亲友、父母及财产的。在中国，信仰不过是一种散漫的联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疑惑，信仰里面含有否定的成份，

① 西方传教士称鸦片战争前的“教案”为“教难”。

比之肯定的成分略少一些。在中国，除一般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僧侣、道士外，没有人真正信奉佛教或道教。至于人民举行佛教或道教的仪式，都是出于恐惧或诱导。等到这些仪礼一经儒学化，人们便将这些事完全抛弃，并且加以反对。

同时，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整部的神异的传说，它们生自民间，颇带虚妄及狂诞的迷信意味，但是官家的藏书库内的书籍，却认为这些都是实在的事实，以致流传广远，浸淫着民众的意识。例如，早在1584年，驻在肇庆府的教士们在万花塔的背面建筑寓所的时候，就被认为冲犯了“风水”，说他们阻止从塔内流向全肇庆府地面的福气，并扬言要对传教士进行报复。又如，教士们开始在中国传教时，他们以为把一个穷、老、病而又无人怜恤的苦人收留下，是很好的事情。哪知这个老人受洗以后不多几日，即行死去。于是到处哄传，说传教士所以收留这个老人，是为了提取他的脑髓。

其次，从基督教输入中国的历史进行考察，它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其具体表现是：

第一，中国有祖宗崇拜的习惯，各阶层人民都把祖宗放在第一位。根据宗法社会家族制度的原则，祭祖是一件维系“以家族为单位”的良法，被一般人视为极重要的事情。这与基督教主张的“除上帝外不得崇拜别神”的信条不合。基督教排斥祭祖，认为这是迷信，而中国人却以反对祭祖为忘本。

第二，中国自信文化极高，视中国以外的民族的文化水准皆甚低下，所以有“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自尊。这不但对基督教有此态度，反对佛教的理由也大都出于“戎狄是膺”这一点。但，近百年来，当中国在国际上受到侵略后，反对洋教的斗争就超越了鸦片战争前的“教难”的范围了。

第三，中国人民的思想浸润于儒、佛教义之中，历时已久，一以纲常礼教为伦理的中心，一认三世因果为社会的信仰。而基督教所

主张的自由平等，却给予儒教以打击；所主张的现世生活，予佛教以难堪；其抨击偶像反对迷信等，皆是动摇儒佛两教的地位。

第四，中国乡村生活中，每以迎神赛会为唯一的娱乐与乡谊团结的象征，并认为这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而信奉基督教的人却反对参加此种活动，认为此举是破坏团体生活的不良行为，乃至群起著文、讲演加以攻击。

第五，中国的伦理，以孝顺父母为中心，养生葬死，是子女的唯一义务。基督教揣来的西方小家庭制度，每每发生儿子与父母分居之事，父母死后又不举行追悼祭祀等仪式。这在中国人看来，大违孝道，甚至被斥之为罪人。

第六，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一向抱宽容态度，一个人往往可以信仰几种不同的宗教，既信儒，又信佛、道。而佛教又能迎合固有的儒学，变更其性质。基督教为保持其独特本质的纯洁性，不肯有丝毫迁就，对中国固有的宗教习惯，一概予以排斥。因而人们把基督教视为固有宗教的破坏者。

第七，基督教自身也给人以怀疑之点。除上述几点之外，最可指责的就是宗派的分歧。各派教士之间往往互相攻击，不独有所谓的罗马的天主教，又有传自英、美、法、德等不同国别的路德新教，乃至被认为含有政治背景。此外，如初期教徒的借教行私，引起教案，尤给人以不良印象。至于传教方式，如当众宣讲，男女杂沓之类，非中国人民所素习。而且，担负宣教之人，又往往是中国社会舆论最为鄙视之人。

（二）黄贞等人反天主教学说的建立

从明代发生的教案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情况下，传教士受着当地人的排挤，甚至为群众殴辱或捣毁寓所，也有为官府拘捕、囚禁或驱逐出境的。当时有一个天主教神父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南京教案大搜捕前叫谢务禄）在调查了明朝时期的情况后说："传教师等所经危难之多，几出人意想之外。我曾调查南京仇教以前教案之数，共有54案，要以传教初年发生于广东省为多。"①

不过这些教案属于地方事件，多因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而起，一经说明，即告平息。明清时，教士们本着耶稣的牺牲精神，息事宁人，不欲使事端扩大，缔结恶感，虽曾受物质损失，身体痛苦，也抱"犯而不较"的态度，泰然处之。这和十九世纪以后的情况大不相同。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侵略者的政治需要，各种天主教修会、基督教差会纷纷涌入中国，充当侵略者扩张和侵略的政治、思想、文化工具，因而就造成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信仰和生存的危机，所发生的教案都具有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性质。而明、清（前期）的教案，并不具有反外来侵略的色彩，更多的是特殊的民族心理所造成；加上欧洲人的习惯不同，种族不同，在有着数千年特殊文化的中华民族眼中，自难免有干戈歧视之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中国儒者几千年来传统的态度。所以历来就有用文字来攻击基督教的。

明清时代攻击基督教最有力量的，莫如明末黄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请辟天主教书》，以及王朝式的《罪言》，钟始声的《天学初徵再徵》，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李生光的《儒教正》，陈侯光的《辩学刍言》等等。

黄贞是一个儒家学者，但又信奉佛教，他自称为"天香居士"、"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为立场，他说：

---

① Alvare de Semedo（曾德昭）：《Semedo Histoire》，第317页。

“佛道之高，以摄九十六外道之法摄之，免其惑世诬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祇之上。”他曾经致书他的老师颜茂猷，列举天主教的可患可愤者五条，请其师著论辟之。他的《破邪集》中收集了许多非教的文章。如张广湉的《证妄后说》中有“西人诬妄先师”的话；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中有“诡张为幻，左道惑人”的话；释普润的《诛左集缘起》中有“斩祖先之祀，乱秉彝之大伦，于是集缁素之文，以诛左道”的话。黄贞欲鼓动佛教徒组成联合战线，所以便引出许多和尚的作品，如普润的《诛左集》、密云的《辨天三说》、袾宏的《天说》、圆悟的《辨天说》、通容的《原道辟邪说》、如纯的《天学初辟》等。但更多的却是一般士子文人的非难。如：王朝式的《罪言》，钟始声的《天学初徵再徵》，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李生光的《辟教辩正》，陈侯光的《辩学刍言》等，都是非教有力的文字。他们非教的理由，大都以天主教破坏中国伦理纲常为骨干，以阴谋不轨为罪状，故能唤起许多人的同情和参与。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发生的南京教案，把非教见之于行动。这时距利玛窦之死，只有六年。利玛窦在世之时，深得朝廷欢心，故教会势力虽日益扩大，反对的人虽然增多，但却无可乘之机。至龙华民继掌教务，凡祀天、祭祖、拜孔等仪式都严行禁止，直接与中国传统思想对抗，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特别是在官吏、士子中间反教的思潮日益公开化，这对传教士十分不利。

（三）沈潅反教奏疏与万历逐教

南京教案是由沈潅的奏参所引起的。他是浙江吴兴人，以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之职，他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之

禁为根据，力主排斥天主教。他在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八月及十二月连上三张奏疏，参劾教士。他的奏参标题是《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他所说的王化，就是儒家文化。

沈潅提出了禁止天主教的理由，主要有：西方教士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嫌，当禁者一；西士劝人但奉天主，不可祭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中国名教，当禁者二；西士私习历法，有乖律例私习天文之禁，恐创为邪说，淆乱听闻，当禁者三；西士劝人信奉夷教，擦圣油，洒圣水，聚男女於一室，易败风俗，乱纲纪，当禁者四。

沈潅上疏后，南京都城诸大臣，如晕文辉、余懋孳、徐如珂等，皆起而附和，一时反教之声甚嚣尘上。沈潅在奏折中说：

> “从来治历，必本于言天。言天者必有定体，尧典敬授人时，始于寅宾寅饯。……月之晦朔弦望，视日之远近，而星之东南西北，与日之短永中相应。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解之者以天体之运有恒，而七政运行于天，有迟有速，有顺有逆，犹人君之有政事也。则未闻有七政而可各省为一天者。今彼夷立说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为一天。……其为诞妄不经，惑世诬民甚矣。”①

这种从学识方面来驳斥教士们治历之谬，是欲改变朝廷对教士治历的信任。这种以尚书、尧典、舜典为根据的方法现在看来，是毫无学理上的价值。

沈潅抓住祭祀祖宗问题攻击传教士，在当时最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因为中国几千年祭祖的习惯，是儒家教孝的要道，一般反对基督教的理论中，都以这点作为重要理由。所以他的奏疏中有：

---

①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臣又闻其诳惑小民辄曰，祖宗不必祭祀，……今彼直劝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由前言之，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由后言之，是率天下而无父子。何物丑类，造此矫诬！盖儒术之大贼，圣世所必诛，……"①

在他看来，这种破坏中国儒家文化的大罪状，是决不可以容忍的。但这理由尚不足以定教士们不赦之罪，所以他又举出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说教士们有图谋不轨之意。这在第一疏中，还说的比较隐约，只说："闻其广有资财，量人而与，是以贫愚之徒，有所利而信之，此其心怀叵测……"。"现今两京各省有几处屯聚，既称去中国八万里，其资财源源而来，是何人为之津送"？

沈潅第一疏在万历四十四年五月，疏入未报。七月，徐光启上疏竭力为天主教辩护。此疏被教中人称之为《辨学章疏》，开头就说：

"臣见邸报，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内言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一云妄为星官之言，士人亦堕其云雾。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连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信向之者臣也，与言星官者臣也，诸陪臣果应得罪，臣岂敢幸部臣之不言从苟免乎！"②

疏中对西方教士推崇备至，其中一段云：

"……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指西士言）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

①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② 黄伯禄：《正教奉褒》。

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相相符合，是以历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①

徐光启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基督教信徒，并且证明这些教士，都是有德有学之人，他们到中国来无非是劝人为善，绝无阴谋。进一层说到他们所传之道，不但高出佛、道二教，而且与儒学道德相符合，希望朝廷能本容纳佛回之例，容纳他们。最后又列举检验方法三种，处置方法三种，用以断其是非。所谓检验之法：（1）将该教经典译出，看是否是邪说左道；（2）召集有名僧道，互相辩驳，定其是非；（3）将该教已译诸书及其教中大意，略述成书，以供参政。所谓处置之法：（1）供其费用，不必收取外国捐款；（2）令本地人士联保具结，以察其有无不端行为；（3）调查信教者有无过犯。这张奏章，得到御批“知道了”三字，反倒把沈潅的奏章搁了起来。

但是，沈潅不肯就此干休。他一方面逮捕信教的华人，一方面又上第二疏，对教士“阴谋不轨”说得格外明白：“裔夷窥伺，潜住两京，则国家之隐忧当杜也。”②

七月二十一日，沈潅令巡城御史孙光裕捕获耶稣会士王丰肃、谢务禄及华人从教者十四人，并幼童五名。八月十四日，又逮捕钟鸣礼、张宗等八人。沈潅的两次逮捕，俱未奉朝廷明令，仅上奏两疏奏请朝廷颁禁教之令。

沈潅在第二疏中所举理由，一曰：“丰肃神奸，公然潜住正阳门里，洪武冈之西，起盖无梁殿”；二曰：“城内住房既据洪武冈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於此，意欲何为”；三曰：“从其教者，每人与银三两，尽写其家

① 《正教奉褒》。

②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案史纲》。

人口生年月日，云有咒术，后有呼召，不约而至”；四曰：“每月自朔望外，又有房、虚、星、昂四日为会期，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尤其重要之点是：“七月初才有邸报，而彼夷即于七月初旬俱揭，及二十一日已有番书订寄揭稿在王丰肃处矣。横弄线索於其间，神速若此，又将何为乎？”这明明把反叛的罪名，加在教士身上。所以说，“一朝窃发，患岂及国”，请求朝廷，速即处分。疏上之后，仍无影响。故又于十二月上第三疏，重申第二疏中的理由，并强调说：“伏戎于莽，为患叵测”。还以闽海士民所说的教士曾借天主教名义袭夺吕宋国土和已捕钟鸣礼等的审询情形作为证据。

当时万历皇帝虽不相信他的话，但经不起那些仇教人的一再诬诉，结果便有放逐教士出国的明谕。谕令于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颁发，迫令西方教士回归本国。于是庞迪我、熊三拔、王丰肃、谢务禄等俱于万历四十五年，被押解广东。其他宣教的西方教士，则多遁迹隐形，投寄民家以避祸。当时，钱塘杨廷筠退官居里，请西方教士寓其家，阴为庇护。其后，庞迪我、熊三拔卒于澳门。而王丰肃则改名为高一志，谢务禄改名为曾德昭，复潜入内地行教。

关于南京教案牵涉的人员，资料记载不大一致。在沈潅的第二奏中说“搜获者十三人”。但在这两案审讯的记录中，钟鸣礼案则有八人，钟鸣仁案成年人十一人，幼童五人。可见当时逮捕的人，必不止仅仅审讯案中的十余人，其中也有非基督徒而牵连在内的。兹将被难人名列表于下：

南京教难人名　　（表一）

姓名	年　岁	籍　贯	职业	进教缘由	判案结果
钟鸣礼	34	广东新会	修士	其父入教	送法司定罪
张　寀	22	山东典沃	推水	同乡称说	同上
余成元	29	南京卫 原籍江西	种园	因表叔曹秀　劝	同上
方　政	32	安徽歙县	描金	其叔入教	同上
汤　洪	32	上　元	未详	其兄舅皆入教	同上
夏　玉	33	南京卫	卖糕	因曹秀劝	同上
周　用	68	江西东乡	印刷	因王丰肃劝	释放
吴　南	24	羽林卫	印刷	未入教	同上

南京教难人名　　（表二）

姓名	年　岁	籍　贯	职业	进教缘由	判案结果
钟鸣仁	55	广东新会	修士	其父入教	送刑部定罪
曹　秀	40	江西南昌	结帽	因妻疾祈福	同上
姚如望	61	福建莆田	挑脚		同上
游　禄	53	江西南昌	髡头	因罗儒望劝	同上
蔡思命	21	广东新会	书童	投王丰肃家	同上
王　甫	31	浙江乌程	看园	因余成元劝	递解回籍

张　元	32	江西端州	结帽	因仰慕王丰肃	发县看管
王　文	30	江西湖口	补网	因姐夫曹秀劝	释放
刘　二	39	江西都康	木匠	因王丰肃劝	同上
周可斗	27	江西湖口	结帽		同上
王玉明	29	福建邵武	煮饭		同上
三　郎	15	上　海	孤儿	由姐夫送入天主堂	递解回籍
仁　儿	14	直隶保定		由父卖与庞迪我	发僧禄收养
龙　儿	14	直隶漆水	孤儿	由伯父卖与庞迪我	同上
本　多	14	广东东莞	父当军		交伊父领回
熊　良	14	江西南昌	父木匠		同上

关于南京教案的情况，曾德昭教士作了一些记载：

“当此时间，诸教徒之表示，皆无愧于神甫，无谋自救或轻其缨绋而自辩无罪者。有数人且欣然受拷讯，惟愿为信仰而受苦刑，惟恐不能殉教而死。……中有二人被痍死。一名Pierre Hia，南京人，年二十二岁，入教已五年，德行素著，是为宗教而死于狱中之第一人。次名Guillaume Vem，已婚，服役于神甫所，死时较后。又有一教徒名姚如望，好学深思，曾制四旗，上书其姓名籍贯职业，以一旗插头上，被捕后，口称愿为天主死。尚有军官二人：一名Jgnace Tsen，一名Luc Tchang。铁工一人，名Anere Hiang。教授诸神甫华

语者一人，名philippe Sin，其人因此被夺功名。”①

这里所记的几个人，除姚如望外，都没有中文姓名；上表中姚如望，或者就是一个人。关于这次教案的材料，虽不十分充分，但还是可见当时的基本情况。

六　明末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再兴

南京教案发生后，教士传教活动不敢公开，仅能暗中进行。但后来，竟出现了明廷宽容、甚至求助于传教士的事情，故使天主教在明朝最后数十年间再度盛行起来。

（一）明末王朝及晚明政权对传教士的依托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与努尔哈赤等在东北进行战争，明大将杨镐四路丧师，京城大震。徐光启上疏请练兵自效，于是神宗皇帝迁擢徐光启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徐光启素与西方教士相善，知其火器之术甚精，可令军士学习以备边急。因此致书李之藻，请他遣人往澳门购置枪炮。当时，李之藻退官居里与杨廷筠商议集资，并于万历四十八年遣门人张焘往购。张焘至澳门，葡萄牙人闻之甚喜。张集金购得大炮四门，派出军事技艺精湛的头目四人，另加通事共六人，一同至广州待命。旋因徐光启受参劾被罢职，顾虑炮到之日，无人主持，即令中止。张焘遂留广州，西人也回澳门。

天启元年（1621年）徐光启奉旨复职，李之藻也被起用为光

① 曾德昭：《Semedo Histire》，第318页。

禄寺少卿，掌工部清吏司郎中事。李之藻上疏，请耶稣会士协助赴澳门购买西洋枪炮。张焘也于此时在澳门自筹资金，将先前所购西洋炮运到江西广信。兵部遣守备孙学诗驰往广信取炮，是年十二月间运抵北京。

1622年（天启二年），广东、福建一带海疆不靖，海盗横行。传教士奉谕旨往澳门，商请葡萄牙国驻澳门水军派炮船、兵弁捕剿，葡官喜而应允。“未几，盗悉扑灭，荷兰国人又侵扰澳门等处，葡师亦舍力攻击，荷人遂远遁。上德葡人功，犒赏甚厚，并嘉奖教士。”①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镇守宁远，把张焘所购西洋大炮两门运往辽边，与女真接仗，竟获大捷。明帝将此炮奉勒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自从孙学诗迎取西洋大炮进京后，明廷愈感西炮铸造放施之术，为必不可少，故先后多次移文两广总督胡应台，令招谕澳门教士来京听用。天启三年四月，葡萄牙头目七名，通事一名，伴随十六名耶稣会士来京②。教士艾儒略、毕方济等，即于此时一同抵京。其后，澳门西方教士屡次来京供职。崇祯二年，教士陆若汉、公沙的西劳等，率葡兵数百人至京，二人效力疆场。陆若汉受伤，赏其南还调理。公沙的西劳阵亡，赐葬澳门三巴寺旁。明人以西洋炮术请耶稣会士来中国，而会士也欲求得朝廷欢心，乐为所用。从此耶稣会士又可自由往来内地，立堂宣教。此为明朝宽容教士及天主教再兴的首要原因。以上是明末王朝对传教士依托的第一个原因。

万历年间，历法失修，推验多误，朝议修改。万历三十九年

---

① 黄伯禄：《正教奉褒》。

② 〔意〕卫匡国：《鞑靼战记》。

（1611年），五官正周子愚题奏："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不及者，当今译上，以资采择。"①礼部因奏："请精通历法如邢云露、范守己等，颇为时所重，请改授京卿，共理历事；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历理，可与庞迪我、熊三拔等同译西洋之法，俾邢云露等参订修改。"不久，邢云露、李之藻被召至京，参与历事。万历四十一年，李之藻已改衔南京太仆少卿，遂奏上西洋历法，陈述台监推算日月交食时刻亏分谬误甚多，而力荐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阳玛诺等，说他们所论天之历数，有昔贤所不及者，请令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礼科姚永济也极力赞同。终因庶务因循，旧习已深，积重难返。未能开局。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发生，传教士多被驱至澳门，译订历法之事，因而中废。

天启元年（1621年）春，邢云露再次详述古今日月交食之事，例举明代授时疏弊，论证西洋新法的周密。奏章下礼部复议。崇祯二年五月朔，有日食，台监奉命推算，前后数刻皆不合。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推，与实际俱合。于是礼部由反对开局而变为奏请开局修改旧行历法，并令徐光启督其事。徐光启请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等，用新法相参较。其时，龙华民、邓玉函等皆居于京，而罗雅各则传教开封，汤若望则开教西安，皆奉命来京参修。不久，其书告成，名《崇祯历法》，但因治历者意见分歧，未能及时颁行，明朝就灭亡了。教士以历法见重于崇祯朝，故其教自然不为朝廷所禁止，致使天启、崇祯两朝时间，天主教在华传教未受禁阻。此为天主教在明末最后数十年间再兴的第二个原因。

---

① 黄伯禄：《正教奉褒》。

（二）外国教会势力渗入宫廷、王室

明末王朝及晚明政权依托于传教士的第三个原因，系宫廷信教者众多。近现代国外研究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汉学家们，多言明思宗也信奉天主教，并举他数毁宫中佛像为证。此说虽不能成为充分证据，但也不无参考价值。《烈皇小识》一书肯定崇祯皇帝曾信奉天主教。书中云：

>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徐光启，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供养诸铜佛像，尽行毁碎，至是悼灵王病笃，上临视之，王指九莲花娘娘，现立空中，历数毁坏三宝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讫而薨。上大惊惧，极力挽回，亦无及矣。”

《烈皇小识》所载虽近虚妄，但所说思宗奉教一事，当必传闻有据，非尽出于虚构。如思宗奉教之说不误，则当时宗室内臣皇亲眷属，必多受其影响。所以《正教奉褒》中称，崇祯末年，宗室奉教者114人，内宫奉教者40人。其言当有所据。这正好说明晚明政权对教士及天主教托佑依服的心理状态。

清军入关前，明宗室内信教人数众多的原因，与前述信奉天主教的司礼监总管、军政大权掌握者庞天寿(教名亚基楼)可以自由出入宫廷有直接关系。他领洗奉教后，便把天主教和耶稣会士们介绍给皇室，于是皇族中人纷纷奉教。到1636年，已经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入教者也多达80余人①。

1648年，南明永历桂王朱由榔嫡母王太后奉教，洗名赫烈纳，生母马太后洗名玛利亚，王皇后洗名亚纳，皇太子慈烜洗名

---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公斯当定，付洗的教士是耶稣会士瞿安德（Fr·Andrew Xavier Kalller，S·J·）。同时，宫中领洗的有50人。太后曾遣使至澳门献祭，并欲遣使致书罗马教皇。庞天寿本愿自往，太后以其年高，改派耶稣会士卜弥格（Fr Michael Boym）带三封信到罗马：一封是王太后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其余两封是王太后和庞天寿分呈给教皇的。请求多派耶稣会士（司铎）来中国传教。

王太后给教皇的信上日期是1650年11月4日，信中说：

"……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祈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①

教士卜弥格偕随侍二人赍书前往，先至澳门，因事被阻，留一年始得解缆西渡。至印度卧亚（果阿），又被阻。登陆西行，经波斯、叙利亚等地入地中海。因途中屡被留难，二年后始至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及至罗马，教皇因诺森十世（Innocent Ⅹ）已逝世，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Ⅶ）即位，验明使节，即行召见。教皇的复书由卜弥格带回。卜弥格行至安南之东，病卒。教皇复书后未能达桂王之手。其时，明室残祚，余灰已烬，即使教皇也无能为力挽救明朝的灭亡。

七、清初是在华传教士的黄金时代

（一）传教士在王朝更迭间的对策

明亡、清兴之际，散处在各地的西方传教士，由于各人所处

① 信的原文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菊生先生于1911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转录自故宫博物院的《掌故丛编》。

的环境不同，对当时的政治变动所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如意大利人艾儒略、阳玛诺，在福建延平比较艰苦的环境中著书、传教。在南京的毕方济则充当了明福王的使臣，前往澳门向葡萄牙人搬兵，冀图恢复明室。福王死后，唐王、桂王偏安西南期间，毕方济一直是晚明王朝中的重要人物，直到清兵破广州时为止。在成都的利类思（L·Buglio）和安文思（G·de Magalhaes）当上了“大西国皇帝”张献忠的“天学国师”，获得了“直接次于阁老之次的位置”①。

当时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有汤若望和龙华民。龙华民此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自然也不能长途跋涉，逃至他处避难。汤若望时为北京教会的负责人，在兵荒马乱之中，一直留在北京，所以如此，据说是“盖其以此教区开辟不易，不愿弃之也，况其职在援救不能逃亡之教众欤？”②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固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汤若望当时已看到明朝的大势已去，自己又是历官，将来不管谁做皇帝都会给他委以重任，因而有恃无恐，留京待变。关于这一点，汤若望在明亡前就说过：

> “有时我们的数学家吓吓我说，皇上的恩典并不是永世长存的。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这个皇帝不在了，会再来一个，对我也许比他更好’。”③

1644年，清朝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从这一年一直到1650年（顺治七年），朝廷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在这七年当中，汤若望由于懂得科学技术知识，不但恢复了他在明崇祯朝

---

① 魏特：《汤若望传》，第10册，228页，杨丙辰译。

② 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96页，冯承钧译。

③ 《Relation Historique》，Texte Latinave Contraduction Francaisedu P·Paul Borneteditеeparr P·HenriBernard，P，98。

的政治地位，而且尤有过之。

清朝建国之初，鉴于自己以异族入主中原，所以在政治上尽量保存明代的办法，以巩固其统治，“他们对于士大夫的利用是煞费苦心的。所有官吏降附者，各与升级，殉难者各予谥立庙……”①。对待前朝的士大夫既如此，对待象汤若望这样的曾服务于前朝且有些特殊本领的西方传教士也不例外。魏特说过：

> “在学术底促进上，新朝廷亦是不要落于明朝之后的……因此满洲朝廷亦是要为他们的目的，而利用西方来的这位科学知识优越的学者的。并且因为这些满州新人物，虽然仍继续中国的传统，但却不要为传统的奴隶，所以他们就能把一种在先朝决不能办到的位置给与汤若望。”②

1644年5月，清廷下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等处，以便旗民居住”。当时汤若望和龙华民等的住处和天主堂都在城内，原应迁出，但汤若望向清廷上了一个留住城内奏折，云：

> “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东来，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臣自构天主堂一所，朝夕虔修，祈求普祐。作宾于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板，尚未完竣，而板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其测量仪器，由西洋带来者居多，倘一损坏，修整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特为沥情具折。恳请皇上恩赐臣与同伴诸远臣龙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册，第25页。

② 魏　特：《汤若望传》，第1册，234页。

华民等仍居原寓，照旧虔修……”①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即得到新王朝的谕旨：“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从而，保住了北京教会在天子脚下最近的一块根据地。

（二）汤若望——第一个出任钦天监监正的外国传教士

1644年5月，汤若望奉召入朝，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询问重修历法之事，并下谕曰：“旧历岁久差讹，西洋新法屡屡密合……其窥测诸器，速造进览。”②汤若望也乘机上言：

> “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有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尽进内廷，用以推测，屡屡密合。近闻诸器尽遭贼毁，臣拟另制进呈。今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西洋新法推步京师所见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与各省所见日食多寡先后不同诸数，开列呈览，乞敕该部届期公同测验。”③

6月，汤又将“本年八月朔日食，明年正月望月食，依新法推步，京师所见亏蚀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与各省所见不同之数，绘册恭呈御览”④。7月，又将“所制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并舆地屏图一幅进呈”，并上疏请将“诸方节气及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加于历册篇首”⑤。7月，礼部奏请颁历，多尔衮说：“治历，明时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各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历又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⑥。汤若望于当年11月接到掌管钦天监印信的上谕，成

---

①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存。

②③《世祖实录》，第5卷。

④⑤⑥《清史稿·汤若望传》。

为清廷的钦天监监正。

1646年（顺治三年），“吏部提称：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创立新法，勤劳懋者，应加太常寺少卿衔”。1650年（顺治七年），清廷“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天主堂侧隙地一方，以资重建圣堂，孝庄文皇太后颁赐银两，亲王、官、绅等亦相率捐助”。这座天主堂便是后来北京的南堂。该堂建好后，汤若望撰《都门建堂碑记》，其中写道：

> “……传衍至今，前蒙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时宪新历，颁行历务。告竣，谨于都城宣武门内虔建天主新堂，昭明正教……”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汤若望有意把治历与传教并提。言外之意是，清政府允许他们建堂传教。实际情况也证明确实如此。

（三）顺治帝的宽容政策及传教事业的发展

1651年（顺治八年），多尔衮死，顺治亲政。8月，“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又诰封若望父、祖为通奉大夫，母与祖母为二品夫人”。次年，又“赐‘钦崇天道’匾额”。

这时汤若望的官衔是太仆寺卿，后又改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赐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后因避康熙玄晔讳，改为“通微教师”。敕曰：

> “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囡通历法，徐光启特荐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今特赐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

① 《清史稿·汤若望传》。

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①

同时，顺治帝又把阜城门外利玛窦坟墓两旁的空地，赐给汤若望作茔地。1657年顺治帝又授汤以“通政使司通正使加二品又加一级衔”，并赐御书堂额，曰“通微佳境”，还写了一篇《御制天主堂碑记》，以示宠信。1658年，又“诰授汤若望光禄大夫，并恩赏若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从上述可知，顺治亲政后，汤若望与顺治的关系很密切。在《修历纪事》中，汤若望透露：

> “在两年中，也就是本世纪的56年、57年中，他（顺治）亲自到我住处来了二十四次。他在我的住处耽了不少时间，并且他还在我的住处吃饭、喝茶。这是他之前任何一个皇帝也没有这样做过的。”②

从顺治写的《御制天主堂碑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清初朝廷对天主教的态度。该碑记载：

> “……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历，敕名时宪，颁行遐迩。若望素司泰西之教，不婚不宦，只承朕命，勉受卿秩，三存历三品，仍赐之‘通玄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都城宣武门内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是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籍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曾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译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但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敬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

① 《清史稿·汤若望传》。

② 汤若望：《修历纪事》，第256页，1942年拉丁文、法文版。

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玄佳境’，而为之记。

‘铭曰：……惟此远臣，西国之良，则天治历，克殚其长；敬业奉神，笃守弗忘。乃陈仪象，乃构堂皇。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矜斯式！’”

从上述内容可知，顺治帝不但重视西方科技文化，对汤若望的“祀其教中所奉之神”的虔诚是大为赞许的。汤若望虽然曾借职务之便，时常向顺治劝教，但由于顺治当时热衷于佛教，宠幸和尚玉林琇、木陈忞等，并于十八年曾剃发，因而有上五台山出家的传说。关于汤若望劝顺治奉教事，樊国梁（A·Favier）曾有记述：

“按世祖章皇帝宠遇汤若望，迥逾常格，每有咨询，随时宣召。奈其时喇嘛僧人，赐张特甚。太后与皇上俱为所惑。汤若望屡谏不听，然皇上不以此而驰爱。每召对时，不呼其名，而以清语‘玛法’①称之；又令汤若望每日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径入内廷，不循常例。且御驾亦屡幸堂中，垂问教理。若望切望皇上奉教，一日密奏其事，多方苦谏。上曰：‘玛法，子之所为，令朕不解。子为修士，而却不欲朕作修荐之事，朕若强子从朕，子能从乎？则朕之心，亦犹子也。然而玛法爱我，其意甚美。切偲之言，朕甘受焉！’汤若望付之无可如何而已。”②

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顺治为了利用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不能不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所以清初顺治年间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与汤若望的周旋有着重要关系。康熙

① 玛法，清语尚父之意。

② 《燕京开教略》，中篇，第26页。

三年曾对顺治朝传教情况作过统计。兹列表如下，以便省览：

1664 年 全 国 教 务 情 形

省　别	地　名	教 堂 数	教 徒 数
直　隶	北　京	三、（南堂、东堂、墓堂）。	15000
	正　定	七	不详
	保　定	二	不详
	河　间	一	2000
山　东	济　南	十（全省）	3000
山　西	绛　州		3300
	蒲　州		300
陕　西	西　安	十（城内一、城外九）。	20000
	汉　中	二一（城内一、城外五、会口一五）。	40000
河　南	开　封	一	不详
四　川	成　都 保　宁 重　庆		300
湖　广	武　昌	八	2200
江　西	南　昌	三（城内一城外二）。	1000
	建　昌	一	500
	吉　安		200

	赣　州	一	2200
	汀　州		800
福　建	福　州	一三（连兴化、连江、长乐）。	2000
	延　平		3600
	建　宁		200
	邵　武		400
	彝山崇安	多　所	
浙　江	杭　州	二	1000
江　南	南　京	一	600
	扬　州	一	1000
	镇　江		200
	淮　安	一	800
	上　海	城内老天主堂南门、九间楼、乡下、共六十六处。	42000
	松　江		2000
	常　熟	二	10900
	苏　州		500
	嘉　定		400
	太仓、昆山、崇明均有教堂、教徒		

以上为1664年耶稣会士在中国十一省传教情形，共有教徒114200人。①

（四）传教士南怀仁主持编修历书

1662年2月，清世祖驾崩，年仅八岁的玄烨登基，是为康熙皇帝。康熙朝是天主教耶稣会在华传教的黄金时代。但康熙皇帝亲政以前，却由索尼、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当权，致使清初以来的耶稣会士受宠的局面发生急骤变化。教士受宠十八年后，突然面临着一场大灾祸——汤若望的历狱。

鳌拜等上台后，提出所谓“今当率祖制、复旧章”，废除了多尔衮、顺治所定的各项政策，着手恢复内三院。顺治时已趋平息的野蛮的圈地运动，在鳌拜掌权后，又再次执行。同时在政治上严禁汉族人干预政务，风俗上要求满人恢复入关前的文化习俗。在这种强烈的复旧狂潮影响下，传教士在钦天监的地位开始受到影响。尽管“时宪历”实行已近二十年，实际生活已经证明它较为科学，较为先进，但仍然逃脱不了狂暴的攻击；传教士在钦天监中的地位也动摇了。科学上的争论同政治斗争搅到一起，酿成了清初一场大教案。

几年之后，康熙皇帝亲政，在朝的教士南怀仁陈述汤若望冤狱。康熙帝遂于1675年御驾亲临北京天主教堂，并以御笔为教堂题词“钦天”二字。后来，所有在华的耶稣堂在鸦片战争前，都以此文题匾。康熙帝又暗示南怀仁在早朝时，当堂为汤若望喊冤。

汤若望这件案子，果然平反了。但那些被拘押在广州的神父们还没有释放，传教禁令也没有解除，这是在京神父们所关注的

---

① 此表由1922年《中华归主》一书所集；另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主要问题。修治历法，不过是为辅助传道的一种方法，传道既不能得到公开，修历就变成了舍本逐末，于是他们便决意辞去历官的职务。皇帝知道他们的隐意，便派国舅佟国纲慰留，并且告诉他们，欲驰传教禁令的困难，因为朝臣中尚有许多反对的人，叫他们姑且忍耐等待。神父们始知皇帝并无仇教之意，颇得谅解，遂勉强打消辞意，一面在北京修葺东、南两教堂，天天在内献祭讲道。朝臣们也知皇帝意思，对于他们传教工作并不加以阻止，所以这一年中有3000人受洗进教。第二年，南怀仁再上疏请求开释广州25位神父，废除教禁。结果，仍为部议所阻。等到康熙九年方才获得开释教士的上谕，一方面准许广州25位教士各归本堂，一方面不准添立教堂，不准中国人入教。并谕：25人中如有通晓历法的，令即来京帮同治历。还御书“奉旨归堂”四个大字，嘱分送广州25神父。在广州被禁的25位神父中，此时在世者只19人，重返各省工作。各省封禁教堂一律交还，被人拆毁的也责令赔偿，地方官莫不优礼相待。其时，闵明我神父已死，格里玛弟（Grimaldi）乃冒称其名由澳门来华。然以其通晓天文历法，便奉召与恩理格（Herdtricht）、徐日升（Pereyra）等三人一同进京修历。南怀仁既撰成《永年历书》共三十二卷，推算至二千年之久。又奉命铸炮数尊，皇帝亲临炮场试放，大得褒奖。康熙对于南怀仁，有如顺治对于汤若望，屡加官职，升至工部侍郎，然皆固辞不就。康熙对于教会发生极大兴趣，且日与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系格里玛弟冒称）讲求西学。当时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因闻中国皇帝雅好西学，南怀仁等神父又蒙优遇，乃派五个精通天文的教士来华。南怀仁乃言于帝，此五人奉召进京，此便是法国教士初入中国之始。此后，巴黎传教士相继而来，四川、两广教务得以发展。五教士在来京途中，忽接南怀仁去世消息。及至京，由徐日升领带引见，康熙帝着留张诚(Gerbillon)、白晋（Bouvet）二人在京供职，同意其余三人在中国传教。

康熙十六年，安文思病殁。二十六年，南怀仁又病殁。康熙皆命赐葬，并派员致祭，御制碑文，勒石纪念。其碑文云：

“朕维古者立太史之官，守典奉法，所以考天行而定岁纪也。苟称厥职司，授时之典，实嘉赖之。况克殚艺能，有资军国，则生膺荣秩，殁示褒崇，岂有勒焉。尔南怀仁，秉心质朴，肆业淹通，远泛海以输忱，久服官而宣力；明时正度，历象无讹，望气占云，星缠式叙；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覃运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坚垒，克禅戎行；可谓莅事惟精，奉职弗懈者矣。遽闻溘世，深切悼伤，追念成劳，赐名勤敏。呜呼！锡命永光乎重壤，纪功广示于遐陬，勒以贞珉，用垂弗替。”①

从上述诏谕可以看出，南怀仁生前深受康熙宠眷。满朝盛称他治历、铸炮之功。从天主教教会角度看，他的最大贡献却在于汤案发生后的十几年间，教会几经困难，后教案虽平，传教之禁仍未解除，西人不能传教，华人不准进教；排外仇教的官吏，往往借为口实，横加干涉，而卒能安然无大风波，都是靠着他的力量。三年后，浙江发生抢掠教堂之事，盖因巡抚张鹏出示禁习天主教而起。杭州神父殷铎泽告急于北京，神父徐日升、张诚乃面见皇帝，求驰教禁。皇帝命礼部议奏，礼部不符上意，复命内大臣与满官再议，国舅佟国纲迎合上意，具题如下：

“臣等会议，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数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进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之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

①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1章。

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俱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敢擅便，谨具题请旨。”①

康熙批示“依议”。此旨一出，全国教堂莫不欢欣鼓舞。杭州殷神父预备进京谢恩，方欲起程，教堂忽毁于火。康熙闻知，饬浙江巡抚重行建造教堂。康熙偶患疟疾，太医束手无策，张诚献上西药，一服而愈。皇帝大悦，遂赐张诚住宅，并赐地建天主堂一所，亲题“万有真原”匾额，并题一联：

“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又作律诗一首送至堂中。诗曰：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佟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②

南怀仁过世以后，由闵明我继其职。到康熙四十六年，闵明我去世，又由纪理安补钦天监。此前，张诚、徐日升也先后去世。在京教士除白晋外，有巴多明（Pavennin）、冯秉正（de Mailla）、雷孝思（J·B·Reg's）等人。康熙待教士如前，并无变化。后来“礼仪之争”起，遂对康熙有所影响。但由于传教士们历数十年之久，首制全国《皇舆全览图》，帝心大悦，所以康熙前期，天主教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创伤。兹将康熙四十年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华分布情形列表于下（表见下页）：

上列数字系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整理的，虽不十分准确，但可知这四十年间教士和教堂至少增加了一倍以上，足以证明在十七世纪康熙时代传教工作得到了发展。

---

①②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1701 年中国教务状况

会别	省别 / 数量	直隶	江南	山东	山西	陕西	河南	湖广	江西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耶稣会	住院	6	16	4	3	4	2	8	8	4	7	1	7
	教堂	21	130	12	10	4	2		8	4	7	1	7
	教士	11	15	1	2	1	1	3	6	2	6	1	10
方济各会	住院		2	6					4	1	3	3	5
	教堂		2	6					4		2	3	7
	教士		2	10					5		3	5	
多明我会	住院								1	2	5		
	教堂									2	4		
	教士									3	5		
奥斯定会	住院							1	1			4	1
	教堂											4	
	教士											6	
不入会	住院		1							4	3	3	
	教堂		1							1	2	3	
	教士		2							1	3	9	

第二章　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

（明末——康熙朝）

中国与欧洲贸易交通，历时已久。但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影响，则始自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时。十六、十七世纪之际，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已高出中国之上。而中国固有的文化，向来专注于形而上学方面，尤其是程朱理学所倡行的心性之学，禁锢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明清交替之时，学人痛恶于心性之学，逐渐转入讲求实学，以求经世致用，颇有采纳西方科学的趋势。如此时的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三个思想家所倡行的即如此。而当时国家施政方面，诸如交食失测，历法急待修订；边患方炽，军器急待改良，也赖西学的传入，以为补救。而耶稣会士东来，正是以西方科学为手段，与士大夫相交往，与当时社会的需要正相符合，可谓适逢其时。

考西学传入，自利玛窦开始。就教会事业而言，利玛窦实为在中国奠立天主教基础的最有力者；就学术思想言之，他是介绍西学至中国的最早人物。这两方面对于中国的近代文化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不可因其为外国教士而忽视。

自利玛窦之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二百余年间，西方书籍传入中国者，不可胜计。《增定徐文定公集》书中，载李之藻所刊刻的

《天学初函题辞》中说："又近岁西来七千卷，方在候旨。"李之藻的《译寰有诠序》也说："时有利公玛窦浮槎间九万里之程，既又有金公尼阁载书踰万部之富。"《远西奇器图说》一书中载王徵所作的序言："《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国之书，此其七千部中之一。"由此可知，明末之际，已有西书七千部或万部传入中国。清初康雍间教士来中国者益众，其所携来的书籍，也当倍增。惜此等书籍亡佚甚多，不能尽传，无法详考。

对西方书籍的译刊，当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为始。徐、李等博雅宏通，兼有科学精神，而且与教士交往甚密，信奉天主教甚笃，故译著甚多，此三人堪称我国科技翻译的先锋。中国译刊外国书籍，计有两大支干：其一，魏晋隋唐间，以译佛经著称；其二，明清之际，以翻译西方科学著称。然徐、李之名，久不为士大夫所称道，其学术思想也淹没失传，不能发扬光大，致使中国科学落后，不能与西方并进。西方书籍集刊，始于李之藻刊刻的《天学初函》中所收的20种书籍，但多属论述教义之书。其后，韩霖、张赓合著《圣教信证》一书，内载明清之际东来教士的姓名及其著述，是为译著中一重要目录。晚清王韬甚重西学，辑有《西学辑存六种》，内载有《泰西著述考》一文，详列西来耶稣会士姓名及其著述。明清之际，西学传入，赖此得窥涯略。其时，所传欧西学术，除论教义的书籍外，按门类分有：天文、算术、舆地、物理、医药、音乐、美术、论理、伦理、语言等类。

值得再次提及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向来专注重于形而上学方面。初期天主教教士们，他们在宣扬基督教义之外，还介绍西方科学来华，做了中西文化接触的媒介。很显然的事实是，自中西文化接触以后，不但使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发生了变化，同时使当时文人也感觉到物质文明的落后，有迎头赶上的必要。若此，安常习素的中国，将一变而为革命进取的中国。不管后来的

中国变化如何，推本溯源，天主教教士带来西学的功勋，是不容抹煞的。

一、传教士是西学东渐的媒介

（一）传教士著述与西学东传

现在我们仅把那些耶稣会士的著述，作一概括介绍，然后，看看其著作所发生的影响，就会发现，中西文化交往的媒介，乃是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

清初时，曾有韩霖、张赓著过《圣教信证》一书，其附录则叙述了当时教士们的著作。继有费赖之经十余年的收集，编纂了《耶稣会士之传记及书录》一书。其书中所辑录教士传记约有500人，中有华籍者70人，篇帙之巨大，数倍于韩、张所作。此书后经冯承钧节译为汉文。

费书原序中，把当时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时代，始于一五八〇年，终于一六七二年，约一世纪间，为不少汉文著述撰刻之时代。

“第二时代，始于一六七二年，终于雍正初年（一七二六年），是为北京及诸行省法国传教会产生发展之时代。”①

此后则为第三时代，这时教会处在教难中，而非撰述的时代了。换言之，即在第一、二时代的大约150年中，天主教耶稣会士大多努力于著述，此种著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在中

① 费赖之：《耶稣会士之传记及书录》，序言部分。

国，开著述之先者，当推罗明坚。他在1584年著成的《圣教实录》，是欧洲人以汉文写成的第一部叙述基督教的纲要之作。

接着，便是利玛窦，著作有20余种，大半都用汉文写成。如：《天主实义》（一名《天学实义》），共二卷；《交友论》一卷；《西国记法》一卷；《二十五言》一卷；《畸人十篇》二卷；《辩学遗牍》一卷；《西琴八曲》一卷（因利玛窦献品中有小琴，庞迪我善音乐，以授中官，乃成此书，附刻于《畸人十篇》之后）；《斋旨》一卷；《畸人十规》（此书是利玛窦在1584年刻于肇庆的第一部教义纲领）；《奏疏》（是为1601年利玛窦入教进贡物品请许留居北京的奏章）；《几何原本》上卷（徐光启笔述，清初，康熙帝命转译为满文，同治四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重刻于南京并作序，西文原书凡十五卷，利氏只译前六卷，后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后九卷）；《同文指算》十一卷（李之藻笔述，是应用的算术，1614年刻于北京，收入《四库全书》之中）；《测量法义》一卷，是应用的几何，又《测量异同》一卷，皆是徐光启所笔述；《勾股义》一卷；《圜容较义》一卷（李之藻笔述）；《浑盖通宪图说》二卷（李之藻笔述）；《万国舆图》，1584年作于肇庆，1609年万历帝命仿绘八幅；《西字奇迹》一卷；《乾坤体义》二卷（收录在《四库全书》之中）。除以上十九种外，尚有许多利玛窦的信札，经后人辑录而成书。

再有郭居静曾与利玛窦合撰《音韵字典》，并自著有《灵性诣主》与《悔罪要旨》各一卷。

苏如望著有《天主圣教约言》及《十诫》一书。

龙华民著有：《圣教日课》、《死说》、《念珠默想规程》各一卷，《圣人祷文》、《圣母德叙祷文》、《急救事宜》，《圣若瑟法行实》、《地震解》、《灵魂道体说》等。又有《答客难十条》一卷，系与儒士辩驳天堂、地狱、童贞等问题。此外有若干禀帖、信札，经后人辑录而成书。

罗如望著有：《天主圣教启蒙》、《天主圣像略说》二书。

庞迪我著有：《七克大全》七卷，收入《四库全书》；《人类原始》、《天神魔鬼说》、《受难始末》各一卷；《庞子遗诠》二卷；又有《实义续编》一卷，乃续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而作；《辩揭》一卷，乃对于仇教时所上的辩论；又曾为中国皇帝绘四大洲地图，每洲一幅，附以说明。

高一志（即王丰肃）著有：《圣教解略》二卷；《圣母行实》三卷；《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后，第一卷题曰《宗徒列传》，编入《道原精粹》第七册中；《四末论》四卷；《终末之记甚利于精修》，凡六页；《则圣十篇》一卷；《十慰》一卷；《励学古言》一卷；《西学修身》十卷；《西学治平》四卷，一名《民治西学》；《西学齐家》五卷；《童幼教育》二卷；《环宇始末》二卷；《斐录汇答》二卷（斐录即philosophy，今称哲学）；《譬学警语》二卷；《神鬼正纪》四卷；《空际格致》二卷；《达道纪言》一卷等十八种。此外，尚有若干信札，记述南京教案情形。

熊三拔著有：《泰西水法》六卷，前五卷言水法，第六卷为诸器的图式。后，徐光启奉敕撰《农政全书》六十卷，曾将此本采入；《简平仪说》一卷，前有徐光启序；《表度说》一卷。三书皆收入《四库全书》。

阳玛诺著有：《圣经直解》，另有官话节译本，题名《圣经浅解》；《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二卷；《代疑编》一卷，似出杨廷筠手笔，杨氏并撰有《代疑续编》；《景教碑注》一卷；《圣若瑟行录》一卷；《圣若瑟祷文》；《天主祷文》；《轻世全书》二卷；《默想书考》；《避罪指南》一卷；《天门略》一卷，等十一种。此外，尚有《天学举要》与《袖珍日课》、《受难记》诸书。

金尼阁著有：《推历年瞻礼法》一卷；《西儒耳目资》三

卷；《况义》一卷；及《基督教远被中国记》、《宗教祷文》等书。

华方济著有：《灵言蠡勺》二卷；《睡答》、《画答》等书。

艾儒略著有：《天主降生言行记略》八卷；《出像经解》一卷，即前书初本的附图；《天主教生引义》二卷；《弥撒祭义》二卷；《涤罪正规》四卷；《悔罪要旨》一卷；《万有真原》一卷；《三山论学记》一卷，是与叶向高论学之篇；《圣梦歌》，亦题《大西利先生行迹》，一卷；《张弥克遗迹》一卷（弥克，张赓子，名识，字见伯）；《杨淇园行略》一卷（淇园乃杨廷筠别号）；《熙朝崇正集》四卷；《五十言》一卷；《圣体要理》一卷；《耶稣圣体祷文》；《四字经》一卷；《性学觕述》八卷；《玫瑰十五端图像》；《景教碑颂注解》；《西学凡》二卷；《几何要法》四卷；《西方答问》二卷；《职方外纪》六卷，前有李之藻、杨廷筠、瞿式耜等序文。先是利玛窦进万国图，庞迪我、熊三拔奉命撰为图说，庞迪我卒，艾儒略增补以成此书。共二十三种。此外，有《一六一二年十一月八日蚀之观测》等书。

邓玉函著有：《崇祯历书》一百卷；康熙时乃改名《西洋历法新书》，《四库全书》总目改题为《新法算书》（全书分三编：首为西洋天文学理；次为行星、恒星，日月蚀诸说，及测算方法；第三为便利测算诸表）；《人身说概》二卷；《奇器图说》三卷，邓玉函口授，王徵笔述；《大测》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正球升度表》一卷；《黄赤距度表》一卷；《浑盖通宪图说》三卷等八种。

付汎际著有：《寰有诠》六卷；《名理探》十卷（即伦理学），二书皆为李之藻笔述，刻于杭州。

费尔德著有：《圣教源流》四卷；《兑牍念经》二卷；《念

经劝》一卷。

汤若望著有：《进呈书像》，是篇乃进呈天主事迹图与朝觐像的说明书；《主制群徵》二卷；《主教缘起》四卷；《真福训诠》一卷，解释圣经八福之义；《浑天仪说》五卷；《古今交食考》一卷；《西洋测日历》一卷，1645年，清廷得之甚喜，以之颁行全国；《学历小辩》一卷；《民历补注解惑》一卷，1683年南怀仁刻于北京；《新历晓惑》一卷；《大测》二卷；《远镜说》一卷，1630年刻于北京；《星图》；《恒星历指》四卷；《恒星出没》二卷；《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交食表》；《测食说》二卷，《共译各图八线表》；《测天约说》二卷；《奏疏》四卷；《新法历引》一卷；《新法表异》二卷；《历法西传》；《赤道南北两动星图》；《西洋新法历书》三十六卷（与徐光启、罗雅各等合撰）等二十七种。此外有《崇一堂日记随笔》、《艾儒略四字经要略》、《则克录》以及其他书札。

伏若望著有：《助善终经》、《苦难祷文》、《五伤经规》等书。

罗雅各著有：《齐克》二卷，《哀矜行诠》二卷，《圣记百言》一卷，《天主经解》、《圣母经解》一卷，《求说》一卷，《周岁警言》一卷，《测量全义》十卷，《比例规解》一卷，《五纬表》十卷，《五纬历指》九卷，《月离历指》四卷，《月离表》四卷，《日躔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黄赤正球》一卷，《筹算》一卷，《历引》一卷，《日躔考》、《昼夜刻分》等书。

郭纳爵著有：《老人妙处教要》、《原染亏益》上下二卷，《身后编》上下二卷等书。

孟儒望著有：《辩敬录》、《照迷镜》、《天学略义》等书。

利类思著有：《超性学要》四卷，《天神》五卷，《六日工》一卷，《万物原始》一卷，《天主体性》六卷，《三位一体》三卷，《灵魂》一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不得已辩》、《昭事经典》、《司铎典要》、《七圣事礼典》、《司铎课典》、《圣教简要》、《正教约徵》、《狮子说》、《进呈鹰论》等书。

潘国光著有：《圣体规仪》、《十诫劝论》、《天神会课》、《圣教四规》、《未来辩论》、《天阶》等书。

卫匡国著有：《灵性理证》、《逑友论》。

柏应理著有：《百问答》、《永年瞻礼单》、《圣坡而日亚行实》、《四末真论》、《圣若瑟祷文》、《周岁圣人行略》。

鲁日满著有：《问世编》、《圣教要理》。

殷铎泽著有：《耶稣会例》，西文《四书直解》三卷。

南怀仁著有：《仪象志》四卷，《仪象图》二卷，《测验纪略》一卷，《验气说》、《坤舆图说》二卷，《熙朝定案》二卷，《历法不得已辩》一卷，《坤舆全图》、《教要序论》一卷，《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告解原义》一卷，《圣体答疑》一卷，《赤道南北星图》，《简平规总星图》等书。

陆安德著有：《真福直指》、《圣教略说》、《圣教问答》、《万民四末图》、《默想大全》、《圣教撮言》、《圣教西理》、《默想规矩》、《善生福终正路》等书。

（二）西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上列各书系根据韩霖、张赓所辑《圣教信证附录》和费赖之的《耶稣会士列传》的记载，仅举其重要者略为介绍，以证初期天主教教士确实努力于著述。他们在六七十年间编撰的这些书籍，一半为阐发教义，半为介绍科学，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

观念，不无重大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如破除迷信，排斥偶像，足以引起中国人民生活习惯上的不安，间接影响到固有的伦理思想。尤其是在科学方面，至少开阔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眼界，从万国地图中知道世界之大，与向来所想像的不同。影响最大的，莫如在天文、历算方面，如利玛窦译著《几何原本》、《同文指算》、《勾股义》等。以后，要属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人的贡献最大，他们都有若干著作，足以引起朝廷的注意。在中西文化交往中，他们起到了媒介作用。康熙皇帝受此影响，也撰著有格致、地震等接近科学的著作①。可见西方文化经过传教士东来的传播，对古老东方帝国文化的影响之大。

二、中华文化西传及其影响

中国是亚洲最大最古之国，自古以来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甚少。环中国而居的诸小国，不是隶属于中国，就是“进贡”于中国，从未敢有分庭抗礼者。因此，中国统治阶级傲然自大，蔑视邻邦，不屑与外国交往，因而，外国人也无由得窥中国国内的一切。尤其是欧洲人视中国为神秘之国，中国的一切文物、制度、风化习尚，都足以引起欧洲人的好奇心。揭破此神秘的，是明末清初时东来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又以其所知，将中国文化介绍于西方，使西方人得以认识进而羡慕。现分别简述中华文化西渐及其影响。

---

① 《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御制文”。

（一）语言学

传教士进入中国，欲与中国人士接触，自然不能不学中国的语言文字。而中国的文字、语言，与欧洲的文字、语言完全不同。教士便把亲自研究的经验所得，比较其不同之点编著字典，在汉字之旁，注以西文解说，附以西文字母的拼音。这种中西字典，在当时虽十分简略，但传入欧洲后即发生影响，使欧洲人对中文有所认识。金尼阁所著的《西儒耳目资》便是沟通中西文字的一部杰作。有人说，此书之奇，不单在其排印方面，尤其是在统御汉字循以西字的顺序方面，可谓开创中西字典之先河。

柏应理被人称为西来孔子。他回欧洲时，曾指导普鲁士医师曼时尔（christian mentzel）学习中国语。他还著有《拉丁汉文小辞汇》（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s sinico Characteristici）及《中国年表》，又编纂《汉语初步》（clavis Sinica）及《中国辞汇》（Lexicon Sinicum）。上书现在保存在柏林国立图书馆。较早传入西方的我国文字是由柏应理讲授编著而成的。

马若瑟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一书，论述了中国语的性质及其构造，是西方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字方面最早的专著，其中有一万二千条汉文例句。

康熙朝时，教士白晋为康熙帝所信任，他精通中国风化习尚，著有《中法辞典》及关于中文研究法等书，惟终未付梓，刻藏于尔孟（Le Mans）图书馆中。

乾隆时的钱德明教士，擅长汉语及满文，著有《满法辞典》（Dictionaire Tartare Manchow Trancais）及《满洲语文典》（Grammaire Tartare Manchow）。其他如吴多禄编有

《中国小辞典》；汤执中编《汉法辞典》，其稿本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

耶稣会士编字典、词典，本为自己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之用，但其影响所至，不限于来华教士本身，而且远及至欧洲，凡欲探索中国文字奥秘者，皆以之为工具。我国文字由教士传入欧洲，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经　籍

耶稣会士到中国后，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之后开始研究中国的经书。利玛窦为最早深入研究中国古书的人。他不但学有根源，而且能纠正经书注疏的错误，对原文以正确的注解，对清代考证学家很有启示。古代史家对其功绩，多有评述。他把中国的尚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后，才知中国古书，识其真原。知中国经籍之真谛，皆利玛窦之为①。

殷铎泽也擅长中文，对中国经书的翻译也极注意，他曾以拉丁文翻译《大学》，题名为Sapientia Sinica；又有《中庸》的翻译，题名为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还译有《论语》。以上诸书均以拉丁文译成。《论语》末，附有《孔子传》。马若瑟和白晋、傅圣泽共同研究翻译《易》、《春秋》、《老子》、《淮南子》等。柏应理回欧洲后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中国哲人孔子》（Confucius Sirarum Philosophus），是《大学》、《中庸》、《论语》的合译本，书内附有《孔子传略》。

经籍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一切文物制度、风化习尚无不涵蕴其中，欲知中国真相，不能不读中国经书。而西方传教士不但

---

① 金尼阁：《大西利先生行迹》，第41页。

阅读，而且进行翻译，使中国文化得以有译本流传到欧洲，使古代欧洲人士能认识中国，而兴起敬慕之心。这与早期耶稣会士的关系极为密切。

（三）舆　地

对于中国舆地之学，耶稣会士有极大的贡献。最初传入欧洲的中国地图，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Novus Atlas Sinersis)，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出版，共17图，171张地图说明。其中一张是中国全国地图，有15张是明代十五省图，另附日本地图。经考证，此图的底本系用明陆应阳的《广舆论》。该图出版后，各国争先译印。此图为当时研究中国地图最好之著作。

康熙时白晋、雷孝思等所测制的《皇舆全览图》，在法国发生了极大影响。而后，教士蒋友仁在北京制成《坤舆全图》寄至法国，雇艺术家刻于精铜之上，共成一百幅。此舆图在法国享有很高的荣誉。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欧洲各国大地测量尚未开始，而中国的全图已经制成，欧洲人见后，赞叹不已。

（四）中国史

中国为文明古国，有着灿烂光辉的历史。欧洲各国研究古代文化史者，皆欲了解中国历史，遂有1658年在德意志发行的卫匡国所著《中国史初编》十卷（Sinicae Historicae decas Prima），1692年被译成法文。西洋人欲知中国史事，当时唯有此书。后来，冯秉正的《中国历史》出版，才有更详细的中国历史专著。其后，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发行。此书对于中国史所记的明亡、清入关及统一中国后之各种史事，颇能补充史料的缺

陷。此书在一年的时间内，欧洲各国竟连续再版十几次，可见此书的盛行，及宣传中国情况对于欧洲人所引起的强烈兴趣①。卫匡国所著《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1654年在罗马发行，可与金尼阁所著的《传教史》媲美。曾德昭著有葡文《中华帝国志》一书，164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版，深受社会欢迎。

教士史学家冯秉正，在研究中国历代兴亡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在北京时，曾受康熙之命，计划把朱子《通鉴纲目》译为满文。因此，他参考了满文译的各种汉文，目的是要将原本译成法文，后又翻译明商辂等的《通鉴纲目》，以补宋元明三朝史实，他又以东西诸书和自己所见闻，补记明末清初的事迹，1737年脱稿，原稿赠与法国的金石文艺院。1783年在巴黎出版，名《中国通史》，共十三卷。第十三卷内，载格洛雪哀所编的《中国志》。此书一出，欧洲人不知中国者，受益匪浅。此书从1777年到1783年，在意大利发行，分36册，至今此书的作用仍相当大。

金尼阁是中国传教史上有名的传教士，著有《传教士长征中国记》。此书主要资料，取自利玛窦所著的《回想记》，叙述明末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史，是为欧洲人最受欢迎的一部书，有英、法、德各国的译本。金尼阁还著有《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

柏应理是中国文物研究家及介绍者，在西方汉学史上做出不少成绩。他于1681年奉命回欧洲，当逗留欧洲时，曾将自己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文学所得撰述成书。1687年，在巴黎出版《中国哲人孔子》一书，此书之末，附有中国年表。他还著《中国传教之耶稣会教士人名簿》、《许太夫人传》、《中国史年表》及《传教士在广州放逐后传教情形》等。

宋君荣，法国人，是后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最熟习汉语中

①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又精通中国文献者。法国汉文家古尼(Joseph de Guigres)赞誉他："在中国之耶稣会士中，以宋公最敏慧，最博学。"宋君荣到中国后，倾全力学汉语、满语。其著作中最杰出者除1770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书经》外，还有《蒙古史》（或名《成吉思汗和蒙古全朝史》）、《大唐史纲》及其附录。

巴多明教士甚得康熙帝优遇，除任皇帝政治外交顾问外，又奉命研习汉语和满语。遗著有从伏羲至尧的上古史的翻译，即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的一部分译成法文，于1730年在北京出版。

张诚于1687年到中国，翌年至北京，娴于满语，甚得康熙的知遇，参与外交枢要，曾与徐日升一同出席中俄尼布楚谈判会议。张诚先后旅行蒙古八次，第一次参与缔结《尼布楚条约》，第五次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第八次为钦差大臣随员到喀尔喀，处理噶尔丹败死之后的新归清朝版图的领土及管理各种事务。他将自己旅行的所见所闻，著成《鞑靼纪行》（Voyage dans la Tartarie），为后世史家研究鞑靼历史提供了不少的重要史料①。

白晋与张诚同为康熙的顾问。尤其是白晋朝夕与康熙周旋，深知康熙的品性及帝王的私生活，他所著的《康熙帝传》，将康熙的为人，描写得如绘如画，无不毕示其真相，颇受读者称赞。白晋还著有《中国现状论》，并附帝王文武官员的插图。

会士刘应也热心研究中国史事，著有《鞑靼史》一书，其资料都依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的《四裔考》而译成匈奴、突厥、契丹、蒙古诸文字，又搜集史家考证，著初稿四册，寄至欧洲，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参考书。

钱德明，法国人，1751年奉乾隆之命入北京，熟悉汉语及满

① 杜文凯：《清代西人闻见录》。

语，博学多闻，发表了许多中国古今历史、文物制度、风物习尚的论文，以新颖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展开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著述甚丰，今录一二如下：法译本《乾隆御制盛京赋》（Elage de la Oillede de Moukder），《中国兵法考》（Ars Militaire des chinais Paris,1770），附刊在巴黎耶稣会教士的《中國杂纂》第六卷（Me'moires Concerrant Histoire）；《中国古今音乐记》，附刊在《中国杂纂》第六；《孔子传》（Vie de Koung Tsie），附刊在《中国杂纂》卷十二。

教士李明（Le comtes），法国人，到北京后被派往陕西传教。1692年赴罗马报告中国传教状况。后回本国，著《中国现状新志》一书，介绍当时中国情形。他还著有关于礼仪之争问题一书，为耶稣会辩护。此书一出，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其他许多关于中国的事，由会士著书寄至欧洲，使很多欧洲人得以认识中国。当时有许多稿本未得付梓，散藏于各国图书馆。

现在尚有三种杂集，收录了明末清初许多西人的书牍、著述。而在此三种书中，所论的问题颇多，保留了很多任何中国史书上所不能得到的珍贵史料。这三种书的书名为：

哈尔特所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完整的书名叫《中华帝国及其领地鞑靼之地理历史纪年政治的记述》，共四大册，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哈尔特神父是主任编辑，他是海外耶稣会士书简集续编的发行者。

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合写《中国论丛》，详记中国的历史、学术、美术、风俗、习惯等，共十六册，在巴黎出版。自1776年出第一册，至1814年十六册全部付印为止，约四十年。编辑者系耶稣会士白莱梯（Gabriel Bretier S.J）。

《耶稣会士书简集》，完整的书名叫《耶稣会教士在海外传教中所写的奇异及慰籍书信》。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两大作用，即：一方面输进了西方的科学，使中国学术界增加了许多经世致用的知识；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烂灿光辉的文化介绍到西方，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真相，从而引起崇敬之心。

三、耶稣会士修正中华古老天文学

（一）传教士对西方天文学的介绍

耶稣会教士对中华的科学技术的贡献颇多，首先是对中华古老天文学的修正。

自明英宗六年（1441年），至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一百五十余年中，钦天监官推算的日蚀，都发生错误。利玛窦东来，即借学术以收揽人心，当其宣教肇庆时，曾制天体仪、地球仪、计时晷等器，赠中国大吏，此为西洋天文学传入中国之始。其后利玛窦入京，与徐光启、李之藻等相交游，时值改历之议喧嚷一时，遂译西洋天文历算等书多种。其书流传甚广，至今犹可得见。继利玛窦东来者如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等，亦皆精通天文历法。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监推分秒及亏圆的时间不合。职方郎范守已奏疏驳其误，礼官奏请广求知历者，与监官推测讲论。于是五官正周子愚奏请神宗诏谕传教士参与修订历法。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熊三拔著《简平仪》一书，详细说明简平仪的用法，次年又著《表度说》，述立表测日影以定时的简捷法，用天文学原理进行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阳玛诺（Emmanuel Diaz）也著书详解晦朔结望交食深浅的原因，并配有图说。

天启年间，明廷因外患日亟，需用枪炮，乃又招用西洋人“协助攻御”，并筹备建立历局，备修历法。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日蚀，按大统、回回历推测皆谬误。徐光启依西法预推取得成功，崇祯皇帝便命他督修历法。

西洋历局于崇祯二年九月建立，徐光启荐举李之藻及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理其事。崇祯三年，邓玉函卒。又征汤若望、罗雅各入局。西洋历局的设立，前后凡十四年，汇集中西人士于一堂，相与推究，取得很大成就。计当时所成历书有：崇祯四年（1631年）徐光启第一次进呈译编的历书一套六卷，其中《历书总目》一卷，《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历表一套十八卷，其中《日躔表》二卷，《割圆八线表》二卷，《黄道升度表》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二卷。

同年八月，第二次进呈《测量全义》十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历表》四卷，《恒星总图》一幅，《恒星图像》一卷，《揆日解订讹》一卷，《比例规解》一卷，共二十一卷。十月又呈《测候四说》，讲的是新旧推算日蚀的异同，并论西法之长，旧法之短①。

崇祯五年（1632年），又进呈《月离表历》六卷（罗雅各撰译），《交食历指》四卷，《交食历表》二卷（汤若望撰译）。《南北高弧表》十二卷，《诸方半昼分表》一卷，《诸方晨昏分表》一卷，以上系传教士罗雅各、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共三十卷。

翌年，徐光启病逝，诏以李天经代之。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李天经进《历元》二十九卷，呈屏一具。嗣后，又进《历法》三十二卷，同时完成了日晷、星晷、

① 参见《明史纪事本末》，第73卷，第18页。

望远镜等仪器的制作。除罗、汤在局所制成的仪器外，尚有象限悬仪、象限立运仪、象限座正仪、三直游仪、混盖简平仪、弩仪、弧矢仪、地平纬仪、黄赤全仪六、圭表二（一横、一直）。用于测定太阳的高度及测黄道各时出没的仪器，还有地平晷、立晷、通光晷、柱晷、瓦晷、十字晷等等。

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李天经又呈《乙亥丙子七政行度历》，及《参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至是新法书器俱备。

综计明末设局翻译历书，自崇祯二年至七年（1629—1634年）共成书一百四十余册，编成百卷，分十一部，其程序即依徐光启所呈《历书总目》中的顺序。由会士们编成后，徐光启润笔，李天经核阅进呈，崇祯帝赐名《崇祯历书》。此后清入关，汤若望又增加《历法西传》一卷，《新法历引》一卷，书中加了哥白尼（Copernic）、第谷（Tycho-Brake）、加白尔(Kepler)、伽利略（Galileo）等学说，康熙帝遂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四库全书》把此书收入子部中的天文算法类，又易名《新法算书》。《崇祯历书》，方拟颁行，却因廷臣门户之见，虽诏立两局，累年测验，明知新法严密，竟不得行，足见中国官场腐败，嫉贤妒能，妄自尊大，积弊甚深。

（二）李之藻、徐光启等对守旧历家的斗争

万历年间，李之藻与邢云露同理历事时，已有争论。邢云露系旧历家，其天文知识肤浅，梅文鼎对他的评价是："由于历法殊略，所疏授时法意，亦未得其旨，……但知有授时而姑授经史以张其说，古历之说未能也，无论西法矣。"①及崇祯设历局时，旧派历家冷守中、魏文魁、郭正中，纷起与新派对抗。崇祯三年（1630年），冷守中进呈预推次年四川月蚀奏摺，徐光启力驳其

① 《四库提要》，第106卷，第93页。

谬。结果，四川奏报，冷守中所推不验，而不如新法严密准确，其说遂黜。翌年，满人魏文魁命其子进呈所著《历元》一书，徐光启摘其谬误，纂为《学历小辩》一书。当时朝廷因历法未定，遂兼存魏文魁之说。崇祯七年（1634年），命魏文魁入京测验，别天经等立东局，与大统、西局、回回并立为四局。魏文魁指摘李所推五星凌犯会合行度为谬谈，结果皆验，魏说也黜。于是，朝廷议废大统历而用新法。旧派历家，多方阻挠，郭正中力言中历不可尽废，西法不可骤行，乃诏仍行大统历，而以新法做参考。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日蚀，西法预推独验，崇祯帝才决意颁行新法。

顺治元年（1644年），睿亲王多尔衮以旧法舛误甚多，谕汤若望、龙华民等用西法测验天象。是年七月，汤进呈所制浑天星球一架，地平仪、日晷、窥远镜各一，与地屏图一幅。八月朔日蚀，汤若望测验，密合天行，而大统历差二刻，回回历竟差四刻。清廷遂采用西法，颁行天下，赐名《时宪书》。汤若望又疏陈大统、回回两历法的失误处。不久，汤若望旨掌钦天监印信，一切进历、占候的选择，悉听奉行。大统、回回旨黜，于是旧派仇新日深。顺治十四年（1657年）已革回回历官吴明煊疏言汤若所所推天象之谬，并上呈当年回回历推算天象之书，后经实测，所指皆妄，礼部议其罪，援赦得免①。其时，攻击汤若望者不乏其人。徽州杨光先著《不得已》一书，攻击耶稣会士及其历法。康熙四年（1665年），杨光先知道辅政大臣鳌拜等不喜欢会士，便又进《辟谬论》，攻击汤若望有十谬，又指责汤若望所撰择荣亲王安葬日期不吉②。并说汤若望阳假修历为名，阴行邪

① 阮元：《畴人传·汤若望传》。

② 荣亲王，顺治幼子，生三月而殇。杨光先状告礼部言钦天监选殡葬时刻，大不吉利，以致累及其母，并累及先帝，相继升遐云云。

教。清廷下旨，严惩在华传教士，造成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历法大狱”。后虽平反，但对以后的非教活动都有深远影响。

（三）传教士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于中国天文学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康熙崇慕西学，对于历法，极为重视，他见旧法不精，毅然采用西法，徵召明白历法的教士主持其事，是应予充分肯定的。他陆续聘召恩理格（Herdtrricht christ）、闵明我（M·ph·Grimau）、徐日升（Thomas Terrerra），供奉内廷，轮班进讲。他们的贡献尤以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Ignus kogler）为最。

汤若望在未遭历法大狱前，曾制器著书。先是明亡，历局仪器悉毁于战乱，故奏请另制。顺治元年（1644年），制成浑天仪、星球、地平、日晷仪、望远镜，与地屏各一。所著书有《新法表异》，以四十二事表述西法的迥异，论证中法的疏谬，尚有《历法西传》及《新法历引》二书，作为进呈清廷《崇祯历书》的提要。

南怀仁于康熙八年（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六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地平仪。又将各仪的制法、用法、安置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引用其器测验，并将诸表综合成十六卷，名《灵台仪象志》。怀仁又将汤若望遗留《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之后，纂成《预推七政交食表》三十二卷，名曰《康熙永年历》等等。南怀仁殁后，所遗钦天监监正缺，即以闵明我顶补。当时，闵明我执兵部文出差，应行时宜，以徐日升、林多安（Antony de Silva）苏霖（Joseph Suarez）、白晋（Joachin Bonvet）、张诚（J.J.Gerbillon）

等作顾问。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定的《星历考源》告成；六十年（1721年），《七政四余万年书》告成；六十一年（1722年），《律历渊源》告成，内《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分上下二篇，有图有表，惟所列编纂者无一西方教士，大抵仍沿《崇祯历书》旧法。

之后，钦天监监官、传教士刘松龄（P.A.Haller Stein）、鲍友管（P.A.Gogeisi），详测编成《总记》一卷，《黄赤道度表》十二卷，《经纬度表》十二卷，《月五星相距恒星经纬度表》一卷，《天议黄赤经纬度表》四卷，共三十卷，命名《仪象考成》，书成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

如此众多的天文学著作和观测仪器的制作，是耶稣会士传播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主要结晶。它不仅修正了中国历法的讹误，有利于农桑稼穑，而其应用远远超过天文学的范畴，使古老的中国天文学增添一株新葩。

四、欧洲数学入传与徐光启的贡献

西学东来，以科学书籍的翻译为第一步，而科学书籍的翻译，又以关于天文历算之书为最多、最要。数学与天文学有极密切的关系，除利玛窦开其先河外，当时在钦天监供职的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也精通数学，其贡献亦复不少。

西方数学输入中国计分五类：一、几何学（Geometry）；二、三角学（Trigonometry）；三、对数表（logarithmes）；四、代数学（Algebra）；五、割圆学。

（一）几何学

利玛窦著《乾坤体义》，其下卷说："数以边线，面积平椭圆互相容较"，是为西方数学入中国之始。其后，利玛窦入北京与徐光启译几何原本。利口授，徐笔译，但口授仅至前六卷平面部分而止。徐光启翻译此书，反复展转，探求本书深邃之意，重复校订，三易其稿，从中可窥其审慎之精。利玛窦在此书引言中，译述了几何学与各科学的关系。《四库总目提要》第一〇七卷一〇六页盛赞此书。几何原本为公元前三世纪欧几里得（Euclid）所著。此后历代学者均重其书或作诠解，或做注释，而利玛窦之师丁先生（Clovius）为其一。丁先生对《几何原本》一书，钻研甚久，深能得其蕴奥。故其弟子利玛窦的《几何原本》才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几何原本》为欧西算学巨著，是第一流作品。利、徐二人译为华文，系选其要略，殊为精当。若谈欧洲算学传入中国者，皆以此书为其始。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在江南刊刻《海山仙馆丛书》时，此书内容均被录入。此外，关于几何学著作，还有：

（1）《测量法义》。此书也是利玛窦、徐光启共译，仅一卷。当初，利玛窦翻译测量之法，至万历丁未年（1607年），开始以文系义，因为测量法仅言其用，而义则言其理。徐光启为《测量法》作序，序中说：

> "西泰子之译测量诸法也，十年矣，法而系之义也，自岁丁未(万历三十五年)始也。曷待乎？于时《几何原本》之六卷卒业矣，至是而后能传其义也。是法也，与周髀、九章之勾股测望异乎？不异也。不异何贵焉？

亦贵其义也。”①

从徐光启的序中可知，中国原有测量之术，仅说明此术所以然之理，却不能说明其理。

（2）《测量异同》。此书为徐光启所撰，系把中国旧有的测量法与西法相比较，叙述两者的异同。徐光启在自序中云：

> “九章算法勾股篇中，故有用表、用短尺测量数条，与今译测量法义相较，其法略同，其义全缺，学者不能识其所系。既具新论，以考旧文，如视掌矣。今悉存诸法，对题罗列，推求同异，以俟讨论，其旧篇所有，今译所无者仍补论一则，共为《测量异同》六首如左。”②

由此可见，此书成于《测量法义》之后，系用新法推求旧法。

（3）《勾股诸义》。此书也为徐光启所撰，仅一卷，自序云：“自余从泰西子译得《测量法义》，不揣复作《勾股诸义》。”可知此书也成于《测量法义》之后，也是对新旧书诸法进行比较研究。勾股之法古代已有，见于《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诸书，后人研讨者，不乏其例，而徐光启乃据前人之说，另参新论，以明其义。

（4）《圆容较义》。此书为李之藻所撰，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万历甲寅三月序云：

> “……昔从利公研穷天体，因论圆容，拈出一义，次为五界十八题，借平面以推立圆，设角形以徵浑体，探原循委，辨解九连之环，举一该三，光映万川之月，测圆者，测此者也，割圆者，割此者也，无当于历，历

①② 见《海山仙馆丛书》。

稽度数之容，无当于律，律穷象忝之容存是论也，庸谓迂乎。译旬日而成编，名曰《圆容较义》。杀青适竟，被命守澶，时戊申十一月也”①。

可见其说也出自利玛窦。李之藻作此书之旨，也见于序文：

“……凡厥有形，惟圆为大，有形所受，惟圆最多。夫浑圆之体难明，而平面之形易晰，试取同周一形，以相参考，等边之形，必巨于不等边形，多边之形，必巨于少边之形。最多边者圆也，最等边者亦圆也，析之则分秒不亿。是知多边联之，则圭角全无，是知等边不多边，等边则必不成圆。惟多边等边故圆容最巨。若论立圆，浑然一面，则尖至圆，何有周边？周边尚莫能窥，容积奚复可量？所以造物主之化成天地也，令全覆全载，则不得不从其圆，而万物之赋形天地也，其或大或小，亦莫不铸形于圆。即细物可推大物，即物物可推不物之物。天圆地圆，自然必然，何复疑乎？”②

这是以算学上圆周之理，证明天地浑圆之说。当时会士所传天文说，以为天地皆圆，而地在天内，如圆用大园包小圆，此书言惟圆为大，是想说明天地之所以为大的原因在哪里，其论虽有宣教的意味，但也有算学之至理。

（二）三角学

崇祯四年(1631年)，徐光启上《割圆八线表》及《大测》二书，前者言平面三角，后者言弧三角，皆出自崇祯历局的耶稣会

---

① 《海山仙馆丛书》。

② 赵缭：《数学辞典》，第744条。

士之手。

（三）对数表

顺治年间，教士穆尼格（Nicolas Mo:el）居金陵，始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所译的《天步真原》以加减代乘除，折半代开方，即指此求对数的方法。

（四）代数学

康熙末年，会士讲学内廷，始输入代数学。当时称为“借根方程”或“阿尔热伯”（Algebra的译音），《四库提要》作“达改作拉”，译为“东来法”①。教士所著的《律历渊源》，数理精蕴，其中借方根比例一部，只分述其一二，仅及二次方程式的计算，及其应用而已。后梅谷成悟解此学，与古时的《立元一法》名异实同，使中国久晦之学因而复明。

五、西方地理学的传入

（一）世界最新探险的成就与地圆说

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仍是天圆地方之

① 见赵缭：《数学辞典》，第744条。

说，使中国历代统治者以天朝帝国自诩，认为整个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中国居地球中央，占地至广，大海环绕，旁无大国，此种观念，牢不可破。而矫正这种观念，输入地圆如球学说，及世界舆图的测绘，则始于耶稣会士。对古老的中华地理学的发展首先做出贡献的，始自利玛窦及其所携来的《万国全图》。

十五、十六世纪交替之际，是欧洲探险极盛时期。1492年，哥伦布首先发现美洲。继之，有葡人绕非洲南端而至印度，又有麦哲伦绕世界一周，地圆之说确立。这在欧洲人看来，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利玛窦生当此时，受时代影响至深，故对地理更加注意。当其东来中国时，沿途所见奇风异俗，山川形势，以及各地物类，无不笔之于书。且又随地测验，辨经纬度的高低远近，以定某一地域所应在的位置。到中国后，他为了说明欧洲特有的新发现，以作为他传教的一种手段。万历十二年（1584年），他据西方地图，重新摹绘，且附以中文注释，说明地球大势，绘成一世界地图，题名《山海舆地图》。图分天下为五大洲：第一、亚细亚洲；第二、欧罗巴洲；第三、利未亚洲（Libia）；第四、亚墨利加洲；第五、墨瓦腊泥加洲（Magellanica）。此图是中国知道世界有五大洲之始，且为西洋地理学传入中国的第一次。利玛窦入京贡献方物中，有《万国图志》一册，於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始入京廷。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又将图分成八页。

地球呈圆形，中国谈天者过去虽曾谈及，但不能证实是否果真如此。利玛窦东来，其谈天、说地，均重此说。在图内所附注释，及其所撰《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书，均详细阐述了这个道理。郭子章的《黔草山海舆地全图·序》中说：

> “利生之图说曰：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有经线，有纬线，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九万里，地之厚二万八千六百

余丈（里），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此则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

这些数字的来源，都是耶稣会士所测定的。会士测得两纬相距二百五十里，以三百六十度计算，共九万里。经度与赤道线的距离也是如此，故说：“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九万里”。至于地球厚度，系根据算术圆周半径理论的数据来计算的，此虽与实际数据有所出入，但大体相同。一直到利玛窦东来，此说始出现于中国。

（二）世界地理学

中国过去对于世界分布的情况，均在想象中，未曾有过确切的认识。早在战国末年，齐人邹衍所持“九州”之说，后人认为荒诞不经。《史记·邹衍传》载其说：

>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洲，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邹衍想像中的世界，当然不合实际。

利玛窦是第一位将十六世纪的地理新发现介绍给中国的人，其图注文说：“……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这里所说的世界大陆分布情形，大体上是对的，惟墨瓦腊泥加洲，实出臆断，不符实际。而利玛窦的臆断也是依据十六世纪探险家们的想象：地球南极，也为一大陆分布区，麦哲伦海峡与爪哇诸岛以南，即为此大陆的分界。当时，利玛窦承袭此说，所制地图出此谬误盖源于

此。对于这一点，宥于当时人类知识水平所限，不可苛求。中国原有九大州之名，而无五大洲之说，五大洲之名见于中国史志书者，自此始。

关于世界各国分布情况及各国地理状况，中国古籍中言及四方邻国，起源甚早，《史记》有大宛等传，《汉书》有西域等传，均详叙华夏以外诸国的情形。自此而后，记载愈详。但诸书所述，很少有越出亚洲范围的，虽较前人著述更为详尽，但不能轮廓出一部较完备的世界地理。利玛窦在《山海舆地全国》中标注世界诸国之后，而于每一地区，又附缀数言，简记此地区的大概情势。这些记叙，对中国人开扩眼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利玛窦所制之图，以及所附各说，有许多显然是根据传闻，并非亲历，所以不免杂有神怪不经之言；或因地在两极，时人尚未发现，不免凭空臆想，将无作有，但他对于亚洲各地的风土物产及风俗人情，所作的全面而概括的介绍，在中国却是前所未有。

（三）天文地理学

中国古有分野说，以天空列宿为地域的分界。但对地球与诸星辰的关系，寒暖节气产生的原因，日食月食生成的根本所在，并不知道。利玛窦在世界全图中，首先提到九重天之说，说明地球在诸天中的位置；又述诸天运行，日月食发生的道理；又述四季寒暑以及诸气节发生的原因；以及地球距太阳的远近，寒暖温五带的划定。凡此种种学说，皆出自于言天诸书。《山海舆地全图》附注内说：

> “……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一、在昼长昼短二圈之内，其地甚热，带近日轮故也；二、在北极圈之内；三、在南极圈之内，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四、在北极昼长二圈之间；五、在南极昼短

二圈之间，此二地皆为之正带，不甚冷热，日轮不远不近故也。”

此说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也前所未闻。

（四）绘制地图术

中国绘制地图，由来已久，但对于采用何种绘制方法，始终不得其法。至唐德宗贞元年间，贾耽绘制地图，始凭据道里的远近，做为一定的比例。《旧唐书》载其事云：

“……兴元（德宗年号）元年，复奉进止，令臣（指贾耽）修撰国图，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都，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忧愧弥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二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终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

由此可知，其所绘《海内华夷图》，是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为标准。其后所绘制的地图皆承此法。迨至清末，欧洲测量法虽已在中国流行，但绘制地图仍多有袭用此法者，可见折百里之法，沿习已久。

十六世纪，欧洲人绘制地图，已知用经纬度线方法进行测量。利玛窦东来中国，极重视实地测量之法。他每至一地，往往测定其所在地的经纬度数，其后绘制的地图即据其所测数字。显然，利玛窦的测量法，开中国以科学方法绘制地图的先河。

嗣后，耶稣会士庞迪我奉万历皇帝之命，翻译欧洲刊刻的地图并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著为图说。后因南京教案竟遭遣逐，书未上呈。天启三年(1623年)，艾儒略（Jules Aleni）复据利、庞旧本，增补润色，成《职方外纪》六卷，记述当时绝域风土，颇为详尽。他在《职方外纪·序》中云：

"……昔神皇盛际，圣化翔洽，无远弗宾，吾友利氏斋进《万国图志》。已而，吾友庞氏，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据所闻见，译为图说以献，都人士多乐道之者。但未经刻本以传。迨至今上御极（指熹宗）而民物重新，骎骎乎王会万方之盛矣。儒略不敏，幸厕观光，概慕前脉，诚不忍其久而湮没也。偶从蠹简，得见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编，名曰《职方外纪》。"

继艾儒略《职方外纪》之后，康熙年间又有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之作，该图把世界分成两个半球，图中凡陆海之处，绘有各地盛产、栖息的奇兽怪鱼，五大洲之下各有总说明；至于各国的政情，各地的物产，及水动潮涌之故，气象风雨之理，皆标明详解。此图刊行于康熙十年（1671年）。

后来，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合著《西方要纪》一书，内分二十条，专记欧西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因是片段记载，不如《职方外纪》完备，并非精心之作。但它介绍了中国疆土之外的情形，也可补《山海舆地全图》、《职方外纪》之所缺与不足。

到了乾隆年间，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t）来华，进《补坤舆全图》，并奉乾隆皇帝之命，翻译注释此图。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何国宗、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钱大昕为之润色。所谓"增补"者，即增补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因其所增多属天文部分，如说地球不是浑圆形而是椭圆形，地球不是诸天中心而是绕太阳旋转等，系把哥白尼等的天文学说补入南怀仁的《坤舆全图》，所以对于世界大致情形的叙述，并无所增益。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清初曾在全国进行地图测绘，而堪称全国地图嚆矢者，系清康熙年间测量、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有的尚未开始，有的虽已开始但尚未完

成，而中国在十八世纪初即完成了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这次实地勘测，学者们还发现了经度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不同，由此证明了地球是扁圆的科学事实。这个用西法实地勘测绘制的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

1689年，清政府派代表团与沙俄谈判，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参加谈判担任中方翻译的是跟随康熙皇帝数十年、充任皇帝西学侍讲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和张诚。《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张诚以亚洲地图奉进皇帝，帝心大悦。此后，康熙几次御驾亲征蒙古，游历满洲，巡幸江南，皆命张诚携带测量仪器随时随地测定经纬。是时，康熙已有测量全国的计划。

1708年6月4日，康熙正式谕令测图，由白晋主持，中西学者合作。始由白晋、雷孝思（Regis）、杜德美（Tantoux）等先自长城测起。逾两月，白晋病，二人仍继续工作至1709年10月12日方返回北京，绘成一图。此图将长城的各门、各堡及其附近城寨、河谷、水流均已绘入。北直隶的测量，先于1708年1月2日开始，同年8月15日结束，历时七个半月。测量满洲的是雷孝思、杜德美、费隐（Fridulli）等，自1709年6月25日从辽东开始，东南至朝鲜边境图门江，东北至松花江鱼皮鞑子区域，1710年8月16日进至黑龙江，1711年2月1日东北地图成，历时一年半。1711年，康熙谕令增添人丁加紧进行测绘，分为二队，一由雷孝思、加尔特（Cardois）往山东；一由杜德美、费隐、潘如（Bonjour）、汤尚贤（de Tarte）四人西出长城至哈密，测定喀尔喀、蒙古之地，回归陕西、山西而返，1712年回京，历时一载。同年又命加尔特、汤尚贤同往山陕（包括甘肃）二省，不久图成。汤尚贤向康熙讲解，帝大悦。康熙又令分三路测绘：雷孝思、冯秉正（be Mailla）、德玛诺（kenderer）三人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汤尚贤、加尔特二人合测江西、广东、

广西；费隐、潘如测绘四川、云南，潘如病死云南，1715年1月费隐亦病。1715年4月27日另派雷孝思赴滇，继续完成云南、贵州及湖广之图。西藏地区是康熙特派二名曾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和测量的喇嘛去测绘的。1717年1月1日，测绘工作全部完成，由白晋汇成全国地图一张，分省地图各一张，1718年进呈康熙。于是，关内十五省及关外满蒙各地，皆经测量而成图，此为中国自古以来未有之大功。自康熙四十七年开始，至五十六年竣事，历时九载。康熙大喜，即兴命名为《皇舆全览图》。此图，迄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最重要根据。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图是后来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命刘统勋、何国宗等测量绘制的。同治二年（1863年）武昌府刊印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以及当今地图皆源于此。

当时康熙皇帝对于《皇舆全览图》的问世感慨万分。他对内阁大学士蒋廷锡说：

> “《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尔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过后面奏。寻，九卿奏称：‘从来舆图地记，往往前后相沿，传闻附会，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或山川经络不分，或州县方隅易位，自古至今，迄无定论。我皇以生知之圣，殚格致之功，分命使臣，测量极度，极高差一度，为地距二百里，昼夜之长短，节气之先后，日食之分秒时刻，都邑之远近方位，皆于是乎定。天道地道兼而有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①

欧洲舆地学在康熙间确曾发生一度影响，但会士所述的世界情况，中国士子、文人官吏仍多茫然无知，半信半疑。《明史·

① 《东华录》，康熙五十八年二月甲寅条。

意大里亚传》记载利玛窦所述五大洲时，写道："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信不诬也。"《四库提要》录《职方外纪》，称："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对于《坤舆全图说》的看法，书中云：

"……疑其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①

对于五大洲之说，也有所批评，云：

"至意大里亚人所称天下有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取以中土为五大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亚，而据其第五洲曰墨瓦蜡泥，乃因墨瓦兰开之而名。夫以千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中国数百万里地方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而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獉，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②

大抵此种论调，可以代表康乾之际一般文化人心理。当时对外态度，弊在虚骄用事，而虚骄的发生，又因昧于外情影响所及，并一再延续着。直到鸦片战争发生，中国人才逐渐猛省，意识到要学习外国人的长处，以补自己的不足。此后，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虽曲折坎坷，但中华民族毕竟觉醒了，在荆棘丛中找到了能够延续并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的经世致用之法。

①② 《皇朝文献通考·四夷考》。

六、西方物理学、水利学、机械制造学的传入

（一）物理学

欧洲物理学也于明末传入中国。天启六年，汤若望供职西洋历局时，曾著《远镜图说》一书，此书论望远镜的制法及其原理，如凸镜凹镜配合，光线曲折反射等原理。此书是外国光学传入中国之始。天启七年，耶稣会士邓玉函与国人王徵共译了《远西奇器图说》三卷，又有王徵自撰《诸器图说》一卷，两书虽皆论及制作，但也重视介绍原理，若推西方物理学传入中国，实以二书为最早。王徵在为《奇器图说》作序时，曾说：

“……余不敏，窃尝仰窥制器尚象之旨，而深有味乎璇玑玉衡之作。一器也，规天条地，七政咸在，万禩不磨，奇哉蔑以尚已。考工指南而后，代不乏宗工哲匠，然自化人奇肱之外，巧绝弗传，而木牛流马，遂擅千古绝响。余甚慕之、爱之，间尝不揣固陋，妄制虹吸、鹤饮、轮虚、代耕，及自转磨、自行车诸器，见之者，亦颇称奇，然于余心殊未甚快也。偶读《职方外纪》所载奇人奇事，未易更仆数，其中一二奇器，绝非此中见闻所及。如云多勒多城，在山巅取山下之水，以供山上，运之甚艰，近百年内，有巧者制一水器，能盘水直至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也。又云，亚而几墨得者，天文师也，承国王命，造一航海极大之舶，舶成，将下之海，计虽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也，几墨得营作巧法，第令王一举手引之，舶如山

岳转动，须臾下海矣。……余盖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曰：嗟呼！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也，而一觑之哉。”

当时，我国许多人把制器之术看成奇技淫巧，非经世大法，厌恶谈及。王徵破除一般士人观点，习制虹吸、鹤饮等器，又注重西方制造之术，堪称为开拓性人才。王徵译此书时，把重点放在原理说明上，其宗旨是说，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即力艺，三者皆相资而成。譬如，重心、比重原理、杠杆原理、滑车轮轴原理、斜面原理等，都属于物理学中的力学范围。

（二）水利学

先于《奇器图说》并纯以利民之术传入中国的，是熊三拔所撰《泰西水法》六卷。此书成于万历四十年（1613年）。其中记载取水、蓄水之法。一卷谈龙尾车，挈汇河之木；二卷谈玉衡车，附以专筒车，曰恒升车，附以支升车，用挈井泉之水；三卷谈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四卷谈水法，系寻泉作井之法，而附以治病之水；五卷是专论水性；六卷为器具的图示。介绍西方传入中国的有关制作之术的，此书为第一部。王徵所译《奇器图说》，虽未曾受此书影响，然二者在注意于农事的改良方面则是一致的。继《泰西水法》与《奇器图说》之后，而注重农事的著作，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六十卷。此书总括农家诸书，萃为一卷，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六卷也被采入。推其用意，意欲采用中西之术，讲求农政的改良，这对于古老的中国机械制造，不能不说有所革新。

徐光启之后，又有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十八卷，是为农业工艺之书，其书成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此书所论范围较

广，凡民用器物均分类评述，且于每类之后，附有图谱若干，以明示器械形状。所论各类，重在当时的叙述，不重以往的考究。其中所引西方器物制作方面，如各类大炮的制作，系作者亲眼所见，非采他书，但，宋应星所著，系受西方科技的影响是无疑的。

清代专涉农艺之书有数种。倘若对比一读，就可发现，中国农艺受着西法的影响。如戴震的《戴东原文集》有论羸族车一条，他自陈是因袭西人龙尾车而作。又有自转车一条，也是沿用西人的作法而制造的。

（三）枪炮制造术

中国社会素重保守，尤以农民为甚。故西法虽巧，其影响却不甚大。在西法当中为中国人最重视的，当为制炮之术。西洋炮术传入中国，始于葡萄人东侵。明代嘉靖二年（1523年），葡萄牙将别都卢率其部属驾驶五支船侵犯广东新会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生擒别都卢、疎世利等四十二人，官军得其炮即名佛郎机，由副使汪鋐进呈嘉靖皇帝。是为我国知西方枪炮之始。其后广东巡简何儒尝招降佛郎机人，得其铳法，但未能精用。

耶稣会士入中国后，徐光启从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而知其术。神宗时，辽边告急，徐光启力请多铸大炮，以资城守，但是议不果行。《明史·徐光启传》称："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偏习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可见，徐光启是精于西洋枪炮制作方法的第一个中国人。天启二年（1622年），外患日亟，明廷始令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会士制造铳炮，以资戎行，并招寓居澳门、精明火炮的葡萄牙人，来内地协助使用、攻御。崇祯三年（1630年），龙华民、

毕方济，奉旨招劝葡商等集资捐助大炮。教士陆若汉（Jean Rodrigeauz）及葡萄牙头目公沙地西劳(Gonzalvus Texera)率领本国军队携带铳炮前来效力，在宁远、涿洲等处屡退清兵。这一年，皮岛副将刘兴治反叛明廷，登州莱阳紧急，朝廷议复设登、莱巡抚，遂擢徐光启门下精通西炮制造的徐元化为右佥都御史，抚登州，所铸西炮甚多。毛霖的《平叛记》中曾记载崇祯五年正月三日孔有德攻破登州事，云："是时，尚有……红衣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这次战役中，会士及葡兵皆阵亡。遂由耶稣会士罗雅各等，教授使用炮铳之法。

崇祯十二年(1639年)，毕方济上疏奏请敕部由澳聘请谙熟制铳会士数人传授制造火药、点放之术。崇祯采纳了这个建议，令汤若望铸造，工部办料。又命汤若望把用法传授兵杖局内监。于是汤若望先铸钢炮二十位，大者重一千二百斤，小者三百斤。验收效果甚佳，即令再铸五百位①。并命汤若望教授放铳法，并编纂火药城守等书进呈。次年正月，崇祯又命汤若望与吴惟英在都城讲授火器，以资演练。四月，周廷儒奉命边塞督师，动用所制火器，汤若望随征。途中，汤若望演试空心炮。崇祯皇帝大悦，旋命其赴蓟县督师，并教授火器使用方法。现在故宫内放置的生铁大炮就是在汤若望主持下制造的。崇祯十七年正月，李建泰督师围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也曾命汤若望随军修理西洋火器。当时，汤若望是唯一精于西洋炮术的传教士。后来，清兵入宫，汤若望没有走，遂为清廷所聘用。

汤若望还曾口授《火攻揭要》一书，由焦勖笔译，书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其中叙述各式火器的铸造法、运用法、装配法以及子弹、火药、火箭、地雷的制造甚为详细。焦勖是何许人，及与汤若望的关系，均不得详，但汤若望制炮之术，赖此人而得

① 黄伯禄：《正教奉褒》。

以传，则无可质疑。

在清代，以西法造炮著称者，要算南怀仁。南怀仁铸炮，始于康熙十三年。其时吴三桂叛，海内骚动。清廷将征讨，所需西洋火炮甚急，因命南怀仁铸造。《清通考》说的“康熙十三年，谕兵部，大军进剿，须用大器，著治理历法南怀仁铸造大炮”，即指此事。清平三藩，南怀仁所造之炮，其效甚著。《正教奉褒》中说，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初日，南怀仁奉旨铸造战炮三百二十位。二十年八月十一日炮位告成，康熙帝脱下御服貂裘，赐给南怀仁，并奖慰曰：“尔向年制造各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已有功效，今之新炮，较为更好。”南怀仁自康熙十三年迄二十一年，共制大小炮三百七十二位。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吏部题称工部疏称：

> “钦天监治理历法、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南怀仁，先铸炮一百三十二位，又神威炮二百四十位，指挥制造精坚，应交吏部议叙。查南怀仁指挥制造炮位精坚，应加工部右侍郎职衔。”①

北京阜城门外有南怀仁墓，在墓碑上记述了铸造西炮及受朝廷褒崇之事。再，南怀仁曾著《神威图说》一书，详记炮火铸造之术。此书可与焦勗所著《火攻挈要》一书并观。

（四）机械器物制造术

自欧洲人来中国之后，服饰器用诸种玩好也传入中国，有关记载，杂见于各书之中。如，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张汝霖、印光任的《澳门纪略》，均有记载。其中有助于科学进步的为数不多，而制造技术后来被中国采用的为数更少。兹举其要者记述于后：

① 黄伯禄：《正教奉褒》。

（1）自鸣钟的制作。自鸣钟传入中国，当自利玛窦始。利玛窦初入中国即携带有自鸣钟。他在肇庆开教时，所赠官府诸物中，即有自鸣钟一件。万历二十九年，他入京朝见，所贡也有大小自鸣钟二具。到了清初，宫廷视此钟为珍奇，意欲仿制而不得其术。康熙《庭训格言》记载宫内有制造自鸣钟者，因发条工艺较难，“故不得其准也”。后来康熙“自西洋人得作发条之法”，制自鸣钟十枚，“以为玩器”。而中国民间所制之钟，不如西制之精，久之，其术不得流传。乾隆间欧洲商人所进，仍以自鸣钟为珍品。

（2）望远镜。望远镜何时传入中国，不得详考。明代正德、嘉靖间，西人东来海上测量，常用此器。诸书所载，从未涉及此事，不敢妄断。推其传入年代，似在万历末年。因为此器为测天所必需，故汤若望著《远镜图说》一书，以阐述其理，明示其用途。汤若望除著书外，必又自造望远镜若干具，作为治历之用。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澳门情形时，也曾谈到望远镜之事：“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由上可推知，清初时，望远镜在澳门可能为普通物品，其得以流行于民间，还是有可能的。

（3）显微镜。显微镜何时始传入中国，也不得详考。《广东新语》载其事，云：

> “有显微镜，见花须之蛆，背负其子，子有三四，见虮虱黑色，长至寸许，若可数。”

王士祯的《池北偶谈》也载其事，云：

> “西洋所制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见其所画人物，视之不辨头目手足，以镜照之，即眉目宛然姣好。镜锐而长，如卓笔之形。”

此处所说之镜，即显微镜。至于此镜流传的情形，根据当时科学尚未进步，医学尚未发展，其用途不甚显著，故流传也决不

会广。

自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后，天文历法方面有测天诸仪的仿造制作；在农艺水利方面，有引水诸器的制作；在军备方面，有西洋各式铳炮的制作；在物理学、光学方面，有引重、起重诸器及各类镜的制作，可谓洋洋大观。从科学事业发展角度而言，当时来自欧西的这些理论著述及实际制造，均已粗备基础。

七、欧洲哲学与宗教思想的传入

一、西方哲学思想的入传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由冯承钧译、赖费之著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高一志传》和高一志著的《斐录汇答》二卷（书藏巴黎国民图书馆中国书籍新藏三二〇八号）。“斐录”是西语哲学的译音。《四库提要》曾为著录，说：

> “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

以物质而论，火、气、水、土，为宇宙间四大原素，是希腊原有的哲学思想。高一志原名王丰肃，万历间传教南京，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发生后，被押解到广州，后改名高一志，潜赴山西绛州、蒲州等地传教。生平著述甚富，颇精于哲学。高一志未东来之前，曾在米兰（milan）教授哲学三年，来华后将西方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

继高一志之后介绍西方哲学的，有傅汎际。他曾与李之藻共

译《名理探》①一书，是为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之始。

《名理探》即希腊文中的逻辑学或论理学。论理学重在穷理，而穷理又有两大方法：一为归纳法，一为演绎法。《名理探》中所说的“设明辨之规，是近向界”，即归纳法；“循已设之规，而推演诸论，是远向界”，即今之演绎法。逻辑学原为希腊亚里斯多德所创，中古欧洲各大学，多设有此科目，傅汎际和李之藻所译的《名理探》即是当时欧西大学的教材。希腊哲学传入中国，此为第一时期。

西方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后，曾在中国发生过争论，使中国沉寂的思想界，稍生涟漪，这就是基督教的宗教哲学思想。自利玛窦等宣教中国后，归依者固有之，而反对者尤多。考当时反对天主教的原因，大约有三：（1）出于爱国观念，如怀疑传教士在中国有觊觎窥伺之嫌；（2）以西洋宗教仪式与中国传统习尚不合，如祀天、祭祖、拜孔等；（3）出于卫道观念，以为天主教兴，则孔孟之道必趋衰微。此等辩论，大抵出于感情的冲动，以及习惯的不同，并没过深牵涉思想的内涵。当然，近代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晚明时，代表中国思想界的唯有理家一派，其所论心性之学自成一种思想体系。此派思想与基督教宗教哲学大相径庭，绝不相同。

（二）基督教思想与中国理学的异同

基督教的主张是：（1）宇宙间有一个有意志的上帝，他创造及管理天地万物，并纠察人类的意念行为。上帝被视为人类万物之灵，故对飞潜动植物仅予以求生存及感觉或知觉的能力，而对人类则独赋予一种灵明的躯体。此种灵明的躯体，能体察宇宙

① 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

何谓善，何谓恶，何谓真理，何谓虚妄，何谓正义，何谓邪僻。总之，具有一种明悟与裁判的力量。（2）基督教是坚持人类罪孽原有说。如各种欲念声色货利等，俱为先天已具有的罪根，而人类之所以为灵明，在于能体察上帝的意旨，克服各种欲念罪过，以达于至善的境界。但由于基督教不承认人类自身有克服罪过的力量，因而，又有救主降世代人赎罪之说。（3）此外，又承认人类的灵魂不随肉体消失，且有善恶之报，此即所谓天堂地狱之说。凡此诸说，均与晚明理学家所倡的学说不同。

当时理学家的言论，其说不一，总的是以阳明一派为最盛。其主张是，人类先天赋有一个虚灵不昧之心，心的本体即纯善与真理之所在。心也可称之为良知，人类欲求达到至善的境界，须使一切意念行为合于心的本体，也即充分表现心的本体的功能，此即所谓“致良知”。人心中所具有的“天理”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换言之，即人心中所具有的天理与草木乱石所具的天理相同。此理为宇宙本体，能生天、生地、成鬼、成神，生成万物。

理学家的思想与基督教的思想有明显区别：（1）不承认宇宙间有一位超乎一切、主宰万物的上帝，而承认万物的生成乃原于理，此理颇似近世所说的“自然规律”。（2）承认人类有个虚灵不昧的心，近似基督教所言的灵明，然此心非人类所独有，乃与万物合为一体，且非上帝所赐予。（3）承认人类有此力量能使心志行为合于心的本体，以达到至善境界。（4）理学家认为人类的求达至善，乃出于自由意志，并非有所企图。基督教则有赏罚报应的观念，以诱掖世人。

理学家与基督教的思想虽殊，然二者要求认识宇宙本体，辨明真理与至善，并使人类如何修行，方可达到至善，其目的则是一致的。因此两种学说同具有一种宗教意味的理想。自利玛窦等宣教中国，即注意到当时理学家所倡导的学说，虽未敢公然辩论，但其诘驳之语也常散见于所著各书之中。从利玛窦的《辩学

遗牍》一书，对当时教理辩论的情形，可以知其大概。其后，又有艾儒略著《三山论学记》一书，也对教理有所辩论。此外，还有毕方济著《灵言蠡勺》、艾儒略著《性学觕述》、利类思著《超性要学》、《灵魂》等书，均对灵性之学有所阐发。

从阳明学说看中国传统的本体思想，溯其本源，始于儒家学说。理学家的理论系统受多方面影响，但他们却自认为是承袭或阐发孔孟的道统观念。其实，儒家思想总不外在“人”上追求，教人如何为人，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也即是求现世人的正当关系。基督教则与此相反，只注重未来世界。也就是说，人生在世的各种修行不是为现世而是为来世。在这点上，二者的差别相去甚远。基督教尽管传入中国甚久而未能发生巨大的影响，也未能使中国文化发生转变的原因，就在于根本态度上的不相同。

理学家所说的“道”，其理论原脱胎于道家思想。道家认为，宇宙是自然演变而成的，否认上帝创世说。道生成万物，而寓于万物之中，故万物为一体。此种理论在科学未倡明之前，本已达到最高境界。我国学者能在宗教思想的圈套之外，独创一种思想来解释宇宙，在哲学史上实堪注意。从表面看，理学家是反对老庄的，而在精髓中却吸取了老庄的学说，构成一派思想。所以，理学家的理论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绝对相反。

（三）基督教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差异与斗争

除理学外，佛教的思想也与天主教有较大的差异。万历年间，利玛窦传教中国所采取的态度是迎儒排佛，遂引起佛教徒虞淳熙及云栖和尚等的反诘。晚明之际，佛教徒反对天主教者，以杭州为大本营。杭州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反洋教的中心地，似与教会在杭州迅速发展有关。当时中国人中信奉天主教者，以徐光

启、李之藻、杨廷筠三人为最著名，所谓教中的三柱石皆江浙人氏。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云栖和尚著《竹窗三笔》一书，书末附“天说四则”，对于天主教义多所诋毁，而虞淳熙也著《天主实义杀生辩》等文，与天主教徒论辩。此时，佛教与天主教激烈的争辩进入到尖锐化的时期。

基督教以上帝为宇宙本体，佛教与道教以无为为宇宙本体；基督教视天主、人类与万物各具不同的德性，而佛、道两家则视万物为一体。当然，佛家与道家也有不同的地方。道家主张宇宙间一切现象自然生成之后，便各在大自然的波涛中听其自然演变，自然生息，一切现象均是大自然演进中应有之事，故善者不得为其善，恶者不得为其恶，大者不得为其大，小者不得为其小，往古今来，浑然一体。从而否定宇宙间有善恶是非之分。既然不承认宇宙间有善恶是非之分，因而便无赏罚观念，也无来世思想。佛家则不然，佛家承认万物从无生成之后，便各具其外形与内心，外形名之曰“色”，内心仍称之为“心”。既有心，便有心的作用，故曰“心生万虑”；既有色，则色生变化，故曰“色起万端”。因为心、色各有其作用与变化，故生出种种事情来，既有种种之业，便又有善恶之念；既有善恶之念，便又有赏罚与来世之思想。佛教轮回之说，即由此种观念而来。基督教与佛教同具赏罚与来世的思想，但前者只承认人类的思想行为，可受赏罚的报应，而其他万物不在其列。天主教士至中国后，极力反对佛家的轮回说。佛教徒起而与之辩论。这种辩论直到雍正朝教禁严厉时期，余波方平。

上述理、佛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争辩，究竟发生了什么影响？细察此段史实，当争辩偃旗息鼓之后，即变得沉寂无闻，各行其是，互相间不再发生影响。这与中国以往的历史不相同：佛、道两家，在春秋战国时即已形成两派最大势力，彼此攻击、诋毁，

较明清时期理、佛、基之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佛教东来之后，也曾激起一大波澜，凡是儒生，无不辟佛自重。这几笔笔墨官司载在史册，斑斑可考，不能一一阐述，但它们争论的结果是，道窃佛之说，佛也窃道之说，儒窃佛之说，佛也窃儒之说，相得益彰，兼容并蓄，经历了一千多年，最后便唱出了儒、道、释三教合一之说。

基督教则不然，它与儒、道、释也曾经过争论，为什么未发生相互渗透的影响，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素来重视理论的探讨，而不重视宗教形式如何。二千年来，中国未曾自己确立一个有如基、回、佛等那样的宗教派别。这足以证明中国很不重视宗教形式，所以虽有派别而无确定的信条，亦无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因而，凡理相通、说相合者，均可兼容并收。儒、道、佛三家之能在中国互生影响，这是其最大原因。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宗教的形式已确立，教条已确定，不易容纳外来意见，尤其是中国民族的特性和习尚所决定不易受其他理论的影响。又因基督教为超然的教派，为其教义的纯洁性，必然产生排它性，所以始终走不到中国社会里层去，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始终不能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天主教传入中国时间较晚，再受到几次教案的打击，更难在中国立足生根。所以，那种“基督教化中国”的狂妄主张，到后来只有依靠超宗教的力量来推行了。

八、传教士在发展古老中华的医药学、音乐学和语言学中的作用

（一）医药学

西方医药学也于明末传入中国，而首先传入的是解剖学。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的《人身图说》后称："西洋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所译其国《人身图说》二卷。"此处所说的《人身图说》，即今日的解剖学。王韬的《西学辑存六种·泰西著述考》载邓玉函著有《人身说概》二卷，与《人身图说》之名不合。冯承钧认为《人身图说》为罗雅各著，《人身说概》为邓玉函著，因二书并行，俞正燮遂混为一谈①。罗雅各所著《人身图说》一书，《泰西著述考》没有记载，所以书成于何年，无由得考。至于邓玉函的《人身说概》一书虽有，但流传也不甚广。译者称他亲见有旧抄本，题作《泰西人身说概》，篇首有东莱毕拱辰序，并说，此书译于武林李之藻家。冯承钧又云：

> "初无刊本，崇祯八年，拱辰识汤若望于京，得见此书，以玉函译时，乃一纰陋侍史从旁记述，恨其笔俚而不能挈作者之华，语滞而不能达作者之意，因而使书的内容通其隔碍，理其纷乱，文其鄙陋，凡十分之五。但本来面目宛然具在，遂付诸梓。是知此书初成于武林，崇祯八年又经毕拱辰删改而成。"

依笔者所见，冯承钧的说法未必真实，因仅出一人之口，并

① 赖贲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邓玉函传》。

无佐证。假定罗雅各果有《人身图说》一书与邓玉函《人身说概》并行，可是，俞正燮却称《人身图说》为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三人所共译，似冯氏所见抑或有臆想之处。否则，混罗、邓二书为一犹可说，何以又将龙华民之名并入？因此，二书之源流尚待考定。或者说此二书即为一书，仅有邓作而无罗作，若此，则又可证明冯承钧语与实际显然相抵触。

西方解剖学虽经邓玉函、罗雅各的介绍而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医学上尚未产生大的影响。因为此时中国崇尚传统的古典医学，距科学研究尚远，不能接受此种科学，就连生当乾嘉之世、博览群籍、对于西洋教士所著之书甚是留意的余正燮亦有错误记述：

> “……又论人知觉在脑。其人南怀仁于康熙时上《穷理学书》，云：‘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亦不出此书之旨。惜脏腑经络事非众晓，脏腑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脏腑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脏腑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当毅然自惜，掉首发舌，决然舍去欤！”①

余正燮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西洋人身体构造与中国人不同，因其身体构造不同，所以信仰的宗教也异其趣。中国初与西方接触，事事多出误解，这仅为普通的一例。

康熙年间，西方医术继续传入中国。康熙帝尊宠教士，西方科学多被采用，医学也在其中。耶稣会士们的回忆中，称康熙帝爱好西方医学及解剖学，当为事实。这可从康熙在皇宫中任用欧洲人做御医一事中得到证明。据载：

> “标下千总陈秉志、抚标千总袁良栋同谨禀大老爷

① 《癸巳类稿·人身图说》。

台前。禀者二十九日旨意，叫嘉乐进朝内见，皇上问嘉乐许多话、赏衣食。皇上望西洋内科乌尔达说玩话：'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皇上大笑甚欢……"①

据此可知，在教皇派教士嘉乐来中国之前，康熙已用西洋人乌尔达为内科医生。又据载：

"允祁废立后，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脏弱，跳的很快，卧病几死，罗德先进药，病愈，遂荣任廷御医。"②

可见，传教士中充任内廷御医者，又有罗德先（Rlodes）。康熙皇帝既信用西方医生，则其对于西方医学的提倡也可想见。

康熙内廷供职者既有西方医生，则西方药物也必于此时传入中国。《文史周刊》又载：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西洋人自从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徐日升等在内廷效力，俱勉力公事，未尝有错。……前者，朕体违和，尔等跪奏，西洋上好葡萄酒，乃高年人大补之物，即如童子饮乳之力，谆谆泣奏，求皇上进葡萄酒，或者有益。朕即准其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好。今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念尔为朕之诚心，不可不晓谕，今将众西洋人传在养心殿，都叫知道。钦此。"③

此处所说葡萄酒虽是平常用品，但因病而用，则得于一种药

---

① 1934年3月19日桂林版《扫荡报》，"文史周刊"第8期

② 见"文史周刊"，第4期：《从西方书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附录。

③ 同上，第5期。

剂。据史料载，康熙帝曾患疟疾，服西洋金鸡纳霜而愈。会士传教往往利用医术，因此西洋药物传入中国，必定不少。可惜，中西书籍记载甚少，不能详考。

又据图理琛的《异域录》称，清圣祖曾令俄罗斯商人科密萨尔转达俄罗斯朝廷，请其派送外科良医来华。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路经托波尔时，将此事告知当地的噶噶林（官名）。后俄罗斯把瑞典医生兰给（De Lange）荐于中国。兰给于康熙五十四年来京，住留三年后，返回俄国。康熙五十八年，兰给又以参赞身份随俄使伊斯迈罗夫（Ismailoff）东来，留数载。由此可知，康熙时期除由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医生外，尚有俄罗斯遣来的医生。康熙皇帝对西方医学的注意，于此可见。

康熙年间，在西方医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医术也传入到西方。中国《本草》一书，是医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邓玉函将此书译为西文，传入西方。中国医术传入西方，当以此书为始。

痘医之术，当时已甚留意。清初设有查痘章京，是管理旗人痘疹及内城民人痘疹迁移的官员，说明当时对痘疹传染已知采取隔离防预的办法。康熙中期又将种痘之术推行于北边各地。《庭训格言》有这样一段记载：

> “训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主，遂全此千万人之生命者，岂偶然也。”

此种痘之术是中国所固有，方法是种牛痘于鼻上。1803年（清嘉庆八年间），西洋种痘之法由西班牙人传入中国。

清廷既注意痘医，而又将中原地区种痘之术行于边塞。俄罗斯知有此医术，故特遣人来中国学习。《癸巳类稿》说：“康熙

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又说：“俄罗斯有学蒙古接骨大夫者，仅康熙年一至。”

中国药物传入西方，当以大黄为最早。大黄在中国药材中甚为普通，传入西欧不知自何年始。但在康熙年间，俄罗斯对中国贸易，大黄是专利品的一种。自俄罗斯东来贸易之初，至乾隆之末，大黄输入俄罗斯甚多，而俄罗斯商人也赖此获利甚厚。俄罗斯为什么需要如此之多的大黄？何秋涛有著作载曰：

> “……盖俄罗斯新都在彼得罗堡，滨海多鱼，旧都，在莫斯科洼，五谷较少，唯鱼是食，须大黄以解鱼毒。其东，偏锡伯利诸部，本鞑而鞮旧埒，风俗多同蒙古，不食五谷，唯嗜牛羊酥乳，脏腑火盛，亦必须大黄以荡涤之。至俄罗斯南境，毗连安集延、回疆等处，食大黄者虽少，而多用以染色，故俄罗斯特派头人，专司收买大黄，散给属下，官卖济众，此彼国不可一日无大黄之实在情形也。”①

当时人的揣测未必尽然。但在游牧及渔猎民族中需要大黄，则近于事实。所以俄罗斯毗连的各民族，需要大黄甚多。大黄既为输入俄罗斯的主要药物，故乾隆五十年中国再停恰克图市易时，即以严禁大黄出口作为威胁俄罗斯的唯一手段。当时的禁令，不仅限于恰克图一地，即使库伦、新疆等地也一体禁行。清廷又恐与俄罗斯接埒的欧洲各国洋商转贩，遂谕令盛京、直隶、山东、江南、浙、闽、粤东各督抚等，饬属在沿海口岸严行稽查，毋许奸商偷贩大黄出洋，转售于俄国。以一种平常药材，竟成为对付外国人的重要政策，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俄罗斯互市始末篇》。

（二）音乐学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始自葡萄牙人定居澳门之时。屈大均《广东新语·记澳门事》中曾记载了一种西洋乐器：

> “男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寺有风乐，藏革櫃中，不可见。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鸣鸣自櫃出，音繁节促，若八音然，宜以合经呗，甚可听。”

此处所说的“风乐”，即今天通常所用的风琴，因为礼拜堂中歌诗颂神，需此琴以和韵。明嘉靖末年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建堂、习教，风乐是礼拜时必须使用的一种乐器。因此说西乐传入中国，应自葡萄牙人定居澳门时开始。

自此以后，西洋音乐及乐器，陆续传入中国。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中说，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九年入京朝觐时，献铁弦琴一张。神宗爱之，命内臣学习，并问西来曲意，利玛窦便译八章以进。《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利玛窦传》记载：“《畸人十篇》后，附有西琴八曲一卷，玛窦所献品中有小瑟，庞迪我神甫善音乐，以授中官，此乃其曲意八章也。”可知利玛窦所献的铁弦琴，即西洋的epinette。而教授华官者，是庞迪我神甫。

到康熙之世，对西洋乐理研究尤切。据载：

> “……至于律吕一学，大皇帝犹彻其根源，命臣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此书不日告成。此《律吕新书》内，凡中国钟磬丝竹之乐器，分别其比例，查等其根

原，改正其错讹，无一不备美。”①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为西洋乐理讲授于宫廷；一为《律吕新书》的编订。关于德理格教授皇子乐理之事，还有《康熙与德理格》一文可以佐证。此文曾摘录梵蒂冈罗马教廷档案中的一段，云：

“六月二十二日（指康熙五十三年即一七一四年），首领张起麟传旨：西洋人得里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学律吕根原，若是要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乌、勒、明、法、朔、拉、六七个字的音都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明明白白说与得里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的音律要紧的根原。再亦着六十一管教道他们。”②

德里格于康熙五十年奉召入都，供职宫廷五年，对于西洋乐理的传授，贡献很大。档案所载，为康熙五十三年六月间事。所谓“乌、勒、明、法、朔、拉”六字，乃当时所用的六音，即今日乐谱中的1、2、3、4、5、6六音。

西洋乐理传入中国后，国人也对中国古老旧乐加以整理。康熙五十二年，有诏令纂辑律吕等书之事。在《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的第六件中所说的编写《律吕新书》，即指此事。因乐书失传，它的内容未可详考。德理格在宫廷中讲授律吕的根源，即为纂修新书的第一步工作。今《律吕正义续编》的卷一，就是论述西洋乐理并着重于五线谱的编制及用法的说明。此书编首《续编总说》云：

“……我朝定鼎以来，四海尽入版图，远人慕化而

---

①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六件《德理格、马国贤启》。

② 1941年4月23日桂林版《扫荡报》“文史周刊”第13期。

来者渐多。有西洋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者，精于音乐，其法专以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和声为本。其书之大要有二：一则论管律弦度生声之由，声字相合不相合之故；一则定审音合度之规，用刚柔二记以辨阴阳二调之异，用长短迟速等号以第声字之分。从此法入门，实为简径。后相继又有壹大里呀国人德礼格者，亦精律学，与徐日升所传源流无二。以其所讲声律节奏，核之经史所载律吕宫调，实相表里。故取其条例形号，分配于阴阳二均高低字谱，编集成图，使谈理者有实据，而入用者亦有所持循云。

当时所论的乐理，一为乐音谐和，一为曲调编排，即五线谱的制作。西方乐理，简要易明，稍习音乐即能按谱歌唱弹奏，并不深奥。而在当时则觉得很新奇，所以令西士讲授于宫廷。明清间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很多，音乐居于重要的地位。

（三）语言学

我国文字为表意字体，每一字有一个读音，因此就字体结构的形式而言，不能明其读音。读书者，自幼学习，每遇一字，明其意，诵其声，积久熟习，始能运用自如，此纯依赖记诵，没有捷便方法。所以，一旦遇到奇僻之字，假如不得传授之人，就无法阅读。魏晋以后，因受梵文拼音方法影响，而采用反切法，即将每一字所含的音素，用其他两字标注在这个字旁，上字表明其变声的关系，下字表明其叠韵的关系，声母与韵母相配合，即得其字的音质。这种方法必须确定反切二字的确切读音。但是，中国文字的读音往往因地而异，于是各家所用反切之字往往彼此不能统一。标准既不确定，学者自不知所从，虽有其法，而在运用上仍不免感到困难。

中国文学采用注音符号是近现代的事。但推本溯源，则以明清之际耶稣会士采用罗马字母注音方法为始。教士东来中国，诵习中国语言文字的最大困难是各字的读音难以记忆。于是，他们便采用罗马字母拼音的方法，在每个中国字的旁边，别注罗马字母拼音，见其字即能诵其音。程大约的《墨苑》内有利玛窦所作的罗马字注音四篇，作为赠给中国学者程大约的礼物。其注音方法，赖此以见。罗常培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①，对于利玛窦所注罗马拼音各字逐一分析，发现有二十六声母，四十三韵母，四"次音"五字调符号。中国每字既具有声韵两个元素，只有清、平、浊、上、去、入五声之分，所以必须有符号标明每个字。据史书记载，利玛窦有《西字奇迹》一卷，把汉字译写成拉丁字母，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刻于北京。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第九章《近代中国音韵学所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中，称利玛窦赠给程大约的就是他的《西字奇迹》一书。总之，自利玛窦译写拉丁字母，开始注重注音，后来作注音四篇，用途更大，这对于西方人学汉语读汉字比较便利。

利玛窦起初使用罗马拼音，仅是为了自己学习汉语方便，并未有分析中国文字声韵的意思。所以对中国的音韵学，没有显著的贡献。

及至教士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一书，他用西洋拼音方法来解释中国音韵之理，从此将拼音法具体纳入中国音韵学的范围。此书流传甚少，《四库提要》虽曾著录，但残缺不全。

金尼阁写作《西儒耳目资》的主要目的不在声韵分类，而在于应用的便利。所以西方文人不把此书看成是音韵学著作，而被视之为工具书。此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1）区分音类，即按中国文字声韵分类，可以互相阐发；（2）拼音方法简单，

① 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

便于应用，可以避免反切的困难；（3）依声分类，依形分类，便于检查。此书开中国近世工具书的先河。陈垣称“当时以此为西洋人认识汉字之捷决”①。教士来华，感于中国文字之难于学习，故喜讲求简易之术。利玛窦开其端，金尼阁继其成，其他教士也大多注意对中国语言的研究，或考文法，或究声理，或纂辞典，著述实属不少。这在无意中开了西欧研究汉学之风，中国文字本身也因此而得到拼读便宜。这也是早期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一个功绩。

九、中西绘画艺术的结合

（一）西方宗教绘画艺术的传入。

明清之际，西洋艺术传入中国者，以绘画为最重要，而其传入中国的时代，则以耶稣会士东来为始。万历年间，会士罗明坚初至澳门宣教之时，即携有天主耶稣及天主母玛利亚画像。其后利玛窦开教肇庆、南雄、韶州、南昌等地，无论教堂的构造形式，或堂内的装饰点缀物品，均是西洋宗教艺术风格。但在当时却不曾为中国艺林所注意。万历二十七年，利玛窦入京朝贡被阻，住居南京，建堂于洪武岗，聚众宣教，其时所携来的西洋艺术品，渐为中国人士所注意。清人张庚说：

> “白苧村桑者（张庚自号）曰：明时有利玛窦者，西洋欧罗巴国人，通中国语，来南都，居正阳门西营中。画其教主作妇人抱一小儿，为天主像，神气圆满，彩色鲜丽可爱。尝曰：‘中国只能画阳面，故无凹凸。吾国兼画阴阳，故四面皆圆满也’。凡人正面则明，而

①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32－133页。

侧处即暗，染其暗处稍黑，斯正面明者，显而凸矣。”①

张庚这段评论出自顾起元《客座赘语》，其述利玛窦条云：

“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面皆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阳与阴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云南绵纸，厚而坚韧，板墨精甚。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丝发……。”

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入都朝觐，所赍贡物，有天主及圣母图像，亦即艺术品。《正教奉褒》载其奏疏云：

“……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主图象一幅，天主母图象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敬献御前。”

利玛窦所献天主像及天主母像，在艺术上的价值如何？曾否发生影响？不得而知。但是自利玛窦入都之后，教会日渐发展，西洋艺术品东传者，日渐增多。1910年，劳弗尔（Berthold Louter）所著《中国耶稣教艺术》（Christian Art in China）

① 张庚：《国朝画征录》。

一文中，摘录程大约的的《墨苑》内所载的西洋宗教画四幅：（一）《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系绘《新约》中耶稣召彼得海上行走故事；（二）《两徒闻实即舍空虚》，系绘《新约》耶稣受难后，现身与革流巴等二门徒同行故事；（三）《淫色秽气自速天火》，绘的是《旧约》中所多玛城因罪被焚故事；（四）为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耶稣之像。每像之上，俱有西字，标题下端附有西洋绘画及雕刻家若干人。前三图，有汉文解说，每字之旁，也附西字。第一图的说明之后，题有“欧罗巴利玛窦撰”。第二、三西图说明之后俱题“万历三十二年岁次乙巳腊月朔遇宝像三座耶稣会利玛窦题”。1927年，陈垣从通县一姓王的人家中得《墨苑》，见所附图说皆全，于是影印行世，题目叫《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其跋文云：

> “明季有西洋画不足奇，西洋画而见采于中国美术界，施之于文房用品，刊之于中国载籍，则实为仅见。”①

这段叙述说明陈垣先生对于此图非常重视。后来，研究欧洲历史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于此图的来源，进行过分析研究。

利玛窦之后，以宗教图画进呈于皇帝的还有汤若望。据记载：

>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有葩槐国君玛西理，饬工用细致羊革装成册页一帙，彩绘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各图，又用蜡质装成三王来朝天主圣像一座，外施彩色，俱邮寄中华，托汤若望转赠明帝。若望将图中圣迹释以华文，工楷誉善。至是若望恭赍趋朝进呈。”②

---

①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23页。

② 《正教奉褒》。

汤若望所进呈的图象，后曾刊刻流行。康熙年间，杨光先著《不得已》一书，其中有《临汤若望进呈图像说》一篇，可以为证，文云：

“上许先生书后追悔著《辟邪论》时，未将汤若望刻印国人拥戴耶稣及国法钉死耶稣之图像，刊附论首俾天下人尽见耶稣之死于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为其作序，即小人亦不屑归其教矣。若望之进呈书像，共书六十四张，为图四十有八，一图系一说于左方。兹弗克具载，止摹拥戴耶稣及钉架立架三图三说，与天下共见耶稣乃谋反正法之贼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图说附于左方。”

（二）中西绘画艺术的相互影响

当西洋艺术品传入中国之时，中国绘画也极发展。董其昌、米万钟等号召南北画派皆为一体。明代画家董其昌的绘画，曾受西洋影响，吸取了西洋风格。劳弗尔的《中国耶稣教艺术》中称他自西安得一画册，内有书六幅，绘于丝绢之上，末题玄宰（董其昌字）之名，并有董其昌印鉴，确定为董其昌之作。这六幅画俱附于劳弗尔作品之后，每幅所画人物服饰，劳弗尔说均染西洋风格。这足以说明，中国艺术界受西洋影响，董其昌当为最早者。

中国绘画受西洋艺术影响，自写真开始，而开其风者，又从曾鲸始。陈彬和所译的日本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云：

“传神写照之名人，自曾鲸（原注：字波臣，莆田人，顺治六年卒，年八十三）出，而轰动一时。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教士来明，画亦优，能写耶稣圣母像，曾波臣乃折衷其法，而作肖像，所谓江南派之写照也。”

明清间，除写真技法曾受西洋影响外，一般绘画也略受西洋的影响。常熟画家吴历，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记载：

“吴历，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学画于王时敏，心思独健，气韵厚重浓郁，迥不犹人。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蓊渺凌虚，迥异平时，康熙五十七年卒，岁八十七。当时或言其浮海不归，后于上海南郭得其墓碣，题曰‘天学修士’云。翬初友善，后绝交。王原祁论画，右历而左翬，曰：‘迩时画手惟吴渔山而已’。世以时敏、鉴、翬、历及恽格，并称为六大家。”①

清代康、乾年间，中西绘画彼此间发生交流而产生影响的，以画院一派为最显著。清制仿明代画院，设如意馆於京师启祥宫南，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装璜、帖轴，皆存此处。这类工匠，无官秩，后渐用士流，由大臣引荐，或献画称旨召入。康、乾间，以绘画供奉内廷者，除中国人，尚有欧洲教士，故中西画法易于互相影响。嘉庆中，编修胡敬撰《国朝院画录》一书，共载八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有：熙朝济宁人焦秉贞，以西法作画，不独为宫廷所好，艺林之士也多承袭其法。例如，《画徵录·焦秉贞传》中云：“弟子冷枚，字吉臣，胶州人，尤工士女，康熙五十年与画《万寿圣典图》。”又崔镐传云：“崔镐字象州，三韩人，工人物士女，学焦秉贞法，传染净丽，风情婉约，虽未能方驾古人，而翩翩足隽一时矣。”由此可见，以西法作画的秉贞之法，亦流传一时，蔚为时尚。

院画派中，以西法作画而受中国影响最深的传教士，以郎世宁（Jooeph Castinglione）等为最。郎世宁于康熙五十四年

① 《清史稿·吴历传》另见《方豪六十自订稿》，下册，第1627—1688页，有关吴渔山先生的记载。

来京，卒于乾隆三十一年，供职内廷甚久。作品甚多，仅《石渠著录》就搜集56幅，此外尚有散见于他处者。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曾记述其线画法：

“都中，天主教堂有四：一曰西堂，久毁于火；其在蚕池口者曰北堂；在东堂子胡同者曰东堂；在宣武门内东城根者曰南堂。内有郎世甯线画法二张，贴于厅事东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壁下，闭一目以觇东壁，则曲房洞敞，珠帘尽卷，南窗半启，日光在地，牙签玉轴，森然满架。有多室阁马，古玩纷陈，陆离上下，北偏设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于中，灿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发。壁上所张字幅篆联，一一陈列。穿房而东，有大院落，北首，长廊连属，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润。又东则，隐然有屋焉，屏门犹未启也。低首视曲房外二犬，方戏于地矣。再立东壁下以觇西壁，又见外堂三间。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离。堂镜上悬大镜三。其堂北墙，树以隔扇。东西两案，案铺红锦，一置自鸣钟，一置仪器。案之间设两椅。柱上有灯盏四，银炽盛其上。仰视承尘雕木，作花中凸如芷，下垂若倒置状。俯视其地，光明如镜，方砖一一可数，砖之中路，白色一条，则砌以白石。由堂而内，寝室两重，门户帘栊，宛然深静。室内几案，遥而望之，饬如也，可以入矣，即之，则犹然壁也。线法古无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见也。特记之。”

郎世宁供奉内廷甚久，亦以善画著称一时。《清史稿·艺术篇》唐岱传，称郎世宁“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奇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盖为皇帝宠眷之一人。其所绘各图，石渠所录，大都花

卉翎毛之属，然亦精于画马。”《熙朝各画续录》又说：“准葛尔进大宛马，上赐名如意骢，即命世宁图之，得邀睿鉴赐题。”《清史稿·唐岱传》亦言及此事，云：“会爱乌罕进四骏，郎世宁绘之。复命金廷标别作，仿李公麟法，增写执鞭人，古趣出彼上。”郎世宁又别有百骏图，亦为艺林所称道。此外，世宁又以绘武功图著称。乾隆一期，以平定准葛尔及回部为最盛，世宁既绘《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一卷、《玛瑞斫阵图》一卷，且又与其他教士共绘平定准葛尔和回部图十大幅，图成后，于乾隆三十年送法国雕板。平定准、回二部，为乾隆一朝的盛事，而绘画雕板亦为当时的盛典。因中国古籍记述甚少，无得详考。

清初，会士中精于绘事者，未必尽供职画院，而供职画院者，又未必仅郎世宁等人。这些人以西法介绍于中国，使中国艺术发生重大变化，而其自身亦受中法的熏染，逐渐改变其固有的作画风格。但就总体言之，中法受西法的影响，很快就消失无踪，没有大放异彩。而西法受中法的影响，也限于教士数人，在欧洲也未发生重大影响。其中原因，系因读史者仅供研究之用的缘故。

上述西洋艺术，仅偏于绘画一门。其余如雕塑、建筑等，本应列入艺术之内，因其涉及范围太广，篇幅所限，不及详论。

十、早期传教士的功过是非

明清期间，西方传入中国的学术思想及其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大略如此。笔者以为，科学技术发展，是近代文化进步的特征，也是国家富强必备的条件。明清间，中国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大体已备，倘统治者懂得其重要，潜心研究并且大力推广，定会使中国很快进入近代科技文化的境域。可是，至乾隆

朝之后，西方的影响逐渐衰微，犹如涓涓之泉，不出百里，而涸竭中途。有人说中国对于西方科学所以不发展，系因雍正间禁教甚严，传教士不能立足中国，致使所传来的西学，逐渐隐没失传。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其根本原因却是自来中国一般人的思想多偏重于'人'的方面，而不注意于'物'的方面。也就是说，专在社会科学上费时间，而不在自然科学上用功夫。晚明之时，士子喜谈心性；乾嘉之际，士人又喜谈经术，讲究学问正宗。至于天文、历算、物理学等均属末技，不能入流，不为学人所重视。在此种空气中，以科学技术著称的西学，必然不能发扬光大。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巨舰利炮，打破中国大门，侵入华夏，社稷国家，危如垒卵。尤为甚者，即后来的传教士竟一反早期耶稣会士为传布基督信仰的献身精神，施尽手法，践踏中土，践踏中华民族，士子始知空言经术，不足以救国，而开始注意于西方各国所以致富致强的原因。然，对当时国家病源，无所探察，无从根治，仅吹毛求疵，表面改革，不动社会根基，所以不能不令人引为教训，深深慨叹！

至于十六、七世纪的耶稣会士来华，是否也带有本国或西方原始资本积累初期时的掠夺性和侵略性的问题，现存的史料很少记载。诚然，利玛窦曾经这样说过："做耶稣的勇士，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个崇拜偶像的中国。"①还有一条史料记载，明代万历年间，西班牙驻菲律滨总督和传教士曾建议派兵攻打中国，"使中国基督化"②。关于传教士是否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肯否或简单否定，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

① 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1册。

②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转引自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2页。

在十六、七世纪时，西欧一些国家正处在原始资本积累的时期，确实带有很大的掠夺性和扩张性。但就当时到中国来的耶稣会士们讲，包括利玛窦、南怀仁等在内，他们一生的活动证明，主要是受罗马教皇的派遣，以个体或小群体到中国传布基督教义，扩大教廷在东方的影响和势力，很少看到是为某个国家或集团所控制，以实施政治侵略、经济掠夺的目的。会士们在中国的主要表现：一是广泛传播他们的信仰，以及在发展教徒中的坚韧不拔的献身精神；二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把西方科技带入中国，并勇敢地捍卫其科学性；三是谋取职业，了解中国，开创一番新事业。仅这三条，就大别于以后带着政治目的来中国的诸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被教廷解散以后，他们欲结欢本国权贵，讨个什么政治任务，就越发困难了。

关于西班牙驻菲律滨总督建议派兵攻打中国之事，现在仅见的史料，只是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时，驱教派首领沈潅等人，为了证实耶稣会士是为占领中国而来，便宣传西班牙欲占中国，教士郭居静想当中国皇帝。这种谣传，实系葡西两国政治关系解体，西班牙国王不再兼葡萄牙国王，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由葡萄牙人煽惑而起。澳门的舆论很快会由广州传到燕京，加上继任的中华耶稣会会督龙华民背离利玛窦的礼仪宽容方针所引起的朝野愤慨，再加上中西历孰是孰非的争斗，等等，这几件事结合在一起，就给驱教攻击耶稣会士提供了有力的“炮弹”。

第三章　“礼仪之争”与康熙政策的变化

（1644年——1722年）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本身逐渐走向衰落，原因起于教会的内讧。内讧的焦点是天主教中的多明我派、法兰西斯克派与耶稣会派神学思想的冲突和矛盾，并由此而引起“礼仪之争”。正是各教教派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礼仪之争”，导致中国士人仇教和康熙政策的转变，自此，在中国的教禁，竟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一、在华天主教教派间的争斗愈演愈烈

自利玛窦宣教中国后，一般东来的教士均属耶稣会一派，意见比较一致，教士内部很少发生冲突。且此时在东方传教仅受葡萄牙一国保护，其它国家如西班牙、法兰西等的政治与宗教势力尚未达及中国，所以当时政治背景比较单一。教廷也因东方教区初辟，对于教士的传教方法亦任其自由，不予干涉，所以教廷与传教士之间也相安无事。然而，到十七世纪初叶，这种局面便逐渐发生变化。随着葡萄牙势力的日趋衰落，不能独霸东方传教保护

权，因而在中国的教士也就不全是耶稣会一派了。积久，各派意见渐歧，纷争渐起。

（一）西班牙多明我教派的教士与耶稣会士之间的冲突

西班牙自占据菲律宾群岛之后，极欲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教，几经筹划，多明我派修士古奎于1630年到中国福建传教。从此西班牙各教派传教士相继前来，不断扩大其宗教势力。当时，耶稣会传教士看到自己在中国几十年独自经营的教区逐渐被西班牙教士分领，嫉恨之意渐生。164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分治，西班牙国王不再兼领葡萄牙国王位，于是两国政治关系解体，彼此间对于东方殖民地的经营，不再进行合作。而各自保护的传教士们也互相嫉视，互相排斥。1644年，留居澳门的西班牙教士，大多被葡萄牙人所杀，彼此的仇恨进一步加深。此时，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势力较大，对西班牙教士进行压迫和排挤，而西班牙教士则认为耶稣会的传教方法有背于基督教义，也不遗余力地对耶稣会教士进行攻击。二派争斗愈趋水火，“礼仪之争”于此肇端。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组建及其势力进入中国

十七世纪中叶，西班牙、葡萄牙海外殖民势力已呈衰微状态，而法兰西却崛起于欧洲，与各国互争雄长。其时，法兰西虽然同西、葡两国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但由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对东方怀有野心，不仅欲摧毁西、葡两国的海上霸权，而且要破除葡萄牙在中国独有的传教保护权，以扩展其宗教势力。

当时，法国耶稣会士亚历山大传教于安南（越南），主张发展东方传教事业，应加强对传教人才的训练，不应专赖西籍教士。但要实现这个计划又必须有西籍主教主持方可成功。亚力山大遂

想从巴黎觅一适合的人选。他到巴黎后，看中了耶稣会士巴流（Francois Pallu）。1658年，罗马教廷便委派巴流与另一教士兰贝尔特（La Motte Lambert）督察安南教务，并管理中国长江以南数处教会事业。其后，另一名教士古突兰（Cotolendi）也被派来督察南京教务，并管理朝鲜及中国北部数处教会事务。法国海外布道事业受教廷赞助甚力，共同目的是要削弱或取代葡萄牙对东方传教的保护权。

1663年，巴流获得教廷允许，在巴黎创办了一所神学研究院，以培养海外传教人才。并以该院为中心组织了一个“外方传教会”，形成了天主教中的另一新会派，与天主教的耶稣会等教派相对立。外方传教会依赖法国政府与教廷的势力传教于东方，这对葡萄牙在东方传教事业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时，外方传教会会士，对耶稣会士原有的传教态度和方法深怀不满。此是“礼仪之争”发生的又一原因。

（三）罗马教廷对于东方传教事业控制的增强

自葡萄牙东来之后，东方布道事业均归其保护。葡萄牙人于印度卧亚（果阿）设一大主教，管辖东方各处传教事业；并在澳门设一主教，统辖中国的传教事业。凡到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先至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候船出发，再到卧亚，然后才能到澳门。到了澳门要学华语，课华书，有了传教经验后方能被派到中国各地。外方传教会成立前，教廷对于葡萄牙人保护的传教事业，采取放任政策。其后，法国教士巴流等亲受教廷委派东来中国传教，扩大了教廷的监督权。葡萄牙人坚决反对教廷的这种作法，认为是侵犯了他们的传教保护权。1688年，葡萄牙通令各传教士，凡至东方传教者，必须自葡萄牙出发，并且要立下誓言尊重葡人的保护权。1690年，教廷为了缓和矛盾，在中国境内划出南京、北京、澳门

三大主教区，归葡人管理，并授葡人有确定这三大主教区域范围的权力。而葡人竟将中国各省尽划归在三大主教区之内，致使教廷派来的主教无插足之地。对此，教廷深为不满。1699年，教廷明令葡人缩小其主教区域，而另在中国境内开创八个主教区，归教廷直接管辖。这八个主教区分配于福建、浙江、江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山西、陕西九省之内，每一教区由教廷派遣一副主教，负责巡查监督教务。罗马教廷在中国另辟教区的做法，不仅使葡人愤恨，而且其它各国教派如西班牙的多明我等会，也因不愿受教廷的干涉而深怀怨意。但是，罗马教廷却坚持己见，曾于1678年通知在中国的派教士，必须服从教廷所派主教的管理，教中仪式亦须遵守教廷颁发的命令执行。从此教廷在东方布道事业中的统治权日渐增强，传教士的自由行动受到了限制。原来耶稣会士在中国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教廷不再是听之任之，而是加以约束。所以，即使各派传教士之间没有内部分裂、互相抵牾之事，也不能保其不发生争执。

总之，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在中国因会派的不同而发生传教事业上的竞争，又因竞争而发生了互相攻击、排斥的行动。各派教士除隶属于某一会派外，又为某一国的国民，这样就出现了有时因爱国心的驱使而背叛其会派的趋势。欧洲各国往往利用护教之名来实现本国对中国的影响的目的，而教廷与各护教国也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行使教权，因此各行其事，不能互相合作。到这时，布道事业已不再单是行教救世，而是与政治背景和权力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内部必然产生分裂，“礼仪之争”仅仅是作为彼此间进行竞争的借口罢了。

二、康熙初年的大教案——“历狱”

当欧洲各派在华教士矛盾尖锐、出现“礼仪之争”的时候，传教士遇到了明清时期传教史上的第二次大教案，这就是1659年至1665年间由钦天监官杨光先鼓动起来的“历狱”。这次教案距南京教案约五十年。

（一）杨光先发难

杨光先，安徽歙县人，明朝时任新安卫官生，以参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而出名。他以传教士汤若望所修中国历书上写着“依西洋新法”字样为借口，认为是暗窃正朔之权给西洋，使中国奉西洋正朔而失体统。便趁康熙帝“冲龄践祚”，辅政大臣不喜耶稣会士之机，诬告汤若望和各省传教士阴谋不轨。最初，他在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了一个奏章，参劾汤若望等教士有三大罪状：（1）潜谋造反；（2）邪说惑众；（3）历法荒谬。重点还是在（1）、（2）两点。

因为顺治帝对于汤若望等教士甚为宠眷，杨光先的参劾未生效力，他只好改变方针，串通权贵，拉拢赞同者，于是著成《辟邪论》上下两篇，印刷五千份，广为散布。上篇是驳斥李祖白所著《天学传概》①，他说：

> “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邪说惑众，潜谋造反，是上篇攻讦教士的中心思想。下篇是

① 李祖白是华籍天主教徒，任职于钦天监。

驳斥耶稣即天主之意。其实，《天学传概》一书，本为传教士利类思所著，华人李祖白、许之渐仅各作序文、弁首而已。杨光先误认为此书为李祖白所著，故又作《不得已》一书，云：以亚当为人类元祖，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并且西洋人来中国传教，无非要谋我中国。又说：澳门屯兵不少，汤若望是这些屯兵的头目，不可不防也。杨光先这本书流传甚广，影响甚大，不但朝野人士有因此而仇恨传教士的，即便是以前对教士们表示同情的人，虽明知其言不实，也不敢得罪权贵。

（二）鳌拜兴狱

不久，顺治去世。康熙皇帝年少，政权都操在辅政大臣手里。辅政大臣鳌拜原本憎恶教士，现又惑于杨书鼓动，益发嫌弃洋教士了。于是在康熙三年八月发旨将汤若望逮捕，发交礼部审讯。汤若望此时已七十三岁，适患痿痹症，口舌结塞，受审时由南怀仁（Verbiest）在旁代为申说。从此每日提审汤若望等，一连审了十二堂。至是年十月，又传旨将奉教的职官李祖白、潘尽孝等收监，南怀仁等也锒铛入狱。

经过两个月的审问，虽然教士图谋不轨之事毫无证据，仍判定汤若望邪说惑人，革职监绞候，汤若望被移押刑部大狱。

辅政大臣将此案呈请太皇太后定夺。而太皇太后览后大怒，掷折于地云："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①遂命速即开释汤若望，李祖白等则以荣亲王事应斩决②。汤若望开释后，回宣武门内天主堂(即南堂)。而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存泰等五人均被冤杀。其他

① 《中国基督教史纲》。

② 关于荣亲王事见本书第二章三（二）部分的注释。

奉教大员，如御史许之渐、臬台许瓒曾、抚台佟国器均被革职。

“历狱”案至此暂告一段落，而发起此案的杨光先却因之而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第二年，在中国供职、传教四十年的汤若望因病去世，时年七十五岁。

当这件案子在北京闹得厉害的时候，各省督抚也奉旨拘押西洋教士解京审办，并查封堂宇，焚毁经像。有许多地方官同情教士，不忍拘押教士，如江苏、福建、湖广等省对教士都很优待，有的还派兵护送进京。松江知府为会士潘国光（Brancati）设宴饯行，在南京传教的会士刘迪我（Le Farre）也蒙地方官优待。唯有山西、陕西、山东、江西等省教士遭受凌虐。山西金尼阁、陕西李方西（Ferraniis）及山东汪儒望、江西聂伯多（Caneveri）、浙江洪度贞（Augeri）等被锁押，教徒也遭刑罚，有的教士因此而丧命。各省解京神父共计三十人，都先后于五月间到京，其中耶稣会二十五人，多明我会四人，方济各会一人，并有一人病死于途中。诸神父大半皆年龄高迈，发眉皓白，他们在中国有的已历四十余年，此前，他们都没有会面的机会。过了二个月，奉旨除南怀仁等四教士仍留居京师外，其余二十五名传教士，都遣回广东，交该省总督看管，被圈禁在广州城内的老耶稣会堂之内，不准出城，不准传教。这时，各省教务由中国籍教士罗文藻照管，北方诸省有教徒许谦往来联系，教务得以维持。后因地震而迷信是“天主示戒”，竟释放被囚教士，逐之于澳门。

（三）康熙昭雪

康熙帝年事稍大，临朝亲政。两宫皇太后屡屡称许汤若望的为人，及他们所推算历法之善，向为先帝所信任，二十年并无过犯，今遭谗人陷害，深为惋惜。康熙帝知道其间委曲，乃欲考其

真相。

其时，杨光先虽为钦天监监正，但他对于天文学，所知无几。康熙五一—七年的日历，本为汤若望等所造，故无问题。及至康熙八年的历法，便出现了差误。康熙命近侍持此年历法访问留京的四个耶稣会士，经南怀仁等指出，竟错谬多端。康熙帝即于次日召南怀仁等入朝，时礼部尚书布颜与杨光先等钦天监人员皆在。侍臣宣读上谕："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持己见，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务当平心考察，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①并令侍臣把南怀仁对杨光先所造的历法上的错误朗诵一遍。杨无言以对。

次日，又命南怀仁、杨光先同时测量日影。方法是立直木于平地，预测正午日影所至。南怀仁的推算不差分毫。又命南怀仁测验星象，亦悉如南怀仁所预言。而杨光先与钦天监监副吴明烜竟茫然不知所措。诸大臣将试验经过报告皇帝。杨光先知事不妙，即上一奏章说："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杨光先原想用这些耸人听闻的话来打动皇帝，不用西洋历。殊不知康熙早有平反前案之意，故意用上述试验之法，使一般大臣明了其曲直优劣之所在；而且，杨光先的那几句话更激起了皇帝的反感，被斥之为妄言，当即下令革杨光先职。并命南怀仁署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固辞不受，唯愿布衣终身，在监效劳。

当时许多学者曾对杨光先进行批评。如王士祯说：

"杨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师，以劾陈启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历法之弊，遂发大难，逐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汤若望，而夺

① 《圣祖实录》

其位。然光先实于历法毫无所解，所言皆舛谬。如谓戊申岁当闰十二月，寻觉其非，自行检举。时，已颁行来岁历，至下诏停止闰月。光先寻事败，论大辟。光先刻一书，曰《不得已》，自附于亚圣之辟异端，可谓无忌惮矣。”①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杨光先《不得已辑要》一书中有三篇《辟邪论》，都是很有刺激性的文章，是“历狱”及非教运动的思想武器。在钱大昕笔记中，谓“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欲以高价收买《不得已》而焚之”，这是不是事实，现在还不得而知。然而，杨光先的文章确实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引起震撼全国的巨大的反教风潮。杨光先毕竟不谙天文、历算，不懂科学技术，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杨光先丢官失势的同时，那些同恶相济的同党也个个罢职垮台。如苏克萨哈是一个反教最厉害的人，当时曾力主处死汤若望，但他在汤若望死后两年，被他人告发二十四款大罪，被处绞刑，其子侄亦皆弃市。鳌拜、遏必隆二人，也于杨光先失败之后，削职罢免。

康熙知道当时汤若望一案的冤屈，暗暗地叫南怀仁、利类思等三名会士上书诉冤，许以平反。教士等便遵谕上疏：

“臣等同乡远臣汤若望，来自西洋，住京三十八载，在故明时，即奉旨修历。恭奉我朝鼎新，荷蒙重恩，敕修历二十余载，允合天行，颁行无异。不料遭棍徒杨光先倚恃权奸，指为新法舛错，将先帝数十年成法妄行更张，幸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误舛，而新法则无不合，蒙恩命怀仁仍推新历，此已无庸置辩。惟是天主一教，即《诗经》所说：‘皇矣上帝，临下有

① 王士祯：《池北偶谈》，第4卷。

赫’，而为万物之宗主也。在故明万历年间，其著书立言、大要以敬天主，爱畴人为宗旨，总不外克己尽性，忠孝廉节诸大端，往往为名公卿所敬慕。世祖章皇帝数幸堂宇，赐银修造，御制碑文，赐若望嘉名。若系邪教，先帝圣明，岂能如此表彰？乃为光先所诬，火其书，而毁其居，捏造《辟邪论》，蛊惑人心。臣等亦著有《不得已辩》可质。且其并将佟国器、许之渐、许缵曾等诬告，以致为教革职，此臣等抱不平之鸣者一也。又光先诬告若望谋反，臣等远籍西洋，跋涉三年，历程九万里，在中国者不过二十余人，俱生于西而卒于东，有何羽翼，足以谋国？今遭横口诬蔑，将无辜远人栗安当等二十五名，押禁广州府，不容进退。且若望等无抄没之罪，而房屋被人居住，坟地被人侵占。况若望为先帝数十年，勋劳尽忠，罗织拟死，使忠魂含冤，此臣等抱不平之鸣者二也。臣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兔死狐悲，情难容已。今权奸败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时，冒恳天恩，俯鉴覆盆，恩赐昭雪，以表忠魂，生死衔恩。”①

康熙即把此奏折交六部九卿详议。结果是，汤若望、李祖白等的确被诬，应照原品赐恤，并给葬银赐祭；其因奉教而被革职的佟国器等十人俱应恢复原官；宣武门内天主堂房屋应还南怀仁等。杨光先因诬告反坐，情罪重大，应即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王公大臣把此议案呈报皇帝，即批“依议施行”。惟念杨光先年纪已老，姑免死罪，着即驱逐回籍。

杨光先出京，行船至山东德州，背生一恶疽而死。杨光先的失败，实在是咎由自取。阮元说他“不旋踵而败官哉”②，实是确

① 《正教奉褒》康熙八年条；另见《圣祖实录》。

② 阮元：《畴人传》，第36卷。

切的批评。

汤若望平反后，那批关押在广州的二十五名传教士于康熙九年（1670年）获得开释，除少数进京在钦天监工作外，其余人分到各省去公开传教。至此，康熙帝使处于危难的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得以复苏，且有所发展。

三、“礼仪之争”及其实质

正当在华教会得到昭雪顺利进行传教之时，教会内部却因礼仪问题各执一辞，互相争吵，使传教事业受到很大影响。

（一）“礼仪之争”的导因

教仪之争，是由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俗采取宽容态度引起的。溯源其始，则由利玛窦开其端。利玛窦初至中国时，深感开教不易，力求使宣教方式、内容与中国习俗相调和。凡是中国习俗与教仪无大冲突者，均不在禁止之列。艾儒略《大西利亚先生行迹》中说的“利玛窦始入中国，衣饰略仿缁流”，是说他穿的是和尚装，以为这样做可以不受中国人的歧视。利玛窦以后才知道和尚并不为社会所重视，于是又从瞿太素说，改穿儒装，并诵习中国经史，处处迎合中国故有风俗习尚，以便与士大夫接近。

中国社会习尚及伦理观点，把祀天、祭孔、拜祖视为最重要的典礼。如果不这样做，即被视为离经叛道，定遭世人唾弃。但就天主教的教义及仪式而论，若崇拜偶像，即触犯十戒之一，教会绝不容许。当时，利玛窦善为解说，使华人归依其教者，易于接受。如，拜祖一事，本出于亲爱之义，孝敬之思，即所谓报本

反始，慎终追远之意，而并非借以求福保佑；设立祖先牌位，也并非祖先之灵魂在于其上，只不过是子孙借以追远，以纾如在之怀罢了；至于祀天，亦非祀苍苍有形之天，而是敬天地万物之原；拜孔，也是景仰孔子人格、思想的伟大、影响后人之深，并非崇拜幽灵。且依中国的法律与习俗，这些仪节是为中国人所必当奉行的。

（二）“礼仪之争”的焦点

在华各派传教士的所谓“礼仪之争”的焦点有三：

第一，关于“天”或“上帝”名称的争辩。利玛窦在God的翻译上，并不十分固执。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初入中国，对于宗教上应用的名词一时很难决定。God之名，起初译音为德斯（Derrs），因为找不到新的适当的名词、深感困难，所以利玛窦起初用“天主”二字。他后来在中国古书上看到“天”或“上帝”的名称，是中国古圣贤用来指天地的主宰的，于是改变初意，便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了。他后来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说天不过是一种义理；即上帝也不必是独一的天地主宰，于是又将“天主”或“上帝”并用。这便引起了后来的争论，即有一派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的名称。而耶稣会士一派以为三名不妨并用，因为中国古人曾以此解作天地主宰。这个问题辩论得非常激烈。后来基督新教在翻译《圣经》时也曾发生同样的讨论，有主张用“神”字代替“上帝”的，直到现在有些《圣经》封面上，还是注出“神”或“上帝”字样，表明这书里把God译作“神”或“上帝”。

第二，关于祭祖、敬孔的争辩。当时，指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祭祖、敬孔是否有罪？基督教徒是否绝对不能参加？在这种礼节中是否会有宗教的意味？或者传教士虽认为有罪，而基督徒仍可以凭良心去裁断？一派认为，祭祖、敬孔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民众习

惯，一旦完全取销，势必会使传教工作受到莫大的阻力，一般人将会把基督教看成是破坏中国的家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利玛窦对于这个问题曾采用折衷办法，他认为，这不过是中国基督徒一种礼节、表示敬仰与孝思而已，不妨任其奉行。这原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办法。但在当时有的耶稣会士却大加反对，如龙华民等曾经禁止祭祖拜孔，认为这与佛道诸宗的拜偶无异，大有背于天主教的教义。

第三，关于一部分零碎问题的争辩。如民间举行出会迎神活动，基督徒应不应输钱与参加？或者一个基督徒、他的祖宗是非基督徒，是否适用基督教的仪式？或者牧师为妇人施行洗礼、能否免去那些在中国习惯上所认为不甚合适的礼节？这些小问题与上述问题有连带的关系，但是附属的、而不是主要的。所以成为这次论争的中心问题的、还是第一、二两点。

论争之初，范围尚小、且限于教派内部。后来范围日益扩大，而且从两派不同的意见、变为派别间的嫉妒、甚至影响到国际方面，不但在远东的传教士都各自参与两方面的阵线，就连欧洲教会也因此而有激烈的辩论。

（三）多明我派等对耶稣会士的攻讦

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大部分是拥护利玛窦的主张，而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教士大都站在反对的立场。1631年，多明我会士到福建传道，他们看见耶稣会士容忍祭祖、敬孔的事，便联合方济各派，把这问题禀告到马尼拉主教处，总主教又禀告罗马教皇迁尔朋第八，这是1635年的事。结果，一方面由教皇派员调查；另一方面由耶稣会士们向教皇辩诉，到1638年遂由马尼拉总主教撤回其诉状。

溯礼仪之争，实由西班牙多明我派教士马拉来斯(Morales)

开其端，他于1633年至中国后，即开始怀疑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态度，曾多次与会士们辩论。因教廷对此尚未注意，故未引起大的冲突。1637年他被迫离开中国，返回欧洲。1643年他谒见教皇时又提及此问题，并列出十七个问题汇报教廷，以质问在华耶稣会士。其中重要的有：

中国教徒是否应与其他天主教徒同例，每年须举行认罪及圣餐一次？

教士对妇女行洗礼时，可否不用口津及盐，以及免除过量的涂油？

中国信徒如放债时，是否允其征收30%的利息？如系以放债为生、在其归信天主之后，是否允其继续经营此种营业？

应否允许中国信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

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政府所举行的必要祭典？

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祭拜之仪？

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的典礼，及举行其他祀祖的仪式？

在对中国人举行洗礼之先，应否告其天主教的教仪为绝对禁止敬拜偶像及举行其他祭典？

中国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

中国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中，对于皇帝应否可用‘万岁’字样？

对于中国非教徒可否举行弥撒典礼？

自马拉来斯向教廷陈述十七点意见后，教廷曾于1645年9月12日发表了一道禁止的命令。命令中说：此项禁止在未有别项决议前，须暂时遵守。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对于此决议非常惊愕，决定向当局陈述他们的意见，于是在1651年派了代表卫匡国神父到罗马去解释。1654年，卫匡国抵达罗马，把耶稣会一方的陈述送

交“异教徒裁判所”。1656年由新任教皇亚历山大第七作出裁定，准许耶稣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让基督徒自己决定在此范围内的事；对中国那些含有迷信的礼节、丧葬等仪式，只要不妨害中国基督徒们的根本信仰，均可自由参加。这个命令，表面上与1645年的命令冲突，实际上却是一种暂时的性质，并没有绝对肯定的话。此前，多明我会对于第一次命令，本来就不很满意，马拉来斯曾经提出了责问。马拉来斯去世后，该会又有鲍郎高（Palanco）继马拉来斯后向教廷询问是否取消了1645年的法令。等到1699年，教皇格来孟第九答复他一道公文，说两个法令在依照环境情形下都应遵守，这似乎是使耶稣会得了点胜利。

自此之后，多明我会教士与耶稣会士的争论甚烈，而教廷又骑墙其间，久不能决，使问题愈演愈烈。此时，法国外方传教会教士，对耶稣会士的抨击也甚激烈，而尤以教士梅古罗特（Maigrot）为最。梅是广州主教，兼领福建教区监督职务。他于1693年通令通所辖教区的教士，凡耶稣会所宽容的礼仪，均严格禁止，且罢免了两个不执行命令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虽遭此挫折，但由于清圣祖对其传教态度极力袒护，故未动摇其根基。这样，中国教派内部发生的分裂，竟达到不能合作的地步，而在欧洲的教士们对此问题也大起争辩，闹得满城风雨。书函往来频繁，吵嚷纷纷。

罗马教廷总领各地教务，处此局势，身不能进退其间，久悬不决，致使一般教士无所依从。于是，教廷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中没有耶稣会、多明我会人参与其间，以冀有公允的解决。

（四）康熙与教皇对“礼仪之争”的干预

正当两派激烈争论之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张诚、刘英(即刘

应)、洪若望把“祭祖与祀礼是否含有宗教性质”的问题提出来询问康熙皇帝。1700年11月30日康熙正式发布上谕，说中国的祭祖祀孔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是纪念先祖过去的善行，并无宗教性质①。于是反对耶稣会的人便以此为口实，说关于教会的事，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去请求中国皇帝，实在不当。以便挑起教皇对耶稣会的恶感。后经长期的考虑，教廷决定采用梅古罗特之说。1704年，教廷派遣多罗（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东来，并携教廷禁约。此禁约有汉文译本，兹录于后，以见当时教士对中国传统思想、风俗的看法：

“教王第十一格来孟(Clement Ⅺ)得传为永远世世悉知之事：自从我为教主第一日以至今，我料理诸事虽多，至于众西洋人在中国互相争论，此系我第一件要紧事。在中国众西洋人，因看见中国有几个字，还有几件礼，也有说此有异端之事，也有说此无异端之事，因此争论寄信予我，彼此相告，要我自己决断。我所定夺，叫他们众西洋人一心一意。此一件事，从先前在位教王第十二殷诺深爵料理起首，因他亡故，此事到我跟前，我将两旁所告言辞细细详审后，于天主降生1704年11月20日俱已定夺，开写于后：

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之主。如‘敬天’二字之扁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

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先之大礼，凡入教之人，

① 《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八年条。

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子庙行礼。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再，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

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文指爵位上边说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以上我虽如此定夺，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也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由教王之使臣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俱决断不许行。”①

从教廷禁约中可以看出，当时多明我会及外方传教会诸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实属肤浅。中国的言‘天’、‘上帝’，其含意根本不是指基督教的耶和华，实指有意志的对象而言。中国

①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古籍对此记载得清清楚楚。这些教士却斤斤于名词之争辩，必以‘天主’二字才可代表其崇奉的真神，而斥‘天’与‘上帝’等字为绝对不可用，甚至‘敬天’二字亦不得书之于扁额、悬之于会堂；对拜孔、祀祖典礼，也根本未得真蒂，一概以拜偶像视之。由此可知，耶稣会士的卓越见解比其他会派教士高出一筹。

教廷唯恐实行这个公文后，会发生不良影响，于是决定派一个特别代表来调停东方的争端。因为当时在印度马拉巴（Malaber）也有同样的事件发生。这个代表的任务是，不但要使传教士和本地教徒满意，而且要设法使中国能谅解教皇的法令。最后由铎罗(多罗)主教带着这道禁令到中国来。他先到印度去解决马拉巴的争执，因遭到葡萄牙主教与耶稣会士的反对，只好离开。1705年4月，他到了广州，12月4日到了北京。耶稣会里的葡萄牙教士对于他的委任起了恶感。因为那些传教士费了一生的精力在中国传教，建造起许多房子，现在却被一个年轻的、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来管辖，当然不能服从。康熙起初对他优礼相待，后来发现这位年青代表与自己的观念完全对立，便大为不悦。1706年，康熙下逐客令，命其速离京师。多罗不得已离开北京，到达南京。

此后，由于多明我会、外方传教会一再干预和攻讦耶稣会的中国教区之事，康熙更加愤怒，便连续多次发出上谕，除保护那些为帝国做出贡献并领有允许在华传教印票者外，余者一律驱逐出境。可见，欧洲天主教各派的“礼仪之争”是导致康熙末年及雍、乾、嘉三朝严行禁教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四、康熙政策的变化

（一）康熙开始禁教的原因及措施

1706年铎罗主教被康熙驱出北京以后，便在南京宣布了教皇的命令，并加上自己的解释，谴责那些违背天主教义的异端称呼和非法仪礼，并威吓说，凡违反禁令的人，必须赶出教会。这显然是与中国皇帝作对，更引起康熙的愤怒。康熙一面下令把多罗送到澳门看管起来，一面于同年12月发布上谕：凡传教士没有领得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并且不服从中国礼仪的人，不准在中国传教，一律返回欧洲。

康熙被激怒的原因，除了他内心的、天朝的尊严受到西方教士的侮辱外，更主要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基础受到基督教义的严重挑战，他不得不重提禁教之事。

就实际情况讲，中国没有纯粹的宗教思想，更没有入主出奴的成见，只要符合民族的风格、习尚、信仰绝对自由；王朝的更迭，也不是靠宗教力量来取得，“神”对于祭天祀孔的中国士庶，并不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只不过是作为统治人民的一种威慑力量，即使是统治阶级，亦不强迫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对外来宗教也是兼容并蓄；宗教间的磨擦与斗争还没有发展成为社会危机，对王朝统治没有构成巨大威胁。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宗教思想，即对“天”的崇拜与信仰。绝大多数人的心理，莫不承认“天”是至高无上的精神主宰，是一切伦理道德产生的根源。而“天”的代表却只有皇帝一人，是“天”之子，真龙天子，行使“天”的权力，违背这一观念就违背“天意”，

是要受到“天”的惩罚的。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既决定了统治者对宗教的容纳、排斥和取舍，也决定了百姓对宗教的选择、创造和信仰，两者都在争夺代“天”发言的权力。

处在王朝兴盛之际的康熙皇帝，自然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敢与西方的上帝相抗衡；如果退让，爱新觉罗氏赖以统治的思想基础就会彻底动摇。因此，康熙采取了部分禁教的措施，驱逐傲慢非理的教士。对此，教皇也无可奈何。然，康熙皇帝并不操之过急，以致生变，故于铎罗抵南京后，即遣教士白晋、沙国安至罗马谒见教皇，求一折衷调和的方法，以期多罗在南京的宣言及1704年教廷的法令有所变更。

但是，中国朝廷的谦让和容忍，却遭到罗马教廷的拒绝。教皇格来孟十一世，不仅重申南京宣言与1704年的法令具有同样的效力，还颁布了一道正式谕令：凡教士都必须宣誓恪遵禁令，绝对服从，否则将受到逐出教会的严惩；同时，谕令对于一切纯属于政治范畴而不含迷信的礼节，允许容纳；若再有新礼节产生而又不能决定其是否属于迷信者，必须经教皇批准后方能实行。

前一篇重新申明传到中国后，方济各会教士把这篇申明公布在北京的教堂里，耶稣会士因此感到极大的不安。对于后一道严厉的谕令，教士们都不敢把它公布出来。等到主教在教堂里宣读以后，康熙即派人把主教捉拿收监，以此来为耶稣会士撑腰，故利玛窦一派的门徒，仍然继续在朝廷供职，在地方也能和中国官员融洽相处。

此时，康熙虽有反洋教之意，然无反洋教之决心。因而各级官吏对禁教之令并不严格执行，是以西洋教士仍能潜藏内地，私行传教，朝廷亦未深究。此情可见1706年上谕：

> “前日曾有上谕，多罗好了，陛见之际再谕。今闻多罗言：‘我未必等得皇上回来’话。朕甚怜悯，所以将欲下之旨晓谕。朕所欲发旨意者，近日自西洋所来

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杂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得教化王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先明白晓谕，命后来之人谨守法度，不能稍违方好。以后凡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之人，许他们内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们居住。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况且多事。更有做生意站买卖的人，益不可留住。凡各国各会，皆以敬天主者，何得论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则永无争竞矣，为此晓谕。”①

康熙为了使所有各派传教士都能像耶稣会士一样，只要热衷于科学事业、恪守天朝法度，就可以“一概同居同住”，并规劝他们和好，以平息“教仪之争”。为此，又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三月十七日颁发谕令：

“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叫你们回西洋，朕不叫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叫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中国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教化王若说你们有罪，必定叫你们回去，朕带信与他说，徐日升等在中国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叫他们回去，朕断不肯将他们活打发回去，将西洋人等头割回去。朕如此带信去，尔教化王万一再说尔等得恶天主，杀了罢，朕就将中国所有西洋人等都查

①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二)。

出来，尽行将头带与西洋去。设是如此，你们的教化王也就成了个教化王了。”①

康熙对于“教仪之争”的处理方法是，只准遵守利玛窦时的规矩，尊重中国人的习尚，不准干予天朝的法令，违者驱逐、监禁。这对耶稣会士无疑是一巨大支持，并表示康熙对他们的信赖。

但是，保守和顽固的罗马教廷，对中国皇帝的谕令毫不退让，无视中国皇帝的一再告诫，仍坚持“申明”和“谕令”的观点，并指使方济各等派传教士抗拒清廷法令，排挤耶稣会士，加强在南方诸省的传教活动，把“礼仪之争”的弦绷得更紧，从而使矛盾愈来愈尖锐。这样就促使本来就欲排斥基督教的地方官员，都站到教会的对立面，纷纷上疏弹劾。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奏称：

> “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查康熙八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直隶各省立堂入教，著严行晓谕禁止。但年久法驰，应会八旗直隶各省，并奉天等处再行严禁。”②

当然，陈昂奏章中“招集匪类”之词，言之失实，但“居心叵测”却迎合了康熙对罗马教廷的憎恨心理。翌年，两广总督杨琳复具疏奏请朝廷，再申陈昂所论各节，请常严行禁止西洋教士在清廷辖境内传教。清廷据此复申前旨，禁止百姓自由入教，未领有印票的西洋教士，均被迫返回澳门。清朝前期的反洋教斗争便

---

①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二)。

② 《东华录》，康熙五十五年条。

自此开始。

但是，康熙晚年时仍重视耶稣会士传播西方科技之功，因此教禁仍不甚严格。1719年他在给教士利国安的谕旨中说：

> “……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以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的人留用外，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①

第二年，康熙在给西方教士苏霖等人的谕旨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并且对耶稣会士的工作予以肯定，以解除他们的疑虑。谕旨云：

> “……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國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也无关涉。”②

康熙如此重视西方科技，并对传播西方科技的耶稣会士如此赞赏，堪称是一位封建社会的开明帝王。同时，康熙本人也研究现代科学，他撰写格致、地震等方面的文章，这无疑是与他自幼至老接受耶稣会士科技知识的影响分不开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接受西方文化的方针，且又不准西方教士违天朝法度，干预朝政；并对利玛窦耶稣会士一派与忠实执行罗马教皇的其他教派有所区别，而不是一概排斥，去留随意，留此“优容”，这也是他不能厉行禁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

①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②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二）教皇公文激怒康熙严行禁教

正当康熙帝举棋不定、余怒未息之际，罗马教皇的特派主教满柴巴尔巴(Mezzabarba)于1720年12月抵达北京，带来了教皇的公文。这个公文语调十分强硬，提出要纯洁基督教的礼仪，维护基督教的教义，清洗耶稣会士的异端邪说。这当然更把康熙激怒了。他在教皇的公文上批道："欧洲人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礼节。"并连发两个上谕，警告除了耶稣会士之外的其他教派教士。谕旨曰：

"……因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即Maigrot梅古罗特）的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那么，他如何轻论中国礼仪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据尔众西洋人修道，起意原以为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苦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稚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倘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与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论，此至圣先师之所以应尊敬也。尔西洋亦有圣人，因其行为可法，所以敬重。多罗、阎当等知识扁

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①

康熙在批驳西方传教士反对中国礼仪、敬天、祭孔之后，便把禁教的行动贯彻下去，同意陈昂奏请将天主堂改为“公庙”，教士尽行驱逐出境，不准在中国境内传教等主张。耶稣会士苏霖、巴多明、穆敬远等急忙赴朝启奏，要求保护。康熙说：

“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票的西洋人，与有票的人无关，若地方官一概禁止，即将朕给的票交看，就是传教的凭证。你们放心去，若禁止有票的人，再来启奏。”②

其后，教士嘉乐东来，又出示教廷禁约，内容如前教皇谕令。这就引起康熙更大的震怒，他在禁约上批示云：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信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懂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之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③

从此谕批中可以看出，由于“礼仪之争”，导致了康熙后期的反教之意。从此，未领有朝廷印票的传教士纷纷被驱逐出境，教堂、教产被剥夺，一些教士弃教从商，潜伏内地；即使领有印票的耶稣会士，亦不像从前那样受到器重。在各省传教的耶稣会士，行动受到监视，发展教徒的工作受到阻挠。中国人也不敢违抗朝廷的旨意，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由地出入教堂，崇信天主。康熙病逝，雍正登基，严厉禁教的倪端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

①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十一。

② 《正教奉褒》。

③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十四。

第四章　雍、乾、嘉三朝教禁

（1723年——1820年）

一、雍正严行禁教与罗马教廷遣使来华

雍正继位后，严格执行了康熙的禁教命令。雍正二年（1724年）初，将教士遣送澳门或广州天主堂安插，不许他们潜入内地；同时，严行禁止中国人入教。雍正对在京供职的耶稣会士们解释了他禁教的理由：

> “……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①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胤禛的耽心是不无道理的。

（一）疆臣斥教奏疏与雍正严厉禁教

雍正采取禁教的手段，是从闽浙总督满保等人奏疏开始的。满保奏云：

---

①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55—256页。

“雍正元年十二月壬戌。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饬禁。

得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总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①

雍正二年十二月庚寅（1725年2月3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复申前议，云：

“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后送到广东省，若尽送往澳门安插，滨海地窄难容，亦无便舟，令其归国。广州省城为洋舶聚泊之所，应将各省送到的西洋人，尽其暂住省城之天主堂。其年壮愿回者，令其陆续附舟归国，年终造册报部；年老有疾不愿回西洋者，听其居住省城天主堂，不准各处行走，行教诵经。其各府之天主堂俱改为公所。素日误入其教者，俱令改易。应如所请。”②

雍正《硃批谕旨》亦载其疏，并有礼部议覆内容，云：

“钦此，查各省居住西洋人，先经闽浙督臣满保题准，有通晓技艺愿赴京效力者送京，此外一概送澳门安插。嗣经西洋人戴进贤等奏恳宽免逐回澳门，发臣等查议。臣思西洋人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于吏治民生，原无大害，然历法算法各技艺，民间俱无所用，别为一教，原非中国圣人之道，愚民轻信误听，究非长远之

① 《世宗实录》，卷14。

② 《世宗实录》，卷27。

计。经臣议将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暂令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出外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遇有各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回。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为公所，不许潜往居住，业会同将军抚提诸臣具题。……”

世宗对此奏疏有个批谕，也附该奏疏之后，云：

“朕于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尔其详加酌量，若果无害，则异域远人，自应一切从宽。尔或不达朕意，绳之过严，则又不是矣。特谕。”

世宗对于西洋教士，虽非深恶痛绝，但各省官吏得此禁教之令，则行之甚严，于全国范围掀起仇教的浪潮。如，浙江总督李卫奏将杭州天主教堂改为天后宫；福建巡抚刘世明请禁人民习天主教；两广总督把居留广州的教士逐至澳门，广州教堂被毁。各处教堂有的被改为公廨或书院，或庙宇；南京教堂住宅均变为积谷仓；上海天主堂改为关帝庙。不数年间，全国教堂尽被废毁。传教士五十多人悉遭驱逐，唯在京教士二十余人，以服务钦天监之故，得安然居留。所以，西方史书及教会资料都称，天主教在中国所遭遇的困难，以在雍正时为最甚。

（二）雍正为什么要严行禁教

雍正皇帝之所以严厉禁教，系有两件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是罗马教廷派教皇使臣麦德乐来华谒见皇帝；二是雍正登基前的皇位之争牵扯到耶稣会士。

正值雍正开始禁教时，罗马教廷派麦德乐来华谒见，呈上罗马教皇的信。雍正见后大悦，于雍正三年冬十月癸酉（1725年11月13日）发布上谕，谕曰：

“谕西洋教化王伯纳地哆：览王奏并进方物，具见悃诚。我圣祖仁皇帝怙冒万方，无远弗届，龙驭升遐，中外臣民悲思永慕。朕缵承大统，勉思绍述前徽。教化王地处极远，特遣使臣贲章陈奏，感先帝之匪恩，祝朕躬之衍庆，周详恳至，词意虔恭。披阅之余，朕心嘉慰。使臣远来，朕已加体优待。至于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时时教以谨饬安静，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因使臣归国，特颁斯敕，并赐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其王领受，悉朕惓惓之意。”①

雍正对于麦德乐要求允许教士在华传教并释放康熙皇帝政策偏移时所禁锢于广东的耶稣会士德里格等，除开教一节尚处犹豫没有答复外，于翌年六月丙寅（1726年7月4日）发布上谕，释放传教士。谕旨全文如下：

“西洋意达里亚国教化王伯纳地哆，奏请援释放德里格之例，将广东监禁之毕天祥、计有纲一体施恩释放。敕谕曰：德里格于康熙五十九年因传信不实，又妄行陈奏。我圣祖仁皇帝，念系海外之人，从宽禁锢。及朕即位后，颁降恩诏，凡情罪可原者，悉与赦免，开以自新。德里格所犯与赦款相符，故得省释。彼时，广东大吏未曾以毕天祥、计有纲之案入大赦册内，具体上闻。今据王奏请，朕查二人所犯，非在不宥之条，即王不行陈奏，朕亦必察出施恩。今特降旨与广东大吏，将毕天祥、计有纲释放，以示朕中外一体，宽大矜全之至意。”②

接着，降旨宣欧洲教士于1727年1月26日进宫。参加谒见的教

① 《世宗实录》，卷37。

② 《世宗实录》，卷45。

士们在回忆中说："皇帝要在大殿里同我们一起进餐"，"这对受宣者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异乎寻常的荣誉。"受宣者之一的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即安托万·戈比，Antoine Gaubil)给在欧洲的盖雅尔神父写信，记述了受召见的情景，他写道：

皇帝一开始便说，他尚未款待我们，他想在年内招待我们一次，并说他一定御驾亲临。我们磕头向他致谢，感谢他给我们如此之大荣誉。随即，排开十桌宴席，每桌坐两人，皇上自己独坐一桌。宴会很豪华。皇帝多次向我们劝酒，并同我们干了一次杯，这在中国是极其特殊的荣誉。这位君主十分赞赏意大利画家、耶稣会士郎世宁修士。他只让巴多明给他讲讲瑞典和俄罗斯之间过去发生的战争，询问了我们和俄国人之间在宗教上的差异，并告诉我们说有人指责我们不敬重祖先。

巴多明神父十分精辟地向他解释了天主教关系孝敬父母等等的学说。

……

陛下还想了解行星联球的情况，并就他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他还告诉我们，葡萄牙使臣麦德乐先生已经离开广州往朝廷进发。随后他命人赠给我们每人两个钱袋，两张豹皮，又当着我们的面，下令送给耶稣会士的三个教堂三张摆满水果的桌子。我们磕头谢恩后便告退了。到了外面，有人还以皇帝的名义，给我们送了桔子及其它各种水果。

……皇帝曾通过他的十三御弟向我们表示过：如果我们把皇上对我们以礼相招之事在欧洲见于文字，那他是很高兴的，因为这位君主如此盛情地款待我们之[illegible]正值俄罗斯使臣在朝之际，皇帝知道萨瓦先生是欧洲人，他担心这位贵人回到俄国后，只讲欧洲人在中国受

到虐待，尽管他们为清帝国做了很多事情。……

他还希望，他请我们赴宴正是他高兴地接待一位欧洲国王的使臣的明显例证。皇帝对巴多明神父在翻译各种公文时的严谨态度很满意。巴神父翻译了俄罗斯人提交的各项拉丁文公文。皇帝还对巴多明向十三御弟怡贤亲王允祥所做的关于与女沙皇的使者交涉情况的准确汇报表示满意。……我们本来很希望皇帝能归还我们几所被查封的教堂，而不是请我们吃一顿饭，但现在看来为时尚早。……”①

恰在这时，胤禛之弟、康熙的第八子允禩曾于康熙末年谋立之事发，牵扯到耶稣会士一人及皇室中的叔伯兄弟、奉教的苏努及其家族。于是雍正勃然大怒，一面下令迫害苏努一家，一面下令严厉禁教，并迁怒于教廷使臣麦德乐的到来。1727年7月21日，雍正在圆明园召见苏霖、马盖朗（P·Magaillens）、费隐、戴进贤、雷孝恩、巴多明、宋君荣、沃尔方和雷纳尔迪等耶稣会士。宋君荣信中说：“赐余之后，便当着我们的面把天主教之骂了一通，并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相提并论。”②对于雍正帝大怒之后的一段重要讲话和表态，安托万·戈比(即宗君荣)有信记载云：

“……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倘有别的使臣再来，尔等应事先告知他们，要他们注意，不要象麦德乐那样讲话。当麦德乐清楚了朕之理由后，他也会赞同朕的这些道理的。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麦德乐提出的那些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 因为这些要求没

①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

② 同上注：《宋君荣神父致耶稣会尊敬的盖雅尔神父书信节录》，第21号信件》。

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驱逐出境了。麦德乐向朕提出要发执照，好让朕知道尔等皆是好人，朕不想那样做。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任用西藏喇嘛，这两位君主因此受到了中国人的憎恶。先皇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洲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象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喇嘛教最接近尔等的教，而儒教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它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尔等称天为主，其实这是一回事。在回民居住的最小村庄里，都有一个敬天的‘爸爸’，他们也说他们的教义是最好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人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

吗？如同尔教一样，佛也是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难道我们满洲人在我们的祭祀中所竖立的杆子不如尔等的十字架荒唐吗？（原文如此——译者）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都很少有人理解他们那一套意义，就象尔等当中很少有人理解尔等的教义一样。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进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①

此次召见的谕旨下达后，全国便掀起排教的高潮。其经过情况，散见于各种史料。从山东布政使费金吾奏疏山东禁教之事，即可窥一斑。其疏云：

“……兹查得历城县原有西洋人南怀德等，已于雍正二年班京，所遗天主堂二所，一改为育婴堂，一改为义学讫。此外，所有房产，因部文未经指明，所以尚有房屋八间，坟地七亩，不敢一并改为公用，以致西洋人仍暗中托人每年潜收租息。又查得临清州，原有西洋人康和子，于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进京，现住京城西直门仁桥天主堂内，所遗天主堂已改为公所，但尚有房屋三十七间，并地四顷九十二亩，亦系西洋人暗中托人每年潜收租息……”②

（三）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碑记》

杭州东北原有一座天主堂，雍正八年时曾被官府改为天后

① 《宋君荣神父致耶稣会尊敬的盖雅尔神父书信节录》，42号信件。

② 《朱批谕旨》，雍正七年条。

宫，并由兵部尚书李卫做了一篇议论文章，把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天主教如何骗人等都说得极为剀切明白。碑文载：

“古昔圣人之言天者，理与数二者而已。大极生两仪，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此言理也。日月星辰，缠度次舍，此言数也。至于苍苍者，则积气为之，地之上即天，一言尽之矣。易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天之功用如此其盛，非谓天之□复有施行此云雨者。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言天无视听，就群黎百姓而寄此善恶是非之理，非谓天之上真有具耳目之质而司此视听者。虽齐东之野人，邹衍蒙庄之怪诞不经，亦未有指天所生之人以为踞乎天之上，操之纵之于清虚广漠之中，使天亦退处于无权而之主者。

自明季万历年间，大西洋利玛窦入中国，造为天主之名，而其教遁蔓延于愚夫愚妇之口，其徒之入中国者，遂大兴土木营建居室于通都大国之中。我朝定鼎以来，圣祖仁皇帝念其人生长海外，远来就化，虽为说不经，然皆具心思知识，未必不可教道。居之京师，使沐浴圣朝德化之盛，久而幡然改悟，归以教其国中之人，咸知天经地义之正，此乾坤覆载之深恩，不遗一物一义也。岂知荒诞狂悖之见，固结而不可解。我皇上御极之初，洞烛其奸，黜其人，皆归南澳，不得盘居内地，而直省之所为天主堂者，将以次而改矣。顾其制皆崇隆巍焕，非编户之所可能，空之又日就倾圮。去荒诞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苍生之明神，不劳力而功成，不烦费而事集，此余今日改武林天主堂为天后宫之举也。

虽然，自利玛窦之入中国，迄今凡二百年，浸淫沉溺，惑其教者，未必一旦有豁然之悟，即误矣，视如今日二氏之说，虽无当于圣贤道德之旨，不妨存而不论，

以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此其得罪于天，而为害于人心风俗者，卒未大白于天下也。

余既深居而熟悉焉，不申其罪，无以服附和之心，不诛其心，无以破奸诡之胆。

教称天主，是风雨露雷阴阳寒暑，彼皆得而主持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将竟无有寒阴阳暑风雨雷露乎？抑别有主持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此其谬一也。

入其教者，必先将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与毁弃，以示归教之诚，不知天主生于空桑乎，亦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彼纵生于空桑，亦不得降天下之人而尽弃其水源木本之谊。况人之所可敬天奉天者，以天实能生人生物耳。今以生我之祖宗父母而弃绝之，不知尚何取于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奉之？此其谬二也。

弃绝父母祖宗者，欲专其敬于天主也。然闻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生而不绝，则何不尽举而废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尤专且笃，而独父母祖宗，弃若敝屣，此其谬三也。

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务穷思力索，精其艺而后止，设所得止及于半，而年不我与，则举而授之其子，其子即就所受之半而接续以继其思，犹有未达，则复举其所得而授诸其孙，或一传或三四传，其艺始精，则群然推而奉之，以为此可以行教之人矣。今之入中国者，悉此类也，夫一技一能，原无当于生人日用之重，至于奇技淫巧，尤为王法之所不容，今既不知有祖宗父母者，当亦不复以子孙视之，独至奇技淫巧之事，父忽念其为子，而不啻箕裘也之授，子忽念其为父，而不啻堂构之承，此其谬四也。

艺既精矣，遂可出而设教行道矣，夫既祖宗父母之尽弃，其他漠不相识之人，复何关痛痒？而必穷数世之精力以利他人之用？此其谬五也。

然此虽足为人心风俗之害弊，止及于惑其教之人，其罪独小，至于居心之险，则尤有大不可问者。西洋去中国数千万里而遥，非经岁不能达，又有大海风涛之险，去故乡，离妻子，跋涉而来，以人情论，必有所利，而为之携带土物，造成器用，诳中国之金钱，诚不可数计。然吾闻入其教者，必有所资给，人有定数，岁有定额，劳心焦思，取中国之财，仍给之中国地方之人，图利者恐不若是之拙也。

或云，每年红毛船到，必广载其国中之银钱，以济此在中国行教之人。或又云，彼来中国者，皆善黄白之术，以彼国之金，而用之中国，且以此数人之行教，而国中居守之人，皆倾其资以佐之用，所图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教人，而复借黄白之术以收拾人心，则以幻术愚人，以资财给人，其所设心，殆有在矣？

或又为之说曰：彼其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何难去故乡、离妻子，蹈不测之大海，以博后世之名？夫好名之人，诚有舍其身以狥人者，然一人好名，何为而国中之人，允皆好名而倾资以佐之也？且络绎而来，其居天主堂者，所在而有，是何好名者之多也？呜呼！此盖非无所为而为之者！一见其技于噶尔巴矣，再见其技于吕宋矣！又几肆其技于日本矣，为行教计耶？抑不止为行教计耶？

愚夫愚妇未有不以祸福动其心者，今日本海口收港登陆之处，铸铜为天主跪像，抵其国者，不蹈天主像，则罪至不赦。既为天之主，而受海外一小国如此蹂践毁

蔑，卒亦无可如何？其不能祸福人，明亦！所精者仪器，璿玑玉衡，见之唐虞矣；所重者曰表、指南车，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鸣钟、铜壳滴漏，汉时早有矣；所骇人者机巧，木牛流马，诸葛武侯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有之，至今尤有传流之者。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亦中国之所素有，其为术又不能祸福人，吾不如何为而人之惑其说也？

西洋人之居武林者，圣祖仁皇帝曾有白金二百两之赐，此不过念其远而抚恤之，彼遂建堂于省城之东北隅，颜其俯曰'敕建'，夫曰'敕建'，必奉特旨建造而后可。今以曾受赐金，遂冒窃敕建之名。内外臣工受国家白金之赐者多矣，以之筑室，遂可称为赐第乎？干国宪而冒王章，至矣！尽矣！他复何可胜道耶？诬罔不经者宜去，则有功德人宜祠也；冒窃敕建之名者宜毁，则列在祀典向无专建之庙宇者宜增也。

天后之神，姓氏颠末，见之于书者，虽亦未可尽信，然我朝历圣相传，海外诸国，献琛受朔者，重译而至，鱼盐商贾，出入惊涛骇浪之中，计日而去，刻期而还，如行江河港汊之间，而天后之神，实司其任，神之灵应，呼吸可通，德功之及民，何其盛哉！荒诞不经者去，而崇德报功之典兴。毁其居室之违制者，改为庙貌，彻其像塑之诡秘者，设以庄严。夫而后武林之人，目不见天主之居，耳不闻天主之名，二百年来深沉诡秘之术，将无所施其技。异端邪说，久且渐熄，其有天于风化，岂浅鲜哉！

时雍正八年岁次庚戌九月□日。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卫

题”①。

这个碑记记载了许多关于天主教的史实，以及中国的旧伦理观念。虽然碑文中有不尽符合事实逻辑之处，但不失为二百多年前一篇排除基督教的绝妙檄文，是宗教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献。

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碑文中多次提到武林天主堂，经方豪先生考证，此处的武林，并非是指武术界而言，系指杭州此处天主堂在杭州的武林门②。

二、苏努教案

上述是雍正一朝教禁的大体情况。其中一个大教案，就是皇室贝勒苏努及诸子奉教治罪案。当时法国安托万·戈比会士在给欧洲耶稣会士凯龙神父的第四十三号信件中说，此案是“对信奉天主教亲王的迫害”，他说：“1726年12月末，我们从山西省来的天主教徒那里获悉，那里掀起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迫害在右卫的信奉天主教亲王的事件。”

（一）苏努家世

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与雍正帝是从昆弟行。努尔哈赤第一子叫褚英，褚英第一子叫杜度，杜度第六子叫杜努文，杜努文一子叫苏努。褚英、杜度皆有战功，封贝勒，清史有传，唯杜努文无战功，故无传。苏努以获罪削籍，亦无传。西方教会史记载苏努父子事，多根据当时简牍，比较可信。

---

① 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碑记》，据传，致碑仍在天后宫处。另《越风》杂志，第廿三、廿四期合刊中也载过此事。

② 方豪：《方豪六十自订稿》（下），第1940页。

苏努虽无专传，然其生平所历，散见于实录及《八旗通志》，尚可得其梗概。王先谦的《东华录》摘抄实录，多有节略：如《圣祖实录》中，康熙十九年四月庚辰，以纂修玉牒告成，赐总裁辅国公都统苏努等银币有差；二十七年二月丁卯，纂修玉牒，命宗人府左宗人镇国公苏努为总裁官；二十九年六月癸酉，兵部遵旨议发八旗满洲蒙古兵，命宗室公都统苏努治领全军。从上记载可知，苏努在康熙年间曾以辅国公镇国公，任都统、宗人府左宗人，及纂修玉牒总裁。《八旗通志·宗人府年表》中载，康熙十二年五月，苏努为左宗人，二十二年八月免，二十四年九月复任，四十七年十一月免，在职三十五年。《八旗大臣年表》说，康熙十八年正月，苏努任镶红旗都统，雍正元年正月免，任职四十四年。《直省大臣年表》说，康熙三十七年四月，苏努为奉天将军，四十七年正月免，在职十年。《圣教史略》却说苏努以正红旗都统兼辽东总督，此系镶红旗都统兼奉天将军之误，因清初并无辽东总督之名。《圣教史略》说苏努获罪时，年七十七，尚为可信。因为据《宗室王公世职表》，杜努文以顺治五年九月卒，苏努至迟生于是年。到雍正二年，苏努正好七十七岁。

（二）清宗室皇位之争与苏努家族获罪

为什么苏努及诸子会因奉教而获罪呢？原来苏努曾帮助允禩谋皇帝位，因而雍正忌恨，此实为获罪的真正原因。当初，康熙立第二子允祁为太子，既废而复立，立而复废者三次。第八子允禩谋继立，苏努助之。康熙既崩，四子胤禛立，是为雍正，而允禩遂不得不以次削除。教士樊国梁的《燕京开教略》说，因苏努诸子奉天主教，遂说苏努有罪。事实不是这样。现将《世宗实录》及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中关于苏努的罪状列出，就清楚了。谕曰：

“雍正二年八月壬辰，谕曰：苏努等怀挟伊祖旧仇，

专意离间宗支，使互有烦言，人人不睦。朕即位以来，弃伊过恶，格外措恩，欲其改过从善。伊等不从，仍钻营构乱，毫不悔改，朕当以国法惩之，岂可容其如此？所谓伊祖旧仇者，褚英曾在太祖时获罪也。”①

三年三月辛亥谕曰：“前朕议处苏努、吴尔占之罪，伊等并非与朕旧有隙怨，只以骨肉之内，彼此倾陷，互为仇敌，一有微隙，群起而攻之，则其人何所容身乎？今我宗室内，互相仇陷之习，皆由苏努所致，降此谕时，苏努已死，诚无所谓嫌隙，不过因忌允禩而并忌之耳。”②

五月癸亥谕曰：“盛京风俗，其属不堪，俱因苏将军八年，俯徇无知小人之心；沽取虚名，私恩小惠，逞其机诈，惟利是图，风俗由是大坏。”③

十月辛巳谕曰：“贝勒满都护、保泰、苏努、七十、马尔齐哈等，同谋结党，众所共知，朕虽屡次训谕，而伊等结党之心，坚如铁石，毫不移易。”④

四年六月甲子谕曰：“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苏努之子勒席恒等，皆继其父志，而奸恶过焉，似此毫无忌惮，父子相承，先后济恶，种类递传，安有止极，实为国家之大患，必贻后日之深忧。”⑤

五年正月壬寅谕曰：“年羹尧之结党，为时尚浅，易于解散，阿其那（即允禩一笔者）、塞思黑、苏努、阿灵阿、鄂伦岱等之党，固结甚深，如胶如漆，牢不可破。”⑥

正月乙巳又谕：“从前奉天将军苏努等，深负皇考委用之恩，于任内之事，漠不经心，内怀狡诈，饰貌沽名，将朝廷法纪，满洲制度，尽行废弃，侵蚀库帑，

---

①②③④⑤⑥ 《世宗实录》，雍正二年条，三年条，四年条，五年条。

亏空仓粮，种种罪恶，不可枚举，著将苏努家产交与嵩祝、唐保住查明，再将伊等所有资财，俱带往盛京，以为兵丁搬移入城之费。”

十二月癸卯又谕：“当日苏努、阿灵阿、鄂伦岱等，同恶相济，结为邪党，凡属在朝臣工，其庸懦无能者，则弃置之；而于聪明才智之人‘或动之以利，或怵之以害，或震慑之以权势，或诱惑之以美名，使其人不得不堕其术中。”

由上可知，苏努及其诸子获罪的真正原因并非因为奉教，但真正下狱戍边治罪时，又将其奉教之事提到首位。当时的耶稣会士目睹的情况，及其与苏努诸子的书信往来，足以证明苏努全家信奉天主教是极其真诚的。故在天主教传教史和教案史上，将此列入一大教案也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对雍正来说，这是翦除异党的一个手段，系数罪并罚而已。正如后人所言：

“苏努父子之被谴，既与奉教无关，则苏努诸子奉教之说，可信乎？曰‘冀为而不可信也，正为其奉教，而又受重罚’。故谓雍正因恶苏努父子而并恶天主教可也，谓雍正因恶天主教而并恶苏努父子，则倒果为因，绝非史实矣。吾考档案，涉及苏努父子罪状者，无虑数十起，其中关涉天主教者仅三通，且惩治允禟、苏努父子案，前落亘五年，直至诸人相继云亡，始言及奉教。而勒什亨、乌尔陈之发遣，本在二人未奉教之先，苏尔金、库尔陈，二人奉教至诚，乃独不在奸恶不可留者八人之内，其非因奉教而恨苏努父子更显然矣。”①

对于苏努父子奉教之虔诚，雍正上谕曾进行谴责。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初八日，罗马教廷使臣麦德乐来华时，雍正发上谕

① 《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

曰：

“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努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①

这是雍正帝在苏努案中第一次涉及谴责其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官方文书。此后，四月十九日五大臣等议奏：

“苏努之子乌尔陈等，与阿其那结党乱政，复私入西洋邪教，请将乌尔陈等凌迟处死。奉谕：‘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不遵满洲正道，崇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悔改，屡次遣五大臣等降旨，分晰开导，乃伊等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悔改，如此昏庸无知，其心固已先死，何必加以诛戮？乌尔陈等非鄂伦岱、阿尔松阿、阿其那、塞思黑等，力能摇动政事，断不可姑容于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与否，并无关系。今五大臣等因苏努父子从前所行大逆不道，请将乌尔陈等即行正法，所奏虽是，但朕从前已将伊等之罪暂行宽宥，今复将伊等正法，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为伊等因入西洋之教被戮，转使伊等名闻于西洋。著将乌尔陈等交与步军统领阿齐图择一地方，牢固锁禁，俾得用力穷究西洋道理，伊等如知西洋敬天之教，自然在朕前奏请改过也。”②

七月二十五日，刑部等衙门又奏：

“苏努将圣祖仁皇帝朱批谕旨，狂书涂抹，悖逆已极，应将伊子孙照叛逆例治罪。奉谕：‘朕从前在藩邸时，与苏努并无丝毫嫌怨，只因苏努为人阴险奸邪，

① 《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

② 《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

引诱宗亲，要结匪类，欲以扰乱政事，煽惑人心，其害实有关于宗社，诚为元恶渠魁。朕即位后，冀其改过自新，封为贝勒，而伊并不感恩悔过，仍复怙恶不悛。又见朕防范严密，不得遂其结党之私，复教导诸子，肆行不法，甚至苏尔金、库尔陈、乌尔陈，信从西洋外国之教，经朕屡次降旨，谕令悛改，伊竟公然抗违，奏称愿甘正法，不肯改易。似此忘本背君，藐视国法，丧心蔑理，闻者莫不骇异。今查出昔年圣祖仁皇帝朱批奏摺，苏努竟于御笔中间狂书涂抹，见者无不心寒发指，是其背叛之心，显然昭著，罪实同于大逆。本应将伊子孙照法司所议，俱行正法，但伊子孙多至四十人，悉行正法，朕心有所不忍，倘分别存留，于法又觉未协，今从宽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著将苏努父子前后所犯罪案，及朕所降谕者，遍行晓谕伊之子孙等，若嗣后伊等安静守法，再不过犯，则开恩全其性命；倘诸人中有一人犯法者，不论情罪之轻重，定照此本所议，将伊即行正法。”①

当时的耶稣会士及后来的传教士樊国梁的《燕京开教略》等书，因不了解苏努诸子获罪的政治原因，因而大书特书他们因信奉天主教的真诚而获罪，诚与史实不全相符。但是，苏努子孙诚心归依天主教，至死不背教的记载，仍有多处。雍正四年末，安托万·戈比等教士收到监禁在北京的苏努第十二子乌尔陈（洗名若瑟）用中文写给教士们的信。信中开头说：

“刚才他们借口检查我们的仆人，在这里搜查了我们天主教徒。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726年12月8日)，各牛录派人来劝我们放弃信奉天主教义。我们答复说，

① 《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见《陈垣学术论文集》。

我们的教义是真正的教义，因此不能放弃。一个头领叫我们口头上放弃，我们说，即使是口头放权也是违背我们的教义的，因此不能从命。……到了晚上，我们的全部仆人都被召到卫队那里，盘问他们是不是天主教徒。全体天主教徒都很坚强，一致承认是天主教徒。有两个人本来还不是天主教徒，却也说是。他们两人遂在第二天晚上接受了洗礼，一个取教名为若翰达尼老，另一个为方济各①。殉教的愿望促使另外十个仆人也要求领洗，因此他们也受到了洗礼。……”②

另外，安托万·戈比还转录了1727年5月3日雍正皇帝为苏努子乌尔陈之奉教罪发布的上谕，文曰：

“乌尔陈之父乃塞思黑、阿其那③之党羽。今伊与其父同出一辙。弃我国之礼教，从欧人之伪律。乌尔陈曰：‘若皇上循天主之戒律，赐我一死，我死，皇上亦将负杀我之恶名，可吾乃天主教徒也。’今朕以其父之罪杀之，此则一新罪也！”⑤

1727年9月6日，刑部向雍正皇帝奏，请除奉天主教的苏努全家，“儿、孙和曾孙三十九人，全部斩首，他们的嫔妃判处做王宫里最低下的奴隶”⑤。为此，安托万·戈比在给凯龙神父的信中骄傲地写道：

“我尊敬的神父，能够置身于这个境况里，我感到

---

① 此为仆人方济各的教名。本处及其他有关史书所提之方济各、库方济各，均指方济各“亲王”。

②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第149页。

③ 塞思黑即允禟，阿其那即允禩，皆雍正弟。

④ 《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第43号信件。

⑤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第166页。

非常的荣幸。天主在欧洲是会看到我们受到如此不公正控告的，尊敬的神父们是无辜的。二十多年来，苏霖、尤其是巴多明神父，首先为改宗，而后为教育苏努的王子们工作着。他们获得了成功，教义在这个著名的家族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他很多法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都支持这两位神父的事业，而且天主也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的努力取得了的成绩。顺致崇高的敬意！

1727年10月4日北京”①

据《燕京开教略》载：乌尔陈、若瑟于1727年的圣母升天瞻礼前一日死，是为阳历8月14日，即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此说系取自于传教士巴函选译的《圣心报》332号。该报载：苏努有子十三人，二人前卒，获罪时存者十一人，今考十一人中知名者九人，官书举本名，教会史举圣名，细为勘合，尚可得其次第年岁及受洗先后，并知其前卒者为第五、第八子。谕旨中复有库章阿一人，当为苏努之孙，即沙勿略之子。一并附于下表：

① 《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第43号信件。

附：苏努诸子表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本名			苏尔金	赫世亨	勒什亨	鲁尔金		福尔陈	书尔陈	库尔陈	乌尔陈	木尔陈
圣名	沙勿略		若望		类思	伯多禄			保禄	方济各	若瑟	尼老 若翰 达
受洗年	雍二	雍四	康六十		雍元	雍四			康五八	康六十	雍元	雍三
先后禁所	右卫	右卫	右卫 北京	甘州 开封	西宁 北京	右卫 济南		右卫 太原	右卫 南京	右卫 北京	西宁 北京	右卫 苏州
年岁	雍二卒·年五九		雍五卒·近六十		雍五卒·近四九				雍五卒·年三[illegible]		雍五卒·年三三	雍五卒·年二十

这起发生在清宗室内的教案以苏努子孙被杀为最高潮，天主教传行中国再一次受到抑制。但并未因此而绝迹。和其它意识形态一样，宗教的渗透力量是很强的，不管发生多少、多大的教案，不管采取何种严厉的行政手段，颁布多少绝对权威的禁教谕令，都不会把它消灭掉。何况天主教义有不少感人的“赞美诗”，传教士携带的西方文化科技足以先声夺人，还有明清两朝几位皇帝的信赖和褒奖，这些都坚定了布道者与信教者的信心。

三、雍正教禁下的传教活动

（一）天主教暗中扩展教会势力

雍正一朝的教禁，似疾风暴雨，使在康熙末年已经皈依天主教的30万中国奉教人藏身无处，躲难无门。外国教士也尽行驱逐于澳门，或因居于广州教堂。但是，中国的一些士民，仍被圣母玛丽亚所慑服，私相传习。雍正七年的禁令，即因此而发布。湖南巡抚赵弘恩奏疏云：

> “……大学生马尔塞等寄信，奉上谕：‘近闻西洋之人，外省府县中，尚有潜藏居民者，本地无赖之人，相与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渐架益深，甚有关于风俗。钦此’。臣已严饬各属，星夜查报，倘有潜往之人，臣当遵旨委官押送澳门安插……”①。

从上文可知，到1729年（雍正七年）仍有传教活动。至雍正末年，全国各地的教堂仍然到处林立，教徒比比皆是。例如，雍正十年六月，广东巡抚鄂弥达奏称，广州天主堂改为公所后，仍旧存在天主教堂情形②，其中对于教堂所在地及堂主和入教人数，均有详细记述，而且从中可知当时的天主堂已有男女分堂之事，实为一极重要史料。因其文过于繁冗，现列表以便省览：

---

① 《朱批谕旨》，雍正七年条。

②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

雍正十年广东省城天主堂调查表（一）

教堂所在街名	堂　主	副　堂	同　　堂	入教人数
西门外扬仁里东约	西洋人安多尼	西洋人艾色		1400余人
扬仁里南约	戈　宁	顺德人刘若德		1000余人
濠畔街	谢德明		增城人欧歌，山东人，魏若韩	1200余人
芦排巷	方王章	西洋人朱耶芮		1100余人
天马巷	罗铭恩	顺德人刘依纳爵	顺德人梁家湘	1300余人
清水濠	彭觉世卜如善	西洋人张尔仁	江南人王弘义	2000余人
小南门内	闵明我	新会人江四	南海人刘若敬；番禺人郝若瑟；增城人劳赞成区良祐何伯衍。	1400余人
花塔街	华　姓	西洋人卞述芳		300余人

以上为男天主堂八处，入教男子约万人。

雍正十年广东城天主堂调查表（二）

教堂所在地点	堂　　主	入教妇女
清水濠	顺德人谭氏、刘氏	400余人
小南门内	顺德人　　陈氏	300余人
东朗头、盐步两堂	顺路孀妇　梁氏	600余人
西门外变石圣母堂	顺德孀妇　何氏	200余人
大北门天豪街变名圣母堂	正蓝旗人　余氏	300余人
小北门内火药局前	顺德孀妇　苏氏	200余人
河南滘口	南海人唐琼章妻戴，同堂孀妇卢氏、唐氏	300余人

以上为女天主教堂八处，入教女子二千余人。

由上两表观之，在雍正朝严行教禁之下，许多天主堂被改为公廨，而秘密天主堂仍散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区区广州一城即达十五座，教徒已近二万。至于全国教堂及教徒人数，因当时没有全面统计，不知其确数，但按上例推算，也可知其大概情况。

（二）传教不绝的原因

既然清王朝实行严厉教禁，观之为有伤风化，何以天主教在此时没有绝迹于中国呢？推其原因，有两点可供思考：

（1）重西学。康熙、雍正两帝对于教士的态度，均是重其学而不重其教，数十年来，虽多次颁布禁教之令，但精于历算、测量等技艺的教士均留京供职，未返本国。这些留居中国的

教士所持态度，则与之相反，传教是其本志，论学乃其手段，因此他们在京供职是名，实则仍行其教。朝廷因重视西学，对这些教士也深加优容。禁教之令渐行废弛，教士又可秘密传教于中国。清初，天主教未能因教禁而绝迹中国，与教士们传播西学的关系甚大。由此可知，耶稣会士所用的方法，对于传教事业的影响，其重要程度非一般士子可以明察。

（2）教士教民护教的热忱。天主教自明代再传中国，至雍正末年已有一百多年，传教基础奠立已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拔除其根底。教会建立，原本于虔诚的信仰，非同其它事业，可随时代的需要，而任其消长。这种虔诚的信仰，一旦形成，是武力迫胁或政令所不能消灭的。历史上宗教之争，与殉教之例，不胜枚举。当时西欧各国正千方百计地图谋扩展其宗教势力于中国，而一般教士，又多具有宗教热诚，不畏艰苦，把开教中国视为光荣。而中国信徒一旦奉教，矢志不移，解教、离教者只是少数，他们虔诚的态度，一如其领洗人，这种情况亦绝非政治势力所能消除净尽的。而且，当时海禁已开，西欧商船往来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无所禁阻，这也给西方教士一个极好的机会。史籍所载西方教士假通商之名，行开教之实者，其例甚多①。同时，国际间的关系日趋复杂，自然无法禁止外国宗教的流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教士的态度，尚称恭顺，隐忍苦痛，可求达其行教之目的。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固然不曾公然诋毁，甚或继利玛窦之志，研习经史，潜心修订历法；对于中国政治，也不敢稍涉干预之嫌，故不致惹起中国朝廷和士大夫的极大反感；他们对于皇帝及中国官员温驯、谦和，时而博得嘉奖和同情。当时，他们还未带有后来的基督教士们所怀有的基督征服中国的野心。这些是他们能够在雍正严行禁教之下得以生存的基本原因。

---

① 《朱批谕旨》，雍正十一年。

自雍正朝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进行的。而仇教运动，上自朝廷，下至民间，虽然未停止过，但只不过是时紧时弛，未有定局而已。迨至《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欧列强使用武力侵略中国，传教之权载于条约，教士们就威风起来了。他们从此也走向反面，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教案。

四、欧洲教廷事件和乾隆朝的“闭关政策”

雍正在位仅十三年。其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是为乾隆皇帝。弘历登基时，年已二十五岁，阅历颇深。他综合康熙、雍正的宽容和严厉政治而实行“宽猛互济”政策。所以乾隆初年所采取的作法是：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传教活动，抱着置若罔闻的态度。故尔传教活动又暗中活跃于内地。至乾隆十一年，朝廷又重申严行禁教，并以“闭关”手段拒绝西方一切人进入天朝。

（一）罗马教廷取缔耶稣会组织

欧洲在华各教派的“礼仪之争”，此时仍激烈继续着，教士们关于中国人对天主的称呼、祭祀祖宗、崇拜孔孟等问题的争论，不厌其烦，喋喋不休。从而使教士们分成两派，而两派又都固执地坚持着各自的观点。这就迫使罗马教皇本笃十四世于1724年7月11日发布教令，禁止迁就中国的风俗习尚，致使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面临的危机日趋严重。

恰在这时，在华各派教士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争端。即有些基督教徒在父母去世时，把父母的姓名、职衔写在一块白缎上，让

教外人叩拜，在福建有些教士并不加以禁阻。北京主教觉得这违反了1742的教令，便通令各教堂，重申向死人叩拜是有罪的。此命令在各教堂发布的时候，引起了一场骚动，甚至有人大叫说："叩头是不是迷信？"主教选定了这个题目讲道，希望借以安定教友。这样，反而增加了纷扰，因为有些官家或贵族的基督徒，不能容忍这种限制，对教会持对抗的态度，争端又复活了。

耶稣会方面出现的困难，除上述这些情况外，还有他们在欧洲的仇敌变得越来越多，终至耶稣会被迫解散。首先解散的是欧洲当地的耶稣会，随后于1773年波及到中国，而完全解散。在华耶稣教会为了传布天主教的神国，在中国努力传教一百九十年（1583——1773年）。这回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使前后来华的四百七十二个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毁灭。这四百多人中很有几个是著名的学者和工作不惮劳苦的人。因该会解散而产生的种种弊害，他们的后继人，是不可能一一补救的。所以许多教士认为，这种争执，实在是自己毁坏了在华的传教工作，若是没有这次争执，若是不因争执而触怒中国皇帝，十八或十九世界的中国，或者可以变成天主教的国家。康熙对于教士，本来有很好的感情，因与教皇发生意见分歧，就一反从前的态度。本来因为皇帝的倾向，使那些反对教会的人，不敢有什么动作。可是等到皇帝的态度一变，这种反对教会的势力，也就渐渐地活跃起来，形成了一股反教的风潮，这全是由于这次争端招来的恶果。

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只知其一面不知其二。如果没有礼仪之争，中国也不一定会变成天主教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民族特点及其风俗习尚，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某种势力改变的。

（二）乾隆朝禁教与"闭关政策"

造成乾隆朝教士传教困难的另一原因是弘历继续了雍正朝的

教禁政策，尤其是1757年实行“闭关”政策后，教禁愈严。

乾隆朝第一教案发生在十一年五月（1746年7月）。原来在雍正朝禁教时，被押解到澳门的耶稣会教士，又纷纷设法潜回内地传教，例如西班牙耶稣会教士桑（Sanz）被驱逐至澳门后，于乾隆三年（1738年）潜至福建省福安县，与费若用（Aliober）、德（Serrano）、华（Royo）、施（Diaz）等教士在该县府镇传教，被告发押解到省。巡抚周学健遂上奏朝廷请旨，云：

“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据福宁府知府董启祚禀报，该属福安县境内，崇奉天主教者甚多，竟有西洋夷人，在彼传习。当即密遣臣标弁兵，会同该府镇等，严密查拿。据获到夷人费若用、堂主陈廷柱等男妇各犯，并搜出画像、经卷等件，严审办理。得旨：办理甚妥，知道了。董启祚尚能如此留心，亦属可嘉也。其人究如何？”①

起初，皇帝只令将“夷人勒限回国”。由于周学健素恶天主教，遂再上奏摺，要求处死四个教士。其奏折云：

“接奉军机大臣等议覆臣前奏，请严治西洋天主邪教一摺。令臣将现获夷人，勒限回国并分别量拟惩治。然臣观该国夷人，实非守分之徒，有难加以宽典者。查西洋人精心计划，独于行教中国一事，不惜钜费，现讯据白多禄等，并每年雇往澳门取银之民人缪上禹等俱称，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该国钱粮，运交吕宋会长，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教给。又西洋风土，原与中国相似，独行教中国之夷人，去其父子，绝其嗜欲，终身为国王行教，甚至忘身触法，略无悔心。至中国民人，一入其教，信奉终身不改，且有身为生监，而

① 《高宗实录》，卷267。

坚心背道者。又如男女情欲，人不能禁。而归教之处女，终身不嫁。细加查究，亦有幻术诡行。臣前于福安各堂内，搜出番册一本，讯系册报番王之姓名。凡从教之人，已能诵经坚心归教者，即给以番名。每年赴澳门领银时，用番字册报国王，国王按册报人数多少加赏。现在福安从教男妇，计二千六百余人。夫以白多禄等数人行教，而福安一邑，已如此之多，合各省计之，何能悉数？是其行教中国之心，固不可问。至以天朝士民，而册报番王，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尤不可测。臣请将白多禄等按律定拟，明正国典，以绝狡谋。得旨：未免言之过当，然照律定拟，自所应当。”①

不久，四个教士竟先后被周学健处死②。

翌年在苏州也发生了同样事件。多明我会葡人黄安多（Henriquez）与意大利人汉方济（Athemis）二神父，以“洋人散布邪说，煽惑良民”之罪，绞死于苏州。教徒被牵连者甚多，教徒唐德光死于狱中，教士汪斐理出狱即死。

是年，江西鄱阳县教案亦起。传教士李世辅自山、陕宣教后，赴江西传教，途中被捉，此案波及直隶、山西、陕西、京师教徒。因而乾隆谕令将教士所获教民全部押解到江西省城南昌“永远牢固拘禁”。上谕云：

“上年十一月内，有西洋人李世辅，同直隶南宫县民蒋相臣，山西曲沃县民尹德志，路过江西省鄱阳县境，该县盘获讯供，曾在山、陕二省传教，又在京城海淀堂里住过。一面移咨山、陕抚臣确查；一面移咨礼部查明来历，俟审明后递解广东附回本国等语。李世辅游历

① 《高宗实录》，卷297。

②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3章。

山、陕授徒行教，其从前经由之澳门等关口，并未照例奏明，显系多事不法之人。此等奸徒，若押令回国，伊必捏造妄言，肆行传播，转为未便。其蒋相臣、尹德志等，虽随从附和，此外，必尚有党羽，若押遣回籍，又得串通消息，不若将此三人即于江西省城，永远牢固拘禁，则伊等狡狯伎俩，举无所施，不致蔓延生事。可传谕巡抚开泰，将此案审明遵旨办理，具摺奏闻。其移查礼部之处，传谕该部，令将原文发回。”①

自福建、苏州、江西教案发生后，各省皆起而仇教：南京五神父被囚，已定绞罪，后蒙释解澳门；北京出现谣言，说教徒用邪术剪人发辫，被剪后数日即死；影响及于湖北，如湖北谷城县有一百五十多教徒被捕；四川刘神父因而被拘押八年之久；各县皆搜捕教士，虐待教徒。四川冯主教与李、吴、彭三神父，山西西吉主教，陕川高主教，山东四神父，江西二神父，广西一神父，湖广二神父，以及其他教徒、神父，均被押解至京。经审问，将中国神父七人与教徒十一人，刺字于额，充军伊犁；另有教徒三、五十一枷号示众；西洋教士一律从宽开释。

为了防止教士再混入内地，乾隆又发上谕，严查海口，杜绝“奸人”潜入内地，谕曰：

“吕宋为天主教聚集之所，内地民人在彼甚多，商船往来难免无传递信息之事。又本年二月间，吕宋夷船到厦，有携带书信至潼州府龙溪县严登家内者，其严登之子严廉、严谅，现往吕宋未回等语。内地民人潜往外洋，例有严禁。今吕宋为天主教聚集之所，而内地民人，竟因与同教，多潜彼地。现查有严廉、严谅果往吕宋未回，岂向来该地方官，于各海口竟未将民人透越之

① 《高宗实录》，卷288。

弊，严行约束？抑或办理未善，致有疏漏？此等民人，潜在彼地从教，且复书信往来，若非确查严禁，于海疆重地，所关非细。可传谕喀尔吉善等，嗣后务将沿海各口私往吕宋之人，及内地所有吕宋、吧黎往来踪迹，严密访查，通行禁止。并往来番舶，亦宜严饬属员，实力稽察，留心防范，毋致仍前疏忽。其严禀、严谅等，查明之日，即行奏闻。”①

如前所述，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已近两个世纪，若欲彻底根除，不能使用政令。严厉禁教仅能在表面上阻止宣教活动，使教士活动甚为艰难，但却不可能根除。因而秘密传教仍在继续进行。乾隆十七年（1753年），广东又有教士被抓获。据两广总督陈宏谋奏称：

“龙溪等县，拿获民人崇奉西洋邪教，现在严究有无交通外国，并此外传教伙党，一并严拿务获，分别按拟等语。西洋人之崇奉天主教，自是该国习俗，闽广濒海愚民，多有习于其教者，究之尚与邪术煽诱有间，即如京师现有天主堂，亦何能遂惑致众？现在李阙娘、严恐等，既经获报到案，自应照例查办。若必概行查拿，则未免滋事，且于整饬人心风俗之处，亦未见有益，当以不必深究为是，可传谕陈宏谋知之。”②

湖北也有教徒被抓。据该省抚臣奏云：

“巡抚恒文奏，上年襄阳县盘获信从天主教之曹殿邦，写寄万一举番字，经札、药方等物，及现在拿获假昌钦天监差役之唐县民人邸，究出曹应文，代毕珠所写番字书札各情一摺。内称，伊等字迹，臣等既不认

① 《高宗实录》，卷315。

② 《高宗实录》，卷429。

识，而此处亦无认识之人，恐有悖逆不法情弊，即应严加根究，何敢草率完结，现在访查有无伙党，并为匪确情，再行严审。所有西洋番字经札，一并进呈等语。曹应文等写西洋番字，密相札寄，并假充差役，既经拿获，其有无别情，自应讯究。但京师现在亦无认识番字之人，若交与西洋之人在钦天监者，令其译汉，即札中果有不法情弊，伊等恐亦未必写出实情。且伊等在中国已久，尚属安分守法，想无煽诱为匪情事，一经查办，转致惊疑。看来此事，只应在曹应文等究明缘由。可传谕恒文，该犯现在楚省，其所寄番字札中情由，俱可就近讯问，照例办理，在外究结可也。”①

湖北还有外籍教士被逮捕。据鄂容安奏称：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鄂容安等奏，拿获天主教西洋人张若瑟等诱人入教一案。经朕降旨，令该督等就案完结，将张若瑟等，解回澳门安插。旋据鄂容安等奏，西洋人设为幻术，诱人入教，于风俗甚有关系，请将拿获之张若瑟等五名，请行监禁，俾知儆惕等语。已降旨，照拟完结。可传谕询问该督抚等，自张若瑟等犯案之后，现在该省有无此等西洋夷人，潜入内地，煽诱行教之事，如并无此等情事，则张若瑟等，自可仍照前旨从宽解往澳门安插。著该督、抚查明具奏。寻严继善等奏，张若瑟五犯，经前督臣鄂容安奏请监禁，已羁狱一年，现在江省并无此等煽诱行教之事。拟令将张若瑟五犯，解澳门安插管束。报闻。”②

这些情况大都发生在清朝“闭关”（1757年）以前。闭关后，

① 《高宗实录》，卷440。

② 《高宗实录》，卷491。

惟限广州一口通商，商人来华不许登岸，仅在船边售货或暂住广东十三行，有专门看管，西方教士难以进入内地。所以，当时仅有数十个在宫廷任职的教士从事天文、绘画等工作。据雍正《御制圣谕广训》中说："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这是允许少数传教士留在中国的确证。各地宣教的教士已为数不多，全国教徒虽仍有三十万，但却没有多少外国教士主持传教之事。这种情况维持了二十多年。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大量传教士又潜入内地，这种局势才有所改观。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搜捕，这就是1784—1785年的乾隆朝大教案。

五、1784—1785年乾隆朝大教案

雍正皇帝继位后，严格执行了康熙的禁教命令。他于1724年（雍正二年）初将传教士遣送澳门或广州天主堂安插，不许他们潜往内地，同时又严禁中国人入教。此后一百三十余年间，天主教（包括后来的基督新教）被中国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朝野官吏、百姓们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有差别了。前面谈到，雍正对传教士的活动所带来的后患是十分忧虑的，曾对留在京城供职的耶稣会士们解释他禁教的原因时说："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唯尔等之命是从，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尽管雍正实行严厉禁教，却没有使传教活动陷入停顿。这个情况，除上节有所叙述外，其它例子还很多。如雍正七年，曾发现传教士在山东历城县仍占有房屋八间、坟地七亩；临清州有房

三十七间，土地四顷九十二亩，竟有暗中“潜收租息”，①许多教士继续在内地活动，到了乾隆末年，竟然还有几所培养内地中国教士的秘密学校②等等。当然，传教士除了潜伏下来的外，凡是继续由澳门、广州秘密渗入内陆者，“途中恐人知觉，……扮为病人，每晨以茶颊面，使颜色黧黄，每休息旅寓，则以茵褥蒙首，面壁而卧”③。这样，传教士愈是遭到象秘密会社那样的待遇，就愈是被迫象秘密会社一样活动。乾隆在位（1736—1795年）的长时期内，不时发生全国性迫害教士、教徒的事情。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便是1784—1785年对教士、教民的全国性大搜捕。

（一）教案起因

在这次教案发生之前，已经在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已多达数十名。其中仅陕西渭南地区一处，就有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籍传教士呢吗·方济各、王亚各比等十二人④。同时，如西安、四川眉山等地天主堂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活动很频繁，地方官竟“毫无稽察”⑤。鉴于内陆传教的需要，澳门主教区于1784年初先后派出三批传教士潜入内地：先是派十名教士往直隶、山西各省传教，继而派五名潜赴山东省各地，最后在5月间又派四名往湖广、川陕地区。如此看来，在1784年的大教案发生之前，在各地潜行传教的外国教士几遍全国。

1784年5月，澳门主教区派第三批传教士的情况是：“湖广

---

① 《经济研究》月刊，1965年第8期，第50页。

② John K Fairbank：《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iume 10，Chapterll。

③④⑤ 《高宗实录》，卷1218，第18页。

两人，同蔡伯多禄（广州教徒——引者）到哆罗夷馆，延请四个西洋人同往湖广，又邀了乐昌县人谢伯多禄、高要人谢禄茂，一同起身。”①他们几个从广州沿着各地传教点，潜往内地。为了不致被发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个传教点，即由当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个传教点。他们经过湖南湘潭、湖北樊城，当走到襄阳城时就被拿获，并在留他们住宿的教徒刘绘川、刘十七家中查出《圣经》和圣母画像等。湖广大吏特成额立即奏报朝廷。乾隆闻奏大怒，1784—1785年全国性大教案遂起②。

（二）教案经过

事发后，兵弁从呢吗·方济各身上“起出书信一封，系广东罗玛当家（广州教区主教）所发，往陕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③。乾隆异常惊讶，说：

“西洋人面貌异样，无难认识，伊等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员弁何以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④

时值乾隆朝处于闭关时期。乾隆皇帝认为，西洋人此来是为了勾结内地人密谋造反，对抗朝廷，极可能是洋人“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信息”⑤。便谕令全国各地对传教士、教民“迅速严拿，一并解京，归案办理”⑥。

首先破获的是此次接送四个意大利传教士的各地教民。结果，发现此案竟然牵涉广东、福建、湖北、湖南、陕西、四川、

① 《高宗实录》，卷1214，第19—20页。

②③ 《高宗实录》；卷1213，第10页。

④⑤ 《高宗实录》，卷1213，第10页。

⑥ 《高宗实录》卷1215，第2页。

山东、山西、直隶、甘肃等省许多地区的数百名教徒①。

接着，陕省大吏毕沅根据湖北襄阳教徒刘十七的供状，在西安抓捕了教徒焦振纲、焦贵明父子。焦氏父子又供出了陕西渭南县是西北传教中心地，外国教士多名在那里宣教。毕沅根据搜查出的十封外文书信，进行查拿，发现“西安天主堂自饬禁后，旧存房屋……房内供有十字架……请西洋人来陕念经……传教。”②遂将被捕的教士、教民逐一审讯，又发现“尚有西洋人五名”，“往直隶、山东传教”，另有“西洋人十名往……各省传教”③。搜查结果，在渭南一地就抓获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多名，如王亚各比、马诺、呢吗·方济各等。其中呢吗·方济各潜赴陕西省传教已长达二十三年有余。此外，还抓捕教民（包括中国教士）徐宗富、张多明我、苏神父、杜兴智、刘西满、薛成林、曾贵、王天德、刘三等数十人。乾隆发布上谕，在山东、直隶、四川等地进行搜查。

在湖广搜出意大利传教士吧地哩央和教民赵安德等人；在甘肃抓获了教徒张继勋、刘志虞等人；在江西查拿了法国传教士方济觉（即弗兰嘶噶）；在四川盘获了三名西班牙传教士冯若望、李多林、吧地哩呋哂和教民张万钟、张万效等。案情牵涉到直隶、山东。

山东大吏明兴在全省设卡，挨户搜查，“拿获私赴山东省传教之西洋人吧地哩哑，并勾引李松、邵珣等人”，“西洋人雷西洋诺，亦已拿获，其吧地哩哑供出一同勾引西洋人之广东人李刚义、直隶人安哆呢（即安三）及伴送之广东人鄂斯定（即陈某）”④。在直隶的涿州、藁城及顺天府各地均有教徒被抓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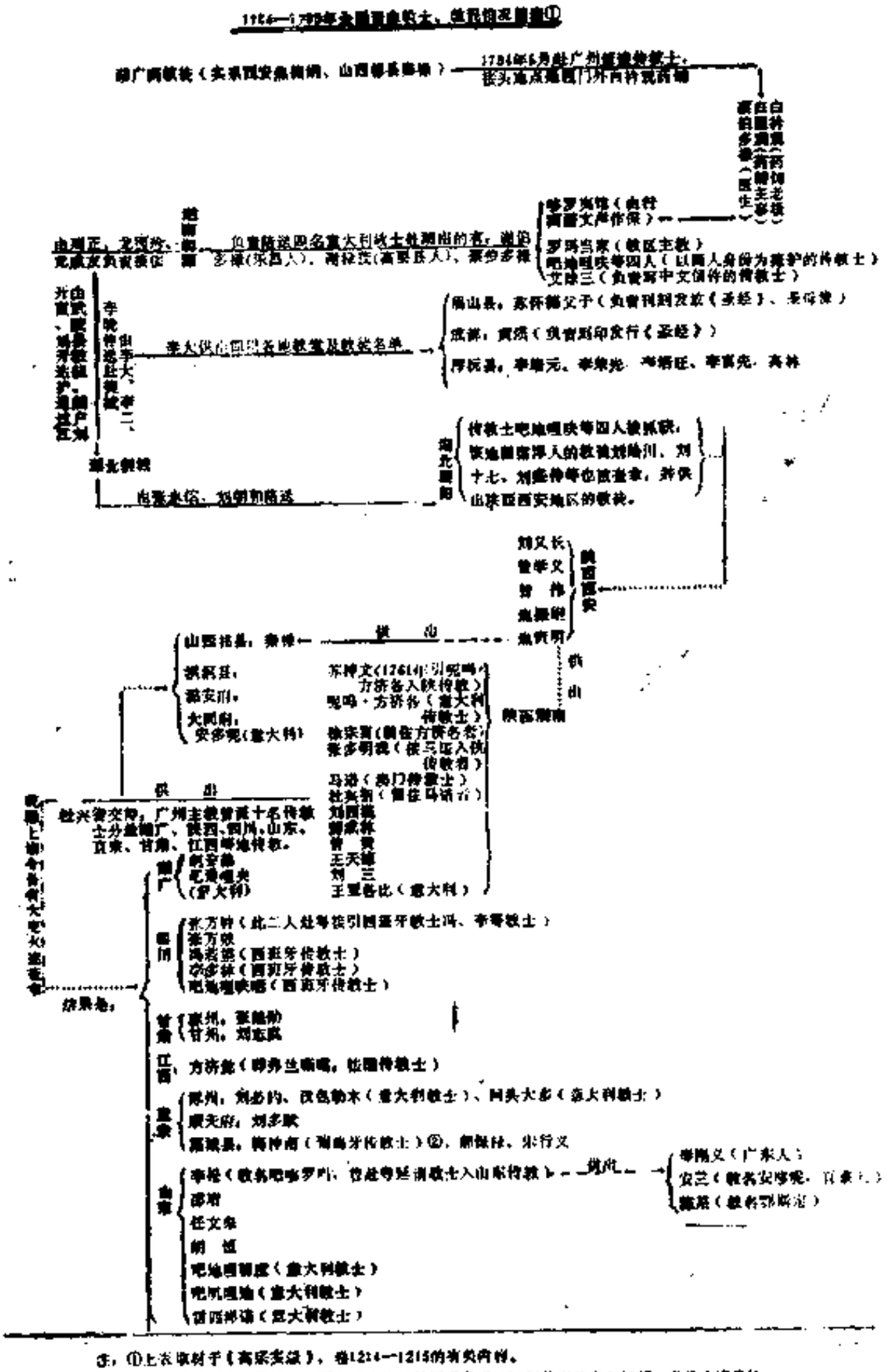
---

① 见后附简表：《1784—1787年全国查拿教士、教民情况简表》。

② 《高宗实录》，卷1216，第34页；卷1217，第4页。

③ 《高宗实录》，卷2220，第6页。

④ 《高宗实录》，卷2221，第28页。



注：①上表资料于《高宗实录》，卷1214—1215的有关内容。

② 梅神父原住宣圣教堂，所管下的传教地区发展了1005年教案的中心问题。参见《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卷，顺治条。

全国搜捕结果，抓获外国传教士数十名、教徒数百名。乾隆发布上谕，对外国教士、中国教士、教徒首要分子和一般教民采取不同的惩处政策。

对外国教士稽拿从严，谕旨说“西洋人传教惑众，最为风俗人心之害，除已获解京之外”①，尚未弋获者，各省官员要“带领人役，四路追寻拿获”②。但是，在处理上却是“宽猛互济”，乾隆说：

> “此等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别项不法情节，且究系外夷，未谙中国法，若永禁囹圄，情殊可怜，俱著加恩释放，交京城天主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著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以示柔远至意。”③

对于中国籍教士，则明宽实严，谕曰：

> “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④

对教民的处罚同中国籍教士。对于“内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勒令悛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照例办理，毋庸深究”⑤。

对于稽查不力的地方官吏的惩处是严厉的。如对担任广州哆罗夷馆的保商潘文岩，逼令其交出罚银二十万两⑥；对有关官吏则是“惟督抚是问，即当重治其罪，不能复邀宽典”。

这就是1784年到1785年乾隆大教案的始末。经过这次教案，

---

① 《高宗实录》，卷1219，第5页。

② 《高宗实录》，卷1221，第29页。

③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5，第40—41页。

④⑤ 《高宗实录》，卷1219，第5—6页。

⑥ 《高宗实录》，卷1216，第4页。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否停顿了呢？不但没有，相反，潜行传教之风，却越发厉害。遂导致了嘉庆朝1805年和1811年两次全国性大教案的出现。

六、1805年嘉庆朝大教案

乾隆承雍正的禁教政策，终其世而不变，致使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有些传教士在传播技艺的掩护下，巧避朝廷眼目，未尝稍停其传教活动，甚或有潜入内地传教者。此一停滞时期，可谓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潜进时期。其时，虽有禁教明令，但因领土广大，且有重大军事行动①，清廷对传教的活动，未能专事监视。

嘉庆承父之业，仍袭原有政策，传教士的社会地位及活动，依然如故。据史料记载，嘉庆帝最初并不知道中国内地还有传教活动。嘉庆十年（1805年），传教士在中国秘密传教的活动暴露出来。适值白莲教叛乱之后，因而清廷对天主教采取严厉态度。这就是西方人所谓“一八〇五年之迫害”。兹述其始末于下：

（一）教案的肇端

嘉庆九年，罗马教皇有敕书命供职北京钦天监教士毕学源

① 系指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

（Cajelanus Pires），转任南京主教。该敕书送到澳门后，葡萄牙人罗泽礼士德等嘱华人教徒陈若望晋京递交①。陈若望于该年九月抵京完成任务。在京教士们违反“凡在京西洋人未经朝廷许可不得擅行与外间通信”之禁，在陈南返时，托陈携带向澳门及本国函件，华人教徒也乘便托陈带书信。陈若望南下经江西时，竟以形迹可疑被捕。在行囊中查出一张由海道至直隶注有汉字的地方地图，及华人教士包罗柯（Paul Ko）书信一封，遂严究行踪。江西巡抚秦承恩照录陈若望供辞，并附上所带函件，一并摺奏京师。该摺于嘉庆十年正月十日（1805年2月9日）奏达内廷后，嘉庆降旨，着军机处按秦承恩所奏查讯。翌日回奏云：

“臣等遵旨，传到俄罗斯馆学助教受承柯等，将昨日秦承恩奏到之西洋字信一包，令其阅看，据称不能认识，查此项字迹，惟西洋人认识，此外并无认识之人。随传到索德超，将秦承恩摺内所称陈若望于上年从澳门带信到京，交索德超，索德超复给伊银两，带回书信，并所寄自广平至登州府路径图样一纸，各情节详细询问。据索德超坚称实不知道。恐系索德超因一时无人质对，不肯承认，亦未可定。复传到北堂西洋人南弥德，将西洋字各信交令阅看，据称，‘我系佛郎济亚国人，此项书信俱系意达里亚国的字迹’，伊亦不能认得，并据称有北堂西洋人贺清泰能通晓等语。臣等俟传到贺清泰等，令其认识，译出汉字，并将写寄汉字书信之蒋德仁等逐加询问，再行具奏。谨奏。”②

上录奏片中的西洋人索德超，据附于《正教奉褒》下卷的

---

① 参见Thomas·A：《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Tome II，第82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卷。

“教士姓名华洋合璧”中的记载，即系葡萄牙耶稣会士joseph Bernardus d′ Almeida。《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中曾载其传略。

西人记述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事件的书籍，以Nouvelles的Lettres Edifiartes Desmissions de La Chine最为详细。其卷四中收有南弥德（Lamiot）1807年的报告，述其审问经过，兹译之于下：

> “余有一友人，在一八〇五年二月九日（嘉庆十年正月十日），于秦承恩摺到之际，已闻知消息。余等教士中三人在严重情形下，首先被传询话，且询话时，彼此隔离，不得交谈。余之被询极简，仅出意大利文及葡萄牙文书函两件，余答称不能认识即可。嗣后，余即未被传询。”

南弥德记述中的“余等三人”，系指索得超、贺清泰及南弥德本人。这个报告继续说：

> “此后更传讯其他传教士。布教圣省教士教父德天赐（Ad′eodat）认供上项地图系彼寄送。至其送交地图原因，则供称，意大利葡萄牙两国传教士间，对传教地域界限之意见，未能一致，故欲寄交此地图与布教圣省，以求解决。此际，官方目的，对此地图之作用及其动机，极为注重。教士等之供述，因不敢直言，故其措辞，亦多含混，益使其疑及别有重大问题，及使各教士分别翻译包罗柯之信件。包罗柯函内，系关于风俗、思想之报告，如直言，则颇有顾忌，故率皆支吾含混，致所语各异，未能一致。官方因未得要领，竟日系于此狱，及复审讯推究，结果对余等疑念稍释，虽初来时严加监视，但此时反飨以美食，并嘱明朝再来，即行释归。此后三日间，每日审讯，凡托寄书信者，无一得

免，窥其目的，似专注地图与包罗柯之信件。第四日，大臣等亲行审讯，因候时颇久，又赐饮食后，首讯德天赐教士，主要追索此地图是否出自彼手。答称并非自制，乃发现于代理者①用文书中。于是又传讯前次代理阎诗谟（Anselme），问其是否见及此图，答称未见，又询图中字迹是否系德天赐之笔迹，答称颇相似。此图确系旧有，惟图中标记则系德氏所作。故大臣等谓诡词欺骗，致德氏终未蒙宽赦。候时未久，竟捕缚德天赐。押送提督衙门查辨，并对其他教士宣示，谓皇上对尔等并无恶意，无须惊恐，德教士尚须数日之审讯”②。

因地图关系被拘的德天赐，是意大利人。嘉庆十年正月十四日（1805年2月13日），清廷关于此案的文件云：

“提督衙门，正月十四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将西洋人三品顶戴德天赐，交左翼总兵文宁，派千把一员，在圆明园提督衙门，暂行看管。钦此。”③

按南弥德所述，清廷最注重追究者，乃地图与包罗柯的书信。关于此地图性质，据南弥德说：“意大利、葡萄牙两国教士间，对传教地域界限之意见，未能一致，故德天赐欲寄此图与布教圣省，以求解决。”又说：“地图乃旧有者，德氏仅在图上加以标记。”其事实与前录奏片所载，没有出入，与官方文书亦无差异。据刑部折云：

“臣等复向德天赐究讯，欲将山东登州一带地图，寄回西洋，是何意见？据供：此图原是乾隆四十九年因

---

① 代理者（Procureur），即西堂当家之意。

② Lamiot于1807年写给教皇的报告，载在Nouvelles的Lettres Editiarles Desmission de La Chine，TOMe V中。

③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卷。

传教犯事、业经治罪之梅神甫所遗，图内自山东登州至直隶广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隶景州，俱系传教地方，近日各堂要争往传教，我想将此图寄回西洋，求教主传谕各堂，不许竞争。”①

再，此案发生后不久，德天赐被释归国，途经马尼拉时曾发表遭遇经过。教士伯若森（Brossen）在1816年1月12日的书信中，曾记云：

“北京城内四隅，有教会四，由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四国教士管理其事。此中除法兰西以外的三国教士，久因管辖京城近郊已经基督教化之一大村落问题，发生争执。德天赐为息此争，上书布教圣省，申陈和平解决意见，并附寄标明传教境界之旧有地图。”②

以上所录三种史料所记事实是一致的。至于德天赐向罗马教廷寄地图的动机，这要追溯北京四堂的背景。传教士们虽以阐发神道为职志，但仍不能超脱“人情”，尤其是对于国家、民族，宗派等观念更难超脱，因此传教士虽是同一信念，但万难彻底合作，以致形成分裂割据状态，北京的四个教堂间的斗争，尤为激烈。这四堂中，南堂为德意志耶稣会士汤若望得顺治帝宠爱时所建，东堂为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所创，二人都是在葡萄牙政府的保护传教下来中国，因此两堂的传教士全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其势力最为强大；北堂乃法兰西耶稣会士巴明多（Fontanay）由康熙帝所赐地址建立，故始终为法兰西耶稣会士所把持。东、南、北三堂均属于耶稣会士的势力范围。至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教皇克里门十四世发布解散耶稣会命令，会士均被降为俗人。而居住在北京的会士虽接到命令，仍留北京管理教堂，以俟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卷。

② Annales be La Prapaqation be Fai Tome Ⅳ、151.

续任者。其时，葡萄牙政府因耶稣会已被解散，便于1801年（嘉庆六年）命罗查勒士派葡萄牙人李拱辰（Riberio）、福文高（Fereira）来北京，还俗的耶稣会士便让出东堂与其居住，以前的会士则聚居于南堂。同时，法兰西派的北堂，因耶稣会被解散，加上发生了法国大革命，没有宗派及国家的支援而呈衰微状态。直至法兰西罗查勒士派南弥德（Lamiot）来京后才稍见起色。西堂之建迟于以上三堂，是布教圣省罗查勒士派意大利人德理格（Pedrini）于1725年（雍正三年）所创，尔后由意大利派普罗巴堪其斯德等主持，直至嘉庆十年。故属于罗马教廷的奥史基诺斯派教士，皆居于西堂。嘉庆十年之际，管理四堂教士的宗派国籍关系，盖如次列：

东　堂	葡萄牙人	罗查勒士派
西　堂	意大利人	普罗巴堪其斯德派
南　堂	葡萄牙人	在俗耶稣会士
北　堂	法兰西人	在俗耶稣会士及罗查勒士派

按上列关系，教士等唯视国籍为依归，而轻宗派观念。所以主持各堂教士的国籍在传教上必然发生抵触，这是1805年事件的肇因。

德天赐之所以向欧洲寄送地图，在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纷争，但其背景实含有国民感情关系。葡萄牙教士以南堂为根据，在葡萄牙政府的支持之下，加之所处地位优越，上则把持钦天监，下则垄断直隶、山东各省的传教权利，其它堂不能望其项背。西堂的意大利教士依赖教廷援助，并拉拢失势的北堂，以对抗葡萄牙教士的专横。他们的斗争虽未表面化，但其内部矛盾已不可遏止。迨至直隶、山西两省的传教地盘问题发生后，其对立便表面化了。所以西堂当家德天赐在发生争执的地图上，加注各堂传教标记，欲呈送教廷，以便取得本教派的胜利。

再据当时在北京的沙俄东正教教士四贴班（Timkowski）

所谓“德天赐苦于应付葡萄牙教士之困难”，故上书陈述情形如实的话，可知德天赐此举，显然对葡萄牙教士不利。果如是，陈若望携图南下被捕，或系葡萄牙教士为顾及本派的利害而向清廷告密。四贴班说“陈若望之被拘，或系葡萄牙人之阴谋有以致之”①。可见，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的直接原因，虽在陈若望的被捕，但溯其远因，实肇因于教士间的暗斗。

现在再分析一下清廷何以对这幅小地图竟如此重视！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史料并无任何记载。但在传教士的著述中却留下了一些可贵的史料。前录南弥德口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官方疑此图系侵略计划，欲究真相，竟使德氏长跪达两小时之久，要其招认将此图寄送英国，籍以袭击山东。”②又据伯若森说：“有一妇人原为娼妓，后为显宦所收，乃德天赐之信徒，该妇初为娼时，极为厌恶，询其由，则谓余乃天主教徒，遂因是被遣归母家。职是之故，官人对德氏之印象颇恶，乃上奏谓被收之文书，乃与英人私通消息。”③

清廷根据这两个材料便怀疑德天赐把地图交给英人，作为英国进攻山东的资料。其时英国侵略印度成功，侵略安南失败，清廷对英国入侵中国沿海深感忧虑。

1802年（嘉庆七年），英舰借口法国将袭击澳门，竟停泊广东鸡颈洋海面达三、四个月。更引起了清廷的疑虑。时过不久，地图之事发生，故疑其为侵略计划。何况，德天赐又不肯实

---

① Timkowski：《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ste China》，vol、Ⅰ，第365页。

② Nouvelles：《Lettres Edifiares Desmissions de La Chine》。

③ 《Annalesdt La Propagation de Le Fai》，Tome Ⅳ，第152页。

供，更增加了清廷的疑心。据四贴班说："嘉庆帝睹此地图，大为诧异；盖因教皇绝无伸张权利至中国之野心与可能故也。"①既然中国明知教皇无伸张势力于中国的可能，遂转疑英国要得到有关中国的机密情况。

于是，清廷决定把德天赐关在园明圆的提督衙门，等到把陈若望解京后再行审讯。当时一般教士抱乐观态度，满以为此事不致扩大。殊知形势不断恶化，此案已由政治问题转化为宗教问题了。

（二）教案的经过

陈若望于嘉庆十年三月十四日解到北京，立即开始审讯。陈若望只承认代传书信，其它事一无所知。再提询德天赐，因与前供无异，便问他："汝事已毕，唯待其他教徒能否证明所言无伪；汝能否指出相当之天主教徒？"德天赐供称西洋教士的仆人，俱系教徒。又对他说："如能将彼等传到，则汝可无事矣。"德天赐即供出山东省的两名教徒。最后，传询居住西洋堂的华人，询问地图内容及包罗柯的住处家族，各据实供招。于是，此案逐渐转化为宗教问题。

在审讯期间，外间的传教士也感到情况愈来愈严重，遂进行活动打算向皇帝陈情，以防事态恶化。此时教士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一派主张陈明宗旨立场，保释德天赐；一派主张唯求释德天赐，不涉及宗教问题。结果采用前一个主张，请求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荣福转奏。而荣望却说："若于此际上书，徒刺激审此案之官员。"如此前后连请三次。后来有人对荣福说："如彼等情急冒然上递，倘为中途扣押，反为不佳。"荣福才表示同意

---

① 《Annales de La Prapagationde La Fai》, TomeIV, 第151页。

转奏。荣福即以康熙帝“关于许可天主教上谕”①事奏呈嘉庆。其结果是奏呈没有上报，事态益形恶化。正如教士南弥德所说：“查禁天主教之端绪，未尝不因陈情书而启，实属失著。”

清廷对保证德天赐所供属实的天主教徒，强迫他们反教。同时，军机处接到嘉庆十年四月十八日上谕：

“御史蔡维钰奏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一摺。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乃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在该国习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讲论成书，原所不禁。至内地刊刻书籍私与民人传习，向来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创其异说，妄思传播，而愚民无知，往往易为所惑，不可不申明旧例，以杜歧趋。嗣后，著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论知在京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人往来交结，仍著提督衙门、五城、顺天府将坊肆私刊书籍，一体查销，但不得任听胥役藉端滋扰，致于咎戾。钦此。”②

这个上谕除说明京师留居西洋人的宗旨外，还重申了禁止传教，并飞咨各省遵办。

此后，又对德天赐进行多次审讯，从供中得知许多天主教徒的姓名和住址。并在直隶、山东两省查拿天主教徒，陆续送交刑部讯办③。据嘉庆十年四月三十日《刑部奏审拟西洋人德天赐托陈若望私带书信一案摺》说：

---

① 后藤末雄：《康熙帝与路易十四》，载《史学杂志》42卷，第3册。

② 《仁宗实录》，卷142。

③ 详见《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卷。

"当同德天赐详细讯问，讵德天赐一味回护，狡饰支吾，不但不肯供出神甫等项民人姓名，即被惑习教之人，亦供：年久人多，均不能知其住址名字。复将德天赐之跟役翟喜、萧斌、吴永泰、黄德等查传到案，设法推鞫，并与德天赐质对，德天赐见势不能隐瞒，始据供认：天主堂共有南北东西四堂，德天赐在西堂办事，四堂共有先生八人，内姜姓已故，顾姓、赵姓、何姓现在分赴外省传教；卢姓、尤姓、刘姓并镶黄旗汉军马甲周炳德，现在各堂讲道，管理一切传教事宜。又于嘉庆七年间，将海甸、孙家井地方旧有西洋人寓所一处，改为圣母堂，分为男女两堂，男堂会长六人，已故张廷贤，在逃之杨姓，并现获之刘朝栋、赵廷畛、朱长泰、内务府正白旗闲散现在畅春园看门之汪茂德；女堂会长民妇陈杨氏，各讲经传教，每月男女来堂念经，煽惑甚众，并究出习教之西堂代认汉字先生山东惠民县人王世宁、直隶吴州人吴西满、山西平遥县人张明禄、山东临清州人简恒、直隶威县人尹思敬、正蓝旗汉军马甲佟恒善、佟明、养育兵、佟四、正黄旗汉军马甲蔡永通等，分别查传。"①

审讯德天赐及其天主教徒，至此告一段落。刑部将审讯情况上奏嘉庆，并对有关人员判了罪。第一个上谕是刑部上奏的当天，即1805年5月28日发布的。谕旨说：

"据刑部奏，审明广东民人陈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赐处送书信、地图，并究出传教习教各犯，分别定拟一折。西洋人信奉天主教，在该国习俗相沿，原所不禁，即京师设立西洋堂，亦祇因推算天文，参用西法，凡该

① 《仁宗实录》，卷142。

国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原不准与内地民人往来滋事，乃德天赐胆敢私行传播。讯明习教各犯，不惟愚民妇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复信奉，并用汉字编造西洋经卷至三十一种之多，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辟异说而杜歧趋？且该国原系书写西洋字，内地民人从无传习，今查出所造经卷，俱系刊刻汉字，其居心实不可问。此在内地愚民已不得传习，而旗人尤不应出此，关系人心风俗者甚巨。所有寄信人陈若望，在堂讲道之汉军周炳德，会长民人刘朝栋、赵廷畛、朱长泰，汉军汪茂德，或往来寄信，或辗转传惑，著照刑部所拟，发往伊犁，给额鲁特为奴，仍先用重枷枷号三个月，以示惩儆。民妇陈杨氏，以妇女充当会长，尤属不安本分，著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不准折枷收赎。民人简恒，曾代为寄信，请人传教；汉军佟恒善经反复开导，执迷不悟，俱著枷号三个月，满日发伊犁，给额鲁特为奴。周炳德、汪茂德、佟恒善，既自背根本，甘心习学洋教，实不齿于人类，均各销除旗档。至，一经晓谕，即情愿出教之民人王世宁、柯添幅、尹思敬、吴西满、汉军佟明、佟西、蔡勇通，尚知悔过，应行省释，但恐该犯等因一时畏罪饰词，未必出于至诚，仍著该管旗籍各官，严加管束，如敢再行传习，即加倍治罪。德天赐以西洋人来京当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书传教，实为可恶，该部奏请或饬令回堂，或遣回本国，均属未协，德天赐著兵部派员解往热河，在额鲁特营房圈禁，仍交庆杰随时管束，毋许与内地旗民往来交涉，以杜煽惑。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常福，于德天赐寄信、刊书、传教等事，未能先时查禁，著交内务府议处，其失察旗人习教之历任都统、副都统等，著军机大臣查明，奏请交部分别议

处。该堂存贮经卷，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派员检查销毁，毋许有留。其刊刻板片，并著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一体查销，并出示晓谕军民人等。嗣后，倘再与西洋人往来习教者，即照违旨例，从重惩究，决不宽贷。余著照刑部所议行。”①

此后的第二、三道上谕是专门对旗人教徒的惩罚，迫令佟澜、色克、舒敏、李庆喜等背教，并“情原合家一齐出教”，家中要供奉祖先，张贴门神、灶神，还要由“参领、佐领切实印结”后，“交该旗管束，谕令安分守法”，“如敢复蹈故辙，私行习教，或与西洋人往来交结，该都统等即行据实奏明，一面锁拿，交刑部加倍治罪”②。

在此之前的5月4日，军机处再传索德超（D'Aimeida）、汤士选（Gouvea）、福文高等教士，晓以皇帝禁止传教刻书之旨。教士等答应今后不再与内地人往来，不刊刻汉满文字书籍，谨守中国法度③。各个教堂交出的书籍，前后达173种之多，全部销毁。军机处奏片云：

“遵将前次查到西洋堂私刊清汉字各书籍逐一阅看，尚无悖逆词句，惟多系荒诞支离之语，兹就其谬妄尤著者，粘贴黄签，共七本，进呈御览。又续经查到清汉字书一百七十三种，应俟臣等派员阅看后，再行请旨销毁。谨奏。”④

嘉庆皇帝曾于5月1日命大吏禄康、长麟、英和等议订取缔天主教章程。5月15日章程草案拟就奏呈。这个章程的内容在

---

① 《仁宗实录》，卷142。

② 《仁宗实录》，卷144、145。

③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卷。

④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卷。

Nouvelles的Lettres Edifiartes一书的卷四中有较详细记载。兹简译其要点于下：

“（一）管理西洋事务大臣，为监督西洋堂，得任用代监者两名及司员四名。

（二）步军统领衙门派士官两名，率部下五名，看守教堂门，两日更配一次，以监视入堂者。

（三）皇帝因洋人在京当差，故赐给房屋，而彼等竟擅自在门额勒有‘敕建天主堂’字样，似许其公然传教；恐有愚民被惑，故先销其额，并销去其他标示。

（四）西洋人所奉宗教之祈祷日，旗民人等概不得参加，更不得与之结交。供职于钦天监洋人，虽许其出勤，但须事先申请该管吏，派士官一人同行。其他无差使者，与其他教堂往来之际，亦同上项办法。

（五）四堂附近之诸堂，着即行拍卖。

（六）西洋人在海甸有住房四所，现今传教士俱不居其间，每处有仆人两名居住。其仆人俱已带往步军统领衙门，着官宪暂行看管，不许旗民人等出入。西洋人如具正当理由住该屋时，须经许可后，始许其滞留。

（七）西洋人中，如欲向本国寄信时，须先告知该管司员，该司员将欲寄书信。交由俄人翻成汉文，阅读封印后，由军机处送交广东巡抚，再行交付。由欧洲寄向北京之书信，则由广东巡抚翻成汉文，检同译张，寄该管司员转达西洋人。

（八）居住四堂之西洋人所雇用人，须有一定名额，并填册档，不得自由增加。仆人中如有求去者，须禀明该管司员，再觅后续人位。

（九）在四堂附近及其他处所，张贴次录告示：‘官吏信奉天主教者免职，旗人加刑，余人则判徒刑。

有信教后欲出教者，具有确证者免罪。被捕之教徒，送刑部审决，该教徒如翻然省悟时，则破格减罪。此告示专为使众人作奉教之想，如弁丁兵员可藉口查禁天主教，而有搔扰行为者，定严惩不贷”。

（十）西洋人每于夏季为购买草药，派人在四乡采买。为恐趁机传播，着严禁其购买。”

上引禁教章程，已经嘉庆皇帝批准。这从五月二十日上谕中有“前已谕令派出管理西洋堂事务之大臣禄康等，公同议立章程，随时稽察”字句中，可知其业已施行。

为了杜绝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嘉庆又两次发布上谕，一为分析天主教义的支离狂妄、怪诞不经，另一为再有行教、信教者，要严惩不贷。上谕曰：

“前因京师西洋堂人，有与旗民往来习教，并私刊清汉字书籍传播之事，叠经降旨严行饬禁，并令将各堂所贮书籍，检出缴销，当交军机处臣将查出书籍查看。旋据签出各条呈览，朕几馀披阅，如《教要序论》内称其天主是万邦之大君。《圣年广益》内称所系降生之耶稣系普天下各人物之大君；又称中国呼异端为左道，未必非默默中为承行主之而有是言；又称凡在天地大主之下，自君王以至士庶，人人弃邪归正，圣教大行，未有不久安长治者；又称我教之主，真正是天地人物之主；又称凭他有道之邦，多系世俗肉身之道；又称圣人欲乘此机会传教中华。又《婚配训言》内称外教者如同魔鬼奴才等语，支离狂妄，怪诞不经，不一而足。而其内尤为悖谬者，则称父母所命，相反于天命为大不孝，有圣女巴尔拔拉，不肯听从逆命，被顽父亲手杀之，天主义怒至公，即以暴雷击死之。为人父母亲友阻人事主者，当以此为鉴等语，蔑伦绝理，直同狂吠。又称当时

有一个贝子，终日行非理之事，福晋极力劝之不从，一日有一群魔鬼拉贝子下地狱，天主以福晋有德行，默启他使知伊夫火海永远苦难，可见不听善劝，决不免天主永罚等语，尤为肆口乱道。贝子、福晋之称，西洋人何从知悉？自系前与汉人来往谈论，知此称号，妄行编载。事属已往，今亦不加深究。至其所称贝子被魔鬼拉入地狱之语，皆系凭空捏撰，毫无影响。似此造作无稽，妄行伎俩，尚有何言不可出诸口，何事不可笔之书，若不及早严行禁止，任令传播，设其编造之语，悖谬更有重于此者，势不得不加惩办，与其日后酿成巨案，莫若先事豫为之防。前已谕令派出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禄康等，公同议立章程，随时稽查，兹特揭出书籍所载各条，指示申谕。嗣后旗民人等，务当恪守本朝清语骑射，读圣贤书，遵守经常。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亟应湔除旧染，勿再听信邪信，执迷不悟，背本徒邪，自不齿于人类，有负朕谆谆训诫至意矣！将此通谕知之。钦此。”①

嘉庆十年十一月庚申（1805年12月31日）上谕，指令粤省督抚，严禁传教士由澳门潜入传教，要求“实力稽查，绝其根株，正其趋向，亦整风饬俗之要务”②。

（三）教案的余波

嘉庆十年教案，除上述一千人等受到惩罚外，因为是全国性的禁教运动，还有一些与此次教案无关的中国信众，也同时遭到

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1。

② 《仁宗实录》，卷152。

严厉的处罚。现分述于下：

1.图钦、图敏兄弟案。图钦、图敏早在雍正时已奉教，是雍正时被黜革宗室、配流边疆的苏努的曾孙。关于二人的情况，南弥德曾有详细记述。二人的洗礼名叫Michel及Rachael，皆习南教于北堂。尤其是图敏，曾居住北堂达五六年之久，担任说教传道之职，刑部曾再三劝他出教，竟坚持不肯。所以嘉庆上谕说："是该二犯本属罪人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经该部再三开导，犹始终执迷不悔，情殊可恶"。"革去红带子，名除玉牒，枷号六月，送往伊犁为奴。"①

天主教浸及宗室，危害满人的统治，故朝廷规定，如不宣誓叛教就严惩不贷。佟澜等四旗人因举家出教，才免罪释放。图钦弟兄"执迷不悔"，除有宗教上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憎恨，所以受到严惩。

2.山西人李如案。嘉庆十年九月三十日，两广总督那彦成、广东巡抚孙玉庭摺奏报称："山西阳曲县人李如，即亚立山，拟接引居于澳门之西洋人若亚敬，赴原籍传教，兹将关系犯人罪状呈奏，请敕刑部判审。"②据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若亚敬（JoachimSalvietti)说，李如的祖父系天主教徒，李如于嘉庆十年三月至澳门，结识若亚敬，欲结伴同归故乡，雇得教徒麦丙忠船只，并有教徒倪若瑟搭载，于四月二十七日由佛山出发，抵乐昌即被捕。最后作了以下判决，援德天赐之例，送若亚敬于热河，关押在厄鲁特营房；李如援陈若望之例，枷号三月，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倪若瑟、麦丙忠两犯，则充军极边，于配所责四十。同时晓谕澳门天主堂，不许民人入堂习教。同年十一月，刑部摺奏谓：

---

① 《仁宗实录》，卷146。

②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卷。

"那彦成等所拟李如、麦丙忠，倪若瑟刑罚尚无不当，惟若亚敬因异于德天赐所为，可于广东永远监禁或监禁一二年，谨请下旨定夺。"

当天即发上谕："部驳甚是，著将若亚敬留禁广东三年，期满释其归国，其他如议处理。"①

3.德天赐发往热河，虽不详其出发时日，但据六月一日兵部右侍郎广兴的奏片，可知其于十年六月一日以前，即已抵达配所，在厄鲁特营房圈禁。因他无其它不轨行为，于嘉庆十四年刑满获释回京。十六年教案再起，又以"学业未精"为由，把他送回澳门。②

七、嘉庆中后期发生的重大教案

嘉庆十年教案后，仍留在北京皇宫内供职的外籍教士共有十一人，北京教务仍有一些进展。其它各处西方教士均难立足，皆由中国神父主持，继续进行秘密传教活动。这种秘密传教不管如何谨慎，如何约束教徒保密，仍然是要暴露的。

（一）1811年搜捕旗人教徒案

这次教案起因系嘉庆十六年五月丙午御史甘家斌奏报，至今饭有西洋人传教，并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嘉庆皇帝闻奏，立即在当天(1811年7月19日)发布上谕，再制定传教、习教治罪条例，并追问除了在京当差供职的西洋人外，怎么还会

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卷。

②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3卷。

有西洋人在其它地方传教呢？谕曰：

“西洋人素奉天主，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问。至若诳惑内地民人，甚至私立神甫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而内地民人安心被其诱惑，递相传授，迷罔不解，岂不荒悖？试思其教不敬神明，不奉祖先，显畔正道，内地民人听从传习，受其诡立名号，此与悖逆何异？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至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前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时，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前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澳，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至直省地方，更无西洋人应当差役，岂得容其潜往传习邪教？著各该督抚等实力严查，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①

于是，全国从7月19日起开始搜捕传教的“西洋人”及习教的中国人。首先发现在北京竟有旗人传习天主教。吏部、兵部遂于9月11日（七月庚寅）奏报朝廷，对京城失察的官吏予以处分。奏折云：

“吏部兵部会奏，核议失察西洋人传教之地方文武各官处分，均著照所议行。至旗人居住京城，尤应遵守

① 《仁宗实录》，卷243。

法度，该管官闻目切近，亦易于稽察，如有传习西洋教者，本人既应加等治罪，其失察之该官，亦应从重议处，所有部臣原议，失察旗人潜习西洋教之该管官降二级调用，著改为降三级调用；兼辖官原议降二级留任，著改为降三级留任；统辖大臣原议降一级留任，著改为降二级留任”①。

于是，对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进行审查，追查有哪个“西洋人”曾与旗人接触。结果，主管“西洋人”的清廷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矢口否认曾有失察之事，其奏折中说：

“西洋人在地方潜住，并无传教情事，内地民人习教，并未转教者②。”

关于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情况，该管理西洋堂务大臣又奏报说：

“在京者共十一人，除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谦三人现任钦天监监正、监副；南弥德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又毕学源一人，通晓算法，留备叙补；贺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归国；此外，学艺未精之高临渊等四人，俱已饬令回国。现在西洋人之留京者，只有七人，此七人中其有官职差使者，出入往来俱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其老病者，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谅不至听有传教惑众之事。至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之处，即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③

上谕将留京的七个传教士，遣回年老四人，仅留下三人：

“贺清泰、吉德明、毕学源三人，著准其留京，饬

①②③ 《仁宗实录》，卷246。

令在西洋堂安静居住。其高临渊等四人，著交前军统衙门，于伊等起程时，派参将、游击二员，酌带兵丁数名，伴送至良乡县，直隶总督另于文职同知通判内，武职都司游击内，拣派妥员，带同兵役接替伴送出境，其山东以下经过各省，均照直隶一体派员接替，递至广东，交该督松筠收管。俟有便船，饬令附载归国，其沿途所过地方，及到粤居住之日，均不许令与内地民人交接往来。倘有意外之事，惟伴送之文武官弁是问，慎之。”①

同时，朝廷又规定凡在一年之内投书悔教者，免于追究等，并严饬地方官再查拿传习教人。上谕还对不认真禁教的官员作了如下处分规定：

“未行查拿之州、县官降一级调用，该管官各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其仅止过境并未逗留，失察之州、县官降一级留任，该管官各上司罚俸六个月，督、抚免议；如违匿不报，照讳盗例革职，该管上司均照讳例分别议处，其武职旗员处分，一律办理。”②

这个上谕下达后，地方官深恐受责，便加紧查拿。结果发现潜来内地的传教士，全国各地都有。于是各地的教案纷起。

（二）1812年西藏马吝事件及贵州驱教案

嘉庆十六年十二月（1812年1月）西藏发生了驱逐传教士马吝事件。十二月戊午上谕载：

“夷人马吝，带同通事汉人赵金秀到藏朝佛，该大臣等察看马吝面貌光景与西洋人相似，恐其素习天主

①② 《仁宗实录》，卷246。

教，假朝佛之名，希图暗中传教等语。所虑甚是，近来西洋夷人散布各处，传习天主邪教，意图煽惑，甚不安分，必应加意严防。夷人马吝，据称系噶哩噶达部落，其地滨海，路通西洋，向不信奉佛教，今迂道远赴西藏，显系托名朝佛，潜来窥伺，或有隙可乘，即渐图传教惑众，断不可任其久留藏中。著瑚图礼等，即将该夷人驱逐出境。……其汉奸赵金秀，以内地民人由京师至广东，渡越重洋，随夷人深入藏地，甚属可恶，著解交常明严审，从重定拟具奏。将此各传谕知之。”①

嘉庆十七年二月（1812年3月）贵州发生教案，牵涉数百教徒。给事中何学林奏报了此案的情况后，嘉庆帝下令严惩：

“贵州传习天主教，各乡集数十人及百余人不等，省城之北门外尤甚，又思州府等处有成群拐匪，各据巢穴，诱拐妇女至数十人，即贩往湖南、江西发卖，地方官俱不行查办等语。黔省地处远僻，易容宄慝，地方官当随时防范，加意侦缉，以杜奸萌，兹该给事中所称天主教及拐贩两种匪徒，聚积渐多，如思州、平越等处，距省尚远，或系府、县官隐匿不报，至省城北门外传习天主教者，实繁有徒，该抚驻札省垣，岂竟毫无闻见，乃漫不留心所司何事？颜检系曾获重咎之人，经朕弃瑕录用，仍委以封疆重任，倍当激发天良，力图报效，今该省有此奸匪，伊未能早行查办，已有失察之咎。著该抚即督率所属，将省城关外各处传习天主教匪徒及思州等处拐匪分饬严密查拿，将首恶按律严惩，俾随从者咸之改悔，革面革心，渐净根株，以靖地方，面除积患。若因循姑息，酿成大案，其咎更重于失察书吏

① 《仁宗实录》，卷251。

侵蚀钱粮矣！思之，慎之。将此谕令知之。”①

（三）1813—1814年湖北、广东驱教案

嘉庆十八年五月（1813年6月），湖北京山县发生教案。此案是由京山县天主教徒刘义悔教所引起的。据史料载：

“湖北京山县民刘义等九名，呈明伊等自祖父相沿习天主教，今因编查保甲，传谕示谕，俱投案自首，具结改悔，但在一年限外，该犯等系远乡农民，未能早知例禁，致逾定限，其自行投首，畏法输诚，较事发到官改悔者，似更真切，可否免其治罪。”

朝廷对此案作了批复：

“均著施恩免罪。嗣后，传习天主教之人，于例限外拿获后始行改悔者，仍当照例治罪，其有自行投首出教者，虽经逾限，概予免罪。著刑部再将例文分析，详明通行各直省，一体遵守办理”②。

嘉庆十九年二月(1814年3月)，广东发现传习天主教的情况严重，尤其“香山等县妇女亦多入教”，“又有匪徒潜匿、拜会、肆劫”活动。广东官吏感到这股力量是难以消灭的，于是，总督蒋攸铦、巡抚董教增会衔“出示晓谕绅耆人等，俾其互相稽察，自行约束，有拜会入教者，禀官究治，纵容者罪之，以将邪慝而安良善”③。

嘉庆十六年开始对教士、教民的搜捕，持续达十年之久。有许多教徒表示悔教，类似上述湖北京山县教民刘义等九人悔教的情况，全国比比皆是。例如，京城官吏满人魁敏信教获罪，发

---

① 《仁宗实录》，卷254。

②③ 《仁宗实录》，卷269。

往新疆伊犁效力后，表示悔教，“并从十字架跨过，实系真心悔改，魁敏着准其释回，交该旗严加管束，不时查察。”①

嘉庆朝中期禁教历时达十年之久，对传教事业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把教士和教徒清除，留京供职的传教士继续行教，潜入内地的传教士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如嘉庆二十年冬十月，湖南抓获潜入的欧洲教士兰月旺，数月间历遍江南各省，入教人数不计其数。据文献载：

> “时湖南来阳县查获西洋人兰月旺收徒传教，巡抚翁元圻以闻，奉谕：兰月旺以西洋夷人，潜入内地，远历数省，收徒传教，煽惑多人，不法已极，著翁元圻严切讯究，申明后，将该犯问拟绞决，奏明办理，其供出之犯，搜拿务获，并飞咨各该省一体严缉究办。”②

到鸦片战争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天主教徒，仍不少于20万人。

八、沙俄侵华别动队——东正教挤入中国

（一）沙俄东正教在北京建立传教据点

中俄发生宗教关系开始于十三世纪的元朝。在十六——十七世纪，正当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南部海岸地区及内地的时候，沙皇俄国也开始向远东西伯利亚地

① 《宣宗实录》，卷34。

② 《国朝柔远记》，第7卷，第10页。

区扩张，并且在十七世纪中期将势力伸向了中国黑龙江地区。1665年，以车尔尼哥夫斯基为首的一伙俄罗斯人强占中国黑龙江左岸的雅克萨城，并在那里修筑堡寨。俄国的东正教士叶尔莫根就在堡寨的前面建立了一座纪念“耶稣复活”的教堂，1671年又在雅克萨城郊高地建起了另一座“呈献救世主”修道院。这是在中国土地上最早出现的东正教教堂。

俄国人在盘踞雅克萨城以后，四出劫掠，大肆屠杀和蹂躏中国居民，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国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1685年前后对入侵的俄国匪徒进行了有力反击，在雅克萨战役中俘获了一批俘虏及降人，其中有一个是东正教司祭马克辛·列昂捷夫。这部分人即俄国史籍上所谓的“阿尔巴津人”。他们在受到宽大处理后，被带到北京，并把这百十来人独立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他们被安置在镶黄旗的驻地北京城东北隅胡家圈胡同，并得到与旗人相同的待遇，由清政府供给住房、饮食，发给年俸，允许与中国人通婚。康熙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特地颁赐一座小庙，准许他们在庙中做礼拜。

对于这些人的来历，还有另一种说法：

> “大约在三百多年以前，有一批俄国猎户偷渡黑龙江，到中国境内打猎，为当地驻防的清兵所发现，遂把他们予以扣留并解送北京。这批猎户人数在三百左右，其中有一部分被送回国，其他的由于水土不服，很多人在路上生病而死，行至沈阳，已剩了七十多人。及至来到北京的时候，竟然只剩了十几个人。他们都是俄罗斯阿拉巴金城人，并且都信奉东正教。清朝政府不但没有对他们施行虐待，反而给他们安排住处，还按照对待旗人的办法，拨给了他们一定的俸禄。于是他们就在北京居住下来。他们共是七姓，其中有两姓没有后嗣，其他

罗、何、姚、杜、贺等五姓人皆与中国通婚。这姓杜的便是我的高祖。

后来，这些俄国人请求清朝政府准许俄国神父来华，以满足他们的宗教生活。经清朝政府与沙俄交涉，俄国彼得堡东正教廷于1685年派了马克西木·列翁也夫神父来到北京，康熙皇帝还把北京城东北隅的一座寺庙赐与他建造教堂。自此，东正教就正式传入了中国。”①

（二）“布道团”及随团“学生”的不光彩行径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这批人擅自把“罗刹庙”改建为东正教堂，后来又接受沙俄教区证书，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俄罗斯北馆，即今苏联大使馆原址）。该堂是主持这个教堂的神父马·列昂节夫一手导演并活动的结果。这是北京有东正教的开始，也是沙俄在北京建立的第一座东正教堂，是沙俄利用东正教会作为扩大侵略中国的工具所打开的第一个缺口。此后，沙俄即以东正教会的形式，用各种方法加强其联系，一再要求在北京建立教堂，选派主教，而且每次俄国商队来华，都派若干神父随行。1715年，沙俄从托波尔斯克派遣“行教番僧”九人，随同清朝官员图理琛到达北京，以俄罗斯“北馆”为驻地，这是沙俄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北京传教士团”（又称“布道团”）。《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沙皇俄国按照条约第五条的规定，取得了每十年（后改为五年）定期派遣传教士团接替前届传教士团的合法权利，条约并同意沙俄派遣“学生”六名随传教士来华。根据条约规定，还在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正式建立了另

① 杜立昆：《关于中国东正教会的历史概述》，载天津宗教界史料编辑委员编《史料选辑》，第29卷。

一个东正教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即俄罗斯南馆），作为传教士及“学生”的住地，从而使沙俄利用合法外衣进行对华侵略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据统计，从1715年到1850年的一百三十五年间，沙俄先后派遣了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传教士团“负有供给俄国使臣情报之秘密任务，甚至暗中参与密谋”①。这个教会“起着俄国政府官方代表的作用”，“教会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②。据此可以窥见，东正教会来中国的目的是要掌握中国情况，进行搜集情报等活动。他们表面上是宣传宗教，学习中国文化，实则是拉拢在京外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为沙俄政府服务，以配合边疆地区的军事侵略行动。这是北京沙俄东正教会的真正使命。

对于沙俄派遣传教士团及随团“学生”的真正目的，清朝政府内少数有识之士是有所觉察的。1737年（清乾隆二年）监督俄罗斯馆的御史赫庆奏称：

> “（沙俄）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俄罗斯互市宜在边境，其居住京师者，请禁贸易。”③

赫庆虽然明确提出了防范传教士和“学生”的破坏活动，但为时已晚。其时，清朝初年尚有国内战争，无暇北顾。沙俄便乘机逐步扩大侵略边境地区的活动，还用一切方法向内地渗透。十七、十八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和“学生”实际上是十七、十八世纪沙俄侵略中国的一支“第五纵队”。是沙皇政府用以“打开中国的窗户”的对外政策工具，是一伙“披着宗教外衣的奸细”、

---

① 《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61页，云南崇文书馆版。

② 《在华的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1919年10月号。

③ 《朔方备乘—俄罗斯馆考》，卷2。

“挂着‘汉学家’招牌的文化特务”和“盘剥中国人民的吸血鬼”①。

沙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第七届传教士团（1781——1799年）首领、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的“工作指示”的第一款中说，在他前往北京途中和驻北京期间，“要按照彼得大帝1724年1月13日颁发的谕旨所规定的那样去做”，而且“在国家事务中有什么必须保守的秘密的事情，那么绝对不能在私人信件中提及”②。足见这伙道貌岸然的“圣徒”，是披着合法宗教外衣、执行沙俄侵略使命的间谍。历届教士团成员来华后都要千方百计地结识清朝官吏，刺探清政府的机秘，传递收集情报。上面提到的那个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来华前夕，沙皇政府外交委员会就命令他要尽量搜集“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沙俄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还巧妙地利用西方国家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华较早，得到清朝政府的信任，很多人获得了官职和当了翻译，这就成了沙俄北京东正教传教士设法窃取中国情报的重要来源，例如，1685年尼布楚条约谈判期间，担任清方翻译的是外国天主教士张诚和徐日升。他们利用翻译的身份，帮助沙俄的谈判代表戈洛夫。当双方在进行有争议的领土谈判时，徐日升竟建议“不咎既往”，停止“无休止的争论”而立刻进入划定边界的谈判，使沙俄得到很多好处③。

此外，随沙俄北京传教士团来京的“学生”，在国子监学习毕业后，其中不少人往往留下来充任理藩院的翻译，实际上成了负有特别使命的俄国情报人员。1738年，第一届“学生”罗索兴在理藩院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转呈沙俄枢密院后，获得

① 参见《沙俄侵华史》，第1卷，第264—282页。

②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89页。

③ 参见《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92页。

了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1746年第二届“学生”伏拉迪金和贝科夫回国时也带回“不少对俄罗斯帝国有用的机密情报”，其中包括摹绘的《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有一个专门研究“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外交职能”的俄国人格列勃夫说过：“我们的翻译在理藩院任职，帮助中国官员处理事务。通过这些翻译，我国的传教士团总是对有关中国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了若指掌，借以广泛地向俄国政府提供这方面的情报。”①披着宗教外衣的北京东正教会成了沙皇俄国政府设在中国首都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情报站。

（三）“汉学家”的真面目

沙俄政府除了利用宗教掩护其间谍活动外，还培养了不少号称“汉学家”的文化特务。沙俄政府以派遣“学生”学习汉、满、蒙语言，派遣医生传授医学等手段，积极进行文化侵略活动。早在1700年彼得一世颁发的“特谕”中就强调要对中国进行“研究”，深入调查中国的情况。从那时以来，以沙俄北京传教士团为骨干的沙俄“汉学家”把研究“旧汉学”作为俄国推行殖民政策的思想武器，为沙俄在东方的推进寻找辩护的理由。据统计，沙俄政府从《中俄恰克图条约》第七、八条取得派遣六名学生来华学习汉、满文的规定以来，十年更换一次，到十八世纪末，先后派遣来华“学生”二十四人。他们中间产生的“汉学家”，几乎都是负有收集清政府政治、经济情报和“研究”中国的特殊使命。除了通常的活动方式外，他们主要是在学习完成后，从事理藩院的翻译和理藩院所设俄罗斯馆向八旗子弟教授俄文的工作，做了大量的满汉文典籍的编译和翻译工作。他们为沙

① 参见《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92页。

皇效劳是不遗余力的。来华“学生”中比较著名的罗索兴、伏拉迪金和阿·列昂节夫三人，曾把《八旗通志》、《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异域录》（理图琛著）和《中国地理手册》、《中国丝织厂资料》等书翻译完成；对清朝统治者的谱系、清政府的组织机构等也进行了“研究”。他们编译的书籍，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对外关系、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他们回国后受到沙俄政府的重用和赏识，大多被安插在沙俄外交部门担任要职。如阿·列昂节夫在沙俄外交委员会任职，罗索兴是他的同事，而伏拉迪金则就任了兼有外交职能的沙俄来华商队总管，为沙俄帝国制定侵华政策出谋划策，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沙俄北京东正教教会中的“汉学家”的活动更加猖獗，肆无忌惮。如一度被人誉为“热爱中国，把中国看作他的第二祖国”、“俄国在汉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奠基人”的俾邱林，在他留居北京的十四年间，利用宗教人士的合法身份到处奔走，结交清政府权贵和蒙藏贵族上层人物，搜集了我国各方面的情报资料编写成书，而且掠夺我国的文化典籍和文物，当他回国时，竟“带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和各类文物。又如1830年（清道光十年）在北京东正教会学习的“学生”帕维尔·库尔连德采夫，曾以巧妙的手段，盗买了一部脂评《红楼梦》八十回手抄本真迹，并于第二年回国后交给沙俄外交部亚洲图书馆（现称亚洲人民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成为流落在国外的一个重要的《红楼梦》抄本。

（四）东正教士大肆进行经济掠夺

自十七世纪末以来，沙俄北京东正教教会还与来华的俄国商队紧密勾结，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他们充任商队的译员和向

导，经常通过商队“就外交情报事项同外交委员会联系”。他们所搜集的大量经济情报为打开中国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728年恰克图开市后，俄国对华贸易不断发展，从中国输入的茶叶、丝绸、棉织物、烟叶等物，至十八世纪后半叶已在俄国对亚洲贸易中跃居首位；而1792年至1800年俄国对中国输出的皮毛货，已占对华出口货物的百分之七十。1775年以后，为了保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沙俄政府正式通过外交部赋予北京东正教会以收集经济情报的任务，并拨出大量款项，作为收买清政府官员的经费。

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沙俄北京东正教教会直接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到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这个教会在北京郊区占地已达一万亩以上，每年收取大量的地租。这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大发横财，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据《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记载，第一届（1715—1729年）传教士团首领依腊离宛在北京期间，出则高车驷马，入则仆役趋侍，美食锦衣，极其奢华。后来的俄国教士提起他在北京的“排场”时，仍然称羡不已。他手下的修士司祭劳伦特来华时，“穷得一文不名，连一件象样的衣衫也没有”，“到中国后也阔绰起来，过着呼奴唤婢的生活”①。

第八届教士团首领、大司祭甫罗尼，于1795年就曾放债二千二百卢布给一个中国人。历届沙俄北京教士团利用他们敛聚所得，在北京经营商业，出租房屋，包揽诉讼，无恶不作，集大地主、高利贷者、奸商、房产主和讼棍于一身。第六届传教士团“学生”科尔金经常辱骂中国人，引起极大的公愤，成了民众所公认的恶魔，以致善良的中国母亲们竟以科尔金的形象来吓唬啼

① 《沙俄侵华史》，第1卷，第281页。

哭的幼儿①。

综上所述，在十七、十八世纪，沙俄在赤裸裸地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同时，曾利用伪装“和平友好”使者的宗教使团进行文化渗透。他们设据点，求通市，建教堂，派“学生”，都是为了窃取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以实现其向东扩张侵略的既定政策。沙皇俄国是侵略中国最早和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之一。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害。

九、雍乾嘉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

一、缪勒、戴倍洛等对东方学研究的建树

清代中期的雍乾嘉三朝实行禁教，而且教案经常发生，传教士来华远不如顺康时期为多，这使中西文化交往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仍有不少愿在清廷京师效力的传教士，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与此同时，顺康时期已被传教士带到西方的中国东方文化艺术，也受到欧洲学者的重视，许多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学”的“汉学家”。

除了来华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研究中国文化外，第一个研究“汉学”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十七世纪著名的德国东方问题专家缪勒（Andreas A．Müller，1630—1694）。他虽不是传教士，但致力于“汉学”研究，著有《马可波罗游记订误》与中文

①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55、58页。

索引（现藏柏林图书馆）和《一六九五年之若干东方著述》（Opuscula nonnulla Orientalia 1695）、《一六八五年之中国范本》（Speeiminum Sinicorum 1685）等书。与缪勒同时的，还有法国皇家学院教授戴倍洛，其杰作叫《东方文库》（Bibliethéque Orientale），又名《东方各民族学识百科辞典》。戴倍洛为便于潜心研究学术，退隐于笃斯加（Toseane）。后受首相郭尔倍（Colbert）邀请，就东方学术的研究草拟计划，奏陈国王。郭尔倍首相对东方学颇感兴趣，他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研究来建立大西洋以外的国际关系及促进商务的发展。他曾鼓励对中国语文的研究，并赞助增派法国教士来华的计划。郭尔倍死后，由罗伏亚（Louvois）促成这个计划的实现。罗伏亚首相嗜天文、地理、文学，曾把郭尔倍1660年成立的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多人遣往欧美各地，中国方面则以此事付托于传教士。

从此以后，到中国来的西欧教士将欧洲典籍译为中文，又将中国的儒家典籍译为欧文。十七世纪用拉丁文译成的《四书直解》，在巴黎出版。继此复有十八世纪出版的以法文译成的《中国六大经典》（Six Libri Classici Sinensis），在比利时刊行。此书是比利时教士卫方济（Francois Noel）所译，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所以命名为《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年（康熙五十年）在比利时出版。

除儒家经典之外，老子的《道德经》，也于十八世纪中叶翻译成拉丁文出版。《道德经》最早的译本是1750年（乾隆十五年）某教士所译的拉丁文本，后存伦敦的印度事务局（Indian Office）。

（二）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介绍与推崇

彼时，中国的文艺作品已被翻译为西文传入欧洲。其中较为著

名的是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法国教士马若瑟(Joseph Maria de premare ），将元人纪君祥所作《赵氏孤儿》杂剧，译为法文，译名为《赵氏之孤儿》(Orphlin du Chao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法国人赫尔特（Du Halde）又将本剧重新翻译。元曲中最为欧洲人赞赏者，是《赵氏孤儿》。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剧中的程婴与公孙杵臼的忠义殉身，表现了中国文化所涵育的最高道德。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Voltaire）对此剧十分赞赏，便将译本大意改写为五幕剧，以表明其提倡中国道德之意 并在巴黎演出。伏尔泰十分赞美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礼俗政制是值得西欧各个国家效法的。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常暗用中国的传说故事，足见其对中国事物，不但崇仰，且所知甚多，涉猎甚广，实为当时汉学专家。

当时不少欧洲人仰慕中华文化，曾撰编中国戏剧、小说、书牍，借以讥刺欧洲的时弊。伏尔泰实为一时之代表。其他如狄德罗（Diaero）、海威修斯（Helvetius）、波乌尔（Poivre）也都是非常崇拜中国文化的学者。

对于中国文化的宗师孔子，在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以前，欧洲人并不注意，到十八世纪时，欧洲人才把他尊为世界大哲学家之一。十七世纪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热心研究中国哲学，他建立的学说与中国孔子、老子之说符合，并欲使西欧天主旧教与新教各国联为一体，冀图输入东方的文明。他还主张使界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俄国成为两大文化交通的孔道。他曾组织学会，著书阐发周易之礼。莱布尼兹的弟子们极力推广其师之说，欲将基督教义与中国孔子、老子的学说融合起来。

（三）中国文化对西欧社会生活的影响

十八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ls)，十分赞美中国的

以农立国，并欲使法国效法中国。这对法国国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王路易十五世就曾仿效中国天子亲耕籍田。重农学派不仅称赞中国的农本主义，而且认为中国文化及《论语》的道德教训，皆超越希腊之上，“实为最高之理想”。

绘画与漆器，也为东欧所风尚，渐能仿制。十八世纪初，意大利、荷兰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尤以德国所制最为成功。中国的丝绸及绵织品，也为欧洲人士所称赞，并仿效其技术。此时东方花布及花纸也传入欧洲。

西方绘画也深受中国画的影响，许多人摹仿画在瓷器上的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画师中最著名的叫维华多（Jean Artoire Watteau）。

此外，中国的杂技、娱乐方式和许多风尚，也纷纷传入欧洲。中国创于晋唐而盛行于宋代的肩舆，自十七世纪初年，也被欧洲人采用。不过乘肩舆的多为贵妇人，而且不是用肩荷，而是用手提着行走，故法语称肩舆为“手提之椅子”（Chaiss a R-orteur)。之所以盛行，原因是由于欧洲帝王摩仿中国社会中的尊严华贵阶层，用以区别等级。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贵妇人，除乘中国肩舆外，还用中国聚头扇。西欧自古无扇，希腊罗马时代的石刻绘画，皆未见有持扇者。原因是欧洲气候有寒无暑，故扇子并非必需品，欧语也没有扇子这个词汇。至十七、十八世纪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十四世的宫廷贵妇，乃盛行用扇。贵妇盛装，手必持扇，其制作精美，并仿中国，迄今仍有遗风。其后，聚头折扇的形状影响欧洲的建筑。建筑师多爱使用中国的扇形图案作为门窗的装饰。中国式的园亭建筑，亦曾风靡一时，雕花的窗楹，饰龙的檐柱，多角或圆形的亭子，层级的宝塔，皆为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所采用。其时中国教士向欧洲通讯，赞美中国圆明园的宏丽。法王路易第二曾欲仿造，未果。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大诗人歌德（Goethe)，很喜

欢读中国书，在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即熟读中国六经，其后读了许多中国的文学作品，醉心于中国事物，崇拜甚殷。

（四）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方面，十七世纪中，接受欧洲文化最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等人。他们曾与利玛窦等交游，并潜心于西学，与西欧教士合译的著作甚多，欧洲历法、天文、数学、哲学，都有明代译本。其后清代遂有自撰的科学著作。中国人与西欧人合译的名著除《几何原本》外，尚有《希腊哲学》。其时，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著作，已经翻译成汉文，传于中国。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尤以历学为盛。

绘画美术也深受西欧影响。其著名的画家，清代有焦秉贞、冷枚、唐岱、陈枚、罗福旼、门应兆、张恕、崔锴、吴历等人。康熙时画师吴历，为清初六大画家之一，晚年喜与西欧教士交游，并信奉基督教。曾偕西欧教士至澳门，欲赴欧洲而未成。乾隆时有西欧画师郎世宁、艾启蒙、马国贤等人，供职书院，作中西合璧之画，堪称国画欧化的先驱。

在建筑方面，中国也有不少欧化的特点。明末时，欧洲人入广州，葡萄牙人居澳门，其后耶稣会士至北京，故此三地为欧式建筑开始之嚆矢。崇楼仙阁，高檐飞栋，甚为中国人惊羡。乾隆南巡时，扬州的澄碧堂即摸仿广州十三洋行中的碧堂而成。而欧式建筑中，最为宏大美丽者，为乾隆时完成的圆明园与长春园。法国教士王致诚(Denis Attiret）函中称之为“万园之园”（Jardin de Jardins），并非过誉。长春园是乾隆帝准备将来满60年归政后的宴游之地，制作尤精，其中专仿欧式建筑者，计有十二处。大都白石雕刻，瑰奇伟丽。而门柱雕饰，是摸仿希腊

罗马雕刻和法国路易 王 朝 风格。自咸丰十年（1860年）毁后，仅存废墟。

其它欧洲工艺及美术图案，如瓷器的形式、色彩等，多仿西欧或作欧式图案。其中珐琅的绘画与珍贵饰品，已为帝室贵家所使用。

（五）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论争

对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当时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尤以对宗教与历法二者攻讦最甚。反对派始自明末，延及清康熙间，以魏文魁、沈潅、杨光先等为代表，但他们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是平庸之辈，甚至是愚昧无知的顽固派。基督教被禁止，对于西欧文化继续传入中国，不啻是一大打击。起因是基督教士之间的意见分歧，而罗马教皇又固执己见，竟然违反中国的礼俗，遂引起中国帝王与士大夫的厌恶，西方文化的传播也处于停滞状态。其后，1715年（康熙五十五年）及1743年（乾隆七年）罗马教皇虽曾两次降谕停止“仪礼之争”，但在中国传教之事，终难恢复。

欧洲自十七、十八世纪掀起华化热之后，因中国禁止传教，耶稣会的衰落，就很少有人宣传中国文化了。当时，欧洲的重商主义兴起，继之以古城发现，对希腊、罗马的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当十八世纪西欧崇拜中国文化的狂热时期，即有人反对欧洲华化的说法，如法国的卢梭与孟德斯鸠等，可为代表。卢梭说中国圣贤之教（孔孟儒学），无异于中华民族的落后。孟斯德鸠则认为中国纯以专制恐怖立国，其国民道德，尤其不足称许。而德国人格里姆（Frederich Melchoir Von Grimm）竟然说中国是凶残的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假设了中国孔子与希腊苏格拉底之间进行互相的问答，孔子理屈辞穷而退。其意在表明苏格拉底的虚心而怀谷，孔子的乐观而大言，且证明中国人好古盲从，远不如

希腊人的重知识而务批评。

其他西欧学者，也纷起否认华化的价值。或从年历推算，说明中国古史不足信；或诋中国哲理为粗浅幼稚；或谓中国艺术过于纤巧。甚至有人说中国文明源出于希腊。希腊文明传入中国之说，至今许多欧洲人还相信。在德国，甚至有人反对译读老子的《道德经》。就连崇拜中国文化的大诗人歌德，也转而主张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化。

自1723年（雍正元年），中国禁止基督教士居住内地，仅许留居澳门，至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法国政府宣布解散本国的耶稣会，西欧的华化热渐衰，随后不久便寂然无闻。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萌芽的西欧华化与中国欧化的趋势至十九世纪而中断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外来突起的新文化，与本位固有的历史文化，常互相消长，互相取补，互相嫉妒，互相钦慕，此为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难违的规律。

第五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方传教士

（1821年—1844年）

在十九世纪以前，基督教曾于唐朝、元朝、明朝三次传入中国，但那时的传教士仅以传教者的身份来中国“布道”，侵略意图很少或根本没有。十九世纪以后的情况就大不同了。当时，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掠夺落后国家人民，成了资本主义各国最迫切的要求。因而各资本主义列强都把宗教作为自己的工具，充当它们推行侵略政策的先锋和开路者。马克思在1843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①。

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传教来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目的，在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血腥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显著。鸦片——大炮——传教士，实际上是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来掠夺中国的三位一体的工具。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介尼甘（J·R·Jerueqon）说过：

“从商务观点来看，传教工作为我们对华商务的发展，是大为有利的。……在传教士已经跨过的平原和土

①参见《马恩论宗教》，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50页

地上，工程师正在为建造铁路而进行测量。借着这些铁道，商人的货品就可以大量运入内地了。要是我们没有传教士供给的报告，中国大陆上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当记住：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着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①

这位领事对传教士的“贡献”大肆吹嘘，充分暴露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本质，使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干着与其身分不相称的勾当的布道者的罪行，昭然若揭。

一、十九世纪前期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的变化

（一）、拿破仑支持法国天主教会与葡争夺保教权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伴随着天主教的敌对派基督新教的各个差会踏上中国土地，并开始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之后，天主教教廷为了加强对远东尤其是对中国天主教各修会的领导权，以巩固它们在中国经营近二百余年的传教成果，于是便调整与基督新教既敌对又勾结的关系，以强化天主教对中国传教的保教权。

从十五世纪开始，葡萄牙是在远东地区享有天主教会保护权利的唯一国家。远东各主教的提名和派任，及各主教的传教区域，均由葡萄牙决定。中间有一度甚至把各主教的人选限于葡籍教士，而且规定赴任前要从葡京出发。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葡萄牙逐渐丧失了海外霸权，继

---

①巴顿：《传教士及其评论者》，1906年版，第19页。

之而起的是法、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英、美、德三国以基督新教最为盛行，只有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当时法国的对外贸易比较薄弱，因此就以大量派遣传教士的办法来弥补其不足。有书记载：

"〔法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教活动方面，始终首屈一指。法国派遣自己的宗教徒到最遥远的地方，用自己的船只把传教士送到海洋的彼岸，并以大量金钱给予资助。这个特殊基督化的国家始终在执行着这样的政策，逐页地在它的历史上写着'天主的工程借法国人之手完成。"①

法国推行的这项侵略政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曾一度中断。当拿破仑上台后，立刻又继承了这个祖传的衣钵。拿破仑为了满足法国资产阶级的欲望，疯狂地对外侵略。为达到这个目的，他除动用军事力量之外，对传教士的作用也十分重视。拿破仑刚一上台，就立即下令恢复法国境内的教堂，偿还教会的财产，恢复教会以往所享有的特权。1802年1月30日，他特为此事给巴黎总主教布朗（Bolloy）写了一封信，透露了他企图利用传教士的用心，并且特别提到了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信中写道：

"阁下提出的有关仁爱会修女的各项要求，我已尽知，我同意恢复她们以往所享有的各项特权。关于来信中所谈中国的传教事务一节，我已仔细过目，并深感此事极为重要。希望阁下给我作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使我能够弄清楚：目前，我们的传教士分布在那些地区，

---

①古伯察（Huc）：《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第4卷，第231页。

他们在当地为法国作出那些贡献？阁下可以对所有与阁下发生联系的传教士保证，我对印度、中国，和对叙利亚及东方各地均采取同样的政策。我已将圣地及东方所有教友尽置于法国特殊保护之下……”①

同年8月28日，拿破仑又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

“我已将圣墓及叙利亚的教友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教堂悉交法国保护……我希望能给中国的传教事业增加新的生力。不必对圣座隐讳，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与一般宗教利益无关，而是为了使中国的传教事业脱摆英国人的手掌，因为他们已经在着手这项事业了。”②

当时的葡萄牙虽然实力日渐削弱，但仍然死死地把持着布道中国的保护权。它控制了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咽喉一澳门，对于非葡国籍的传教士特别是法国传教士，一概禁阻。1788年，法国传教士陈（R. Aubin）和爱尔兰传教士韩纳庆（R. Hanna）来到澳门之后，一直在那里等了三年，也没有等到进入中国的许可。法国传教士急不可待，便潜入湖、广等地活动，而爱尔兰传教士则留在澳门修道院中教书。1793年英国使团来华，这位爱尔兰传教士与另一法国传教士南弥德（Lamiot）请求偕使团进入中国，但行至天津，即被中国官员发现，又被送回澳门。1799年，法国传教士闵盖特（Minguet）躲过澳门的葡萄牙人，向广州总督求得了去北京的许可，到了广州。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得知此事，向两广总督提出抗议，闵盖特只得返回澳门。1801年，法国

---

①②古伯察，《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第4卷，第236、237页。

传教士Dumazel和Richnet乘英国船来到澳门，由于葡萄牙的刁难，始终得不到进入中国的许可，一直在澳门呆了五年，以后只得潜赴湖、广等地活动。凡是不接受葡萄牙保护的传教士来到澳门，葡萄牙人不但不将他们向中国推荐，甚至根本不予接待。

在葡、法两国激烈争夺中国保教权的时候，英国人企图坐收渔利，乘机诱劝北京传教总长罗广祥（Raux）承认自己是英国人。英人瑞特(Ritt)也曾向两名来中国的传教士表示：如果他们能够动员他们的伙伴承认自己是英国传教士，英国除无偿地运送他们到中国之外，还可以每年给他们五万里尔。由于法国传教士自有他们的使命，因而没接受英国人的这番“美意”。

这场激烈争夺战最终还是实力强大的法国占了上风。由于葡萄牙国势日衰，教皇对它不再器重，教廷需要另找政治靠山。葡萄牙的保护权于是逐渐减弱。到1834年4月，教皇格列高里十六就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保护者的义务为理由，颁布教谕，取消了它的保护权①。葡萄牙拒不受命。法国却一心一意地去谋取这个保护者的地位了。

法国成为在华天主教会保护者，当时还没有取得清政府的承认。1846年2月8日，清政府虽然颁发“上谕”准予国内天主教“免禁”和各省原建的天主堂由地方查明发还原主②，但并没有请法兰西给予保护。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所谓“奉教”、“传教之人”，包括了各个国籍的教徒和教士。一般的看法都认为，法国从此取得了在华天主教的保

①A. Thomas：《Histoire de La Mission Pekin》，Tome，第215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5卷，第5页。

护权①。但就法律而言，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天津条约》并没有承认法国是教会的保护者。

实际上，法国是否取得保护权，完全决定于教廷的态度。教廷是最讲现实政治的。《中法黄埔条约》订立之后，教廷就开始倒向法国。1846年4月，教廷命令在内蒙西湾子传教的法国教士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去接管葡萄牙派任的赵主教（Castro）所管的北京主教区。次年3月，在这位葡萄牙主教的答复中，表示他效忠葡萄牙国王，不能让教皇随便取消了国王的权利。他说：

> “不管教徒要如何对付葡萄牙国王的权利，这都不会影响到葡政府，因为葡萄牙要的是完全照旧，或是一无所有。简单说，我不管这些问题。照《圣经》上说，我要把应该归凯撒的给凯撒，应该归上帝的归给上帝。……我生为葡人，死为葡鬼，就是这一句话。”②

赵主教这番话说明，天主教会保护权并不单纯是教会内部的事情，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赵教主的话使甘为法国效劳的教皇想不出什么话来答复。他也很明白，承认一个主教的地位和国家的权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最后还是法国取得了胜利，孟振生抢到了北京主教区主教的位置。说明宗教保护权的享有，完全视强力为转移。直到1857年，葡萄牙才正式放弃了“澳门以外的宗教保护权”。

法国取得天主教会的保护权，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法国政府的目的“不是由于对宗教的热诚，而是出于对体面和权力的欲

---

①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第306页。

②参见上书，第247—249页。

望"①。这就是说，它的目的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因此它并不争抢对各主教人选提名的权利，而注意实际操纵天主教士的一切活动。第二，教廷始终是做强国的附庸，它在四十年代就已勾结法国，《天津条约》订立以后，教廷就完全用法国护照派遣外国教士到中国；如果外国天主教士对中国官府有所交涉，也完全由法国领事馆办理。很明显，法国取得的保护权，实际上并不是根据国际条约，而是根据教廷的承认。第三，外国天主教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年，就力求法国的保护。1851年传教士召开宁波会议，全体联名呈书法国外交部请求保护，再让孟振生写信给部长，请他敦促法国政府多注意传教事业。同年上海会议，各主教还联名呈请教皇把保护权交给法国。信已拟好，但没有发出。法国教士曾公开宣称传教事业对法国将来侵略中国的重要②。所以就法国教廷和传教士三方面来说，都认为天主教和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事业对殖民侵略的作用，曾毫不隐讳地供认："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象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③。事实正是这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传教士中的头面人物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等，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他们或大肆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间谍；或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和掠夺中国权利出谋划策，充当谋士；或和鸦片贩子狼狈为奸，参与贩卖鸦片和为鸦片贸易辩护。这说明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从一开始就把传教士作为侵略

①A. Thomas：《Histoire de La Mission Pekin》，Tome Ⅰ，第245页。

②HUC：《LeChristianis me en Chine》第1卷。

③杨真：《基督教常识》。

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

（二）法国天主教会鼓吹侵华战争

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不仅在中国的沿海口岸大肆活动，而且非法潜入中国内地，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作准备。他们擅自在中国领土上划分自己的“传教”范围，以传教的名义，暗中进行间谍活动。在这方面，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显得猖狂。

1838年，罗马教皇不顾葡萄牙的反对，废除了它在中国的保教权，北京教区的主教座位也由葡萄牙人让给了法国人。直到十九世纪末，保教权始终控制在法国人的手中。至1890年，在山东南部出现了德国保教权，才破坏了法国保教权的完整。

1840年，英国首先发动鸦片战争。清朝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除向英国交出巨额赔款并割让香港之外，还承认英国享有五口通商、领事裁判等权利。法国侵略者对英国人捞得的这些实惠自然非常羡慕。这时候，在中国活动的大量法国教士充当了法国侵略者的内线和响导。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的自由，岂非轻而易举？”①法国传教士古伯察(Huc)

①包尔腾（J·S·Burdon）：《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第269页。

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①法国传教士这样公然为其本国的侵略政策服务，可见其行径与其"劝人为善"宗旨多么不相称。

果然不负法国传教士所望，第二年即1844年，法国政府就派遣拉萼尼（Lagrene）率领舰队来华，强迫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教堂的责任。1846年，拉萼尼又强行要求清政府对天主教"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②。从此，法国传教士的活动就更加猖狂起来，虽然清朝政府明文规定"外国之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但传教士都以领事裁判权为护符，有恃无恐地在中国的神圣领土上横行不法。

此前，于1835年来中国的法国天主教遣使会神甫孟振生（Mouly C. M.）。由于在京师无法传教，便潜赴内蒙察哈尔盟的西湾子村（今属河北省崇礼县）进行秘密传教活动。当时的北京，由于嘉庆十六年的教案，乾隆时的东西南北天主教教堂，除去南堂未毁外，其余全部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毁掉。1820年，北堂教士南弥德又因间谍案被逐，离开中国，随后高守谦到北堂坐守六年后，又离京返澳门。当时住在北堂的中国传教士薛玛豆离开北堂，到南堂去住。两年后，薛又到口外西湾子藏匿，以避查拿。后来，隐居京师暗中从事活动的三个中国传教士在法国教士毕学源死后，避居口外。从此，北京教区教士绝迹，一直到《江宁条约》签订。

①包尔腾：《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第269页。

②《教务纪略》，第3卷。

薛玛豆抵西湾子后，即派人赴澳门与国外联系。西湾子原系北京教区经营多年之地，地区偏僻，教徒较多，能避官府查拿。北京教堂被毁后，这里成了北京教区的根据地。法国教士孟振生（1807—1868年）、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 1813—1868年)、翁羊铎（Laurent Carayon 1814—1848年)、林安当（J. Ant. Simand 1799—1871年)等人陆续赴西湾子。1842年，孟振生升为蒙古教区主教。1846年又改任为北京教区的主教，但仍兼任蒙古教区主教，直到1857年才卸去兼任。他是西方殖民者称为"十九世纪远东教士中最有功有名"的一个侵略分子①。法国遣使会在蒙古教区的传教士，以察哈尔盟的西湾子村为中心，经常"在北方远近各处，遍历循行视察"，并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一带活动，企图把西湾子村"作为天主教向西播种的起点"。孟振生更野心勃勃地在鸦片战争前夕，"确定了对于蒙古民族传教的方针"，以后又进一步对中国西藏地区发生兴趣，1844年派遣了两个传教士经青海到达拉萨。他对中国边远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具有极大的野心②。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教士肇事而起。

（三）德、意与法国争夺传教保教权的实质

《北京条约》以后，法国对中国天主教会的保护权发生了一些变化。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第三共和国成立。共和党虽然对保皇党天主教士是敌视的，但是对国外天主教保护权却十分重视。教廷照旧把法国看成是保护者，对德意志帝国和统一后的意大利却很冷淡，虽然在七十年代德、意两国也都注意到天主教的保护权问题。1876年，澳门主教请驻广州法领事给葡教士护照

①②参见隆德里：《西湾圣教源流》。

赴海南岛；西班牙在福建的教士也使用法国护照①。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意大利企图取得对本国教士的保护权，结果没有成功，原因是教廷支持法国的保护权。1885年到1886年，李鸿章和教廷曾磋商互派使节问题，当时教皇对法国，不满，便答应互派使节，并定了人选，终因法国的反对而收回成命②。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华的天主教教士都觉得他们自己不过是在为法国政策帮忙打杂。

从《天津条约》签订到1870年中国各地纷纷发生“教案”，揭露了外国教士的不法行为。清政府也不得不注意这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在1870年2月9日，总府衙门请驻华英使阿礼国带了一个文件递交英国政府，并由英国转给各国。这个文件的主要意思是要取消外国的在华天主教保护权。它建议：

> “妥定章程……使传教士如中国僧纲道纪等司，均归地方官管辖。……传教士既欲久居中国，……不欲被中国人民歧视，自当与中国人民各习各教……同归地方官管辖”。③

这就是说，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对在华教会有所谓保护权。次年，清政府又将《传教节略》和《传教章程》散发各国，请它们“议办”，结果都被拒绝。法国的态度最蛮横无理。狐假虎威的教廷，对上述几个文件中所提到的中国人民对教士许多罪行的控诉，完全装聋作哑，而对法国的态度却竭力为之辩护，因为教廷知道法国是“利用教士做政治甚至军事侦探”的④。教廷的奴颜婢膝，证明它实际上是法国的附庸，是和中国人民为敌的。1870年以

①Corderi：《Histoire des relatations de La Chine》，II，第637—8页。

②见前引A·Thomas之书，第2卷，第611—615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2卷，第13页。

④Michie：《Missionaries in China》，London（1891），第32页。

后，教廷完全投靠了法国。

但是别的国家对此是不甘心的。从1878年教皇里奥十三即位以后，德国曾向他表示好感。由于德国是新教国家，教皇不能公开准许它有保护权，但也不能象对待意大利那样去阻扰它。1882年，德国驻法国公使曾向法国政府提出要求，要保护德国在中国的教士。1886年驻华德使巴阑德(Von Brandt)为了交涉铁路的一些问题到天津，见李鸿章时又提出这个问题。两次都没有结果。1888年夏天，德、意两国同时向中国提出保护他们本国的天主教会的要求，总理衙门不敢反对。到了十一月初，两国就分别通知法国，说它们已经和中国取得协议了。关于协议的内容，中国与德、意两国的说法不同。据德、意两国说，这个协议规定：（1）中国承认两国签发它们本国教士的护照，这可以使他们享受最惠国的权利和待遇；（2）对法国发给德意两国传教士的护照，中国拒绝签证。而总理衙门却告诉法使李梅(Lemaire)说，中国只承认德、意给它们本国教士的护照签证，但对法国所给所有各国教士的护照签证，中国也都承认①。这和德、意两国对法国说的显然冲突。当时法国并不重视中国方面的意见，它促使教皇设法破坏这项协议。在教皇的影响下，意大利教士拒绝接受本国的护照，仍旧找法国签证。

但是，德国尽管是新教国家，教廷却不敢惹怒它，对它的所作所为抱着敷衍的态度。德国首先利用在山东南部布教的安治泰（Anzer）向教廷提出要求②。接着德使巴阑德（他也是基督新教教徒）向教廷表示极强硬的态度。法国的外交部被迫让步了。教廷的处理办法是：让安治泰代表德籍教士自己挑选要德国

---

①Corderi：《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II，第73—79页。

②Thomas：《The Case for China》，第193页。

还是要法国保护。安治泰原属德国人在荷兰成立的“史泰勒教会”（Steyl Mission）。但他却诡称，他本来不愿意接受新教国家的保护，但是他怕德国政府对他的教会有所不利。实际上，德、法教会保护权的争夺是德国侵占山东的先声，德国教士早已拿着法国签证的护照替德国服务了。1890年安治泰回柏林时，德国皇室和政府对他的接待十分隆重。不久他便向教廷提出德国的保护权，次年一月，教皇就答应了。安治泰从此名声赫赫，俨然以德皇的代表、山东的太上皇自居。“对中国总理衙门，他用的是盛气凌人的口吻，对地方官吏，他是上峰一般地走进走出他们的衙门，把他所不喜欢的官吏报告上级官吏以至北京政府”。①

从此以后，法国的天主教保护权日渐削弱。然而法国并没有死心。十九世纪末年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到处高涨，法国就以保护者的资格迫使清廷在1898年一连下好几个特别保护教徒的命令。清政府觉到太麻烦了，就在次年3月16日发了个“上谕”，准许天主教直接与各地官吏平等交涉。其原意是籍以减少帝国主义者利用保护权所起的纠纷，结果却长了教士的威风。他们自认为和地方官吏处于平等地位或自居为官吏，因而自认为取得了对教徒们有某种程度的民事管理权②，法国保护权倒没有受什么影响。

法国对中国天主教保护权的终止，是由于1905年法国和梵蒂冈的绝交。1906年1月，法公使通知中国，此后法国只保护本国的教徒。1908年清政府也收回了1899年3月16日的“上谕”。此后各国都单独保护他们自己的教士。帝国主义国家公开争夺天主教保护权的问题，虽然已结束，但是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的阴谋并没有终止，教廷所找的靠山，一个比一个更凶恶。

---

①Thomas：《The Case for China》，第13页。

②Latoureffe：《A History of Christian in MissionChina》499－500页。

三、基督新教入传中国及其侵略活动

（一）马礼逊——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基督新教传教士

基督新教在历史上叫更正教、耶稣教。此教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大陆进行活动，始于十九世纪初，远比天主教和东正教为迟。

在十七世纪初期，基督新教曾有传入中国大陆的尝试。荷兰殖民者曾于1624年武装侵占中国的台湾，1626年即派遣传教士到台湾活动。这批传教士在台湾传教二十多年，吸收了上千人入教，开办了一些初等教会学校。但后来由于荷兰殖民势力在日本的基督教活动受到打击，因而限制了传教士在台湾的活动。1662年，郑成功把荷兰殖民者从台湾驱走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台湾的活动也随之被消灭①。

后来，基督新教又进行过几次尝试。据乔治·弗克斯（George Fox）的日记载："在1661年有三位教友，名叫施丹白（John Stubbs）、考司曲路（Richard Costroppe）、福尔（Henry F. Fell），他们很勇敢的开始到中国传教，经过了不少的困难。"但却未能抵达中国。

莱伯尼志（Leibnitz）对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非常感兴趣，因此，提倡东正教徒也照样去做。他希望把各教派联络起来，在中国组成一个没有派别的教会。虽然这一倡议得到各方面的赞同，但没有实现。1798年，牧师马锡兰（Mosley）在美国请求把圣经译为中文。1801年，伦敦国外布道会曾讨论过派传教士到中国的问题，决定先筹备一笔款子，以便将来使用。同时，外国圣经

①《中国丛报》，1851年8月号，第541—545页。

会主张印刷博物院里的《圣经》，以便散发到各地去。

此前，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前来中国，次年抵达北京后即向乾隆帝提出十一条要求，其第七条即要求准许英国派传教士到中国自由传教，但遭到拒绝。英国这时已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兰西，夺取了海上霸权，竭力向外扩张殖民势力。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在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国内纷纷成立对国外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机构。其中较著名的有，1792年成立的浸礼会差会，1795年成立的伦敦会差会，1796年成立的苏格兰差会，1800年成立的基督会差会等。这些差会训练了一批传教士，并陆续地将他们派往非洲和亚洲的印度、缅甸等国活动，并为到中国作准备。

到十九世纪初，基督新教十分注意前往中国传教的工作。1805年伦敦布道会(即伦敦差会)派遣马礼逊(Robert Marrison到中国。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当时基督新教极力主持在中中国传教的，有三个人：一个叫卡茉（Carey），彼时他在印度建立了传教团体，并积极准备来华；另一个叫麦西门（Marshman），再一个就是马礼逊。最后，“伦敦布道会”选中了马礼逊。

罗伯特·马礼逊，英国人，生于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他是基督新教中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牧师。当伦敦布道会命他选择非洲或中国时，他决定把中国作为其目的地，便开始学习中国文字，请了一位名叫杨善达的广东人做他的教师。同时，从伦敦博物院里找到一本不完全的中文《新约》，天天照样子，小心誊写。这本残缺的没有翻译者姓名的《新约》，就成为后来马礼逊翻译《圣经》的根据。中国当时海禁甚严，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内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也不许传教士乘坐，原因是耽心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马礼逊只好先到美国，再从美国乘船过太平洋到中国来。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9月8日，马礼逊到达广州。他

秘密地寄居在一个美商货栈里，学习中文，在生活起居上仿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后来他暂赴澳门居住。在澳门时，他认识了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玛丽·摩登小姐，他们产生了爱情，遂于1809年结了婚。东印度公司也在这时聘请他为中文翻译，做了公司的职员。这样既可以免去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担心，又可得到公司的薪水，不再依赖布道会的津贴，还可以借此进一步研究中文。伦敦布道会也赞成他的做法。从此，他便一面办公，一面翻译《圣经》，常往来于澳门、广州之间。

伦敦布道会交给马礼逊的任务是：

> “由于我们对你可能立足的地点不能肯定，要给你规定任何明确的指示限制你的行动将是非常不恰当的。我们有必要授权给你，可根据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个场合方便行事。……我们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机会担任数学家的职务，对数学各个分门进行讲学，也可以教授英语。……我们坚信你能住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等到你能达到学会汉语的大目标。……你也许有幸可以编一本汉语字典，……或更有幸地翻译圣经”。①

马礼逊独自工作到1813年，才由伦敦派米怜（Milne）来到中国。由于遭受官府及公司的反对，米怜不能在澳门和广州安身，只好到南洋群岛去找立足之处，后来到了马六甲，在那里帮助马礼逊刻版印书。帮助马礼逊作印刷工作的华人蔡高，于1814年的重阳节那一天，在澳门一个幽静的海湾中，接受了洗礼，做了中国基督新教的第一个信徒。1816年，马礼逊随英国专使阿美士德以翻译身份到过北京，但没有立稳脚跟。

马礼逊努力从事翻译《圣经》与撰著布道通俗小册子的工作，

---

① 《马礼逊回忆录》，第1卷，第95－97页，“伦敦会给马礼逊的指示”，1807年1月20日。

这时他已经完成的有《使徒行传》、《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说》、《耶稣教法》以及《旧约创世记》等书，并且正准备编辑《华英字典》。这不但引起了中国官府的注意，开始搜捕印刷刻版的人，同时也招来设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对他的不满，要辞退马礼逊的职务。公司曾经给他写信说：

> “本部所说先生印刷中文圣经和劝世文，引起中国反对，皇帝下有谕旨，禁止这书，并要重治相帮的人，我们想这样作去，与贸易总受影响。现下议决，公司辞退先生职务。”①

上面提到的蔡高兄弟等以及1816年在马六甲入教的梁发，都帮助马礼逊做印刷工作。在中国基督新教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曾与米怜在马六甲共事三年。他除帮助翻译印刷之外，还于1818年帮助创办了一所“英华书院”，后来这所学校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至今尚存。梁发热心于撰著布道小书，写了一本叫《救世录撮要略解》，书末附有几段经文、三首圣诗和十诫，此书虽只37页，却是第一本中国人自著的中文布道书。他把书稿带到广州给马礼逊看，印了二百本，分送亲友。为此，清朝官府把他关进监狱，销毁了版本，并且牵连到马礼逊所印的书，连蔡高之弟蔡亚三也一并被捕。梁发被打了三十大板，血流至足，经马礼逊请巨商设法营救才得释放。

这时，马礼逊已经完成两大著作，一是《新旧约圣经》的翻译；一是编辑成《英华字典》。《英华字典》一书所用的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全书共六册，注解详细。印刷费需要一千二百英磅。到1833年，基督新教在广州已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团体，常在马礼逊家中聚集礼拜。梁发努力于小书的撰著与印刷，每逢乡试，便将一些小册子分送给赴考的生员。教士卫三畏（Samuel

---

①《马礼逊回忆录》，第2卷。

wells Willams)在1833来到广州，与梁发相见，曾经谈到过他的分书情形：

“他现在尽力从事于著书，而且已经派送过数千本了。不久以前在广州举行府试，有二万五千个童生从各县到广州来，梁发雇苦力数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贡院前面去，他在那里尽力把生命之道传播与这些智识阶级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个仪容可敬的老人，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权被取消后，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商务监督前来广州。7月5日，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召集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侨民，当众宣读了英国国王的命令，其中任命马礼逊为律劳卑的“秘书兼翻译，年俸一千一百英镑，可以穿上副领事的制服，缀上皇家的领扣”。马礼逊写信给他的妻子说：

“律劳卑宣布这项任务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我立即告诉他说，我愿意。……请你为我祈祷，使我能在所担任的新岗位上忠于我的上主。这对于一个传教士来说是颇不寻常的，穿上一身副领事的制服而不是传教士的道袍。”①

可是，马礼逊担任副领事还不到一个月，即由于过度兴奋和劳累，突然于8月1日得急病去世，终年五十二岁。们在中国苦心经营了二十七年，最终仍未能实现其进入中国内地的愿望。

就在马礼逊死去之前，美国基督新教的牧师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到十九世纪初叶对中国的贸易已上升为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相继设立了基督教差会，1801年设立“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1814年设立“浸礼会差会”和1820年设立“圣公会”、“美

① 《马礼逊回忆录》，第2卷，第624页。

以美会差会”等。

美部会成立之初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与英国伦敦会合作，在财政上互相支援，并了解关于传教前景和准备工作的情况。1811年，又派专人到英国打听中国情况和具体讨论合作方式。1820年，正式聘请马礼逊担任该差会的通讯会员。经过几年的准备之后，美部会选中了裨治文作为第一个从美国派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他于1830年2月到达广州。

继裨治文而来的美国传教士还有卫三畏和伯驾医生，他们是在1833和1834年先后来到广州的。此外，还有一名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又译为郭士立、郭甲利）于1831年底到澳门。他们都受到马礼逊的接待和帮助，并且把他在中国二十多年的经历告诉他们。

美国基督新教各差会，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和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关系。美籍教士一开始便和他们的政府勾结在一起，甘心充当侵华先锋，用诈骗手段和政治压力，巧取豪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光彩的事迹。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籍基督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就曾说过，他们之所以不远千里而来，“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①。1832年裨治文独自创办了一种期刊叫《中国丛报》（Chinese Respository），译为《澳门月报》或《中国文库》，他自任编辑兼主要撰稿人。内容是专门向外国人尤其是向美国人介绍当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特别着重鼓吹侵略思想，他以中国通的资格提供侵华的具体政策和策略。外国商人曾从这个刊物中了解到很多中国的情况。当时对中国的认识还很模糊的美国政府也曾深受这个“中国文库”的影响。后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等条约中的许多款项，就是根据《中国丛报》所提供的意

①《裨治文传》。

见拟定的。

（二）英、美教士的侵华活动

英、美基督新教在华传教士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二十余年间，特别是在战前的四、五年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搜集情报，大肆鼓吹采取强硬的政策来叩开中国大门；二是在中国为开展传教作准备。这两者既有区别而又有相互联系。

在搜集情报方面，郭实腊是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期间，他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有十次。第一次他乘坐一艘中国商船于1831年6月3日从暹罗出发，沿途经过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他在船中自言自语道：

> “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①。

郭实腊一路上仔细地刺探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于同年12月13日返回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马礼逊的欢迎和接待。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澳门的大班们（此系指公司贸易商船的负责人及贸易地的负责人），对郭实腊的首次沿海侦察成功十分满意，于是在1832年3月派遣“阿美士德”号武装间谍船，到中国沿海进行了六个多月的侦察活动，窃取了中国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和山东沿海等地的大量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绘制了航道、港口图，了解到清军的布防及军备废弛等情况，为后来发动鸦片战争作了准备。郭实腊积极参加了这次谍报活动。当时，

---

①《中国丛报》，1832年8月号，第140页。

“阿美士德”号船上共有七十多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负责测量河道、海湾和绘制航海图的船长因礼士（Captain Rees），主持调查侦察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的职员林赛（H. Hamiltion Zindsay），化名胡夏米）和充当翻译的郭实腊。郭实腊不仅会说流利的中国普通话，而且还会讲厦门方言。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以传教和行医为名，进行欺骗宣传，笼络人心，加上胡夏米在沿途大量散发《人事略说》、《通商事略说》等小册子来麻痹中国人，这就使一部分群众和一些清朝官兵，对这些以“传教”、“通商”作掩护的间谍，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福州有的官吏竟认为，郭实腊和胡夏米一伙来福州，“不是要伤害和破坏我们的地位”，“深深觉得无须任何顾虑”①。上海附近的一处兵营，甚至连驻守吴淞的清军检阅，都让他们自由观看。他们把“阿美士德”号武装间谍船认为是“切望和平交易的商船”②。这就给这伙人窃取情报的活动以可乘之机。

是年6月间，郭实腊等到达上海后，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用了十九天时间在上海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

> “〔1832年〕六月三十日　上海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的左侧，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由于中国长时期享有和平，所以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烂。……我们还巡视了兵

①②福建师院历史系编：《帝国主义侵略福建资料汇编》第1册上。

营，……我们看到弓挂在墙上，没有发现箭，据他们说，箭存放在对岸。他们的武装极不一致，有些士兵有大刀，其余的有火绳枪，少数有矛，等等。他们所属的分队用大字写在他们的外套上。……大部分军官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从部队里升上去的。他们的工资很低，收入极少，他们的地位一点也不值得羡慕。许多将官都是满人，享有极高的工资。同有些文官一样，只要中国的这种和平局面继续下去，他们的官职不过是一个闲差使。”①

郭实腊等人到吴淞炮台刺探情报，遇有军人出来拦阻时，就拿出预先印好的基督教小册子散发，借口说是来传教的，以此掩人耳目。他对清政府在上海的防务详细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到这里来，整个中国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②郭实腊、林赛等把这次沿海航行的的情况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作了详细汇报。郭实腊说：“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已充分调查清楚，并向商人和传教士作了报告，要他们对这有利可图的地方引起重视。”③这次侦察航行进行了七个月之久，于同年9月5日返回澳门。

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夕，就是利用《中国丛报》向西方列强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包括中国的历史、自然地理、政治制度、风土人情，以及从清廷到地方各级官吏的情况。还有关于当时中国时事，中国进出口贸易数字，中国对英商交涉的评述，清政府上谕及大臣奏摺的译文和外侨对这些文件的评论等等。《中国丛报》在西方列强制定侵华政策中起着提供情报的作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和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沙克（J。Lewis Shuck），这一时期也在中国为西方列强搜集情

①郭实腊：《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第1532、83页。

①②郭实腊：《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报。

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传教士，为英国侵略者搜集情报也是不遗余力的。有个传教士把吴淞江通往内地的航道图秘密送给英军。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工兵队上校奥特隆尼（Quchterion y John）曾供认：

> “我军从一些传教士方面，获得了不少消息，知道中国政府认为我军一定沿着白河，要向北京进攻。传教士传递消息说，自从宁波为我军攻陷以后，清政府即用上一切力量，在预料我军所要进攻的道路上布防，建筑起各式各样的障碍物。清政府把天津看成是北京的一个海港，因而特别重视天津，希望将天津变成头等的防御阵地。”①

奥特隆尼还说，居住在长城口外（属热河）一个驻有清军的边界镇市上的传教士，把当地许多村庄铸造的铁炮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的情况，密告英军。而英军也积极帮助传教士进行活动。鸦片战争爆发后，参加侵华战争的“宁罗得”号军舰在窜犯舟山群岛时，便在岛上散发新旧约《圣经》。曾参加侵华战争的英海军军官宾汉（Bingham, J. Elliot）叫嚷：要使鸦片战争“能成为将耶稣教介绍到中国去的一种手段”②。事实上，英、美一些传教士跟随在英军之后，在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出现在中国厦门鼓浪屿、舟山群岛、宁波和香港等地，享受着英国侵略者用枪炮给他们带来的传教特权。

（三）《中国丛报》——侵略中国的喉舌

自从1834年律劳卑在广州进行讹诈遭到失败后，《中国丛

---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1页。

②〔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载《鸦片战争》（五）。

报》上就不断出现鼓吹采取强硬路线的舆论。这年的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侨（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作为后盾，英国全权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 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和勒索一系列特权。在华的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对此完全支持，说："我们对他们这样做找不出有什么错处，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达到他们所提出的全部要求。"时任《中国丛报》编辑的裨治文为此还作了如下"论证"：

"依我们看，请愿者是如实地提出了主要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纵然可能和请愿者在次要问题上有差异，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否则的话，一切过去的情况又将被漠视，让英国侨民'各自为政地'重与中国人打交道。

让我们首先谈一下，'沉默方式' 如采用这条路线，那末，过去的一切错误必将保存在案，并作为中国人和外夷未来交往的准绳。……采取这条路线，就要在天子宫中永远记录着大不列颠是一个进贡属国，恭顺地恪守天朝的律例。采取这条路线，所有外国人都是蛮夷，就要肯定下来并传之于后世。……不论我们从商业、政治、社会或道德的任何一个高度看，沉默方式的效果都是坏的。……

我们现转来考虑请愿者提出的路线。…… 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是必需的，正确的，得策的，因此是实用的。……我们从实际中知道伟大的造物主曾保证要将全世界都交给人类管理，我们无论如何或在任何情况下，

决不从上帝所保证的适当考虑和应该履行的一切责任退缩，不管它是社会的、宗教的或是政治的责任。……国与国之间是互相负有义务的，而中国，在他与别国的关系上，是公然触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这条法则的。中国这种态度，各国可以而且必须劝谏她。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她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①。

1835年初，《中国丛报》公然发出了战争叫器：

“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②

到1836年初，《中国丛报》刊载了《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提出了使用武力迫使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该文写道：

“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几个省的军队。……

中国，虽然是一个辽阔的国家，有三亿六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

中国当今的皇帝道光，是一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对于敢于反叛的起义者，他不是采取歼灭，而是吁请他们的领袖投诚，采用金弹和银弹同他们开展不流血的战争的办法。他说过不少反对扩大对外贸易的话，但是这

① 《中国丛报》，1834年12月号，第345—363页。

② 《中国丛报》，1835年1月号，第406—416页。

事如能由他亲自来处理(这在过去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倘若他开始觉察事态已是十分严重，对于我们的要求除了老老实实地接受别无他法时，我们确信在必要的时候他会悄悄地作出让步的。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得出几个重要结论：首先，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可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走向同中国人达到真正的和解的第一步，必须是从他们那里获得完全承认大不列颠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缔结条约时，必须重视获得使英国使臣能常驻北京的权利。要确定一个固定的关税，废止公行的垄断，完全准许我们在所有沿海有海关的港口和京城里通商。……

〔编者按语〕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的通讯员所说的我们还是要学会应该怎样对付一个高傲、半开化、专横的政府。……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①

1836年8月，《中国丛报》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情况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在不堪一击②。同年11月，《中国丛报》还把格拉斯哥东印度协会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份“备忘录”全文刊出③，为英国政府对华侵略制造舆论。

这份“备忘录”提出的八条意见，是为英政府后来强迫中国

---

①《中国丛报》，1836年2月号，第441—449页。

②同上，1936年8月号，第165—178页。

③同上，1836年11月号，第334—336页。

接受的中英《南京条约》的雏型。

（四）传教士与鸦片走私贸易

西方传教士不仅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民，而且肆无忌惮地大干鸦片走私的罪恶勾当，这样可以获得大量白银而发财，又能使中国人的身体和意志受到摧残，从而失去对侵略的抵抗能力。

他们对英国大量走私鸦片(包括美国在内)的罪行不加谴责，并且还是积极的支持者。传教士郭实腊不仅是窃取中国情报的间谍，而且还是鸦片贩子的同伙，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英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最大鸦片贩子查顿（william Jardine），打听到郭实腊既能说中国话，又久住中国，通晓风俗人情，就请他入伙贩卖烟土。查顿在给他的信中说：“此行（指贩卖鸦片——引者）的利润愈厚，我们也愈可多提一笔钱来供你支配，使你今后可用以促进你所抱的崇高目标；我们对于你的成就，是十分关心的。”①另一个鸦片贩子说：“郭实腊工作了三天，我给了他一千块钱。”②

1836年，义律（Elliot,C.）任英驻粤领事，请郭实腊为扩大鸦片销路出谋计策。郭实腊深知清朝各级官吏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当即向义律献了一条计策。他说：

> “清廷百事泥旧，毫无进步倾向，惟知傲慢自尊，不顾世界大势。要路显官，尽为私人奸佞之徒，惟苴苞是尚。朝廷命官多嗜好鸦片，故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③

义律听后大喜，当即委托郭实腊包办贿赂清廷之事。

---

①〔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载《鸦片战争》（五）。

②〔东德〕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7页。

③武堉干：《鸦片战争史》。

一般的基督新教的教士们在此间来华后，都或多或少地干着贩卖鸦片的勾当，就连伦敦布道会派来的马礼逊，也是一面传教，一面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并替该公司批售鸦片。在东印度公司的机构中，设有专职牧师，以便把鸦片与传教结合起来。马礼逊于1834年死后，他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继承其父衣钵，继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兼传教。在鸦片战争中，小马礼逊与郭实腊一样，都是臭名昭著的侵华谋士，他在战争期间，曾七次乘船到安徽内河窃取情报。

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暴利，大规模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清政府财政日蹙，并腐蚀了清朝各级官吏和士兵，从而给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这种罪恶行径受到了当时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连当时英国人蒙哥米利·马丁（Montgomery Martin）都认为，英国贩卖鸦片是极其不人道的罪恶行径。他说：

> “贩卖鸦片者在使不幸的人们的精神本质腐化、堕落和毁灭以后，还毒害他们的身体，而每时每刻都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者。英国的杀人犯与中国的服毒自杀者互相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①

传教士的利益与贩卖鸦片是息息相关的。郭实腊就曾与鸦片贩子共同分赃大笔不义之财。不少传教士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来到中国，也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及商人手中接受捐赠。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都是免费乘坐美国鸦片商奥利芬（Olphant）的货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奥利芬商行曾免费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81页。

运载来华教士五十多次。所有美国传教士（也包括部分别国传教士）来华后都由奥利芬商行接待，安排住房，不收费用。对于传教士从事出刊物、建医院、办学校、开工厂等配合宗教侵略的活动，奥利芬商行也都给了大力支持。英美传教士于1838年在广州成立“中国医药传教会”，得到了怡和洋行老板、大烟商查顿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主持了“中国医药传教会”的成立典礼，而且还被选为该会的副董事长①。凡此种种充分说明，传教士确定与鸦片贩子狼狈为奸，积极参与鸦片贸易的罪恶活动。

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鸦片贸易，而且还煽动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当时，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提出了一个口号：“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美国长老会教士倪维思（J·Z·Nevius）说：鸦片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②。

上述传教士与鸦片贩子之间的肮脏关系，及其对英国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的无耻颂扬，充分说明了一些传教士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忠实工具。就连英国人自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承认这一点：

> “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所进行的工作。”③

基督新教跻入中国后所进行的活动，都是为本国和西方侵略

---

①E·V·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977年版，第72页。

②J·W·Fosth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第73页。

③[英]诺尔斯著，袁绩藩译：《英国海外经济史》，第一卷，转引自《英国皇帝殖民学院纪事录》一书。

者服务的。这与早期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迥然不同。如果说早期耶稣会士是抱着传播信仰而有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话，那么近代史上的传教士，他们来华的目的则完全为本国的统治集团服务——进行海外掠夺及军事入侵，是列强吞噬中国的帮凶。

四、“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一）美国牧师伯驾的战争叫嚣

鸦片战争前，有些西方学者和国会议员及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人类道德立场上，曾猛烈抨击本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贩卖鸦片的卑劣行径，坚决反对对中国发动不义的侵略战争①。

而那些在十九世纪踏上中国国土的基督新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甫却奉行着“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信条，抱着要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②的信念，他们竭力鼓吹战争，煽动英国侵华决策者的狂热战争情绪，叫嚷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③。

同时，传教士们也设法从别的方面打开中国大门。故此，他们乃乔装出慈善的面孔，唱着“圣洁”的“赞歌”，向中国人民推荐

---

① 〔英〕格林堡·米迦勒：《The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第一章有关内容。

② 〔美〕卫斐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列强的使团》，1912年版，第119页。

③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载《鸦片战争》（五）。

吸食那些连教廷和他们本国政府都列入违禁使用的鸦片。他们竟然胡说什么："鸦片无害于中国人，象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①

当然，对传教士来说，打开中国大门，"开放"中国的最好办法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正如当时一位美国资产阶级作家所揭露的那样："用武力来开放中国的侵略性"，是"完全符合对传教士团体一开始就存在的精神。"②在这种精神之下，刚踏上中国土地不久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就竭力要求本国政府尽快以保护本国在华商业利益和侨民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

其中，最早提出"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口号的是美国基督新教牧师伯驾，他在1834年启程来华时就反复强调他的这一主张。他在澳门开设了一座眼科医院，生意兴隆，于是伯驾便借此广交中国各阶层的人士，收买人心。伯驾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从"开放中国"、设法使美国经济政治势力侵入中国这一动机出发的。鸦片战争前他曾向林则徐"恳切"建议，说只有和西方国家结个条约才能彻底解决中西间的纠纷，促使清政府主动用和平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要求。战事发生后，伯驾急忙跑回美国，向范布伦总统（Van Buren）及国务卿福赛斯（Forsyth）呼吁，应该"直接并且毫不迟疑地派遣全权公使到清廷去"。由于当时美国国内正忙着选举总统，他的呼吁未引起注意。新政府成立后，伯驾又向国务卿威伯士德（Daniel webster）多次提出这件事情。

---

①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1，第40页。

②〔美〕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第563页。

（二）英、美等国传教士在战争中的罪行

和美国传教士一样，英国传教士也玩弄了两面手法，他们一面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鼓动英国政府使用武力；一面却又向中国方面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抵抗准备，用西方的“船坚炮利”来进行讹诈，“劝说”林则徐屈服和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林则徐却用“打仗不怕”的凛然正气予以回答，击退了传教士的“和平攻势”。传教士见威吓不成，便把全部力量运用到策动本国政府发动战争上去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狂妄地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①因此，当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及侵华英军正副司令，4月英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并立即派兵开赴中国时，几乎所有的基督新教在华传教士都直接投入了这场侵华战争。

在持续两年之久的中英战争中，传教士们作为英方“特种部队”，随军征战，以实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口号。战争期间，英、美等国传教士完全剥下了“基督圣徒”、“传播福音”的外衣，成为英方取胜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下面仅举几例，以窥其作用。

战争开始时，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小马礼逊）和传教士郭实腊都摇身一变而成为英国政府在华的官员，郭实腊是直接从英国政府领取年俸800英镑的官方翻译，马儒翰也成了从英国政府那里领取年俸1000英镑的翻译官。他们都直接参加了英国侵略军的战争行动。由于郭实腊和马儒翰在中国混了多年，对中国各方面

①《中国丛报》，1840年5月号，第2页。

情况特别是对清政府各级官僚的昏庸腐朽和各地军备落后的情况十分了解，因而能在鸦片战争中为英国侵略者出谋划策，充当谋士，成为侵华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郭实腊抓住清政府妄自尊大的弱点，向英国侵略者一再献计说，只有采取“强硬”政策，才能制服清政府。英国侵略者从战争开始，直至谈判订约，都是按照郭实腊这个计策行事的。因此，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战争中，英军沿着长江攻打南京，切断漕运孔道的诡计，就是马儒翰提出来的。原来，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在攻陷镇江后，打算按预定的计划进犯天津，马儒翰便献策说：

> “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今但盘据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①

璞鼎查听后改变主意，随即攻打南京，使其阴谋得逞，马儒翰在随璞鼎查沿长江的军事侵略中，通过他的手，勒索了所谓扬州“赎城银”五十万两，南京“赎城银”三百万两。马儒翰供认，林则徐最恨他，说“小马礼逊最坏”②。连投降派、两广总督耆英也说小马礼逊是：

> “居心狡诈，善能窥伺内地一切情形，又能通汉语，习汉字，连年以来，阴谋诡计，主持其事者，虽不止伊一人，而多半听其指使，实为罪魁。”③

两江总督裕谦也曾出告示，生擒小马礼逊者“赏洋银三万元，奏请赏戴翎枝”④。可见，清政府也很清楚小马礼逊在鸦片战争中所扮演的侵华谋士的重要角色。

又如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和文惠廉，在战争进行中，也是异常

---

①梁廷枏：《夷氛闻纪》第4券。

②张喜：《抚夷日纪》，载《鸦片战争》（五）。

③④《鸦片战争》（三），第475、386页。

活跃的人物，他们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随后又有两名传教士到厦门协助英军。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后来又有米威怜（米怜的儿子）也来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眼科医局因战事暂停后，他回到美国，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再次大肆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美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后来，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裨治文等人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

传教士郭实腊在战争中也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作为英军的翻译官随英军侵犯宁波、镇海、定海和上海等地时，除参与英军抢劫中国的财物外，其主要活动就是搜集情报。英侵略军侵占上海前夕，上海居民把财物运走或埋藏起来，以防落入侵略者手中。郭实腊搞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向英陆军总司令郭富（Sir Hugh Gough）报告，要求赶紧攻占上海。郭富听后立即把英军分成水陆两路，进攻上海。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米琪在其《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说："许多传教士们疯狂地勾引中国人背叛祖国。"郭实腊正是这样干的。英军占领宁波、镇海、定海后，郭实腊被英国封为管理宁波的最高官员，他不仅亲自窜进当地衙门窥阅文书档案，而且还收买罪犯、流氓、赌棍等充当英军的探子。汉奸陈秉均招供，他因犯罪被判充军，遇赦释放后，被郭实腊收买，到浙江慈溪"探闻军器银两名物，均在乡间，当即回去告知郭实腊"；他又"常在各处茶馆探问军情，后来又打听打仗日期，也曾告知郭实腊"。每次探事，郭实腊给"洋钱一二元不等"①。汉奸虞得倡供认，他以开妓院为业，在宁波陷落时投靠郭实腊。

①《鸦片战争》（四），第272页。

郭实腊把宁波殷氏娼妓的两个女儿作为老婆，并把虞得倡收为义子，“人皆称为虞二舅爷”。郭实腊任命他为巡捕总头，他“乘势擅作威福”，“势颇显赫”。他招募五十人，组成“汉会”，替郭实腊“探听大兵虚实，并搜查附近潜伏兵勇”①。郭实腊每月各给洋钱二十元。郭实腊还以每日五百文钱收买慈溪鸣鹤场人顾保林为内奸。据顾保林招供，他“常替官兵送信，就便替郭实腊探听消息，两边讨好”②。由于郭实腊千方百计收买汉奸，充当英国侵略者的走狗，“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因而连清政府进兵宁波的日期，都事先为英军获悉。郭实腊收买汉奸远不止上述几个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此外，传教士还诱骗中国人入教。不法教民助纣为虐，也充当汉奸。当时有人尖锐指出：“逆夷之教，厥名天主，杂居城市，输情于敌矣。”③故欲除汉奸，“非严究天主教不可”，因为“汉奸多奉其教也”④。

这场侵略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传教士们认为他们所倡行的“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信念，即将实现，于是便纷纷以征服者自居，大谈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伟大功勋”。例如，1842年2月14日，一个在华传教士给另一个外国教士写信，信中说：

> “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陷落。……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的。
>
>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我是一个洋人，又是一个传教

①《鸦片战争》（二）、（三），第183、274页。

②《鸦片战争》（四）第277页。

③《鸦片战争》（五），第510页。

④《鸦片战争》（三），第204页。

士，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

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①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在中英谈判签约过程中，还是由马礼逊和郭实腊担任翻译，一切谈判全由他们来往传说，所有条约起草都由他们包办。小马礼逊态度蛮横，“多方要挟”，扬言清政府如果不割让香港，不开放五口为通商口岸，英国政府“则惟有战而已”②。由于他们在侵华战争中十分卖力，因而深得英国政府的赏识，马礼逊被任命为香港立法委员兼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秘书，郭实腊也被任命为香港殖民地政府秘书。

在伯驾等传教士的鼓动之下，美国政府于1844年2月派遣顾盛（Cushing，C.）率领订约使团抵达澳门。美国国外传教事务局表示愿为顾盛赴华提供支持。顾盛事先写信给伯驾，请伯驾做他的助手。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一起担任顾盛的秘书兼翻译。在谈判中，伯驾利用清政府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产生的惧外心理，一再鼓动顾盛采用武力胁迫清廷屈服。伯驾恐吓清政府的谈判代表说，美国在中国水域有三艘军舰，还准备再派出三艘来华。他甚至扬言美舰要北上天津。顾盛和伯驾等人通过武力恫吓，强迫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比《南京条约》内容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其中规定了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的特权。伯驾在1844年8月1日的一封信中得意忘形地说：

“美国几乎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切。其中一项重要

①卡理·埃尔维斯：《中国与十字架》，第189页。

②袁陶愚：《壬寅闻见记略》，载《鸦片战争》（三）。

成就，就是准许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建立医院和教堂的条款。从政治上说，建立起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而且在英国条约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进一步的重大商业利益。”①

由于伯驾在签订《望厦条约》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青睐，被委任为美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此后伯驾侵华活动越来越猖狂，曾露骨地鼓吹美、英、法联合行动，共同侵占中国，从而使他步步高升，1855年被任命为驻华公使。

《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签订以后，传教士不仅得到五口传教的“合法权”，并且获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所谓治外法权。他们这时的兴高采烈，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美籍浸礼会教士沙克（Shuck）就曾在当时这样描写过内心的喜悦，他在给所属教会的信中写道：

“我此刻得能向你报告一个光荣的消息，大不列颠已经和中国签订和约，这个异教的国度，现在终于被攻打开了。”②

伯驾也情不自禁地宣布：

“一个崭新的时代现在已经来临。”

他们甚至叫嚷什么：

“（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③

---

①E·V·Gulick，《Peter Pa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第12页。

②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62页。

③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吃了侵略军的苦头，被迫缔结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以慈善为本的英美传教士反倒从中渔利，为中国出现的灾难而欢欣鼓舞，伪善者的面貌，不是暴露得清清楚楚了吗？难怪一位曾被马克思称赞为“对基督教虔诚而非常出名的”①基督教信徒——豪伊特，在他编写的一部史书中，无情地揭露了当时传教士的真面目。他写道：

>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全世界一切地区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行为和不顾死活，乃是人世间任何时代、任何其他人种，不论他们多么残忍，多么无知，也不论他们多么狠心和无耻，都是无法跟基督教人种相比拟的。”②

法国侵略者对英美侵略者通过鸦片战争捞取大量侵华特权，垂涎欲滴，不甘落后，乃于1844年8月派遣刺萼尼（de Lagrene T·M·M·J.）为缔约专使，带领八艘兵船到达澳门。清政府同样经不住刺萼尼的讹诈，被迫又与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还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就给清政府增加了保护教堂的义务。根据这项条款，法国侵略者威逼清政府弛禁天主教。1846年2月清政府被迫下令，不许各地方官吏再查禁天主教，违者加以处分；同时命令各地将康熙年间所建造的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外，一律发还给教徒。清政府一百多年来的禁教至此废止。此后，大批西方各国传教士，举着十字架，与西方商品和资本同步，象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了中国，

---

①《马恩全集》，第23卷，第820页。

②豪伊特：《殖民地和基督教，殴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英文版。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新的灾难。这种灾难的降临，“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叫嚣，确实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五、另一个侧面的评说

十九世纪以来，天主教士改变了对华的传教政策，基督新教也踏上中国土地，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为本国的政治服务，从事搜集情报的间谍活动，是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也应当看到，传教士在此期间也曾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文化事业作为招揽人心的手段，这在客观上对中国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传教士在华出版书籍和创办报刊

前面谈到，基督教伦敦布道会牧师马礼逊在沟通中英文化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他把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并在中国开始传播，是马礼逊第一个把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的另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是编纂《华英字典》，1817年在澳门出版了第一卷，到1823年陆续出齐六卷，四开大本，共四千五百九十五页，仅从《康熙字典》收进的汉字加以英译就达四万余字。1824马礼逊因病返回英国，带回“价值在两千英镑以上”的中国书籍约10000卷，这是他在中国陆续收集的。他向英国国王乔治第四呈献了一部他译的汉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国王通过他的大臣传旨：“对这位绅士的卓越的和有用的工作表示他的高度嘉奖。”①

① 《马礼逊回忆录》，第2卷，第254—255页。

此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时，除了搜集情报、鼓吹采取强硬政策以叩开中国大门的政治活动外，还在南洋出版书刊、在广州商行内开办医局和在广州、澳门创设小学校等。为在中国广泛开展传教活动作准备。

在出版方面，除马礼逊的著述外，米怜还在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用汉文刻印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在南洋出版的一种汉文月刊，共出了七卷，1821年停刊。撰稿人有马礼逊、麦都思等。除在南洋华侨中分发外，还秘密运进广州、澳门等地散发。米怜在该刊第二期上登了一篇论述办刊宗旨的文章，他写道：

> “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也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义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延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扶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作始虽简，将毕必巨，若干人创之于前，若夫发扬光大，则后之学者，责无旁贷矣。是故不揣简陋，而率尔为之，非冒昧也，不过树之风声，为后人之先驱云尔。”①

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基督教所办的最早的汉文期刊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创刊，1834年迁至新加坡，由郭实腊负责。1835年冬又移交给“实用知识传播会”负责，到1837年停刊，共

①米怜(Milne)：《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刻，第1卷，第2期。

出了四卷。

在外文出版方面，比较重要的就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而在世界上又保存无几的《中国丛报》。是由马礼逊倡议创办的，编辑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后来卫三畏也参加编辑工作和负责印刷发行业务。广州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利芬提供开办经费和印刷场所，并想承担亏本补贴。1832年5月因战事发生，迁到澳门，1844年10月迁往香港，后来又迁回广州，到1851年12月停办，共出了二十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间有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等方面的调查材料，其中包括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等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重要参考材料。各国史学家对该报记载的资料，极其重视。

1834年11月29日，英、美在华侨民以鸦片商马地臣和传教士兼鸦片售卖的郭实腊等人为主体，组建了一个叫“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单从该会的“宗旨”看，是一个学术性质组织。担任该会秘书的郭实腊在说明该会“宗旨”时说：

> “本会的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要采取适当措施不仅能在广州，而且能在全国流通。”

接着在该会的“通报”中又写道：

> “我们现在作这个实验，是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她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我们路程的终点是遥远的，壁垒是很高的，路途是崎岖的，通道是艰巨的。因此，我们的前进可能是缓慢的。我们准备它可能出现各种意外，也知这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欢呼这项事业的开始，并欣然参与这一场战争。我们必定是胜利

者，而被征服者遭到的只能是共同的雀跃和欢乐。”①

1835年10月19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广州举行第一届年会。裨治文在“公务报告”中说：

“本会迄今还没有发出一本书给中国人。……目前在编译的有三种准备出版，第一部是世界通史，第二是世界地理，第三部是一幅世界地图。”②

这个空有虚名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继首届年会之后，又於1837年3月10日、11月20日和翌年12月8日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届年会，然而，仅仅是开会而已，并没给中国人带来任何的“学艺和科学”。到了1839年，这个会的成员几乎全部都介入了侵华战争，该组织也就声销迹匿了。留下的，仅是把别人出版的《伊索寓言》等书杂抄而成的两卷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而已。

（二）传教士在华办学、兴医

在办学校办教育方面，传教士们的客观积极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第一所教会学校，是基督新教创办的。马礼逊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在南洋的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由马礼逊的传教助手米怜任负责人。后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该校迁往香港，接替米怜负责校务工作的是美国传教士理雅各。

马礼逊去世的翌年(1835年)，驻在广州的西方各国的商人、商务监督、传教士，在英国大鸦片商查顿和颠地等人的倡仪和组织下，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Chinese Respository》1835年1月号登刊了该会组建的宗旨，其中提到：

---

①《中国丛报》，1834年12月号，第378—384页。

②《中国丛报》，1935年12月号，第354—391页。

"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那末，我们的后世将在不远的日子里，看到中国人不但为了商业、知识和政治的目的正在访问欧洲和美国，而且在抛弃他们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后，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在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①

1836年9月28日，"马礼逊教育会"在广州正式成立，颠地任主席，并向英美国内开始了募捐活动。几位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异常欣赏英美在华侨民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他们推荐了本校的高材生塞缪尔·布朗来华执教。

1839年11月4日，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并非单纯的教会学校）在澳门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这就是著名的"马礼逊学堂"，最初共有学生六名。学校的创办，使布朗大为振奋，他在报告中说：

"（1839年）十一月一日，我们搬进教育会购置的屋中，四日上了课，有六名小学生。……我们安排他们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六点钟开始，到晚上九点钟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露天场地上运动和娱乐。……孩子们和我家庭混合在一起，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生儿子，鼓励他们对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做他们的最好朋友。他们可以自由地参加我们家庭的早晚礼拜。简言之，我们是在努力使他们感到是同在家里一样，给他们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教

① 《Chinese Repository》，1841年10月号，第569—240页。

育。”①

这所学校是传教士向近代中国传播科技文化的第一所“洋学堂”。这所学校的学制为3—4年，开设的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学、地理、历史、音乐等。许多近代改良思想家是从这所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如近代改良家容闳及中国近代第一位著名的西医黄宽都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他们也是近代第一批去欧洲留学的中国青年。1846年9月，塞缪尔·布朗夫人回美国时，容宏、黄宽、黄胜等随同去美国，1847年1月4日出发，同年4月12日抵达美国纽约。

容宏等在布朗和其他美国朋友的帮助下，进了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读高中。容宏、黄宽学习两年毕了业。黄宽后来前往英国升学，考取了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学生。经过五年学习，他于1857年回国，在广州博济医院行医和培养中国第一代西医，为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

容宏留在美国升学，他考取了耶鲁大学，在布朗等美国友人的帮助和他自己在该校图书馆工作挣钱自助的情况下，经过四年勤奋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并于1854学成回国。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基督新教教士塞缪尔·布朗做出的贡献是显著的，他以教员的身份驻华八年，对发展中美文化交流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礼逊学堂后因师资缺乏、经费困难而于1849年停办。继之而起的是带有利用宗教侵略性质的教会学校在香港和五口陆续开办。

关于医疗事业方面，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客观上也作了些有利

---

①参看容闳：《我在帝国和中国的生活》第1和第2章。原版为英文，1909年在美国出版，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了英译本，题名为《西学东渐记》。

于中国的事情。当然，对其中有些以开办医院为手段，配合本国政府的侵略的传教士的作用，这是首先要认清的，如美国传教士伯驾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与上面所提到的塞缪尔·布朗等传教士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对伯驾一类的客观积极作用，也应予以肯定。

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是美国人伯驾，他于1834年10月受美部会的派遣到达广州。1835年11月4日第一所基督教开办的医院“眼科医局”在广州开张，因为伯驾由伍浩官（即伍怡和、伍敦元，又名郝华）在十三行内的新豆栏街上的丰泰行租了一些房间作为居所，故当时一般人称该院为“新豆栏医局”。

伯驾的眼科医局开诊后，六个星期内就有四百五十人到该医局。东印度公司的哥利支医生在这个医院工作，这位国际友人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从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十六、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献身精神再现。为了解除中国人民患疾之痛苦，他在要求英美尽可能多派医生来中国的“呼吁中”中写道：

> “我所建议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教徒们，为了改善中国人民世俗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这个帝国的亿万生灵要求我们的关注。为此让我们学习在他们中间行善，向他们展示奠基于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这样基督教的传播就是它的必然结果。”①

接着，1838年2月21日哥利支医生倡仪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哥利支被推为会长。这年四月，他同副会长伯驾、董事查顿联合签署了一份本会的宣言，宣言称：

“第一项公开行动，即成立一个新会社的组织，已

---

①《Chinese Respository》，1835年12月，第386—389页。

经完成。……本会的宗旨，如同在成立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的，是要鼓励在中国人间行医，并将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

我们称呼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的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及其一切往来置于更想望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

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好处是医学

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好处是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第二个好处是将可以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可与人民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真实情况，回答我们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我们感兴趣要提出的，而且可以获得答案。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率坦然的，尽管他对人可能有意隐瞒事实或者掩饰真象。”①

从这份宣言中，可以发现，传教士兴办医院的宗旨有两点，其一是将“医学科学移植中国”，其二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搜集情报”。所以，在叙述他们的客观积极作用时，决不能忽视他们办医院的另一目的。

① 》Chinese ResPositorY》，1838年5月，第37—44页。

第六章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传教运动”的兴起

（1844年——1860年）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签订了《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并割让香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西方传教士认为这是向中国进行公开传教的“转机”，使得历时二百年的教禁开始解冻。但条约中还没有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后在传教士的要求下，法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开放“教禁”，自由传教。1844年道光皇帝下了一道手谕，对天主教准开教禁。其后，由于基督教各差会要求享受同等权利，耆英被逼于1845年2月下令准于一体适用。从此天主教各修会和基督教各差会传教士纷纷前来中国，以通商口岸为基地，伺机潜入内地活动。不久清廷又允许归还雍、乾年间查封的天主教的教产，于是又出现了“给还旧址交涉”，引起了许多纠纷。英法侵略者在修改条约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借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签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了侵略者的特权，西方传教士便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在传教和慈善事业的掩护

下，进入了西方传教史上最不光彩的历史时期。

一、不平等条约使禁教开始解冻

1842年8月29日，英军总司令璞鼎查逼迫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写上“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的字样，这给传教士在华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传教士伯驾迫不及待地怂恿美国政府也和清政府签订条约，写上传教的条文。果然，《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明文规定：“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公开建立教堂之始。伯驾曾夸耀地讲：

> “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礼拜堂’三字加入到中美条约成为十七款时，我感觉到为争到这点成功，做了它的低微工作，虽一身勤劳也是值得的。”①

《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眼看英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于是决定派遣使臣拉萼尼来中国。据载：

> “（拉萼尼）一到广州，他就收到罗伯济主教送来的备忘录一件，汇报天主教在中国的状况，并追述自乾隆以来所受迫害的经过。罗主教凭他多年的经验，认为可以断定，中国官厅不会拒绝基督教国家的强硬要求。罗主教恳请法国使臣，为天主教的利益向中国方面提出

① 《伯驾生平书记及笔记》，1896年，第326—329页。

交涉。”①

在法国传教士的策划下，法国于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条约的二十三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②。

这三个条约的签订，传教士都充当了参谋。甚至直接成为侵华条约的策划者。“在天主教和基督教里，这些条约都受到欢迎，被看作是传教中划时化的新标志。”③

卫三畏得意洋洋地宣称：“上帝与这般人民打交道，路总算打开了，他把他们带入审判，要向他们显出怜悯。”④充分说明那些传教士们到中国的真实目的和卑鄙的意图。

拉尼萼并不满足于《黄埔条约》的签定，又要求耆英奏请道光批准弛禁天主教。耆英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奏：

> “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谨奏：……今据弗朗济使臣喇嗟呢请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似属可行，应请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行非者，仰恳天恩，准予免罪。……仰祈皇上恩准施行。谨奏。”⑤

道光帝接到奏本后，即在上面加上硃批：“依议钦此”。据《教案奏议汇编》记载：

> “道光二十五年，法商赴粤诣总督衙门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请弛汉人习天主教之禁。总督耆英

---

① 高龙倍：《江南传教史》，下编第1卷，第6章，第10—11节。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2页。

③ 《中国基督教传教史》，第231—232页。

④ 《卫三畏的著作和书信》。

⑤ 《教案奏议汇编》，卷首。

据以奏闻。奉旨：交部议准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钦此。”

在天主教弛禁后，教士们又怂恿拉萼尼向清廷提出发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道光帝为此于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发布上谕。全文如下：

“上谕：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尼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习学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藉教为恶及招集远方之人，勾结煽诱，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借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定章程，外国人概予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将此谕令知之。钦此。”①

根据这道上谕，各省天主堂均被发还。上海南门的圣母堂与老天主堂归还给天主教，北京的南堂亦得启封。从此天主教活动得以恢复，各国天主教的修会也纷纷派员来华。基督新教各差会传教士也云集香港，讨论如何“进军”中国及划分传教区域范围等问题。不久，东正教也把外交职能和传教分开，由北京向中国各地扩大自己的传教势力范围。

① 《教案奏议汇编》，卷首。

二、“给还旧址交涉”与教士反攻到算

（一）传教士擅自潜入内地传教

然而，由于此时道光帝的上谕明文规定了“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所以这个时期仅仅是教禁的解冻期。当时还有在内地抓获的非法潜入内地的传教士并押解澳门的事件发生。如1846年7月28日就发生了湖北“盘获传教之西洋国人，解赴广东”之事。道光帝为此专门发了一道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耆英等奏，遵旨讯明湖北获解传教洋人，饬发西洋领事收管一折。教士纳巴罗即陆怀仁，以外人赴内地希图传教，据讯明，实系大吕宋人，并无别项不法情事，亦非匪徒饰混诈冒，该国并无领事在粤，该督等已发交西洋领事严加管束。惟此人将来如何归著？是否交该领事饬令回国，抑或仍留粤东，并如何妥为安置，不至再出滋事之处，著耆英等斟酌情形，悉心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①

翌年十一月甲午（1847年12月25日），又有上谕重申禁令：

“谕军机大臣等：裕泰等奏，盘获西洋人潜入内地传教一折。据称西洋人李若瑟、啰沅勒，改换服饰，潜至湖北省，与民人马五芝等会遇，劝允传教。并有该省上年委员解粤领管之纳巴罗一名，复行来楚，欲图传教

① 《宣宗实录》，卷434。

等语。该国习教念经，例不准赴内地传习，以防蔓延滋弊。兹西洋人李若瑟等，曾至山西、陕西等省，复先后至湖北传教，既经该督抚解回广东，著耆英照例妥办。将此谕令知之。”①

到了1848年，西班牙多明我修会教士罗启祯在西藏传教时被抓获，在四川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道光帝又发一道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穆腾额奏，盘获佛兰哂洋人欲赴西藏传教一折。据称盘获洋人罗启祯，假称贸易，欲赴西藏传习天主教，请即于察木多台，解交四川省审讯等语。所见甚是，该国洋人习教念经，意欲遍传内地，各省及四川省办有成案，皆系解交广东。著琦善于该案罗启祯等解到时，详细研鞫，妥为解粤，咨交徐广缙核办。将此谕令知之。”②

1856年法国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县为非作歹，酿成教案，中国内地各省都据约不准进入传教。西方列强为了使中国的教禁彻底解冻，达到自由传教内地的目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国王路易·波拿巴遂签署命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传教士刮起“给还旧址”的风潮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根据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教堂的权利。这两个条约规定：美、法教堂所需土地，由各该国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择定，按照当地行情议定“租息”，不得抬价勒索，也不

① 《宣宗实录》，卷449。

② 《宣宗实录》，卷457。

得强租硬占。中法条约还规定，“在五口地方，凡佛兰西人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定限制”①。又，根据中美条约关于治外法权的规定，中国官员对违犯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并无审讯治罪之权。而根据上述条约中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法、美两国传教士所享有的这些特权，无条件地适用于其他西方订约国家的传教士。

当时，西方教士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还有一定的约束，必须经过清政府地方官吏批准。1845年住宁波的法国教士顾芳济所需房舍是由宁绍台道台代为租赁的。次年，顾芳济欲添租房屋，宁绍台道台又收买其邻近周、韩两姓房产予以转租②。1850年，英国教士借住福州神光寺，经过地方官批准后租约才予以成立。后来，由于当地人民坚决反对西方教士进寺居住，地方官便缴销租约，勒令神光寺僧人出具切结，保证不再租房给西方教士③。

同时，根据前述条约，西方传教士虽然取得了在五个通商口岸进行活动的特权，但并没有准许他们渗入其它城市和乡村传教。而且，当时所有不平等条约仍没有中国方面必须归还过去业经收回的教堂房地产的规定，也没有中国方面必须撤销禁教命令的规定。可是，条约一经签订，西方教士就更加猖狂起来，他们不仅制造了一系列所谓“还堂”交涉，掠夺中国人民房地产，而且要求清廷撤销教禁，准许教士渗入内地进行活动。

1844年，上海法国教士罗伯济向上海道台要求“归还”旧天主堂。法国公使拉萼尼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撤销禁奉天主教的命令；一是归还被封闭的天主教的教堂地产。本来这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4、62页。

② 《筹办教务始末》，道光朝，第75卷，第39—47页。

③ 《筹办教务始末》，咸丰朝，第2卷，第5页。

两项要求毫无条约根据，但在1846年2月20日，道光却完全接受了，宣布“准免查禁”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并承认“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①。这个谕旨颁发以后，不但被查禁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天主教正式弛禁，而且还引起了许多“给还旧址”交涉。

在此项谕旨尚未颁发之前，法使拉萼尼就亲赴上海要求发还天主堂的所谓“旧址”。事实上，上海县南门外的一处天主堂并不曾“给还该处奉教之人”，倒成了法国教会的财产。上海城内的另一处天主堂则因旧址已改建为帝庙，由上海道宫慕久另拨董家渡、洋泾浜等三处市肆房屋予以抵偿，也成了法国教会的财产，与该处奉教之中国人无关②。自此以后，各地也不断发生“给还旧址”交涉。天主教士在法国使馆支持下，向清廷地方大吏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进行反攻倒算，使这种“交涉”延续达一二十年之久，制造了不少事端。据清政府的《给各国议办传教章程》中称：

> “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管是否有碍民情，硬要给还。……即或实系当年教堂，经教中人卖出，嗣后民间转相售卖，已非一主，并有重新修理费用甚巨者，教士不出价值，逼令交还。又因房屋偶有倾倒，反索修理之费。各种举动，百姓均怒目相视，俨若仇敌。”③

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所讲的要严重得多。天主教传教士们擅自

---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5卷，第5—6页。

② 史式徽：《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第4页。

③ 《教务纪略·章程》，第3卷。

跑到各省，任意指控，恣意讹诈。在西藏、四川、湖北、浙江、广东、河北、山西、江苏等地被地方官吏查获的就有三十五起之多①。另外，1850年上海天主堂传教士赵方济通过法国领事敏体尼提出交涉，要求给还松江府属华亭县的天主堂旧址。清地方官吏认为，上谕只令将天主堂“给还该处奉教之人”，“法兰西不得过问”②。使赵方济的讹诈没有得逞。也有外国传教士潜入内地霸占房产的，如1851年浙江定海厅就发现洋教士无理霸占庙宇达六处之多，地方官将其全部收回③。

法国政府及传教士见恣意横行仍有阻碍，便寻衅滋事。1856年，法国政府以在广西省西林县为非作歹的法国传教士马赖被杀为借口，联合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软弱的清政府在法国政府及传教士的要挟下屈服了。在《法约遗补》的第一款上签字答应：“西林县知县张鸣凤敢将本国传教人马神甫恣意杀死，本系有罪之人，应将该知县革职，并言明嗣后永不得莅任。”在1860年的《中法北京续约》的第六款中规定：

> “上谕即颁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札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④

这些规定不仅重申了“给还旧产”，而且允许法国教士可以

---

① 《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卷，第1—2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五卷第26页。

④ 《教务纪略》。

随便在各处建堂。侵略者和传教士借口《中法北京条约》关于“还堂”的规定，在各地强占民产，肆行掠夺。据清政府在《给各国议办传教章程》中说：

“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管是否有碍民情，硬要给还，并有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年教堂，逼令民间退让之事。甚至将有碍体制之地，及公所会馆庙宇，为阖地绅民所最尊崇者，均任意索取抵给教堂。”①

在江苏淮安、扬州、靖江、金陵、镇江、上海、宜兴等地，先后发生了外国传教士强占民房民田之事，而且愈演愈烈。

（三）孟振生神父抢夺北京“教产”

关于北京东、西、北三处教堂的归还经过，更是值得重点叙述，从中可以窥出法国天主教士的专横与跋扈。

《中法北京续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孟振生，惟恐法国侵略军总司令葛罗离京退走后无威可恃，因而唆使葛罗挟制清朝政府，在城内各处张贴保教告示，晓谕居民，以免民教滋事。他要求葛罗替他索回教堂，发还居住在中国内地的教士，并发给盖有中法双方印鉴的执照。葛罗照此办理，硬逼中方认可。1860年11月4日葛罗给奕䜣一个照会，要求照续约第六款规定，将南北二堂及其它地基房廊并“给执照一纸”交还孟振生。奕䜣均照办。11月5日，葛罗写信给孟振生说：“南堂与栅栏莹坟全已归还，今特转交主教。”并说：“遇有交涉归还教堂之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9卷。

事，务与法国驻中国全权大使布尔布隆联系。”①葛罗还带孟振生去拜会奕䜣，提出交还其它三处被毁的教堂地基和法国坟地正福寺的要求，一切事宜与孟振生进行磋商。11月9日，葛罗离京赴津前，给孟振生盖有中法官印的执照28张，分送各地教士。孟振生据此，狂骄已极，占索北京三堂，根本不管东西北三处教堂地基上的居民有无搬迁上的困难，一律强令他们立刻迁走。三处居民群起反对，事情拖延甚久，不能解决。法使布尔布隆得知此事，即从天津派翻译美理登到京协助孟振生办理还堂事宜。美理登与孟振生一道去会晤奕䜣时，美理登乘坐兰呢轿，法国巡捕乘马相随；孟乘坐绿呢轿，前后有许多教徒骑马护卫，俨然如官府大吏。他们见到奕䜣，就迫使其照《中法续约》第六款交还北京教堂地基。奕䜣马上答应交出东西两处教堂地基，并给一张执照。北堂的住户虽然不愿意迁走，但迫于朝廷的压力，只得收下政府给的赔偿费，被迫搬迁。这样，孟振生未付任何代价，即将清朝政府在1862年拨给教会八千银两赔偿费的北堂全部收回。法国大使离京不到20天，北京教堂和被拆毁的教堂地基，在孟振生的百般要挟下，都已归还。只有城外法国坟地正福寺交还较迟。

正福寺自1732年成为法国坟地，直至1838年毕学源病故，已有一百零六年的历史。在此时期中，坟地周围种植了果树四百余株，葡萄一百五十株，四周护以砖墙。毕学源死后，坟地无人经管，加之附近居民愤恨洋人，坟地大遭破坏。孟振生坚决要奕䜣发给归还正福寺的执照，企图借此逮捕居民，从重治罪，进行报复。奕䜣不许，孟振生无计可施。恰在这时，驻在天津的法国教士孟特班送来一封信，要孟振生要挟清廷迅速交还正福寺，以便

---

① 关于北京“教产”归还的详细情况，参见A·Thomas，《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 Par》，第304—406页。

把在中法交战时被清军打死在天津的法国军官丹姆斯（Albert de Damas）的尸体迁往正福寺的法国坟地。孟得信后往晤奕䜣，恣意要挟，益形骄纵，迫奕䜣发给交还正福寺执照，不然就拒绝迁葬。奕䜣怕横生枝节，遂在12月10日将归还福正寺执照送交孟振生。执照内称：

“……查得西直门外正福寺，旧有西洋人坟地一处，现交与大法国钦差，转交主教孟管业，专派人看守，并饬知地方官，禁止附近居民，不得侵毁。如有侵毁者，准该主教呈明地方官惩办可也……”①。

孟振生得到执照，深恐附近居民再行侵毁坟地，决计要对附近居民严加惩治。经过谈判，最后决定在指定日期，由地方官带几名被捆绑的所谓侵毁法国坟地的附近村民前往正福寺，听候孟振生审讯及惩治。地方官员无不一一照办。审讯之时，孟振生大发雷霆，对被捕的居民严加训斥。据孟振生自己供认，直到迫使他们“叩首领罚”，才算完事。从此，孟振生全部接管了教堂和教堂地基及法国坟地②。

孟振生仗恃条约的保护，向清政府要挟甚多。慑于法国军事力量的清朝统治者，不能不向孟振生作出使百姓吃亏的让步。于是，北京天主教的势力大张，民情益愤，仇恨洋教的情绪也就日益高涨。

---

①② 参见A·Thomas，《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 Par》，第364—406页。

三、“传教运动”的兴起

（一）《天津条约》与清廷“传教宽容”政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屈辱投降，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而宣告结束。清廷与四国分别签订的《天津条约》中，都对传教作了新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中俄天津条约》第八条规定：

“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有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察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

《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

“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已，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规定：

“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已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

《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

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①

《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实行“传教宽容”的政策，大大激励了传教士们的“热情”。1858年7月30日，基督新教传教士杨格非（杨笃信、杨约翰）给英国伦敦的差会写信说：

“这封信带给你的消息，一定会使整个基督教国家所有的差会朋友们深感兴趣。这个辽阔、古老的帝国，不管它的闭关政策，自负的傲慢，对一切外国的极度轻蔑，已经首次被迫打开它迄今不能渗入的地区，可以进行友好的交往和光荣的贸易了。……就这样，中国几乎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②

接着，在1860年的《中法北京续约》第六款中又规定：“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在这个条约的中文本里，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等擅自添上了“并任佛（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内容，这就给各国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分子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而这个法国教士之所以要玩弄欺骗手段，特地在条约中擅自增添这一内容，是因为他们深知辽阔富饶的内地和边陲的重要性，这是以长时间的窥探侦察活动为基础

① 以上条文均见《教务纪略》的条约部分。

② 汤普生：《杨格非传》，第78—82页。

的。由于有了这一规定，外国传教士便可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的各个角落，建立侵略据点，划分势力范围，形成独霸一方的“天主教王国”，以便进一步将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如同他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其它一些国家所做过的那样。从此，天主教、基督新教教士们便以条约为护身符，开始公开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为了迷惑中国人，侵略军头子和传教士还逼迫清政府把允许传教的官方公文张贴在全国城乡。据《教务纪略》载，咸丰帝曾下了一道上谕，内容是：

“通行传教谕单

照得咸丰八年天津议定法国条约第十三款内载，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又载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各等语。除按照和约业经行知各省督抚，将八年十年所定各款一体遍行张贴……”

同时孟振生又拿出刻印好的“通行传教谕单”250张，强迫清廷总理衙门盖上官方印鉴。《教务纪略》载，云：

“通行传教谕单并咨行教民犯案办法

总理衙门咨：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准法国送到传教谕单二百五十张，请盖用本衙门关防，以便交付各处传教士收执。本王大臣检查该衙单内，载该教士赴内地，只以传教劝善为务，并无他意，亦丝毫不得干预地方公私事件等语。相应咨行各直省督、抚、将军、监督，查照行文，通饬各府、州、县地方及关津卡隘，一体遵照。嗣后，遇安分传教之人，自应按照条约设法保护……”

（二）在华各教派为争夺传教势力范围明争暗斗

首先，看一下天主教各派传教情况。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在中国的传教会共计有五个：西班牙多明我会士（Spanish Dominicans），在福建传教；巴黎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所管辖的区域最大，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两广、满洲和西藏；方济各会士（Franciscans）在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五省；遣使会（Lazarists）的教士们从1785年耶稣会解散后接管了他们所开创的传教区以后，在河北、江西、河南、浙江等省传教。此外，耶稣会于1814年一经恢复以后，又于1842年卷土重来，先后分得江苏、安徽两省和河北的东南部的传教权。1847年，他们在上海徐家汇徐光启墓址附近，建立了总部。

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中，又有许多修会到中国来传教：密良（Milan）外方传教会士于1858年初次到香港，1869年分得河南教区；圣母圣心会的司铎们（The Schent Fathers）在他们的修会成立不久，便于1865年来华分得的传教区是蒙古；奥斯定会传教士，经过了一百多年间断之后，又于1879年回到了河南；1885年，罗马创立了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Roman Seminary of SS·Peter and Paul)也在同年派遣会士来华，到陕西传教；德国司带尔圣言会（Steyl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的司铎们，于1879年初次来华，1882年分得山东的一部作为传教区。此外，还有1883年来华住在河北杨家坪的苦修会士们（Trappists），1870年到香港的教学修士们（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和1893年到上海的圣母小昆仲会修士们，也在中国进行传教。

这些先后来华的传教会，凭藉条约的保护，强行在中国各省

传教。他们除了发展信众之外，还创办医院、孤儿院、留养院，开办各种学校。他们开办的学校有为培植神职人员的神学院和各级普通学校，为教中子女和教外人家的子女提供了学习的便利。而且女修会的修女们也在那时开始来华，教士们在办教育方面，得到了她们很大的帮助。这些女修会中，最早来中国的是1842年来的仁爱会修女们。随后来华的有：沙德圣保罗女修会（Sisters of ST·Paul de Chartres)(1848年)，加诺萨女修会(Canossian Sisters)(1860年)，拯亡会(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1867年)，包底欧上智会(Portieux Sisters of Providence)(1875年)，多明我女修会(Dominican Sisters)(1889年)自从1869年圣衣会修女们到了上海之后，欧洲妇女们的隐修会，也陆续在中国设立了分会①。

除了上述这些修会以外，还有一些根据需要，由一些教士或者根本不是教士的殖民分子临时组织起来的修会。这种临时出现的天主教修会与各自为政、没有统一领导的基督新教差会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每一个新成立的修会，必须经罗马教廷批准。例如，为了适应侵略的需要，1861年，比利时的一个在兵役学校长期充任随营司铎的教士南怀仁②，立即纠合了几个同伙，要求比利时教会和梵蒂冈批准他们成立一个专门到中国“传教”的修会。第二年，他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近郊斯盖特村成立了“圣母圣心会”。参加这个修会的主要是比利时和荷兰两国的天主教士。1864年9月1日，梵蒂冈指定了中国的“蒙古地区”作为该会的传教范围。同时，他们还把传教势力伸入绥远。据载：

---

① 参照德礼贤：《中国天主传传教史》。

② 原名是Theophil Verbioest，南怀仁是他来中国后取的名字。

"天主教是清咸丰六年来在归化的，先在城隍庙街七号创立教会。现有外国神父四名，教友一百余名，土地八十亩，房屋六十二间，有育婴堂一所，男女婴儿六十余人，主教葛崇德管理一切……"①

此时，基督新教传教活动也不落后。早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1842年他们就曾在香港举行第一次各差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会议，出席的各差会传教士15人，策划在通商口岸开展传教活动。到1855年五个口岸共计有传教士85人，分属于英国伦敦会（1807年来华）、美国公理会（A、B、C、F、M，1827年来华）、英国圣公会（C、M、S，1842年来华）、美国浸礼会(1843年来华）、美国长老会（1844年来华）、英国浸礼会（1845年来华）、美国美以美会（1847年来华）、英国长老会（1847年来华）、英国安息浸礼会(1847年来华)、英国循道会（1850年来华）。由此可见，除了个别差会来到中国较早以外，其余都是《南京条约》签订后来到中国的。当然，这时基督新教传教士的活动，还只限于南方的五个通商口岸，尚不准到北方或进入内地活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当时在香港的英国圣公会主教史密斯写信给英国坎特伯爵大主教说：

"大西洋两岸基督教差会的朋友们，都应当知道，这些条约中涉及基督教条款的措辞，是由于列威廉公使的同情与合作，因此应当对他表示热忱的感谢，列公使的得力秘书和译员卫三畏博士与丁韪良牧师都是在中国有名的传教士。"②

就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英国基督教会的主要教派圣公会积极派遣传教士来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其中，圣公会下属的布道会

① 《禹贡》，半月刊，第5期，载《绥远宗教调查记》。

② 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辑委员会1962年编《史料选集》。

的传教士包尔腾（J·S·Burdon）急忙由杭州北上到北京，进行传教活动和翻译工作。1865年又派寇林（W·H· Collins）进入北京活动，并开始到北京附近的永清县从事活动。与此同时，英国国外福音布道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Cospel 简称S·P·G）也于1863年派遣传教士司悌伟（J·H·Steward）和梅琦（F·R·Mitchell）进入北京，活动十余年之久没有多大发展。到1874年，该会改变策略，开辟山东传教据点，派遣两个年轻传教士史嘉乐（C·P·Scott）、吴梅理（Milos Green Wood）于1874年7月由英国动身出发，经由美国、日本到山东烟台登陆，暂住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尼温斯（Nevins）家中，学习汉语，不时偷偷进入内地活动。为了便于独立搞侵略活动，1876年在宁波主教禄赐（Rusoll，后升为华北教区主教）的指使下，另行租房居住。同年春天，史嘉乐的妻子和吴梅理深入山东泰安活动。这种随着不平等条约而来的传教活动，是不受人民欢迎的，加上传教士横行霸道，因而不断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吴梅理就曾请求当地官府予以保护。

1878年—1879年华北大旱，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灾情十分严重。传教士们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纷纷深入内地采用放赈手段，邀买人心，进行侵略活动。史嘉乐和盖斐理（Capsl）二人带着四千英镑的款项，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在山西各地走了三千余里，大肆进行放赈、传教和搜集情报的活动。从此，该会在山西建立了侵略据点。

当史嘉乐和吴梅理在山东活动的时候，英国驻中国海军司令芮迪（Admira Ryder）给他们以全力支援和鼓励。芮迪积极主张在山东省建立强有力的传教机构，并派主教驻守，还设法募集了一万英镑作为主教基金。

1879年兼理华北教区主教禄赐去世，英国圣公会大主教泰第（Tait）便指派在山东活动多年的史嘉乐为华北教区主教。当时

华北教区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甘肃等省。因史嘉乐担任华北教区主教是由国外福音布道会指派的，教会布道会不服从，自1880年起便退出了华北教区。史嘉乐于1882年召开教区会议，商讨教区事宜，积极准备进行扩张。他在山东选中了中国佛教圣地、五岳之首的泰山脚下的泰安府为活动中心，继而扩张到平阴，并在泰安、平阴周围村庄积极活动，大肆扩张教会势力。其后于1874年在烟台，1890年在威海卫建立了英国人的礼拜堂。另外又在直隶省以北京、天津为中心，沿铁路线向东发展，1874年在北京、1890年在天津、山海关、北戴河等地都建立了英国人的教堂和学校，同时在北京成立了神学院，加强对中国传道人员的训练；又在河北省安国县开始进行传教活动。

作为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的东正教，这个时期也在积极地扩大传教势力范围。1860年以后，为了适应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沙俄政府把北京布道团的外交职能和宗教活动划分开来，外交权限交给了新成立的俄国公使馆。布道团的神职人员不再由俄国政府而是由俄国东正教的牧首公署直接管辖。布道团在形式上虽然成了“传教”、“文化”机构，但实际上仍然受俄国政府控制，只是活动方式更加隐蔽狡猾罢了。俄国东正教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逐渐由北京向中国各地发展。在此以前，它的合法传教团体只有一个北京布道团。而在1860年以后，特别是在义和团起义前后，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都建立了教堂，并且形成了独立的教区。北京布道团的势力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已由北京一地扩张到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地。并在北京西山，京东的通州和涿县、房山、永平、古北口、天津、北戴河、青岛、卫辉（豫北）、上海、汉口、广州、石浦、沈阳、旅顺、大连、哈尔滨、长春、满州里、库伦、西安等地共设教堂三十二座、分堂五座、神学院一个、男女学校二十所、气象台一座、企业和事业机关十六处。受洗华籍教徒五千五百八十

七人（其中北京约一千人，天津约二百余人）。另外，蒙古及西北边疆地区华籍教徒注册登记的有三万七千零二十名。东北地区最早的教堂——哈尔滨市尼古拉圣堂是在1898年建立起来的。在1908年沿中东铁路东北各地有教堂十六座，并建立了独立的教区。

综上观之，至二十世纪初叶，东正教在中国华北、东北、华南、西北等地已经形成了一个为沙俄侵略政策服务的传教网。

四、“洋兄弟”与太平天国

（一）基督教义对洪秀全的影响

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十年，即1851年，中国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与中国以往的历次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次起义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宣传革命的内容以及反映贫苦农民的要求上，都采取了基督教义和形式，同时加进了儒家的大同思想。

太平天国起义的理论为什么与基督新教教义有关呢？起义的领导人洪秀全为什么能接受异邦宗教观点？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自1807年基督新教由马礼逊传入广州后，由于布道者虔诚地热心传教，及其有别于天主教传教的方法，把《圣经》译为中文，并撰写解释《圣经》的中文小册子刊印成书，广为在中国年青士子中间散发，并创办英华书院，甚至忍受清朝禁律的惩治也始终不渝。因此，基督新教能很快在广州一带传播开来。

1836年（道光十六年），参加广州乡试的洪秀全走出考棚时，一位传教士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小册子，这就是中国第一个牧师梁发所著的第一本中文布道书。由于洪秀全此时名落孙山，懊丧归来，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没有看这本书。据《天王本纪》载：

“这一天，他因卧病在床上，忽然暴死，但心里却很明白。起初，似乎看见一条龙，一只虎和一只鸡，一同走进房里。接着有一队人马，奏着各种音乐，后面跟着一顶彩轿，到了房门口，就有一个人上前请他上轿。他心里非常惊奇，又无法推辞，就跟着来人，坐上轿子，到了一所光明华丽的宫门口。站在宫门口的许多男女，看见他到了，都向他鞠躬致敬。有一个老妪，引他到洁身池去沐浴完毕，就有一队老者来引他到一间小室里，将他的肚子剖开，取出旧的心脏，重又安上新的心脏，然后缝合起来，毫无痕迹。于是，他就一人走出室门，游览宫内，但见四面墙壁上，刻满劝善的碑文。走到正殿上的时候，忽然看见庄严灿烂的宝座上，坐着一位黄发黑服的老人，招他上前，流着泪对他说道：‘世界上的人类，都是我所造成，衣食一切，莫不是我所赐给；但是人类不但不知报本，反而背弃我而去亲近恶魔了。我希望你能够快去荡灭恶魔，扶持真理，使人类都能返本归元’。说完，又拿了一把宝刀和一颗金印送给他，算是委他去锄奸扶正的凭证。”①

他在这恍惚的病态中，说是常常遇见异象。据他自己说：“有一天，他曾梦见一位中年男子，嘱咐他要努力斩除恶魔，洗灭罪恶。”他以为这中年的男子就是天兄耶稣。在宝座上的老人，就

①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是天父耶和华。这种异象，不过是把“造反”与神的意志挂起钩来以动员群众而已。

直到1843年，洪秀全坐在书房里看书，有一个朋友来拜访他，发现了那本在书架上搁置已久的《劝世良言》，才引起他的注意。当下便把它打开翻阅。读后顿然省悟，觉得从前在梦中所得异象，都是上帝的启示，于是拔剑而起，立志从事革命活动。这本《劝世良言》竟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理论依据。

《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劝世良言》宣扬上天只有一位独一真神，那就是“上帝爷火华”；“所有富贵光荣皆由之而下来，亦是全世界众人之父”；“神爷火华曰：除我外而未有别个神也”。洪秀全接受了这个思想，他说：“看见其书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1845至1846年，洪秀全写的《原道救世歌》的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开辟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否定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神存在。书中说：“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五行万物天造化，岂有别神宰其中。”洪秀全所谓的“天公”也就是上帝。人不能不拜上帝而拜其它的神，“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洪秀全认为，中国人过去崇拜的如来佛、观世音以及孔孟、关岳、金花夫人、送生司马等各种神、佛、大仙、偶象根本不是神，而是妖。既是妖，就不能拜，拜了就得不到好结果。洪秀全正是利用《劝世良言》所宣扬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为武器向封建的意识形态宣战。

洪秀全还根据“独一真神唯上帝”这个总的宗教教义，阐述了广大农民群众强烈要求政治平等的思想。《原道救世歌》中说，人的肉身受之父母，肉身之外还有一个灵魂，人的这个灵魂都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因此，“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既然“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因而，拜上帝是大家的权利，“何得君王私自专”！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统治秩序建立的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是万世不变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而按照《原道救世歌》的理论，封建帝王与人民，地主与农民，主人与奴仆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这种政治平等思想，启发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革命觉悟，猛烈冲击着封建统治秩序。

到1847年，洪秀全又根据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皇帝。在天国，只有皇上帝才能称皇称帝，在人间，最高封建统治者自称“皇帝”，就是“僭越”。《原道醒世训》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缅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因此，他号召拜上帝会的人起来“共击灭之”。

把基督教教义、封建儒家思想杂糅在一起构成了洪秀全的主体思想。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终于在1851年于广西金田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这次起义是以“拜上帝教”来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拜上帝教”源出于基督教，因此，两者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首先，在教义方面，“拜上帝教”认为，“皇上帝下凡间大共之父也”①，“上帝当拜，人人所共”②。故而“凡不信上帝及耶稣之真理者，虽为吾人旧交，但非吾友，尚欲魔鬼也；反之，凡信上帝及耶稣真理者，乃天堂真兄弟真朋友也”③。这与基督教传教士所主张的“上帝为创造天地万物，无始无终，全智全能，独一无二，昔时、今时、异时永生之真神，人当以敬

①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② 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③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之，首爱之”①，基本雷同。再如，拜上帝教认为，“普天下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②，“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③，这也和传教士所说的“世人皆为天父所生。故凡同类者，皆有相爱之情”④的人权平等思想相符合。

其次，在宗教仪式方面。拜上帝教严格执行摩西十诫，遵守安息日，敬拜上帝，做祈祷等，这也和基督教教仪相同。

再次，拜上帝教，排斥其他一切宗教的偶象崇拜，独尊一位“上帝”，因此起义军所到之处，到处破坏孔庙、寺院、佛像。这也恰好是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所迫切希望而又无能为力办到的事情。

另外，太平军的宗教化，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洪秀全既建立了太平天国，便用宗教来驾驭军队，他最初出兵时的那篇檄文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一开始就列数满人的罪恶，继而便说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拯救人民，“尔等官民人等，从前误为满人所用，现在应该弃暗投明，作天圣之子女。并且天皇恩德高厚，果能敬天识主，莫不一视同仁”。在这篇长一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不独充满着革命精神，更是充满着宗教思想，“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可见太平军处处以宗教信仰为号召，务使军队宗教化。

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颁布了太平军的军律——《太平条规》。其中处处充满着宗教的意识，如军营规例中的第一条，便是“要恪遵天命”，第二条“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等，没有一种仪式不是从基督教仪中取来

---

①④ 《万国公报》第83卷第12页，《基督教有益于中华说》。

② 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③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的。所谓“天条”，就是基督教的十条诫命：（一）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三）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五）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六）不好杀人害人；（七）不好奸邪淫乱；（八）不好偷窃劫抢；（九）不好讲谎话；（十）不好起贪心。又在每条之下，附了一首极普通的七言四句韵语，如第一条底下说：“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起升，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余各条之下都有这样相同的诗句，这与现在基督教歌唱的那些赞美诗差不多，便于教徒记诵。除了这十条天条之外，还有许多歌词之类，要每个军队兵士，背得很熟，否则便要处罚，或责打，或处死。

定都天京后，这些从草莽中来的英雄，一跃而成为“天堂”的主人，办了许多初级学校，实施国民的强迫教育。同时，也用开科考试的办法，分为男女两科取士，以圣经里的教训做考试的题目。特编《三字经》、《幼童诗》作为初级学校的教科书，是根据新旧约的历史故事编成的，文亦浅显。如《三字经》：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七日拜，报天恩，普天下，把心虔。说当初，讲番国，敬上帝，以色列；十二子，徙麦西，帝眷顾，子孙齐。后狂出，鬼人心，忌兴旺，苦害侵。命养女，莫养男，烦役苦，实难堪。皇上帝，垂悯他，命摩西，还本家。……乃释放，出麦西，日乘云，夜火柱。到红海，水汪洋，以色列，实惊慌，迢兵到，上帝栏，会红海，水两开，以色列，尽保全。行至野，食无粮，降甘露，人一觞。西奈山，显神迹，命摩西，造碑石。皇上帝，设天条，传至后，暂不遵，中魔计，陷沉沦。皇上帝，悯世人，遣太子，降凡尘，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十字架，钉其身，流宝血　救凡人。死三日，复重生，四十日，论天情，临升

天，命门徒，传福音，宣诏书。信者救，得上天，不信者，定罪先。……”

全书有三百五十二句。从这里节录的几句中可以看出，它的内容完全是叙述基督教的历史。《幼童诗》是仿从前的“神童诗”而作，使用五言一句的句式，内容与《三字经》差不多，述说礼拜上帝的重要性等等。

（三）“洋兄弟”的美梦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当太平天国革命一旦爆发，它就被外国基督教传教士误认为是解决在华传教问题的最好机会。正如外国传教士米赫斯所说：“如革命成功，吾人可预料之利益，乃是大开海禁以便传教通商。”①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更具体地说：

> “旧都（南京）落入任何一群叛徒手中，当然是全世界所关心的事。但当那些叛徒们被人知道是基督教，不仅为帝国而斗争，更对他们国内偶像崇拜进行十字式的斗争。这个兴奋是无限制的：商人们开始推测他们的成功将对商业发生什么影响；传教士们讨论着这个叛乱对推广福音可能有的关系；外交人员们自认为是唯一能自由地亲自去作考察的人，去寻求最早的机会，从一次访问南京中去探知事实。”②

丁韪良的这番话，大体上反映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及其外国基督教传教士们对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所抱的不同幻想。

当时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着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

---

① 彭泽益：《太平天国革命思潮》第79页。

② 丁韪良：《花甲记忆》。

太平天国与各国侵略军的关系；一是太平天国与各国传教士“洋兄弟”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两种关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那些自称“洋兄弟”的外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接触，初期都是密切配合本国政府而行动的。1853年4月22日，访问天京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即是陪同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同来的。1854年5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还引导美国驻华公使麦莲访问了天京。

太平天国十余年间，先后有二十余名英、法、美等国传教士到过天京。这些往来，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太平天国急于想和外国传教士友好相处，目的是希望传教士们承认、相信、信仰它的上帝教，进而达到支持这个政权，巩固这个政权。而传教士们和太平天国往来，则有两个企图：一是企图通过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运动，以便为外国基督教侵华开辟道路，加速中国全面基督教化，促使基督教最终成为中国国教，这是外国传教士们在初期所以极力支持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最基本的主导思想；二是教士们需要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报告给本国政府。太平天国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就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而展开的。

最早到太平天国管辖区的是英国教士麦都思。其后是美国传教士戴得生（即戴勒尔，Charles Taylor），于1853年6月4日到达镇江。据当时《北华捷报》透露，戴得生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到叛军营里去采访最有价值的情况”①。

戴得生在镇江住了三天，并受到了那里负责人罗大纲的热情招待，但罗大纲并不知道他是美国人，始终认为他是英国人。戴得生临走前，罗大纲托他带一封信，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信上上说：

“五月初一日（农历六月五日），贵邦有兄弟戴作生带来各书，俱已收到。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所

① 《太平太国文书汇编》，第295页。

阅来书，两相符合，总属一条道路。”①

纯洁、善良的农民军领袖此时并没有想到其他问题，只简单地认为既然两者都崇信天父，理应走同一条治理天下的道路。殊知，就在戴得生进入镇江的同时，美国军舰“神使号”便到达镇江江面，进行试探，并无故开了五十三炮，以显威严。“神使号”一驶进镇江，“随后则有伪清妖船”，“复有船来，而清妖船又于后”②。于是引起了太平军领袖的怀疑。故罗大纲在信中又说：

> “惟目下天人应顺，正兴（汉）灭满之时，……今弟处非阻通商，终以两下交兵，恐其往来不便。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庶贵邦之往来不受伪清之欺侮也，不亦宜乎？”

这是太平天国政权初期对传教士们“来访”的态度：既渴望将来能建立传教、信仰及通商联系；又恳请他们目下不要再来，等灭掉清朝后，“不受伪清之欺侮”地自由往来。这个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天京政权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据史料记载，1853年时，天王洪秀全曾经给他起义前的“宗教师”罗孝全写过一封什么邀请信。罗孝全收到信后，立即把信呈给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马沙利当即向美国国务卿麻西作了报告。这封“邀请信”确实有过，而且到了罗孝全之手。不过，这封信并非洪秀全所写，而是有人假托洪秀全之名写的③。

罗孝全是美国传教士，曾一度作过洪秀全的“宗教师”，对洪的印象并不好。当太平天国定都后，罗对洪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1852年9月，罗孝全在香港访问了英国传教士韩山文，从

---

①②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95页。

③ 信的原文见：《太平天国文件编》，第459页；登在《China Qverland Mail》上的信件英文译样的汉译，见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的第284—285页。

他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洪秀全的情况后①，突然对洪秀全十分感兴趣了。罗孝全说："迄今我对这个事件极少或完全没有兴趣，但是今后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他写道：

> "我猜想，已经接受过传教士的教育的领袖将是容易接近的和肯听教训的。虽然，在这个国家，他的地位是高贵的……他将充分地学习耶稣的真理，然后在向他的人民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和传教士进行合作。"②

可见，早在1852年，罗就想利用洪秀全在中国广为传播基督教。所以，他1853年5月收到那封署名为"愚弟洪秀全"的假信后，竟高兴异常，马上从广州写信给住在上海的马沙利，要求去天京找洪秀全。1853年8月3日，在传教士戴得生陪同下，罗孝全乘帆船进入长江，因行至途中受到清军水师的拦阻，他们只好返回上海。

罗孝全无法进入天京，只有另找渠道设法与洪秀全搭上关系。1853年9月25日，他在上海访问了小刀会起义军领袖刘丽川，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事后，他说："中国将被革命化和基督教化，并有一大批人通过这些手段得到拯救"，"我必须不使这

---

① 金田起义后，洪仁玕流落香港，1852年4月，他和传教士韩山文在香港相见。洪把有关洪秀全的材料留给了他。后来，韩山文根据这批材料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ion of Hung Siu-tzuen and Q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②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 Gleaner》，第67、69－70页。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8页。

个良好的机会丧失”①。

（三）“洋兄弟”寄希望于洪仁玕

1854年4月26日，美国人麦莲到达上海，接替马沙利的美国驻华公使职务。罗孝全又想以公使的随员身分进入太平天国辖区，但被麦莲拒绝。于是，传教士们把希望寄托在流落到香港的洪仁玕身上，企图通过他与太平天国联系，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是“拜上帝教”最早的信徒。他因金田首义时，未及时同大队汇合，他为避开清政府搜捕而流亡香港，求助于英国传教士韩山文和理雅各。因为他是洪秀全的族弟，才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传教士另眼相看，给他安排了教书的职务，并为他受洗。韩山文和理雅各亲自教给他的宗教知识，并于1854年出钱资助洪仁玕赴南京。但洪仁玕第一次赴京计划，由于清军阻路，未能如愿以偿，不得不滞留上海。在上海，英国传教士杨格非、艾约瑟、杨笃信、慕维廉、麦都思等，都对他优礼相待，并建立了关系。不久，洪仁玕返回香港，被英国伦敦会破格聘请为宣教士。1857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后，朝内缺乏人才，于是英美传教士就乘机鼓动洪仁玕再度前往天京。当洪仁玕准备前往天京时，上海所有的英国传教士都向他联名祝贺：“恭贺他平安到达南京，并勉励他坚定保守纯洁的福音。”②洪仁玕也向上海的英国传教士写信表示：“他的离去香港而到南京，不是为了高薪高位，乃是协助天王传扬福音，使全国根绝偶像崇拜

---

① Yuan Chung Teng Reverend Issacher Jaccox Roberts and the Rebell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1。

② 杨格非：《中国五十年史》。

的习气，归向到天父、上帝、天兄耶稣的圣教里去。”①英国传教士们对洪仁玕非常赞扬，艾约瑟在洪仁玕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后，说：

> “干王已经是忠诚的基督教徒了，干王经过几年基督教传教士的指导和影响之后，便来到南京，可能对洪氏思想有所作用，他曾试图以正统派的基督教义来指示、劝告洪秀全，改正洪氏错误的宗教观点。”②

杨格非更拍手称快地说：“我们从宗教观点来看，洪仁玕晋升最高级官职，他来到后，将对整个运动带来良好的效果。”③

从以上英国传教士的言行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英美传教士们所以对洪仁玕如此垂青，这决不是他们的“仁慈”或洪仁玕的幸运际遇，而是英美传教士企图利用洪仁玕和洪秀全的关系，为外国侵略者的侵华和基督教的传播开拓道路。后来洪仁玕坚决捍卫太平天国的立场，使传教士的“中国基督教化”的目的落空了。

由于洪仁玕和传教士有着前面所述的密切关系，当1860年6月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上海和苏州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外国教士便纷纷前往苏州。第一批到苏州去的传教士有美国的高第丕（T·P·Crawford）、花兰芷（J·L·Holmes）、赫威尔（J·B·Hartwell）及几名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他们6月23日到苏州，受到很好的礼遇。回上海后，他们说：“我们带着对叛军极其友好的印象回到上海。”④7月初，英国伦敦布道会的艾约

---

① 杨格非：《中国五十年史》。（L·S·Toster：《Fifty years in China》），第109—112页。

② 王崇武（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24页。

③ 《北华捷报》，1895年10月。

④ S·Y·Teng：《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第194页。

瑟、杨格非、杨笃信等五人又去苏州，忠王李秀成在忠王府会见了他们。他们此行的目的，一是了解太平天国对通商的态度和政策，二是了解太平天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对于这两点，李秀成都给予了圆满的答复。

对于第一点，李秀成说：

“天朝也极盼除去一切通商的障碍，如果通商能继续下去，天王将设立关卡，征收货物的进出口税。”①

对于第二点，李秀成说：

“显然贵国也象我们一样，信仰耶稣救世主。我们同一宗教，我们是弟兄。现在清朝已到末日了，天朝已占有半壁江山。苏州这个城市，最近才攻下，现在还没有建立教堂，否则，你们可以和我们一道去教堂，参加我们的礼拜。”

李秀成又说：

“我们在这里或别处常看见这些可厌的偶象，上帝曾遣送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我们的天王就是耶稣的弟弟。”②

这几个英国传教士回到上海后，对太平天国宗教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有的说，“从前太平军中宗教成份是很强的，但现在已经日渐消失了”；也有的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不过是一副面具，“不值得正统的基督教徒的尊敬和同情”③。

但，杨笃信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说：

“在这场运动中，其最足令人反对者，就是其中有些人伪称神圣临凡托身及得见天象等等。屡见于官书中

---

① 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131—132页。

③ 《北华捷报》，1860年7月14日。

关于‘天父下凡’的记载，最为可憎可厌。据记载，种种丑恶的说法居然喋喋不休地出自上帝之口，简直近乎于亵渎神圣。”

杨笃信又说：

“其缺点与错误很多而且是明显的，但是……关于这一点以及圣灵的道理，他（指洪秀全）需要亮光的开导。”①

报着这个目的，他们决定先通过干王去开导洪秀全。于是在8月2日，艾约瑟、麦高文、霍尔曼、杨笃信等五人再度访问天京。这次访问结果，更使英国传教士得意忘形。诚如杨格非所说：

“我们这次访问天京主要目的，是要从那最高首领处获得准许布道自由的谕告，目的完全达到，谕告已经取得在手，凡宣教士欲进行宣教工作者，不论任何派别，均能完全自由进入他们的占领区，并居留其地。该谕告是年轻太子亲笔写成的，盖着他父亲的印章。……我们深信上帝正假借叛徒之手，摧毁这块土地上的偶象崇拜，并借着这些人，加上外国宣教士的力量，使基督教起而代之。”②

这是英国传教士们到太平天国去“访问”和“传教”的不打自招的供白，使他们的目的及其手段昭然若揭。

（四）罗孝全访问天京

英国传教士的频繁活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利用

---

① 《北华捷报》，1860年7月14日。

② 木先：《基督教与中国百年文化之关系》，载《真光杂志》，第10期。

罗孝全与洪秀全的旧交，而且洪秀全又有会见罗孝全的意思。此事发生在1858年底英国侵华总司令额尔金闯入长江之时。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说：

“朕前游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孝全。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①

美国驻华公使得知此事后，立即训令罗孝全去天京面见洪秀全。训令说：

> “当美国政府使你和你的著名学生（洪秀全）及其信徒发生关系，而又合于你美国公民义务时，你将可以毫不踌躇地去执行你的宗教任务。”②

罗孝全带着这个特殊的使命，于1860年10月13日来到天京。

英美传教士们纷纷“访问”天京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用“正统的基督教”来代替中国的偶象崇拜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为了“纠正”革命军的“错误”，并使他们“转向好的方面”。而实际上他们是企图以传教为手段，来改变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以利于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卑鄙目的。他们的这种阴谋，自然不会被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所接受，尽管太平天国希望通过传教士来争取各国的中立、支持和购买武器弹药，而盼望传教士能多来占领区。因此，英美传教士纷纷到达天京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发生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在分析双方矛盾和辩论之前，先介绍一个耐人寻味的滑稽例子。罗孝全到天京布道的念头，历经八年后，终于实现了。1960年8月，他取道苏州，10月进入天京，住在干王府。在第二天早朝时，罗孝全也去了。按照太平天国的礼制，大臣朝见天王要下跪，可

---

①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4页。

② 艾约瑟之妻：《中国实况与人民》，第3章，第239页。

罗孝全却拒绝这样做。太平军领袖研究结果，同意罗孝全对洪秀全不下跪。但是，他们又告诉罗孝全：所有的人都必须对天父下跪。对此，罗孝全当然不能拒绝。进入接见大殿时，大臣们在大殿东西两侧排成长队，罗孝全排在一个长队的末尾，差不多是第二十名。包括罗孝全在内，高级官员们都穿着朝服。当进行礼拜上帝时，出乎意料，站在天王旁边的干王大声叫到："罗孝全拜上帝！"罗孝全迟疑了一下，终于和其他的官员们一道下跪了。但他却将面孔从正对洪秀全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也应算是拜上帝会与基督教在礼仪上的矛盾吧。

现在有必要研究一下洪秀全诏书罗孝全的目的和是否按照基督教义来建设太平天国的问题。洪秀全曾给罗孝全颁发了一道诏书，阐述了拜上帝的教义，并要罗孝全接受。《诏书》说：

> "孝全西洋同家人，识得朕心否？朕今钦赐各项诏书，尔等细认。朕诚上天否？上帝圣旨：'尔等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醒否？信否？醒信福祉矣！"①

《诏书》甚至说："约书不好此当去……朕来乃是成约书。"在《诏书》中，他要求罗孝全变成一名"改宗者"。改什么？就是改成和洪秀全一样的信念，到外国去布道，让外国人改信太平天国的宗教②。

此后，罗孝全和洪秀全之间的斗争集中反映在四个问题上，（一）传教士拜会洪秀全时的礼仪问题，（二）承认不承认"三位一体"说，（三）教会的含义和它的首领问题，（四）杨秀清

---

①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53页。

② Teng Yuan Chung: Reverend Issacher Jacox Roberts and the Rebell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1.

的“赎病主”（Savior from Disease）称号①。从表面上看，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全是宗教方面的争论，实质上却是谁“化”谁的问题，太平天国政权走什么道路问题，中国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洪秀全当然是决不会接受罗孝全为首的传教士们的要使“中国基督化”的意图的。因为洪秀全并不正真信仰基督教。他之所以要打出“天父是我自己的父亲，耶稣是我自己的哥哥，和我同由一母所生。天父和天兄使我成为统治者”②的旗号，起义前是为了号召和组织深受压迫、渴望上天有神来解救他们脱苦难、过上好生活的下层民众参加起义；建立政权后则完全是为了巩固他的天王至尊无上的地位。倘若他们真信基督，就决不会有杨秀清“赎病主”、“代天父言”，进而发生血染天京的杨韦事件。倘若洪秀全真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拜上帝会一点“不离经叛道”，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就会得到西方基督徒的全力支持。果真如此，太平天国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未来，中国科技文化的未来，可能会成为另一个样子。

这些宗教上的分歧，使洪秀全不可能信赖罗孝全。于是，太平天国广大军官对这位“洋兄弟”失去了兴趣，洪秀全对他也疏远了。

① 罗孝全认为：“这个称号是不确当的，因为它把杨秀清和基督相比，只有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世主（Savior）。”对此，洪秀全用硃砂在罗孝全的信上批道：“东王是上帝的爱子，他虽没有赎罪，但是，他赎病。”这个争论见：Jane R. Edkins, 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 With Notices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Various Parts of China, With a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Her Husband the Rev. Joseph Edkins, 1863, PP. 273—274.

② 同上书，PP. 272—273。

和罗孝全一样，还有其他许多传教士如艾约瑟、花兰藏等等，也抱着上述目的，前往天京及其太平军占领区，不厌其烦地对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们进行劝化开导，均遭失败。

（五）“洋兄弟”的“庐山真面目”

当“洋兄弟”们对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所抱的希望全部落空时，他们就反目为仇，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本人进行恶毒的造谣和谩骂，以此来发泄他们失败后的沮丧和愤懑。美国传教士花兰藏懊伤地说：

> “我去南京本来满抱希望，但我离开南京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现在我伤心地说，我所发现的，除了基督教名义之外，无基督教的实质，……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正在宣传着偶象崇拜主义，他们中间的人正在这种影响下培养自己的性格。”①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也以同样的口吻说：

> “他（洪秀全）所形成的制度，只能认为是一个失去智力平衡的人的工作，希望这种人能被说服，而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是徒然无效的。”②

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也失望地说：

> “由于我在1847年曾一度做了洪秀全的宗教教师，因此我曾期望他地位提高能对中国在宗教上、商业上以及政治上都是益，……但在他们中间生活十五个月以后，并精密观察了他们在政治上、商业上以及宗教上的行动后，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十分反对他们。”③

---

① 慕维廉：《中国的太平起义者》，第256页。

② 艾约瑟之妻：《中国实况与人民》，第280页。

③ 《罗孝全致美国公使蒲安臣函》，载《北华捷报》，1862年2月8日。

接着他又对洪秀全的宗教政策加以攻击：

“他要我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我宣扬耶稣基督福音，引人归向上帝；而是要我做他的官，宣传他的一套教义，劝导外国人归向他。”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

“至于天王所非常热心宣传的宗教主张，我相信在大体上由上帝看来是可憎恶的，事实上，我认为他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特别是在宗教方面，但我不相信他对任何事情上有健全的理性。”

因此他最后说：“我认定天王是一个疯子或傻瓜而抛弃他。”①

教义上的矛盾，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西方传教士纷纷站在本国侵略者和清王朝一边，参与镇压太平军的罪恶活动。太平天国后期在江浙地区与清军进行争夺战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阿德（H·E·Moule）②的侵略活动可见一斑。据记载：

“在12月10日我进城和我哥哥慕卓志同住了三天三夜，一天下午英国参赞巴夏礼和英国战舰‘侦察号’舰长高必特来访问。巴夏礼参赞是来同太平军将领会议谈判的，他对黄呈忠主将和范汝增主将讲了一番善于辞令而强有力的话，很可能由于这次劝告，促使太平军转移。……英国驱逐快艇‘战斗号’架着十三尊大炮和炮艇‘强健号’在英国海军舰队司令丢乐德克指挥下，由上海而来，他奉了英国提督之命来向太平军下最后通牒，并提出了条件。……清军方面的道台张景渠在攻陷甬江口的镇海县

---

① 《罗孝全在天京的自述》，载《北华捷报》，1862年2月8日。

② 慕阿德是1861年8月在太平军快向宁波进军时被派到宁波的传教士。

以后，在英国舰艇的掩护下，溯江而上，并宣称在5月9日早上三点反攻宁波，……我向丢乐德克司令报告了这预定攻城的情报，但是他认为按着军舰现有的布置，这样攻城似不可能……，最后作战双方（指英法军和清军）还是定于5月10日进攻。……美国的冒险家，人所共知的华尔将军，他是以西洋战术训练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人物，他从上海来，为要协助击退这一次突围而来……，我看到华尔将军以藐视的态度指着慈溪，在那一带，村庄还正在受着烈火燃烧，计划次日向慈溪进攻。就在两天以后，华尔将军在慈溪城脚下率兵突击攻城时，受到了致命之伤。……由于太平军的叛乱，全省被蹂躏，陷于荒凉情况，全省的传教活动停顿有一年之久，太平军是不怕神不怕鬼的偶象破坏者。……他们的失败是由于基督徒的忍耐和政府的力量，使宁波恢复了秩序，这不仅使全省脱离可怕的恶魔，而且洗净被这些人流血的叛乱者所玷污的基督徒的名字。”①

英法联军和清军联合进攻浙江地区太平军，它们屠戮无辜、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李秀成描述说：“鬼兵到太仓攻打，外有清兵来助战，打入城者，鬼兵先把城门，大小男女任其带尽。”②在这些血醒的镇压活动中，也有西方基督徒的罪行在内。慕阿德上述不打自招的供认中，是西方传教士勾结本国政府和清军摧毁太平天国事业的典型史料之一。他们不仅疯狂地仇恨东方的“异端”，攻击太平军是“叛乱者”、“恶魔”、“蹂躏”了全省，而且向英法联军、清军提供确切的情报，帮助反革命势力镇

① 慕阿德：《在华五十年的回忆和观察》，转引自天津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第24册，第34—35页。

② 《李秀成自述》。

压了浙江地区的太平军，扼杀了太平天国大有希望的南下战略的实现。“洋兄弟”的真实面貌彻底暴露了！从此，它们“劝人为善”的欺骗逐渐被中国人民所认识，继之而来的是震荡宇内的反洋教斗争，把西方宗教的伪装剥得一丝不挂。

五、在华各国传教团体及其活动

两次鸦片战争和众多的条约签订后，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各派便纷纷进入中国沿海及内陆活动。

就天主教的各修会来说，都是统辖在罗马教廷认可和制约之下，其修会派别和活动范围，本书前已述及。这里主要研究教禁解冻后基督新教的各差会及东正教布道团的传教情况及活动范围。因为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如：两次革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孙中山，都曾接近或接受基督新教洗礼；中国士子提出向西方学习，也是在接触传教以后，才开始的；中国大片土地被划归异国占领，东正教布道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等等，所以有必要专节论述。

（一）基督新教在华传教团体

1842年以前，基督新教传教士不能以传教名义进入中国内地。马礼逊等少数教士仅能逗留于广州，皆假托经商之名。其他多数企图进入中国的西方教士，只能驻足于南洋诸岛与澳门等处，如伦敦会教士驻马六甲，圣公会教士驻爪哇，均无法入境。及至《南京条约》订立以后，传教士得到条约的保护，方络绎不绝地来到通商口岸。从此来中国者，有英、美、德、加拿大

等国130多个不同的差会。如，同一长老宗中，有英、美、加拿大之分；同一监理宗，有监理、美以美、循理、美道等之别。其它教会亦如此。由于国别及差会名目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其背景与特点。

（1）**公理宗**。该宗在中国有纲纪慎会、美华会（美部会）、浸信会、伦敦会、瑞丹会、瑞华会或自理会、宣道会等不同名称，①其管理制度为全体治理，不受制于一人，是纯粹的民主制度，只重信仰，不拘仪文畛域。

其中，伦敦会是英国公理宗中的一种向国外传道的组织，起初称为伦敦传道会，也称为国外传道会、伦敦布道会，英文叫做Foreign Missions。1807年，马礼逊是基督新教第一个到大陆的人，继之者有米怜、麦都思、哈信医生、米怜之子、李雅各、吐毕医生、杨格非、韦廉臣、洪约翰、艾约瑟等陆续来到中国的大陆和港澳，巩固和发展了香港、澳门、广州传教事业，并在浙江、江苏、福建、湖北、直隶开辟了教区，在陕西、湖南、四川也建立了传教据点，培植了屈昂、梁发、何福堂（伍廷芳之岳父）、王煜初（王宠惠之父）、张祝龄等华籍教士。该会在“文字布道”和创办学堂、医馆以广收信徒的方针下，麦都思撰著《通俗三字经》，翻译《圣经》，编写《英文字典》，为当时学术界、宗教界一大贡献。李雅各把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到香港，又把中国的《四书》、《诗》、《易》、《左传》等书译为英文。哈信医生在广州设惠爱医院。韦廉臣创“广学会”于广州。杨格非创“圣教书会”于汉口，又编著许多劝世文，并著有《德慧入门》一书、翻译《和合本

① 这些会有些也同时隶属其它“宗”，如浸信会也属浸礼宗，瑞华会也属内地会系，宣道会也属其它宗系。总之，基督教的差会，组织松散，不象天主教会那样，每个修会不管国籍或地区，都须属于天主教会的教廷管辖之下。故基督新教的差会比较混乱。

圣经》等，颇为时人所赞誉。杨格非还径往苏州，会见洪仁玕，以伦敦会教友之谊，要求给予在太平天国区域内传教自由，他在中国传教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王煜初牧师因澳门为蔡高受洗的发祥地，乃筹建礼拜堂曰“志道堂”，竖横额曰“福音初到之地”。后，张祝龄倡建中华基督教，筹建“第一受洗人蔡高纪念堂”，1918年落成开幕。

公理宗是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会，故也称美华会或美部会。1830年2月，裨治文来华，他是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随之而来的有伯驾、杨顺、弼来满夫妇、夏察理、卢力、柏亨理、喜嘉理诸教士。该会在上海、福建、台湾、山西、直隶、山东都建立了教区或传教点，从事译经，创建学校、医馆诸项工作，培植了陈遂昌、翁挺生、梁文寿、谭沃心等一批华籍教士。其中最重要的是1883年喜嘉理牧师到香港时，为孙中山施洗，奠定了中山先生向西方学习及其以后在南洋诸岛、檀香山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的基础。

在公理宗系统中，另有美普会牧师儒理于1864年在张家口、蒙古等地传教，1867年又有马维廉、1876年有雷云霄等来助。此外，该宗中还有协同公会等。

（2）**长老宗**（Presbyterian）。该宗介于监理宗与公理宗之间，既不承认监理宗的监督主治之权，又与权在教友的公理宗不同，犹如共和制度的组织体制。创立者为克立文。这个大差会，因其所派遣来华的地点不同，故有苏格兰、爱尔兰、芬兰、加拿大等等的小差会。具体说，如苏福音会、英长老会、加长老会、艾长老会、纽长老会、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归正教会、复初会、约老会、基督同寅、苏长老会等等，都属长老宗会。

长老会派往中国传教的是1838年由美国来的宓（T·A·Mitchell）、何（R·M·Oir）两教士。他们最初住在新加坡，伺机向广州渗入。1842年娄礼华进入广州，次年又有教士哈巴、

高利等进入广州。不久娄礼华与高利携带印书机器到宁波。1847年娄礼华到上海协助翻译《圣经》，途中遭盗溺死。同时还有雅俾理到厦门建立传教据点。1860年，美国因南北战争的影响，教会分成南北两支，在广州、浙江方面属北长老会，在厦门的是归正教，属南长老会。1847年英长老会亦传入广州。此后苏格兰、加拿大、爱尔兰等十二个长老会，都相继派出了应斯理、麦嘉缔、倪维思、丁韪良、李佳白等数十名教士在中国建立传教据点，势力包括广东、海南岛、浙江、江苏、山东、北京、湖南、东北、湖北、福建的一些地方。

在这批传教士当中，特别要提到的是1850年进入中国传教的丁韪良牧师。他曾作为美公使翻译参与了起草《中美天津条约》，给中国权益带来了巨大损失。他在传教方面也别出心裁，编成宁波土话《罗马字圣经》，便于当地信徒习诵。在他到北京同文馆任教习前后，编辑了许多书籍，如《格致入门》、《性学举隅》、《富国策》、《天道溯源》等，均为士子和信徒所传诵。1878年，他与林乐知等设立“上海圣教书会”，把传教进一步推向南方。

1882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中国的李佳白教士，以其布道于知识阶层为其特点，先后结识李鸿章、翁同禾等人，是打入当时权臣中间少有的西方教士。1897年，他在北京筹建“尚贤堂”，以进一步拉拢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用宗教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宣扬基督新教的优点。

（3）**信义宗**（Evangelical Lutheran），也称路得宗。是基督新教中最古的教派（其中包括：巴色会、德信义会、丹路德会、北美信义会、中美信义会、芬信义会、自立信义会、长老教会、挪美遵道会、信义公理会、豫鄂信义会、信义长老会、挪路德会、挪信义会、礼贤会、瑞美行道会、瑞信义会、瑞行道会，等等。“人得称义，端赖信仰”，为该宗要道。其对于圣餐的见解，固不信饼与酒即为基督的血肉，但确认在酒饼之中有

基督实质在其中。在中国的名称虽不同，而后则统称之为“中华信义会”。其组织体制类似议会制，由各堂决定其自治权。

最早来中国传教的信义宗差会，是礼贤会与巴陵 会（ 巴色会）。1830年的时候，德教士郭实腊受荷兰教会差遣，来中国传教，侨居澳门，学习粤语，1838年受聘于香港英政府任翻译官，日则办公，夜则讲道。1847年，礼贤会便派柯士德、叶纳清二教士东来。柯士德至江门患痢疾故世。叶纳清入虎门镇口，布道施药，协助他的有中国牧师王元深（即王宠惠之祖）。继后又有罗存德、高怀义，由德国来华推广教务。

信义会在中国传道的区域，可以分为豫鄂、湘中、湘西、豫东、豫中、粤南、陕西、关东等处。它们虽为同一宗派，但因差会的来源不同，湖北、河南是美国的，湖南是挪威与芬兰的，粤南是德国的，陕西是挪威的，关东是丹麦的。历史最老的，则在豫鄂，称为中华信义会（原称豫鄂信义会），系由樊城鸿恩会、信阳路德会、光州信义会三会联合而成，创办人为李立生牧师。他们都从办学、设医院入手，在介绍西方科技、教育等方面有一定贡献。

此外属于信义宗的，还有行道会。它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瑞典韩宗盛、任大德、梅保善等牧师于1890年在武昌创始；北支乃由美国马德胜牧师于1891年到襄阳开创。行道会南北两支在湖北各地建了不少教堂，也办了不少学校和医馆。

（4）**浸礼宗**（Baptist）。它注重以全身浸入水中，为信仰的表示，信道全由个人自己意志的决定，父不能强其子，故不收未成年之童子进教。它实行绝对民主的体制，信徒一律平等，无等级之分，会中执事，不过是一种职务，没有管辖权力。属于浸礼宗的有：来复会、美浸礼会、英浸礼会、孟那福音、新约教会、友爱会、美浸信会、瑞浸信会、安息浸礼会，等等。来中国传教的安息会、基督会、三一浸会虽都注重浸礼，但不属本宗系统。

浸礼宗在中国传教区域，分为华南（包括两广、山东）、华东（包括江苏、浙江）、华北（包括山东及山西、陕西、东三省一部分）、华西（四川）、华中（包括河南、安徽）五区；还有英浸会在山东、山西、陕西间，瑞典浸会在山东等地的教区。

最先到中国的浸礼宗教士，是1836年到香港的叔未士与1837年到澳门的罗孝全，旋成立教会于香港。过二年在广州租一平房，组成粤东浸信会。1847年后，晏马太夫妇在上海建立传教点，罗梯尔在宁波办教会，1849年高德来华布教于杭州等地。此后，华东区传教事业日益兴盛。1856年纪好弼到广州，使浸会扩大传教范围。他传教不仅限于广州，且推广到肇庆及广西梧州、桂林等地。此后，1860年，花、海两牧师到烟台建立传教点。不久，花牧师死于太平军战役，海牧师把传教事业推广到青岛、济南等地。1864年，潮州人黄宝山等创“岭南教会”，在潮州、汕头、揭阳等地都有传教据点。1889年，有魏、侯两牧师到了四川，组织了传教点。1894年，又有十一个教士到四川，在泸州、自流井、嘉定、雅州等地成立教会。

浸会传教方式，大体和上述各宗相同，如注重文字传教，办学校、设医院、开书局、办报纸等等，以招徕崇信者。上海沪江大学就是在1900年创办的。香港的《真光杂志》也是浸会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值得着重一提的是，1850年洪秀全曾投浸会传教士罗孝全施洗，未成，这是他领略梁发的《劝世良言》“真缔”后，与西方教士接触的重要记载。倘洪秀全果真入教，并坚持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开放，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英国浸会牧师李提摩太是这一时期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教者。他于1869年经朝鲜到达中国，先后在山东、山西为英国浸会开辟传教据点，又在山西放赈以争取信徒，并注意于教会的自治自养问题。培植中国的中坚教徒。王保泰便是该浸会在中国培养

的第一个牧师。1890年，李提摩太到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任上海同文书会（后改名为广学会）总干事，与洋务派张之洞、李鸿章都有交往，同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也有联系。维新变法失败后，曾帮助康有为离京赴日。此前，还要求清政府实行新政，此后又反对义和团。总之，他在晚清期间，对朝野臣吏士子的决策都有影响，是英国浸会在中国传教的佼佼者。

（5）监理宗。创始者为卫斯理，故亦名“卫斯理宗”。其英文名称为Methodist，原意为循规蹈矩的意思，因而译为“循道”，亦有译其音为“美以美”。其组织为监督制，最高立法权操于大议会。

基督新教在中国共有八个大的差会，第一个传来中国的正是美以美会（即监理宗）。美以美会的马礼逊于1807年到广州。1847年柯林斯和怀提夫妇三人到了福州，开始学习汉语。次年美国又派赫克来作后援。此后，美以美会派了不少教士来到中国，建立了福建、江西、北京、四川传教年会。

美国南方的美以美会，在中国称监理会，于1848年派秦右牧师等到上海建立了传教据点，以后又有不少教士来到中国，把传教事业推广到苏州、杭州、湖州、常州、无锡等地。

监理宗下属的小差会主要有：美福音会、循理会、美道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遵道会、圣道公会、循道会等。

圣道公会是监理宗的一支。1860年，有英国牧师郝differ康、殷森德二人到天津设立教堂，是为华北圣道公会传教的开始，以后推广到山东、天津、唐山等地。1869年，英国圣母会派遣教士阚斐迪、燕乐拔到宁波传教，从鄞县开始推广到奉化、象山、上虞各县。从此，该派在南方建立了传教基础。

循道会是在1863年由葛君（Gossah Cox）传入湖南湘潭，但未能立住足。1880年，苏格兰教士都亚当往来于湘鄂间，卖书

传教，但成效甚微。

（6）**圣公宗**（Holy Catholic Church）。初译为“圣而公之教会”，也有译英国圣公会为“安立甘会”，也有称为“监督会”，1909年则通称为“中华圣公会”。该宗不问其来自何国，其组织为监督制，其仪式近于天主教，故为新旧教的调和者。与旧教不同之处在于大度包容，采取自由主义。

这个宗主要有：英圣公会、加圣公会、美圣公会、华北英圣公会等。

圣公会由英、美、加拿大三方面传到中国，把中国传教区分成十一个辖境，即：属于英公会的，有浙江、福建、港粤、华北、山东、四川、桂湘七辖境；属于美圣公会的，有江苏、鄂湘、皖赣三辖境；属于加拿大圣公会的，则有河南一辖境。

这三派圣公会中，最先来中国传道的是美圣公会。1835年有骆、韩二教士来华传教，因为不能入境，留驻于爪哇对华人传教。1844年文惠廉主教至上海，建立了圣公会的基础。由此推及江苏全省，皖赣、鄂湘等几处的教务皆由江苏主教遥领。1863年，第五任主教郭斐蔚任职后，教会益形发达。该会在后来于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在武昌创办的“文华大学”都是名播中外的。

英圣公会于1835年即有布道中华的意思，只因经济、人才的缺乏，未能如愿。直到1843年，英国某富翁捐款，遂派史密斯主教至香港，开办学校，即后来的保罗学校。1848年始在宁波开始布道。后来，戈柏、陆赐在此传教三年，仅得二人信教。1850年，该会又派韦、翟二教士至福建传教，初无效果，十年以后派医生前往施医，教会始渐发达。尔后，岳斐迪、包尔腾、慕稼谷等来宁波，传教事业才有发展，并建立了华北教会（总理直隶、山西及东三省会务）、浙江教会。在浙江教会中，中国任会长的，要以沈恩德为第一人，此后又有王有光（王正廷之父）、

夏光耀、陈醒志为会长。

霍约翰任香港主教时，曾派教士至广州传教，并建立教堂及男女学校等。

该宗在四川布道始于1868年。到1860年盖伟良入川，会务有进展，五年后他被任命为主教，四川成为一辖境。英圣公会在广西和湖南南部，也有传教区，称为桂湘辖境。

加拿大圣公会曾以河南为传教地，怀伟廉于1910年任主教，故河南辖境，在圣公会为最后建立的教区，而发展却甚快。

（7）**内地会**。这是专门向中国内地传教的教会总称。它并不属于某个宗派。其中，有的教士是属于别的宗派下的小差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某个或某几个教士为到内地传教而自由结合在一起，都叫做内地会成员。各种内地会虽各有特点，却不能成为一种宗派，乃是一群狂热的中外传教士，自由组织的传道团体。如：内地会、德女公会、女执事会、自由会、德华盟会、瑞圣洁会、立本责会、挪威会、挪华盟会、北美瑞挪会、瑞华会（亦属“公理宗”）、瑞华盟会，等等，皆为内地会系统。这个内地会系的创始人是英国戴得生牧师，他在中国传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当他在英国的时候，听一个医生演说中国乏人传教的情形，便邀集许多信徒组成“醒华会”，1853年他被派到中国来。后来因与该会意见不同，就脱离关系，独自传教。1860年，因病回国，到处演讲中国需要传道情形，越二年，带了家眷和十六位男女教士，重来中国，以杭州为根据地。1867年，成立了杭州、绍兴、宁波、奉化、台州、温州六处教会。同年，他派童跟福（George Duncan）到了南京，戴氏自己到扬州、镇江。转年，又在清江浦设立教会。1869年，梅度士（James Meadous）、韦灵生（James Williamson）在安徽省城布道，高学海（J·E·Cardmell）在九江卖书传道。他们虽已在浙江、安徽成立教会，但仍竭力扩张。1875年，又开办武昌教会，作为向西北传

教的根据地，同时函请英国续派传教士十八人来助，分赴山西、陕西、甘肃、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处，先后设立教会。他们还到过西藏进行传道。那时仅有二十余人协助工作，外国传教士中本来只有英吉利、苏格兰、爱尔兰人，至此则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等国的教士，同来合作。西南的苗族、侗族，尤为内地会注重的传教对象，于是派遣亚当氏（J·R·Adams）、华德氏（B·C·Waters）前往传道。从1888年起，经过八个月就有一千人信道，而在贵州几近万人，云南亦有数千人。又有泰罗女士（Miss A Taylor）孑身进入西藏内地，茂尔夫妇（J·R·Muir）在松潘、茂州，潘根（George Parker）、衡德（G·W·Hunter）在新疆迪化，先后开堂布道。

（8）其它教会

所谓其它教会是指不归属于上述七大差会（宗）的一些小差会（个别的除外）。主要有：贵格会、宣道会、公谊会、美女公会、使徒信心会、上帝教会、弟兄会、美基督会、五旬会、南直福音会、复临安息会、瑞美会、救世军，等等。

其中，贵格会是一种自由的组织，于1887年由美国传到南京，初创的教士名义白理，继任者乃中国牧师高师竹。宣教会在长沙、武昌、无为、临潭、梧州等地；公谊会就是英国的贵格会，传道于四川。美女公会传道于上海。使徒信心会传道于广西、陕西、山西、浙江与上海等处。复临安息会传道于浙、苏、桂、燕、闽、豫、湘、粤、晋、鲁、陕、蜀、滇等省。上帝教会传道于燕、陇、桂、粤、晋、鲁、陕等省。南直福音会在直隶。救世军在燕、晋、鲁。弟兄会在闽、赣、苏、鲁。五旬会在云南。美基督会在南京与安徽。瑞美会在广东。这些小差会都有相当的传教能力。

（二）各差会来华传教的目的

传教士何以要来中国？据他们供称，就是要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起光辉的十字架”①。这说明传教士来华的宗旨是以传教为掩护，服务于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侵略政策，才是其实质所在。据美国传教士斯贝杰供认：

> “在美国领事与美国传教士之间，有一种具体的谅解存在，即后者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

美国公使田贝说：

> “这些先锋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②

西方各国政府对有贡献的传教士，也是论功行赏，不负他们为帝国扩张效忠。如《望厦条约》缔结后，伯驾侵华有功，1855年9月便正式任命他为美国驻华使节。此后，他的第一件任务便是设法修订《望厦条约》，扩大美国在华既得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亲赴欧洲向英、法当局游说，表示了美国愿意和他们在中国充分合作的诚意。1856年12月12日，他又向国务卿麦西（Marcy）提出一项令人吃惊的建议，主张由美国去占据台湾，法国占据朝鲜，英国占据舟山，待修约问题得到清政府答应后，再‘归还’中国。由于美国海上实力不强，麦西不敢轻率应允，此恶毒计划才未付诸实施。伯驾并不因此罢休，又于1857年2月12日向美国国务院建议说：

---

① 这是1868年9月代表清政府赴各国接洽修约的美国外交官蒲安臣在纽约州长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发表的言论。详见卫斐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列强的使团》，1912年，第119页。

② 《美国外交档案》1888年，第221页。

"台湾在目前已经成为我们许多商人的一个极有兴趣的题目，它理应从这个伟大的西方商业国度得到比过去更多的注意才对；切盼合众国政府不要在这个关系着人道、文明、航业及商业各方面利益的、关于台湾的行动上退缩不前……"①

1857年3月10日，伯驾又写了一个"密件"给美国国务院，更加露骨地说：

"这个岛屿（台湾）可能不会长久隶属于这个（清朝）帝国，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如同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美国就显然应该占有了它，特别是有关于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的理由。"②

但是，由于那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强大，伯驾建议美国侵略中国台湾的阴谋未能得逞，又被美国政府暂时搁置了起来。

1858年，美国利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机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取得在内地"游历"、增开口岸、改定关税、自由传教等特权。在这次订约过程中，美国教士威廉士、丁韪良（W·A·P·Martin）等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差不多每一款草拟时，美国公使列卫廉都曾参考这两个美籍教士的意见，尤其是第二十九款完全是两人草拟和定稿的。这一条款规定："凡遵照教规安分习教者，无论其为美国公民抑系华籍教徒，他人毋得骚扰。"这不仅把中国的教徒划归美国保护，挫伤了中国教徒的民族感情，侵犯了中国政府的管辖权，而且提高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同时也为西方其它列强各国强迫清政府订约提供了先例。如英国侵略者就赏识这一条款，他们强迫清王朝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事实上完全是美约的翻版。事后，香港英国主

① 〔美〕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289页。

② 〔美〕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284页。

教曾在其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中，深深表示过对威廉士、丁韪良二教士的感激。1858年，美公使列卫廉给国务卿盖斯（Cass）的信中这样写道：

“……此外我必须提及，传教士及与传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他们所做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①

十字架与强权政治相结合，推行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政策，不仅想吞灭中国，也吞灭了他们自己，因为传教士的伪善外衣，逐渐被数不清的教案所揭穿，人们不再相信基督教了。当然，东正教传教士也不干落后，何况这些东正教士心中还有一个俄国沙皇欧亚大帝国意图呢！

（三）东正教的传教活动

早在1781年，以岳阿基穆为首的第七批沙俄东正教布道团来华时，沙俄政府就指示他们设法获得“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1818年8月4日，沙俄政府向布道团下达训令说：“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②。1823年2月14日俄国外交副大臣涅谢利罗德给宗教事务和教育部的信中说：“布道团神职人员应当从事中国人的农村经济、他们的家庭生活、农业等的情报收集工作。”③1854年又重申“布道团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新派到北京去的布道团监护官

① 《大公报》，1954年1月19日，“史学周刊”，第二期。

② 布拉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中俄关系史略》。

③ 布拉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中俄关系史略》。

搜集有关中国及其领土的可靠情报”①。从上可见，东正教布道团的所谓传教活动完全是一种伪装，它的传教士所干的与现代国际情报人员的间谍活动毫无区别。

事实上，布道团的一些神职人员本来就是沙俄军事或外交机构派遣的人员或间谍。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到处搜集情报，盗窃机密或以“中国通”的身份直接参与沙俄侵略中国的种种不光彩的活动。在帝俄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过程中，他们出谋划策，提供情报，甚至直接出面参与其事。例如布道团第十三班及十五班领班大司祭巴拉第，来华前原为俄国驻罗马使馆的官员，他在华三十三年的活动中，广泛搜集中国边疆地区的政治、军事、贸易、民俗、宗教等情报，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1847年，俄国政府为了通过贸易向中国边区进行渗透和侵略活动，他曾建议与中国政府进行有关新疆地区的贸易和伊犁等三地通商的谈判。而最初提到这个谈判的就是巴拉第给俄国外交部的报告。1853年这个神职人员还用密写墨水给俄国政府写了一份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了茶叶北运，可能导致恰克图茶叶贸易大幅度下降的绝密报告②。可是，现代苏联人齐赫文斯基在他的著作中却公然为东正教开脱罪责，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沙皇俄国……没有用传教士作为商业扩张的间谍”③。这实在是欲盖弥彰，把自己维护沙皇、东正教形象的面目暴露得更加彻底。1853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侵占黑龙江北岸的所谓“武装航行”计划，也是参照巴拉第在乌苏里江黑龙江一带亲自调查所提供的详细情报制

---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189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2页。

② 格尔：《十九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载《红档》杂志第53卷，第166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

订的。此外，巴拉第还在1855年（咸丰五年）中俄划定边界的交涉中，为穆拉维约夫提供了大量的中国情报。他在一份报告中说，在划界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曾有所变化，断定“中国政府由于内乱四起，不得不对我国采取妥协政策”。穆拉维约夫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因而对巴拉第“从北京送来的各种情报”和“参与处理我国同中国的外交事务时所表现的善良意愿”，“表示谢意”①。穆拉维约夫在1856年1月12日还特地发出“指令”，极其露骨地要巴拉第“在北京施加影响”，使边界问题的解决对俄国有利。再如，堪察加教区大主教英诺肯提乙（后任莫斯科都主教）在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以前，就曾为穆拉维约夫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制造舆论，出谋划策，甚至直接参与军事占领活动。1858年5月《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穆拉维约夫为纪念英诺肯提乙在侵华活动中给予的“最积极的赞助”，特地把海兰泡易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因为英诺肯提乙最初曾在伊尔库茨克的“圣母报喜堂”担任过神甫②。

东正教帮助沙皇侵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的，只有憎恨和鄙视。这一段东正教劣迹的记载，完全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

① 《1856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给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的指令》，转引自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第七章　近代早期教案及民族矛盾的激化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史。西方列强的宗教渗透和侵略，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而扩大加深了，教会和教士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也在各方面展开。特别是《中法北京续增条约》、《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使这种矛盾达到激化的程度。其表现形式为：(1)1844——1860年间发生的规模较小、影响不大的民教磨擦，可称为弛禁后的早期教案；(2)1861——1895年间发生数百起规模较大的教案，并引起严重的中外交涉，是教案进入高潮的时期。各省、府、州、县人民反对外来宗教侵略的斗争，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教士为什么会大批涌进中国，且不为中国人民所欢迎，并与中国人民发生矛盾，以致发展成为打教的群众自发运动呢？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赋予了西方传教士以掠夺的特权，使他们一部分人从"福音"的传布者变为经济掠夺者、政治压迫者。教士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出身低下，生活清贫，当窜进一个地大物博的东方大国时，便贪婪地掠夺中国的财富。他们侵人权，夺人利，当然不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何况他们中许多人心狠手毒，计谋多端。从1860年《中法北京续增条约》草案中，传教士已经取

得了“还堂”的权利，而充任条约谈判翻译的法国天主教主教孟振生（Joseph Martial）和神甫德拉玛（即戴辣玛，Delamaus）对此还不满足，竟私自在条约的中文本上增添“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的文字。昏愦无能的清政府就默认了。从此，传教士拿着法领事发给的要中国官民“丝毫不准留难”、“以宾礼相待”、“随时照料”的执照，横行中国。各国传教士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也鱼贯进入中国内地。特别是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给了外国人在内地自由旅行的权利，西方教士更是潮水般涌进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到十九世纪末，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基督教差会，竟达八十个之多，天主教修会也不少于八十个；它们在全国绝大部分府、州、县及乡镇几乎都建有教堂②。

西方教会迅速地渗透中国各地，在发展教徒、归还教产、掠夺房地产、“慈善事业”、教士干政、教民横行逞凶等方面干尽坏事，必然与非教百姓、士绅官吏发生严重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实质说明了：民族的、信仰的、生存的三大危机，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被迫起来反抗，以挽救亡国灭族断宗的危险。人民的斗争规模逐渐从小到大，斗争目的逐渐从自发到自觉，斗争的内容逐渐从打教发展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一、弛禁后的早期教案（1844—1860年）

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清王朝实行教禁解冻和

① 余能模等编：《中外条约汇编》，第1册，第147页。

②《中华归主》，1922年版。

传教宽容的政策。1844年，道光皇帝的朱批（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仅是传教宽容，并不允许教士们进入内地传教。清廷再三申明：传教士"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①。所谓"断不越界"，是指不准逾越条约中所议定的各通商口岸的界址范围；即便是在口岸范围内传教，也必须是"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②。对这种限制自由进入内地的规定，不但传教士不满意，就连西方各国政府也深为不满。为了取得深入中国内地的特权，以英、法为首的侵略者便设法寻找新的借口，酝酿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传教士不顾清廷禁令，加紧对中国内地的渗透。

仅据王先谦的《东华续录》等史书的记载，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起，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的十五年间，天主教、基督新教违约非法潜入中国内地的，至少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西班牙、德意志等七国的五十二名传教士（此前早已潜入内地的数十名尚不计算在内）。他们活动地点从最北部的黑龙江到最南部的广西，从伸入大海的山东半岛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足迹遍及全中国。兹列表于后，以便省览：

---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6，第2880页。

②同上书，第3136页。

1844—1858年非法潜入内地的外国传教士及其活动范围①

国别	人数	传教活动范围
法国	33	浙江、江苏、广州、广西、福建、江西、湖北、河南、直隶、陕西、甘肃、四川、川边藏区、云南、贵州、山东、北京、天津、新疆、热河、察哈尔、蒙古、西藏、盛京、黑龙江
英国	6	浙江、江苏、广东
意大利	6	湖北、陕西、山东、山西
美国	1	北京、山东
西班牙	1	湖北
德意志	1	广东
葡萄牙	1	北京
不明国籍	3	湖北、山东、热河

非法进入内地比较典型的例子很多。如：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天主教遣使会教士顾铎德(Vier Tiomothee)即潜赴定海厅城内，建教堂一所，并指派福建籍中国传教士方安之驻堂传教②。结果，引起了鸦片战争后的第一起民教纠纷，成为

①此表资料来源：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朝），卷56；（咸丰朝）卷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3、75—79；咸丰朝卷2—7、11、17、21、45；《第二次鸦片战争》，第9册；《近代来华外国名人辞典》。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第178—179页。

交涉事件。

当然，为了避免被官方以违约之名“盘诘”或抓获，潜入内地的教士们在出发前都要有一番准备工作，因他们的“衣服语言与中国不同，遂改穿内地服饰，学习中国口音；又恐关口盘诘，剃去头发……与内地人大略相同”①。他们潜入内地后，又多联络当地教民，“雇令服役”，作为响导，或“随行活动”时作掩护。1846年初，地方官在西藏查获的非法潜入藏区的法国遣使会教士约则噶毕（Gabet Joseph）和额洼里斯塔(Huc Evarise—eregis）就是身着蒙古喇嘛服，他们经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山东、直隶，到达北京，之后又至热河，进入盛京、黑龙江、内蒙、外蒙、察哈尔、甘肃，最后进入西藏。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查找原来天主教堂旧址及旧有教徒，为日后“还堂”交涉作准备。他们所到之处，或住数日、数月，或年余不等，竟然周历中国大部分地区而未被发现。

1857年热河朝阳县境内传教士建造天主教堂并聚人讲习福音。咸丰帝一面命地方官严查，一面下谕说：“朝阳县界，并非各夷通商之地，岂容建立天主堂，聚集多人，致滋流弊。”②1858年4月，天津地方拿获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兼内蒙教区主教孟振生派来传教的中国籍教士邱云亭，解省审讯时，咸丰帝震怒，谕批曰：“似此匪类，不止一人，务须严加根究。”③可见，在《北京续约》签订前，教士入内地传教已引起清廷相当的重视，并将进入西藏、蒙古、四川、江西及广东各地的传教士八人，押到广州交领事管束。

---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76。

②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7，第591页；卷20，第709页。

随着归还天主教旧产谕令的发布，天主教传教士便借口归还历代被查封的天主教“旧产”，开始反攻倒算。他们一面由法国驻华公使、领事或主教出面与清廷交涉，一面潜入内地直接霸占、强夺“旧产”，甚或民宅、民田、公堂、廨所。他们有的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私入民间田舍屋宇，奸污妇女等等。于是，由于传教士们的为所欲为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导致的纠纷和教案开始屡屡发生。据不完全统计，1844—1860年间，东南沿海及内地发生的教案或华洋争殴事件多达数十起。其中比较典型的有：1848年2月福州黄竹岐地方的华洋争殴，1848年3月青浦发生的教案，1851年浙江定海教案，1855年南昌、鄱阳的打教事件，以及1856年的广西西林教案等等。现简述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剖析，以窥一斑。

（一）福州黄竹岐民教斗殴（1848年）

1846年，道光皇帝虽然发布上谕允许外国教士在华传教，但因历史上禁教风气的沿袭，加上天主教士们的横行嚣张，故“云南、湖北等省，尚在拿办天主教”。有的省份尽管不再禁止，但也并非听凭教士任意传教，如“四川、湖北、山东等省，将该国（指法国—引者）传教洋人凌辱”。有的地区还发展到直接的民教冲突，甚至持械斗殴。福州黄竹岐地方的民众愤怒反抗法国传教士横行霸道的斗争，即是一例。

1848年，法国传教士在福州传教，并借口还堂，欲侵占黄竹岐地方的马神堂。马神堂原是当地村民的莹地。侵占莹地改建教堂，这在中国百姓心中是决不能容忍的。消息传开后，四方八乡的民众愤起护卫祖宗莹地，而教士却带着教民硬要扒坟建堂，于是民教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村民被殴伤多人，教民也有受伤者。事件发生后，法国领事向清廷提出抗议。清廷统治者及地方

大吏鉴于进入内地传教仍在禁例中，故在分辨是非曲直时，尚能据理力争。上谕曰："此次黄竹岐华洋争殴之事，该国若能约束禁止，何至动起衅端？"根据这次事件，清廷重申："非贸易不得无故滥入民间田舍屋宇。……该国洋人勿再擅自入内地传教，以昭信守。"①

由于清统治者对此事件持强硬、公正态度，法国领事自知理屈而作罢。

（二）青浦教案（1848年）

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踏进上海不久，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就逼迫上海道台宫慕久公布《上海租地章程》，开了中国城市设立外国租界的先例。传教士等到达上海之后，便买地建堂、设医院，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伴随着英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传教士们的宗教活动内容日见其少，而文化侵略的性质却与日俱增，从而引起了民教冲突。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nurst）、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非法进入离上海九十里的江苏青浦县传教。这就违反上海开埠时议定的"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他们还在城隍庙一带散发宣道小册子，引起了大批乡民和漕粮船水手争相索取，在混乱中，雒魏林竟举起手中拐杖在几个水手的头上乱击，"把最前排一人的脸给擦伤了"②，激

---

①《宣宗实录》，卷451—455。

②兰宁、柯灵：《上海史》，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81页。

起了众愤。水手们还击，“投更多的石子”①，致使这三个传教士“受有轻伤”②。这就是青浦事件的真象。

事情发生后，英国驻上海第二任领事阿礼国不仅不承认传教士的越境错误和打人罪行，反而乘机小题大作，有意歪曲事实扩大事态。据《阿礼国传》中写道：“阿礼国先生不失时机地向中国当局要求给予完满的赔偿。”③从事件发生后中英双方的交涉经过，可以看出侵略者的卑鄙手段：

三月九日，即青浦事件发生的翌日，阿礼国向上海苏松太道台咸龄提出“惩凶”、赔偿的要求。当时咸龄回答阿礼国“斗殴细故，不足深诘”。而阿礼国竟当场“语侵观察，适持长枋折叠扇在手，乃以扇拍观察之首而击之”，对咸龄横加殴辱。咸龄对上海道台吴健彰说：“执民以媚夷，吾不为也。”④

十日，咸龄致函阿礼国，指出三位传教士到青浦去，这本身就是违反定章，并写信慰问麦都思。

十一日，阿礼国致函咸龄，抗议他直接给麦都思写慰问信，蛮横地说咸龄此举“不但违反惯例，而且对他本人是一种侮辱”。

十二日，阿礼国要求“迅速拿犯”严惩。没有答复。

十三日，阿礼国发布告，并向中国当局宣布：“在未获得满意的解决之前，所有英国船只进出口的货物一概不付税；再有，所有装载贡米准备出海运往北京的一千四百艘运输船队，一律不

---

①《四个传教士的报告》，见《英国蓝皮书》，第49号文件，附件2。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6，第9页。

③密契：《阿礼国传》，第1卷，第129—135页。

④夏燮：《中西纪事》；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334页。

准驶离港口。”①

十四日，阿礼国命令“停泊在船队下游河中央的‘契尔顿’号（Chiltern，英舰）在最有效的封锁位置上”②封锁港口，禁止漕船出入。

十九日，阿礼国派副领事罗伯逊（B. Bobertson）乘英兵舰“爱司比格”（Espiegle）号前往南京，递交照会，直接向两江总督李星沅进行恫吓。其时驻上海的法国和美国领事致函阿礼国，表示完全赞同并支持其行动。在侵略者的威逼下，李星沅屈服，开始查拿“凶手”。

二十八日，传教士麦都思在江苏臬司倪良耀陪同下，到县署认定王明副、倪万年为“首犯”，并抓捕另外八名水手。阿礼国宣布撤销封港禁令。

三十日，阿礼国根据麦都思等三教士的“失物单”，要求赔偿。地方政府赔偿银三百两。

三十一日，两江总督李星沅接见罗伯特，告知事件已妥善处理完毕。罗伯特、巴夏礼坚持要求总督另派大员再赴上海查办。李星沅又派藩司傅绳勋前往查办，并亲赴英舰和传教士寓所“拜访道歉”③。同日，阿礼国在给香港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的信中，洋洋得意地自诩，他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迫使地方官让步的。

四月四日，阿礼国照会咸龄，要求严管所拿十名“凶手”。十名中国水手被“枷号示众”。

四月十八日，阿礼国照会要求将十名漕船水手“照白昼抢夺等律定拟，帮办县令均应科办”。不久，咸龄被革职，交刑部议罪。水手另定罪名。

---

①②《阿礼国传》，第1卷，第129页。

③高龙倍：《江南传教史》，下编，第2卷。

五月二十日，阿礼国照会署理上海道台吴健彰，表示同意中国方面所作出的处理决定。

二十七日，江苏巡抚委员随同吴健彰前赴英国领事馆面交对十名水手更定罪名及对咸龄革职拿办的公文。

从以上经过可以看出，阿礼国使用的讹诈手段使清廷就范，具体采取了三步：首先命令全部进出口英船停止交税；其次，用兵舰封锁港口，进行武力威胁；最后，派兵舰给地方最高官吏施加压力。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他就炫耀自己的手法高明，他说：

> “我采取的这三种手段，一个比一个厉害，它们是互相关联的；如果停付关税长久之后，中国人就会受不了，这样就可使他们不至于将事情拖延了；一千余只粮船不准出口，这必然地会立即引起地方官的注意。”①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懦弱，科学知识的缺乏和军事力量的落后。阿礼国在进行这场讹诈时，是做贼心虚的。《江南传教史》的作者写道：“这是一件大胆的事情，但是这个计划的成功就是靠了这次大胆。”德庇时给阿礼国的指示中说：“恭喜你的成功，但只此一遭，不能再干。”②

当时阿礼国只拥有两艘很小的军舰，一艘开赴南京去要挟，一艘封锁港口。这艘担负封锁任务的“契尔顿”号，仅是一艘装了十门小钢炮的双桅船，据说是靠了一个“真正的英国人”毕德门船长的“坚定”，就把一千四百艘粮船挡住不能出口。当时，道台曾下令，让部分粮船在五十艘中国兵船护航下驶离港口，但却被这艘小小的英国军舰开了几炮就吓住了③。地方官当中也不乏有爱国之心的人，但由于他们的无知和得不到清政府及上级大

---

①《英国蓝皮书》，1848年3月31日，54号附件12，阿礼国致德庇时函。

②③《阿礼国传》，第1卷，第135页。

吏的支持，对这样一个事件竟然无能为力。这就开了清廷在教案交涉中屈服于列强的先例。但是，这次青浦漕船水手一万三千余人参加的反洋教冲突，也显示了中国人民蕴藏着的强大反抗力量。无怪乎德庇时告诫阿礼国“只此一遭，不能再干”。

（三）定海教案（1851年）

早在1844年，法国教士顾铎德派中国教士方安之在定海建立教堂时，就发生过人民反抗的事情，只是战争刚结束，清廷怕生衅端，故进行了袒护。到1846年2月，清廷准许“还堂”，从此，“给还旧堂交涉”在各地时有发生。定海教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发生的。

1851年12月，在中国教士方安之的支持纵容下，教徒们乘机霸占了定海城内的几处寺庙庵院，遭到了定海人民的反对。据史料记载：当时法国传教士顾铎德派去驻定海城内天主堂传教的方安之，诱迫教民“屡将乡间各庄寺庙庵院献入教堂，踞占把持，各庄士民因屡被欺扰，群怀不平”，乃聚集村民，“逐出教徒，收回被占寺院”①。

教案发生后，法国教士顾铎德立即随同该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前往宁波、定海，威胁地方官，要求地方当局立即“严办村民，押让寺院”，否则，“即飞调火轮兵船来此进攻”②。浙江巡抚常大淳对法国领事的无理要求给予了“正言拒覆”，并命道台等下属官员要“团结民心，以资折服，断不可任其挟制”，对不法教徒也申明将要“查拿究办，不加庇护”③。但当时清廷正

---

①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第178—179页。

②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04页。

忙于对太平军作战，在处理外国教士的纠纷时要求各地官员“不可过于苛求，以致别生枝节”①。清廷上谕软弱，官僚们只好奉命行事，仍坚守成约，将此事不了了之。

（四）西林教案（1856年）

西林教案又称马神甫事件。1853年，法国外方传教会教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违约非法从广州潜入西林县，利用传教名义，勾结知县等官吏，欺压人民，强奸妇女，作恶多端。并纵容包庇教民无故在乡间起衅，进行抢掠奸淫，肇事多起。民愤极大，上控省大吏。1856年，新任西林县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逮捕并处死。法国拿破仑三世及其政府便借口此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后，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条约》，赔偿白银二百万两②。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弛禁后的早期教案规模很小，影响仅及一城一县，引起的对外交涉也很易于处理。但是，随着“还堂”事件的恶性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再一次战败及不平等条约给予教士内地传教的权利等等，西方传教各修会、差会纷纷侵入中国腹地、边圉之后，西方教士中的一些人利令智昏，摆出征服者的架势，藐视官府，欺压良善，敛财害命，淫人妻女，把西方殖民统治者的暴虐手段，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被他们称之为“暴乱”的“教案”，完全是由于入侵者的罪行所引起并遍及全国的。

---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55页。

②《文宗实录》；夏燮《中西纪事》。

二、“还堂”事件的恶性发展

1860年《中法北京续约》第六款规定：对于“滥行查拿”传习天主教者，“予以应得处分”；同时，清政府还承认康、雍、乾期间没收传教士非法所占房地产的行为是对教士的“谋害”，同意“归还”教产。产业所在地点，由法国教士指定①。“归还”的范围包括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各项财产。从条文上看，“归还”仍规定只给“该处奉教之人”。但实际上一经“还”了，就成为教堂、教会财产，而教堂、教会财产又都是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尤为奇怪的是，清政府要将上项财产“赔还”法国公使，由法国公使再转交“该处奉教之人”②。于是，法国公使便成为天主堂财产的合法代表。

就在议订《中法北京续约》的当年和后一年，北京、济南、上海、杭州的传教士纷纷要求“归还”教堂旧址。第一批归还的是北京的南堂和北堂。对于其它地方的“还堂”问题，起初清政府曾指示地方官吏断不可听任传教士“凭空指控”，任意讹索，必须查有确据，方准“归还”；如果旧址已为有主之业，则另以空闲官地抵给，断“难将房地给还，以失民心”③。但是，在侵略者的炮舰威胁之下，清政府很快就放弃了这个立场，改为积极支持洋教士恣意掠夺中国人民的土地财产。例如，这个时期的上海城内天主堂交涉一案，本来已经用别处市肆房屋抵还过了，到

①《中外条约汇编》。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47页。

③《直省洋教成案》，第1页。

了这个时候，清地方官吏在法国侵略军官孟斗班的威胁下，又把关帝庙奉还给法国教士①。又如，山东济南还堂案，清地方官吏并不以别处空闲地段抵换，却用暴力驱逐了天主堂旧址上的几十家居民，对于居民所受损失，只按地契原价给银三千七百四十七两，钱一万五千八百四十九文作为补贴，至于房屋不动产则随着地皮移交给法国教士，连价值多少也没有估计②。这样，清政府就用国家权力为传教士掠夺了大量民财，以换取列强各国的“谅解”。

1861年北京政变以后，清政府进一步积极投靠外国侵略者。所谓“还堂”交涉也愈演愈奇。1862年初，太平军收复宁波后，再次进攻上海，“沿海地方，均已吃紧”。于是清政府为了向两年以前纵火烧圆明园、迫订城下之盟的英法侵略者乞求“借师助剿”，主动送给了外国侵略者更多的特权，又取消了不许英商经营沿海豆类贸易的禁令，对法国则听其教士“任意指控”，恣意讹诈③。

1862年4月，奕䜣为“还堂”问题上奏说：“现在既欲借外国之兵力帮同剿匪，是在我不能不许以一二，以事羁縻”，“未可稍事拘泥，致生枝节”。这就是说，凡见外国传教士要求“还堂”，不必进行查核历史上是否确有教堂存在的事实，也不管有无民人居住，都得对洋教士“许以一二”。

从此，传教士便以“还堂”为借口，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广东、江西、浙江、江苏、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仅在直隶一地就提出归还旧教堂七十

---

①史式徽：《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第34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4，第3—4页；同治朝，卷5，第15页。

③刘蓉：《刘中丞奏议》，第20卷，第5—8页。

二处①。在江南干脆不提多少处所，只指出了十五个府县名称②。大致上说，从1861年到1868年，历史上凡有过教堂的所在地，都遭到“还堂”的灾难。鸦片战争前，一度广置田宅的教会、地主全都卷土重来了，甚至历史上根本不是教堂的处所，凡是传教士意欲侵占的，也都被说成是教堂旧址。

例如，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提不出任何证据，硬指东雍书院为教会产业，要求“归还”。地方政府以书院为士子读书之所，拟援例以它处抵偿。法国公使却向总理衙门提出质问说：“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于是，总理衙门就下令将这个占地四十三亩的书院及其所属田地“赔还”给传教士了③。连“会馆、公所、庵堂为阖境绅民所最尊最重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这就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民族感情，更惹起人民的愤恨。

又如，在陕西西安府，昔日天主堂遗址究在何处，已经无可稽考。传教士高一志一无契据，二无亩数粮册，更指不出四至所在，却硬指城内土地庙、什字街草巷一处高大宅院是天主堂旧址。为了辨明产权，长安、咸宁两县官员遍查新旧契据，证实该宅实系费、张二姓辗转相承，现属已故翰林院编修张大椿子孙所有，并非天主堂旧址。陕西巡抚刘蓉认为，“地系民业，地方官亦万难抑勒使从”，拟以城南三里的旧回寺一所另附渭河边房屋五间，一并相抵。张宅计地七亩多，回寺计地十一亩多，寺基大

---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24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法国照会》，编号187。

③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室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年版，第168页。

于宅基，即使张宅实系教堂旧址，就地基面积而论，也足够“赔还”有余了。不料传教士却坚持“非省内张宅不可”，同时又拒绝付出任何代价。法国公使威胁说，如一定要教士付出代价，法方便要以“上海关税扣偿”。这场无理取闹的所谓“还堂”交涉，一直纠缠了五年。到1866年春，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六个月内交还完毕。于是，奕䜣遂以“贻误大局”，“猝起衅端，责有攸归”去恫吓刘蓉，要刘蓉“迅速督属妥为办给，不得再意迁延”。结果张宅也就一变而为天主堂旧址，转入传教士之手①。根据刘蓉留下的材料，当时回寺只有正厅四间，两厢房屋十六间，而张宅则有房屋一百五十八间，值银一万两之巨。传教士硬要索占张宅，可想而知。

1866年春，法国公使为西安和南京两地的“还堂”交涉，又对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与西安不同的是，南京双方都认为确有过天主堂，但其地已建仓库，因此南京地方官拟另行拨地抵充。而洋教士不是嫌其旷无人烟，就是嫌其地基低湿，百般挑剔。最后，法国公使在上述照会中进行威胁说，如果三个月内不办妥，“即开炮破城，得地到手，难知何时交还中国”。同时，派兵船开入长江，并且索要所有交涉教务未结银两，兵船一到，每日至少供给兵船费用银一千两②。后来，南京交涉案也同西安交涉案一样，以清政府的屈膝投降而告终。当时清政府中的投降派内部，也有人不满意这种毫无掩饰的投降行为，李鸿章就深虑这样“任其指索”，不独“后难为继”，且有引起“民心不服”之虞③。

---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29—34页；卷42，第66—70页；卷43，第1—7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法国照会》，编号156。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32、40页。

在“还堂”交涉中，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南阳一案。南阳府城西十二里原来确有教民居住，“并未实系教堂凭据”①。所谓“还堂”交涉的结果是，洋教士不仅在城西十二里的蕲冈村占了大片的土地，而且在该地获得一种特权，即“修筑圩寨，既可建堂，又可自卫”，“一切均听其便”②。从而使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也享有收藏军器，进行武装割据之权。南阳“还堂”交涉，开了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在内地建筑圩寨的先例。

1871年，总理衙门对六十年代的“还堂”交涉说过一段总结性的话：

> “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窒碍，强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以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境绅民所最尊最重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况各省房屋，即实属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从新修理之项，所费不资，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③

这番话大体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需要指出，“任情需索”的是传教士，而“逼令让还”的正是清政府总理衙门自己。

至于《中法北京续约》中所谓学堂、坟茔、土地、房廊的归还，也同样是对中国人民土地财产的讹索，并且是直接导致中国人民生存危机的原因之一。例如，1866年，北京天主教堂教士拿出一张已不管业五十余年的旧地契，要求“归还”土地。他们说，这块土地座落在京西罗谷岭道徐山梨树洼地方，但“契内四

---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9卷，第31页。

②《直省洋教成案》，第35—47页。

③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1936年版，第350卷，第10938页。

至并无亩数”，只载粮银四钱。据总理衙门的计算，该地只有十一亩三分九厘，而教士强索归还的土地面积竟达七十三亩多、外加煤窑一座。实际上，这块土地是民人陈文林的产业，有道光六年税印的红契为证。但法国公使却进行抵赖，胡说“并无别样实据呈验”，而且当年传教士亦“未立有字据给予陈姓”，无理地否认陈姓契约的法律效力。经办此事的清地方官吏也就莫名其妙地把土地二十九亩，界内煤窑一座断给天主教管业。对于地方官夺民产以授教士的处置，总理衙门还给以赞扬，说是“甚属公断”。可是，天主堂教士和法国公使却坚持“除非分毫不少”，否则不能收领完案①。这个问题究竟是怎样解决的，没有原始资料查考。但据樊国梁后来在《燕京开教略》中说，天主堂在京西有山林一座，“四面以巅为界，周可五十余里”，也许与此次讹诈有关系。

三《栢德固协议》掀起掠夺房地产的高潮

“还堂”还不是最终目的。进一步扩大传教范围，占有更多的实际权益，以便把条约的保护权扩大到极限，稳稳地在中国站立脚跟，进而达到永久占领中国，才是传教士的真正意图。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的行动，就必然带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疯狂性和野蛮性，表现在掠夺中国人民的房地产就是一例，因而引起史不绝书的教案。每发生一起教案，传教士就向公使馆告状，公使馆立即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接着就是清政府对人民的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3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法国照会》，编号140、177、183。

镇压，向外国侵略者屈服。传教士得逞后，愈加放肆，人民对之就愈加痛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又起来反抗。如此恶性循环，使矛盾不断地激化。

在签订《中法北京续约》中，法方担任翻译的传教士孟振生和戴辣玛①在中文本第六款的末尾私自添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②。该约是以法文本为准的，中文本内私添文句并无法律效力，这是法国公使也承认了的③。1864年初，法、美、日、西、德、荷、俄七国领事为了把在中国内地置产权夺取到手，曾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内密谋策划④。经过一年时间，1865年初法使栢德固同总理衙门达成一项协议，规定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传教士有在中国内地租买房地产的权利，不过契据上只能书写卖与本地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⑤。这就是所谓《栢德固协议》。根据此协议，法国教士不仅有权成为通商口岸房地产的租赁人，而且有权成为内地房地产的租赁人和所有人，这实际上等于默认了上述私添文字的法律效力。协议虽未正式公布，但根据最惠国条款，凡是订约国家的教会就享有这一特权，并且不断扩大它的外延，于是出现了种种夺取民人资财的不法手段：

（一）强买恶索

就在签订上述协定的那一年，浙江会稽法国天主教教士田某

---

①樊国梁：《燕京开教记》，下编，第31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47页。

③Cherter Holcome（何天爵）：《The Rea Chinese Question》，1900年版，第323—325页。

④《上海新报》1864年2月18日，第298号。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29页。

契买石童坊居民商友生的房地产业。地方官认为这项买卖是违法的，于是扣押了卖主，引起了法国领事的“抗议”。对于这次交涉，总理衙门根据协议精神，指示办理通商事务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说，内地建堂由来已久，天主教堂可以作为买主置买产业。李鸿章又将上述指示通饬各关口。自此，传教士以教堂名义租买产业成为“合法”的行为①。会稽案件也因而成为传教士在内地租买房地产的第一个“合法”的事例。

上面说过，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所谓教产都是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的。所谓“教堂公产”就是外国教会或传教士的产业。总理衙门声言根据《栢德固协议》办理，卖给教堂的产业，不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产权不致落入外人之手，于中国仍属无伤”②，这不过是欲掩天下人耳目的自欺欺人之谈。

总理衙门也了解，产权属于教堂或洋教士，二者并无实质的区别。为了对教堂或教士的产权予以限制，又对内作了下列规定：

> “嗣后，卖业之人须令于未卖之先，报明该处地方官请示，应否准其卖给，由官酌定，不得迄将己业私行卖给，如有私卖者，立加惩处。”③

一般说来，这个规定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规定本身并不能改变《栢德固协议》的精神，只不过是把教士享有的内地置产权附加一层经官方批准的手续，能否起到限制教士置产的作用，又要视清政府和各级地方官吏媚外投降的程度而论。实际上，在《栢德固协议》签订以后，直到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这段时间里，外国侵略者是经常使用炮舰直接威胁，迫使清政府唯教士之命是听的。法国公使罗淑亚、英国公使威妥玛都认为这是解决“教案”

---

①《直省洋教成案》，第33—36、53—54页。

②《直省洋教成案》，第35—36页。

③同上书，第35—36页。

的迅速而有效的办法①。在此情况下，正如在“还堂”讹诈中无需实有根据一样，在因租买而引起的中外土地纠纷中，是用不着查究有无报明批准以及是否照章书写契约的。

比如说，1868年，南京下关天主教会的房产是由陆某承买后交给教士的②，英国福音堂在武昌长街的地基是由张河清转买的③，盖州天主堂地基是由税务司马某出面代买的④。这些都没有事先报明地方官批准，又没有书写教会公产字样，而总理衙门对于这些既成事实，也都予以承认。大致说，在此五、六年间，凡是因租买房地产而发生的纠纷，特别是在沿江、沿海地区，如江苏镇江、丹阳、扬州、南京、安徽安庆、福建福州等地，都是这样解决的。

前面提到的所谓“限制”，有的地方官曾据此规定来限制教士猖狂掠夺，如蒙古、河南地区都发生过这种情形。1880年，法国公使就曾因为广西发生地方官限制教会置产的事件而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声言由于地方官执行了教士置产先经政府批准的规定，“迫使”传教士只得私相租买，并因而激起事端，这是与条约“厚待保护”的精神相违，要求取消上述规定⑤。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在交涉中间，总理衙门向法国公使宝海保证说：“此后绝对只按《栢德固协议》办事。”这些报纸认为，宝海这一胜利，取消了长期以来引起抱怨的原因⑥。清廷对教士置产权先经官府批准的规定，最终不起任何作用。而唯一参照执行的就是《栢德固协议》。

---

①崇厚：《崇厚奏稿》，抄本，第18册。

②李鸿章：《通商章程成案汇编》，第22卷，第7页。

③《直省洋教成案》，第26页。

④《通商章程成案汇编》，第22卷，第5页。

⑤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法国照会》。

1881年，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了一部《契券汇式》，搜集了许多的租买契约格式，专供各地教士占房置产的采择酌用。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意味深长地说：

“历观案牍，每多田宅争讼，究其所议，概由写立文契未能详细而致，是则立契之疏漏脱落，所关岂浅鲜哉？”

对于这种使用文字“游戏”来欺占中国人民的房产田地，清廷毫无办法，而只有当地人民起来反抗，才能有效地制止掠夺。比如说，1866年前后，法国教士在安庆已经买定了双莲寺房产，就是因为当地人民反对，才不得不退还原主，改作书院公所的。但是，清地方官吏害怕法国炮舰的恫吓，又在城外择买堂基，城内另租公所给予法国教士①。1868年，英国教士马某在台湾凤山县埤头地方购地建堂，当地人民起来反抗，打毁教堂，赶走教士②。同年，英国教士戴得生在扬州租地建堂，也被当地人民逐出扬州，焚毁教堂③。而在河南南阳，由于人民反对，洋教士一直不得进入府城。

可是，被炮舰吓昏了的清政府，“唯恐事机决裂，难以收拾”，竟于1868年11月因江苏扬州、福建、台湾、河南、南阳等地教案迁延不结，向各该省督抚发出了必须迅速完结教案，不使外人有所借口，以免酿成巨案的指示④。扬州和台湾两地教案在清廷上谕和侵略者炮舰的直接威逼下，以赔款给教士而完结。在交涉过程中，英舰武力攻占台湾安平炮台，杀伤清军副将以下四

---

①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6卷，第78页。

②《清季教案史料》第1册，第16—26页。

③《清季教案史料》第1册，第5—15页。

④《直省洋教成案》，第48—52页。

十余人‘扣留中国轮船一艘，清政府竟不了了之①。南阳的教案了结不久，天主教的主教就大耍威风，“黄帽紫袍，乘坐绿轿，前列旗牌，随从多骑”出入府城了②。

然而，此时的各级地方官吏在屈服投降方面，一般还不是毫无顾忌的，无论是在租买案中，或上文提到过的“还堂”案中，往往需要总理衙门一再指责催促，甚至直接出面，案件才能以满足洋教士的索要而完结。就是在地方封疆大吏积极投降的时候，地方基层官吏也并非都是亦步亦趋的。例如，对于江苏镇江的一件租房案处理，地方基层官吏和两江总督的看法就大不相同。镇江民人夏履之，私将房屋租给英国教士，后来由于当地人民的反对，由夏李氏出面要求教士退租，引起中外交涉。在此情况下，镇江地方官一未责斥“夏姓先租后退之非”，二未另为教士觅房“以弭衅端”，这种作法自然是有利于当地人民的反教运动的。而两江总督曾国藩却申斥该员处理“均有不合”，并一反地方官所为，援引安庆事例，为教士另择堂基，同时要求镇江地方官“开导士民”，“不必与之为难”，“再而聚众生事，断难姑容”③。

也有地方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不是消极地为洋教士另择堂基，而是“主动地开导士民，将原屋相让”。如1869年淮安地方官就是这样做的。因为这种做法符合清政府的媚外投降政策，所以总理衙门认为此案处理“尚属妥协”，给予嘉许。然而，地方官普遍地采取这种惧外抑民的态度，还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清政府惩治了保教不力的官吏，迅速颁发抑民护教的谕旨。因而各级地方官吏投降媚外者愈

①《清季教案史料》，第1册，第5—26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法国照会》，编号132。

③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6卷，第77—79页。

众，致使传教士“谋田地房产，不先禀商地方官，硬立契据”①的事件遍及全国城乡。而教士谋取田地房产的方式也花样百出，愈来愈奇。

强行霸占是一种常见的方式。1876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在处理皖南教案之时，就发现法国天主教士在皖南一带霸占了多处房产。但是，当沈葆桢要求归还上述产业的时候，传教士和法国公使竟说有些霸占是必要的，公然表示要继续霸占下去。这种恶劣态度，在1877年的一件致总理衙门的法国照会里表现得特别露骨。照会说：

> “其侵占之房屋地基，从前教士半为教民所误。现在宣城之徐村内所占三处房屋，及殷村、高村，建平之徐村，广德之月湾街五处，教士已许定期搬让。惟宣城之徐村山上，与建平之城内教堂围内陈姓地基一块，教士以已盖洋式房屋，坚求设法购买，不肯拆还。惟宣城徐村山上及建平城内程姓之基为地无多，断非教士之所吝惜，且愿设法购买，可见不贪便宜。”②

这种以旧霸占来肯定新霸占的说法，并且把这种说法写在外交照会上，这只有外国殖民主义者才能干得出来。

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高潮，可是清政府不但不支持人民防范教士的越轨行动，反而严令各省督抚严密保护教堂，如有“借端滋扰纠匪报复者，即著严拿正法，毋稍宽宥”③。因此，在华教会基本上得以平安地渡过了三年的交战时期，并且在战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并得到清朝官吏的包庇和宽容。

---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2卷，第32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法国照会》，编号350。

③《东华续录》，光绪朝，第63卷。

1887年，美国长老会教士企图在山东济南霸占一处房产开设医院。他们说这是1864年山东巡抚答应过的（根据美国公使田贝的供认，这是扯谎①）。李佳白等教士们就诱骗一家房主立了一张将房屋出租三年的契约，企图明租暗占。济南一些绅民得知这个阴谋，就起来反对，要求收回租约，如果传教士实有需要，可以另行商借，不能强行霸占。其实，租约上明明写着租期三年，以及在三年限内业主可回赎的条件。一家外国报纸驻济南通讯员说，这是交涉中外国人的“唯一弱点所在”②。然而，主持交涉的地方官员，并不重视这一事实。在激怒的群众面前，他一面命令业主收回租约，一面又对洋教士解释说，那是他能想出的“解散群众的唯一办法”③。在地方官员这般庇护之下，美国教士“挟着皮包冲入该地住宅，命令住户空出房间，由他占领”④，同时又声称“保管租约的那位教士到北京去了”，拒绝交出租约⑤。令人十分惊讶的是，经过交涉不但没有收回任何权利，地方官又让给美国教士占有距济南三里路地方一大块地皮的权利，而且许可洋教士在1891年上述租约期满后无限期霸占下去。田贝于1889年11月19日呈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 “极可告慰的是，即当地政府已允许该传教士在距济南三里处拨给一块有价值的土地。……据报告，那块土地有七英里之广。我不愿炫耀我的成就，但是我感到有理由可以说，我为美国人争取土地的努力，已经获得

①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260页。

②《北华捷报》，1887年7月1日。

③《北华捷报》，1887年9月17日。

④《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260页。

⑤《北华捷报》，1888年2月24日。

了显著的成果。”①

传教士强占中国人民的房地产业之后，把有的房产田地用来办商店、农场、企业等，作为经济剥削的基地。美国公使田贝在报告中又说：

> “不论在那一个中外条约或协定内，从未允许来华外人在内地从事各种职业。但是，事实上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从事各样各色的职业是非常普遍的。……他们设印刷厂、订书局、实业学校、工厂、商店及诊疗所。他们充任医生、宗教书售卖人、报纸通讯员，还有开设旅店、饭馆招待过往客人的。他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家具公开售卖。”②

外国传教士使用各种办法做生意赚钱，使社会财富流向教堂，他们都富起来了。从而夺去了中国人民生存的条件。

（二）强迫捐献

传教士对有房地产的教徒往往强迫他们捐献，答应他们死后可到天堂居住更大的房屋。这种情况不论在天主教或基督新教内部都相当普遍。捐不起房地产的，也可捐些教堂内的设备，譬如椅子、桌子、灯具之类，或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教会购地之用等等。有的还驱使人民将庙宇捐献给教会。这里举两件“契约”为例：

其一，山东德州第七屯有一寡妇吴氏，因在1878年灾荒时领过传教士的一点救济，1881年在传教士的花言巧语下立下了契约，愿将她的房地产捐献给教堂，契约上这样写着：

---

①转引自《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48—149页。

②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263页。

"因信耶稣圣教有年，既明天上主宰保佑之恩，又蒙荒年赈济之情，愿将宅院一处，平房七间，门楼一间，庄东地二分献给教会，永不反悔。吴氏押"①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教民吴长泰不愿施舍自己名下的田产，而将寡嫂、寡弟媳的产业捐献出来。此前吴寡妇已将上项产业捐给本村官学，并经德州知府换了契约，故引起一桩交涉事件。传教士和美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说，德州地方官涂改契约，阻拦捐献是不应该的。他们俨然以这份产业的主人自居，不容别人插手②。

其二：1878年，在德州的石家塘地方，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哄骗下，强迫当地人民将一座庙宇捐献给了教堂，契约上这样写着：

"……将庙宇情愿归于耶稣教会修理会堂，宣传圣道，设立义学，成全合庄子弟为善，益于后世，俱属教中承管，永远为业，并将庙地归于看堂人朱连科家耕种为业，不许当卖……"③

教徒捐献的房地产从个别事例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类似情况，各省都普遍存在，累计起来却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数字。从上述事例可知，"捐献"是神权强制，是掠夺民产的一种狡猾手段。这种手段当然会被时人所识破，这也是引起民教纠纷的一个原因。

---

①《清季教案史料》，第2卷，第196页。

②《清季教案史料》，第2卷，第196页。

③《教务杂志》，1878年11月—12月，第468页。

（三）盗买盗卖

传教士通过不法教徒盗买公产或将亲属产业转手给教堂，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多起。"发生了多起"之后传教士采用这种手段获得了不少房地产的产权。他们的手段十分卑鄙，如果看中了某一房地产，就先唆使一些无赖之徒冒充是该房地产的业主，然后串通官府书吏"窃印文约"，将该房地产卖给传教士。

例如，1877年至1883年间，江西的贵溪、鹰潭先后有桂冬喜、冯东初、桂良才等九人，将沙滩石、胡家井一带田地转卖给本地教堂，收取白银约一百六十两。事后查明全部是盗卖公产或亲属遗产①。

又如，1882年，在黑龙江呼兰县，传教士贡罗斯通过窦玉、侯希春、傅永春等人出面，将郭定恒的产业盗买到手。后来郭定恒起诉。传教士不但绝拒回赎，反而开枪打死交涉的官员，并抢先向官府告状，还要求赔款三千两银子。经过总理衙门和法国公使之间多次交涉，结果官司的胜利者属于凶手一方，教士们不仅仅收回了地价，又取到了那块土地的产权，并要原业主备价抽赎②。

十九世纪末，有人概括了上述掠夺方式，云：

> "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赖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地方不敢科以盗买盗卖。"③

盗买盗卖土地房产等物，为各国法律所严禁，更何况伤人夺

---

①王鹏九：《交涉约案摘要》，第2卷，第55—55页。

②民国《呼兰县志》，第10卷，"地方案件汇编"。

③《东华续录》，光绪朝，第138卷，第17—18页。

产，引起教案纠纷。一些传教士以殖民主义者自居，明知犯法而不屑一顾，皆仗恃条约的保护。

（四）低价勒索

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灾荒时最为常见。传教士利用灾情严重、农民纷纷逃荒之际，用极低的价格买进大片土地。

例如在1876年至1879年之间，华北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大批传教士乘机到灾区活动。其中，有以低价收购土地者，等到灾荒过去，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回来时，因无力赎回，只得被迫在全家入教的条件下充当教堂的佃农①。

传教士有时也采取低价永租手段。例如在内蒙“黄杨木头有田地七十余顷，中国堂有田地三十余顷，均从蒙古人之手永久租来，每顷只费租金九两银子，而转租与教徒，则收取二十五两银子。教徒以外，不得租也”②。另一美国传教士黄安河在内蒙用恐吓手段，“租田地一千顷，署曰永租，均由教民领耕，并课其租，人数约千余人。此外本堂又牧羊一千余，牛马各百余，在堡内服役者五十余人”③。

又据山西长治天主堂的原《田产登记簿》记录：一百六十八处田产中竟有一百处是用低价勒索到手的，其中每块在七十千文以下的占三分之二，有的甚至每块低于二十千文。

1894年，英国传教士只花了六十两银子就租到江西庐山牯牛岭，包括高冲、长冲、女儿城、教厂、讲经台一大片辽阔的公有土地，作为外国冒险家们避暑胜地④。其它如莫干山、北戴河、青岛、烟台等许多好地方，传教士都采用低价勒索的手法购进或

①赖德烈：《中国基督教史》，第333页。

②林竞：《西北丛编》，第52、60页。

③王鹏九：《交涉约案摘要》，第2卷，第19—20页。

永租。

在有些情况下，传教士直接以土地作为担保而发放所谓“赈济”。愿意领受的人必须把土地上收获物的一部分交给教堂。自身则沦为教堂的佃户①。

在上述种种方法不易奏效的场合，传教士也采取收买或租赁的方式，多少付给代价，其中高价赎买者间或有之②，但更多的是贱价兼并③。许多事实证明，十九世纪后半期，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到中国来的传教士，都是“非常精明的生意人”④。精于指地建堂，“广置田产，经营蓄息”⑤。他们运用暴力和金钱、“圣教”和“赈济”以及其它一切可资运用的手段夺取中国人民的土地财产。

（五）强占垦地

这是一种更奇特的掠夺土地的方式，主要发生在内蒙一带。传教士采取占领垦地召佃开垦，然后收取租息或马牛，俨然以农奴主自居。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传教士已渗入内蒙一带占领垦地。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规模扩大，1871年在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乌尔图沟，传教士一次就占领垦地达四十五顷，建立教

---

①赖德烈：《中国基督教史》，第330－331页。

②《清季教案史料》第2册，第190页。

③《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第16－22页。

④Archibald R. Colquchoun（柯乐洪）：《Overland to China》，1900年版，第358页。

⑤密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

堂，霸为教产①。1873年，通过法国公使出面，传教士又把萨拉齐小把拉盖周围一百顷土地全部夺归己有，建立教堂②。他们在此站稳脚跟以后，便不择手段向外扩张垦地。

1875年外国教士到达三道河时，一无所有，经过五年时间，这里就出现了七处教堂，辖有教民一千多人，分散居住在各个教民村落里。所谓教民村落，据有人对陕北靖边县成川、宁条梁地区教民村落描写说："每处男女百数十名不等，皆以垦地为业，牛犁种子多自洋人发给，秋后按粮品分。"③这类教民实际上就是传教士的农奴。传教士能够役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所谓武装开垦。内蒙古地区的外国教堂多半是这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教士占垦土地面积的扩大，教民村落的大量出现就成了这里半殖民地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内蒙古著名的二十四顷地大教堂是传教士于1877年占地兴建的。最初向蒙古王公租借的不过二十四顷，到1887年又在周围扩占土地一万顷。据内蒙古一个天主堂的文件载称：

> "大约在1877年，陆殿英司铎……由高九威手，买得草地一段，即今之二十四顷所在地也。高九威之租地也，其所以名村者，乃以此也。惟当时一般商人向蒙古王爷租地者，从不着实丈量，已成惯例。不过骑马巡视一周，指为十顷则十顷，指为百顷则百顷。"④

内蒙古丰镇厅七苏木滩地方，由于"滩草茂盛，地亦广大"，就成为天主教教士垂涎的对象。1886年，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天主教蒙古教区主教就命教民前往占垦。这个地方本是牧民牧地，蒙民就同附近的汉民联合起来，对教堂展开斗争，并烧掉占

---

①②《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14、215页。

③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第2卷，第13页。

④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13页。

垦土地上的禾苗。事情引起了中外交涉，结果，清政府无视蒙汉人民的反对，“即将地交与教民垦领开种”①。这是中法战争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掠夺。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占垦的规模更大。如在内蒙亚伦巴区，距扒子捕隆之西四日行程，天主教在该处占地达一万顷。又如在阿拉善区，距扒子捕隆西南十日行程，天主教竟据有一城，并占四周田地一万顷②。这一严重的局势，为内蒙、东北等地的民教长期纠纷埋下了伏线。

不法传教士通过上述五种掠夺方式，到底在中国占有了多少房地产，从局部史料来看，可以有个眉目，但从全国范围来说，永远是一个谜。但是，从一些典型的史料推测，亦可窥全貌。

镇江是1861年开埠的。1866年，在江南天主教开列的“还堂”的名单里，镇江天主教会只有为数甚少的财产。但到1884年，驻该地领事美国奥森汉在他的商务报告里说：“教会的异常增加是此地的新奇景象。”这里原有耶稣会、内地会，于今又增加圣公会、美以美会、长老会等，“这里每个教派都买了地产，建造了华丽轩敞的房子……目前传教士的人数要比教徒多。”③资格最老的天主教教堂取得的房产最多，集中在天主堂街，都是用来出租牟利的。当时《申报》报道说，租户们因为买卖清淡，要求教堂减低租赁费，聚集请愿并准备罢市者即达二、三百人之多。从此可以略见，镇江教会拥有房地产之巨④，“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⑤。

---

①《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20页。

②《中华归主》（英文版），第458－465页。

③Bertram Wolfesstan（乌尔夫斯坦）：《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1860—1907》，1909年版，第5页。

⑤《申报》，1881年3月1日。

⑤《英国兰皮书》，中国（b），1885年，第93页；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第2卷，第58页。

北京是天主教最早进入的城市。早期建有东、南、西、北四堂及郊区的一些坟地。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教会资财地产房屋急剧增加，仅据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的“收租帐单”记录统计，天主教的财产仅在西单牌楼以南、宣武门内外就有一百三十家店铺，出租给买卖人，收取房租，进行房地产租赁剥削①。

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的外国租界或居留地内，教会也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据估计，1900年仅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产已达三千七百万法郎，或五百四十万美元，而大批房产还未计算在内②。

传教士在中国霸占了大量的土地之后，除用于教堂及其附属机构建筑外，其余土地就利用教徒充当佃农耕种，强迫他们将收获的四成五成，最高达八成交纳给教会，进行残酷的剥削。传教士还要佃农献纳鸡、鸭、鱼、肉、蛋、酒和核桃、苹果、枣子等供其享用，另要奉献蜡烛费、瞻礼费等。此外，还令教徒从事建造教堂、修筑圩寨、拉柴赶车、种菜挑粪、喂养牲口等无偿劳动，还利用青壮年佃户充当教堂武装的打手。如不履行以上义务，传教士就用罚款、罚送匾、送酒、刑责或收回土地、开除教籍等方法惩罚佃农。例如，在江苏省宿迁耿车，地主周甲信天主教，每亩收租七斗米，而佃农周乙等四十人也信天主教，但因无力负担地租，抗拒不缴，外国传教士竟勒令佃农周乙等罚款一百三十千文，又要制匾一方，酒席五桌，送进教堂时要用乐队和放炮③。又如直隶新河县芝芳头村英国基督新教教民唐自知利用收租机会，“恃教横行，率领多人，抢割村民麦子，激动众怒”，致

①樊国梁、林懋德：《信稿录存》。

②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465页。

③《益闻报》，1897年12月5日。

村民鼓众杀毙其夫妇二命”①。总之，此种事情多不胜举。

四、一些传教士、教民的劣迹

遍布全国的教堂，一百多个“修会”、“差会”、“布道团”的上千传教士在中国传徒宣教，与中国的四亿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有所接触，都被这异邦的宗教信仰所困扰，或迷离不解，或惊惶以视，甚感安危难卜。

1861—1870年的十年中，外国传教士在各地的活动，为后来的《烟台条约》中的若干条文，提供了制订的基础。而《烟台条约》的订立，又替这些传教士打开了更广泛、更深入地进入中国内地的大门。对于这一点，英国“内地会”创建者戴得生(James Hudeon)之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在其所著《戴得生传》一书中说道，“戴得生在1876年9月4日第二次乘船到中国时：

> “已船开一礼拜之内，李鸿章在烟台和英国驻华大使签订条约，准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旅行居住。戴氏在上海尚无所闻，但是他因相信，早知神要为他们开路了。”②

这段自供使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大肆活动的目的暴露无遗。他们所谓的“神”，不是西方的“上帝”、“天主”、“基督”，而是英国驻华大使，是英国的炮舰。他们与其所在国的对华侵略政策结合得多么紧密！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自从十八世纪末从葡萄牙人手中接过东

---

①《北国春秋》杂志，1960年第2期，第95—96页。

②内地会编：《戴得生传》，下卷，第27—58页。

方的保教权以后，大批进入中国，以政治上的恃强，经济上的掠夺为其特色，因而在中国树敌最多，为此而酿成的教案亦最突出。英、美传教士来华较晚，以创新学、办慈善事业为其特色，侵略行为较为隐蔽，留下的不光彩的记载，散见于史籍中的比较少。但是，他们为本国侵略政策服务的宗旨却是坚定不移的，对夺取中国人民的资财也是毫不手软的。因此，不少教案的发生都与他们的行为有直接关系。

（一）大肆网罗社会渣滓入教

西方传教士为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必须大量发展教徒，他们为聚敛财富，也必须大量发展教徒；他们为神职人员晋升更需要大量发展教徒①。

被发展的中国教徒，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真正的虔诚的信教者。一般都是比较善良的农民和一些士绅，由于受到传教士的宣教或逃避官吏的苛索而信教，或因崇拜西方科技与教士长期接触而皈依。他们富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占教徒中的一部分，有些人还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二类是“吃教”的。他们谈不上什么信仰，有的是因为生活穷困，经“外来教士多方引诱”②而入教。如山东巨野县农民提供的情况：“也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有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

---

①教会规定，教士能否晋升为神父（牧师），神父（牧师）能否升为主教、总主教、大主教，都要以他们建立的教堂数、发展教徒数作为根据，进行考核。

②《巴县档案》，光绪三年七月十四日“成都将军、四川总督札”。

或用教堂两吊钱。”①还有的是属于二流子或是地痞流氓被收买入教的。第二类教徒中，前者是奉公守法以维持生计，后者常挑起民教冲突。

第三类是恃教的。他们企图依仗教会势力保护个人或家族的利益，或借洋人招牌经营企业、商业，逃避赋税，大发横财。他们之中多数为地方恶绅、商贾、衙吏及第二类中的二流子、地痞、流氓等。他们是挑起民教斗争的肇事者，其中不少人成为往后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些人则成为买办势力的代表。

教民构成的不纯，特别是当地的社会痞棍被收买入教，大大破坏了教会的形象，使中国的士子农工无不侧目。加之教徒一经皈依西教，传教士一概视为教友，把治外法权扩大到华籍所有教民中享受，更是激起公愤的一个主要原因。法国侵略者曾经公开宣称：“我们绝对关心教徒，如果因他们是教徒而受到任何凌辱，就等于对法国不友好。”②所有西方列强各国都把华籍教民当作自己国家的臣民，都给与治外法权的保护。民教纠纷事起，领事、传教士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加以保护，即便有干清律，亦百般为之开脱。

在西方教士的怂恿下，“吃教”中的地痞流氓和“恃教”中的恶绅、衙吏是挑起民教纠纷的祸首。他们凭借教会势力，制造事端，其中有的居然被提拔为教士。如引起建平教案的淫棍黄之绅、杨琴锡就是典型。教士对这些在地方遭到鄙弃或非议的人，尽力拉拢，开门迎接，甚至出钱收买这些人来“吃教”，依为

---

①《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6页。

②仆拉致“高尔拜”号司令函，1853年11月11日。载迈尔雪：《“加西尼”号中国海上远征记。1851—1854年》。

“教党”。买价不一，有的给“白银四两”①，“有的给银一百三十两”②。“教士们袋子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③。教会收买有些地方帮伙势力的无赖者才给大价钱。一般贫穷百姓“吃教”，只给“三四百文”，或经常给些布施而已。有关传教士收买“痞棍”入教之事，我国文牍中记载甚多：

传教士“四处招延盗贼奸民……而奸宄无赖之徒争窜于教会”④。

“民教生事之故，多由不法痞棍一经入教，即恃为护符，妄搆滋非。”⑤

“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⑥

一位洋务官员揭露说：

“莠民以入教为护符，嗜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⑦

这些痞棍为什么要入教，四川华阳县令告示作了如下归纳：

“习教之民恃强霸恶，愍不畏法，或素性鄙吝，借入教而冀免输将；或为讼棍，借入教而图遂刁唆；或因罪犯奸赌无从藏匿，借入教为逋逃之薮；或因身债积欠，畏人追乎，借入教为避债之台；并有漏网痞徒，著名土

---

①②《中西纪事》，第3卷。

③罗德夫：《义和团记》。

④民国四川《巴县志·交涉》，第16卷。

⑤《巴县档案》，光绪二年六月十八日“川东道札”。

⑥《清季外交史料》，第10卷 第5页。

⑦《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85页。

棍，借入教而泄忿报怨。”①

这件告示很有典型意义，它把痞棍入教的不同动机，浓缩为数种类型，使百姓一目了然，使犯奸触法者视而生畏，如果没有西方传教士的滥收，他们将一个个地追捕审判；没有西方传教士的包庇与支持，他们不可能逍遥法外并继续为非作歹。曾国藩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奏折中说：

> “惟天主教屡滋事端，……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惟和约记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者也。”②

这就是治外法权扩大到华籍教民中的恶果。除曾国藩外，大部分枢密疆臣对教士包庇不法教民都有类似的分析和揭露。士子隐逸更是申斥教士的不仁。这一时期朝野的舆论，对于部分官绅参加反教事件很有影响，朝廷“持平处理”的官样文章由此而生。

除上述一批“吃教”者之外，还有许多特殊的“投教”者。如，安徽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由于清军的蹂躏，人口死亡众多，土地荒芜，因此外省来皖垦荒的“客民”甚众。在这些外来屯荒者之中，大多是邻近的湖北、河南籍农民，往往因为双方利

---

① 《巴县档案》光绪二年九月十三日。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6，第30—14页。

害关系之不同而发生冲突。两江总督沈葆桢谈到这一情况时曾说："皖省自兵燹后，遗黎十不存一，墟荒者多外籍，客与土不和。"①而在客民之中，湖北籍客民为了依靠外国势力作后盾，成族成村相率"投教"，以致双方积怨更深。安徽东南部各地的教案以及西北部霍山的教案的发生，皆由双方寻仇而扩大至毁教堂、杀教士，就是因为仇恨那些"投教"者，而牵恨教堂。"吃教"者与"投教"者和外国传教士实际上已成为特殊的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集团。

地处四川南部的叙永厅，士绅组织"成会"与农民手工业工人组织的"平会"相抗衡，历时多年，纷争不已。后来天主教、基督新教各收一派，争夺各自的传教势力范围，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发展为相互械斗，长达二十余年，死亡数千人之多②。历任地方官均不能平息这场持久的"宗教战争"。以经济、政治地位聚众分别投某一教，在西方不同派别的教士唆使下，以兵戎相见，这在西方传教史上确是不光彩的一页。

以上两则"投教"事例，实皆"恃教"以维护和发展各自的经济利益。一旦他们受到外界势力的侵犯，传教士就出面奔走于官府，或致函于领事，请求干预和交涉，"恃教"者无不获胜受益。

（二）建立"国中之国"及教士干政

传教士本不应享有外交豁免权，因为他们不是本国政府的代表。但是列强各国政府看重传教士谙习中国语言文字、风土人情，

---

①《清季外交史料》，第9卷；《沈葆桢奏研皖南教案分析示录折》。

②《续修叙永厅县合志》，第18卷，边防7，第16页；《外交报》，1902年第69期。

就赋予了他们以政治的、传教的双重任务，并以传教为手段，而享有治外法权。在国际法上，外交豁免权是以不损害主权国法律为前提的。但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及其附加的解释，传教士获得的不仅是外交豁免权，而是战胜者可以随心所欲的“特权”。传教士通过这些“特权”，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成为地方的权力中心，成为“国中之国”①，成为在殖民统治者“保护之下广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王国”②。其中最难使中国官吏士民接受的，一是干预地方政事，藐视地方官员；一是疯狂地聚敛财富，侵犯百姓利益。

在“还堂”、夺产、兴讼等民教纠纷中，教士不问是非曲直，一意庇护教民，威胁地方官，甚至通过领事向清廷施加压力，要稳操诉讼之胜卷。据《巴县档案》载：“主教每逢民与教民微嫌口角，动辄具片送州，包定输赢，致使教民借此声势讹诈”③。早在1861年，恭亲王奕䜣就奏称：

> “(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者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④

一些地方官对民教诉讼，“虽欲秉公剖断，无如教士干预嘱托，否则，借口毁教压人”，地方官就要革责，甚或“荡产倾

---

①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1883年英文版，第659页。

②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1929年英文版，第279页

③《巴县档案》，光绪三年七月十四日，“成都将军、四川总督札”。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卷，第46—47页。

家，尚难完结”①。陕北教会声言山西教民过黄河到佳县（葭州）经商，被当地清军“盘诘”，向清廷提出抗议。清廷责即责令佳县令俞恒龄查处，“并限三日内禀报”②。可见教士势力煊赫，外国传教士如此藐视官府，就连中国籍教士也依势大耍威风，咆哮公堂。如陕西略阳华籍教士王奉元代人诉讼，与县吏发生口角，王竟执鞭抽打衙吏，又大骂县令桂超，“挥以茶碗”，“扭其胸衣”③。平日骄横不可一世的桂超，只得“忍而受之”，结案时，桂超竟遭参革。更有甚者，“同治六年（1876年），法国洪主教移行四川省官员，铸用官防开作。四川……并有教士因教案致撤地方官员”的荒唐事件。类似桂超遭革、四川官员遭教士撤职事件，不胜枚举。甚至一些官吏因遭“教祸”而弄得倾家荡产。所以，一般地方官吏，为保身家仕途，“见教士则若天神，视平民则如鱼肉”④。

外国传教士在制服地方官员后，进一步干涉地方政事，其中以挑起诉讼为最露骨。中国平民最怕县官，教士抓住这种心理状态，唆使教棍侵民财产，迫人入教，强买占卖，毁人坟茔，夺妻霸女。被害者一经抗拒，教士就“具片送州，包定输赢”；官吏登堂传呼，衙役追比搕索，教民佐逼威胁。其结果是：小讼比兴大狱，抗讼必遭倾家；小故惩以枷示，互斗量以大刑；有理却变无理，无理讼必有利。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使非教平民、士绅遭其荼毒，破产人亡。有时发生民教纠纷事起，诉讼既兴，教士操纵其间，“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忿争，偶拂其

---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45—46页。

②《秦中官报》，光绪甲辰年，《秦事汇编》第6—7页。

③《秦中官报》，光绪乙巳年十一月号，第1、2页。

④丁日昌：《海防条议》，《海防要览》上卷。

心，教士则饬词上诉”①。致使小案拖百日不决，大案终年未了，非教百姓拖累其间，既要负担衙司理案之费，又遭胥役传呼之搕索，往往一诉未胜已倾家荡产。更何况与教民兴讼，鲜见胜者。教士挑讼目的，既是扩大权势，又起威慑作用，使得谁也不敢去碰教会势力。有的省甚至出现“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的现象②，无非是迫使地方官作出有利于教会势力的结案。一些教士挑起讼狱的伎俩，不仅使百姓愤慨，连许多绅、士子亦十分痛恨。一些地方官员抱怨教士侵权，当教案、纠纷发生之后，亦不积极采取制止措施，或对处理诉讼故意拖延。当时，大部分地方官员都站在教士一边，袒教抑民，并趁词讼之机苛索人民。这一点，连靠镇压人民起家的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专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申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③

由于不少民教纠纷、教案久拖不决，各地传教士常到北京告状。清政府总理衙门便于1896年初，颁发了一个《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文件，把清廷早就给教士品秩封赏的旧例，用条文固定下来，要地方官就地与传教士一起解决教务纠纷。先在直隶京畿地区实行。《事宜》主要内容有三：第一，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同级。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第二，分别教中品秩与同级中国官员往来。第三，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同总理衙门或地方官交涉

①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35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第117卷，第30页。

③《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60页。

办理，也可以直接与地方官商办①。1899年3月4日，又以带有法律效力的《章程》形式上谕各地照办。《章程》规定：

> “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倘主教有事出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事务之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摄位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既督抚道司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②

章程还特别规定地方官所接见的传教士，必须“均应泰西人充当”。这些规定使西方教士完全处于地方官员的政治地位，这一特权为他们进一步的掠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些地方，教堂甚至私设公堂，“几无异于名城巨埠之有租界地”③。他们拘押群众，酷刑逼讯，中国地方官员不能干预，中国政府的法律也不能保护百姓的安全。如宁波传教士，以“一府长官自居，任何人不能过问”④。

清政府颁发的这个“章程”，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法律，损害了官吏、士绅、平民百姓的尊严。罗马教皇干预国家政治的陋习，在西欧逐渐被废除，而教士们却在中国得到了这个“特权”。这样，主教、牧师、神甫俨然以中国官员自居，制名片，服官袍，戴花翎，乘官轿，骑花马，教徒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一切和清吏一样。“山东传教士有擅称巡抚之事”⑤。1893年，清廷赏“山东南境教区主教安治泰三品顶戴，两年后又提升为二品顶戴，把他列为总督大员一级”⑥。四川成都教区主教杜昂被“赏

---

①1696年3月18日“总署致直隶纳尔经额咨文”。

②《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6页。

③《（内蒙）通志稿》，“基督教”篇。

④《鄞县通志·文献志》，卷4。

⑤指法国主教顾立爵，见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

⑥骚楞：《山东传教史》，1932年英文版，第41页。

戴花翎”，与将军、总督同级。河南省南阳县靳岗教堂“还特别盖了大官厅、二官厅，专为接待各级不同身分官员”①。这个教堂还专门雇了一帮人替他们“走衙门”，以取得词讼的胜利。主教安西满还保举这帮人得到四品都司、五品军功的官衔。甚至有的主教“擅用关防印信”，所书文牍“擅由堤塘官驿递送”，俨然以中国官员自居，号令属下。

外国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不但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有的清廷大臣也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侵官吏之权，事已难恕，甚至侵国家之权，情实难忍。似此无礼已极，安得不犯众人之怒！”②但是，“大炮在天朝呼啸”，朝臣们只能在奏章中抒发己见。

清政府在处理民教纠纷时，虽然口头上说要“持平办理”，实际上却采取“保教抑民”的投降政策。这就更加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他们肆意践踏1861年总署咨文中有关“传教士丝毫不得干预地方公私事件”、“有干预公私事件者，亦应照谕单驳斥不准”的规定。对清政府于1871年递交各驻华使馆的《传教章程》也不值一顾，对凡“遇有教民涉讼，听凭地方官从公审断，传教士不得插手帮讼”的规定③亦置若罔闻。清廷及大臣尚且畏“洋”如虎，地方官更不敢惹怒传教士。

（三）大肆聚敛财富

政治上获得“特权”，并不是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当他们一踏上这东方神秘的古国时，黄金、白银、古玩这些“他们在各自国内或其家庭境况下所梦想不到”的“奢侈与享乐的生活”，使他

---

①《义和团运动史》，第12页。

②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

③详见《教务纪略》，第3卷下，第4—12页。

们的欲念”之火再也按奈不住了。他们把传播“福音”的信念一股脑儿抛弃，一头扎进“淘金”的黑浪里，在列强“炮舰政策”的淫威下，他们获得进入内地自由传教、估逼“还堂”、买产置业、建造自便的特权。而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凡是涉及传教活动的，都是传教士聚敛财富的特权依据，并使他们的这些非法活动“不受中国的管辖”①。他们掠夺手段之猾，经营范围之广，盈利数额之大，商务纠纷处理之刁，一般中外商贾均望尘莫及。

他们在“国中之国”里，拥有清政府“由于战争与和谈而已经丧失了的征税权和行政权”②，这就使他们获得了教堂收税权与主教发卖执照的权力。山东邹县传教士公然“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福建有主教者，鬻卖执照，每张洋银二十四元。良民有者，始免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③。其它各省，亦有类似情况。

此外，传教士还擅自经营商业贸易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他们贩卖鸦片，从私运挟带到公开批售样样都干。他们出租土地、房屋，收取高额租费，却又拒纳赋税。如四川“彭县白鹿场之天主堂及其修院，占农田一万亩以上，除房屋面积外，有九千余亩，岁收租谷，不纳田赋”④。他们还开设旅馆、饭店，“制造各种各样的家具，公开售卖”⑤，赚钱颇丰。还有一些传教士放高利贷，盘剥教民和非教百姓。传教士通过经营非法贸易以及霸占房地产、估逼奉献等其它剥削手段，使得他们都发财致富，带着白花花的银子回到欧洲去享受了。而他们发展的华籍教民，凡参与西方教

---

①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1922年英文版。

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1918年英文版，第5页。

③《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3929页。

④转引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第6页。

⑤1897年美国公使田贝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

士盘剥掠夺者，“皆得衣锦厌粱肉，富厚累金玉，出入烜赫”①。不少无赖、地棍就是靠“作奸犯科”，恃西方教士势力巧取豪夺而变成富贾、大地主。

以上侵民利、发民财者，大多数皆是天主教徒，他们“广置田宅，经营藩息，川至云贵，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赁屋，概凭大道生财”②，因而民愤最大。基督新教教士也不甘落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

> “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中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孰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③

所以，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都不能约束他们的一些教士在中国的不法行为。这种“六根不净”、“十诫”不遵的欲念，是从西方土地上滋生的，何况还有本国政府的怂恿和支持。美国丹涅特曾说过：“传教士都是坏蛋，他们来到中国，为着享乐，为着抓钱。”④当然，这个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在西方传教士中仍有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尽管为数并不多。

此外，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要打击那高举着十字架旗帜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

---

①钟祖芬：《振振堂文稿》上二，第28页，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②宓克：《支那教案论》，第58页。

③瓦德西：《拳乱笔记》，载《义和团》第3册。

④丹涅特：《亚洲民主运动》。

利益”①的侵略思想指导下，对中国人民的反教斗争总是极端恐惧与仇视的。每当教案发生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其传教士便共同不择手段地勾结清朝卖国政府，对反对教会侵略的中国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并把教案当作他们向中国勒索的新借口。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大小教案，一般都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最后以割地、赔款、“惩凶”告终。因此，赔款就成了传教士进行经济掠夺的又一个手段，同时这也是新的反洋教斗争再起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四）“劝人为善”与“慈善事业”的背后

“劝人为善”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入传中国后公开标榜的宗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也都写上了这一条①。尽管基督徒中也有真心“劝人为善”的，但利用这个口号侵犯中国主权、强迫人民改变信仰、掠夺财富、践踏人权的传教士却不在少数。其影响之大，危害之深，罪孽之重，完全把“劝人为善”的伪善外衣撕掉了。那么，“劝人为善”究竟怎么会激起公愤呢？

从总的方面看来，一些传教士自从跟随外国炮舰进入中国后，就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经济利益。他们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以胜利者自居，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在“劝人为善”的掩饰下，侵犯中国人民的权益。由于最初侵犯人民利益的规模还比较小，酿成的教案也比较少。但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就大批地涌入中国腹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包庇教民，干了许多坏事。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

①巴顿：《传教士及其评论者》，1906年版，第109页。

②《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5页。

一些外国传教士表面上道貌岸然，满口“劝人为善”，骨子里却心怀叵测，“十诫”对他们来说仅是用来欺骗和愚弄他人的手段，更何况他们都负有各自政府的这样和那样的使命。所以西方教会从本质上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①因为他们懂得，要变中国为殖民地，单靠炮舰是不行的，还必须从思想上征服人心，消除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先给予小恩小惠，以掠夺更多的财富；从观念上改变人民的信仰，使中国人民忘记中华民族的传统。这正如美国传教士斯贝杰曾公开宣扬的：

> “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该以能被利用来引人入教的影响及可能性为限度。作些小慈善事业，而能收获极大的传教效果，远胜过作许多慈善事业，而只能收获微小的传教效果。”②

传教的目的达到了，而那些受命或不曾受命的基督徒，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所在国侵略中国推波助浪。甚为惋惜的是，那些虔诚的、毕生为广布“福音”而老死中国的传教士，也一齐受到了指责。慈善事业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应如何评述呢？我们也只有尽量地予以区别对待了。但是首先还是据大量文献史料，揭露其违反人道、触犯刑律、聚敛钱财等方面的罪恶行径。

教会的“慈善事业”包括了三个方面：(1)育婴堂、孤儿院、社会救济；(2)教会医院；(3)兴办学校等。他们既然把举办慈善事业作为一种生意，所以教会医院把贫苦病人当做试验品，育婴堂虐杀婴儿事件也层出不穷。如，在江苏，教会育婴堂虐杀婴儿的暴行就是很突出的：1868年在扬州育婴堂发现被虐杀

---

①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233页。

②《列宁选集》第二卷上，第375页。

的婴儿四十多个；1891年在无锡天主堂内发现二百余具婴儿尸体。1891年镇江知府王仁堪记丹阳天主堂虐杀婴儿的惨状时说：

“……园内，纵横孩尸七十余具，有用小棺者，也有用洋油木箱者，有蒲包者，有裸埋者，断烂骷髅，十居八九。间有新埋数具，血肉模糊，身躯无从辨认，就中最可疑者有一匣中头骨三具，匣宽九寸，高仅六寸，全尸虽小，势亦难容，一切惨恶情形目不忍睹。”①

又如，湖北武当山下茶园沟西的沈垭天主堂，从1876年建立育婴堂起，几十年间，“共收容男女婴儿二万五千余人，绝大部分被残杀了，最后仅剩下六十多名残废者”②。

除此之外，传教士们兴办的所谓医院，表面虽以“治病救人”为本，但实质上是“挂羊头卖狗肉”。传教士高尔法供称：

“我们医生的工作和目的……既不是为了介绍医学，也不是为了慈善……他们只是用治病为传教的手段。”③

另一个传教士陶斯威特更坦白地讲：

“因为医生每天与病人接触，他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缔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④

据他们自己的调查统计，“有些地方大多数信徒是由于医院影响的结果”⑤。以医院为诱饵来吸收中国人入教，来为他们服务，可见传教士用心之深，摧毁我国人民传统信仰之“周密”。而他们的的确确利用治病手段，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些贫穷落

---

①王仁堪：《王苏州遗书》第6卷. “丹阳教案始末”，第1页。

②申雅、黎群：《罪恶累累的沈垭天主堂》，载《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③《在华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第119页。

④⑤《在华新教传教士1891年大会记录》，第276—278页。

后或商贾富豪而身患重病的人，成为他们猎取的对象。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教会在中国群众中的影响，传教士用种种方法，全面深入地打入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去广泛招来教徒。他们还对不同阶层的中国人民采取不同的进攻办法。对下层人民采取诱惑的手法，即所谓“恤贫”的方法。这种“恤贫”，按传教士自己的解释就是“为了收买一个人的灵魂，必须利用他的肉体为桥梁”①。他们认为：“用白银收买的办法在某些地方和时期是常用的。……因为没有褥子的人，愿意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入教”②。配合着所谓的“慈善”事业，传教士又在各地方拉拢和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叫他们“吃教”，并给予他们特权，充当教会的爪牙，为教会势力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而对上层士大夫阶层，则采用威胁利诱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用西洋“船坚炮利”的实力来压服中国的士大夫，另一方面暗中却运用西方奇巧物品以及五花八门的奢侈品进行贿赂。如传教士金民东主张用欧洲的图画、玻璃瓶、精巧的钟表来贿赂中国官吏，并认为“这东西都是进身之阶，其作用象油脂一样，可以用来润滑事务的轮轴，使之更容易转动”③。另外，他们把基督教和西洋文明混为一谈，夸耀和宣扬西洋的科学文化，使士大夫阶层产生惧外、崇外、媚外的心理，从而改变士大夫们对基督教的鄙视态度。传教士们这些苦心，在封建统治者当权派内，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些洋务派就极力为帝国主义辩护说：“中国之祸不在四海，而在九洲之内矣。”故此，传教士们对那些洋务派官僚也进行了许多拉拢的活动，如李提摩太夸耀洋务派头子时讲：“各省之督抚中，有李传相（鸿章）、张制军（之洞）、刘爵帅

①②《在华新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纪录》，第245、418页。

③艾兰：《京廷之耶稣教士》，第45页。

（坤一）皆能深泰西之法，已有明效之大验。”①

传教士还以开创洋务风气的名义，大贩基督教的私货，通过办洋务为基督教服务。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买办，在基督教教育事业的直接支持下，搞起了所谓大办“西洋文学”和“西洋艺术”的教育运动，以此来训练军事、技术和翻译人员，直接培养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在传教士们直接鼓励和支持下，设立了同文馆，并聘请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由容闳率领120名学生前往英美留学。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活动大为活跃，几乎当时中国所新办的文化事业，十有八九由基督新教包办代替。基督新教就在以上有利形势下，又在1877年组织教科书编纂委员会，表面上是编选教材的机构，而实际上却是指挥洋务教育的司令部。1887年又创立同文书馆，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传教士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已基本确立，西方文化思想又一次打开了封建儒学的思想缺口，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列强侵华思想在中国已基本上奠定了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这一时期，作为传教士个人如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李佳白等等在中国居住活动了几十年，已在中国社会上扎稳了根。他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在思想上，对中国社会已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社交中和政界中也具有一定的“威望”。随之而来的，便是基督教企图取儒学而代之，而成为统治中国的主导思想。

传教士们在中国大肆宣扬“耶稣教和儒教各虽迥别，道本同源”的时候，也知道如果光凭颠倒黑白、鱼目混珠的办法总非长远之计，要取儒学而代之，必须要有广大群众基础和广大群众影响作为后盾才行。因此在这时期，传教士们就从另一条战线和儒学展开了争夺群众，尤其是争夺青年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并不是明

---

①《皇朝经世文编》：《论放账不如防灾》。

目张胆地以挑战方式出现，而是暗暗地以开办学校、设立医院、开办报刊杂志、广收教徒等等方式，从中进行分化，扩大基督教基础，以此来和儒家思想对抗，最后取而代之。这种如意算盘可以从传教士的自供中得到证明，他们说：

“学校在传教区内作了很多开辟传布道路的工作，它们常常起着尖兵作用，是布置轰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它们是特别用来帮助传教士的工具。这些学校教育的结果，证明了我们必须要利用这样的工具，许多入教的儿童信了主，并且成为最得力和智慧的基督教徒和牧师。”①

“作为儒教思想的支柱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教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是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旧士大夫，因此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②

美国传教士、后任美国某大学校长的詹姆士在写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说的更加露骨，他说：

“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多花一些钱，即使只在物质意义上讲，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③

这就是传教士们热衷于大办教育事业的真正意图。而兴学仅仅是争夺思想领导权的一种手段而已。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兴学的积极意义及其对清朝教育制度改革产生的影响。教会学校培养了第一代中国具有自由、民主、科

---

①②《在华新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纪录》，第45、286页。

③《人民日报》，1951年4月14日。

学知识的人才，在变革中国社会制度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至于西方教会的慈善救济事业，在本质上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施贫”是一致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之一，是巩固和推进统治阶级利益的策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小恩小惠，只不过是组织形式新颖，一时能博得人们的好奇心罢了。其中尤以西方医药、医疗事业的传入和普及，传教士是有贡献的。但一些传教士把中国人当作临床实践的试验品，草菅人命，这就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

（五）列强的经济侵略激化了民族矛盾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通过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各资本主义列强获得了长江航运权以及传教士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这些特权。这些权利的获得，给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1876年英帝国主义又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订立《烟台条约》，开安徽的芜湖等市为商埠，设领事，又将安徽的安庆、大通作为外国轮船停泊、上下贸易的“寄航港”（Port of Call）。西方国家在内地的侵略势力，依靠着《烟台条约》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扩大和加深的结果，给中国城乡手工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几千年来小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经济基础，在外国商品势力的不断打击之下趋于瓦解。

在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之中，除了以不平等的商品贸易来摧毁这些地区自身的经济基础，从而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为它们的附庸外，还利用了宗教来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进行思想麻醉工作，以便为商品打开销路，为资本输出创造良好的市场。1888年，一个叫推顿（T·H·Tritton）的传教士曾说：

“商业欠了传教事业多少债？是啊，欠了一切的债。它的最大作用在于开辟这个国家（按：指中国）的商业大道和小路。是商业在先呢？还是传教士在先？是啊，我们知道，在好些事例里，往往是传教士走在商人前面。他们为商业开辟了广大市场。感谢上帝，商业和传教事业的关系不只是理论的，而且是实际的，关乎日常需要的。”①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实例，恰恰成为这位传教士招供的确证。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传教士首先进入安徽，以传教为名，行开路先锋之实。稍后，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的教堂全国林立，神甫、牧师几遍全国。商业和宗教，商人和传教士，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榨取中国人民脂膏、压迫中国人民的两大工具。现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加深，及其所带来的祸害简述如下，以揭示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发生的历史根源。

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中国城乡手工业经济逐渐衰败鸦片战争前，中国广大的城市乡村，存在着牢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这种基础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居民除粮食生产外，不少地区几乎每户都有纺车从事棉布副业生产。在当时农业生产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某些地区的这种副业生产实际上已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安徽农户从事纺织甚为普遍，《怀宁县志》说，“皖之女红，多经纺绩”，“所重惟布”。但是，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只缴纳2.5%的轻税就可在中国销售。接着《烟台条约》订立，外国洋布、大呢、洋绒等商品，通过各个通商口岸，向全国内地大量倾销。外国棉布使用机器生产，质量较土布高，价格也低于土布，

①1888年《传教百年大会报告书》。

数丈洋白布，只需白银一两，而土布因受清政府沉重的厘卡税率负担，价昂质次，无法与外国货竞争。这样，民间手工织布业，便开始迅速瓦解。过去“所重惟布”的安徽农村，现在都“出布渐少，乡人衣着大半仰给于洋布也”①。棉织业的衰败，使全国农村经济濒于破产。过去依靠织布为主的大批农户或小手工业者，生活急剧恶化。马克思在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衰颓的情况时，写道：

> “……外国布匹之输入，对于中国工业的影响，与这种输入过去对于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工业的影响一样大。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②

除织布业以外，外国商品的输入对许多城市手工业的打击也是致命性的。屡屡发生教案的芜湖及山东和华北广大地区，其城市手工业所遭受的打击尤为显著。芜湖的许多手工业部门，特别是冶炼业与染织业远在明代即已十分发达，曾出现过我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据载：“居市里冶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咸丰后尚有炼厂十四家，均极富厚”。所制成品的质量非常高，“其良者扑之皆寸寸断，乃分别为记，檄束而援之，客走天下不啻也”。“今按通商后，洋商以机炉炼出之钢输入，此业遂辍”③。芜湖的染料业，明代处于极盛，直到嘉庆、道光年代，染料业的加工成品和染料还销售到外埠及关东一带。然而到同治、光绪年间，因染料的原料“洋绿”入口，而致“一落千丈，今存者仅三家，并合一坊，惟画工及珍贵物品尚

---

①《怀宁县志》，第6卷。

②《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页。

③《芜湖县志》，第8卷。

用之，余皆利洋绿之价廉也”①。

帝国主义国家商品侵入的结果，一方面扼杀了若干城市中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工业工场；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这些工场主破产，手工业工人无以为生的严重情况，这些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都是积极参加者。

此外，外国轮船自由航行长江及各内河，还给沿江各地及内河沿岸大批民船航运工人带来了厄运。《天津条约》规定开放长江以后，英国商人恃条约所规定的特权，设立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往来长江流域各地，兜揽华商及旅客生意，而中国“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于是内江沿海之利辟为所占”②。特别是从《烟台条约》订立之后，外国大轮不独往来于条约规定的芜湖、安庆、大通，甚至连长江向内伸延的各县镇等内河口岸，亦有小轮往返行驶。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曾“以小轮行驶内河，流弊滋多，碍民生，妨国课，病地方”，奏请严禁③。但并未生效。外轮航行中国内河的结果，造成沿岸民航业一落千丈。咸丰年间，长江流域尚有民船三千余艘，而到光绪十三年，仅存四百艘。这些数字表明，依靠内河运输为生的水上工人，一旦失去其赖以维生的活路，除少数幸存者能谋到其它工作以外，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无业游民，他们对外国侵略者是深恶痛绝的。

这些没有职业的旧航运工人为保障自身利益，多结成帮会。这种帮会往往与反清秘密组织白莲教、哥老会等发生关系，因而富有反抗压迫的思想。由于他们经常往来各地，交游较广，见闻较多，因而长江流域各省发生反教事件的消息多由他们传递。长江流域诸省数次大规模反洋教斗争，大都由他们带头发动。

---

①《芜湖县志》，第35卷。

②《清史稿·交通志》，二。

③同上。

此外，1883年（光绪九年）以后，江南茶园经济的衰颓，也促使这些地区人民仇恨洋人情绪的高涨。

江南诸省盛产茶叶，特别是安徽的歙县、休宁、黟县、绩溪等地的绿茶，皖赣交界处的祁门、婺源一带的红茶，向为中国出口茶叶之大宗。在这些地区，茶农不仅仰赖茶市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而且还要依靠茶市收入负担清政府用以维持长江水师饷源的沉重的厘金剥削。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英国在印度发展茶园，使用机器焙烘，生产了大量价格低廉的印茶。许多大量依靠中国输入茶叶的西方国家转而购买印茶，因此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顿形萎缩。仅光绪十一、十二两年，安徽经营茶叶之商贩即因茶叶滞销，亏本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光绪十三年（1887年）一年亏折更甚，损银近百万两①。茶商、茶贩尚且如此，一般茶农的生活状况，当然更加困苦，今非昔比。应该指出，印茶虽是印度农民、工人生产加工而成，但生营、销售、贩运都受英国资产阶级所控制，仍属于帝国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侵略行为。所以，安徽以种茶为生的茶户，把茶叶滞销，收入顿减的原因，归咎于"诡计多端"的洋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帝国主义商品经济的侵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作了精辟的论述：

>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市场，……破坏了城乡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②

---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第42卷，"征榷"14。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城乡数以万计的依赖各种手工业或以茶叶经营为生的城乡居民生活恶化，使沿江及内河两岸大批航运工人失业，他们从实际的生活中深深地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他们仇恨外来侵略者是理所当然的。重庆教案、芜湖教案中，群众焚毁教堂后，又前往攻打英国领事馆及海关洋人的事实，就足以证明人民痛恨的对象，并不只是几个传教士或几所教堂。但是，由于在所有的外国侵略者之中，只有传教士是普通中国人民所能直接接触到的外国人，而他们又是些假慈假悲、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外国人，在各地留有蛮横、暴虐、夺产、侵权的不光彩形象，因此，教会及传教士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和打击的主要直接对象，并不是偶然的。

第八章　教案席卷神州大地

（1861——1895年）

外国侵略者及其传教士侵犯中国主权，欺压人民，作威作福。就连无赖之徒入教后也是倚恶仗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完全变成了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当时流传着一句俗语说："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教民如此，教士更可想见。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情况更为严重。直接身受其害的百姓对这群如狼似虎的教士、教民十分痛恨而无处伸诉，以致发展成为声势越来越大、此伏彼继的杀洋人、烧教堂的反教会、反侵略的爱国行动，最后汇合成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在此间三十多年的反洋教斗争中，有三个多发期：一是以1870年天津教案为代表的第一个多发期；一是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为第二个多发期；一是1891年以四川、长江流域和热河东部为中心的第三个多发期。随着反洋教斗争的深入发展，斗争目标更加明确，目的更趋于鲜明，手段、方法更接近于革命方式。这就是说：第一时期，大规模的群众反教斗争的目标仅是教士、教堂，目的是反教会的压迫，而更多的是从经济上着眼，形式上也是一哄而起；第二时期的目标，不但是教会、教士，而且还有领事馆、海关署以及为法国服务的商人商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色彩加强了，民众朦胧地感受到国家与民族处在危亡中；第三时期，深受双重压迫的下层民众，模糊地意识到压迫他们的不仅有

洋人，而且还有勾结洋人的清政府。

这一时期教案，无论从内容、规模、影响诸方面，都较弛禁后早期教案丰富得多、大得多、深远得多，它随着中国半殖民化的加深而加深，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化而强化。从《天津条约》签订后发生的贵州青岩、开州教案起，至《马关条约》签订后成都、古田教案止，先后发生教案数百起，平均每年要发生教案数十起。这一时期教案发生的原因，本书第七章各节已详述，这里仅概述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教案，使之互为表里，更能增加实感。

一、第一多发期的典型教案（1861——1870年）

传教士获得在口岸传教以后，不久又获得到内地传教的自由，他们恃条约给予的政治特权，以征服者的姿态，横行都鄙乡村，引起众多民教纠纷乃至民教冲突。但是，丧失国格的“和约”，总署同意的传教“护照”，清廷严厉惩办打教人的谕旨等，并不是畅行无阻，它受到百姓和一些官吏的异议和抵制，故有传教士说：“所有和约，并不通行各省，即或通行到省，而各督抚又可转行所属，并将天主教益加禁革，比未立约之先，更惨且酷，实出情理之外。”①这是传教与反传教斗争的开端，并直接影响教案的发生。第一多发期中所发生的教案有近百起，它有以下一些特点：

（1）传教从隐蔽到公开，中国广大地区百姓突然感到一种陌生的信仰在威胁着自己的传统习俗，不少教案只因为细小问题

① 《贵州通志·前事志》，第27卷，第1页。

而酿成巨案；

（2）教士的蛮横和盛气凌人的态度，把不少地方官员、绅衿得罪了，因此，不少教案都有地方实权势力的支持或同情，乡试考生参加打教者甚多；

（3）“还堂”事件的恶性发展，及强买房地广建教堂，侵犯了百姓的切身利益，致使教案屡发；

（4）法国天主教士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肇事者，英、美教堂受到波及。

（一）贵阳教案（1861—— 1862年）

贵阳教案是指1861年发生在青岩和1862年发生在开州的群众反洋教斗争。

法国天主教势力在十六世纪后半期，就已经进入贵州，但影响不深。1849年白德望任贵州主教后，凭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及他本人特殊的活动能力，教务日益发展。至1853年，全省已有三分之一州县设有教堂或传教点，为此而发生大小教案十余起，教会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①。不久，神父胡缚理等又先后在六冲关和青岩镇强买民地，建造大、小修院和印刷厂，遭到当地人民抵制，结怨甚深，时思报复。

《北京条约》签订后，有利于传教士的条款，使胡缚理在接任主教后行为更加失检，骄狂不可一世。1861年4月4日，他手持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的“传教士护照”，乘坐紫色大轿，肩披紫带，在一百多名教徒前呼后拥下，招摇过市，引起路人侧目。他

① 据范介屏《贵州开教以来大事年表》统计，从1756—1860年，贵州共发生教案十六起，教士、教民死十三人，伤一百多人，被捕一百六十多人，其中充军二十人。

直奔巡院衙门，要求巡抚何冠英承认教士在内地传教自由，保护天主教在贵州的“合法”权利。何视其傲慢无理之状，已含愠怒，当面驳斥说：“现省内情形混乱，外出传教，实有不便之处，并且黔省教门已多，实无增加教门之必要。今后教徒中，如有违法乱纪之事发生，汝等不能辞其责。”①胡缚理碰了一个硬钉子还不甘心，又乘轿往见提督田兴恕。田拒绝接见他。对传教士僭权行为深为不满的田兴恕，此时欲借群众愤恨之情势，一举驱逐洋教。

田兴恕本系一介武夫，因镇压黔省境内暨川边会党起事而邀功赏，官至一省武官大员。但此时他置清廷弛禁谕旨于不顾，再三派弁勇搜查天主堂，抄走各种宗教用品。并向全省各地发出“秘密公函”，令各地“随时驱逐，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或借故处之以法”②。消息不径而走，赶走洋教士的呼声，竟成为贵州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愿。

承认和反对“传教自由”争执的僵局，历时两月余。适逢端午节日，青岩镇各族人民按传统习惯到郊区野游，途经姚家关天主堂大修院，与修士、教民发生争执。团首赵畏三知大宪有驱教之意，遂率众一举焚毁修院，逮捕数名教徒，并在田兴恕的指令下，于7月29日将张文澜等三名修士和一名厨师秘密处死。胡缚理幸免后，急向驻京法公使报告，提出赔款、护教、惩凶三点要求。法国政府亦向总署提出“抗议”。正当双方紧张谈判之时，开州教案又起。

开州(今开阳县)教案起因，是天主教徒对青岩教案久议不决的报复。次年正月十五日，开州夹沙地方欢度元宵，援例应每户出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怂恿教徒抗交。民教双方发

① 转引自周健钟：《贵州三教案》，第18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39、43页。

生冲突，几至动武。团首周国璋、开州知州戴鹿芝本恨教会侵权，即在田兴恕批示“缉案就地正法”①的指令下，在正月内将文乃尔及四名抗捐闹事的教民逮捕处死。

前案未结，另案又起，法国公使联合英、美、俄等国公使，一齐向清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以武力相要挟，要求赔偿一切损失，处死田、戴、赵三人，并严惩一切保教不力或查处不严的有关官吏。

在长达三年之久的外交谈判中，清政府终于屈服在列强的压力之下，达成：戴鹿芝、赵畏三、何冠英已死不予追究外，田兴恕发配新疆充军；提督衙门拨给天主堂使用；两处教案共赔偿白银一万二千两；有关人员或交部议处，或革职，或充军。列强各国和传教士也满足了，特别是把闹教的指挥部、全省军事首脑机关——提署罚给天主堂使用，大大挫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无怪乎“胡缚理深为悦服”②。一场震惊中外的贵州教案，在传教士满意的前提下结案了。

（二）南昌教案（1861——1862年）

《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即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间，法国传教士罗安当拿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执照，乘船到九江。先派其副手江西抚州人方安之到南昌府衙门投递照会，称罗拟见江抚沈葆桢商洽一切教务，并称已在省城新置育婴公会一所，养有女婴十余人。十二月十八日，罗以法国总理江西传教事务的名义谒见江抚，呈交恭亲王所给的咨文，内容系索赔吴城教堂，当时未达成协议。

---

① 《开阳县志稿》，第9章，“宗教”。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第46页。

江西在《天津条约》签订前，法国教士已在省内各地如抚（临川）、建（南城）、袁（宜春）、瑞（高安）、临(清江)、吉（吉安）等处设立秘密教堂，在黑夜传教。其中只有鄱阳湖西岸的吴城镇系公开设堂多年，道光年间曾加修建，但即为当地知县所毁。后又改设一区，复在咸丰五年为彭玉麟率兵毁坏，改设龙王庙。当时因尚未订约，暂作罢论。法国传教士罗此时据约提请赔还。当年，罗安当就在省城育婴公会过年。

第二次晋见时，罗又改用法国全权大臣的名义，命令地方官张贴传教的布告。这一侵犯中国内政的行为，立时在江西省人民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时，湖南湘潭一带有些“吃教的人”听说传教士依约来省，就“相与夸耀其事，以为吐气扬眉复见天日”的时机来到了。这深深触怒了当地的人民，于是人们便印发传单揭露传教士的种种不法行为，说他们“借宣讲为名，裸淫妇女”，而对“其它种种奸恶”亦“描写书致”①。并利用歌谣、图书进行宣传。这一类的宣传品很快就传入江西，于是就由齐集在省城考试的生童们联合了致仕官员夏廷渠（翰林院检讨）、刘长浔（甘肃臬司）等，把湖南的斥教传单连夜赶印数万份，分贴于重要地方，并发布行动的揭帖，决定在二月十八日（公历3月18日）打毁教堂。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向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斗争。

在决定行动的前一日，即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1862年3月17日），南昌人民群起拆毁筷子巷的育婴公会，并将平日恃教为恶的吃教者住房拆毁数十间。次日夜间，又将城外法国的天主堂及教士的坐船捣毁，并在进贤县附近毁教民陈姓数家。罗安当及中国教士方安之惊恐万状，赶忙逃跑。

事情发生以后，沈葆桢在处理上感到棘手：“夷人逞志于我

① 夏燮：《中西纪事》，第21卷。

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也”①。他认为此举是“二百年养士之报”，并且对事件的责任要“挺捷身仕之”；一方面他却又向清廷声明自己是“与该教士亦休戚相关”，并进言“使传教士徐示以可信，而不可强以遽信，久焉断无不信之理”②。廷臣对沈同情人民的一面加以攻击。李鸿章劝沈不要这样做，而郭嵩焘主张以“法”来“整肃”人民的正气，反对士子绅官参加打教。最后，朝议解决办法：“由官筹措五千金，俟罗教士抵浔时，解与九江道妥交，以为赔偿之费；凡百姓愿卖之地，任凭罗教士自择建造，以壮观瞻。”③可是法国侵略者并不满意于这一馈赠，竟提出了新的要求。据《中西纪事》记载说：“连年各处被亏，及现在省城、进贤两处房屋、器用、经典等项，共计估值七万两，又欲索抚州门外之丁家山及九江西门外之琵琶亭空地，以备该国教士随时建造房屋、教堂、坟茔之用，交罗安当承管。”④这种无理的要求，对于官吏来说是可以“忍气耐烦以保全和议”⑤的。但遭到江西人民的抵制。

首先，人民在舆论上揭露教士所说“劝人为善”的目的是：“要夺我们本地公建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来占我们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⑥；他们“隅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

---

① 夏燮：《中西纪事》，第21卷。

② 《沈文肃公政书》，第1卷，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五奏。

③⑤ 《筹办夷务始末》，卷12，《沈葆桢附呈派员密访问答》。

④ 《筹办夷务始末》，卷12，《沈葆桢附呈江西匿名揭帖扑灭邪端异教公启》。

⑥ 《沈文肃公政书》，第1卷，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五奏。

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①；若依教士横行，“以后总不能安生”②等等。

其次，对于官府的包庇，士绅的动摇，也进行了一些揭露。民间传言：“官府绅士，总是依他（侵略者）。做官的只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结果“受罪的是百姓”③。他们蔑视侵略者说：“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④在发布的反对侵略者的公启中说：“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肩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杀死一个，偿尔一命，杀死十个，偿尔十命。”⑤1863年，当罗、方又乘船来省城交涉接收时，人民就在“河干树一大旗，禁止法夷入城，”并抛掷砖石，飞中其舟。罗、方二人忙“解缆下驶”⑥逃去。

但是，清政府惧外媚外已相沿成习，所以把“和议”作为唯一出路，因此不顾人民的意愿，最后还是赔偿洋人“银一万七千两”，被拆毁的教堂则由“教士领款，另向他处购造”⑦。轰轰烈烈的南昌人民反洋教斗争，最后竟然得到如此屈辱的结局。但是，江西人民的斗争却给西方传教士上了一课。

---

①⑥ 夏燮：《中西纪事》，第21卷。

②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与美公使谈日本侵台湾。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2：《沈葆桢附呈派员密访问答》。

④ 《筹办夷务始末》上同治朝，卷12：《沈葆桢附呈江西匿名揭帖扑灭异端邪教公启》。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2。

⑦ 《沈文肃公政书》，第2卷，同治二年六月二十日奏。

（三）衡州教案（1862年）

衡州(今湖南衡阳)教案发生在1862年农历四月初三日。据衡永郴桂道黄文琛（海华）的奏报说，此案是考生“乘考聚众，焚毁该堂，拆毁教民房屋，人逾数万，势甚汹汹”。情况很象李伯元在《文明小史》里描写的湖南反帝运动，其规模之大超过了后来的天津教案，只是没有闹出人命。

教案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教会“邪妄奸污，肆无顾忌，士民受害最酷”，因而“切齿痛恨，不啻同仇”。具体的事实很多，正如衡州耆民夏士培等联名上巡抚禀帖中所载，实属是“怪怪奇奇，难以擢数”。其中“昭彰在人耳目”的，有这样几件：

衡州北门，原有“十字街”，教会认为触“十字架”之讳，纠聚教民拆毁民房，还要改变街道的十字形式。弄得衡州一市大哗，群起反对，相持了好几天，才平息下去。

另，教民出丧，有小孩在道旁游戏，扬灰撒成十字形。教民认为受了侮辱，竟把孩子的父兄扣押起来。生员萧方规进行劝解，也遭到他们毒打。他们把棺材抬到孩子家里不肯走。后来由邻里集钱赔礼，才算了事。

衡州下关有来雁塔，教会的洋人用教民做向导，悄悄地把他们引上去，“用远镜俯瞰全城内外形势，绘图”。这显然是遭官吏士子民人的忌恨的。

教民聚众千余，揭帖通衢，要拆掉城隍庙，改筑“道友堂”，还要撤掉府县学中的孔子灵位，改奉“十字架”。又散布流言，宣传天主教当兴，迂腐的儒教当废，如“胆敢违抗，将来广东、湖北两省教主，必兴问罪之师”。

此地教会经常走私，“有船只数十，终年往来载运，每月数回。每船木桶数百，收发于城外香水庵，而封识甚固，不知为何

物”，引起衡州人民的疑虑。

他们还包庇匪类，如“素行不法之张道荣，案发收系，一报彼教，即有夷目来为杠护，官府即释不敢问”。至奸辱妇女事件，更是常常发生，教会庇护，冤屈无由昭雪。

总之，这时教会的势力已经达到了穷乡僻壤，“四乡七属”，全有教堂。只要肯入教，每人先送十两银子，并宣传还可以“免灾”，“生监以上，予以援例报销之数”，因此，被收买的人很多。教士、教民横行不法，终激大变。所以夏士培等人禀词追溯教案的根源时说：教案是由“教门与衡人以大不堪而激成之者也”。

教堂焚毁以后，外国教士就跑到北京“控诉”，清廷立即“下巡抚檄道穷治”。教士回来后，气焰更加嚣张。据夕霞馆主的《儒林附纪》和牛应之的《雨窗消意录》两书所记，在审理时，“士民圜视而诉者数千万人”，但是，诉胜者，仍是教士、教民。

（四）第一次重庆教案（1863年）

第一次重庆教案，是由于“还堂”事件所引起。

1858年，法国教士以《天津条约》弛禁、“还堂”为由，要求退还川东四所教堂旧址，“请准长安寺地，改修重庆教堂”①。教士范若瑟持清廷文谍，强行拆除长安寺，修建真原堂，并侵及附近民产民居，就连川东三十六属团体保甲办公暨八省首事聚会之地，均被逼从长安寺迁出。不久，范若瑟升任川东教区主教，又扩建真原堂，强占民房。重庆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863年3月，一举捣毁真原堂及教士住宅。

---

① 民国《巴县志》，第16卷，“交涉”。

教案事起，范若瑟通过法驻京公使向总署施加压力，并说“暴徒”拉走存放在教堂内的“川黔滇藏寄存货物”，及教民铺中“川苏洋广匹头、杂货、绸货”①，索赔甚巨。清廷指令川吏火速处理。时成都将军、署川督崇实疑八省会馆首士为肇事祸首，即将傅苍岩、张朗斋等提省讯办，“几陷大辟”。后迫于全川人民的反对，并经成都知府再三调停议妥：八省会馆赔款二十余万两；允法国教士“另行卜地建修教堂”，“各属境内教民如有典买田宅修理经堂、医馆等项，该处士民均宜玉成其事”②；长安寺“转给八省永作办公之所”，偏右地段永清驻扎军营，以卫阖城。

第一次重庆教案从形式上看，打教人民似乎取得了胜利，争回了长安寺，维护了本地人民的信仰。但是，川东“所属境内”广修教堂的权利，却拱手交给了川东主教。从此，教会势力遍及酉、秀、黔、彭、涪、垫、万、梁，川东遂成为多事之地。

（五）第一次酉阳教案（1865年）

自从1858年6月27日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的第十三款规定传教士自由传教“不受拦阻”，特别是1860年10月24日《中法条约》中又把传教士可到内地活动的条款塞进去后，传教士便进入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活动。

最先进入川东少数民族地区的是法国教士邓司铎。1862年，他带着一份法国公使发的“护照”到达川东土家族、苗族聚居的酉阳州。他的护照上写着：

---

① 《清档·教案档》，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范若瑟致总署函》。

② 民国《巴县志》，第16卷，“交涉”。

"……传教士某公，在四川省来去传教居住，无论何处租田买地，建造天主堂屋宇，均听其便，丝毫不可留难，当以宾礼相待，并望随时照料。为此，本大臣给发此照，凡属大清国辖内外各处，咸宜遵照勿违……"①。

邓司铎持这个"护身符"便在距酉阳城二十里的小摇坝地方修建了"公信堂"。此后，他又收买痞匪，设置"教党"武装，征收租税，奸淫妇女。继邓之后来酉阳的是法国教士李国。李国依仗"护身符"，把入教的痞匪武装起来，横行乡里，肆意劫杀，欺压人民。当地忠厚的居民何大发因为不愿入教，就遭到毒打，并被迫杀猪纳款，到教堂赔罪。何大发仅仅说了一个"不"字，竟遭如此迫害。因而引起当地士绅、团首张佩超、冯仕银等人的不满，并暗中支援受迫害百姓，民教矛盾日趋紧张。事隔年，在李国的纵容下，痞匪教民刘明钊等数十人血洗何大发家，杀死其父等二十余人，痞匪教民还将何大发之妻李氏轮流奸污致死②。事件发生后，罪犯在法国教堂的庇护下，竟然"祸免无恙"。更有甚者，教士"马洛特在酉阳天主堂门前，将绑赴刑场执刑的土匪杨光涛劫至堂内包庇起来"③，地方官竟无可奈何。民众怨忿日积，民教矛盾已呈一触即发之势。1865年阴历二月二日，四乡民众在农民刘胜超率领下，一举捣毁"公信堂"。酉阳城民众起而响应，摧毁境内教堂，打死窝藏洋教士的店主何魁。各族人民举旗执械，在县衙门前悬牌，上写"诛灭天主教，

---

① 引自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第7页。

② 《巴县档案》，同治八年十月；《团民何大发控告教士教民暴行禀状》。

③ 《重庆教区历史资料》。

斩草除根”。斗争迅速发展，城内各街“传闹如狂”。八月初，民众在土家族头人冉从之（冉老五）的率领下，把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玛弼乐欧毙于城皇庙。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派兵入川进行威胁。清政府十分害怕，急忙把镇压群众不力的酉阳候补知府董贻清、试用直隶州知州邓清涛“摘去顶带”，由川东道首尹锡佩接办此案。锡佩一味迁就法国的要挟，逮捕了刘胜超、冉从之、张佩超父子等，杀害了冉从之，其余人杖责或刺配充军，或久禁渝监。同时，与教会议结：赔偿教会白银八万两，“先交教士银二万两修立教堂，其余六万两分作四年付给，书立和约，公用画押”。酉阳知州胡圻还多次到教堂赔礼道歉。

这一屈辱的结案，并没有压服酉阳人民的怒火，也没有给不法教士、教民以应有的惩戒，这就为酉阳再一次发生打教事件埋下了伏线。

（六）第一次扬州教案（1868年）

1868年的“扬州教案”是江苏地区人民最先掀起的反洋教斗争风暴。

扬州地处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为交通要道，经济、文化较发达，是当时中国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所以，在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传教士一到中国，就看中了这个地方。

在扬州传教的主要是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传教士金缄三，为了吸引广大百姓入教，举办了育婴堂、医院等所谓慈善事业。其实，他们的设备很差，护理更不完善，医疗事故多，特别是对病婴的治疗，成活率甚低，因而盛传教士所“拐骗”的婴儿，大都被虐死。据记载，1868年，幼婴因受虐待，“堂内死了

四十多个”①。当地群众纷传教会“有将幼孩挖眼挖心之事”，并散发揭帖，说“育婴堂系为食小儿肉而设”②，并传闻教会医院将婴儿和贫苦病人当作试验品。传教士的这些暴行一传开，大大激怒了扬州人民。1868年6月间，扬州官绅会议驱逐“洋教”；群众也不断向教堂抛掷砖石，打碎门窗、房瓦以示威。但是，传教士仍无离开之意。扬州士绅在群众斗争的不断高涨下，再次会议，决定采取强硬的措施。这时，正是府学考试期间，考生云集，许多考生投入了反洋教斗争。七月初五日，以葛姓秀才为首的考生，会同“无数百姓”③围攻基督新教英国教堂。愤怒的群众，攻入教堂，捣毁家俱陈设，并举火烧毁教堂。

事情发生以后，英国驻沪领事麦都思赶到扬州，向知府提出了无理要求：照英方所指之罪犯，予以惩办；赔修教会房屋；出示申明教士各种权利；赔偿损失。知府表示只同意其中一部分，其它须请示两江总督曾国藩。英领事遂离开扬州，赴南京与曾国藩交涉，但未得圆满答复。侵略者见单靠交涉不行，于是采取了炮舰政策。十一月，麦都思率领战舰四艘，到南京向曾国藩提出了最后通牒。曾国藩在英方大炮的威胁下，答应将扬州府县撤职，赔偿所有损失，在教堂门前建立碑石，并申明保护教士④。这场斗争仍以清吏的屈膝投降而告终。

（七）台湾凤山教案（1868年）

为了反对西方资本列强在中国领土台湾建立殖民统治，台湾

---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札法国领事文稿”。

② 《清季教案史料》，第5页。

③ 《清季教案史料》，第8页。

④ 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第35—36页。

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早在十七世纪初就开始了，到1868年的凤山教案前，共发生大小教案十几次，其中较大的就有九次之多。在台湾发生的众多教案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868年8、9月间在凤山县发生的“凤山教案”。

凤山教案起于1868年7月30日（农历六月十一日），结束于翌年2月。

凤山教案是由英国基督新教牧师、教士传教及教民的专横引起的。教案发生前，凤山县城内经常发生儿童失踪的事，于是，民间开始流传洋教士把孩童拐骗到教堂之后，剖胸挖眼用以配药方。此类传闻，最易不胫而走，人民愤恨异常，遂把仇恨集中到新来的牧师马雅各身上。恰在这时，凤山县县衙当差的猫角作证说，有人在挖教堂废墟时，曾发现那里有白骨。群众拥到县衙控告，知县凌定国往勘，果有白骨。这更激怒了群众。

1868年7月，马雅各指挥重建曾被民众烧毁的凤山埤头教堂，民众组织数百人，再次袭击施工现场，所有的建筑材料全部被抢走。到了9月（阴历八月），英国教士又到县属前金庄传教，村民数百人集众鸣鼓“围而攻之”，驱走了教士。消息迅速传到县城，民情汹汹，一呼百应，又去围攻凤山沟仔乾教堂。愤怒的群众“拆屋毁物”，最后纵火焚之。此后，民情振奋，又连续捣毁了凤山长老会教堂，杀死两名平日作恶的教徒。教士高长跑到县衙躲避，被凌定国拘捕。马雅各躲到旗后教堂，人民紧跟着去围攻。后经英国商人持械营救，马氏方得脱险。这就是凤山教案。

教案发生后，民愤仍未平息。县令凌定国遂照会英国驻安平领事吉必勋（J·Gibson），要求逮捕教士马雅各、吴文水严惩，以平民愤。吉必勋被迫带着马雅各、吴文水前往县衙交涉，途中又遭附近人民持械伏击。吉必勋要求英驻华公使出面干涉。英公使一方面向清廷总理衙门照会，要求查办凶手；另一方面派出两艘兵舰从香港开到安平，猛烈向安平城开炮，杀死副

将江国珍及兵士多人，并焚毁兵营及火药库，血染安平城，造成了安平事件。闽浙总督英桂据理力争，英使仍毫不妥协。

清廷怕事态扩大，便派出福建兴泉永道曾宪德等赴台查办凤山教案。1869年12月，双方签订一项条约，其中包括：赔偿教会损失；抚恤打死的教士家属；地方官全部革职；“扰事凶手”严惩抵命；县役猫角流放泉州；取消台湾官丁的樟脑专卖权等①。

凤山教案虽结，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教斗争却没有结束，而是越来越高涨，一直到1895年6月，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之时，斗争仍在继续。

（八）第二次酉阳教案（1868年）

第一次酉阳教案后，酉阳天主教会传教士更加有恃无恐，桀骜争长。他们利用教会武装变本加厉地欺凌非教百姓，因而再次激起事变，导致了1868年11月的第二次酉阳教案。当地人民称这次教案为“何彩打教”。

何彩系民团骨干，其母曾遭教士殴打，并被教士教民轮奸致死，对教会恨之入骨。遂四处联络，密谋起事，并得到当地各民族人民的赞同和支持。地方名士宋昭楼、冯石渔等人和其它民团首领都与之暗中结交，打教呼声日益高涨。适逢无赖痞匪教民龙秀之“逼勒朱永秦退婚”，并率教民抢朱家财产，烧毁房屋多间，更激起公愤。何彩抓住时机，于农历十一月二日，率领群众一轰而起，首先焚毁了火石垭教堂，继而捣毁酉阳城内的法国天主教

① 有关凤山教案的详细情况，参见连横的《台湾通史》，第22卷，“宗教志”；林子侯的《台湾涉外关系史》，1978年台北版，第336、349、350页；陈碧笙的《台湾地方史》，第13章。

大教堂。奸污其母、作恶多端的法国司铎李国①，也被烧死。酉阳县各乡民众闻讯纷纷响应，毗邻的贵州民众也积极参加，声势浩大，聚众约万人。清政府派军队进行镇压，捕杀打教群众多名，并下令解散民团。纸房溪教堂的法国教士覃辅臣等也乘机动用教堂武装，枪杀民众一百四十五人，打伤七百余人，烧毁一百户民房。刹时间，酉阳城变成一片火海，鲜血染红了街心。

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派员来川，扬言再起战争。清政府慌忙将酉阳知州曾传道革职调任，改派田秀栗接任州牧，率兵前往镇压。翌年，清廷又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入川查办。李明知“本地痞匪入教者，依势欺压平民……激成巨案”②，但仍持“其曲在我”的奴才观点，颁发告示，发布谕令，禁止人民有任何反教举止，要求“聚众行凶，致犯阻教灭教重罪”不再发生。随后，将何彩等人押解到重庆杀害。同时，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公使、教会议结，赔偿白银三万两③。两次酉阳教案实际赔款达白银二十万两”④。

发生在川东酉阳县土家、苗族人民中间的反教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人民的那种顽强的斗争精神也使传教士胆颤心惊。法国传教士在回忆酉阳人民反教斗争的这段历史时说：

> “教士在酉（阳）、秀（山）、黔（江）等处所受之苦，风波之猛，致命之众，难以枚举。”⑤

---

① 《穆宗实录》中称为李国安。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5卷。

③ 《四川近代史》，第115页。

④ 《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第76页。

⑤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九）安庆教案（1869年）

1869年（同治八年）初，法国天主教（Tesuits派）教士韩石贞（Plerre Hende），英国内地会数士宓道生、卫养生等进入安徽安庆后，以低价半买半租民房十五间，改为教堂，引起了安庆人民极大的不满。

同年六、七月间，湖南反教揭帖流传至安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揭帖内容为：(1)教会不敬祖宗神佛，惟知上帝，入教者必先毁除祖宗牌位，遇到庙宇，即行拆除，“祖宗者，人之本也，本之不存，枝叶必枯”；(2)教堂以甜言密语勾引男女，卖给败类洋人，甚至远送南海岸侧，充作渔人钓饵；（3）“奸夷在条约庇护之下，经营商业，关卡通行无阻，不受查验，教士布满各处，为之侦察”。揭帖以“如果邪教盛行，圣道不昌，不知成何世界”，号召“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①。安庆人民在揭帖的鼓动下，纷纷欲捣毁教堂，驱逐教士。

此时正值府院考试期间，安庆府各地文武考生云集。这些考生因平时孜孜所学皆为诗书义理，与教会反对祖先崇拜之义绝不相容，因而有浓厚的反教思想。十月间，安庆考场附近出现了一张匿名揭帖：“匪教猖獗，与考童为难，于初二日拆仁爱堂。”②这样一来，反教空气更紧张。揭帖出现后，安庆地方官嘱咐教士在生员考试期间切勿外出，以免发生纠葛。教士置之不理。十一月三日，英教士宓道生、卫养生不听劝告，乘轿往府署，要求道台查办散发反教揭帖之人。当时府署内正举行考试，教士一入府署，即被考生拦阻，并将宓、卫两人之乘轿

① 《中西纪事》，第21卷，第4页。

② 《清季教案史料》，第2册。

拽翻，高呼“杀洋鬼子、打洋鬼子”①。教士避入府署呼救。事既开头，不可遏止，许多考生及群众拥入西右坊英教士住所，捣毁家俱什物；同时，东右坊法国教士韩石贞住宅亦被大批愤怒的群众冲入，捣毁门窗器具，并搬拆一空。教士韩石贞刚启程赴上海，此时闻讯折回，迳往府署，要求道台驱散闹事群众，赔偿损失，保护教士身家性命安全。安庆地方官因教士到安庆之初，即挟势“租”屋，将教堂盖在衙门附近，心存芥蒂。继而教士不听劝告，迳闯衙门，以致酿成事端，地方官更为不满，因而对英法教士的要求，故意拖延，坐视事态发展。当晚群众又拥入教士住所，捣毁尚存之物件，撬开房内地板，拆除砖壁，殴伤宓道生之妻，并声言焚屋杀人。韩石贞见状不妙，由后门逃走，连夜化装乘船到了上海。

安庆反教事态扩大后，道台、知县不敢继续坐视无闻，但亦不愿镇压闹教群众。因而当韩石贞逃走后，对宓道生、卫养生请求护送离境的要求，一口允诺，次晚即派小船两只，将二人及家眷送至九江。

宓、卫到达九江后，立刻向英驻华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ock）作了报告，诬蔑安庆人民抢劫教堂家俱，侮辱教士妻子，对安庆反教的事实经过，极尽歪曲之能事。当时正在海口一带巡视的阿礼国，闻讯匆忙赶到南京，要求两江总督马新贻惩办肇事者，赔偿教堂、教士损失。马新贻因安庆考试尚未结束，群情尚愤，若立刻严办，势必激起更大事端②，故请求阿礼国稍宽办案日期。阿执意不从，即由南京乘船沿江西上，企图以武力相逼。他路过安庆时，又派人进见安徽巡抚英翰，要求英翰速办。英翰也以考生群集、众愤未散为辞，商请阿礼国暂缓查办。

---

① 《清季教案史料》，第2册。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第23页。

阿在安庆江面遥见城内百姓成群结队，形势紧张，只得同意待事态平静后，再行办理。

在法国方面，安庆教案发生前数月，法公使罗淑亚（Comle de Roche Chonart）已借口四川酉阳、贵州遵义教案，向总理衙门进行勒索。及至安庆教案发生，罗淑亚即乘机率领兵船六只离天津南下，声言要武力解决，一时形势甚为紧张。总理大臣奕䜣以为事"且涉英国耶稣教堂，更形棘手"①，惟恐英、法再次联合，进攻北京，又虑"安庆地处江滨，为兵船所必经之地……设藉兵船就便，任意要挟，恐吓官兵，以致枝节丛生"②，便下令马新贻速与英法公使谈判具结。罗淑亚离津后，十二月一日到达上海。马新贻早已派臬司杜文澜在上海等候，与之商谈。法公使恃仗武力，态度强硬，且要求多系无理。杜文澜在他的报告中说，"法使挟盛气而来，……挟制要求多不近情"③。这些"不近情"的要求，可归纳为三条：（1）赔偿损失五千元，由政府代建教堂，偿还教士；（2）安庆城内或指拨官地或仓廒衙署之类为教会堂基；（3）凶犯由教士指定拘拿④。在法国武力威胁下，清政府表示同意即日派员会同教士到安庆，指定城内地址一块，由官买给教堂；赔偿损失四千元；按照密、卫两教士指定之"祸首"，严予惩办⑤；出示申明条约，保护教士⑥。此外对保护教士不力之安庆各级官吏严加申斥。

安庆教案至此乃告一段落。但教士通过教案议结，任意指定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9，第27页。

②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9，第27页。

④ 同上，第70卷，第34页。

⑤ 两教士在事件后，根据教民诬告，指控夏民、王奎甲、徐星关等人为启事首犯，要求严惩。见《清季教案史料》，第2册。

⑥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第55页。

民产作为赔偿，气焰益发骄横。安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也愈来愈深。

（十）建德教案（1869—1870年）

江西建德(今至德)自法国天主教传入以后，有许多居民因与邻居素有微嫌，乃相率入教，借外国教士之力，欺压与他们不睦的邻居。建德官府迫于传教士的恐吓，遇有教民与非教民之争，不分是非曲直，一味压制非教民，以图息事宁人。建德教民以入教为护符，恶霸街坊，肆无忌惮，引起群众莫大愤慨，双方仇恨逐日加深。

1869年安庆反教消息传至建德，建德遂发生群众与教民的仇斗。地方官因平日受教士的歧视，忌教士侵夺其权，不愿出面干涉。仇斗结果，教民寡不敌众，被杀者二十余人，住宅亦有被焚毁的。

1869年12月24日，罗淑亚以建德教民被杀，安庆教民议结又未履行为借口，率兵舰四艘，赴南京再度与马新贻交涉，要求拿办建德教案的凶犯；派员前往建德查办，抚恤教民。建德民教仇斗，并未涉及教堂，纯为中国内政问题，而罗淑亚竟要求惩凶、赔偿，是公然漠视中国内政主权的行为。然而马新贻竟同意他的无理要求①。罗淑亚当然表示满意，乃回船北上。

建德民教仇斗后，因事关人命，地方官曾逮捕教民与非教民多人，及至马新贻允许“惩凶”，抚恤教民。建德知县因教案只关中国之事，与教堂无涉，因而对惩凶、抚恤一节，拖延未行。1870年3月，法方见马新贻的诺言迟迟未成行动，又派兵舰一艘（Castlogon号）至安庆江面示威。同时，罗淑亚又再度以离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第36页。

开北京来威胁总理衙门。清政府屈服于压力，遂保证立即查办执行。同年5月，建德被囚的教民全部获释，损失亦得到补偿。此事才告了结。

（十一）天津教案（1870年）

天津教案是此期教案中最大者：共死法国领事一人，随员三人，法国教士、修女十二人（内有二人系比利时籍，一人为意大利籍，一人为爱尔兰籍），法国居民二人，误杀俄国居民三人；焚毁法领事馆一所，法国天主教堂两处，毁损英、美教堂四处。群众的口号是："杀洋鬼子，先杀法国鬼子。"当时之所以要"先杀法国鬼子"，是因为在1858和1860年，英法联军在两次攻占天津中，人民惨遭屠杀，而且1860年以后联军又继续占领天津三年之久，犯下了累累罪行。而法国军队尤其残暴，连其他外国人都认为他们"恶名远扬"。

1860年，法国竟然把原来暂作联军议约总部的望海楼，侵占为领事馆。1862年又在天津东部修仁慈堂一所。1869年又在领事馆旁强占土地建造规模很大的圣母胜后堂（Cathedral Notre des Victo Res）一所，当时俗称河楼教堂。法国在天津的侵略势力，正是在法国军队、领事、传教士与恶棍教民的勾结下，日渐扩展起来。

教堂建立后，传教士以慈善为名，大批收容幼孩，甚至收买幼孩①。一些以"吃教"为生的无赖教民，四处拐骗幼孩，这就直接威胁到天津人民子女的安全。据《蓝皮书》中记载，1870年接连破获的几件迷拐案，都与教堂有关。一次在恶教民张栓、郭拐身上搜出"鹰洋"，供认是仁慈贞女付给他们的幼孩身价。另一女教

① 《英国兰皮书》，中国部份，1871年第1号，第19页。

徒武兰珍被捉后供认，系受河楼教堂教民王三的主使，替他拐骗幼孩，并说在王三的指挥下，共有八人都干这种勾当①。英国驻天津领事在这些罪行泄露后，报告英公使时说道："法国修女收买幼孩，简直是笨透了。"②

教堂不仅收容幼孩，也收容成年人。据曾国藩说，平时"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就是在焚堂当天仍查出剩下的活人约有男女150余人，幼童80余人。这些成年人、幼孩，"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这些"不见其出"的成年人、幼孩，都是在教士的虐待下丧命的。教堂夜间将死者"两尸、三尸共一棺"草草掩埋。而尸体又均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与正常死亡完全不同。由此暴露出教堂虐杀幼童、草菅人命的罪证。法国军队的兽行、法国外交官的横暴及法国传教士虐杀百姓，本已使天津人民不能忍受。现在，又揭发了这种罪行，自然引起天津人民更大的愤慨。

天津人民于5月中旬要求地方官逮捕拐案主犯、教民王三。地方官不敢干，只向法领事馆要求"引渡"。犯人交来后，又立即被教堂索回。6月19日，天津道带着受害家属的呈文，找法领事丰大业（Foxtanier）控诉，丰矢口否认。当日天津县又要求搜查教堂，丰大业大肆咆哮，态度横蛮，并称除通商大臣崇厚外，不跟任何人打交道。次日，崇厚与丰大业约定，21日晨押带拐犯武兰珍到教堂查看对质。侵略者蛮横的嘴脸，使天津人民愤慨到极点，大街小巷贴满了揭贴，控诉侵略者的罪行，要求惩办罪犯。而外国侵略者此时却从北京调集武装，将军舰派到渤海游弋，给清廷施加压力。

1870年6月21日（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早晨，天津道台、知府、县令三人在人民支持下，如约去教堂。然而教堂早已

①② 《英国蓝皮书》，中国部分，1871年第1号，第19页。

预先隐匿罪证，连王三也匿藏不见，以致查看对质，均无结果。而教堂中人又居然对聚集在教堂四周的群众逞凶，于是发生冲突，抛砖殴打。丰大业要崇厚派兵弹压，崇厚只派了几名巡捕官。丰大业大怒，对来人加以殴打并赶出门外。自己携带两支洋枪，他的秘书手执利剑，飞奔去找崇厚。途中遇到逃回的一名巡捕官，丰大业乃一手抓住他的辫子，一手挥舞着手枪，口中乱骂着，将巡捕官押向通商署。于是群众中纷传领事打死了巡捕官。

丰大业到达通商署后，拔剑击桌，大发雷霆。并向崇厚咆哮道："听说乱民想要我的命，你先给我死！"同时取枪射击崇厚，子弹擦肩而过。复剑劈差役，捣毁什物。四围的群众愈聚愈多，他们一路目睹丰大业的野蛮行为，此时更纷纷传说洋领事打死了"崇大人"。丰大业这时要回领事馆，崇厚劝他不要去。丰大业厉声说："我不怕中国百姓！"扬长而去。途中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又举枪射击，结果打死随行一人，其秘书则向群众射击。罪行累累的外国侵略者，居然在中国人民面前逞凶，枪杀官员，枪杀人民。积忿已久的群众至此忍无可忍，遂一拥而将丰大业及其秘书击毙。一面又鸣锣传众，将领事馆和河楼教堂的洋人杀光，焚毁房屋，并渡过浮桥到天津东郊救出仁慈堂幼孩，杀死修女，焚毁教堂。直到傍晚，散归途中，又拆毁英美教堂四所。这就是天津教案发生经过，是"由丰领事仓猝激变"，是"法人之天主教……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所引起。①

教案发生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乘机捞取利益。驻北京的美、英、法、俄、普、比、日七国公使立即联衔照会清政府，威胁说："事体重大，宜设法防其再发，否则将使中国沦于与世界

① 《天津民教滋事许后录》，曾国藩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奏片"（手抄本），藏天津人民图书馆。

为敌之境地”①。这时各国政府也纷纷训令其公使支持法国在华行动。英国政府接受了法国的请求，命令公使威妥玛(Thomas F·wacle)帮同法使罗淑亚办理津案。各国公使恫吓说，“罗淑亚和法国水师提督性情躁急，难保不遽尔失和”，如果中国不委曲求全，则各国也就“爱莫能助”了。一面又各自提出种种趁火打劫的要求。上海英领事馆透露出消息说，准备趁此要求增添通商口岸，并准洋人朝见满清皇帝等。各国在天津、上海、香港的报纸，也拼命鼓吹要用武力“惩戒中国官民”②。各国军舰也纷纷驶向天津沿海，准备军事行动。

威妥玛同法使罗淑亚于7月19日一同赴津，提出种种苛刻条件，如要包括提督陈国瑞在内的天津府、县官员三人抵命；赔恤银二三百万两；赔修教堂；允其驻军天津和大沽口，军费则由中国负担等等。同时调遣两国水师提督率领海军到大沽口外，进行战争威胁③。

昏愦虚骄的清政府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下，与之议结。首先处死无辜百姓二十人，判处包括府、县官员在内的军徒二十五人。遇难者皆是挺身出来保卫天津安全的无辜百姓，他们惨刑受苦，慷慨就义④。行刑之日（十月十九日），死难者慷慨激昂。而天津人民对他们的英勇献身深表悼念⑤。

其次，原来应允的赔偿抚恤费，也议定了数目。计：法国——赔偿损失物件计银二十一万两，抚恤费二十五万两；俄国——抚

---

① 《清季教案史料》，第1卷。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函稿》，第10卷，第20页。

③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海防纪略》。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第28页。

⑤ 据天津英领事给英公使报告，见《英国蓝皮书》，中国部分，第239页。

恤费三万两；英国——赔偿及抚恤费二千五百两；美国——赔偿费共银四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九分；教民——五千两。共计：五十余万两，并决定派崇厚赴法国道歉，等等。

上述这种屈辱投降的议结，中国人民断然不会缄默，天津百姓反侵略的爱国行动，在教案交涉的过程中仍然继续着。曾国藩在奏折中称："谕旨垂询近日民情，虽然臣屡次晓谕，而其疾视洋人，尚难遽予解化……浮动之意，至今未定。"①在教案"议结"后，这种"浮动"仍在继续，将曾国藩"晓谕"、崇厚"告示"涂毁；把侵略者的罪行、人民的斗争，印成宣传画，传扬出去；更有将图画印在斗方扇面上，流传市面。天津人民对二十位为教案而殉难的烈士，始终忆念。每年在烈士的死难日，天津人民都要沿街游行，行列中扮有数目相等的无头鬼，必定要经过教案发生的浮桥旧址，要穿过天津城与望海楼跨海河上的金刚桥，而终止于烈士们就义的刑场。人们称这一天为"鬼节"。

二、第二多发期的典型教案（1875—1889年）

《烟台条约》以后，英、美基督新教差会，取得了进入内地传教的特权。它们以办慈善事业为名，积极修建福音堂，发展教徒，与当地人民的矛盾日渐激化。中法战争的爆发和中国政府的屈辱结局，南方藩篱尽失，广西、云南边境洞开，西南受到威胁。因此中国人民对法国侵略者倍加憎恨，甚至微末小事也会酿成民教冲突。大吏如张之洞、丁宝桢等对法国教士的蛮横，都非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3，第46页。

常不满，皆采取拖延结案时间的办法或置之不理。由于以上两种原因，本时段内的教案发生频率较高，共达一百余次。它表现出以下诸特点：

(1)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一样，是教案的两个肇事者；

(2)各地会党势力开始参加反洋教斗争；

(3)教案发生率高，但规模都不大；

(4)酿成教案的原因除占地建堂外，一些细小问题也成了教案发生的原因。

（一）延平教案（1875—1879年）

1874年（同治十三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建延平县（今福建南平市）强行建堂。民众于1875和1876两度拆毁教堂，驱逐传教士出境。到1879年12月，传教士又以开设书店为名在延平开办福音堂。民众前往观看时，传教士竟开枪伤人，激起民愤，遂将该“书店”捣毁。闽浙总督何璟在美国政府的威胁下，对传教士鸣枪杀人不查究，反以赔款和“惩凶”及总督革职结案①。

在延平教案期中，福建建宁、福清都发生人民捣毁教堂，驱赶教士事件，福建各地民众到处张贴禁奉教人买食物的传单。

（二）建平教案（1876年）

1876年夏，安徽建平县（今郎溪县）发生剪辫之事，被剪者甚众，且皆为非教民。河南客民阮光福的辫子亦于7月7日被剪。7月11日，阮光福之弟阮光临与另一河南客民安定三等九人在田中拔草，谈起剪辫之事，认为是建平匾村教堂所为。此话被教堂

① 《清季教案史料》，第59—61页。

问答教师杨琴锡闻之，即率二十余教民将阮、安二人非法绑架，扣押于教堂内，拒不释放。此前，教民黄之绅等，平日无恶不作，奸淫妇女，包揽诉讼，干涉地方公事，与当地居民一向不睦，已经引起地方官的忌恨，此次又擅自利用教堂特权，非法拘押平民。于是，当地群众和官吏对教堂的愤恨，再也无法控制，终于爆发了一连串规模巨大的反洋教斗争。

7月13日晨六时，约有七八百人携带枪械刀器，冲入瓯村教堂，将黄之绅、杨琴锡刀割数块，投入火中。随后又将教堂家具捣毁，焚烧教堂内学校一所，并在黄的住宅中搜出许多纸人。至此，群众对教堂剪辫之事更深信不疑，怒烧中的火焰更为炽烈，并且还蔓延到宁国、广德等地①。

（三）宁国府两次教案（1876年）

建平教案发生之前，安徽宁国府（今宁国县、广德县）考生在安庆考生捣教堂、逐教士的影响之下，也聚集了许多群众，于2月12日冲入教士住宅，打毁器物，要求宁国府衙门驱逐外国传教士。事件发生后，法教士金缄三即前往府衙，要求赔偿。宁国府官吏鉴于安庆官员因“保护不力”而遭惩处的教训，故对金缄三的要求，百般依顺，答应：赔款2,660两；“出示保护教堂”；由教士指定地点，拨地29亩，作为教堂地基。这三点议约，除“出示保护教堂”一条之外，其它如赔款则强迫居民按户摊派，居民极为不满。至于拨地一条，实际上给金缄三任意霸占民地提供了“合法”依据。宁国府人民对法国教士借口“教案”进行无理勒索的行为，更难以容忍。

1876年7月，建平教案发生，特别是当建平瓯村教堂内藏有

---

⑳《清季教案史料》，第59—60页。

纸人的消息传到宁国府后，深受第一次教案迫害的宁国府人民，决心对教堂进行报复。7月14日，百余群众将大孙村教堂焚毁。24日，又有数百平民奔往永乐教堂，纵火焚烧，并将外国教士依司铎（Femiani）之木棺撬开，将其尸骨抛出棺外。金绒三躲匿幸免，当晚即乘人不备，逃遁南京。

前面所述几起发生在皖南的教案，除具有上述历史根源以外，还有其特殊原因，这就是：畛域观念的地方宗派斗争。安徽在太平天国时代，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最激烈的地区，遭受破坏甚重，人口死亡亦多，土地荒芜。湖北、河南失去土地的农民，大多都来皖屯荒。外籍屯荒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安徽土著农民之间，因利益冲突，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湖北籍屯荒者为自身利益，往往成族成村“投教”，借外力为屏障，而河南农民则反教，他们的反教，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对湖北客民利用教会的势力排挤河南客民。在皖南，这种带有地方色彩的宗派斗争，由于牵涉教民，而演成对教会的仇恨。这种仇恨，通过当时的剪辫谣传，遂爆发成规模巨大的反教事件。

1876年长江流域一带盛传剪辫之事，说被剪者生命有旦夕之忧。“剪辫”可能是白莲教的一种活动，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剪辫传说又与外国教堂发生了关系。因为当剪辫犯被捕受审时，皆隐讳与白莲教的关系，而供称受教堂指使，认为事涉教堂，地方官就会有所顾忌，不敢深究。但是，也有许多“剪辫”之人确系教民，因为大多数的外国传教士，只图广收教徒，对入教者不加考核。而教徒一旦入了教，便借洋人势力，身价顿增百倍，官府亦侧目而视。这样，许多白莲教徒，也采取了入教的方式，以掩护其反清活动。同时，在天主教会之中，亦常使用剪制纸人，象征天使或圣母、耶稣，作为崇拜之用。由于教堂剪制纸人之事与剪辫之谣偶然巧合，加上剪辫者供称受教堂指使，于是群众便深信剪辫之事出自教堂。这样，教堂乃由群众憎恨的对

象，转为群众惧怕的“异端”团体。最后又由惧怕转为愤怒。皖南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就是如此。

建平、宁国府、宁国州、广德等地教案发生后，法国同时从三个方面分别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教士金缄三向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要求迅速查办；法国驻上海领事向上海道台提出“抗议”；驻北京法国代理公使赴总理衙门要求惩凶、赔偿。

不久，法国新任驻华公使蒙莫杭（M. Breuier Moutmorand）由法抵上海，立即前往南京，向两江总督沈葆桢提出同样要求。在交涉中，法教士金缄三态度蛮横，故意将教案事态渲染扩大，以图趁机渔利。他提出三项要求：(1)将宣传反教最激烈的宁国府防务统领方某调回南京，其部属何清父子必须严惩；(2)追查杀死黄之绅、杨琴锡的凶手；(3)赔偿全部损失。当时，沈葆桢认为，皖南教案主要系客民与土民之争，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与教会无关，至于被杀的黄之绅、杨琴锡，因平日作恶多端，而被群众愤杀，罪有应得。且黄之绅、杨琴锡虽系教士，但仍为中国民人，其案件也应由中国官府按照中国法律处理，外人不得干涉。因而表示在对案件仔细研究调查之前，不能给金缄三以答复①。

经过调查和审讯，沈葆桢认为此次客民与土民之冲突所以酿成巨案，主要应由教民负责，如被杀的黄、杨二人，平日依仗洋人势力鱼肉乡里，霸占民妇，作恶已非一日，事发之前，又擅自拘押阮光临、安定三二人，以致众愤所指，不杀不足以快人心。至于纸人剪辫牵涉教会一事，纯系民间讹传，与教堂无关，表示愿出告示解释，为教堂昭雪。最后，沈葆桢一方面对教案作出下列结论：(1)方统领及其下属何清父子，并非打毁教堂的祸首，其宣传“禁教圣谕”及刊印天、地、君、亲、师牌位，系遵

① 《沈文肃公政书》，第6卷，第83－87页。

行政府命令，亦是民间常行之事，并非与天主教故意为难；(2)监生胡秀山、客民陈士柯、李士华为滋事魁首；(3)白会清以白莲教邪道惑众，实开肇事之衅端，系剪辫党类；(4)阮光临、安定三被黄之绅等非法捉入教堂，以致身死灭迹，教堂应负责任；(5)黄之绅、杨琴锡行为不端，玩弄妇女入堂被杀，罪有应得。另一方面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皖南教民一向“恃横”，“不予严惩，无以安善良”，并表示“万一西邻责言，臣愿一身当之”①。

沈葆桢提出他的五条结论后，法教士金缄三大为不满，认为黄之绅的“罪状”系出之证人口供，而口供乃是刑讯结果，不足为凭，又认为皖南教案之真正“凶犯”方统领及何渚父子未见加罪，坚持要求对他们严惩。与此同时，另一个法国教士夫梭（Foucault）对沈的审讯结论也表示反对，他要求“雪黄之绅之冤，惩何渚之横”。

应该指出，在这次教案交涉中，法国教士没有能够象过去历次教案交涉中那样，获得法国官方的充分支持，这是因为当时正值法国与普鲁士进行战争，法国大败，实力消耗，不愿远东多事，因而对皖南教案的态度，不及教士热心。同时，清廷方面，沈葆桢又表示可以惩罚、赔偿，所以法教士仍不得不同意在沈葆桢的五项审讯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结果，双方议结如下：(1)指定胡秀山、陈士柯为教案祸首，按“土匪”例正法。李士华拘获后另结；(2)白会清照“妖匪”例正法；(3)教民陈么哥（害死阮、安的帮凶）、王立周、何大田均杖一百，流三千里；(4)所有被打毁各处，除系教堂强占民居者，勒令还清原主外，其余确定教士所契买起造者，按照损坏轻重，酌量赔偿；(5)赔偿教会损失银33356两②。

---

①《清季外交史料》，第9卷。

②《清季外交史料》，第9卷。

（四）邻水、江北、涪州教案（1876年）

第一次重庆教案议结后，法国天主教得以在川东所属府厅州县建堂传教。邻水、江北厅、涪州等地都有不法教民欺凌百姓之事，民教纠纷屡屡出现。

光绪三年（1876年）初，邻水教民王同兴纠结教党，黑夜抢劫、杀害人命，官府不敢过问，造成“阖邑惊惶，互相联络，倡言逐教”。广大下层贫苦百姓积极参加，有力地推动了逐教活动的开展，大批为非作歹的教民被驱逐出境，捣毁县城内外五处教堂，教民房屋被焚毁不下百余家。川督丁宝桢奏折称：“维时各处棍徒乘机混入……人多势众，究竟是民是匪，当时未能区别。”①邻水反洋教斗争很快漫延到江北厅、涪州等地。

江北厅与邻水距离甚近。天主教在江北厅势力雄厚，并直接受川东主教范若瑟指使，大肆发展教会势力。在教会指使下，唐昌久、黄节耀等不法教民气焰嚣张，干了不少坏事，严重侵犯了当地士绅、团首、百姓的利益和身家安全。1875年，团首陈子香、聂钦斋等遂发起灭教倡议。邻水打教事起后，他们受到鼓舞，并于旧历三月十三日集合四十八乡乡民数千人，“排队入城，各持旗戈枪炮，吼称灭教，毁塌教堂……焚烧医馆十余处”②，有三百余户教民遭到打击。陈子香等还踞城垣，设稽卡，立刑罚，操生死，传号令，提出“斩决唐昌久，炮烙黄节耀、冉武氏”的口号，给予教会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

同年旧历五、六两月，涪州百姓在张在初等人的率领下，“效江北打教之风”，聚众焚毁各乡场教堂及教民房屋一百余

---

①《丁文诚公奏稿》，第14卷，第3页。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卷，第23页。

家。旧历十月，数千乡民，“头裹红布巾，扬旗鸣炮，拥至州城，先后将州城内外教堂一并焚毁，州属教民概行驱逐出境”①。

三地教案发生后，范若瑟接教民诉状，云江北厅“葆丞袖手旁观……向葆呼冤呈状，竟置命案不验，抄毁不勘。迫控道府，置若罔闻，奔控军督，掷状不收相…”②。范即通过驻京法使，向总署施加压力，谕旨饬四川大吏赶快议结。教士借此提出苛刻条件，甚至故意拖延。川督丁宝桢1878年奏折称：

> “四川江北教案，延数年。民教结怨成仇，枝节丛生，几乎不可收拾。臣去年到川，即委员会同川东道、重庆府持平速办；并经面饬该主教范若瑟迅速会议办理。乃范若瑟游移矫强，迟之数月，迄未办结。嗣经总理衙门灼知其弊，照会法公使将范若瑟撤回，本年二月内始行离川。接办教事者为白德哩，其人似较范若瑟平妥，奈其随从之辈，半皆狡猾嗜利，从旁怂恿，多方阻扰。臣于该主教接办时，即屡饬委员会商妥议，而悠忽变幻，仍然要挟多端，白德哩又多不与委员晤面，延之两日，仍无了局。此次阅伍到重庆接见委员，据禀该主教于此案意图拖延，藉索重资……约计银二万九千两。”③

邻水、涪州教案议结，亦受教士阻挠，拖延甚久，最后清政府仍以教士的意图作为议结的条件，仅赔款一项即达白银62000两（邻水23000两，北厅29000两，涪州10000两）④。

邻水、江北厅、涪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显示了川东人民反帝爱国的斗志，摧毁了天主教在此经营多年的侵略阵地，狠狠地

---

①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卷，第10页。

②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卷，第23页。

③《丁文诚公奏稿》，第15卷，“议结江北教案片”。光绪四年七月初八。

④ 《进步日报》，1951年4月17日。

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从而带来了这一地区十年民教“相安无事”的局面。

（五）济　南　教　案（1881年）

1881年（光绪七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济南勾结奸徒骗取民房改为教堂，泺源书院师生发出揭贴，要求收回房屋。传教士向美国公使报告，故意夸大事实，声称教堂已被拆坏，要求赔偿。济南道署提出用山东大街房屋六十四间抵换，传教士仍不允。美国使馆派参赞到济南向地方官要挟，以退还原房价和赔款结案①。

（六）呼　兰　教　案（1882年）

1882年（光绪八年）6月，法国传教士贡罗斯在黑龙江呼兰县强买民地建堂。业主向地方官告状，经判决该地产应归还给原主赎回。传教士恃强不允，会谈时竟开枪打死都统署官员一人，并捏造“旗兵滋事”，告到法国公使馆。法使向清政府提出交涉，以赔银三千两结案②。

（七）第二次扬州教案（1886年）

1886年，扬州东乡爆发了姜三娘和钱龙伟所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姜三娘是当地的一个寡妇，平时很有胆量，经常站出来为群众说话，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钱龙伟是个做香火的人，为人

---

① 《清季教案史料》，第2卷，第196页。

② 《德宗实录》，卷80；民国《呼兰县志》，卷4。

正直而富于正义感。1886年，法国传教士在扬州东乡占田修教堂。姜、钱就在扬州东乡一带进行宣传，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没有几天，扬州东乡七十二庄的农民都发动起来，在一个夜晚，农民们用锄头铁耙捣毁了教堂。

法国侵略者在群众的斗争面前，不敢吭声，他们偷偷地逃到扬州，向江都县告状。江都州官吏闻讯下来查问，群众置之不理，只得上报两江总督曾国藩。姜、钱听到要下来搜捕，就分头连夜串连七十二庄老百姓，抗锄头、铁耙，拿火叉、镰刀，聚集起来，准备对抗。曾国藩到了扬州，见到这种情形，随即溜回南京去了。

法国侵略者见扬州东乡人民一不怕“洋人”，二不怕官吏，无可奈何，只好离开这里。从此，外国传教士再也不敢轻易到扬州东乡露面了①。

（八）第二次重庆教案（1886年）

1886年，旧历六月初一，重庆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这次教案的起因是由于美国、英国、基督新教的教士们私自在重庆“鹅项颈修建洋房，占据险要，人心惊恐，继因教首罗元义（教士），雇人逞凶，杀伤多人，遂至群起寻仇”②。当时重庆人民聚众三千，焚毁教民房屋250家，英、美教士洋楼3处，法国教堂多处。愤怒的民众到处散发揭贴。附近州县，闻风响应，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洋教斗争的洪流。

李鸿章的奏折中对这次教案的简况陈奏如下：

“渝城民教滋事，因美教会在鹅项颈修造，士民恐伤地脉，联名禀县，未断结；众愤不平，于五月三十先

---

① 《益闻录》，第8册。

② 《巴县档案》。

打亮风垭、丛树牌两处英国教堂。城内法国教堂及从教殷实者亦被拆毁。惟系号教主罗宝芝，招有打手，屋未拆，反被杀伤民人二十二人。游护督已委罗、唐两守查办，尚无头绪，附郭教堂均毁。六月二十四日白果树地方，法人教堂极坚险，华民教徒甚众。南川、綦江两县团勇大开一仗，各伤数百。江北厅六月初被教民放火烧毁铺屋四百余家。川东各属起团，声言打教，其势汹汹。此系差弁述地方绅民之言云。”①

对于此次教案发生的原因及其前后经过及影响，民国《巴县志》收录了当时人的记叙云：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余在成都闻重庆有打教之事，至则已平矣，盖教之入蜀，民皆不喜；而奸宄无赖之徒，争窜名于教会，恃势横暴，民益恶之。然司教者略不经意，民讼之官又不得直，由是愤懑不能平。至同治二年（1863年）遂宁诸县民群起伤教徒，至今又有江北之变。江北与重庆相对，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烧民居数户，团民即捕之；而教徒又缚纳粮厅城三人，拔其髯，争折辱之且死，乃释之。于是四乡之民不期而集毁教会、医馆，并伤残教徒。远近闻风起，遂涉江南八府城，将尽火教堂以甘心焉。镇、道及地方官百方慰谕，久之始退。”②

现将重庆教案议结奏稿中所附地方官与法国传教士签订的合同内容摘要如下：

一、此次误扰抢毁法国驻渝巴县城内蹇家桥真原堂石板街公所，江家巷公所外铺面十间，杨家十字天主堂

---

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7卷，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②民国《巴县志》，第16卷，第5页。

及外院铺房全向并银钱什物酌议赔款银十二万两，又白果树书院、书局、机器、华洋活字聚珍板、水鸭凼老书院、深坑子书院、界石公所医馆、木洞教堂医馆，并田土佃户三十余家，酌议赔款银五万二千两。

一、此次波及大足县龙水镇教堂外院二向，三驱场医馆，万古场教堂医馆等，酌议赔款银七千两。

一、此次波及铜梁县教堂医馆，酌议赔款银二千内教两。

一、此次案内各命案概由地方官照例究办。

一、此次巴县、大足、铜梁各处教堂、书院、公所、医馆抢毁，各处滋事之人，乃饬命地方官务获究办，毋得抹糊销案。

一、此次巴县城乡教民遭害被抢毁者一百四十八家，酌议抚恤银三万两。

一、此次大足县教民遭害被抢毁者九十八家，酌议抚血银八千两。

一、此次铜梁县教民遭害被毁者九家，酌议抚恤银一千两。

一、此次巴县、大足、铜梁等处之赔款并抚恤银共二十二万两，原议交现银六万两，筹商限定以丁亥年（1887）五月交银二万两，十月交银二万两，戊子年五月交银二万两，十月交银二万两。己丑年五月交银二万两，十月交银二万两，庚寅年五月交银二万两，十月交银二万两。现经委员会道府县各员言定，议出印票，概由道库出银交付，其银均系票色，以渝城市秤比兑，逐次误期不得推诿异言。

一、民教一体编联保甲，以卫身家而清地方。倘有匪类滋扰，设监保团甲，务须协力兜拿送官惩治，切勿

旁观袖手，致干查究。

一、诸事和息以后，委员道府县各员，认允禀请督宪颁发剴切示谕，遍贴各府州县镇市等处，俾得家喻户晓，以期民教永远相安。”①

（九）第一次大足教案（1886—1887年）

大足教案发生的地点在川东大足县龙水镇，该镇距大足城四十华里，人口约有六、七千。附近的西山，跨大足、铜梁、永川三县。山上有碳厂、石灰窑和造纸厂，皆用土法开采。自清代中叶起，经常有工人及苦力二、三千人，产品都运到龙水镇售卖。镇上的手工业也很发达，铁器制造业，极负盛名，产品运销云贵各省。每旬照农历三、六、九集市。六月十九日是传统的灵官会期，举行迎神赛会，张灯结彩，异常热闹。

第一次重庆教案议结，允传教士到川东所属传教建堂后，法国传教士就于1865年窜到大足，在马跑场燕子窝修建了县属第一座天主教②。1882年以后，法教士彭若瑟又在龙水镇和三驱、万古等场相继建堂多座，做了一些损人利己的坏事，与当地平民相处甚恶。1886年夏，重庆第二次打教消息传来，适是龙水镇灵官会到来之时，当年7月20日（旧历六月十九日），四乡百姓前往龙水镇参加一年一度的灵官会，并纷纷前去观看新教堂。此时，教民数十人执械守门，不让围观，发生口角，继以斗殴。有人一声喊打，顿时将一座新教堂夷为平地。余栋臣和余翠坪兄弟都是这次打教堂的积极参加者。此后不久，距龙水镇三十里三驱场教堂和五十里外的万古场教堂、医馆，亦相继被百姓捣毁，九十八

---

①《巴县档案》。

②转引自《四川近代史》，第122页。

家教民房屋受到袭击。事情发生后，教会要求赔款建堂。后来此项赔款合并到重庆教案一起处理，“大足赔银一万五千两”，并通缉主犯了案①。

1886年大足龙水镇教堂焚毁不久，教士彭若瑟用赔款鸠工重建，并占用了人文桥边的炭市，把许多运炭的苦力挤到桥下设市。引起炭伕和群众的愤恨，以煤窑、纸厂工人为首，在余栋臣弟兄的暗中联络下，准备再次铲平教堂。及1887年旧历六月十九日灵官会期又到了，而再度修建的天主堂刚竣工不久，教民及大足县派的守护教堂的练勇，手持武器，如临大敌，把守教堂大门。此时，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围教堂数十重，教民练勇持械驱赶，人群中有人一声幺喝打教堂，霎时扁担、石块齐飞，教堂顿时又被捣毁。彭若瑟又提出赔偿损失、通缉主犯的要挟。后因主犯不获，县令吴克蹇被撤职②。

（十）第一次冠县梨园屯教案（1887年）

梨园屯的民教矛盾起于拆庙建堂事件。早在咸丰年间，该村士绅曾公众捐款购买义学坡地，在义学后面建有玉皇庙，占地三十八亩。咸丰末年毁于兵燹，乡间三街首事无力兴建。同治八年（1869年），村中民教都要求分配义学公产（田地与宅地）。那时全村近三百户，加入天主教者才二十多户。分产时，村民分到了三十多亩坡地，而教民分到了三亩多宅地。教民分到宅地后即转让给外国传教士。双方多次到官府打官司，教民胜诉，从此埋下了民教仇恨的种子。

1873年（同治十二年），教民梁宗明以个人名义在宅地上拆

---

① 《近代史资料》，第1卷，第129－130页。

② 《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56年第1期。

庙建立教堂，为此引起村民公愤。民教双方先后上控到县，冠县知县韩光鼎以同治八年所立分亩地单为依据，审断可以在庙宅基地上建堂。

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初九日，该村举行玉皇神会，游人挤开教堂大门，与教民发生口角。这本来是细微小事，“既未据地方官禀报，亦未接该教士函会”①。但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顾立爵却以此为借口，怂恿法使出面干涉，逼迫总署行文山东巡抚处理庙堂问题。山东巡抚任道镕鉴于该教堂建立已有多年，未便遽令拆还，但察诸当时办理此案，亦“本未定议断给该教士永远承管”，遂向法使指出所指责各节“似与原案未符”。不过最后审断时，仍议定先将原宅基归教民“暂时借用”，待教民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后，再议归还原宅地，以完结此案②。这次审断未变同治八年的定议。

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传教士费若瑟在该庄置买砖瓦、木料欲重建教堂房屋。教民王三歪等复扩充地基，于是又引起村民公愤，遂将教堂拆掉重新建庙。这次拆堂建庙斗争是在该村士绅领导下进行的。梨园屯村长左建勋和三街会首刘长安、阎立业、王世昌等集众数百人，持械阻止建堂。为此，民教双方又呈控到县。县令何式箴公开向士绅表示他对教士、教民管不了，并令村民遵限拆还教堂。刘长安等不服，又上控到府，何式箴竟将刘长安、王世昌等功名革除，并将其监禁。旋经十八村绅耆调停，教民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于该村为庙”，而刘长安等与村众“亦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这一改变是出于双方情愿，所以何式箴说：“此案刘长安等肇衅理由，本应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唯念该民教等同居里闾，若令嫌隙滋深，难保不别酿祸患。即经绅耆调停，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

①②《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263页。

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永远相安。”①

经过此次议结，梨园屯民教相安将近两年。其时传教士卫保禄慑于当地人民反抗之激烈，对民教双方自愿和解，不得不予默认。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民教双方积怨未消。卫保禄调走后，新任教士又兴风作浪，欲摧毁当地人民对“玉皇”偶像的崇拜，企图树立起天主教在该地的权威。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法使偏听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马天恩的挑唆，致函总署，要求按照同治年间定议，在玉皇庙地址上建立教堂。次年五月，他又强词夺理地说：“光绪十三年经绅耆调处另择地基建堂之举，教堂并不知情，该县因何得伊一面之词，私行断结？”②并进一步提出要允许传教士同地方官当面商定，交出庙基，重建教堂。山东巡抚张曜就此事复总署文称：“查案情初起之时，该处教士系卫姓（指卫保禄），此息讼则已易李姓，今则案结年余，教士闻又数易，实无别项胶葛未清之件”③。这样的复文，当然不能满足侵略者的要求，教会势力在等待有利时机，这就为冠县梨园屯第二次大教案埋下了祸根。

（十一）镇江教案（1889年）

1889年旧历五月初六日，英国在镇江的印度巡捕无理殴打中国居民康麻子，因而激起众愤。镇江人民向英国领事署责问，但是英国当局置之不理。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更激怒了镇江人民，数千群众将英国领事署和教堂包围，进行示威。英国侵略者竟悍然对示威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数人。镇江人民见侵略

---

①《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465页。

②《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470页。

③《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465页。

者以武力镇压，他们就举火焚烧领事署及教堂。英国侵略者见势不佳，只得偷偷地逃到长江边上的英国轮船上去了。这次镇江被毁领事署和教堂等达十五处之多①。

由于人民的反抗，迫使英国当局不敢借此次教案提出苛刻的赔款要求，清廷府也不敢向英方提出惩办凶手，此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第三多发期的典型教案（1890—1895年）

中法战争以后，法国在西南取得了很多权益，并想与英国在长江流域争夺势力范围。因此，法国天主教对长江流域各省及川滇黔藏等边远地区加紧渗透，与这些地区人民的关系日益紧张。而英国不仅在长江流域站住了脚根，而且也开始向中国西南地区渗透，并与美国传教士同步，在上述两个地区发展教会势力，又办起很多所谓慈善事业，以推进其经济和政治上的侵略步伐。它们也与当地人民产生了许多矛盾。第三多发期中不仅有与第二多发期相同之处，而且承上启下，其特点表现为：

(1)集中在西南和长江流域、热河东部，规模比以往更大；

(2)从单纯打教堂发展为对列强在华政治、经济机构一齐进行袭击；

(3)哥老会及其它会党在反洋教斗争中是组织者；

(4)敢与清军、团练对抗，甚至诉诸武力以抗争。

在西南地区，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表现为：大足第二次教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95页。

案中，龙水镇人民在余栋臣、蒋赞臣等的领导下，三次打毁教堂并且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是为这一地区发生教案的高潮，也是全国教案第三多发期最有典型意义的教案。又如，成都教案起因甚小，但却波及十余州县，这说明反洋教斗争出现了新的动向。

至于长江流域人民在这一时期的反洋教斗争，更集中地反映了上述四个特点。此地区是构成这一时期反教斗争的三大中心地区之一。再有就是河北东部人民的反洋教反清大起义，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反洋教斗争所产生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讲，三大反洋教中心地带的反洋教活动集中反映出此间反洋教斗争的上述特点，为后来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洋教斗争作了准备。

（一）第二次大足教案（1890年）

大足龙水镇教堂在1886和1887年被人民连毁二次，侵略者却并没有接受教训。1888年又鸠工重建，并扩展屋基，厚筑围墙。及至1890年教堂修成，旧历六月十九日的会期快到了。彭若瑟通知大足县令钱葆堂，要他出令禁止举办迎神赛会，钱知县遵照办理。但到了会期，镇上仍旧拥挤异常。把总刘连升带官兵把守教堂。教民王怀之、龙正官等，到处寻仇。结果就在教堂门口发生冲突。官兵杀死平民蒋兴顺，教民王怀之等纵火焚平民居室数间，并声称要捉人。群众易常激愤，许多人拥入教堂，将教堂捣毁。以后人们渐渐散了，刘连升才虚应故事地派兵捉人。这时白鹤林地方的农民蒋道甲等，担锣鼓回家，突被官兵夺去大锣，因锣后有墨书“蒋赞臣”三字。刘连升提锣回县，捏称这是“乱民的催兵锣”。彭若瑟又逼县令交主犯，钱葆堂无可如何，只好硬说三次打毁教堂，都是蒋赞臣主使，同时捏造许多的讯言来证实他的罪状。并立即派兵前往白鹤林捉拿蒋赞臣。蒋闻讯后即携子逃赴西山余栋

臣家中暂避①。

余栋臣是西山下的农民，弟兄四人共有田二十亩。农闲就作挑煤工人，贴补家内的生活需要。他是蒋赞臣的表兄，长蒋五岁。他平时待人很好，性情直爽，一般煤窑、纸厂工人及苦力挑贩，都愿和他接近，在西山下是有些声望。他们弟兄四人都学过武术，同族的人也很多。三次打教堂，都有他参加。蒋赞臣投奔他后，他激于义愤，当即邀约西山上的工人及苦力挑贩李尚儒、李玉亭、唐翠屏，及其二弟翠坪、四弟海坪等共十二人，在余家院子歃血订盟，誓同生死。

他们订盟以后，于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890年8月8日），率领一百多个西山的煤窑、纸厂工人，攻入龙水镇。杀死教民十二人，打毁二百余家教民的房屋，没收教民财产，强迫他们退教，同时散发檄文云："夫洋人禀夫犬羊之性，假以虎狼之威。不惟凭凌小国，敢又欺侮中华……使司铎而钻衙门，颠倒是非；买保正以作心腹，别有阴谋……骇天八大罪状。"②并开始招收队伍，声势渐大。当时距龙水镇数十里的马跑场、强家坝的群众，也焚毁该地的天主教堂来响应他们。正如张华奎所说"数百里汹汹骚动"③。于是清政府急命重庆知府王增文，到大足查办。王入境后，派人与余栋臣接洽，亦无结果。后，受清军团练内外夹击，余栋臣被迫撤离龙水镇，退匿西山。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二（1892年1月7日），清政府与法国公使进行交涉，议结了教案。"计被毁三教堂，一公所，一医馆。教民被焚二百余家，被杀十二人，共给偿银五万两。废教堂，撤司

---

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光绪十七年条；《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第4卷，"余栋臣传"。

②《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第123－124页。

③《清史稿·循吏传》，第77卷，"张华奎传"。

释、焚杀各案，均归罪余栋臣等六人，檄属通辑。教堂肇衅之王怀之、朱矮子二人，言明仍由官拿办以顺舆情……”①这就是1890年大足教案的经过。

有利于教士的议结，并未能使大足人民屈服。余栋臣把队伍拉到大足、铜梁、永川三县交界的西山隐蔽起来，秘密发展队伍，并多次下山出击，转战于大足、铜梁间，给清军、团练以很大的杀伤，并惩处了一些不法教民。后来起义军遭到重大损失，余翠坪亦在十万场突围时被捕牺牲，余栋臣只身突围，远飏他乡，不得不暂时潜伏起来。余栋臣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至此结束。

（二）芜湖教案（1891年）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开芜湖为通商口岸，允许领事驻扎，又规定“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轮船暂准停泊，上下客商货物……”②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更加大规模地伸入安徽。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们也根据条约上允许外国人自由旅行或居住内地的权利，而大批进入安徽，短短一、二十年内，在安徽大小三十余城市建立了教堂，达到了传教士在安徽进行侵略活动的最高峰。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宗教侵略的发展，各地人民的反帝反教活动也日益高涨。1891年长江流域各省爆发的一系列大规模的人民反教斗争，就是日益高涨的人民反对侵略、反对压迫的集中表现。

1891年（光绪十七年），长江流域一带盛传天主教堂拐骗幼孩、挖眼制药的揭贴和传说。这种传说，不一定真实，但反映了长江

---

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四寄译署。

②《中外条约汇编》：《烟台条约》条。

两岸人民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愤恨。

1891年5月，这些传说传播到芜湖，多年来燃烧在人民心中的仇恨火苗，再也不能抑制了。5月10日，恰巧有两个天主堂中的女修士（华人）出外探视病人，因有一家患传染病，家中的两个小孩（5岁、7岁）就被他们带回教堂。但在路上，遇见两小孩的亲属，强要抱回，女修士坚持不允。双方争执之时，路人聚集，纷纷指斥天主堂迷拐幼孩、挖眼制药，并将两个女修士拘送保甲局，要求惩办。保甲局见事牵涉洋人教堂，不敢作主，上送县署处理。法教士得讯后，亲赴县署交涉，威胁知县立即将二人释放。知县萎葸怕事，遂当场将二人开释。于是群情大愤，以为知县受了洋人贿赂而将“犯人”释放。5月12日下午，又有一妇女到鹤儿山天主堂，要求领回寄养在该教堂附近育婴堂内的小孩。一时堂前群众拥集达五千人，大都执一小手旗，要求驱逐传教士。尽管知县亲自在场弹压，并拘捕一人，仍无法制止。英国驻芜湖领事见状不妙，请芜湖关道台成章派兵镇压。但在兵来之前，聚集在天主堂前的数千名群众已冲入堂内，将教堂、育婴堂及教士住宅焚毁。当晚，群众又拥向江边英领事公署。道台成章恐事态扩大，率兵保护。群众乃从领署转赴海关及海关职员住宅处，海关人员武装抵抗。同时，安徽府台沈秉成又开炮威胁，群众乃散。但因“谣诼纷纭，民情尚多惶惑，仍四处聚集不散”。

芜湖打教、打海关事件发生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一面调拨兵船，增加勇营前往芜湖镇压，一面又委派江苏候补道刘佐禹等赴芜湖英领事署道歉，并表示立即查办①。

尽管芜湖教案只与英法有关，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德、日、意、比、西、俄等七国驻华公使，也与英法联名，向清

① 《光绪政要》，第17卷。

政府提出“抗议”，以显示列强各国的联合力量。清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镇压发动反帝斗争的芜湖人民，将斗争坚决的王光金、傅有顺两人定为“匪党”，不加审讯，即行斩决，并传首于江宁、镇江、上海等地示众。又将其他被捕之人，“各按情罪轻重，分别监禁枷责”①。此外，还将芜湖知县王焕熙以“疏于防范”的罪名，撤任调省申饬。并加派清军驻防芜湖，常年巡弋，以保护外国传教士及侨民，镇压芜湖人民的反抗。

“紧急措施”实行后，刘坤一饬令江海关聂缉槼与法总领事华格臬等“妥为筹商”教案善后。而天主堂教士借口教堂被焚，需重新修建，指定要芜湖著名风景区八角亭一带，企图霸占包括八角亭在内的全部鹤儿山地区。聂缉槼竟置芜湖人民利益于不顾，表示同意。这个消息一传开，引起了芜湖各阶层人民极大的愤慨，他们喊出了“国家土地虽尺寸，不能轻易割让”②的口号，准备不惜流血，保护寸土。芜湖著名绅也联名上书，表示“该山坟冢累累，大难迁移，决不承认”③。法帝国主义惟恐引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乃不得不放弃霸占全部鹤儿山的企图。他们向芜湖人民勒索了白银十三万两，作为被焚教堂的赔偿费（被焚教堂实际只值四万两）。这样，成为1891年长江流域教案号角的芜湖教案，才告了结。

（三）丹阳教案（1891年）

1891年，在江苏丹阳也发生了一起教案。

法国传教士曾在丹阳开办育婴堂和教会学校等所谓“慈善事

---

①《光绪政要》，第17卷。

②③《芜湖县志》，第3卷。

业”。他们虐杀婴儿的暴行，激起了丹阳人民的愤怒。是年4月25日，天主堂附近居民十多人，要求进天主堂察看，但遭到拒绝。群众又从天主堂的后面进去，进去时发现地上泥土松软，脚踏下陷，并见一具木匣，扒开一看，内装有小孩尸体。再往里走，又发现七十余具尸骨。群众见此惨状，怒不可遏，大声呼喊要打天主教堂。消息一传出去，周围群众象潮水一样涌至天主堂，将其围困。丹阳城守调兵镇压，群众被迫起而抗击，打伤营兵数名。城守见众寡不敌，只好听任百姓自由行动。群众“将天主堂及附近住屋等付之一炬”，烧毁房屋二十多间①。

（四）无锡教案（1891年）

天主教传入无锡是比较早的。从1859年起，法国传教士先后在无锡的三里桥、堰桥、西漳、杨巷、新塘里、玉祁、陈八房等处设立了天主堂。三里桥天主堂最大，是为总堂，兼管江阴、常熟、宜兴等县的天主堂。

法国派到无锡主持教务的司铎彭安多，阴险毒辣，经常与部下在地方上欺压人民，鱼肉百姓，侵占田地屋产，包揽词讼，敲诈勒索，虐杀婴儿，奸淫妇女，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广大群众对他们的罪恶活动十分仇恨，骂天主堂为“天诛堂”，称彭安多叫“彭铁头”。

无锡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因传闻法国天主教堂虐杀婴儿而引起的。自天主教堂设立育婴堂以后，教堂附近一带居民经常走失小孩，而且只见小孩进堂，不见小孩出来。于是三里桥一带群众便流传天主堂拐骗小孩。人们的这种怀疑越来越煞有介事地流传散布，加上扬州、丹阳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无锡人民也行动起来

①王仁堪：《王苏州遗书》，第6卷，“丹阳教案始末”。

了。1891年旧历五月初二，数百人至三里桥天主教堂，要求进去看个究竟。金匮县①知县汤曜为了向帝国主义献媚，赶忙调集军队，守卫天主堂，不准群众进入堂内。大批群众冲破了清军的阻挠进入教堂，在木板上发现有小孩尸体一具，又在天主堂前面空园内发现丛葬婴儿尸体的坟墩，掘开一看，上、中、下三层共埋了二百余具尸体。这对愤怒的群众，真是火上加油，于是举火焚烧教堂，教堂三十多间房子很快化为灰烬。

三里桥群众烧毁天主堂事发生以后，无锡其它地区人民也纷纷响应。五月初三日，群众又烧毁了龙山稍的天主教墓亭。接着，堰桥、西漳、杨巷等地的教堂也被烧毁。反洋教斗争波及全县②。

这次教案的结局，民众被叛徒刑21人，丹阳、无锡等六县的知县皆受议处，六县共赔银116300两。

（五）武穴教案（1891年）

1891年(光绪十七年)6月，在湖北广济县武穴镇发生教案，系因外国传教士虐死幼童而引起。民众千余人焚毁武穴教堂并击毙一英国传教士。英国联合法、德两国向清政府进行威胁，湖广总督张之洞处分地方官1人，判处民众2人死刑，7人徒刑，赔款65000两③。

---

①当时无锡分为无锡、金匮两县。

②《益闻录》第13册；无锡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无锡人民反洋教的斗争》；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第3卷。

③《德宗实录》，卷294，第299页。

（六）宜昌教案（1891年）

1891年9月，湖北宜昌教案因法国天主教圣母堂拐买儿童而引起。丢失孩童的家长到教堂寻找，居民群集堂外要求检查。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竟向民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民愤。数千民众焚毁教堂，打伤传教士。事件发生后，英、法、美等九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威胁，各国军舰开至汉口、宜昌进行武力恫吓。湖广总督张之洞讨好洋人，判处民众12人徒刑，赔款175,771两①。

长江流域反洋教斗争酝酿于六十年代扬州、安庆、建德等地的教案，到1891年5—9月，斗争的规模遍及长江流域的各个通商口岸及中小城镇。组织并参加这次斗争的是勃起于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斗争的目标，除了攻打教会及其传教士外，代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领事馆、海关也是这次反教斗争的主攻对象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芜湖教案中，人民还贴出要攻打外国洋行的揭贴。它继1869年镇江教案、人民群众进攻领事署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攻打这些帝国主义在华机构，这说明了中国人民已经初步具有反帝斗争的朦胧意识。

这次反洋教斗争的烽火首先从安徽芜湖燃起来，迅速地蔓延到皖苏浙赣湘鄂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是有外国教堂的地方，群众皆愤然而起，“竟有一县焚毁数处者”③。这不但震惊了清政

---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第404页；另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28卷，第38页。

②参见《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1891》，第24页。

③《张文襄公全集》，第13卷，第21页。

府，连帝国主义驻华公使们也慌了手脚。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连续地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重庆、镇江、扬州、汉口及芜湖都受到它的祸害。""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①闹事各处，"骚动、残杀教士，已混为一体"②。各帝国主义国家面对这场风起云涌的反洋教斗争，公开实行武装镇压，他们把"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③。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

这场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的组织者是哥老会。这些哥老会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七十年代的湘军和淮军裁撤下来的兵勇，也有很多是运输工人、私贩盐枭等。很多散兵游勇充当了哥老会的头目，他们大多久历戎行，桀骜成性，勇敢善斗，富有江湖经验。从他们的反抗活动看，这次反洋教斗争已经开始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清朝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了。扬州教案时，哥老会揭露说："官府受贿，保护洋人。"④汉口教案时，哥老会发布的《武昌匿名揭贴》中斥责"张之洞坐湖北，糊涂乱干，为什么把洋人当祖先。"⑤各地哥老会准备联合武装起事，推翻清朝统治，这是很明显的。当然，在当时，把反帝反封建两种斗争结合起来，并不是自觉的，而且有的斗争还夹杂了复杂的因素，如报私仇、泄私忿等。但是，这次反洋教斗争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

①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00页、602页。

②Mason：《The Chinese Confession of Charles We sh Mason》，伦敦1924年版，第33页。

③《美国外交档案》，1891年，第440页。

④《益闻录》，1063号，第13册，第200页。

⑤[日]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排外运动》，资料篇上，第141页。

（七）热河东部教案（1891年）

1891年热河东部人民因教案而武装大起义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造成的。

早在鸦片战争前，法国天主教教会就潜往热河传教，到甲午战争前夕，天主教把内蒙古分为东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热河及朝阳属于“东蒙古”范围。到1890年，热河有外国教士30余名，教会、教堂150余处，学校、育婴堂近百处，教徒已逾万。

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外国教士、教民在这一地区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正如热河都统奎斌的奏折里所说，他们“所行所为率多横恣”，因而“人心积怨”①。外国传教士和一些非法教民还与地方官吏、蒙古王公勾结残害人民，如建昌县（今辽宁建昌、凌源县）三十家地方教堂从天津密运毛瑟快枪卖给喇嘛庙和蒙古王公，准备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群众侦悉后，“夜间聚众十余人，越墙而入天主堂抢快枪，……去者均被打死”。教堂还借此为由，“任意指控某为金丹道匪，致被官府捉去多人”②。教堂还拐骗、杀害儿童。平泉州知州文卜年在起义群众将该州某教堂烧毁后，曾率兵弁前往“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无珠无心”，“并有童男女十六人亦各昏迷未醒”③。教会、教士的罪行，激起人民群众与“天主

---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542—6，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九日“奎斌奏折”。

②《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清末金丹道起义初探》。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542—3，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谕批德福片。”

教为仇”。

热河人民在饱受外国教堂百般蹂躏和欺凌的同时，也遭受着蒙古王公及清廷官吏的残酷压榨和勒索。这是逼迫当地人民走上起义反抗道路的第二个原因。清政府为了笼络蒙古王公贵族，便把热河及朝阳一带土地山林作为采邑，“分封给蒙古王公、贝子、贝勒”，而他们则乘机“勒租汉民租价，侵夺人家生产”①。致使周围的汉人百姓“无人不怨”②。尤为苛刻和残忍的是，蒙古王公还占山为王，不许百姓进山樵采或打柴草，如有犯者，便施以“十无一生”的酷刑，即“以碗口粗小树砍去枝梢，削其顶为尖，将犯山人衣服尽脱，并将小树弯俯在地，以树尖插入肛门，陡一松手，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其草菅人命，惨无人道，大率类此”③。

和蒙古王公一样凶残的，还有派往族地的清廷墨吏。他们对当地贫苦百姓肆意勒索、欺压。据史料记载：“各任热河都统，多以卖官为生活，于是各县官贪婪尤甚。”④例如承德府知府启绍“贪婪夙著，横索所属州县，赃款盈千累万”⑤。1891年，“又值热河春旱夏涝”，“德福（热河都统）讳匿不报”⑥，却照旧搜刮如故。

因此，“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贪官”，成了热河东部人民大起义总的战斗口号。

---

①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9页。

②《朝阳县志》，1390年版。

③《朝阳县志》，1390年版。

④《德宗实录》，卷303，第6页。

⑤王锡祺辑：《辟邪录》，第2卷，第26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六日“恩溥片。”

热河东部人民大起义，首先是由金丹道发难的。金丹道起义军攻占敖汉贝子府，拉开了大起义的序幕。经过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初，敖汉贝子府准备血洗杨弯子。这时，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杨悦春感到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趁蒙兵还未到来之前，暗中调集二千人到杨家弯子，把人分成五队，举行起义。

十月九日，起义军首先拿下了贝子府，在那里建立了开国府，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杨悦春被推为开国府总大教师，下设丞相，及各种官职，发布了安民布告。之后，起义军由开国府分兵四路，划占土地。

热河东部各地人民闻讯纷起响应。在理教首领郭万昌率众数千首先响应，接着各地数十股队伍相继起义，“旬月之间，由数千聚至数万”①。各路义军陆续攻到土默特旗、奈曼旗、翁牛特旗、那林沟巴林旗、扎萨克旗等地。其中，一路军直逼朝阳，攻入县城；另一路军在平泉州的榆树林子伏击，使前来“围剿”的州判于甫筠的部队“全军尽没”②；从开国府出发进行北伐的一路军，连克五旗之后，扑向赤峰。

在建昌及其附近一带，以该地金丹道教教首傅连信、佟杰等率领下，教众也于十月中旬在建昌松岭子镇举行了起义，树起了“平清王傅”的五色大旗。他们首先捣毁了附近的天主教堂，并在在理教首领林玉山率领的起义军配合下，攻入了平泉州州城，焚毁了外国教堂数处，计房屋68间。之后，他们直取建昌城。

这次大起义攻占了热河东部的和（泉）、建（昌）、赤（峰）、朝（阳）四州县，完全摧毁了清王朝在这个地区的统

---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392—3，光绪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朱批李鸿章奏。”

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3063页。

治，直接威胁着热河省城及清王朝的发祥地之一的奉天。于是，清廷十万火急地调动两路人马围剿起义部队：一路由统领左宝贵率奉省官军，从东向西围攻；另一路由李鸿章督办，命提督叶志超统大批精兵由南向北进剿。同时，教会、传教士也参与了镇压起义军的活动。

到十月底，清廷与教会勾结，在朝阳东部捕杀了在理教首领郭万昌，镇压了东、南两路义军。十一月底，叶志超率直隶清兵在喀拉沁王旗打败了西、北两路义军。义军重要首领李国珍在转移途中受伤被俘，最后被“押赴通衢，凌迟枭示”①，英勇牺牲。各路义军相继失败，余部纷纷向开国府集中，准备在那里与清军最后决战。此时，芦台练军记名提督聂士成督饬马步队“合力仰攻”。义军遭到失败，开国府很快陷落，义军的主要首领王正、王幅等奋战阵亡，千余名战士拒绝投降，全部战死。攻占开国府后，聂士成又率军攻占义军的另一个根据地——距开国府四十四里的下长皋。两千余名义军战死。

起义军大本营开国府陷落后，杨悦春等人于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被俘遇害。历时两个月的热河东部人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的余部仍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统治者还在忧虑：“热河削平股匪后，伏莽仍未净尽，深虞乘间窃发。”②

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的统治，在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对后来热河人民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

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3063页。

②樊国梁：《燕京开教略》，第78页。

（八）古田教案（1895年）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福建古田斋教首领刘兴祥发动民众抗税并准备起义。被英、美传教士密访侦知后，便报告驻福州领事，领事又向闽浙总督边宝泉密报。于是总督派兵赴古田进行镇压。为了教训充当间谍的传教士，刘兴祥率众于8月1日焚毁教堂等。英国派军舰前来威吓，领事向清政府进行要挟。结果民众26人被处死，200余人被捕①。

（九）成都教案（1895年）

从教案的范围及其经过看，成都教案在这一时期的教案中并不典型，但是，从教案的议结看，却是极为典型，发人深省。以往各地发生教案后，都是教案肇事国一方和清廷地方政府或总理衙门进行交涉议结。而这一次，市民毁掉的只是法国天主教堂，但英、法、美三国却共同出兵，调动军舰多艘相威胁。这反映了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尽管角逐争斗，但它们的利益却具有一致性。这足以证明，传教与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不独关涉某一国。另一个问题是，以往各地最严重的教案是在教士毙命后，除了赔偿一定数量的白银，就是"凶手"抵命，再就是当地知县被贬官。而这次并没有教士毙命，但在处理上却相当严厉，除一下子杀死六名有身份的人外，上至总督，下到知县二十余人被参革丢官，交刑部审理，十六人充军。这说明在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已经深化了一步，腐朽的清政府已经向"洋人朝廷"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

① 《教案奏议汇编》；《德宗实录》，卷371，第6页。

完全仰外国人的鼻息行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谈一谈各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四川的逐角情况。

早在明末清初时，天主教开始传入四川。经营百余年后，到嘉庆年间，已形成一定势力，尽管嘉庆皇帝先后于1805年、1811年曾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禁教，天主教在川势力也未完全翦除。《黄埔条约》后，天主教势力在川省复炽。逮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北京条约》，天主教势力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四川主教区下建立了川东、川南、川西、川边藏区四个教区，他们主要代表法国的教会势力。后来，英、美等国新教势力也接踵入川，与法国角逐。1864年，英国牧师石琢之入川强占巴县九块桥地方，建立福音堂。翌年，法国与英、俄两国在西藏角逐失败，被迫放弃原属法国天主教四川主教区的西藏教区，允许英、美、俄等国插足其间。法国天主教教会方面承认，放弃这个地区的真正原因是怕英国不满，并且俄国也不乐意看见法国人插足西藏①。1877年，美国的美以美会组织华西大会，以巴县为传教地点。翌年，内地会也开辟成都为宣教地，以嘉陵江为界，划川东、川西二教区，1886又辟巴州、阆中为宣教地。1888年，英国伦敦会在巴县建立传教据点。到1891年重庆开埠时，四川已有法、英、美、德等七个国家的教会，十三个慈善机构，外国传教士一百七十五人。随着帝国主义对四川侵略的全面展开，教堂林立于全省的每一个角落，“自省会以迄县治，教堂几遍”②。

从外国教会立足四川那天起，四川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开始了。造成人民反洋教的原因，绝非是单纯的文化心理和信仰习俗的迥异，而更多的是传教士们劣迹恶行所致。例如，1863年四川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重庆教案就是由于法国天主教强

---

①《巴县档案》，“天主教川南教区创立纪录”。

①梧生：《排教与仇教》，载《四川》杂志第1号。

占长安寺地方而引起的。法国天主教会虽然让出了长安寺，但在外国人威胁下，川东道竟出示晓谕各地“应由该教另行卜地建修教堂，嗣后各属境内教民如有典买田宅修理经堂医馆等项，该处士民均宜玉成其事”①。这就为天主教及后来的基督新教疯狂地在四川强行占地购屋开了绿灯。传教士肆无忌惮地抢夺，使人民积愤日久，总会出现导火线的。

1895年的五月五日端午，成都人民按传统的风俗习惯，在东教场撒李子。忽然有人传言附近的四圣祠教堂有洋人杀小孩，于是群众蜂拥至四圣祠，将教堂捣毁。之后，又分赴平安桥及北门外将法国教堂捣毁。参加者主要是城市贫民。群众当晚即散，成都各国传教士纷纷逃往新都躲起来。新都群众也准备响应成都民众打教堂，知县某以兵保护，教堂才未被打。这就是成都教案的经过。

成都教案发生后，教会与地方政府议定赔偿和惩办凶手。但，这远远没有达到侵略者的目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

> “单是要求赔款和杀戮一些下流社会的匪棍，对整个中国人民来说，还不够发生恐吓的效果。”②

英、美帝国主义除逼迫清政府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外，硬要清政府对那些不用大力镇压人民的官吏进行处分。英国政府竟说：“中国如不即予刘督相当之罪，明即发派兵船到华海口报复。”③于是，英、法、美各国派出八艘军舰游弋长江，向清政府进行恫吓、威胁，各国驻华公使又联衔提出“抗议”。清政府按着侵略者和传教士的旨意，将四川总督刘秉璋，候补道周振琼，成都知府唐承烈，华

---

①民国《巴县志》，卷19，“交涉”。

②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16页。

③《清季外交史料》，卷175。

阳、乐山、灌县、大邑、冕宁、新津等县知县全部革职，朱瑞亭等六人被杀害，另外有十七人充军。

《清季外交史料》中记载了这一情况：

“昨电旨刘督已重处，英使当帖服，美员亦可不来否？电奏附参各员，想已即行议处，特此案仅议处恐未必即允结，究如何议结，似宜从速以免另生枝节。”①

“钧署已允美派人会英领事赴川查案，美教士产业川省独多，不论所损多寡，非确查妥办，难弭后患。法已查毕，英派人在即，美在华利益一体均沾。总统欲以英法所查为据，兼体中国不愿英美会查之意。前称不附英，谓英借端要挟，美不预闻，至保护教民，美英无异。”②

“教案屡电催川东不覆。今来电忽称英领事云：‘不办又不议，教案非电请总署与英使商定日期，发电领事，不能议’等语。当覆电严饬，先以毁堂匪犯业已分别正法拟办，不得再藉词推延。该道黎庶昌屡次推诿请总署与英使商定转饬遵办，不知是何意见。查此次‘匪犯’系劫杀多案而并抢毁教堂者，设法拿办，藉以消案，合并声明。”③

“新报四川教案，中国不肯议刘秉璋罪，英派多轮上长江等语，探外部于此事极重视。”④

“旨川省屡出教案，刘秉璋督率无方，厥咎甚重。刘秉璋着即革职，永不叙用。又电，本月已将刘秉璋革职，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17，“川督鹿传霖电”七月十九日。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17，“驻美使电”七月二十二日。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17，“川督致总署电”七月二十五日。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117，“驻英使电”八月初八。

并将办理不善之道府查明惩办。着该大臣告知外部。”①

“旨鹿传霖电悉。法国教堂赔款现与定约，亦只可如此了结，惟现在库储支绌，此款须由川省筹划。所称分年措交，语未明晰，究竟作何处分交之处，详覆。英美教堂及省外法教堂仍应迅速议结为要。”②

“惟该道（黎庶昌）有病，精神恍惚。此次日本商务关系甚重，恐致贻误，拟请旨将该道送部引见，仍委张华奎接署，以期妥慎，不知于英使请暂留黎道有碍否？”③

清政府与各国领事在重庆定结成都教案。民众处分十七人，死刑六人，知县等官处分十一人④。其中，邛州知州革职，叙府知府、宜宾知县、双流知县等撤任，崇庆州知州、崇宁、南部、大足知县开缺⑤。

四、甲午战前三十年教案的趋势及其特点

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章程、合同，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的一个罪证。当时外国侵略势力涌入中华大地，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无论是中心地带，还是遥远边陲，到处都有侵略者的足迹，到处都有传教士“酿造”的事端。可以说，传教士渗透愈深，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也愈深。由于中国人民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因而反抗斗争也随之激烈。

---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117，龚照瑗告英外部电八月初八日。

②《清季外交史料》，卷116，致川督电六月十八日。

③《清季外交史料》：卷118，川督致总署电九月初五日。

④艾学：《帝国主义与宗教》。

⑤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40页。

除了官方抵御外侮的几次大型战争之外，这三十多年的斗争主要就表现在全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上面。

（一）斗争的趋势及分期

关于，反洋教斗争在地域上的发展趋势，根据此间全国发生的教案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时期的反洋教斗争并不是从内地首先爆发，或是由内地某一地区向四面扩展，而是先在沿海一带爆发，再向内地发展，并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这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逐渐深入有直接关系。因为《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以后，外国教会势力从沿海通商口岸和边疆潜入内地活动，这些地区首先发生多起反洋教斗争事件。1860年以后，外国教会凭借不平等条约，更加明目张胆地侵入内地，由省城而府县，直到穷乡僻壤。随着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各地人民反对外国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斗争也就愈来愈激烈，反洋教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

这三十多年的反洋教斗争，依据参加者的阶级成份的变化，斗争内容和规模的特点，可以明显地划为两个阶段：从六十年代到中法战争为第一阶段；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除劳动人民外，清政府的一些官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参加进来，而且往往是斗争的推动者和倡导者；斗争的内容主要是打教士、烧教堂的骚动、暴动。到第二阶段，官吏、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退出，一部分人成为这个斗争的反对者，参加斗争的基础是城乡劳动人民，会党成为斗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斗争的锋芒不仅指向教会，还攻击其它外国侵略机构，并且对清军、练勇的镇压采取武装抗拒，甚至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二）第一阶段斗争的特点（1861年——1885年）

1861年，反洋教斗争首先从偏僻的贵州开始，它以“驱逐异端，崇奉圣教”为召号，迅速扩展到湖南、江西。“灭教公函”、“驱教檄文”广泛传播。两年间，贵州的贵阳、开州，湖南湘潭、衡阳、清泉，江西南昌、进贤等处群众纷起攻击教堂，驱逐教士。

从1864年到1869年，在教士、教民特别凶横跋扈的四川，发生了连年不断的、大规模的民教“聚众斗殴抢杀”事件，尤以川东彭水、酉阳州、酆都一带的斗争最为激烈。同一时期，贵州永宁、遵义、兴义、安顺、桐梓、都匀、绥阳、贵阳，江苏扬州，安徽安庆、建德，江西庐陵、贵溪、安仁、德化、彭泽、新昌、南康，河南南阳，直隶永年，福建福州、罗源及台湾，都发生了小规模的斗争。各地斗争互相影响，群众斗志日益昂扬。1870年，终于爆发了杀死洋教士、洋商、外国职官20人、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开重刑镇压之恶例。人民愤怒郁积在心头。天津群众曾决定为死难者举行公葬，立碑建祠，以资纪念。这个决定因侵略者的干涉而未能实行。于是，群众便令手艺人摩拟就义者肖像，扎彩置于会场，“延请僧人讼经超渡”，表示追悼①。歌颂天津反洋教斗争的快板书、刻板画等广泛流传于直隶、山东，揭帖、檄文、《辟邪实录》等反洋教书文散布至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省，致使“南北谣言，同时并起”。

1870年——1871年，直隶通州、蔚州，江西吴城、南昌、瑞昌，福建古田、福州，广东琼山，四川黔江，都发生了“反教案件”。四川的斗争不断向前发展，南充、营山、内江人民相继奋起，到1876年，出现了以邻水、江北厅、涪州为中心的反洋教斗争高潮。

---

①《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22页。

和四川的斗争相呼应，广东龙州，河南开封，山东德州、即墨，湖南广平、岳阳，浙江处州，江西瑞昌、九江，湖北孝感、武昌，奉天海城，黑龙江呼兰，福建延平、建宁、福州、福清各地的斗争，前仆后继。

1880年后，法国吞并越南并进攻中国的形势日趋严重。爱国人民百倍警惕着教会的间谍活动，及至中法战争爆发，人民斗争情绪更为高涨。

1880年——1885年间，发生教案的地区主要是在西南和东南沿海。如广东清远、茂县、大埔、东莞、潮州、揭阳、佛山，广西南宁、梧州，云南浪穹，建福龙岩，浙江温州，等等。这些地区都是法国侵略者窥伺、渗透和企图攫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个阶段的反教斗争，参加者上有督抚提臣两使，中有士绅道府州县官团首，下有士子、佐杂及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在此期斗争中，起支持、领导的作用或参与者，是省级大吏和有身份有影响的地方父母官，冲锋陷阵的多是由地方绅士领导的下层百姓。1861年开始的贵阳教案，就是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鼓动起来的。当时，他们联名给全省官吏一封公函写道："异端邪说，最为害民。省中天主教……近乃肆行无忌，心实叵测。"为了力"挽颓风"，他们要求各级官吏"无论城乡，一体留心稽查。如有来自外方之人，谬称教主等项名目，欲图传教祸人，务望随时驱逐"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明知朝廷已经和外国订有保护天主教的条约，因而叮咛各级官吏在驱逐教士时，"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藉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②。最后挟行政威权，明定以驱逐洋教是否得力作为官使考核的重要内容，说是"必无差谬，幸勿畏葸。如果办理得力，定当优叙；倘不经心，任听传习，一经查出，咎亦匪轻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1，第11页。

也。”①于是，候补道缪焕章撰《救劫宝训》，在贵阳刊刻传播，号召“屏黜异端”；团务道赵畏三率众焚毁教会学堂，捕杀教民；开州知府戴鹿芝以群众控告法教士文乃耳破坏礼俗为由，逮捕文乃耳等四人，使用极刑处死，并派团首周国璋“四乡搜寻奉教之人”；兴义知府孙彦清、普安厅同知钱士墉、永宁州团首任聚五等等，都积极参加了反洋教斗争的行列。法国使臣要求，赔偿教会损失，抚恤死者家属，并张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告示二十张，贵州大吏坚决不允。新任贵州巡抚韩超对贵州主教说：“要贴请自己贴出，本处官员不便代为发贴。”②贵阳知府多义甚至公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③

如果说，贵州的斗争典型地说明了地方高级官员曾带头反洋教的话，那么，湖南和江西的斗争则表现了地方士绅痛恶洋教的立场，这种立场也曾得到该省地方最高长官的赞扬和支持。1862年，湖南士绅公议驱逐天主教，“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寄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④。他们又撰本省公檄二文，攻击教会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伤风败俗。檄文传入江西南昌，“众论沸腾”。前翰林院夏廷矩、在籍甘肃臬司刘于浔，立将檄文翻印，“一日夜刷印数百万张，遍贴省城内外通衢。”⑤湘、赣反洋教之风同时兴起，教堂、育婴堂、学堂及教民房屋被焚毁多处。江西巡抚沈葆桢认为，士绅排斥异端是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⑥当驱教空气紧张时，传教士曾要求谒见巡抚，请求查禁，沈葆桢拒绝接见。群众斗争爆发后，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1，11页。

②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37页。

④夏燮：《中西纪事》，第20卷，第9页。

⑤夏燮：《中西纪事》，第21卷，第4页。

⑥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10卷，第17——18页。

沈葆桢表示欣慰而叹曰："西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也！"①

四川东部各属的反洋教斗争，则皆以团绅为首，团民为基本力量。往往张旗执械，列阵对垒。酉阳州悬挂牌于州衙门，"明称诛灭天主教，斩草除根"②。

1869年间，湖南士绅又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洋教宣传，印发了大量的揭贴，流传全国各地。揭贴指出，教会、教民"不敬祖宗神佛"，充当"奸夷"侦探，"恃金钱诱人入教"，毒化教民思想，迷拐男女，剖取心目，等等。大声疾呼："如果邪教盛行，圣道不昌，不知成何世界？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③于是江南各地，焚毁教堂、驱逐教士、仇杀教民的斗争，此伏彼起。这期间的斗争往往是地主士绅暗中支持，文武生员一马当先。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爆发之前，"乡绅集会孔庙中，书院停课"。④

正因为此时地主阶级及其上层人物曾投入反洋教运动，所以清廷对运动不便严厉镇压，而是以极其委婉的口吻，向各地官绅反复解释，谆谆申诫。一则说："外国天主教原属异端，无如咸丰八年以前早已弛禁，况此时既与该国换约，而上海等处复藉其兵力以制逆匪(指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暂示羁縻。以赖各地方官仰体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妥为驾驭，弗令滋生事端。"⑤再则说："天主教弛禁，本系不得已之举。第目前军务孔殷，两形相

---

①《中西纪事》，第21卷，第3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第31页。

③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第25—26页。

④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第76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29页。

害，择其轻者，以维大局。”①三则说：“明知此事为风俗人心所关，且与内地良民不相洽，第当四方多事之秋，和约已定，只得持平办理，以期相安无事。”②在清廷的“抚慰”与“训导”之下，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逐渐领悟了朝廷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旨意，于是一部分人迅速退出反洋教斗争，一部分人站在斗争的反面。

这个大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清朝官僚守旧派与洋务派两大派别分化、形成，及洋务派势力日益膨胀的过程。天津教案发生后，守旧派官僚和洋务派官僚曾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守旧派官僚认为：“津民宜加抚循，勿加诛戮”③；“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民之心”④；“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⑤。洋务派官僚则认为：“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天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⑥，“庚申避敌之役，岂可再见”⑦。结果洋务派头子曾国藩、李鸿章等不顾舆论沸腾，力主对天津教案“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⑧。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洋务派势力的发展，政治、军事、财政和外交大权都掌握在洋务派官僚手里，越来越多的守旧

---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37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1，第27页。

③同上书，卷72，第34页。

④同上书，卷73，第21页。

⑤同上书，卷73，第17页。

⑥同书上，卷73，第47页。

⑦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33卷，第48页。

⑧《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2卷，第31页。

派官僚开始向洋务派转化，封建地主阶级上层人物出现退却的情势。但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乡绅、士绅），在运动中仍然相当活跃。特别是当教会侵略势力开始进入某一地区，当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开辟新的侵略据点的时候，所遇到的反抗往往是全民的。其中，不少斗争的倡导者仍是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士绅。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乡绅士绅们的斗争积极性日益低落，城乡劳动人民的呼声则日益高昂，并使运动开始初步萌发了具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双重性质。

1876年，四川邻水、江北厅、涪州的反洋教斗争，其规模、声势及其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斗争首先从邻水县开始以后，迅速扩展到江北和涪州。这些斗争都是在乡绅倡导下，官吏“假作痴聋”，不闻不问，因而劳动人民愈战愈勇。

在四川反洋教斗争轰轰烈烈的同时，福建绅民反对强迫传教的斗争日益高涨。教士出门，“众人即围围喧嚷”，“群起詈骂”；教士下乡，庄农举锄便砍，大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①。1874年，美国教会企图在延平府买屋建堂，立被绅民阻止。1875年、1876年，延平居民又两度拆毁教士宅住，将教士驱逐出境。联甲总局绅董发布公启，指斥教会“蛊惑人心，败坏风俗，大为地方之害”，号召城乡人等“互相保卫，备置器械，无论夷人所到何处，务必驰赴驱逐”，各铺户遍插“齐心联甲，驱逐番夷”的旗帜，众志成城，力阻帝国主义势力侵入②。建宁府联甲局也曾“设席会盟”，决议驱逐洋教。1876——1879年间，建宁、福州、福清连续发生焚毁教会教堂、洋楼，殴伤教士的事件。福州附近的一个村庄，公开张贴告白：“禁奉教者来买食

①《清季教案史料》，第59—61页。

②同上书，第74页。

物”①。可见群众对洋教如此厌恶。美国教会为了扩大阵地，在1879年4、5月间，以开设“书店”为名，在延平租地建屋，“原议不作教堂，群情始帖”。及至年底竣工，却直悬“福音堂”牌匾，一时“巷议纷纷”，酝酿抵制。12月14日，“书店”内举行礼拜仪式，附近幼童闻讯前往观看。“慈善”的美国教士嫌小孩嬉笑吵闹，竟开枪射击，结果打伤路人臂脚。枪声一响，顷刻间聚集数百人，有扭住教士痛殴的，有愤而将“书店”内器物捣毁的，直至地方官赶来“弹压”，传教士才得逃脱②。

延平事件传到福州，美国领事威逼闽浙总督派员前往“查办”，并捉拿“凶犯”。这时，原来领导驱逐洋教斗争的联甲局绅董们纷纷贴出告白，决心抗争到底。白曰：

> 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殚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租买恃其财钱，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同不共戴天者也。”

告白接着警告清朝官吏和地方劣绅：

> “若知鬼子不是，据实回复，方得算中国之官，百姓无不悦服；若听鬼子一面之词，倒行逆施，则是鬼子私他、贿他，特谋此差而来，纵然回去讨好，得了高官，何颜对人，与宋代秦桧无异也……木偶乡绅，平日常与地方官说话，不知大义，一味巴结。官说是则应是，非则应非，皆洋人驱使。”在另一份告白中指出：

> “真不平，真不平，天朝官竟帮了洋人……他要拿闹事者，个个都是为首人。我们议定有一法，每户各自出一丁。南平四万八千户，共集四万八千人。备盘货，即起程，一概齐到福州城。求各宪，把冤伸，先要拿他放枪

①②《清季教案史料》，第105页。

人……各宪若凡不肯理，拆洋楼，杀鬼子，并杀教民。一言既出，决不停留。那时候，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皇上也出气，百姓也欢心。若非如此斩尽，地方何能安宁？”①

这第二个告白，虽然都以“忠诚”的口吻谈到朝廷和“皇上”，表明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当今的天子”已是洋人的奴才。但是对于直接压迫人民爱国运动的地方官绅，已经采取了严厉攻击的立场，指出官绅“皆洋人驱使”，提出了“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的斗争口号。它标志着反洋教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由官吏士绅倡导“排斥异端”的驱教斗争，发展为广大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斗争。

进一步认识了洋教和殖民主义的关系，也是反洋教斗争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881年，广西沿边人民就已经指出：

“法人诡计多端，已占领越南国滨海各省，复在该国北圻各省建楼设堂，势将吞并全越，逼处内地。凡建教堂之处，多系招集匪人，不容邻里过问。现欲在南（宁）、太（平）等处建堂传教，必将里外勾通，蚕食为害，不可不防。”②

1883年，福建龙岩士绅拟订条规，严禁“交通外匪，趋入异端邪教”。下层群众则以“平夷灭番局”名义出示晓谕：“有能得番首者赏银二百两。”③及至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旧仇新恨，交集人心，群众斗争情绪更为高涨。两广总督张之洞叙述当时广东的情况时说：

“其时人情汹汹，数百里内外，传书聚众，必欲得

---

①以上几段引文，均见《清季教案史料》，第二册，第158－9页。

②《中法交涉史料》，第2卷，第8页。

③《清季教案史料》，第107－109页。

敌人而甘心。……粤东义民，视凡法人，皆若仇敌。几欲尽与教士商民为难，即教民亦不使片刻在境。”①

但是，清朝统治者极力压制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广东、浙江一带攻击洋教者，都被指为“作乱匪徒”，杀无赦。群众斗争的情绪遭到严重的挫伤。

（三）第二阶段斗争的特点（1886——1895年）

中法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急剧加深，反洋教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并在1890—1891年间，以四川、江南、热河为中心，出现了三个洪峰。

1886年，四川重庆“集团四处打教”。接着江北厅、铜梁、南川、綦江以及贵州遵义等处，都掀起了反洋教风暴。大足县连年打毁教堂，到1890年，由于官吏的政治迫害，终于爆发了以余栋臣为首的反洋教起义。江南的反洋教浪潮，也是在1886年间开始酝酿的。江苏松江、娄县、扬州、甘泉、金陵都有“闹教”情事。1891年，大量反洋教宣传品从湖南向全国各地发出。在这些宣传品中，有书籍、有歌谣、有图画；书名有《齐心拼命》、《谨遵圣谕辟邪》暨《全图》、《鬼叫该死》、《棘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教》等等。仅《鬼叫该死》一种在湖南便印行了8^0万册。这些宣传品“遍传各省”，大大推动了反洋教斗争的发展。于是，江苏扬州五、六千人围攻教堂，安徽芜湖万余贫民大暴动。芜湖反洋教斗争是一声信号，迅速地向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各地扩展。安庆、和州、金陵、广德州、丹阳、无锡、金匮、阳湖、如皋、宁国、江阴、九江、杭州、海门、广济、宜昌等处都掀起了骚乱和暴动，势如潮涌，声若山崩，连上

---

①《张文襄公全集》，第97卷，“公牍”七。

海租界及徐家江一带，也出现了攻击洋教的匿名揭贴。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帝国主义分子万分恐慌。美国驻华公使给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①。这次巨大浪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1893年。湖北襄阳、光化、谷城、麻城、黄州、樊城、黄陂以及湖南临湘都不时有小规模的民教冲突。

1891年11月，热河朝阳一带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运动的成员中，有许多来自‘江南’各地”②。起义者建号立营，纵横数百里，横扫朝阳、平泉、建昌、赤峰四州县教会势力，号召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清朝贪官，焚堂灭教，毁署劫狱，所至大震。其影响波及直隶开平、滦州、迁安、永平以及奉天锦州。清朝政府调派了直隶、奉天、热河三省军队“合剿”。起义军“以鸟枪为武器”和清军苦战两个多月，“大小数十仗”，最后失败，二万多起义群众尽遭屠杀。起义失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清朝政府仍然感到朝阳一带“余孽不清，隐患未已”。

反洋教斗争发展到此时，地主阶级无论是上层或中、下层，基本上都已退出。而众多的下层劳动人民及流氓无产者，部分民间秘密会党，开始成为斗争的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1891年四川余栋臣起义后便参加了哥老会，反洋教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地主团练则成为镇压起义的帮凶。川督刘秉璋的奏折云：

> “大足教案迭兴，皆由民教不和，匪徒借打教为名，哄诱乡团与之联为一气，故从前办理殊多牵碍。自前署川东道张华奎剀切出示晓谕乡团不使庇匪，现任黎庶昌亦力主此议，现署大足县准补资阳县桂天培到任以

①②卿汝楫：《英国侵华史》，第2卷，第601－602页。

来，联络绅团官民一气，故此次匪首纠众打教抢劫，绅团无一助逆者。”①

长江中下游反洋教浪潮的汹涌澎湃，与会党从中推动有着密切关系。清廷在上谕中说：“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半由会匪从中主谋，游手之徒相率附和，以致愈聚愈多，动成巨案。”②美公使向美国务院的报告也写道：“这几年来，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据说，秘密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③热河东部的人民大起义，则是由金丹道和在理教领导的。

人民群众在斗争中此时逐渐深刻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恶阴谋，认识了清朝政府媚外、卖国的丑恶面目，从而扩大了斗争的目标，使斗争具有了鲜明的反抗外国侵略和反抗封建压迫的双重性质。斗争的形式随之由一般的骚动、暴动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余栋臣曾发布起义檄文，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传教士“无法无天”的侵略活动，并揭穿封建官绅“助桀为虐”的丑恶嘴脸，号召百姓起来和帝国主义者进行拚死搏斗④。江苏扬州哥老会曾发布揭贴，约期拆毁教堂。揭贴指出：“入教人众，将来必有造反之意。”地方官贴出告示禁止。“告示甫出，即被人爪裂粉碎，另黏红条于上云：‘官府受贿，保护洋人’。”⑤在长江中下游的反洋教暴动中，人民不顾清政府官兵的禁阻，英勇向前，有些地方连士兵也参加了暴动。例如，九江大姑塘镇暴动时，“官吏督兵弹压，不料士兵反戈相

---

①《刘文庄公奏议》，第7卷，第35页。

②《东华续录》，光绪朝，第104卷，第4页。

③《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00页。

④《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第123—124页。

⑤《益闻录》，第1063号，第13册，第200页。

向，与官为难”①。热河的人民起义“公开地以消灭外人，消灭传教士及推翻清朝政府为旗号”②。

清朝政府此时对于反洋教斗争的态度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各级官员秉承上宪旨意，严刑峻法，无所不用其极。江都甘泉县示：“须知天主设教，无非劝人为善”，倘敢“借端生事，一经拿获，定即从重治罪；乡保知情不举，并予究办。”③

苏松太兵备道示：

“查奸徒遇事流言，布散匿名揭帖，最为世道人心之害。定例投贴匿名揭帖以及妄言煽惑人心，分别斩绞。”④

安徽营务处示：

“省城天主堂今有多人前往观视，诚恐愚民无故滋事。……自示之后，勿得三五成群在于该处交耳窥视，倘敢故违，定即提案重究。”⑤

当宜昌暴动发生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严办此案。他说：

“试思白昼通衢，纵火各处，焚抢至三时之久，并非一处延烧。文武官员布列满街，毫不畏惧。若不诛数人，以后法纪尽废，匪徒得意，顽民横行，大乱将作，宜昌如何得安？湖北近省如何得安？”⑥

文后还加上“此并不为洋人也”。可见群众的斗争，已触及政府根本。

---

①《益闻录》，第1068号，第13册，第230—231页。

②《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01页。

③《益闻录》，第1063号，第13册，第200页。

④《益闻报》，第1067号，第13册，第224页。

⑤同上书，第1074号，第13册，第266页。

⑥《张文襄公全集》，第136卷，第14—16页。

于是，他令宜昌官吏“悬赏缉凶”，并告诫他们“勿误认题目，……以拿匪弭乱为搪塞洋人”，必须切实办理①。

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已经完全站在同一立场，以血腥的手段来对付爱国人民，因此人民就必然会把斗争的锋芒同时指向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阶级。

（四）作用和影响

1861——1895年三十余年的人民反洋教斗争，都是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而扩大的。中国人民在自发的反教斗争中，奋不顾身地进行了殊死的、持续的战斗。数十年间，斗争此伏彼起，前仆后继，几乎连年不断。发生斗争的地区，北自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起沿海，西迄边鄙，几乎遍及全国。参加斗争的群众非常广泛，有封建官员、地主士绅、兵丁吏役、城乡劳动人民以及流氓无产者等等，几乎包括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每次人民反洋教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这些斗争却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中国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保卫自己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一种反侵略的自卫运动，它表现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族侵略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必然产物。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除了极少数卖国的统治者以外，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从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大教案——贵阳教案发生，就预示着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政策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并使之受到巨大打击。到1886年的重庆教案及1891年芜湖教案，当地人民把打击的对象扩大到英领事馆及海关时，人民反对的目标就不

① 《张文襄公全集》，第137卷，第17页。

仅是几座教堂，而是包括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人民在斗争中，一方面打击了帝国主义者，同时也教育了自己，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斗争性质的演变，表明了中国人民已逐渐由自发性的反洋教斗争转变成了自觉性的反帝斗争。虽然这种反帝斗争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

这三十多年间发生多起教案，并且每次教案规模都是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而扩大，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中国人民与清朝统治者在对待外国侵略上，走的是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1869——1870年天津教案及安庆、建德等地发生教案后，清政府一方面想预防教案的再起和扩大，防止人民由仇外转为反清；另一方面，又企图借着中国人民仇外情绪的高涨，来适当地削弱列强各国在华的特权。这是因为“洋教”损害了封建统治国家的权力，中国人“一入教民之列，有司即不能过问”①；洋教教义中不拜天地、祖宗等规定，又与中国当时的封建礼教相抵触，所以在个别的地区，清朝地方当局曾经利用过反洋教斗争来维护“圣道”。例如，1868年扬州的反洋教斗争就是一例。因此清廷拟订出《传教章程》，意图是为了在一些非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求得帝国主义的某些让步，以缓和中国人民的仇教情绪。总理大臣奕䜣就曾说过：

“若再不筹善后之方，则教中之气焰愈张，吾民之忿愤愈积，祸患正不知所止。”②

所谓“祸患”，既包括人民可能掀起的反清斗争，也包括帝国主义借口教案而发动的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但是，由于清政府既不敢依靠人民的力量反对侵略，又不敢以坚决的态度削弱帝国主义在华的非法特权，只是以委曲求全的态度来与帝国主义列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1。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6。

强“筹商”。所以，清廷虽在七十年代制定了一个旨在限制教士非法特权的《传教章程》，但当总理衙门把《传教章程》递送各国在华领事馆后，当即先后被各国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清政府又连忙向帝国主义表示继续“履行条约”，保护教堂、教士，这就使人民更加认清政府的真实面目。与此相反，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无理拒绝《传教章程》，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以斗争来打击享有特权的教会，来反对帝国主义。从《传教章程》的破产到义和团运动兴起，全国各地就出现了数百次较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

这次反洋教斗争，确实给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哪里进行侵略活动，人们就在哪里进行反洋教斗争，并且遍及于整个中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数十年间，每次斗争几乎都捣毁了传教士进行侵略活动的大本营——教堂，或赶走传教士。这种斗争打击了传教士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中国内部地区进行渗透的作用。在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和后来北方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下，侵略者认识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不得不使传教士在华的侵略活动有所收敛。当时英国外务相曾对传教士说：“以后传教，不必过于踊跃，总以谨慎为主。”①

从历次教案中，人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经验：在帝国主义借口教案对各地人民大肆勒索的情况下，只有各阶层人民紧密团结，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无理勒索。如芜湖教案后，法教士霸占雀儿山的企图，就是因为芜湖各阶层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得逞。芜湖人民正是以如此团结而坚决的行动，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中夺回了自己的乡土。

---

① 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349页。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迅速加深，中国封建统治者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帝国主义，实行了可耻的投降卖国政策，所以，人民的每一次反洋教斗争，都是以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对帝国主义者的赔偿道歉而告终。为了顺从侵略者的“惩凶、赔款”的要求，清政府在每一次教案发生以后，都给帝国主义以大量的赔款，惩办了大批无辜的百姓。然而，清政府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却是促进了广大人民的觉醒，使他们走向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反洋教斗争，诱导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而且对辛亥革命的酝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的反洋教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饱满的爱国热情和坚强的革命毅力，显示了中华民族无限蓬勃的生气。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阶级，戳穿了所谓“同治中兴”、“中外和好”的骗局，给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动员了千百万人民起来战斗，并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爆发，提供了指导思想，作了组织准备。从这个意义上看，义和团运动应是全国性的大教案。

第九章　义和团运动前的教案

（1898——1899年）

1894年中日战争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机。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上层官僚士大夫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救亡维新运动，下层广大人民把对外国侵略的愤怒情绪发展为实际的反帝斗争。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人民自发的反帝运动就上升到高潮，这个高潮的顶点，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是中国社会下层群众的自发救亡运动。是自1860年以后，各地发生的反洋教事件日积月累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痛恨到顶点的结果。

一、三大危机的加深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随着它们在殖民地、附属国和落后国家既得利益的增多，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它们垂涎和侵吞的一块肥肉。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开端，中国处在被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中。中国赖以立国保民的儒家思想，抵挡不住基督教的进攻，信仰危机日益加深。清政府要补偿对日本的巨额赔款和应付长年的财政亏空，官吏的敲诈勒索，新旧苛捐杂税，都沉重地压在人民的头上，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人民无法生存下去，致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于是长期酝酿着的反帝斗争，终于在1899年全面爆发了。

（一）信仰危机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由于所在国政府比中国还要落后，传教力量又很薄弱，对唐、宋、元三朝构不成信仰上的威胁。明朝中期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正在急剧进行，开辟海外殖民地的掠夺活动已发展到南中国海域，来华的虔诚传教士固然很多，但不安分者亦不少，而且教士插足中国官场，并受皇帝恩宠，威胁到一部分官吏的仕途，由此而产生了信仰的冲突。迄至黄贞、沈潅等人系统的反基督教学说的出现，驱教呼声日渐向民间士子扩散。那种维护儒学传统，抵制西方“邪教”传播的舆论和行动，非利玛窦的基督教儒学化可以抵御。于是发生了万历南京教案及

清朝康、雍、乾、嘉数次大教案。应当明确，这还不是信仰危机。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欧列强看穿了大清帝国外强中干的面目，并一再用炮舰施威侵犯中国的疆域。在它们卵翼下的一大批传教士，恃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带着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目的，纷至沓来，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传教运动，教堂遍布穷乡僻壤，他们还扬言要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官吏、儒学在其进攻之下，节节败退，造成了中华民族严重的信仰危机。特别是传教士强迫中国人信教，恶毒毁儒诋佛的妄自尊大的言论、行为，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不安与愤恨，暴力打教再所难免。等到官吏士绅退出反洋教斗争的行列以后，抵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基督教的传播，维护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斗争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到劳动人民的身上。

（二）民族危机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灾难。这不仅因为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直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且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阶段。

资本输出有两种形式，即外债投资与企业投资。在甲午战争后的五、六年间，这两种形式都是很突出的。

关于外债投资。根据《马关条约》，清政府赔款银二万万两给日本，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三千万两，合计白银二亿三千万两，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八千万两，根本没有力量偿还此项巨款。于是帝国主义各国争着要借债给清政府，甚至拍着桌子估逼清政府借他们的钱。1895年，俄、法银行财团借给了一万万两；1896年，英、德银行财团也借给了一万万两；1898年，英、德银行财团又借给了一万万两。此

外还有别的借款几千万两，总共达三亿七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每年全部收入的四倍半。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禾在日记里曾描写过帝国主义的这种敲诈丑态。他说：英公使来，“咆哮恣肆，为借款也”；法公使来，“无耻无厌”；俄公使威胁他，“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为什么他们逼着清政府借钱呢？因为借了他们的钱，不仅有利息，而且还要回扣。更重要的还可以用海关、盐税、厘金等作担保，以控制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如1898年，英、德银行财团借给清政府的一亿两银子，按八三折扣，实际只给清政府八千三百万两，除了规定年息四厘半、以海关收入和盐税作担保外，英国还把长江流域各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并公然向清政府提出“扬子江流域不可割让于他国”的苛刻条件。这就是帝国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地借钱给清政府的实质所在。

除了外债投资外，还有企业投资。据不完全统计，1895——1902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企业投资，包括建工厂、筑铁路、开矿山、办银行等方面，总共在五亿美元以上。它们对铁路投资特别卖劲，因为这不仅本身就是资本输出，而且大大有利于它们的商品输出和对中国领土的掠夺。无论哪一国，如果取得了企业投资这项贷款的权利，不仅修筑铁路的器材要由他们卖给，而且还要派人参加铁路修筑，并取得管理铁路的权利；同时，还可以夺取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因此，帝国主义各国，围绕着铁路投资问题展开了明争暗斗，向清政府抢夺了许多筑路权。如中东铁路由帝俄直接投资修筑；胶济铁路由德国直接投资修筑，并取得了铁路沿线三十里内的矿山开采权；京津铁路、津榆铁路和芦汉铁路由英、比等国借款修筑；美国与清政府订立了粤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山西、四川等省的路矿权也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从1895——1899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外债投资与企业投资

合计在五亿两以上，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十倍左右。帝国主义各国正是通过投资取得了在中国更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持权，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

为了保证既得利益和独占投资市场，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从1895年法国要求割让云南的猛乌、乌得两地和在云南、两广开矿筑路的权利开始，英、俄、德、日各国相继提出了掠夺中国土地的要求。到1898年，形成了空前严重的瓜分危机。中国的锦绣河山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漫长的海岸线没有一处自己的港口，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外国的兵舰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

外国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的出路何在？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中国各个阶级、阶层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的爱国救亡运动便应运而生，在上层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戊戌维新运动，在下层是广大农民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掀起的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

（三）生存危机

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但影响城市，而且深入到广大乡村，破坏了和正在破坏着农业与手工业相继结合的自然经济，迫使小生产者破产与失业，严重威胁了他们的生存。这种破坏的进程，就其规模来看，不亚于西欧圈地运动；就其结果来说，中国农民的命运更加悲惨得多。就产棉区而言　沿海地区和直隶山东一带是棉花和蚕丝的盛产地，但自从烟台被帝国主义侵占后，每年由烟台输入山东的棉纱成倍地激增着，洋纱代替了土纱，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从而排挤了手工纺纱和土布的生产。据山东《平度县续志》中载：“光绪中叶，洋纱输

入，织工乐其匀适，相率用之，手纺线遂废弛，至种棉者亦锐减。”四川巴县“乡镇间小工业，四十年前纺花手摇车家皆有之，每过农村，轧轧之声不绝于耳。棉纱的畅行　此事尽废”①。四川嘉定（今乐山）“自洋布盛引，土布日贱　计共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②。

再如，《陵县续志》中载：

“清之中叶，生产白粗布最多，当时　滋搏店、神头镇、风凰店各街有布店七座　资本雄厚，购买白粗布运售辽沈，全县收入颇为可观。惟此纯系家庭手工业，农家妇女……自纺自织　法既苯拙，效率亦颇滞缓，然农家者流　女子均有可作，家计不无小补，……迄机器纺纱，俗名洋布输入内地，粗布销路颇形滞涩，渐至断绝，全县手工业无形破产，农民经济影响甚巨。”

蚕桑业，遭受的打击亦甚严重。以山东为例。

“按山东蚕桑，古称衣被天下，日本人言山东土宜桑，叶大盈天，他处所无，然山东人多治他稼，蚕桑甚少，其故何欤？”③

农民“多治他稼，蚕桑甚少”的原因虽未言及，然遭破坏的真正原因，已含在其中了。至于丝锦手工业，当然亦遭破坏。以山东历城为例，据载：

“蚕桑之利，厥惟东南，山东亦踵行之，以长山为最。他郡所产，皆不能及。沂水织作绸缎，青郡一带织作罗纱，为蚊帐之用。数年来，会垣有织洋绸纺等类者，……近年来，封疆大吏，无不以此为要务，而先出示晓谕者，然终未见成效，非有司奉行之不力，亦非闾阎狃

① 〔英〕华特生：《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

② 光绪《嘉定县志》，第8卷，第15页。

③ 《王照之行脚山东记》，《义和团》，第1册。

于积习，而不惯趋时也。”①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烟台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载，至于“山东以手矿丝之商，即屡经教诲，并示以矿样，终不肯一致其矿之之法，或减少其矿车之径”②。

以上资料可以大体看出帝国主义对中国棉丝生产及纺织业的摧残。这不仅伤害手工业者和农民，也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农民既然丧失了土地，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诚如《齐河县志》中所说，“贫民无产，麦秋之际，佣力取值，岁晚务闲，则谋生无路矣”。可见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等遭到何等严重的破坏！

甲午战争后，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侵略尤为突出。在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侵占胶澳时，其照会中说：

“胶州湾一地，限三点钟将驻防兵勇全行退出。女姑口、崂山以外，只允带火枪一事，其余军火炮位概不准带。以四十八点钟退清为限，过此即当整军办理”③。

德国这种讹诈性的强盗行为，是其蓄谋已久侵略中国的一步，进而又派兵侵略内地。1899年3月，“德兵遽赴沂境”。据记载，1899年4月2日，德军出来骚扰：

“有德兵一队到兰山县之韩家村、白莲峪村等处，撵逐居人，焚烧房屋柴草，……日照德兵未退，现又分队到兰山滋扰。”④

德帝国主义在山东施用了极残酷的屠杀手段：

“据署日照县杨耀林禀称，德兵于本月初九日

---

①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287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页。

（1899年4月18日）在城南之林家滩，开枪将民人于永福轰毙，于文明亦被轰伤，情形极为惨酷，……兰山韩家村共被德兵焚烧民房三百余间，又烧毁衣物器具牲口树株银钱文约等项　所至甚巨。”①

其在日照之军队，也有枪毙民命重案：“山东日照县石臼所后数里住家，被德人击死农人一名，被击伤一名。”②

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是帝国主义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人，它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现了奴颜婢膝的态度，对内则无情搜刮。除去所谓的教案“赔款”外，另有大批的银两为各级贪官污吏所侵吞。这些重担都转嫁于人民。清政府为了弥补常年的亏空和交纳巨额赔款，曾在北方强制推行昭信股票。

“据称，山东安丘知县俞崇礼，办理昭信股票，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此等情形，恐不止安丘一县为然。”③

至于钱粮折价浮收、多端搜刮的情形，更为严重。仅以漕项为例，“其征收本色，有一石收至三石外者”④。除巧立名目的加派外，地方官吏及其爪牙任意敲骨吸髓所造成的祸害更深，他们对人民“讹诈多端”，使“民恨切齿”。总之，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给人民的灾难是十分严重的。

以上仅是德国人在山东横行的几个例子，其它国家在山东及中国其它地区也是如此。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危机，人民理所当然地要起来进行斗争。

---

①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③ 《德宗实录》，卷418，第11页。

④ 《宰志纪略》第2卷，第3、4页。

总之，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取得了传教特权，其它国家步其后尘，各国传教士都取得了与英法政府一样的特权，有的列强还想扩大这种权利。1883年后，德相俾斯麦大力支持传教士在山东的活动，以此作为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十九世纪末期，在中国传教的有英、法、德、比、瑞士、奥匈帝国、美、荷、沙俄等国，其中以英、法、德传教士最多，活动更猖狂。美国也不甘落后，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就制定了系统的侵华计划——田贝计划，其中第二、三条规定，“应开放中国供外国人居住”。这就赋予了传教士以“随意行走、居住、购置田地的权利”。各国传教士秉承所在国剥削榨取中国的总计划，成为殖民主义者奴役中国的有力工具。英人密克曾说法国派遣教士来华，“实阴以诇谋寄之，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①。另一个名叫斯魏士的牧师说：“英国商业底优势之对于英国，正如天主教徒保护权之对于法国，他们地位底影响，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是相等的。不过，法国由宗教的材料所得到的利益却要多着十倍。”②义和团运动前夕，教会势力已遍及全中国各个角落，恣意横行，干预政治。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对中国总理衙门，也用的是盛气凌人的口吻，对地方官吏，他象上司一般地走出他们的衙门，把他不喜欢的官吏报告给上级官员，以至北京政府”③。

---

① 密克：《支那教案论》，“政治篇”。

② 《庚子国变记》，序言，第3页。

③ 转引自《历史教学》1956年11期：《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其历史意义》。

就山东遭受的危难而言，德国不少传教士是直接祸害山东省人民的打手。据光绪朝《东华录》所载，“教堂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这说明农村小商也逃不出浩劫之难。另外，象山东“武城县，……该县境十二里庄等处教堂内，闻有快枪百余杆，并有大炮多尊，……。复据禹城、平阴两县探报，该境韩庄白云峪教堂，均有快枪多杆”①。这足见教堂实际上是武装侵略的堡垒。其实，传教士在全国横行霸道的情况下，何止山东省武城、禹城、平阴几县的教堂有武装。帝国主义对于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则往往又“以助剿巡守为名，干预军事，小则索偿兵费，大则占据城池”②。如“英领事……任意纠缠，无理取闹，并时常搜括教民细故，横生枝节”。“法领事业国钦在山东省纠缠，……又专指赔补教堂，据称焚掠九十处，须赔五十九万四百余两，直同恶丐讹诈”，其实，他所说的“教堂，多系教民土屋”③。在1900年以前，在教士的偏袒下，教民欺压人民之事屡见不鲜，当时“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④。外国教士以教民为爪牙，专听教民一面之词，且捏造事实，扩大事态，“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有些地方官和地主豪绅入教，更加鱼肉人民。人民在“连年欠收，贫民无所得食”的情况下，教民却“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积居奇”⑤。还有土豪“教民”，聚百余人捆缚平民，诈财害命之事屡屡发生。层出不穷的罪恶事实，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所以，宗教侵略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而义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0页。

② 同上书，第43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5、68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85页。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

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扩大。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残酷而又野蛮的宗教、经济、政治侵略遍及中国城乡的每个角落，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而饥寒交迫、生产无着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把仇恨集中到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并且把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故此，在义和团运动前夕，已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就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反洋教斗争。1899年至1900年，便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帝洪流。所以说，帝国主义侵略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当然，连年的天灾给广大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也促使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自1896年以来，由于官府不修水利，黄河“几乎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①。在义和团运动前夕，从豫西到鲁北、渤海，从鲁西直到黄河之滨均遭到严重水灾，受灾的州县不断扩大。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清统治者残酷压榨的北方人民，在天灾人祸的威胁下，真是生计断绝、挣扎在死亡线上。

随着帝国主义的加紧对华侵略，及清政府屈辱媚外政策的继续施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人民与洋教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各地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各省，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中，一直有象金丹八封教、如意教、大乘教、义和门、大刀会等秘密或公开的反清团体进行着斗争。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前夕，山东、河南、江苏三省交界的鲁西南一带，由于洋教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压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为了反抗这种残酷剥削，广泛组织了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掀起了全国闻名的义和拳、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要求和迫切愿望，因此它首先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山东爆发，并迅速地在全省发展起来。

---

① 《德宗实录》，卷423，第7页；卷431，第12页。

后来配合直隶等地的义和团力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席卷华北，波及全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

二、大刀会的反洋教斗争

1896年，山东各地爆发了无数次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都是在曹县、单县大刀会领导下进行的，最后推动了山东义和团的发难。

（一）大刀会势力的发展

关于山东曹县大刀会的情况，据《大刀会起止论》说：

> “迄今（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山东曹县、河南东诸县、江苏徐州诸县有大刀会。去年春，始闻，余犹不信；去年秋，言之者谆谆，予不敢以为无。及至今年春，予传道至其地，见有往来行人，多有持红双缨枪者，群曰为大刀会，而且公然在曹县唱戏四天，以聚会友，大约有十余万不止，此会何以兴盛如是之速哉！”①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大刀会发展迅速和组织庞大。大刀会早就在民间传播，当初设会的目的是“保卫身家”，防止“土匪”侵扰。后来，天主教会传入巨野，不法教士、教民在乡间为非作歹，许多不满教会的民众（主要是贫苦农民），便纷纷参加大刀会，从而使反洋教斗争成为大刀会的主要目标。曹县夏官屯的原先的大刀会员夏金聚说：“大刀会与洋教是死对头。”会员李

①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53页。

信全也说："大刀会原来是打马贼，保卫身家的，天主教一来，它便反抗洋教了。"①

曹县大刀会创始人刘士端，系曹县城东烧饼刘庄人（现属单县），幼年时，由隐居在他家的白莲教教徒赵某授以白莲教义与拳术。光绪二十年前后，刘士端以"保卫身家"为名，组织大刀会，势力渐大。大刀会活动的产生以及迅速发展的原因，据《大刀会起止论》的作者某传教士说的"百姓为患盗贼，无法处置，闻大刀会能避刀枪，可以保身家，于是争相学习"②，这只能是少数"富裕之家坠其术者"的原因。至于广大民众，则是因为外国教会的残酷压榨，他们仇教情绪极大，"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士，思尽杀灭"③。这里有传教士的有意捏造和夸张，然而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确实是大刀会活动的中心任务。此外，他们对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清政府也持敌视态度。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办理曹单等处会匪情形折》中说："分隶曹县、单县、砀山、丰县、亳州、虞城等州县，均其投入刀会，焚烧抢掠抗拒官兵不讳。"④

大刀会又名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此会很早前就在民间秘密活动，对当时的农民暴动来说，是起了一定的组织、联络作用。要维持起义群众的团结，单靠宗教形式是不够的，所以大刀会曾订立许多严格的会规来整顿会纪。据民间传说，有一次队伍出发，刘士端预先在必经的路上撒钱，队伍过后，刘士端命令搜查每人的口袋，发现拾得钱者，立即开除出会，毫不宽容。

---

①②③ 《大刀会起止论》。

④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2—56页。

（二）曹县大刀会与曹州教案

曹县大刀会的反教会斗争，始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爆发的曹州、徐州教案。其直接原因，据清廷说是“因挟教民刘葸臣抢麦之嫌”所引起，这与民间的说法有很大出入。在单县群众中有两种说法：一说单县东北有一块洼地，当地人称东团，约有五、六百亩，是无主的荒洼地，邻近诸县的贫民在此打鱼、编苇、栽藕，后被教民强占，民众愤而相争，大刀会遂借机而起；另一说是东圳村民庞三杰之地被教民霸占，庞请求大刀会夺回其地。这两说的共同点是，起因是教民恃教会势力强占民地。

斗争开展起来以后，形势发展极为迅速。当月，在曹县、成武、单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考城、兰仪等县，皆出现了大刀会的活动。参加起义者达数千人。起义者攻击教堂，驱逐洋人。起义得到了宿迁、铜山、丰县及山东单县大刀会的响应。声势十分浩大，纵横鲁南苏北，将这一带的教堂一扫而光，仅单县地区就毁教堂二十余所。

大刀会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外国教会和清政府，中外反动势力便结成反动的联盟，共同镇压大刀会。据载：

> “曹州府大刀会党和天主教人，多日不相和，近该会聚众千余人去闹天主教堂三十余处，现约发四千兵以安静此事。在济宁州有长老会两三家，地方官恐怕也出事故，遂派勇三十名，天天下晚到教士门前护卫，诚所谓预防于事前，胜悔于事后。”①

同年10月6日《山东时报》又载：

---

①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六日。

“大刀会现已剿灭无踪，……拘获者必立时正法，会匪于徐州属内一年正法者多至人百余名。”①

从这两条报道中，可以看出媚外的清朝政府是如何残暴地镇压大刀会众的。

曹县的大刀会暴动，是被清政府派去的刘坤一(两江总督)、李秉衡（山东巡抚）率清军镇压下去的。首领曹得礼、杨玉成、孙景伦等皆被捕杀，后来曹县暴动的总领导人刘士端也被毓贤诱捕杀害②。

曹县大刀会暴动虽然失败，但民间反洋教斗争却仍然继续发展，并且预示着将要掀起更大的风暴。

在刘士端被捕杀的后一月（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大刀会员牛金生、刘清云、刘俊岭即在金乡万福河一带，集结三万多人，冀图攻占曹、单等县，然后进取北京。因粮食缺乏，又逢连日大雨，加上首领中有人动摇背叛，起义遂告终止。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在即墨县又有大刀会员王义训率民众反抗洋教的压迫，有59家天主教徒受到攻击。大刀会在崂山山谷制造枪炮，声言“灭耶稣、天主两教之后，将洋人一概逐出中原”。是年五月三日，王义训被县令周永逮捕，大刀会集一千余人，劫狱失败③。光绪二十三年六月，砀山县（今属河南省）营庄有大刀会四、五百人围攻教堂；同期铜山、丰县聚集一、二千人与洋教为仇。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巨野教案起，曹、单等地大刀会又直接参与并领导

---

①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六日，载《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72—73页。

② 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第12卷；并见《刘坤一遗集》，“书牍”，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致何彩臣”。

③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了这次斗争，杀死二名教士①。

总之，此间由大刀会发动的数十次反教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的反帝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讲，曹、单大刀会的反教斗争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先声。

三、揭开义和团运动序幕的三大教案

1897年爆发的“巨野教案”和翌年爆发的“大足教案”、“冠县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重要事件，堪称是十九世纪末发生在中国的三大教案。虽然三大教案都失败了，但它们对于不久之后掀起的义和团运动，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足、冠县提出“顺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为义和团运动提供了指导思想，使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激情得以成为一个“运动”而载入史册；巨野、冠县教案使北方一些会党统一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向京津进军，这是揭开义和团运动序幕的前哨战。巨野、大足、冠县的人民敢于斗争的精神，影响遍及全国，各地教案不断爆发。中外交涉事件更为棘手，列强欲瓜分中国的阴谋日益暴露，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暴动不可避免。

（一）巨野教案（1897年）

1.教案发生的背景及起因

① 罗惇曧：《拳变余闻》，载《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第32页。

1890年，德国把在山东传教的护教权从法国人手中夺得后，开始在山东积极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如此热心于在山东的传教，并不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是“传播福音”、“救人苦难”。他们的目的，从下面的事实中，可知其端倪：德国在1895年、1896年、1897年曾几次向清廷要求租借东南沿海的港湾。清政府以“恐他国援例效尤”加以拒绝，这使德国非常懊恼，但又不敢贸然使用武力。当时的首相亨诺曾对德皇说：“一二年后教案问题可以给予德国进行之借口。”①可见、侵略者是有意要制造教案，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德国才一贯主张扩大在华天主教势力。德皇威廉第二说：“在华的天主教，无不受我的支持。天主教士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他以中国各项事情报告我。”②

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后，安治泰对其主子献计说：“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胶州，这对我们是从各方面看最有发展的根据地。”③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传教士充当侵略的急先锋，在这里昭然若揭。

德国天主教士进入巨野后，很快就暴露出了他们的狰狞面目。他们在巨野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从而导致巨野教案的爆发。他们的罪行归纳为：

（1）挟持官府，包揽词讼。每个新上任的巨野县官，必先到教会登门拜访，逢年过节，还得送礼给教会，而教士可以在县府随便进出。遇有教民与平民争讼，不论是非曲直，吃亏者总是一般平民。郭庄有一闺女嫁给一教民为妻，因和婆婆不和，狠毒的婆婆竟用绳索把媳妇勒死。媳妇的弟弟去县里告状，因为县官见

① 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第139页。

②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0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版，第130页。

被告者是教民，不敢收状，还狠狠地把原告打了一顿。吕集村的吕茂琪打死自己的亲伯母后，就投了天主教，等吕家亲友联名告官，吕茂琪因有教会包庇，被判无罪。

（2）无事生非，欺压乡民。巨野某村妇女在推磨时打着驴子说："你再叫，你再叫！"因"再叫"与"在教"发音相同，教徒听了立即揪打该妇女，并声言要送官究治。后经说和，赔礼了事。再如张庄有一小孩，在教堂门前说了几句俏皮话，被教士听见，不但把小孩毒打一顿，还要叫小孩的父母赔给教堂凳子一百条。

(3)敲诈勒索，盘剥贫民。磨盘张庄教堂兴建时，挖了农民田地，受害者忍气吞声。惠庄惠忠理的哥哥，花了三千钱在集上买了一只羊回来，被教民看见，诬指这只羊就是当初被大刀会牵走的羊。惠家没有办法，让教民把羊牵走后，另加付三万钱的礼物，才算了事。巨野城西一个无赖，因为偷砖窑的砖，被窑主打了一顿。他入了天主教后，反咬窑主偷教堂的砖，大肆向窑主勒索。此外，教士、教民还经常放高利贷盘剥农民。

（4）道德沦丧，强奸妇女。张庄教堂的洋教士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卑鄙下流，无恶不作。被薛田资神甫所强奸的妇女即达十余人。不仅如此，有的教士还将强奸过的妇女拐骗到外地出卖，这种事情，在张庄屡有发生。

以上就是一些披着宗教外衣，满口念着圣经的教士、教民的所作所为。

2.教案发生的导火线

在巨野教案以前，巨野各地都有大刀会的组织。其中以曹言学的一支为最强，约有七千余人。曹言学是巨野于堂人，家境贫寒，早年参加过白莲教，以后改入大刀会。据当地的老人传说，曹言学精明强干，为人豁达大度，很爱护会众。他经常向会员和一般群众揭发教会和洋教士的罪行，激发百姓爱国自救的精神。

这支队伍，是巨野反洋教斗争的主力。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公元1897年11月1日），巨野磨盘张庄发生了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这就是当时引起轰动的巨野教案①。被杀的能方济和韩·理加略都是德国天主教的神甫，他们分别在阳谷和曹州郓城一带传教。十月初七下午，他们来巨野磨盘张家庄教堂参加天主教的“诸圣瞻礼”（每年11月1日，是天主教会纪念“诸圣”的例会）。因为韩、能二人是来客，所以原在磨盘张庄教堂的薛田资（德国天主教神甫），就把自己的寝室让给两人住，薛田资则迁住于门房里。当天晚上，天下小雨，约莫晚十一点时，有二三十个人手持刀、红双缨枪进入教堂院子里，他们见堂内已经熄灯，就砸开西边窗户，杀死韩、能二教士。躲在门房里的薛田资则侥幸逃命。

对于两个德国神甫的被杀，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一是被杀的原因，一是参与被杀者是否是有组织的行动。对于前一问题，《清季外交史料》称：

> “惠二哑巴即惠潮现、雷协身即雷继参、张高妮即张沁桂、王大脚即王莽又名王衍贵、贾东洋、高大清、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分隶巨野、嘉祥县，平素游荡度日，均先未为匪犯案。雷协身探知巨野县张家庄教堂存有钱物，起意行窃，说允高大清及惠二哑巴、张高妮、王大脚、贾东洋、萧盛业、姜三绿、张允，并不识姓名二人，于本年十月初七（1897年11月1日）傍晚时分在巨野县杨家楼村外空地会齐，于是夜二更时分……更携带尖刀、刀棍至张家庄教堂门外，惠、雷爬墙进院开启大门，放张高妮等进院……，教士能方济、韩理伤重，旋各殒命。”

---

① 当时巨野县属曹州府，故又称为“曹州教案”。

这段记载把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说成是“起意行窃”，这显然是诬蔑。第一，教案发生的案卷里，没有记载有什么东西被盗窃；第二，磨盘张庄（即张家庄）教堂很小，不可能存有大批的钱物，不会有这样多人去盗窃（上段记载去者共有12人）；第三，这些所谓“盗贼”都是平民，清廷也承认“均先未为匪犯案”。这就清楚地说明清廷的诬蔑是毫无根据和自相矛盾的。

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的直接原因，民间流传许多说法，大致有四种：（1）薛田资原在胶东传教，因为经常欺压乡民，引起当地民众反抗。1897年在日照土山教堂时，薛田资曾被群众捆绑起来，薛知道在胶东站不住脚，就来巨野。日照民众不肯罢休，与巨野人联合来杀薛田资；（2）韩·理加略在郓城横行霸道，民愤极大，故有几个郓城人跟踪来到巨野，联合嘉祥人进行暗杀；（3）巨野大刀会首曹言学邀集曹传清、王昆仑和义士刘德润等有计划地组织了这次暗杀事件；（4）住在巨野东南25里独山东北角小刘庄的刘德润，是这次杀教士的领导者和直接参与者。据说，刘德润原来当过“土匪”，后洗手不干，在郓城一带做小买卖。但许廷瑞任巨野知县后，想以大量捕人取得上司的重用。原来当过刘德润伙伴的巨野县棚头魏伯溪向县官告密，捕去了刘德润之女，并使用毒刑拷打，刘德润深恨此事，欲杀教士以嫁祸县官。

以上几种说法，虽然不一，但有其共同点，即一些传教士在民间犯下了罪行。他们的被杀，是群众的一种正义行动，这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关于这次反洋教斗争是否是有组织的行动。对于这一点，从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来看，意见比较一致，即此次活动是由大刀会所组织，并有不少大刀会员直接参加。罗惇曧《拳变余闻》说，“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丁酉十月，大刀会杀二

教士。”①

3.德国借口占领胶州湾

巨野教案发生一个多星期之后，即1897年11月13日，德国政府所派遣的数艘兵舰，由舰队司令棣利士率领驶抵胶州湾。腐败的清军守将章高元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不开一枪，拱手丢失胶澳。次年三月，李鸿章、翁同禾代表清政府与德驻华大使海靖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不仅胶州湾为其侵占，山东全省也渐次落入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侵占胶澳是蓄谋已久的，教案乃为借口罢了。早在1869年德人黎希特霍芬即奉德国政府命令来华，“游历山东内地，于矿山物产调查甚详，盛为称誉，以是德人愈益垂涎”②。1897年以前，德政府已屡次命其在华舰队司令梯尔比兹，详细调查胶州湾沿岸山东半岛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继而又派佛朗求斯于1897年对该地区作更精密的调查，“小而一片沙土此后如何利用，大而铁路、航路、船坞如何设备，无不一一罗列，盖其处心积虑，存之已久”③。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巨野教案，德人也会另寻机会侵占胶澳。

在强占胶澳之后，德国天主教会以军事力量作后盾，迫使清廷在谈判方面作出如下决定：

“1.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

2.在济宁、曹州及巨野张庄三处各建立天主堂一所，并于巨野、荷泽、鄆城、单县、成武、曹县、鱼台七处各建教士住房一所，由中国偿付上述建筑费二万四千两。

3.降谕保护德国传教士，并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

---

① 《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32页。

②③ 赵琪等：《胶澳志·德人租借始末》。

4.惠二哑巴、雷协身斩首，萧盛业、娄三缘、张允监禁五年。”①

根据这几项规定，中国不仅偿付了巨额赔款，以法律形式保护天主教在各地进行活动，而且杀戮了许多无辜的人民。据有关方面的调查，被清廷处死或判刑的人，大多是没有参与杀教士活动的无辜群众。

4.反洋教斗争继续高涨

巨野教案所偿付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就把它转嫁到人民头上。在巨野教案后，天主教会由于有本国军事势力作后盾和清政府地方官吏的悉心庇护，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敲诈更为残酷，为所欲为，飞扬跋扈。例如，磨盘张庄，常有教民指某某为大刀会会员，某某参加过杀教士事件，唆使清廷官吏捕杀。有的教民还公开抢劫大刀会员家属的财产，强迫他们为教会做苦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反洋教的怒火又燃烧起来了。

巨野教案之后，大刀会在巨野的活动，有过一个暂时低潮的阶段，但为时极短。自光绪二十四年以来，出现了不少小规模的反洋教活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巨野的大刀会员立即响应，随即在该年六月初十，爆发了千余人攻打磨盘张庄教堂的事件。

（二）第三次大足教案（1898年）

1.教案再起的原因及背景

龙水镇曾在1886年、1887年和1890年发生过几次攻打、焚毁教堂的事件。这次打教事件的发生，与1890年的教案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有关。当时帝国主义者

① 《清史稿·邦交志》五。

到处强占租借地，分割势力范围，开港建厂，倾销商品，使得各地银价飞涨，外货充斥。而直接受影响的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根据调查，当时大足附近谷子每石二千文左右（一石合今市石三石），米每斤四十文至五十文，盐每斤二十文，白糖每斤五十文，土棉布每匹六百文。城市商业以绸缎业最多。在1894年以前，各绸缎店，尚无洋布，川东一带各县都从重庆进货，上货是绸缎，下货是土布，都是手工制品。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店内的洋布就多了，东洋的瓷器、杂货也逐渐增多了。外货倾销的结果，使得四川的手工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当时工人工资普遍下降，大约数字为：手工业技术工人，如制刀剪的工匠、煤窑矿工、纸厂工人等，最高工资每年十五千文；苦力杂工，工资每年五千文以下；零工每日工资十文；雇工雇农最高工资每年六千文；贩卖炭灰的苦力，每一百斤可赚钱二十文，按当时物价，这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再加上清王朝每年要付出大量的赔款和债息，更加紧对人民剥削。在四川除了地丁正粮以外，又外加“津贴”、“捐输”、“新捐输”等名目，超过正税十二、三倍以上。又在1898年内发行昭信股票，表面上是让人民自愿认购，实际是按粮摊派。四川比其它各省搞得更糟①。这些捐税地丁，完全征收白银，银价上涨，日甚一日。光绪初年，白银一两，换小钱一千文左右，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每两换小钱三千文。而纳粮用银，市面流通用钱，钱贱银贵，粮户、小商品制造者受害最大。就是稍有一些土地的自耕农，每年收入除了上粮纳捐以后，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大足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苦力就是如此，除了起来进行斗争，别无生存之路。

此时的余栋臣仍和八年前那样，并没有用迷信方式和会党的组织来号召群众，但是无法生活的群众因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和

① 《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上谕。

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只要有人号召，便会一呼百应，顷刻就可聚集数千人。

2.教案发展到起义的经过

继1890年大足教案后，大足新任县令桂天培，采取分化政策，仇教群众队伍，逐渐瓦解。余栋臣兄弟潜伏西山一带，出没无常。数年之内，屡次与清军作战。1893年曾击伤桂天培。其后，起义首领唐翠坪被执死，余海坪及蒋赞臣投降清军，余栋臣这时被迫潜伏起来。到1895桂天培调任以后，余栋臣乃返家，娶妻置产，不再和教堂进行斗争。因为余栋臣曾带领群众败过官军，而现在有了田产，又喜欢接济穷人，所以在附近百里地方颇有一些声望，那些煤窑、纸厂工人和当地农民，对他很信服。从前跟他打教的人，也听他随时召唤。

余栋臣的存在引起重庆、大足、铜梁一带的教士不安，必欲除掉余栋臣才甘心。当时法国驻重庆主教杜昂，要清政府捉拿余归案办理。1898年旧历三月底，重庆县令王炽昌遣差役和龙水镇安民局团首蒋礼堂勾结，将余栋臣捕获后，即由间道送赴荣昌监狱。当时余栋臣的妻子给蒋赞臣、张桂山等报信。张桂山、蒋赞臣、唐翠屏、杨玉成等率众二百余人，手持大刀长矛，直抵荣昌。四月初二入城，打监劫狱，救出余栋臣。初四回龙水镇。大足、荣昌的驻军，莫可如何。安民局的地主武装，更不敢过问。

劫狱以后，势成骑虎。于是余栋臣招兵募勇，开炉制造武器，准备大举。一时煤窑、纸厂工人以及龙水镇手工业工人和附近各县失业人民，失地农民，都踊跃参加，不到十天，就聚集了六千人以上。这些起义群众，绝大部分都是被生活逼迫，无路可走，才参加斗争的。

他们占领龙水镇后，首先没收教堂与教民的粮食，以充军用。多余的按市价的二分之一抛售，以济当地的贫民。五月十五日，余栋臣派遣张桂山、唐翠屏分兵两路，到荣昌河包场捕捉法

国教士华芳济，并将其押到戏台上示众，还向群众宣布洋人包揽词讼、强卖田产、奸污妇女、残杀儿童的种种罪行，号召人民起义，用武力驱逐洋人出境。五月十六日即传檄起义。檄文中列数了外国侵略者的罪恶，以及余、蒋二人受屈经过。文中着重声明："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紧接着又说："至各府州县，官是朝廷之官，兵是朝廷之兵，差是朝廷之役，如能见容，一切不犯。""倘自为盗贼，反兵相加，则兵丁官役畏皆是洋人，并非我朝臣子。"最后提出"日本兵(费)合二百兆之款，本国昭信票六千万数"可以免除，以作号召①。除檄文外，还有是年八月间，蒋赞臣及蒋鹤林引兵攻入安岳、资中时，沿途张贴的告示，文曰：

"海禁大开以来　　泰西传教通商
凡我廿一行省　　率土俱杂外洋
积久竟忘庇荫　　气习遂至猖狂
不应欺凌乡党　　不应侮弄祠堂
不应袒护教民　　不应摇荡边疆
剪灭孔圣正教　　竟尔破坏五常
恃势不思痛改　　胆敢跋扈飞扬
往者迭次打毁　　衅由彼教不良
合邑俱受其累　　邻封亦被其殃
此番兴师起义　　打教非比寻常
意在除邪辅正　　并不扰乱地方
货物公买公卖　　禁令时到申详
伏望各处码头　　相助仁粟义浆
一切教民谷石　　以及田土房廊
概归该处公项　　予不染指而尝
倘惧后来滋事　　尽有予身承当

① 《反洋教书文揭贴选》，第94—4页。

更仰士农工贾　　安堵勿得惊惶
勿得携家别往　　勿得畏惧躲藏
予实义愤所迫　　委身以报君王
刻下山东被害　　志士谁不心伤
今日兴举义兵　　特将一纸宣扬”①

从“檄文”和“告示”中可以看出，这次起义把单纯打教堂提高到武装反帝斗争的高度，但对清王朝仍报有很大幻想。这是此次起义的指导思想。

除了檄文及告示外，起义军队中还有许多标语口号，用墨笔写在白布或红布旗上。余栋臣正营有大红旗二面，一写“余”字，一写“义民”二字。另外的小旗写着：“顺清灭洋”、“除教安民”、“民教不和，打奉教徒”、“保民革教”、“专打奉教人，不打普通人”、“专打洋人奉教人，不打中国人”等等②。

义军传檄以后，随即扩充队伍。人数最多时，大约万人，编制大体和清军一样，有营哨等单位。每营分中哨、左哨、右哨，每哨五十人至二百人。领导人称营官、哨长、什长。余栋臣及蒋赞臣各带一营，分驻东西王庙及湖广馆。东王庙设公案，为全军司令部。其余唐翠屏、张桂山、何师一、何希然、蒋鹤林、马代轩、余绍文、余绍泉、江清等，都是营官，分驻龙水镇、八大庙。铜梁的易昏，也和余栋臣有联系，有二营驻铜梁县境。军士每人每日发饷一百文。不打仗时，住在附近的人，可以离队回家生产，有事一听号召，立即归队。常驻营中的，经常有五、六千人。他们的纪律很好，不抢人，不杀人。粮食及军饷的来源，是没收教堂及教民财产，其次是向大户借粮。周围百里如铜梁、永

① 此件是洋务局有关余栋臣档案中的一件，现藏大足县文化馆。

② 《大足县志》。

川、荣昌、隆昌等县的大地主中，有很多人向他们送过钱粮，有些是出于志愿，有些慑于威力。不愿出借的粮户，义军也不进行强迫。只有地主教民，除输粮外，还要令他们退教，否则劫其财产，烧其居室。当时也有假借余栋臣名号抢人的。余为了严肃军纪，曾亲杀四十余人及义子罗平贵示众。当时龙水镇上商贾往来如常，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只是政府的官兵，不敢来到这里。那年的粮税，也无法征收。

起义以后的行动，是分头出兵，打毁附近教堂及没收教堂、教民财产。七、八月内，北攻到安岳、荣昌境，南攻永川、铜梁。旋出旋返，并未远征。

3.清政府的“剿抚兼施”政策与义军的失败

清政府在法国使馆及主教的威胁下，对义军进行镇压。是年六月初，川东道任锡汾派重庆镇官兵到大足剿办，至永川三教场，遇张桂山伏兵袭击，清军溃败。清政府本想“慑以兵威，庶几该匪闻风畏惧，释毕自首”，孰知“兵威”并不可靠，于是改变策略，一意主抚。由任锡汾邀请大足、荣昌各县大地主数十人作调人，和余栋臣进行交涉。清政府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放回华铎”。余栋臣却提出了十个条件，其中几个重要的是：一、由华芳济赔中国白银五万万两，这是洋人在中国历年抢去和赚去的财富，要从洋人身上取还；二、余栋臣、蒋赞臣的积案完全撤销；三、队伍不解散，每月由清政府供给军械粮饷①。这些条件未被接受。

1898年8月，义军出动了几路队伍：蒋鹤林攻安岳天林镇；余绍文及易昏围铜梁，捉获龙水镇的华籍司铎黄用中；南路唐翠屏攻永川、江津、重庆，又回师铜梁；余栋臣自攻来苏；何师一攻江津十都、太平等场；何希然攻内江；马代轩攻安岳李家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3卷。

衙①。

在大足武装起义的影响下，附近各县纷起教案，湖北宜施等地也出现假借余栋臣之名打教灭洋，而且有欲入川东汇合余栋臣之势。一时“教民迁避，处处惊扰，民教惊惶，洋人尤甚”②。

清政府看到事态扩大，惊惶失措，屡电川督文光，谓：“该匪已纠众出巢，不能不用兵堵剿，惟华铎尚在，仍应设法操纵，切勿专恃兵威，致难收束。”又谓：“即剿即抚，不可偏废，兵力不敷，可酌调屯兵”；“如彼能就抚，立释华、黄二铎，不特可邀宽典，且当令其效力”；又饬命任锡汾“亲身前往”，许余栋臣“从优奖拔”③。任派亲信一人到龙水镇，余、蒋对来使阐明态度，愿意报效国家。任锡汾立即电告清廷，谓：“余蛮得闻抚议，顿觉感悟，痛哭流涕”。那拉氏也以为招安有望，电任锡汾，促余栋臣交出华铎，其余条件，即可商量。又谕文光等，余军改编营数的多寡，不必力争，总期交出华、黄两铎，毋得迁延。这时适有江北仇教人物袁陆山逃至龙水镇，劝说余栋臣“不能交还华铎，一交还，则大军至齑粉矣”④。义军首领张桂山、唐翠屏亦反对就抚，“交铎就抚”事至是中断。

十月，清政府特派四川藩司王之春专办大足教案。谕令他说：“兵力太单，剿除不易，如有可抚之机，仍宜设招降。”

是年十一月中，王之春带领泰安、安定、长胜等十余营清军及邻县团练武装至龙水镇，对义军兜剿。义军不敌，退出龙水镇。王复派兵追击，至玉龙场，义军又受重创，而杀死中国籍司铎黄用中。余率三千余人退入深山，踞险设防。清军屡战不克，

---

① 参见大足、江津、内江、安岳各县志及四川大学藏巴县档案。

② 《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诸电。

③ 《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丙申、八月乙巳、八月己酉诸谕。

④ 《大足县志》及《江北县志》。

遂以重兵围西山，并蹂躏余栋臣故乡，烧房屋掘坟墓，奸淫屠杀，惨绝人寰。余栋臣大军在山中，粮食成了问题，士气不振。十二月中旬，蒋赞臣降。十二月下旬，余栋臣也带着妻子和亲随几人连同周万顺、华芳济下山到清营请降。王之春见华芳济安然无恙，如获至宝，对余栋臣也相当客气，把他安置在周万顺营中监视起来，目的是想通过他，招安余众。殊不知他们下山以后，余绍泉即引众三百余从铜梁逃走；余绍文及匡璜率四五百人，由璧山蔡家场渡嘉陵江逃至江北县境；张桂山、蒋尚卿及余众都逃散了，大部分到贵州及铜梁、江津各处潜伏，结果王之春军队上山受降时，只有空庙几所①。

法国人和清政府深知，起义群众分散潜伏，如果把蒋、余二人杀死，恐怕后患无穷。最后清政府决定把余栋臣囚在成都，蒋赞臣囚在西安，交地方管束。而对余绍泉、张桂山这些人，则严令各地围剿搜索，必欲斩尽杀绝。为了防止他们再逃，又令泰安营长驻大足及龙水镇。大足人民仇教反帝的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最后赔银一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两结案，由四川昭信股票抵偿，清政府剥削四川人民的钱几乎被外国侵略者全部夺去。

4.起义的深远影响

1898年大足人民武装起来打教，是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教案，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虽然为时半年就失败了，但起义的影响远非当事人可以料及。它既同于一般教案，又不同于一般教案；它既是一次农民武装起义，又不同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武装起义；它的开始和结局，都充满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精神，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它的“檄文”、“告示”及“顺清灭洋”的口号，使政府瞠目结舌，剿抚不定。这个口号并通过会党的秘密渠道传向北方，对北方“扶清灭洋”口号的产生不无影

① 《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庚子上谕；《江北乡土志》。

响①。起义部队捕捉“人质”，声讨传教士的罪行，并以此作为与政府谈判的条件，这在中国历史上仍属罕见；同时，这个“人质”进入起义部队以后，使余、蒋二人产生了幻想，使领袖们发生了分歧，这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并一直背着这个“包袱”走向失败。

它的影响的另一方面，是波及“三十余县，各处教堂被打毁二十余处”。湖北、贵州、云南都有人用“余蛮子”的旗号，打教堂，抗清军。余栋臣失败以后，它的“党羽散在各县，蜂屯蚁聚，起伏无常”②，使清军疲于奔命。这说明大足人民起义，早已超越了“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界限，已不是单纯的“反帝仇教”，而有着“反清”的因素在内。清政府屡次上谕，提到大足人民起义是“乡众抗官”、“叛情昭著”、“心怀叵测”等等即可证明。十三年后，保路同志军中就有余栋臣的旧部，张桂山、蒋尚卿还领导队伍打回龙水镇，又打到荣昌、自流井。张桂山还当上西南军政府的都督。这一切说明，大足人民第二次武装反洋教起义对当时邻近省、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对后来四川辛亥革命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第二次冠县梨园屯教案（1898年）

1.1892年民教斗殴

梨园屯第一次（1887年）教案后，由法国公使、山东主教数次出面干预均未争得在玉皇庙地基上建立教堂的目的，侵略者当然不会善罢干休，时时伺机挑衅。

---

① 张力：《“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载《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277页，齐鲁1982年版。

② 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第155页。

同时，梨园屯人民对官府袒教抑民，王世昌等六人遭到革除功名和监禁，十分不满，称之为“六大冤”。由于士绅领导的反教会斗争的失败，村中侠义之士愤慨异常，“谓官已不论法，我们就不守法，以武力护庙”①，遂有阎书勤等十八人领衔举事，号为“十八魁”，继续反对洋教的迫害，反对官吏的抑民惧外政策。据《冠县县志》载：“时有阎书勤、高小麻等十八人，号十八魁，积不能平，号召民众联络党徒拟诉之武力拆毁教堂。”②而且这十八人把直隶威县盛行的梅花拳引进了冠县，从此梅花拳投入了反洋教斗争。

光绪十七年（1891年），长江流域各省人民掀起大规模的反洋教侵略的斗争事起。清廷慑于列强各国炮舰政策的压力，一方面着令各省弹压，一方面颁布严禁焚毁教堂、保护教民的上谕。这就大大助长了教会侵略势力的气焰。外国学者有文指出：“这谕旨的发布，在义和拳活动的重要发源的之一便直接导致了冲突之中的再燃。”③法国公使李梅就抓住这个谕旨，于同年十二月致函总署，提出“妥速完结”④。总署咨山东官员迅速结案。东昌知府洪用舟于1892年初悍然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为天主堂；并着冠县令何式箴捐二百两、京钱一千串给教民，另觅新地，重建新庙。又规定：“俟新庙建成后再拆毁旧庙，将神像移入新庙，并立下保证书，终结一事。”⑤这一不公正而又伤害村民传统信仰的作法，激起了梨园屯人民的义愤，并与教民发生斗殴，双方都有人受伤。“十八魁”遂从临清州请来道士魏合意来庙

---

①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3页。

② 民国《冠县志》，第10卷。

③ 〔美〕周锡瑞：《教士与教民与义和团运动，宗教伪装下的帝国主义》，转引自《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年第2期。

④ 《教务教案档》，第五辑（一），第522页。

⑤ 戴玄元：《义和团研究》，第6页。

住持，又从沙柳寨请来梅花拳助威，并将团练使用的武器，搬进庙内，以防教党武装袭击。教民“遂以梅花队阻止、谋叛为词，向冠县投递信函”①。“复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②。村民不服，纷纷前往教堂与之辩理。教民施放洋枪，引起械斗。

山东巡抚福润密饬济东泰武临道道台张上达亲自前往相机妥办，要其执行“拿首解从”的方针。张驰抵冠县后，一方面让冠县县令何式箴先将魏合意拿获，拆毁玉皇庙，交还教士；另一方面又督同东昌知府李清和、临清知州陶锡祺、冠县知县何式箴等传集附近绅耆，晓以利害，劝令解散。三街会首被迫将庙基交出，还建教堂。四大官员的重新审判，博得了侵略者的欢心。主教马天恩曾致函表示“感激不尽”，法使李梅也致函总署声称“本大臣因此甚为欣悦”③。

2.1897年民教械斗

以上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梨园屯教案再起的简略过程。教会夺得玉皇庙，“十八魁”领导的梅花拳愈加愤怒，他们与梨园屯及其邻近村庄的非教百姓联络一气，壮大了力量，扩大了影响，赢得了不少士绅、团首的同情与支持，与教会势力的对抗日益激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正当教会在玉皇庙旧址建天主堂之时，梨园屯百姓在梅花拳成员率领下，组织五百余人到堂址与教会论理，建堂之事只得中途停止。月余后，教民在教士的怂恿下，又到处寻衅滋事，扬言教会势力大，教外之人岂敢敌视。梅花拳众愤愤不平，又聚众千人与教会论理，争执不下，双方持械恶斗，败教党武装数百人，打死为首作恶教民五人，重伤

① 《教务教案档》，第六辑（一），第279页。

② 《教务教案档》，第五辑（一），第528页。

③ 《教务教案档》，第五辑（一），第530页。

七、八人①。教案再次发生后，山东大吏领兵前来镇压，“十八魁”领导的梅花拳众或与之对抗，或撤到直隶威县境，主力未受折损，而且拳民尚有所发展。冠县“知县何式箴以办理此案乖方，自简罢官”②。

3.1898年教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旧历二月，阎书勤与威县赵三多（洛珠）率领的拳民团众联合，义和拳与梅花拳名声大噪。山东、直隶毗连之各州县地方拳民首先将梨园屯教会势力歼除殆尽，拆毁各地教堂，伤毙教士、教民多人。此时，“扶清灭洋”的大旗已经竖起，梅花拳、义和拳都成为义和团。四月初三日，鲁抚张汝梅在电文中说：

“昨闻直隶东民交界有新立义民会名目，四出传单，于直、豫、苏各省，欲与洋教为难。”③

这是义民会名称第一次见于官方文电之中。他所指义民即冠县义和拳组织，亦即义和团。清廷和直督在收到鲁抚电文之前，早就获得山东冠县义和拳反洋教抗清军的消息，直隶按察使向其下属发布的札谕称：

“以访闻山东冠县义和拳民与天主教民寻衅滋事。查山东冠县与直隶省交界，该处既有义和拳名目，直隶省亦难保无演习此项拳棒情事。应一体查禁，饬令随时留心查察，消患未形。”④

4.结局及影响

---

①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② 民国《冠县县志》，第10卷。

③ 《义和团案档史料》，上册，第14页。

④ 劳乃宣：《拳案杂存》“禀遵饬出示禁习义和拳严密防范并送示稿由”。载《义和团》，第1册，第460页。

1898年冠县发生的教案，其领导者先是梅花拳，后改名为义和拳，即义和团的前身。由于这次教案拖延的时间长，梨园屯又作为一块“飞地”置于直隶威县境内，真可谓错综复杂，加之山东大吏时剿时抚，举棋不定，所以没有及时结案。1899年，新任冠县知县曹倜接篆，即向大府请兵，“躬亲督剿”。“十八魁”率拳民顽强抵抗。“官兵攻以炮火百余发，毙团五、六人，团不支，溃走，官兵追击之，擒获数十人，阎书勤被擒”①。后阎书勤牺牲于临清，起义领导人田宅悉没入官。次年，“十八魁”高小麻等亦被捕，牺牲于冠县。冠县梨园屯人民为收回玉皇庙基址，前后奋斗二十年，最终在惧洋媚外的清吏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冠县梨园屯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直接引起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线，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他们的贡献应该名垂史册。

综观梨园屯数次教案的全过程，是教民拆庙修堂，村民拆堂修庙，更迭拆修，从口角纠纷，到枪炮对垒。为什么如此区区一房基事，竟会发展到水火交加呢？毋庸置疑，宗教信仰的冲突是实质。西方传教士欲使中国基督化，在得到政治特权庇护以后，就带有强制性质。他们在梨园屯大量发展教徒，形成了教党武装，实已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他们要拆掉人民传统的偶像崇拜，用基督教的信条钳制人民的思想，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包威尔认为：“此案，就因修建教堂的计划侵犯了当地老百姓的宗教信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所造成的”②。反教会迫害的斗争就这样在梨园屯持续了二十年，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亦属罕见。

---

① 民国《冠县县志》，第10卷。

② 〔美〕鲍威尔：《山东的基督教，白莲教与义和团二者关系的一个解释》，载《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1982年版。

四、其它教案述略

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除大刀会反洋教斗争及巨野、大足、梨园屯三大教案外，全国各地都普遍掀起反对教会压迫、剥削的群众性斗争，小则民教互斗，中则毁堂毙命，大则与教党武装、清军团练刀枪相见。这些反洋教斗争，最后汇总为气势磅礴的义和团运动。兹将有代表性的教案摘要概括如下。

（一）濮州抗教事件（1898年）

根据《近代史资料·有关义和团资料》一文记载的当时参加义和团的王某所传下来的资料，1898年鲁西南的濮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其中虽有迷信色彩，诸如老太婆煮“小面人”、扎“草人”，以求用“法术”消灭洋人等，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情绪。兹摘录如下：

> “自从曹州教案（即巨野教案）以后，鲁西南人民对天主教堂发生了极强烈的反感，‘砸洋学’正是表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愤恨。1898年鲁西南濮州南方七十里桑堂里崔楼村，有一姓郅的老人，绰号‘红毛五’，年老无子，约有三十多田地，家道尚称小康。崔楼村一些地痞流氓入了天主教，强迫红毛五替他们建教堂。红毛五最初允许给他们建三间草房作教堂。那些教徒不允许，必须建筑三间石灰瓦房作教堂始可。红毛五既不欠教堂的钱，自己又不信教，白白给他们建教堂，已觉冤枉已甚，孰知建三间草房还不可，还必须建砖的，不但冤

抑莫名，而且经济力量也负担不起，乃找教徒崔二、打壶等说理。这些教徒不许可他讲理。这老人被逼无奈，用头撞他们。这些教徒见老人以头来撞，急忙躲开，使老人头触墙根，口吐鲜血而亡。邻人望见莫不大怒，地保也报告濮州知州。谁知德国传教士行文濮州知州，歪曲红毛五撞死的经过，濮州知州也根据德国传教士的公文，说红毛五年老糊涂自撞身亡了事。这些教徒不但未得应受的惩罚，还依然在崔楼村为非作歹，这才使人民忍无可忍，有‘砸洋学’之事发生。

“当时这个地区属于小地主阶层的人，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非到大祸临头，多袖手旁观以避祸，一般失掉土地的农民，无所牵挂，纷纷加入‘砸洋学’的队伍。这个队伍除以失掉土地的农民为主外，还有一些小商人和一个牙行的经纪与一个文秀才。这个队伍有四五百人，举一个牙行经纪为首领，到处砸洋学。我村中的参加者，他们的绰号当时编成一首歌：‘大牛、二牛、金山、三猴’，‘大喜、二喜、金山、瘸腿’。其实他们并不会念咒画符求神护身那一套，纯粹是被逼无奈。他们手持标枪，兼有拿火枪者，行军也没有纪律约束，砸洋学时，愿意去者则大家团聚，不愿意去者则各自在家，也有先去后来不参加者，也有先不参加而后来参加者，纯粹自由。参加‘砸洋学’者，一般人以好人目之，平日在家安然无事。教徒遇有砸洋学的队伍时则结队抵御。有一次我乡砸洋学的队伍，夜间往南走二三十里路砸洋学，为教徒队伍所追，砸洋学的勇士们感觉无法再退，乃在方庄南的一个河洼中展开了战斗，约肉搏半个小时，教徒们狼狈溃退。后来好事者将这回事编成戏曲，叫‘大战芦苇坡’，是因为这个

河洼中，遍生芦苇。后来‘砸洋学’的运动发展到曹州城里，曹州城内和附近人民也纷纷起来砸洋学，打进教堂，德帝主义的传教士，出教堂往东城门逃跑，沿途人民你一脚我一拳将德国鬼子打倒在地者有几十次，德教士逃出东城门以后往东北跑，隐匿在某一教徒家中。城内的教堂一霎时拆得片瓦无存。现在曹州府东门里路北巍然高耸的天主教堂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强迫中国人民拿出他们的脂膏来修建的，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为献媚帝国主义者，停止曹州一次秀才考试。

“这次运动很普遍，因为当时德帝国主义传教士非常凶狠，人民愤恨已极，有很多老太婆收集各家的水和面，将湿面块捏成小面人，说是德国鬼子，放在锅里，拿到十字路口用火煮。煮时嘴里还祝祷着说：‘千家面，百家水，活活煮死小洋鬼’。又有许多小女孩在十字路口哭，叫‘哭皇天’，说是能哭得玉皇大帝下界，来消灭这些邪魔外道。又有许多人将谷草束成草人，草人怀里写上德国传教士的姓名，和他的生辰八字，将草人缚在树上，半夜子时，用针扎他的眼，用刀穿他的心。说这样可以使德国传教士瞎眼和心痛而死。种种作法，不一而足，都足以表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恨。”

（二）永安教案（1898年）

广西永安州是太平天国革命发源之地，人民富于反抗暴虐的传统，他们对于天主教的渗透，对于一座座教堂矗立在穷乡辟壤，对于教士、教民恃强凌弱，为非作歹，忿恨已极，“禁止入

教的揭帖”早已在民间流传着。而西方传教士仍一意孤行，硬要在东平里蒙塞村修建教堂。于是，修建教堂与反修建教堂的民教矛盾最后发展成为流血事件。

1898年4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法国传教士苏司铎等三人在教民罗传生和十几名教徒前呼后拥下，耀武扬威，招摇过市，引起路人侧目，店铺闭户，以示抗议。他们进入州衙后，要求州官何璟祥派兵勇、肩舆护送，前往蒙塞村踩测教堂地基。州官一一依允。

当一行二十人至古排桥凉屯时，发现联兴烧酒店墙上贴有禁止入教的揭帖，传教士气急败坏，并对店主李元康百般刁难、恐吓，又打碎店内器物，还要罚店主燃炮谢罪等等。村民睹此不法行径，无不气愤填膺。聚集的数百村民在黄三、黄广祥等人带领下，冲进古排桥，与之论理。八名兵勇抵挡不住，与伕役跟随纷纷逃散。三名传教士开枪示儆，更引起村民的愤怒，在一场混战之中，均先后被击毙。

法帝国主义以永安教案为借口，对清政府提出极其苛刻的要求。最后议结为：

（1）北海至南宁的铁路建筑由两国合办；

（2）处理黄广祥、李亚安等三名“凶手”；

（3）知州被撤职；

（4）赔款四万两；

（5）允许修建天主堂①。

（三）南充教案（1898年）

大足余栋臣起义，对四川省各地影响很大，首先响应的是

① 《永安县志》；《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

川南充县，顷刻间教堂几乎皆毁。据《南充县志》载：

南充县乡民“二十四年（1898年）毁天主福音教堂。是年，大足县龙水镇民余栋臣将该地教堂司铎扣留，风传各县。于五月初五（1898年6月23日 —引者）午后，城中有以小儿衣鞋各件狂呼于市者，云称：‘此由教堂得来，洋人实食小儿。’时龙舟竞渡，闻者莫不深恨骨髓。于是大动公愤，毁室发屋，两教堂一时化为乌有。”①

（四）合川教案（1898年）

这次发生的合川教案，系受大足余栋臣闹教而起。民国《合川县志》略载，云：

“大足余蛮子事起，州城戒严，各乡始筑寨。来里人（“来里”，经考系指合川县西部邻近遂宁的地方——引者）毁教堂。”②

另据《合川县志》中传记部分记载此次教案情况：

“……先事未起时，州有莠民某，怙外教与邻竞，辄诬邻掠其家。不告州而愬其酋，酋遂自观察，使符下州，先生（指当时任合州知州的张熙载 —引者）乃知，为平心廉鞫其情以闻。观察重不厌酋意且开罪，复檄他官覆审，尽反其狱，责邻及团众偿之资。先生争不得已，乃出己金畀之。州民大哗，显得莠民甘心焉。会邻氛急，讹谣滋蔓，中或挟前衅，鼓煽众怒，则逐走教士执其答。先生闻，亟往镇抚，而已因法铎（指法国传

① 民国重修《南充县志》，卷6，第16页。

② 民国《合川县志》，卷5，第88页。

教士）燃枪外声，噪而火其庐矣。先生知不可已，即名卫法铎入署而捕尤不逞者，置之法，众即复合环署，索法铎，与俱死。”①

（五）铜梁教案（1898年）

四川铜梁教案也是受余栋臣的影响发生的。据史料载：

“戊戌年八月十二日（1898年10月9日）大足民余蛮子栋臣出至铜梁十五里之土桥场，有众六百，劫荣昌县荷包场之华司铎以行，无敢击者。县官范大骇，乃遣局绅八人出议和，许以犒金五百，不果交。栋臣遂率众抵城，屯老关庙。是夕，群情汹汹，合城市民守埝　余亦坐镇西城，巡警达旦，城中有内应者。匪党卒烧教堂，取黄司铎，索路金而后去。黎明，匪唐翠屏一股数十人据西郭寿隆寺，声言入城取司铎，亦与传餐、送食、犒钱二十缗始行。九月朔，本府李春如太守来查教堂司铎案，适范县请防之军亦至，人言本府来剿铜梁，于是局绅且虑其摘县印，而绅士受祸也。是夜调集乡团数千人入城，护守县署，几成民变。本府令余与随员李鹤亭调停。”②

（六）宜昌、长乐教案（1898年）

此间在宜昌、长乐发生的教案实系余栋臣的部众所为。张之洞的电稿，记有此事，云：

---

① 《合川县志》，卷38，第41页。

② 杜焕章：《畲经馆遗集自述》，年谱戊戌年。

“又宜昌县、长乐县教堂亦被匪毁，杀毙教民一名。长乐堂系巴东洋教士董姓兼营，长乐教民群奔赴巴，匪亦聚追害。又闻匪徒约期阳之担子山教堂，教民畏惧逃避赴宜。又该县亦有匪数百屯聚，亦谣传匪众二三千人，内多川匪、湘匪，将直扑宜昌并与施南匪联合等语。宜昌为上游商埠重镇，向无勇营，游匪乘机造言煽惑，谓系余党东扰。民教惊惶，洋人尤甚。”①

“巴东、长阳、长乐三处匪徒闹教，惨杀洋教士，焚杀教民，竟欲东趋川境，与余蛮子合夥。巴东一股，经地方文武驱散；阳、乐之匪，以山深地险，负固滋扰，闯入长乐县城，掳其县令、曲史，踞寨守险。经敝处派省城将领带勇数营，前往分头剿办，冒雪力攻，寨破城复，毙匪百数十名，救出各官。”②

（七）利川教案（1898年）

四川余栋臣等领导的反教斗争，不但在省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就连邻近省份也多有因之而起的，有的还借用余栋臣的名字，率民众打教，焚烧教堂。湖北施南府发生的教案即是一例。张之洞电稿（十一月廿九日）中说：

“自川匪闹教以来，湖北接界之施南、宜昌两府讹言纷起，匪徒群起与教堂为难。叠接施、宜来电：前月廿日（1898年12月12日），施南属利川县教堂、育婴堂被匪毁，并焚掠教民多家，系假诿余蛮子旗号。

---

① 《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② 同上书，光绪二十五年二月。

幸教士、女婴等经该县救出，教民亦未被杀。兵勇拿获匪徒七名，该县渐安。”

（八）沂州教案（1898——1899年）

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后，在山东地区引起了连锁反应。据不完全统计，此间发生的大小教案多达30余起。其中，沂州府所属的日照、兰山（今临沂）、莒县、沂水、费县、郯城、蒙阴、诸城等县也发生了教案，通称之为“沂州教案”。

沂州教案的起因，与德国侵占胶澳有直接关系。沂州府各县邻附胶澳，德兵的横行作恶与经济上的压榨使沂州人民受害极深。灾害严重，民生唯艰，也是引起这次教案的原因。据载：“沂州至今无雨，粮价日贵，故人心更觉不安。”人民在经济上受帝国主义、清王朝的剥削，弄得穷困潦倒，而政治上又受外国教会的欺压，于是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在沂属各县爆发。

沂州教案从光绪二十四年秋爆发到次年十月——直接与义和团运动相衔接——前后达一年有余。

诸城、莒县、日照三县，在光绪二十四年秋有二万余人攻打教堂，莒县、日照官府派兵镇压。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沂水、莒县交界处之圣母冢集民教相争，宰牛人田庄太被官击死。十二月十四日，沂水西北乡有二百余人打教，十七日兰山境内小太平庄民教相争，县令陈公亮遣兵，前往弹压，百姓四人被捕，其中郭某正患病，被县令仗毙。次年春，兰山县城东盘石崖村聚集五千人，包围县令陈公亮。陈命兵士开枪打死三人，伤无数。民众不但不逃，反而越聚越多。正在危急之时，省里救兵赶到，陈公亮才侥幸逃命。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兰山、费县交界处，由藏工仪、宋四等率领数百人，与官兵接火，官兵开枪杀死四十余

人①。

此案发生后，清廷与德国传教士安治泰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即开始谈判，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屈辱的清政府答应赔银七万多两结案②。

（九）即墨教案（1899年）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山东即墨大刀会王义训率领民众反抗洋教压迫。四月间，西乡男教友逃尽，有五十九家天主教民受到攻击。大刀会在崂山峪制造枪炮，声言“灭耶稣、天主两教之后，将洋人一概逐出中原”。是年五月三日，王义训被县令周永逮捕，大刀会集一千余人，企图劫牢③未成，遂散去。

（十）海门教案（1899年）

浙江海门农民出身的应万德，因家靠近天主教堂，常受洋教士欺压，痛恨外国教会。他和同村的夏金甫、王吾臣等结党会盟，齐心反教。1899年2月18日，应万德带领会众十余人到海门活动。法国天主教神甫李恩聪强令当地官府逮捕应万德。应万德得知后，便立刻秘密通知其子应再庚，带领反教会群众千余，手执枪炮器械，将教堂围困。只是由于地方官吏从中破坏，海门教堂

---

① 以上史实参见《山东时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二七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九日、一月二十三日、二月七日、三月六日、三月二十二日，及《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页。

③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1959年版。

才未被拆毁。但群众反帝斗争火焰并未因此熄灭，立即奔往洋均地方，将教堂全部拆毁，并把平时依势凌人、身穿洋服的华籍教士阮小本“撬眼削足，驱逐出境”①。十九日，应万德带领会众二三百人，到附近各乡村，鸣锣聚众，号召“护国灭教”、“从者益众”②。二十一日正式举旗起义。二十二日起义群众由黄茅山往太平县泽库，将教堂烧毁。各地起义群众，在应万德领导下，先后将黄岩县井泉、茅林、路桥、太平县城内、三荡庙、新河、隘顽所、石桥头、著横、温岭、泽国等十一所教堂焚毁。起义势力迅速发展到黄岩、太平、临海三县。

应万德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得到各地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据《汇报》记载，浙江“各地乡民闻应姓起事，立将当地教堂全行拆毁”③。太平县西境人民，受应万德起义的影响，也“揭竿悬旗，大书‘保清灭教’，一时声势汹汹，燃毁教堂数处”④。宁波西乡、大桥等地人民也起来反对洋教，“聚众滋闹，声势巨大，迫使洋教士逃走”⑤。余姚“三千多人，集合起来，奔向基督教堂声讨，吓得洋司铎不敢在教堂内居住”⑥。此外，台州、乐清、临海等府县，也同时发生烧毁教堂的事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外国传教士供认：“四方间有骚动，教堂孤立可危。”

法国侵略者得到应万德反教会消息后，立刻派兵船三艘，开往海门。浙江巡抚刘树堂，也调动全台州的兵力，围攻起义群

---

① 浙江巡抚刘树堂片录副奏折，原件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汇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七日。

③ 《汇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三日。

④ 《汇报》，光绪二十五年。

⑤ 《申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⑥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众。应万德领导会众，英勇抗击来犯清军，用土枪、土炮屡次打退敌人进攻，“先后杀死清兵百余人”，使清军“无计可施、实为棘手”①。此后，反动派采取镇压与收买手段，以二千赏金缉捕应万德，并打入起义者内部。七月底，清军再犯，由于起义会众内部分化，遭到残酷镇压。八月初，应万德、应万林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八月十一日被害。

但是，起义没有被完全镇压下去，反洋教斗争如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应万德被杀以后，夏金甫、王吾臣等领导群众继续斗争。八日十八日，夏金甫等再次聚集起义群众四百余人，携带枪械，齐集海门路桥镇北面，前往棚桥，将当地教堂围困，把“教堂司铎克忠（奥地利人）杀伤，教堂杂物捣毁一尽”②。十二月又将“声名恶劣，擅向农民勒租的黄岩县水边各庄天主教司铎处死”③。并把作威作福的洋教士李恩聪痛打一顿。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极其残酷地镇压和屠杀打教百姓，反教会斗争被迫暂时隐伏下来。

浙江人民的这次反教会运动，曾经提出了“护国灭教”，“保清灭教”的口号，与北方“扶清灭洋”、四川“顺清灭洋”口号联成一气。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危机，挽救民族于危难，是各个阶层人民的共同心愿，使更多的人参加反帝斗争的行列，有利于反洋教斗争的发展。一些官僚、士绅、地主阶级分子参加反教行列以后，原来比较单纯的反教会队伍的成份就渐渐复杂起来，对整个运动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护国”、“保清”的目的既有鼓动群众盲目排外的一面，也有反帝爱国的一面。至于这类口号没有反封建的内容，那是毫不奇怪

① 《汇报》，光绪二十五五年五月三日。

②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四日。

③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的，因为这些口号往往就是官吏士绅参加或支持以后才提出的；就是农民阶级也提不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口号，何况在国难当头之际，能有更多的人参加民族救亡运动是一件好事。所以不存在这类口号是对农民的叛卖，也不是统治阶级“精心策划”而成，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值得注意的倒是“东南互保”成立以后，浙江的官僚、士绅、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很快地退出反洋教行列，站在斗争的反面，镇压爱国群众，保护教会势力。与此相反，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仍然高举反帝爱国大旗，把运动推向前进。

（十一）郯城神山教案（1899年）

和山东其它各地人民一样，郯城人民不仅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传教士的压迫，同时还忍受着封建官衙和地主的残酷剥削与统治，过着非人的生活。郯城县知县仓尔爽的衙役和勇目王得成，就是个“动辄诬良民为匪盗，任事妄为”的恶棍，衙吏、书房也多半是以“词讼而丰囊”的赌徒。他们常常挑唆教民讼诉，强迫善良的老百姓出钱“弥罪”，从中敲榨勒索。教会的欺凌、官吏衙役的敲诈，是神山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主要原因。

神山系郯城县属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又称神山保，位于郯城北边，与兰山邻近。因为教案发生于神山，所以又称为神山教案。神山教案不单是发生在是神山的一地，它还包括了磨山保等地的斗争活动。

教案发生之前，神山富户杨清贤屡被无赖教民王方凯欺压勒索，告到县衙，杨清贤反倒落个“有意伤害教民”的罪名。1899年7月，杨借办团练为名，与杨振坤、杨振德、胡兆清等人以“抵制洋人洋教，均粮济贫”为号召，召集了四乡民众一万多人，一举捣毁了神山教堂，教士戈巴德逃匿。杨清贤把教堂的粮食、杂

物全部分给了贫民。农民的抗教匀粮斗争的声势很大，“远近附教者，均受其害”。斗争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饥民闻匀粮食，无不乐从”，一时响应参加者“万余人”。同时与神山邻近的磨山保和各乡都行动起来，震动了郯城全境。

神山教案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指向鱼肉人民的洋教、洋人，以及与洋教有关系的地主，即所谓“附教殷实之家”。有许多地主在群众的压力下，“情愿散放粮米”，借以保全“身家”，所以，“凡附教有余之家，均皆自托各附近首事，情愿散放粮米、银钱，如有三十石者，愿捐二十石……”据《沂属教案赔款清单》中载，郯城神山教案被贫民匀粮而“抢劫”的教民，共二百三十二家，杀毙七名，伤两名。中外统治者把参加这次斗争的人诬之为“匪徒”①。然而农民群众的纪律和高贵品质，时人仍有记载，说这些“乱民”虽系“乌合之众”，“闹教匀粮”，却“闻尚无任意强人讹诈等情事”②。这次长达四、五个月之久的神山教案，虽然被清军镇压下去了，但它对即将到来的义和团运动却起了拾柴添薪的作用。

① 《郯城县禀沂州府夹单》。

② 参见《王小斋致孙慕先书》。

第十章　义和团运动中的教案与传教士

（1900—1901年）

列强各国瓜分中国的阴谋日趋明朗，经济侵略日益加深，教会势力更加猖獗，从而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信仰、民族、生存三大危机。危机日趋严重，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日趋激烈。最后，“隐忍有四十余年”①的中国人民，被逼到“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利害，我们都伴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②的地步，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洪流，是由数十年上千次涓涓滴滴的反洋教斗争汇合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全国性的大教案，也可以说，没有反洋教斗争，就没有义和团运动。故此，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斗争的最高潮，反洋教斗争又贯穿于运动的始终。

义和团运动的初期形式及斗争目标完全是对着教会、不法教士和不法教民，而且斗争较之以前更为激烈更为广泛。于是，出兵“保护”教会、教士、侨民就成了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中国的借

① 《义和团》，第4册，第24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2，第43页。

口，教会也就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教士们则成了他们进行侵略的特种先头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义和团运动和各地反洋教斗争必然会迅速地发展成为焚教堂、杀教士、惩教民、抗击侵略军的反帝的民族救亡运动。

由于腐败的清王朝苟且偷安，自愿充当各帝国主义的“洋人朝廷”，便与侵略者勾结起来，出卖和镇压了英勇悲壮的义和团运动。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完全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起到了各国政府、侵略军和炮舰所起不到的坏作用，他们完全撕下了布道者的遮羞布，干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历史就是这样把一切善恶如实地记载下来，让后世来评论其功过是非。

一、以反洋教为导火线的北方义和团运动

1900年春夏之交掀起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义和团众除了和八国联军作战外，更主要的仍然是焚毁教堂，打击不法教士、教民。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多的时间里（1900—1901年12月），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近3万人；外国基督新教教士188人，教徒5千人，教堂约四分之三被毁。

记录这一次事件的书籍，有基督新教广学会季理斐牧师（Rev·D·Mac Crillivray）所汇集的《庚子教会受难记》二册 与圣教书会柴莲甫所集《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专述基督新教教难情形。《拳祸记》、《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和《圣教史略》中，附载有天主教“教难”情形。

今天分析这一不幸事件，如果从一方统计资料，撇开酿成事

件的社会原因，可以说是一次盲目的排外运动，是不人道的，甚至可以说是愚昧的。但是，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教会势力横行乡闾，中国人民在三大危机日益激化的苦难岁月，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死于沟壑，多少人惨遭教党武装的杀害，多少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侵略军和清政府屠戮，其总和绝不是以万计，也不是十万计，而是以百万计。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仅7月9日到14日就屠杀人民多达三万人。又如，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进行报复，仅在河北省任邱县一个小村庄，就一口气砍掉了680个人头。这是人道的行为吗？这是西方所谓的文明行为吗？列宁说："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那些用传教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憎恶他们吗？"①。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后，由于袁世凯的残酷屠杀，曾一度陷入低潮。到1900年5—6月间，在清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义和团进驻北京，斗争达到高潮，席卷了华北，波及全国大部分省份。此时，义和团众之所以攻教堂、杀洋人比较顺利，是因为此举得到清政府的明令允许。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慈禧所颁上谕曰：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勉允新请……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附循，彼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意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①

这份宣战上谕一公布，义和团众如同火上加油，任凭何种势力也难控制。这烈火从北京、天津烧到辽宁、黑龙江，烧向内蒙，烧向河北、山西，跨过长江，震动了江东各省，燃向四川、云南、贵州。攻打教堂之势如同燎原烈火，几百座教堂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毁掉了，数以几万计的教士、教民死去了。这个大的事变，被外国人称之为“灾难”。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2——163页。

（一）义和团在北京

1、团民围攻教堂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闻本国使馆卫兵将至，乘车出永定门迎接，为董福祥所见，命兵士将他杀死。接着到处焚毁教堂，屠杀教民，京师大乱。京城内外所烧毁的西人住宅共有34所，教堂18所，男学堂12所，女学堂11所，传道学堂四所，施药局12所，医院8所，印刷所3处，盲人学堂1所，天主堂2所。杀死的人不计其数。

义和团首先攻打天主教北堂（西什库教堂），同时火烧东、西、南三堂。6月13日（五月十七日），团民自崇文门进城时，遭到把守崇文门亚斯理堂的美军截击，伤亡多人，团民愤激，开始焚燃教堂。是日晚9时，东堂起火，直至第二日晨，火焰未熄。11时，南堂医院、学校、育婴堂和教堂同时起火。15日，西堂也着火①。

同日，北堂东、西、南三面全被团民包围，法军开炮射击，团民47人身亡。团民大愤，纵火焚烧教堂南面的房屋，遂即离去。适值大沽炮台陷落和各国援军向天津进犯的消息奏到，那拉氏深虑京中清军董福祥、马玉昆等部处在20万义和团包围之中，有尾大不掉之势，社稷虑堪，她希图利用团民的义勇忠烈，惩罚外国侵略者，又想利用外国兵力，翦除义和团，乃发布宣战谕旨。于是，义和团和爱国官兵于6月22日开始围攻北堂。此时，南堂有意、法等国士兵及教士、教民共计3420人，由教士亨利、樊

① 《遣使会年鉴》，卷66，第80页。

国梁等负责指挥防守。相持数日，未破。从6月27日起，团民除用炮火轰击外，又向堂内放射“火箭”。6月28日，北堂东门起火，团民趁势以火油灌入水龙内向起火之处喷射不止，火势益猛，烈焰冲天，火光怒发，光明如昼。数日后，团民又向堂内发射尾部带有火种的一种新式“火箭”①。这种武器内装炸药两公斤，燃烧可达15分钟之久，“力大穿屋，一如炮弹，犹有失火之患”②。此后，双方在进攻、防守方面，激战月余，互有伤亡。7月30日，亨利中弹身亡。堂中已失所恃，乱成一团。团民乘机用箭将劝降书射进堂内，劝说教徒在此穷援之际及早回头，放弃洋教并交出樊国梁和林懋德二人，性命即可安保无虞，不然，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斩首不赦③。劝降未成，清军和义和团继续每日炮击，并挖通道，埋置地雷，北堂已旦夕可下。

但是八国联军于7月14日陷天津后，急速驰援北京。环列京畿一带的清军，足有八万之多，联军不过四万。以众御寡，以逸待劳，不难取胜。但那拉氏这时却把责任推到主战大臣和义和团身上，一意主降，不愿意抵抗。所以联军发动进攻以后，陈泽霖、张春发、夏辛酉、万本华、李秉衡等所部兵勇，纷纷溃逃。8月13日深夜，英、美两国军队到达永定门外，另一支日本军攻破朝阳门与东直门之间的一段城墙，“旗兵神机、虎神等营，闻洋兵一至，如狼遇虎，而鼠遇猫也”④。义和团没有重武器，无法久守。8月14日北京陷落。法公使华盛立即与法将军傅利

---

①此种火器是用长约70厘米、直径10厘米的铜管制成的，尾加一木柄，有3米半长，其尖处为锋利的三棱形。

②《樊国梁日记》，中文版，第16页。

③ Pekin Par Leon Henry: “Le Siege de Petang Dane en 1900”，第123页。

④《义和团》，第1册，第92页，“时事纪略”。

（Frey）磋商，驰救北堂。傅利怕自己的兵力不足，不敢挺而走险，遂会同各国统兵大员，悉心妥筹，准备抽拨兵勇，驰往北堂营救。16日晨，傅利率军取道顺治门，向西华门进攻。驻守西华门的义和团和董福祥军队，浴血奋战，终于不支，渐渐撤退，联军由西华门进入北堂①。

2、团众围攻使馆区

一个被围在英国使馆的基督新教牧师把当时情况写信寄给英国朋友，记述义和团围攻使馆区的情况较为详细，虽角度不同，但可以作为参考，从中可知当时双方攻守的激烈情况。他说：

“我们被困到如今，差不多五十天了，虽然曾经派了许多送信的人。但能从天津回到北京的，只有三人，其余都在路上被杀，所以信息全无，外边的事情，一概没有知道。……现在被围在使馆里的，除了西国人之外，一共有二千多中国教友。离馆九里路远的地方，有一所天主堂，俗名叫北堂，也有二千多教友，被拳匪围困在里头，只有四十个法国意国兵在保护，我们不能通信，不知道现在平安不平安？但听见北面枪炮的声音，没有停止罢了！……

从五月二十四日起，拳匪日夜不断的放炮攻打。受困的一个武官，曾经在西国打过好几回仗，他说：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凶狠的敌手。有一夜，天下大雨，雷声隆隆，拳匪趁机加紧来攻，炮声雷声，搅成一片。他们看用枪不能取胜，就排大炮进攻，我们都有点害怕，恐怕所防守的墙垣要守不住了。曾有人计算过，开花炮弹落在院子里的有二千八百颗之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受伤。他们在内城的城墙上正对着公使馆北面安排了两个

① 《遣使会年鉴》，卷66，第87页。

大炮，向下攻打，墙上都被打得破烂不堪。西国小孩子，常常在院子里，用小筐拾弹子做玩意儿，像不知道有拳匪在外打仗似的。各国公使馆里，受损最大的，算法国德国两处。妇女们一天到晚缝布袋，盛着泥土，做破缺处的防堵。防守的各西兵，只有枪没有炮，所以渐渐有不能抵挡的样子。……。

六月十七日下半天，攻打得最厉害了，他们在法国公使馆放了三个地雷，把房屋轰掉大半，又伤了许多人，医院也被打毁了。为了防备炮弹，特地在空地上挖了几个窟窿，预备给妇女孩子们躲避。有一天，阵亡了一位军官，正在把他抬到树下葬埋的时候，忽然一个开花弹飞来，打在树顶上，赫得大家四散奔逃。这两个月里，西国人死了六十，伤了一百四十，现在围困在府里的，一共有十七国的人。七月十八日，我因病躺在床上，听见救兵已经到了天津，拳匪知道救兵快到了，更加拚命的打，院子里的子弹象雨点一样，晚上也拚命地打，拳匪头目催紧，许进不许退。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听见城外炮声，知道救兵已到，大家胆壮起来，更加用力的抵抗了。

二十一日午后，救兵打破京城，打退了拳匪，大家都同声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①

（二）义和团在天津

当义和团运动在天津蓬勃发展之际，一些为非作歹的教民纷纷逃亡，腿长的逃到天津紫竹林租界，腿短的则躲藏到附近的有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7章。

武装的大教堂里，继续与义和团对抗。团民把这些人呼之为“二毛子”，对这些“二毛子”绝不轻饶，轻则受罚，重则砍头。但对一般被迫入教者则给予宽恕。团民捉拿“二毛子”，一般是先有检举，然后再调查，实属罪恶多端的，要捉到坛口审判。团民们深知教堂是帝国主义进行罪恶活动的大本营，是侵略中国的据点，也是人民最愤恨的直接对象，所以义和团起来后，首先是攻打、烧毁教堂。1900年6月14日，义和团在落垡围击西摩尔军队的当晚十二点时，天津城内的团民就在清军杨寿臣等部的率领下，把仓门口、西门里、镇署前三座教堂同时焚毁。次日午后，又焚毁了天后宫北教堂，晚上又烧了望海楼教堂、马家口教堂等。

当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传教士就成了八国联军中新来的“军官”，大施淫威，进行报复。一个叫梅子明的传教士在他的信中说：“必须把义和团的头目们搜查出来，并尽可能地给予惩办。我马上就要开始干这个行当……我们已经抢劫到足够的东西可以过冬了。”①在他们对北京、天津进行复仇报复时，“每天都要开设临时公堂，把乡间犯有不论是捣毁教堂或教徒之家的人带上来，……审讯象是看戏一样，出现很多滑稽、荒唐的场面”②。他们复仇的口号是“用人头抵人头”，杀害无辜。他们为发泄仇恨，对无辜的善良百姓软硬兼施，强令他们下跪，进行逼供和敲诈③。

（三）义和团在山西

当京津义和团活跃时，太原、太谷靠近榆次的村镇，到处有义和团活动。他们在斗争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侵略

①②博恒理：《梅子明传》，第190—211、224页。

③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0页。

者、教堂、传教士，以及被其所收买利用的不法教民。1900年6月20日，在太原发生“民教哄闹”，结果，太平楼街法教堂墙间有砸毁，柴市角英教堂毁损门窗。同日，大同教堂也被打毁。6月26日，一批“北方义和团”进入太原城，在抚院设拳场，第二天夜里火烧英国教堂，黑烟环绕，火焰烛天，一夜之间，尽成灰烬。7月中下旬，晋南地区也有聚众“与西人及教士交哄”的事件，如平阳即有“拳匪聚众持械呼啸过市”①。8月间，太谷义和团纷纷进入县城，烧毁南门街教堂。此外，象隰州、孝义、大宁、泽州、宁乡、临县、寿阳、阳曲、五台、徐沟、潞城、高平、长子、汾州、忻州、曲沃、河津、文水、蒲县等地，都展开了反侵略斗争。据事后来任的山西巡抚岑春煊奏报说，有义和团活动的共11州、6府、40余县。其中18处杀过教士，其余各处是杀教民，而在阳曲一县，就杀死外国教士40余人，全省杀教士150余人，烧毁教堂70余座，使在山西的传教士一时绝迹②。

这些教士、教民之所以被逐被杀，系平素积恨太多。再加上地方官吏袒教抑民，人民积冤莫伸，一旦骤然爆发，不可遏止。如当时巡抚毓贤上奏参劾已被参革的孟守营守备李富时说：该犯之胞叔李四儿，亦随洋教多年，无恶不作，已为拳民所杀，当饬员弁赴犯家中，起出火药7大瓮，又4口袋半，火硝13大盆，是其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该犯之胞弟，辽州粟城营把总李长，恃其叔侄兄弟皆随洋教，串通一气，欺压善民，百姓恨之切齿。”③

当义和团已经兴起时，有些教士、教民继续为非作歹。如

---

①《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3册。

②参见李喜所等译：《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

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萨拉齐①地方，天主堂教士石姓等，将民人高占年等焚杀九命”，结果，“各处闻知，均公愤不平，旋据应州、浑源州、阴高县、丰镇同知、大同府、大同县陆续禀报，均有焚烧教堂情事”。又如，太原“民教哄闹，鲜由华教士先放洋枪，以至众人忿争”。可见冲突多是由教士、教民挑起，义和团基于积恨，只好逐杀他们。

（四）义和团在直隶

直隶各地的义和团，受到山东、津京及山西的影响，也异常活跃。当北京城内闹得天翻地覆时，直隶省各城各村应声而起。教徒们在传教士带领下，纷纷聚集起来，组成教堂武装，掘壕筑垒，以备抵御。教徒聚众备械，抗拒官兵。官兵乃助团民围攻。如景州朱家河，成为景州教士、教徒避难麇集的地方。适李秉衡率兵北上，其陈泽霖部路过其地，遭到教民武装袭击，军中义和团奋起反击，一千多教徒与两个外国神父皆被杀死。南皮县吉行村也发生教堂武装袭击清军和义和团的事件。团民攻破防线，怒杀聂、鲍二神父与一百多名教徒。宣化府有数百教徒持械匿避山洞中，团民积薪洞口，悉数烧死。献县地方活埋了一百名教徒与教士。巩村地方，有团民一队来搜捉教会中人，将作恶多端的赵牧师及刘姓教徒杀伤。保定孟继先牧师，他劝教徒们都躲到别处，自己与西牧师等留守殉道，后来被团民杀死。美以美会的教徒被杀死的，据一个传教士当时的报告，说在开平有45人；另外在逃到天津的路上被杀了3人，因逃难而饿死的6—7人②。

值得单独提及的便是保定地区。义和团运动前，保定地区人

---

①今内蒙托克托地，当时属山西。

②参见《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3册。

民反教情绪就很强烈。平日教士搜罗一批地痞流氓，或用引诱威胁的办法，拉人入教，供其驱使。一些匪盗之徒投靠教堂，以此为护符，仗势欺人。教会实际上成了外国侵略者和强盗、土匪、恶霸、劣绅的混和体，教堂变成了他们进行罪恶活动的大本营。而外国传教士的横行不法，更为广大人民所痛恨。因而山东义和团传入直隶后，保定地区广大人民便立刻起而响应。他们散发揭贴写道："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他们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千百成群，往来游荡，无处不有"，"毁铁路、杀洋匠、焚教堂、攻圩堡、戕教士"，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新城、定兴、涞水、易州、固安、涿州、雄县、霸县、文安、任丘等地广大农民，也群起响应，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帝洪流。

尤以保定城内、清苑县东阎村、徐水县安家庄三地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向天津进攻的消息传到保定后，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在教堂工作的中国仆人，也都离去。义和团作战更加勇敢。团民把守保定城门，焚烧了北关美国长老会教堂，处死美国教士罗子云。7月1日，团民冒雨奔向南关，攻打美国的公理会和内地会。他们冲入公理会，生擒平日横行的教士、教徒近百人。有六个英美牧师逃到清军兵营中求救，营官王占魁慑于义和团的威力，把他们送交义和团处死。群众也和义和团一起，抓洋人，拆教堂，夺回教堂霸占的财产。保定地区的义和团与活跃在京津的义和团遥相呼应，把这场斗争推向高潮。

（五）义和团在内蒙古地区

山东、直隶等地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在内蒙古地区的义和团也提出了"保清灭洋"、"杀洋灭教"的口号，主要

锋芒是针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流传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义和团歌谣有："扶大清，杀洋人，拔电杆，翻铁道，随后剿灭天主教。"①

内蒙古西部各地的义和团发展起来以后，运动象火山爆发似地不可遏止。他们围攻教堂，焚烧"洋鬼子"的房屋，遇传教士"即杀之"。对于平时为虎作伥的"二毛子"，也给了应有的惩罚。对于一般的教民则首先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脱离"洋鬼子"的控制，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如果愿意，即予释放；顽固不化，替"洋鬼子"的暴行辩护的，才遭杀戮②。

《拳匪祸教记》记载：在土默特旗"教友中富裕者早已被抢，六月十二日，匪抢缸房营村会长张殿蛟家，阅数日……又抢寿阳益新友班文仁家，得谷数百石，银数十两"③。这里所说的"教友中富裕者"、"会长"和有存谷数百石、银数十两的"教友"，实际上都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卵翼下的地土恶霸。到7月间，这里的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东至察哈尔西四旗、兴和一带，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一带，北至乌盟四子王旗，南至伊盟鄂托克旗、乌审旗的最南端城川和小桥畔，凡是有"洋教堂"或"洋鬼子"的地方，便有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斗争。

在蒙古的天主教共分三区，东教区因滦平知县郑文钦仇教，司神被活埋；中区西湾子总堂有教徒五、六千人，武装抵抗，在与义和团较量后，有3200多人被杀，内有神父5人；西南区杀死教徒800余人，内有神父4人。基督新教在法库边门地方，也受到冲击。

---

① 《拳匪祸教记》，第313页。

②③《拳匪祸教记》，"蒙古教难"篇。

（六）义和团在山东

山东原是义和团最早的发源地。李秉衡做山东巡抚时，即是提倡义和拳最先最有力的官员。星星之火，从山东蔓延到山西、直隶而成燎原之势。1899年，肥城县发生杀死英教士的事件，次年曹州大刀会在这里闹教。袁世凯到山东后，残杀团民及百姓，使山东义和团发展大受影响。所以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山东事件并不显著。当西太后颁布了宣战的上谕后，袁世凯不得已令西教士暂避到海口租界，一面把教堂房屋借查封入官为名，以防被义和团毁坏。但在潍县、乐陵、泰安等处有捣毁教堂、攻打教民的事发生，教徒被杀死290人。潍县有个学堂叫“乐道院”，也被团民焚毁。潍县焚毁洋学堂之事，很快传到省内四方，各处义和团又有再起之势。如乐陵县知县何业健发布告示支持义和团，故滨州一处，有中国教徒89人被杀。黄河南岸泰市里的小地方，有24人被处死，菱槲地方有11名教徒被杀死。乐陵西仓上一处为上帝“殉难”的有17人，魏家仓有38名教徒遭击毙，该村教民房屋尽被焚毁。朱家寨的西人住宅、医院、学校、教堂都遭焚烧。山东省情况不如山西、直隶严重，原因是袁世凯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使义和团元气大伤。

（七）义和团在东北地区

在1900年春夏之交，辽宁、黑龙江继山东、直隶（河北）之后，也开始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并迅速地发展起来，配合山东、直隶等地的斗争把运动推向了高潮。

1900年春天，山东、直隶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它们的斗争事迹，由海路陆路传入辽宁。与山东、直隶两省相接壤的营口、朝

阳、旅大、锦州及辽东地方，先后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营埠（营口）左近，自正月间起，有所谓义和团者，专以传教惑人，……营埠有无数幼童皆往演习。询以练此何意，则众口一词，皆以预备逐杀洋人为言”①。朝阳自初春开始，“至三四月间，渐有义和团左道惑众情形传于乡里”。四月，在旅顺工人中也发现了义和团的揭帖，提出要在中国境内禁绝天主教、耶稣教的传播。预言“神明大怒，先去雨雪，降下八百万神兵，扶保中华，逐去外洋”②。五月，在辽东一带也有人教拳法，“男称义和拳，女称红灯照”。六月二十日（7月8日），营口的义和团散发揭帖，号召人民“根除洋人”，说“义和团上能保国，下能护民”。

1900年7月22日，义和团与副都统晋昌的育字军联合拆毁了辽阳附近沙俄铁路桥梁，这标志着辽宁义和团直接与帝国主义进行战斗的开始。

7月26日，义和团民众在首领刘喜禄、张海（张岔牙子）率领下攻打奉天（沈阳）的所有教堂。盛京副都统晋昌亲自带兵帮助义和团，首先攻入南关天主教堂，法国传教士纪主教、艾李二教士和教徒一百多人及许多妇孺，尽被杀死。团民们烧毁教堂及教徒的房屋。还杀死了许多基督新教教徒。在新宝堡被杀的基督新教教徒有42人，永陵有23人，旺清门有14人，上夹河有2人，怀仁县有10多人，八家子有3人。在宁广一带，也有50多个教徒被杀。新民屯等处一共死了38人。天主教被杀的更多，单在奉天一省，就有1500人，内中有1个主教，10个外国神父，3个中国神父。辽宁人民的斗争，给帝国主义的打击是很沉重的。据一本外国传教士主持发行的书籍统计，“经义和团打击后，东三省

①②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1册，第239页。

教徒背教反俗者九千余众"①，"辽宁地区当然不少。过去所谓'教区教务顿呈突飞猛进之气象'，一变为'颓废已极'"②。

吉林、黑龙江的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较晚。1900年5、6月，在南满一带的义和团迅速发展起来后，这时在黑龙江省各地的义和团也逐渐盛行起来。双城、宁安、呼兰、绥化等地，凡有外国教堂的县，大都出现了义和团。齐齐哈尔当时还没有外国教堂，但也成立了义和团。根据一些调查材料和有关文献的记载，各地义和团一开始就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传教士及教堂。如双城义和团"称为义和神兵，领头的姓柳，还有文子贞等人，扒了西街的美国教堂"③。宁安义和团"由城东菜园子姓张的山东人发起，当时有200多人，武器为刀或扎枪，扒了南关道东的教堂，捉住反抗的洋人处决于北门外"④。呼兰义和团不但拆毁教堂，"并将所害教士之首悬诸庙门"⑤。在反帝斗争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一些城市居民也卷入了斗争。如在绥化，"有一神父荣司铎，被拳民追迫，逃入一外教家，为主人击毙"⑥。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对外投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把义和团进行的反帝斗争看成是"罪过"。黑龙江省的统治阶级也秉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子的旨意，开始迫害义和团民。这时省内起义人民多"挺身走险，啸聚山林"，继续进行着反帝反清的斗争。他们常以"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

---

① 《满洲基督教年鉴》，伪康德五年版。

② 《满洲天主教教务年鉴》，1938年版。

③ 黑龙江省博物馆调查资料：《双城县居民张兴邦、张玉访问记》。

④ 同上，《宁安镇居民傅玉民访问记》。

⑤ 《义和团》，第3册，第205页。

⑥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5页。

俄军，使其坐卧不宁”①。义和团运动后，黑龙江人民始终没有间断过这种斗争。

（八）各省人民纷起响应

当义和团反帝运动自山东发展到直隶以后，声势更加磅礴。在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影响之下，中国的中部、西部、东南部、西南部等都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河南巡抚裕长（裕禄之弟），浙江巡抚刘树棠，河南巡抚俞廉三，江西巡抚松寿等等，在当时都倾向于义和团。在河南境内，教堂被毁者十之七八，教徒数千家遭攻掠。浙江以卫、台二州为最烈，教堂与教徒家无一幸免，亦有多人丧命。东南地区要数浙江的反洋教斗争最为激烈，除了秘密会党终南会发动了重大的衢州教案外，还有1900年7月，温州神拳会运动（诸暨白旗党起义），另外尚有宁海一带的伏虎会反教领袖王锡桐（王锡彤）领导的反洋教斗争②。1900年，安徽一省还发生了婺源、宿松、建德三处重大教案。

湖南的反洋教斗争历来处在前列，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人民反洋教情绪更加高涨，加上西太后宣战并支持义和团，湖南衡州道台隆文、知府裕庆与北方仇教大员遥通声气，乃有衡州重大教案发生。

各省人民同时纷起打教，是对北方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声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新觉醒，他们共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尊严，坚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再爆发，为新民主主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① 《义和团》，第3册，第82页。

② 伊芬：《王锡彤闹教始末记》。

二、传教士——八国联军的特种部队

1900年 8 月14日，八国联军突破义和团的英勇抵抗，攻陷了北京城。这群一向以“现代文明代表者”自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神圣领土上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罪行。联军过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房屋尽成瓦砾，妇女惨遭蹂躏，财物洗劫一空。就连联军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①有关这方面资料记载颇多。一个俄国的随军记者曾这样记述说：“帝王的伟大京都一半已被破坏和焚毁，已被蹂躏糟踏的不像样子了，简直象一切都已死绝了一样。”②中国几千年保存下来的文物古籍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侵略者抢劫后，为了消灭罪证，纵火焚烧北京城，使多少琼宇峻阁化为瓦砾。1900年北京在“一个月期间，……被文明的联军洗劫一空”③。“被枪杀与刺死的中国人，堆堆地陈尸在大街上”④。八国联军又以搜杀义和团为名，乱杀人民，以致“尸积如山”⑤。从“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⑥的诸多记述中，充分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残暴罪行。自诩“文明”的西方各国，用枪炮刺刀涂抹了一幅幅原始群残杀对方的令人怵目惊

① 《义和团》，第3册，第31—32页。

② 《八国联军目击记》，第337页。

③ 同上，第336页。

④ 同上，第335页。

⑤ 《庚子国变记》，第49页。

⑥ 《义和团》，第1册，第99页。

心的画面。是“文明”抑或“野蛮”？中外正直的史学家早有定论。

在这场罕见的大抢劫、大屠杀、大破坏的悲剧中，“仁慈上帝”的孩子们——传教士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一）传教士在洗劫北京中的罪行

那么，在八国联军侵华及攻陷北京并洗劫中国时，天主教、基督新教的传教士起了什么作用呢？请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当天，天主教北堂（西什库教堂）被解围前夕，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发布的一份布告：

“因大罗马教宗之恩宠，我，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通告你们以下事项：

围困即将结束之时，你们来北堂投奔我们，你们表现很好，日夜祈祷天主、圣母及诸圣，求得早日得到解救。天主和联军的力量终于奇迹般地解救了我们，应当感谢天主。但是，解围的喜悦不应妨碍你们的安分守己和感激之心……你们之中，有人到被烧或被弃的房子里去寻找吃、烧，甚至银钱等物，据为己有，此举是完全相反公道，不应继续。至于联军，他们所需之物，皆取而得之，那是军官之事，也是军纪问题，与我无关。不应忘记，他们曾经为保卫北京而流血，他们所有的权力，别人是没有的。

我们北堂，曾接受法国领事的委任状，得以为你们这些丧失一切的难民准备吃、穿、烧等日用所需。我规定了条件，即：领事将从赔款中扣除我们现在所取财物之总值。你们不是联军，也没有委任状，你们是中国人，没有权利筹备日用，到被烧和被弃的房子里去拿东

西而据为己有。为使众教友免于冻饿而死，一切都应归公，堆放一处，然后大家均分。为此我颁布以下命令：

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折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

2、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

3、如所抢之物，不论为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我们要把公物中的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给教友，谁也不能特殊。赖天主之保护，切愿能救助京城内外的教友，不致有人冻饿而死。希望人人都守好上述规定。如我们所知，你们都是好教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统计，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

北京教区主教　樊国梁”①

这是动员抢劫的布告，不仅记载了联军的罪行，也把传教士煽动抢劫的行径载入史册。樊国梁限制教民抢劫数超过五十两的要“归公”，当然是归到主教、教士掌握的教堂。教堂不仅成为窝藏脏物的地方，不怕亵渎“圣灵”，而且最后都流向神职人员的私囊。主教和副主教堪称是“大窝脏犯”，并且不要向上帝“忏悔”。

樊国梁在他下令行抢的第二天（8月17日），准备抢劫皇城根边的礼王府，礼王是赞助义和团的，也曾经给了义和团一些物资

① 《遣使会年鉴》，1901年，第229—230页。

援助。为此，被樊国梁等恨之入骨。然而他也深知公然抢劫一个偌大的王府与一般的打家劫舍有所不同，目标过于显著，难免不引起外人议论。为了万全之计，他一面主使教民闯入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一面又亲自去找法国公使，只须从他口中透出“许可”二字，樊国梁就可以少担许多干系了。在他给巴黎遣使会总院写的一封信里追溯了他和法国公使的那段对话：

“我说：是否在救出了这些受到法国保护的人们以后，却要他们死于饥寒呢？

——不，主教，中国政府显然是应当也将会赔款的。事情非常清楚，这件事是必须首先交涉办理的问题之一。

——然而，这些赔款是有得等待的，即使你尽力催迫，恐怕在六个月之内还是什么也得不到。而在这以前，我们的全体教民都要冻饿而死了。

——主教，你需要什么，就到周围去拿吧。你的权利是很明显的，只是要避免起初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抢劫行为。这种行为是别人不会赞成不能容忍的。

——我们将按照战争期间必需的征收办法进行。由于迫不及待，我们得先拿生活必需品：粮食、烧火用的木材、煤炭、衣服和必要的钱。也要拿钱，因为我们不能到城外给一百到二百秆以外的教民去送粮食。那边的教民遇到了在北京城里所遇不到的事。

——要用钱去买生活品，可他们手中又没有钱。”①

实际上，就在法国公使对樊国梁谈什么不可抢劫的时候，教民和外国人已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有人说，光是从礼王府拉走的元宝就装了四十车。樊国梁本人说这是谣言，他承认不过

①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67页。

抢了十二万两银子，只装了四、五车。这话已是令人难以置信了。可是还有更令人发笑的，那就是樊国梁说，他抢了十二万两银子以后，屈指一算，大约可以维持全体教民（京城内外约二、三万人）一年的生活了，于是就下令说："不用抢了。"据他说，当时要再多抢一些，是很方便的，可是他却不愿意那样作。这种掩耳盗铃的谎话，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在别处，教民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都作证说，樊国梁曾经到庆王府拉银子、宝物，还从李莲英宅内拉了许多古书、花盘、玉器，以致北堂院内诸物堆积如山①。

《庚子使馆被围记》的作者在联军进京以后，曾经亲自到北堂查看，结果竟"未遇一人，皆以外出征收捐银……教士、教民、水手……均出门各行其事，以偿其损失也。予等所寻见者，教民数人方堆其元宝而已。此已变为教会之产业，由劫夺之神权而得之，似亦均不以为奇矣"②。此时北堂里的教民倾巢而出，四处掠夺。

1900年12月14日的法国《北方醒报》（Revil du Nord）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叙述说：

> "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们干了。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作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铺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①

---

① 天津宗教界史料编委会：《史料选辑》第5辑：《西什库被围记略》；《史料选辑》第15辑：《庚子见闻录》。

② 《义和团》，第2册，第358页。

教士、教民当时横行不法的情景，已经由这个回国士兵刻划得不能再真切详细了。

樊国梁这个一向披着宗教外衣以“卫道者”的面孔出现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一次竟然公然组织教民打家劫舍，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了强盗面目，这对帝国主义进一步推行其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政策是十分不利的。先是在欧洲几家报纸上出现了攻击樊国梁的文章，后来连法国国会议员也流露出了对樊国梁不满的言论。巴黎遣使会总院连忙将上述种种反应通知了樊国梁。樊经过一番审慎思考，想出了一套对策。不久之后，法国的一些教会报刊上，例如《高卢报》（Gauloie）、《费加罗报》(Figaro)、《传教杂志》（Missions Catholiques）等就接连不断地刊载出了《一个不在场者（指樊国梁）的反驳》、《樊国梁主教的一封公开信》、《巴黎遣使会总院会计的谈话》之类的文章，为樊国梁组织教民抢劫的行为辩护。樊国梁所执一面之词，破绽百出。如言三万“教民的急需”，据载，截止到1905年，北京城内教民总数不过6246人。至于城外各县教民，皆有“地方赔款”可得。如直隶省新河县芝芳头村唐智多，依恃教堂势力，“凡村庄殷实居民及有比睚宿怨者，唐智多立指为‘拳匪’，呈请县长罚款，不至荡产不已。……县长吴庆祥更助纣为虐，从而袒护之，唐智多妄为，肆无忌惮，乃率教徒割收各地麦田”②。又如苏家房子庄天主堂的神父“就下旧保安（涿鹿县）见州官，手中拿六轮子，又要人，又要钱；畅大老爷（州官）当下给神父赔错，又赔银子二百两”，后来又勒令灰窑子村给天主堂银一千两③。再如，聚集在京东双树村的教民，依仗洋人势力，坐地向教外人筹

① 见《进步日报》1951年8月17日：《庚子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梁的抢劫行为》。

②③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年版，第55—56页。

粮、筹款，一直盘踞一年之后，方才满载而归散回本乡①。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可见京外教徒生活有着，不致无钱“去买生活品”。再如，所谓的抢劫总值为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枚，樊国梁的这一谎言更不可信。1901年1月9日的《纽约先驱报》（Newyork Herold）登载了下面的惊人消息：

“北京讯：曾任外交要职而为反对排外运动被西太后免职的立山（原作Lix—Sen）的家属控告法国主教樊国梁，说樊曾去其家行抢，劫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这一家并说已探得这一宗被天主教徒劫去的珍宝现在美国二等秘书斯奎尔（Squiers）手中，正准备运走。”②

樊国梁为此大为恼火，在欧洲和回到北京都大肆活动，以掩盖其罪行，甚至说“我并不认识这个Lou—Sen”③。后来又找到立山的儿子谈话，无非是证明不可能从立山家中抢到价值一百万两的珍宝。然而柴萼在《庚辛记事》里载有：

“杨玉甫尚书立山家有朝珠三百六十五串，其下乘者犹值千金。尚书平时，除忌辰外，日挂一串，一年之中，从不重复。又其家古玩值三百万，拳匪入京，尚书被难，迨联军入京，家资尽丧，凡诸宝器，大半西去。”④

以此证明，自称“热心肠地”为立山家“修补墙垣”的樊国

---

① 天津宗教界史料编委会：《史料选辑》第18辑，石道宏：《武清县大三庄教堂的来历》。

② 《进步日报》1951年8月17日：《庚子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梁的抢劫行为》。

③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5页。

④ 《义和团》，第1册，第316页。

梁，离立山家只有四百公尺的樊国梁，向教徒下命令公开抢劫的樊国梁，最恨立山支持义和团的樊国梁，无论如何也推卸不掉抢劫立山家一百万两珍宝的罪责。

樊国梁的劣迹尚不止此。当侵略军得知皇宫中藏有三百万马克储金的谣言时，瓦德西说："驻北京已有四十年、多方消息灵通之主教Feveiv（按：即樊国梁）认为确实不虚。"①因而使故宫受到严重的洗劫。

（二）传教士直接参加侵华军事活动

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中，很早就以传教为掩护，深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熟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散布帝国主义影响，培养服从于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旦时机到来，马上就可以组成一支帝国主义侵华的别动队。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和签订条约过程中，樊国梁、宝复礼等传教士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是美国美以美差会（即后来的卫理公会）的英国籍传教士，1886年被派到天津传教，加入了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担任天津美以美会"成美馆"的馆长。他平日蛮横已极，欺压中国教牧人员，许多人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他参加了侵略军的情报工作。当时侵略军司令部

---

① 《进步日报》1951年8月17日：《庚子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梁的抢劫行为》。

②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5页。

③ 《义和团》第1册，第316页。

④ 《瓦德西拳乱笔记》，载《义和团》第3册，第37页。

发命令："自本月25日起，宝复礼牧师正式编入本军，隶属于军事情报局。"①从此，他成为"英国远征军"的一个成员，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更有甚者，他驱使信徒为他搞军事情报，为侵略军修筑战壕，还在侵略军入侵天津期间，把"成美馆"让给英国侵略军作兵营。他在1902年向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所作的《成美馆的报告》中供认：

> "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成美馆'长时间供给英国'侵略'军作为战地营房，保护了去北京之前的英勇的第十四步兵团，后来又保护了一连的英国军队，有好几个月我们的房屋为军队所用，直到去年（1901年）秋天才还给我们。"②

宝复礼在1902年写了一本书名《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From Tiantsin to Peking with the Allied Force），炫耀帝国主义侵略军的"胜利"，并利用宗教欺骗世界人民。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在义和团进攻天津期间，宝复礼曾经驱使信徒为帝国主义侵略军卖命，"一夜之间在沿河一带用骆驼毛的包筑成了一道长达二里的防线"，并把这种罪行说成是"中国基督教的努力是使租界免于陷落的最大可能的贡献"③。另据当时经历此事的人说，侵略军主要是采取了"抓苦力"的野蛮办法，迫使中国人民为他们构筑工事。宝复礼还多次驱使信徒为他作"探子"，作"联络"，为他"求援"。在这里除了宝复礼在他的书中所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个叫郑殿芳的信徒，从北京到天津给帝国主义侵略军送情报；另外还有一个叫姚秃子的信徒，在义和团攻北京时，混在老百姓中，把英国武官的信藏在草帽里边，混过

---

① 《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情报局命令》，第102号。

② 《1902年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记录》，第44页。

③ 《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41页。

义和团的盘查，走旱路到天津，找帝国主义侵略军“求援”。以后，姚秃子还多次在教会中“作见证”，无耻地夸耀他的“功劳”。

宝复礼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作“向导”期间，又驱使信徒为他搞“情报”，他说：

> “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中国基督教徒学生充当了我们的探子，这两个人探听到了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地雷情况等等，回到天津向我报告。我就带他们到司令部，把他们的情报全部在地图上标出。这种工作，每日如是，若无中国基督教徒冒生命的危险充当探子，这些情况是无法获得的。”①

后来这两个中国探子为英政府所“赏识”，给他们颁发了“奖章和纽扣”②，宝复礼当然更得到英政府和差会的推崇。

至于传教士樊国梁对侵略军的“贡献”，除配合和指使抢劫外，在充当侵略军侦探、为将领出谋划策等方面比宝复礼更加积极。联军统帅瓦德西曾明确地说：

> “此间关于侦探一事，极难着手组织。所有内地消息之探知，余多赖天主教牧师之助。而且此种帮助，系出自彼等情愿。唯其中极为老练聪明之主教Faviev，不幸已于数日以前，前往罗马，离开中国，临行之时，曾训令彼之代表Jarlin主教，务须尽力助余。因此上校Yorck伯爵进兵（张家口）之时，曾有许多牧师随营效力相助。”③

---

① 《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63--65页。

② 《1903年华北年议会记录》，第57页。

③ 《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45页。

以上是瓦德西在1900年11月14日打报告的时候所提到的情况。实际上，在这以前，樊国梁早已派遣传教士加入法国军队，直接协助他们奸淫掳掠、屠杀中国人民了。

1901年2月20日，法军司令伏依龙（Voyron）从天津写信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Jarlin）说：

> “主教：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以随营司铎身分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我本人看，他们是公使所派的随营司铎，发给了他们一部分军饷和赔款，这是进攻中国的预算以外的开支。……他们离开自己的职务而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①

这封信后来由樊国梁在《传教杂志》上发表了。他加了一个小注说，信是写给林懋德的，因为他本人当时欧游未归。他所以要发表这样一封信，目的是证明他们这些传教士“曾经尽最大的努力为法国军队服了务、因而才承蒙最高将领写来这封充满热情的信件”。樊国梁接着写道：“不消说，我们之中的每一人都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②

在樊国梁的指使下，教会怎样为法国侵略军服务呢？樊国梁本人有一段供状：

> “我们在京城里设有一所庞大的中法学堂，它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有八名精通华语的传教士，应最高将领的邀请，被委为连队长，但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去烧某村庄，杀某某义和团，而是

①②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

为了供给军队将领们以所需要的情报，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了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问候。在这里我要告诉你（白登卜），我手中曾经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间许多人逃遁的去处，我把名单付之一炬，对谁也没有讲；多次受到询问，我答说：‘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使人被杀头，甚至连那些最有罪过的人，我们也永远不会告发。”①

樊国梁承认传教士在帝国主义军队中的任务是供给情报，并认为与军队的烧杀行为无关；承认搜集过义和团头目的名单，又没有把这份名单交给联军。以上两点已把传教士的身份讲得很清楚，不用逻辑推理，侵略军的“帮凶”之一就是传教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抵赖的。巴黎遣使会总院会计白登卜替樊国梁的辩解词，更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有人指出，当士兵们肆意抢劫的时候，传教士也参杂其中，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传教士是兼任军队的随营司铎、翻译和向导的，然而是否为此就可以结论说他们要对一切可能犯出的罪行都应当负一部分责任呢？……这种逻辑未免扯得太远了。”②

白登卜针对欧洲舆论对樊国梁等人的指责而作的辩解，显得十分无力和无知。当那些不谙华语、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侵略军队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时候，这些精通华语、熟悉中国情况的传教士究竟是怎样为其当翻译和向导呢？他们为什么不把侵略军带到抢劫北京的教民家中，而偏偏在财富集中的皇宫、王府、富室挤满了贪婪的侵略军。大量的史料证明，在联军陷大沽、占天津、侵北京的过程中，其“先头部队”、“情报人员”、

①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66页。

②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1－72页。

“侦察”、“驻防安排”、“进攻目标”、“抢劫”对象等等，都是传教士、不法教民充当或提供的，连他们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

（三）传教士瓜分中国的叫嚣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轰轰烈烈展开后，传教士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大肆叫嚣，并明目张胆地提出瓜分中国的主张。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时，就杀气腾腾地说：

> “我们是狂热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①

丁韪良不仅口头上拼命呐喊，而且他还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幕后重要策划者。他赤裸裸地帮助帝国主义列强提出如何瓜分中国的主张，并唆使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丁韪良认为：

> “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②

联军占领北京后，在各国坐地分脏的同时，侵略军的别动队——传教士们也野兽般地施以淫威，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似有立即把偌大的中国一口吞掉，把中国人民一脚踩死之势。传教士们的头脑经过一阵发热之后，才渐渐有点“清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如何处置?!”

1900年10月31日，在华基督教（新教）联合会在上海召集了在华各教派传教士讨论“对中国如何处置”——瓜分还是不瓜分的问题。美国传教士卜方济把争论归纳为两大意见：其一，力主

---

① 《花甲记忆》，《从狮子洞中发出的呼声》。

② 《北京使馆被围记》。

瓜分中国；其二，不瓜分中国而由中国的清政府治理。

卜方济在他编著的《中国的暴乱》一书的第120至121页中，具体阐述了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

另一种意见——反对瓜分中国，而由中国清政府治理。这是绝大多数传教士的意见。持这种主张的传教士们认识到：瓜分中国将对他们不利，他们从亲身经历中，首先是通过义和团运动，尝试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深知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瓜分中国只能引起中国人民百倍地反抗，而使他们更无藏身之地，影响传教活动的开展。另外，瓜分势必造成各国间的割据，各国在自己割据圈内行使自己意志，会严重阻碍英美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和原料掠夺，这对英美垄断资本家是不利的。所以，在讨论会上，反对瓜分中国的传教士一致认为："瓜分中国就象用河坝来切断苏州河一样，是极其行不通和不妥当的。"①

这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把它们的侵略野心和阴谋更清楚地揭露出来。西方各国传教士感到他们利用基督教的许多过去的作法行不通了，"传教事业"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因此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和侵略手法。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巴本生（C·Benson Barnett）在《中国大事记》（《Chinese Recorder》）杂志1902年2月号上发表了他在1901年写的一篇题为《危机》的文章，向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发出"警告的呼声"。他说：

> "去年（指1900年），我们的工作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如今我们已开始继续工作数月之久。在我个人工作的地区，我特别注意到人们的态度和从前不一样了，特

① 《教务杂志》第32卷：《道德和理由》；另见季理斐：《反对瓜分中国》。

别是学生们在三年一度的考试中所表现的态度，更使我预感到一种性质极为严重的危机。我们对这种情况应做醒祷告，严加防范，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敌对的国土上作战的。”

这段话表明，传教士们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大冲击，深感中国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使他们的侵略活动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尽管如此，西方各国政府、教会、差会仍不甘心放弃在中国利用传教士进行侵略的阴谋。为此，他们针对新的“危机”，提出了新的对策。

他们使用的所谓新策略、方法是什么呢？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北京被围期间，即在6月18日就提出了一个“以华制华”的方案，后来又在同年9月15日出版的《泰晤士报》上正式发表了这个观点①。

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也于1900年7月14日为列强拟定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参考，重弹他在维新运动期间提出的“国际共管”的老调。其内容如下：

“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两年来致力于驱逐外国人出境，现又在北京与直隶省进行，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

1、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2、每一个能派遣一万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

---

① 〔美〕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45—147页。

得派二人为阁员。

3、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摊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十二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

4、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国或几国的利益。

5、新的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6、应组织一个最高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7、在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①

丁韪良、李提摩太二人“对中国如何处置”意见书，是具有典型意义和权威性的，联军虽然没有完全采纳，但是对瓜分实为下策的结论，无疑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人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即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帝国主义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暂时胜利，但他们毕竟在这次运动中被中国人民这种高度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惊呆了。他们看到要立即瓜分这个强大民族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得不重新利用和扶持清政府作为傀儡，来继续统治中国人民。清朝政府上层通过这次运动也完全向帝国主义屈服了。于是，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结成了同盟。清政府既然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因而便与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天主教、基督新教开始握手言和，并在列强各国侵华总政策的制约下，意见日趋一致，双方着手思考如何能扩大和巩固这种合作。从此，清朝统治者给了传教士更多的方便和特权，各国传教士得以重建和扩展在中国的教会势力，并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

① 《李提摩太通信集》，第50号。

使中国陷入到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四）传教士与《辛丑条约》的形成

在八国联军进踞北京以前，清朝政府已经任命奕䜣、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其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推行卖国投降的政策，因而在议和时，惟侵略者之命是从，任凭他们的摆布。各个帝国主义却象饿狼一样，撕啃着中国这块肥肉。

1900年12月27日，清朝政府接受了九国提出的《十二条议和大纲》。接着就开始讨论赔款的具体办法问题。这时，樊国梁等传教士从中作祟，企图阻止条约签字，以求更大的勒索。所以，法国公使毕盛在会上突然横生枝节，照会清政府说：

> “此次拳匪倡乱，京内教会教堂、养病院、育婴堂以及学堂、坟地，均被焚毁。请派大员会同驻京主教，议定赔款办法，早为清理。”①

其它国家也跟着提出同样要求。清政府只好各国一体办理，照会英、德、俄、美、意、奥、比各国公使，各派主教等协商此事。从此，传教士们便成了条约内容的决策者之一。清朝政府派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直隶布政使周馥专司其事，“两月以来，督同印委各员详细考核，与各国教士往复商议，舌蔽唇焦，始克就绪”。交涉的结果是：

> “计京城应赔法国天主教堂银一百五十万两，美国耶稣各教会教堂八十五万九千零九十九两，英国耶稣伦敦会教堂银十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九两。……京师一带污渎各坟茔，每处付银一万两。此项不在赔款之内，应交各使馆兑收，计阜城门外法国远近茔地五处……总茔地

① 赖孟多：《义勇列传》，第3册，第183—190页。

七处，……共银七万两。”①

“京内遭难教民应加抚恤，几难数计……总计法国天主教、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英国伦敦会、俄国东方天主教会，各教民应给抚恤银一百四十三万两。各教士力求两月之内请款散给。”②

又

“各州县教堂赔款剔出若干，一并归入大赔款之内。综计京城内外议定，天主耶稣各教赔款已归大赔款之数共计三百三十万零九百七十七两。”

总计1901—1902年，北京与直隶省地方自付的“赔偿”教堂、教民之“损失”的所谓“地方赔款”，除部分未结者在外，“总数竟达一千一百一十二万四千零一十二两”③。

在勒索教堂、教民损失赔款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居中策划，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樊国梁在1901年8月6日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的信中就供认不讳。信中说：

“在向中国提出了一亿五千万两以上的赔款数字后，中国并未感到吃惊，当即予以接受。问题反而发生在联军方面。经过数日磋商，方才达成协议。

最后议定书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即将签字。在法国应得赔款的总数中包括了赔偿教民的数字。依照法国公使的建议，我们和教区境内的官员们进行了谈判。传教士与聚集在一起的官员，对所有被毁、被抢、被烧的村庄作了慎重考查。

双方旨在本着善意，制定了公平的处理办法，问题得到了解决。我照例取得了法国公使对这项方案的同意。教

①② 刘赖孟多：《义勇列传》，第3册，第183—190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6年版，第53页。

民和教会大约能收回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二。为了达成协议，我们尽量作了必要的让步。

为被杀害的传教士，总督交给我一笔巨款，我未加商议而予以全部拒绝。我说：‘传教士的生命绝非金钱价值所可与拟，法国公使会为这些人命要索取精神赔偿的’。”①

樊国梁处处打着法国公使的旗号大肆勒索赔款。可是等到赔款已成定局，他却装出一付“慈悲”面孔，向清政府说什么：

“昔年将蚕池口教堂移建，曾蒙皇太后、皇上赐带、赐匾，并赏伊三品顶戴，至今感戴不忘，安敢格外要索？但西什库教堂北面住屋全被地雷轰毁，各大教堂片瓦无存，教士栖身无处，力求先给赔款，以资建造。”②

至于他所说的“教会和教民大约能收回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二”，纯属骗人的鬼话。庚子年后，许多教民以赔款而致富。单是北京北堂里因赔款所存的金银珠宝，最后竟无法开销，只好用来收买教徒。

帝国主义列强还以“精神赔偿”为名，迫使清朝政府出卖中国主权，任它们在中国恣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活动。这样的“精神赔偿”，已成为《辛丑条约》内容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追求这样的“精神赔款”，其目的就是“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就是把中国变成殖民主义者的附属国，以实现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中国的阴谋。这一绝灭中华民族的险恶用心，真令人不寒而栗！

樊国梁在发布抢劫令的时候，曾一再强调教会所抢掠的全部

---

①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3－74页。

②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同上页。

钱财，“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将来从赔款总数中扣除。可是翻遍了有关议定赔款的中外文件，只能见到樊国梁协同公使对中国苛勒酷索的记载，而以抢劫钱财抵偿赔款事，却只字未提，他们除条约外，多拿的数字，永远也查不清楚。几个世纪以前，为垂涎中华财富而不择手段的西方人，终于达到了目的。

由于传教士樊国梁等人的“特殊”贡献，他们都受到所在国政府、所辖教会、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樊国梁在1901年去罗马述职时，因他利用宗教搞侵略有功，教宗赐给他“宗座卫士”这一梵蒂冈的最高荣誉头衔。樊国梁从罗马到巴黎后，遣使会总会长对他更是大加慰劳。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长也请他共进午餐，与他共议中国形势①。

再有，那个曾被马克·吐温无情揭露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攻进北京后，把自己武装起来，带领二百多名中国教徒，在北京各条大街上抢劫了难以统计的许多富户后，又带着几个传教士抢占了一座在京的蒙古王府。他行抢时，受到了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派兵保护。在康格的支持下，梅子明的腰包被金银财宝胀得鼓鼓的，之后，将其余的“财宝全部运到美国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②。梅子明和公使馆都发了横财之后，他又喊出了“用人头抵人头”的血淋淋的狂妄的叫嚣，结果仅在任邱一个小村子，被他砍死了的无辜村民竟达680人之多。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腰包里塞满中国人民财宝的强盗，在战争之后，竟然被美国前驻华大使田贝申报美国国务院请求给予嘉奖。

八国联军在传教士的密切配合下，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又在传教士的配合下血洗了京津地区，又在传教士的

---

① 参见《遣使会年鉴》，1901年，第234页。

② 《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35—137页。

密谋策划下强迫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他们还在叫嚣瓜分中国。他们要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们要抢劫什么都抢走了，他们要屠杀什么人就杀什么人，使古都城下冤魂麇集。但是，经过这场“大灾难”，并没有使中华民族屈服，而是带来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就连樊国梁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性运动……义和团主要是赶走外国人……视天主教的宣传是为了适应我国的利益。”①

三、义和团运动高潮中的北方重要教案

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民众除去与侵略军进行血战外，攻打教堂，惩处教士仍是义和团斗争的主要方向。所以，高潮中的教案多达百余起。其中除了北京义和团团民攻打北京西什库等教堂为重要教案外，在北方还有许多有影响的教案，它们是义和团运动的组成部分。

（一）巨野张庄教案（1900年）

义和团事起，山东全省的外国教士，都被袁世凯接到通商口岸保护起来。张庄教堂的纳广训神甫走后，令教民、地主赵秀连率领教民死守教堂。时巨野县官茅乃厚，闻教堂被围，惊恐万状，屡次要求上司派军队援救②。后，清廷拨马队一营驰救，

① 《遣使会年鉴》，1901年，第241--242页。

②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十七日收到的《巨野禀》，原稿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但屡受拳民挫败，未解教堂之围。1900年6月27日，大刀会在陈照举、陈照房、岳帮宪的领导下，率众攻入教堂，焚烧教民房子一百余间，把教会准备修建大教堂和医院的砖、灰及筑围墙的砖头拆下来卖给农民，价钱很低，相当于市价的1/4或1/5。大刀会在张庄住七八天，临走前，砸教堂，烧毁了教民住宅，牵走了教民牲口，分了他们的粮食，对非教民财产，丝毫未动。

除了张庄教堂被攻之外，巨野各地反洋教活动，也很活跃。城关镇的大刀会领导人李大尤、袁效本，带领会员三四千人，活动范围很广，进攻过曹州、巨野教堂，也打过城武、定陶的外国教堂。会员的出身，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城北大刀会，主要活动地区在响水口、夏官屯。响水口的大刀会首领是李玉典、李玉仁兄弟，有会员千余人。会员的成份更加单纯，稍有点家产的都不能参加，他们在斗争中对封建地主的打击很重。文庄富户教民刘天祥就被进攻过，刘的财产被大刀会散赈给贫苦农民。不久，由于李玉典、李玉仁兄弟被地主诱杀，这支起义队伍也就解散了。

韩姑娘、徐传忠领导的大刀会，活动地区在巨野西南（即与荷泽交界处）。先是徐传忠在巨野县西南以行医为名进行活动，广收会员。1900年韩姑娘率领的大刀会攻打沙土集教堂之后，进驻龙堌。不久，徐传忠也到了龙堌与之会合。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原来分散在巨野西南各村庄的大刀会员纷纷向龙堌聚集，人数达四、五千人。韩姑娘以重兵驻守龙堌，另派兵进攻龙堌附近的马庄和后马海教堂。以后这支队伍与在龙堌一带的“土匪”冲突，徐传忠因此身亡。韩姑娘便率领部众，冒雨离开龙堌，到荷泽境内，受到清政府军队的袭击，部众散乱。韩姑娘乔装逃出，回到家里，残酷的父兄竟用钉耙乱打，使这位优秀的女英雄死于非命。

（二）奉天教案（1900年）

辽宁义和团反帝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当推盛京省城奉天。1900年6月30日午后，奉天义和团在团首刘喜禄、张海（张岔牙子）率领下，焚毁了教堂、医院和俄国的铁路公司。据史料记载：

> “三十日未刻，有拳民四、五十人，其中十五、六岁童子居多，争着焚毁内治门外英国所建洋楼，随见火焰上腾，楼层俱为灰烬。不多时，东南小河沿地方英人所设教堂、医院亦俱为拳民焚毁无遗。次日，城内外各洋人讲书堂、暨俄国铁路公司，拆毁殆尽。……仅德胜门外法国洋楼幸存。该主教指挥教民，排列枪炮，杀害拳民。而拳民仇恨之心，似非尽毁其洋楼不止。”①

后来，义和团向盛京副都统晋昌借得大炮，轰击教堂，终于烧掉天主堂②。法国侵略分子、天主教南满教区主教纪隆被打死。外国教士及教民被打死百余人。奉天义和团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三）辽南、辽东教案（1900年）

在辽南、辽阳、海城、营口、盖平、复县、金州、辽中等地，团民都展开了焚教堂、拆铁路的斗争。7月上旬，义和团将俄人在辽阳茨儿山的煤矿焚毁。辽阳最大的大沙岭教堂，被团民与清军全部焚毁。侵略势力最大的营口，在外国侵略军保护下，教堂

---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1页。

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9编，第113页。

虽未被焚毁，但侵略者却吓得胆颤心惊，在海关附近赶筑一道土墙，作为“万一被迫撤退时掩护上船的最后据点”。辽中三台子天主堂是侵略者负隅顽抗的据点，法国侵略分子“郭司铎率教民数百人掘壕抵御”。义和团围攻教堂时表现了极其英勇不怕牺牲的精神，“远近号召不下数千人，昼夜环攻，炮声不绝，前者殪，后者进……，如是者二十余日”。由于后来俄国军队占领营口，局势一变，清军撤退，因此未能攻下。

在辽东、兴京、桓仁、凤城、安东、岫岩、庄河等县的团民都对外国教会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7月5日，岫岩丹麦教会被义和团包围，教士曾到营口求救。后来外国传教士逃跑到旅顺才算保住了命。在斗争中，各邻县团民互相支援。另外兴京团民支援了桓仁团民，粉碎了桓仁县令的破坏，使恒仁义和团斗争迅速发展起来。

（四）辽西、辽北教案（1900年）

在辽西地区，锦州、广宁(北镇)、宁远(兴城)、新民等地和朝阳地区义和团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也很激烈。绥中的两所美国教堂，都被义和团所焚毁。朝阳松树嘴子教堂是拥有教党武装的顽固据点，也被团民焚毁了。

在辽北地区，铁岭、开原、昌图、法库等县团民也向外国教会势力展开了斗争。

（五）内蒙萨拉齐教案（1900年）

1900年春，在义和团势力还没有发展到内蒙古西部的时候，内蒙古西部的萨拉齐、托克托二厅和准格尔旗的蒙、汉人民已经开展了反洋教的斗争。这年的4、5月间，萨拉齐厅二十四顷地的教民石险生、任喜财等多人因强占非教民的田产未遂，竟勾结

了托克托厅各教堂的教民三万余人，屠杀托克托厅和准格尔旗属的蒙、汉民九人，并弃尸黄河，企图灭迹。事后凶手石险生等潜逃在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里。驻在该堂的“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韩默理，不仅窝藏正凶，无视中国法律，而且纠结了一千多个教民，全副武装列阵以待官军。当地的吏役慑于教堂的势力，不敢去缉凶。这一事件激起了附近人民的极大义愤，纷纷聚集起来围攻教堂。在群众的压力下，托克托厅的通判不得不请求山西巡抚呈请总理衙门要教堂交出凶手，教堂仍置之不理。以后，地方官请求绥远将军永德派兵前去缉拿凶犯，韩默理又指挥教民，“负隅顽抗，鸣枪拒捕”①。

8月，在义和团勇猛的冲击下，教堂被攻破，匿藏在二十四顷地教堂的杀人犯石险生等和“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老“中国通”韩默理都被义和团抓住。群众将韩默理带到托克托厅进行公审。他们“以铁索穿（韩默理的）肩骨、囚以笼……背上插一小旗，上书‘老洋魔’三字，拽之游街市，民众聚观，诋辱万状”②。最后韩被处以极刑，百姓人人称快。

（六）内蒙四子王旗教案（1900年）

萨拉齐反教斗争兴起后，义和团众攻打四子王旗的铁疙旦沟和乌尔图沟天主堂。这次进攻以托克托厅等地的义和团群众为主，另外还有二百多名绥远城的驻防旗兵、“练军”和四子王旗的蒙古兵。这两个教堂聚集着归化、四子王旗等北部地带以及宁远等地各天主堂、耶稣堂逃出的教士、教民数百人。教党武装“枪械排列”，“环施枪炮”，顽强抵抗，杀伤不少义和团和

① 《义光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38页。

② 《拳匪祸教记》，第322页。

官军。从而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两个教堂都很快地被攻陷，教士被杀，教堂和住房都被群众烧毁①。

（七）内蒙鄂托克旗教案（1900年）

参加进攻鄂托克旗城川教堂战斗的主要是鄂托克、乌审等旗蒙族牧民。他们联合了陕西北部沿伊盟边境的定边、安边、靖边、宁条梁、榆林等地汉族人民以及山西边境的义和团向教堂进攻。这次斗争采用了蒙古民族特有的斗争形式——"多归输"运动②，来团结和组织群众。参加这次"多归输"运动的达数千人，群众情绪十分高涨，连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这次斗争杀死了一个洋教士，捣毁了教堂。当地的统治者派员赶来阻止，他们立即把官员轰走③。

（八）宁中安平抗洋捐斗争（1900—1901年）

此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走向低潮之时，持续近一年时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廿一日（1900年7月17日）安平县（今安国县）宅后寺、义里等地的教堂，借八国联军侵犯津京之机，敲诈乡民，并向县衙提出要重修教堂，要求全县每个人出银一两，作为"洋捐"。对于这样一笔大的惊人的勒索，知县朱正保竟满口应允。

---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60页。

② "多归输"：蒙古语，是指贫苦牧民向牧主和王爷斗争的一种方式。

③ 蒙古历史研究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蒙古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伊克昭盟历史与现状》、《鄂托克旗历史与现状》；另见丁治国：《伊南边区调查报告》。

于是，一些教民便仗洋人之势，横行霸道，寻衅滋事。无赖教民王心灏率一伙教民窜到村南堡富户魏洛田家，将魏的家财抢劫一空，又勾结县衙，以私通义和团、抗“洋捐”罪名加在魏洛田头上，并将魏捕逮入狱。此事，便成了这次抗洋捐斗争的导火线。

看到地痞、无赖教民如此横行，孰知横祸何日飞落头上。于是，以安平谢庄百姓为首，倡导四里八乡成立联庄会。到翌年二月十八日（1901年4月6日），安平县百余个村庄成立了联庄会，并且联名向县衙提出，坚决抗交“洋捐”。知县朱正保带百余名骑兵前往大子文村镇压会众，联庄会众为了保护身家性命，集结抗官，双方激战，打死清兵60余名。朱正保只身逃回，遂以“民变”之诬，请派大兵镇压。四月初四（5月21日），古北口提督吕道生、步兵统领郑才盛率千余名官兵进剿，数以万计的联庄会乡勇和当地农民奋勇抵抗。结果，官军大败而归。五天后（5月27日），吕道生、郑才盛勾引八国联军中的法国士兵500余人，由法国侵略军头目巴尧率领驰奔安平境内，见人就杀，只义里村就被杀死20多人，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联庄会乡勇在大子文村，用原始的武器和农具，与装备有开花炮和洋枪的法国侵略军进行了激战。乡勇伤亡甚重，但法国兵死伤也不在少数。后来，在侵略军和清兵夹攻下，乡勇们冲出重围南撤。

这次抗交“洋捐”斗争，人民取得了胜利。侵略者及传教士从此再也不敢在安平地方提什么“洋捐”了。此前，冀中所有准备征收“洋捐”的县份，传教士们也再不敢催交“洋捐”。

（九）陕西宁强燕子砭教案（1900年）

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在陕西宁强传教的有意大利天主教教士郭西德。他在燕子砭地方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入教，以

扩充教会势力，并强占了与燕子砭一河之隔的风景秀丽的青岗坪，霸占民房作为教堂。郭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须到教堂去“领洗”，结果犹如西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蹂躏、奸污。当地平民潘长富、郑千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①。教堂还规定教民要把女儿送入教堂作“修女”，以供教士们玩弄，满足他们的淫欲。当地民人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教士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十五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作“修女”②。教士还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役等等。由于教会势力与封建势力勾结，压迫、残害人民群众，因此群众对教会势力愤恨异常，时思反抗。

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以张德成、青山道人为首的一千人到陕北活动。当地人民在北方义和团的影响下，遂爆发了燕子砭教案。

1900年7月21日晚，在秀才李云栋、举人杨海、农民潘长富、潘长贵等带领下，集合群众数百人，手持各种农具，前往燕子砭包围了郭西德寓所。将郭毒打后拖到街上示众，然后处死，把尸体扔进嘉陵江。平日依仗郭西德势力为虎作伥的教民李大银等四人，也落得了和主子一样的下场。

陕北教区主教巴士林闻讯后，一面上报梵蒂冈教皇，一面与汉中府知府进行交涉，要求“惩凶”、“赔款”。1901年5月，教会与清地方政府议结燕子砭教案，规定：（1）赔给教会银二十万两；（2）教会可在宁强及汉中府的任何地方修建教堂，并任教士自由传教，自由居住；（3）免收教会应承担的一切税捐，并享有其它特权；（4）惩办肇事“元凶”；（5）停止汉中府的

---

① 转引自张应超：《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教案述评》。

② 《三边天主教教案记略》。

府县文武考试五年；（6）地方官在汉中和燕子砭两地为教会立碑，保证今后“永不发生此事”①。1902年，李云栋、杨海等六人被清政府杀害。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教案

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出现高潮之际，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东南督抚官僚，向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者，提出了旨在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以保大清疆土的“东南互保”。此时，英国在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争得的地盘较少，使英国资产阶级在华利益集团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在没有‘有效地占领’扬子江流域的时候，就不能有英国的范围”，要求武装占领舟山群岛、江阴炮台和两湖地区，在长江各省督抚身旁安置英国官员，把长江流域建成埃及式的英国保护区②。东南洋务派官僚认为，在北方变乱高潮时，只要英国把注意力放在江南，维持现状，就能保住疆土，“英不先进（入长江），他人断不敢进，彼此处于镇静，严密防范，自可相安无事”③。否则，会造成“大江上下，人心浮动”，各地会党“蠢蠢欲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外人伺隙而动”，有入侵长江的危险④。张之洞在一封电报中对“东南互保”的重要性说得更明白：“京畿骤乱，开衅各国，沿海震动，各国窥伺，沿

①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17—119页。

② 伯尼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305、308页。

③ 《张文襄公全集》，第106卷，第15页。

④ 《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1页。

江若稍有纷扰，洋人必入踞长江，自为保护，东南非我有矣！”①所谓“东南互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

朝廷宣战，疆臣又与交战国言和“互保”，并为拉那氏所默认、宽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出十分滑稽的闹剧。这场闹剧至少起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1900年6、7月份，列强得以集中在华兵力，侵入京、津，或者说它们消除了对南方经济要害区的忧虑，专心一致地去镇压北方义和团“暴乱”；第二，8月间，“东南互保”条约又为列强对南方教案找到借口，肆意要挟，动辄出兵威胁。当然，这个条约也牵制了列强不能马上毁掉与督抚互保的朝廷，它们还有点畏惮南方几十万精锐清军。同时，造成了此后洋务派的势力有卷土重来之势，顽固派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东南互保”对义和团运动和南方人民反帝斗争是一个反动，它以仇视人民、惧怕群众运动为出发点，以镇压南方人民反帝活动为主要目的。然而，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南方人民却冲破了中外反动派的封锁，把反对帝国主义、反洋教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7月初，湖南衡州爆发了激烈的反教会斗争。接着，浙江衢州又发生了秘密会社的起义，导致了衢州教案。在大江上下，在东南沿海，在西南边陲，人民反帝斗争如火如荼，此伏彼继。这引起了帝国主义侵华分子的恐惧，他们惊呼，义和团运动“可能在全国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人的暴动”②。

南方各省人民反洋教斗争历时约一年半，发展趋势为初起、高潮、低潮三个阶段。而在1902年以后，又掀起了更大的高峰，并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

---

① 《张文襄公全集》，第160卷，第12页。

②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30页。

（一）1900年初中国南方的民教冲突

1900年初，浙江台州一教堂职员被杀，十余家教民被冲击①；湖北施南也有几座教堂遭到严重破坏②。南方各地焚捣教堂、惩处教民的事件日益增多。特别是到三、四月间，义和团在直隶声势浩大，清政府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的消息传到南方，南方的反洋教斗争就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开始向新的高潮发展。江西新昌、福建建宁、安徽池州、湖北临利、浙江黄岩、福建福安等地都发生了反洋教事件③，其中浙江黄岩的斗争规模较大。

1899年春，黄岩群众就在武生应万德领导下，掀起了一场震动全浙江的反洋教斗争。同年九月，应万德被捕惨遭杀害，斗争暂时平息。适时义和团在北方大兴，应万德的旧友夏金甫、王梧臣等便乘机再次起事，遂于1900年5月15日（四月十七日）集合四百多名群众，携执枪械，包围了县境内栅桥教堂，重伤洋教士郎克忠，尽毁堂中什物④。

上述反教斗争是在高潮之前发生的，所以斗争的规模不大，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往往是一哄而起，将一座教堂破坏后便一哄而散，一般都没有蔓延。参加斗争的社会力量，也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农民群众。

7月中旬，清政府宣布了利用义和团的政策，并对外宣战。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南方反洋教斗争受到北方义和团的推动，便

---

①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② 《张文襄公全集》第159卷，第23页。

③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四月初四日、初十日、十六日。

④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四日。

很快进入此间的高潮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反洋教斗争遍及南方各省。并且在多数省中，已不再象前一阶段那样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而是几个县，整个府，甚至几个府的斗争连成一片，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从时间上说，也不象以前那样旋起旋灭，很多地区的斗争都持续了数十天到几个月。参加斗争的阶级、阶层空前广泛，斗争的激烈程度也非此前可比。这一切，就构成了这个阶段南方各省反洋教斗争范围广，规模大，时间长，来势猛，具有鲜明的全民性等特点。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南方反洋教斗争还只是不断闪现的火花，那么这一阶段就是熊熊燃烧的烈焰了。

（二）两湖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湖广总督张之洞是“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他所控制的湖北地区，他“和两江总督同心协力，决心维持秩序，保护洋人”，为此采取了“特别警戒措施”，对人民严加防范①。但是不管张之洞的措施如何高明，防范如何严密，湖北还是发生了反洋教斗争。六月上旬，天门县皂市地方的群众鸣锣招聚了一、二万人，将英国伦敦会教堂焚毁。驻堂洋医生在教民帮助下慌忙逃往汉口②。到七、八月间，枣阳、襄阳、谷城、随州、云梦一带的群众在河南义和团的影响下，群情振奋，纷纷采取行动。将龙垱等地近20座教堂毁坏，并打击了数百家教民。枣阳县的群众在反洋教斗争中大张“顺清灭洋”旗帜。襄阳、谷城的群众与教堂武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来势迅猛的反洋教风暴，使这一带的教民闻风丧胆。一敛过去嚣张跋扈气焰，或出资或备筵，乞求邻

---

①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80页。

② 《北清事变》，第115页；《张文襄公全集》，第160卷，第10页。

里团绅保护①。鄂东蕲州、黄梅、广济三县的数座教堂在七月底八月初也被群众烧了个干干净净②。不仅鄂东、鄂北这些边鄙地区发生了激烈的反洋教斗争，就是在总督驻节的武汉，也很不安宁。武昌、汉阳都有教堂被骚扰之事发生。连张之洞调来稳定局面的清军士兵，巡逻经过租界时，也“每向西人揶揄戏侮，并有与巡捕争闹情事”③。

湖南的反洋教斗争比湖北更激烈。五、六月间，湖南出现了大量反教揭帖、流言，素有反洋教传统的衡州群众，摩拳擦掌，酝酿新的反洋教斗争。七月三日，群众将衡州南门外清泉县境的福音堂焚毁，殴毙德籍教士二名。翌日，又拥入衡州黄沙湾总堂，将堂中意籍教士任德高、童哲西扭至大门口进行痛打。任德高倒地佯死，为教民抬出送往北乡，童哲西被拽至附近码头上烧死。教堂、育婴堂及附近教民之家变成焦土。是时，主教范怀德正在耒阳县杉桥地方督建新教堂，闻讯即偕意籍教士安守仁匆匆乘船返衡。行至清泉县港子口，被群众捉拿上岸，群殴毙命。“衡州之难，一扬于外，四乡人民纷纷仇教，尽毁教堂”。仅衡州府所属衡阳、清泉、衡山、常宁、安仁六县就毁教堂30余所。常德、湘潭、临湘、永州等地教堂、教民，也都受到沉重打击。各处洋教士闻讯之后，全部乔装打扮，仓惶出逃。途中又多被群众殴打，极为狼狈④。

---

① 《张文襄公全集》，第162卷，10页，25页；第163卷，第3页；第165卷，第31页；另见《汇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② 《拳祸记》，下篇，第472页；另见《庚子国变纪》，第285页。

③ 《北清事变》，第152页；《万国公报》，庚子七月，第139卷；《拳匪记事》，卷3，第76页。

④ 《拳祸记》，下篇，第460—467页；另见《英国蓝皮书》，第426—428页。

（三）赣、皖、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在两江总督所辖的三省中，江西的反洋教斗争最为广泛激烈。8月5日（七月十一日），景德镇的群众首先发难，烧毁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堂，并杀死教民数人。这一事件，立即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饶州、抚州、南康、南昌、九江、南安、建昌、吉安、赣州等府的广大地区，都先后燃起了反洋教的烽火。建昌府属南城等县，还组织了同志会（即通知会），以便更有力地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路经饶州府的清军士兵，也积极参加了当地焚打教堂的行动。庐陵县的群众将率兵前来镇压的知县冯某砍伤。即使在反洋教斗争不十分迅猛的广信等府，群众的情绪也非常激烈，约期焚教的揭帖、流言比比皆是，教士、教民胆战心惊，“皆有朝不及暮，夕不待旦之虑”①。8、9两个月中，江西毁坏大教堂39座，小教堂则更多。焚抢教民1600余家，范围几乎遍及全省②。

安徽由于沿江一带的核心地区会党和群众参加自立军起义者很多，所以反洋教斗争主要发生在受邻省影响较大，而统治力量又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区。与景德镇相距百里的徽州府祁门县，七月间揭帖四布，流言四起。县令夏曾佑见反洋教呼声很高，知道不可强为，便急忙令教民暗中出逃。在皖、赣交界处的婺源县，群众也将一座西式大教堂和附近洋楼付之一炬。紧邻湖北的宿松县，闻鄂东人民闹教，立即相率效尤，纷纷攻击教堂。洋教士在

①② 《义和团史料》，下册，第857—858页；另见《万国公报》庚子七月，第139卷。

群众打击下，“备受惊惶，遄回安庆堂中，不胜狼狈，男女学堂亦即闭歇”①。在安徽腹地的青阳县，意籍教士孟惟礼在初夏时到乡间巡视教民，“比返，见民心已变，向与教民交颇善者，今已视同歧路。询其故，则以谣言四布，将与教堂为难”②。至8月4日（七月十日），教堂终被大队群众焚毁。9月中旬，寿州一带紧连合肥的十余个村庄的群众纷起打毁教堂。巡抚王之春恐反洋教的烈火在这要害之地蔓延，急令大批兵勇将其扑灭。皖北与江苏、山东、河南毗连各处，也有不少群众打着义和团的旗号，“意图揭竿”③。

与已经掀起反洋教斗争高潮的南方其它各省相比，江苏在这一阶段中比较平静。虽然社会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全省各地的反洋教情绪也很激烈，但始终没有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发生，只是在徐州府属与山东接壤地区有数处教堂被拆毁，教民被强迫出教④。

（四）浙江教案

在这一阶段的浙江反洋教斗争中，影响最大的是“衢州教案”、“诸暨教案”和“温州教案”等。

1.诸暨教案（1900年）

义和团由山东发展到直隶，声势更为磅礴，浙江诸暨人民立刻起来响应。1900年7月2日，浙江参加“东南互保”后，诸暨地

---

①② 《汪穀卿先生传记》，第3卷，年谱2；另见《拳祸记》，下篇，第503页等。

③ 《北清事变》，第146页、188页；民国《安徽通志稿》，第40页等。

④ 《拳匪记事》，第3卷，第65页；《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方官吏，立即派兵保护教堂，庇护教士、教民。10日，斯屯乡一农民与教民纠纷，知县得到报告，马上带兵前往镇压，逮捕与此事无关群众四人，“不容分辩，各以重责大板，苛以巨枷，分别示众”①，因而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怒。11日，以杨柳春、王绍桂为首，在斗子岩聚集附近群众二千余人，树白旗起义，散发传单、号召“助王灭教”。得到群众支持后，王绍桂自称南越真帝，以陈慨等十余人为开国大将军，并提出了“先杀倪品梁，后杀陈霞臣”②的口号。12日，起义群众烧毁牌头镇教堂。15日进入县城，焚毁耶稣教堂及洋人住宅，杨家楼教堂、教士住屋、栅桥镇教堂被折毁。洋教士何约翰逃走，地方官畏缩不出。16日，起义军至会义桥烧毁教堂。17日，缴守城清兵械，冲进县衙，知县倪愚山跳墙逃跑。19日，浙江巡抚派参将沈宝清带领大批清军前来镇压，在此紧要关头，首领意见分歧，步调不一，遂为清军各个击破，白旗党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2.衢州教案（1900年）

1900年夏，义和团在北方蓬勃发展，浙江衢州秘密会党终南会首领刘家福、吴癞头，认为反对清朝统治的机会已到，于8月23日聚集会众五千余人，在闽浙交界的九牧山、江山二十八都起义。23、24两日连克江山、常山两县，并围攻衢州。衢州的清朝官吏慌忙宣布戒严。在刘家福起义影响下，衢州城内人民立即行动起来，进行了一场诛官杀教的斗争，史称“衢州教案”。

衢县知县吴德潇在“东南互保”还未成立时，就和洋教士相勾结，欺压百姓，压制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广大人民呼之为“洋人奴隶”，对他恨入切骨。8月25日，群众起来反对洋教，打毁教堂。吴德潇慌忙调派兵役予以保护，并且给洋教士通风报

① 《申报》，光绪廿六年六月廿六日。

② 两人均为传教士爪牙，见《诸暨县志》，卷15。

信。群众当即冲进县署责问，吴德潇竟恼羞成怒，要捕拿为首的群众。人民忍无可忍，“一拥而入，把吴德潇打死在县衙门之内”①。随即将各教堂焚烧，毙英国传教士汤明心和美国传教士石马戴等人；常山县英籍教士黄道明夫妇及孩子四人，未及进城，也在同日被群众击杀于城外码头上。一时城内人民“大索传教西人，喊杀之声不绝”②。不久，衢州府属西安县令一家及幕僚、家丁共34人，也先后被杀。

衢州事起，英国领事霍必澜，立刻对浙江地方官吏进行恐吓，并扬言要派兵入浙江“剿办”。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听到“洋兵入浙剿匪”，认为“有碍东南大局”，更为恐惧。于是函电交驰，要大规模屠杀反帝爱国群众，讨好帝国主义。逃往西安的清统治者，得知衢州发生教案，深怕事情扩大，有碍自己和侵略者的妥协，立即颁发上谕，命盛宣怀同恽祖翼“即著妥协会商，迅速了结，勿延为要”③。英国公使和领事，趁机要挟，提出惩凶、赔款、抚恤、及诛镇、道、府、营和绅士，并要求把巡抚、布政使等革职。清朝统治者和官僚买办，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一面把浙江巡抚刘树堂、布政司荣铨等官僚和绅士三十多人，都以“保护教士不力”的罪名革职、充军和斥革；一面即派江、浙、皖三省清军围攻衢州。刘家福率领的农民反洋教起义被镇压下去，群众遭屠杀，先后达二千余人。

3.温州教案（1900年）

1900年6月，平阳地主杨愚楼、刘绍宽等遵照浙江巡抚刘树堂命令，组织团练，准备镇压即将掀起的群众反帝斗争。7月8

---

① 《刘坤一遗集》，第6册，总第2852页。

② 陶成章：《浙案记略》，载《辛亥革命史丛刊》（三），第50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25—826页。

日，当地农民金宗财，冲破反动势力的压制，在蔡郎村建立神拳会，“散发双龙票布，影借北方义和团，号召除灭洋教”①。附近农民纷纷响应参加，“乡愚只知仇教而起，从者益伙”②。9、10两日，拳民在金宗财带领下，烧毁平阳县西门、鳌江、肖家渡、北港等处教堂，并拆毁各乡教堂。11日，金宗财联合瑞安许阿雷率领的拳民，举旗起义。13日，起义拳民二百余人，在钱库集结，遭到清军和地主团练合击，起义遂失败。首领景雪和尚、女首领章陈氏相继被俘。8月6日金宗财被捕，9日被杀。平阳神拳会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4.第一次宁海教案（1900—1901年）

宁海教士教民，一向无法无天。1900年8月衢州发生教案，伏虎会首领王锡彤立刻乘机号召当地群众起事响应，指出“天主教恶贯满盈，天怒人怨，北方义兵蜂起，正吾侪驱除天主教时矣”③，并带领会众五六十人在大里揭竿举事，烧毁大里、中胡、凤里三处教堂，惩办不法教民。宁海县官孙启泰派兵前往镇压，王锡彤被迫隐居慈溪。

1901年9月，王锡彤回到大里，教士教民得知，前去捕捉。当地群众早有反洋教决心，再次聚集起来，烧毁中胡教堂。7日，县官逮捕王锡彤，群众无比愤怒，立刻聚集一百多人，打进城内劫牢，将王锡彤救出，在嘉兴、湖州一带隐居。

除上述这些规模较大的反教斗争外，浙江其它各地群众打教堂、惩教民的事件也发生多起④。

---

① 《平阳县志》，第18卷，武卫志二。

② 《温州近代史资料》，第165页。

③ 伊荪：《王锡彤闹教始末记》。

④ 《拳匪记事》，卷三，69—75页；《北清事变》，第200、264页等。

（五）福建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曾被满清官吏吹嘘为反洋教斗争"最平安"的福建，在六月以后，许多地区的反洋教气氛愈来愈浓。七月初，漳州、邵武两府的很多教堂相继被拆焚。七月底，福州群众与教民发生纠纷，旋即集聚数百人，将耶稣教堂和教民开设的店铺破坏。八月，汀州府及龙岩州群众又纷纷行动起来，打击教堂、教民。漳州府的反洋教斗争也不断扩展，延及浦南、漳平等六、七个县。漳浦县24个乡社准备联合闹教，地方官忙将教民遣散。据英国驻厦门副领事布拉德统计，仅漳州府一地，就至少有13座教堂被破坏。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吓得传教士们纷纷逃窜，全省多数教堂都是人去楼空。厦门群众曾在天主堂外高声辱骂，堂内传教士怕激怒群众，丝毫不敢作声①。

（六）广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在这一阶段中，广东佛山、潮州等地都发生了反洋教斗争，其中尤以潮州为甚。潮州一带在七月初以前基本上比较稳定，此后流传义和团在北方获胜的消息，对群众的情绪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相信外国人不久就将被逐出中国"，于是便阻挠教民作礼拜，继而又破坏教堂。至八月，这里的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在汕头附近的黄岗，群众攻击长老会和美国浸礼会的礼拜堂时，"具有副将衔的一位军官亲临现场，但无力制止"②。由于一些

---

①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九日；《英国蓝皮书》，第390页。

② 参见《万国公报》，庚子七月，第139卷；庚子九月，第142卷；《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八月初八日；《英国蓝皮书》，第331—339页。

教堂组织教民武装相对抗，群众便纷纷拿起了刀枪。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使英国驻汕头领事十分慌张，接连急电署理总督德寿，要求增派军队前来镇压，并急忙调来一艘英国军舰，“以防止骚乱进一步扩大和保护英国利益”。法国也连忙派了一艘军舰到汕头。但这两个庞然大物并没有产生多大的震慑作用，各处闹教的风潮照样进行。

（七）四川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四川省在庚子事变之前，外国教士活动异常猖獗。据《南充县志》记载：“当同治末年，传教者多法人。……入教者 非奸民即愚民。尝钻衙舞弊，干涉地方词讼，光绪庚子辛丑间，气焰尤炽，人民愈切齿。”人民群众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仇恨，集中在他们日常所接触的这批外国教士身上。于是反教会斗争便成了四川人民反侵略的主要形式。四川成了此期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反教会斗争最激烈的省份。当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具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四川人民，也立即展开了斗争。当时，四川的统治者张惶失措地说：“近闻有等痞棍，借口中外开兵，无端造谣纠众，抢杀教堂、教民。”①群众中普遍地流传说：“近日中国与各国开衅，有旨驱逐教士回国。”②6月25日，清廷命各省督抚派兵北上“听候调用”。正当奎俊准备兵马赴京时，大邑县唐场人民首先举起义旗，继之四川20余州县人民纷起响应，开展打教堂、逐教士、惩教民、起“勤王之师”的自发斗争，压抑、沉

① 《巴县档案》，“义和团专卷”。

② 《巴县档案》，“义和团专卷”。

闷、窒息的社会气氛为之一新，洋人、教徒骄横跋扈的行为受到惩罚，爱国保家的呼声日益高涨。7月初，大邑县民罗文榜“建旗‘顺清灭洋’四字”，操拳练武，远近来聚者数千人，并于7月9日起事。他们象两年前大足人民一样，捣毁教堂，惩办不法教民，“屯聚寨栅”，以拒官兵。12日，奎俊派高维寅、李鉴亭、刘桂峰等率清军前往镇压，并且任命成都知府刘心源“总办川南之匪”。清军在唐场大肆屠杀反洋教的人民群众，罗文榜被捕牺牲。这反映了当时四川官吏对于人民群众反洋教的斗争都主张毫不犹豫地进行武装镇压。这些大吏认为只要采取严厉的手段，对于清王朝的危局，仍然是亡羊补牢不为晚的。这一点与北方情况不同。

与大邑县唐场人民举事的同时，邛州城人民也纷起捣毁教堂，处死为非作歹的教民，并拟于中秋节前围攻州城。后因清军、团练防守严密，未果。此后，崇庆、温江、郫县、灌县、双流、崇宁、天全、汶川、彭县等地人民都以实际行动，声援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据当时报刊载：“近来成都西境颇不能安，教士洋人纷纷散去，留者亦为匪类所欺。城内教堂数座，岌岌可危。”①

7月10日，邻近的蒲江县教堂亦被愤怒的群众所毁。

邛州等三县人民起事失败后，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分子赔款，并以保教不力为由将知州李常霈革职，勒令大邑知县赵绥之“离省”，奎俊任命高维寅署邛州事。大吏虽采取高压手段，严防密访，但人民群众仍坚持斗争，入城宣传灭洋保国的主张。时邛州举人高重钊说：“邛民浮动，未殄余风。”

7月14日，雅州名山县武举庞世琪聚数千人，扎营天王寺，欲假道嘉定（今乐山市），北上“勤王”，并“焚劫教堂，逐教士”，惩教民，“阖邑惶骇”。奎俊命雅州府出兵镇压，署知府

①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李念兹星夜驰往。他污蔑群众的正义斗争是“干国宪，惑人心，……罪在不赦……是即乱民也”。并威胁说：“若归农，吾犹能活汝。否则大兵云集，赤若族，悔无及”①。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灭洋”队伍，在李念兹的恐吓下，大部分被迫解散。其中一部分仍坚持斗争，抗击清军数十昼夜，最后被李念兹委派的监生王玉田所镇压。事后，除赔款白银12万5千两外，名山知县卢鼎智被革职。刽子手李念兹也没有讨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川南主教通令清廷将他“开缺离省”。

同月，丹棱的任春、古老五等率领群众焚毁英、法两国教堂，驱逐教士，“眉、丹两境为之骚然，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②。丹棱人民响应北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后被县令萧寿琪所镇压，任、古二人均被捕牺牲，打教人民的财产被官府抄没。

是时嘉定府城人民亦在酝酿驱赶教士之举。基督新教教士赫斐秋听到有人在他的住宅附近谈论反帝之事，立即将一张名片送到县衙门，要求清吏立即捕拿此人，县官一一遵命③。

7月19日，当时成都将军绰哈布、四川总督奎俊鉴于川南震动，京师更加混乱，他们便接受刘坤一、张之洞的建议，参加“东南互保”，在其告示中说：“川省系长江上游，自当一律办理。……各国官商教堂及游寓洋人之在中国者，自应按照无论何国，一体保护。”④此后，各级官吏也颁布了数不清的保教告示，对于“仇教”的人民，加上“大干典刑”罪名，妄图以此来压服四川人民。

就是在一片保教的狂嚣声中，以盐工为主的自贡人民，又于7

① 《名山新县志》，卷15，“文录”。

② 民国《丹棱县志》，“职官志”，第15页。

③ 《赫斐秋传》，英文版。

④ 《巴县档案》，光绪廿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月30日捣毁了豆芽湾、两口塘二处教堂，并“将大部分信教徒的房屋及其部分家具打烂”①。传教士杨某在地主豪绅的保护下，逃到县城，“知县玉润田肃衣冠延见，……杨司铎盛怒疾声谓：‘你管的奸百姓，打了我的教堂、教友，限你三天办人赔款’。言时以代手杖的旱烟杆击桌有声，傲慢无礼，有甚于上司之命令下属”②。之后，玉润田将起事的首领陈敬斋、王黑棒“站笼”处死，并偿款5千钏。这笔赔款不仅重建了两处教堂，不少教民还因之致富。此外，玉润田还亲自署名，刻立保教碑，竖在教堂门口，严禁人民“打教”，一副帝国主义奴才相暴露无遗。

8、9月间，成都附近的群众，成群结队，自称“保国团”，到处打击外国教会侵略势力③。

是年秋，余栋臣旧部刘玉龙由湖北回川，欲在云阳县起事。云、开、万三县派兵追击。刘玉龙旋即东下汉口，与湖北富有票党人联合，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进行反清斗争。后被川军搜捕，牺牲于开县。

从大邑发难以来，邛州、崇庆、温州、郫县、灌县、双流、崇宁（今郫县先锋乡）、天全、南部、汶川、彭县、梁山（今梁平）、大足、永川、名山、蒲江、丹棱、犍为、荣县、宜宾、富顺、眉山等23个州县都掀起了反洋教斗争，仅“双流等八州县（教民）被毁五百余家之多，邛州尚不在内”④，“各处法国教堂、经堂、医馆、书馆以及教民房屋多被焚掠”⑤。不法基督新教教民被惩罚者“眉州教民七家，丹棱县教民十八家，荣县教民三家，

---

①② 《自贡人民反洋教斗争纪略》，原稿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③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38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69页。

⑤ 《清档·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光绪二十七年，奎俊折。

郫县教民五家，名山教民一家”①。四川人民发动的反洋教斗争，并与清军武装对抗，对北方义和团运动给予了有力的声援。它牵制了大量清军及武器北调，在“东南互保”的后院，燃起了反帝的怒火。从某种意义上讲，四川在1900年已经出现了义和团运动。

（八）其它小规模的打教事件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后，义和团运动高潮过去了。南方的反洋教斗争在九月以后，虽然不如六、七、八月间的高潮阶段那样如同疾风暴雨般猛烈，但仍然连绵不绝，个别地区甚至还有所发展。这种状况，从主观上来说，是因为各阶层群众激昂的反洋教情绪不可能随着形势的逆转而立即平息；从客观上来说，是由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因素所决定；但从总体上说，斗争规模下降，声势逐渐减弱。从整个情况来看，也不同于停留在零星分散、旋起旋灭状态的第一阶段。虽然再没有象衢州、衡州那种击毙洋教士多名的重大“教案”，但在某些地区斗争的激烈程度仍使教会势力丧胆，武装打教事件的比重还相对增加，参加斗争的社会力量仍然比较广泛。

这个阶段斗争较炽烈的是广东、湖南。

10月以后，广州府的顺德、新会、南海、番禺、东莞、新安等县及嘉应州、肇庆府的部分地区又掀起了反洋教斗争。深圳千余名武装群众在攻击教民、驱逐清军时皆身穿义和团式样的衣装，以争取民众的支持。湖南衡阳的反洋教斗争也一直在持续着②。

---

① 《清档·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光绪二十七年，奎俊折。

②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初十日、十三日、二十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九月十二日、十六日、二十六日；另见《万国公报》，庚子八月，第140卷；辛丑三月，第174卷。

这种蓬勃的斗争局面所以出现，与当时流传在广东、湖南的伪“上谕”有关。如湖南衡阳一带，九、十月间有所谓“上谕”及“和约”流传，内容是联军如何败绩，各国如何乞降等等①。受此影响，群众纷纷传言：

> “两宫西幸乃出于计，非迫于势。盖两宫即出，西兵始敢入京，华兵乃环而攻之，不啻驱鱼入网。今西国兵舰被毁殆尽。斯言也，喧传茶肆，遍布酒楼，乡人闻之而喜，市人闻之而传。又有好事之俦怂恿闹教，谓及今不灭洋教，尚待何时？于是一呼百应。”②

> “衡阳府所属各教堂全被拆毁，教民统被拘拿，勒逼悔教。”③

此类“伪谕”、“伪约”，显然是受到了义和团及上一阶段南方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是人民群众的一种有效的斗争方式，是动员人民继续斗争的宣传手段。故自九月至年底，其它各地也不断发生反洋教斗争。其中规模较大者有：九月间川鄂交界处巴东、长乐一带两省群众千余人“仇教起事”④；十月间皖南地区“焚烧教堂，大为不靖”⑤，建德教堂继1869年教案再次被毁；巡抚王之春派炮队前往镇压，才未酿成巨案；十一月湖北沔阳、江西上高、新昌群众“日向教堂、教民寻仇”⑥；年底，浙江温州府神拳会反洋教斗争复炽，不仅打击了教会，还一度打败了清军

---

① 《义和团》，第1册，第259页。

②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③ 《张文襄公全集》，第164卷，第23页。

④ 同上，第165卷，第5页。

⑤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

⑥ 《万国公报》，庚子冬月，第144卷；辛丑二月，第146卷。

和团练的围剿①。

1901年春夏，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反洋教斗争的低落阶段。同前三个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斗争主要内容是反对洋教势力的卷土重来，反攻倒算。1901年初，清政府接受了各国提出的“议和大纲”，标志着它已经向外国侵略者彻底投降，成为“洋人的朝庭”。在中外反动派的全面勾结之下，各地教会势力纷纷卷土重来，进行反攻倒算，激起了许多地区群众的反抗。如浙江诸暨的基督新教教堂上年被毁，1901年春教会勒逼地方赔建了新教堂。新教堂竣工之际，教会准备大张旗鼓举行落成典礼。洋教势力卷土重来，使群众非常愤慨，于是聚集千余人，“声势汹汹，谓吾等去年拆堂，欲逐尽洋教，以至四人授首。今尔又想来耶？吾等费尽心思，岂肯容汝等？当来一人杀一人”，乃绑教民二人欲杀，洋教士慌忙“逾垣逃出，匿农家，得以无恙”②。湖南衡州群众在此时也先后“聚众滋事，阻挠天主教起造教堂”③。浙江宁海县天主教堂重建后，教士、教民挟威横行，愈益肆无忌惮。伏虎会便再次发动群众于五月间将其焚毁④。江西是洋教势力反攻倒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教堂赔款一项，就索白银六十余万两。“地方有司委曲迁就，赔款累累皆倍敛于民，于是民教之仇怨深矣”⑥。对这种仇怨情绪，教会不去缓和，反而火上加油，“开具应办绅犯多至二百五十名，均指定正法、军遣罪名”。“绅民骤闻此信，内不自安”，纷纷奋起打击教堂、教

---

① 《温州近代史资料》，第176页、182页。

② 《汇报》光绪廿七年四月十五日、廿二日；另见《万国公报》，辛丑三月，第147卷。

③ 《张文襄公全集》，第173卷、第17页。

④ 《浙江近代史》，第195页。

⑤ 沈祖恩等：《教务辑要》，序言。

民，以此来对抗教会的报复阴谋①。上述这种斗争，主要发生在1900年反洋教比较激烈的地区。

除了这些地区以外，福建诏安、福宁、福安，浙江浦江，广东廉州、香山等地也不断发生群众攻击教会的事件②，其中尤以四川反教会斗争，最为频繁。3月2日，泸定县民祝华山率众毁冷碛教堂，劫法国司铎牧守仁，“肆其要挟”③。夏初，川东出现“灭清剿洋兴汉”的揭帖，号召打教灭洋，川东震惊④。9月，川黔交界綦江县青羊市，发生陈秀俊率领“拳匪”打教事件，“摇动邻封”⑤。总的说来，这些地区的斗争一般都规模不大，只能说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反洋教斗争的尾声。

以上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反洋教斗争起落消长的基本情况。通过对这个基本情况的了解，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看法：第一，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的反洋教斗争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程度之激烈，都是空前绝后的，堪称近代中国南方反洋教运动的最高峰；第二，不仅北方义和团运动对南方反洋教斗争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南方反洋教斗争对北方义和团运动也给予了有力的声援。从这个意义上说，1900年前后一、二年的南方反洋教斗争，应该说是全国义和团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在斗争性质、口号、打击对象、队伍构成、悲壮结局诸方面，都是很相似的。

---

①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328页。

③ 《锡良遗稿》，第1册，第371页。

④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八日。

⑤ 民国《桐梓县志》，军务志，（下）。

五、各阶级、阶层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态度和作用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日益加深了，人民反洋教的规模也就日益扩展开来。“人民运动开展得越广泛，各阶级的真正面目就显露得越清楚。”①认真剖析义和团运动前几年（1896——1899年）和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动向及其对反洋教斗争的态度，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义和团运动之后的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而且对评论其功过是非也不无意义。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必然触及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因而在运动中，尤其是在教案中，各个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也必然不尽相同。

（一）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在这场反洋教斗争中很活跃，其动向也很复杂。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受洋教的危害比其它阶级更大。在洋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首先，洋教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冲击很大。“严华夷之辨”历来是中国地主阶级的一个指导原则。“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②。所谓“一道同风”，就是把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心理、习俗，统一在儒家尧、舜、禹、汤、周公、孔孟的“圣道”之下，就是“中国之人自有中国之教，为中国之子民，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189页。

② 王阎运著：《湘绮楼文集》，卷2，“陈夷务疏”。

即当尊重中国圣人之教”①。西方教会以“不道不孝”、弃伦灭理的洋教来“强中国”，“欲用夷而变夏”②，势必会破坏这样的“一道同风”。

其次，洋教势力的发展危及到地主阶级的江山社稷。洋教势力僭权越柄，欺官凌民，“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③，严重破坏了封建国家的主权。更危险的是，它还“布小惠，行小善，阴结人心”④，使人们成为“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国法”的“叛民”⑤。而“国家治安天下，以固人心为本”，一旦人心全为洋教邀结，“天下皆教民”，则“国本动摇”⑥，洋人便可“里应外合，好谋中国的江山”⑦。因此，如果“不亟防维驱除”洋教，“国将难与立乎？”⑧

第三，教会势力大大损害了地主官绅个人的切身利益。就官而言，洋教势力对其切身利益的危害，主要是打击了他们的尊严，递夺了他们的一部分权力，使他们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礼节仪舆上的严格规定，代表着官府的权威与尊严，历来不得僭越滥用。而传教士对此森严的等级体制却大加冲击，“所到各省，无论有无官爵，辄与大吏抗衡，且乘坐绿舆，仪从喧耀”⑨。在与地方官交涉事件中，传教士则“经用公文达之巡抚，其藩臬以下

---

① 《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14页。

② 《中西纪事》卷16，第6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2，第16页。

④⑤ 《啸古堂文集》，第3卷，第15页。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页。

⑦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1299页。

⑧ 《啸古堂文集》，第3卷，第15页。

⑨ 《教务档·四川教务》，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成都将军崇实奏》。

等官，具有不屑与言之意”①。他们甚至冲闯官署，咆哮公堂，殴辱官吏。由于教士恣意妄为，教民也就蔑视官吏，与官吏分庭抗礼②。洋教势力如此跋扈，对官府的尊严不能不是很大的打击。事情还不止于此，洋教势力简直形成了一个凌驾于中国官府之上的独立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由教士、主教、外国领事、公使组成，它通过干涉与教民有关的一切事项，特别是民教词讼，造成“中国之法止以治平民，不能治教民”，“一经入教，无论如何，地方官不能过问”③的局面。从而把对教民的治理从中国官府手中剥夺过去，大大破坏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主权。洋教这个独立的权力系统由于有外国公使所代表的强权为后盾，在与地方官府的交涉中总是掌握着主动。凡与教务有关之事，教士总是夸大其词，以危言耸愿诸领事、公使。而一经公使照会，总督无不立饬催办或查复，地方官稍有不慎，即遭处分，轻者申斥、记过，重则降调、撤职。地方官处理民教纠纷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大有“人人自危”之虞④。这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有极大的危害。

绅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历来在礼仪、司法、税役、社会事务等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在地方上拥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居于一方社会领袖的地位。百姓自不待言，连地方官也须对其敬畏几分。但洋教势力进来后，传教士恃仗强权，从各方面向绅士的特权地位发起了猛烈冲击。教士“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年教堂，逼令民间退让”⑤，致使不少绅士祖业私房落入教会之手。而教堂霸占土地，拓佃耕种，更是损害了绅士赖以生存和发

① 《教务档·四川教务》，同治十三年二月初六日：《总署收山西巡抚鲍源深函》。

② 《筹办档务始末》，同治朝，卷91，11页。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490，第9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80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2，第22页。

财的根基；教士把治外法权推及教民身上，削弱了绅士对宗族和民众的控制；教士又通过经常举办慈善事业与绅士争夺人心，通过兴办新式文化教育，影响绅士现有的社会地位和科举仕途的畅通。总之，传教士为所欲为，俨然以地方太上皇自居，绅士无法与之抗衡，不能如过去那样威震一方。这种教权严重威胁着绅权，甚至完全压倒了绅权的局面，是一向养尊处优的绅士们不能甘心容忍的。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地主阶级无论是为了保卫“圣道”，还是为了保卫国家，保卫自己，都必然要反对洋教。

地主阶级对待洋教的态度在十九世纪末也有些变化，这主要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对封建统治者的控制日益加强，地主阶级内部产生了一些分化，各派别、各阶层间反洋教的态度出现了激缓强弱的较大差异。相对而言，顽固派由于是“圣道人心”最坚定的维护者，时刻梦想恢复闭关自守的“盛世”，因而嫉“洋”如仇，反洋教态度最为激烈。洋务派由于“通达时世”，又带有若干买办色彩，认定以中国之力得罪不起外国，洋教既恃强而来，中国只能妥协忍让，对“教士虚与礼貌”，“俾免据为口实，致生事端”①，所以反洋教的态度最为缓和。地方封建绅耆由于个人利益受洋教冲击最大，思想上恪守于封建古训的旧圈子，和洋教的“异端邪说”对抗最尖锐，不负担行政责任，不必介入与洋人交涉的棘手事务，却又为“尊王攘夷”的传统所支配，对洋教怀有极强烈的憎恨感和清除洋教的责任感，持反对态度十分明显。当政者由于负有治土安民之责，动辄需与洋人交涉，时时受到洋人的压力，为求平安无事，反洋教的态度一般比较隐讳。其中，下级官吏由于受洋教的直接压力较大，又“不娴约章”，容易“惑于狂夫之言，泥于书生之见”②，

①② 《教务辑要·叙》

反洋教的态度比较强硬；高级官吏由于更直接地承担执行不平等条约的义务，一举一动都为洋人注目，不敢越雷池一步，反洋教的态度就比较软弱。地主阶级各派别、各阶层对待洋教的态度所存在的这种较大差异，以及当时全国错综复杂的形势的影响，决定了地主阶级在这场反洋教斗争中必然表现出复杂的动向。

顽固派和洋务派对反洋教的态度有着明显不同。顽固派是对人民斗争名为压制，实为纵容。当时各省大员中比较典型的顽固派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湖南巡抚俞廉三、江西巡抚松寿、布政使张绍华、浙江巡抚刘树堂、按察使荣铨等。俞廉三是刚毅的门生①，在戊戌变法时就伙同王先谦等破坏湖南的变法维新②，继陈宝箴为巡抚后，又对维新派人士及有牵连者严厉打击，大大助长了湖南顽固派的气焰③。他对洋人更是素来“嫉恨如仇”。据说他闻日本公使书记生被杀之信大喜，当即传令演剧庆贺④。松寿、张绍华平素对与洋人交往者深怀嫌忌⑤，对洋教势力的张狂，更是深恶不已⑥。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他们立即尊旨派军清上“勤王”，松寿还几次三番要求亲自督兵入卫⑦，可见他对北政府的政策非常拥护。刘树堂顽固守旧，诸事多从荣铨之意。而荣铨之顽固守旧，“嫉视外人，毫无隐讳”，较刘树堂有过之而无不及⑧。反洋教斗争达到高潮时，刘树堂等虽曾饬令各属保护教堂，但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外国领事曾面请刘树堂设法保

①《义和团》，第3册，第416页。

②《虚受堂诗存》卷16：《赠别廣轩中丞》。

③《师伏堂日记》，庚子年正月二十日。

④《拳匪纪事》，卷3，第76页。

⑤《北清事变》，第138页。

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888页。

⑦同上，上册，第226、362页。

⑧同上，下册，第1018页。

护洋人，刘答以“保护载在约章，为守土官专责，但恐事机猝发，或不及防，究以暂避为妥”①。言语间颇有推托之意。刘树堂、荣铨还对违背他们意图，积极保护洋人的属员予以处分②。对于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刘树堂等基本上抱听之任之的态度，往往是在外国领事及刘坤一等人的压力下，才被动地采取一些防范和压制措施。连奕劻、李鸿章后来在与各国谈判中为他们辩解时也承认，刘树堂“乱后仍留浙江任四阅月，除将要员撤任，凶犯毫未拿办”③。

再比较一下俞廉三对“衡州教案”与“自立会”的不同处理，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顽固派对反洋教斗争的态度。在衡州教案发生之后，张之洞再三电令俞廉三迅速“派兵弹压”，“拿办首要”，“撤参道府”，俞却按兵不动，置之不理。以至张之洞不得不警告他“切勿再延，自贻伊戚”④。而汉口自立会机关被破获后，俞廉三却立即在湖南“搜捕余孽”，“大索反者”，气氛十分森严。“拿得党羽三十余人，立即枭首”。连张之洞专电指示勿杀的唐才常，也未能幸免。全省受株连者数以百计，一时“街市无敢偶语者”⑤。如此迅速坚决的行动，充分证明俞廉三等不积极镇压反洋教斗争，实在是不为也，非不可为也。

江南的顽固派这种十分消极的态度，正是他们仇视洋教的立场在特殊条件下的曲折表现。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的反洋教

---

①《万国公报》，庚子年七月，第139卷。

②《英国对华外交档案》，第46页。

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018页。

④《张文襄公全集》第163卷，第18页；卷164，第2页；第165—169卷有关内容；《师伏堂日记》，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

⑤《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万国公报》庚子冬月，第145卷；《张文襄公全集》，第169卷，第14页。

斗争发展得很快，这与他们的纵容有很大关系。正因为如此，各国才把俞廉三、松寿、刘树堂等列入所谓“犯罪官吏”名单，要求给予惩处。

如果说俞廉三等高级官吏只能用名为压制，实为纵容这种比较隐讳的方式来表达其反洋教立场的话，那么，地主阶级中下层参加反洋教斗争的方式就直接了当得多。他们或是公开 怂 勇 支持，或是直接组织领导群众反洋教。一般来说，官吏多为前者，在野的士绅多充当后一种角色。这是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突出动向。

中下级官员怂恿、支持反洋教斗争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湖北襄阳县令李祖荫，在群众焚打黄龙垱教堂时，亲赴黄龙垱街，命地保鸣锣传集教民立悔教结，又出示令教民背教。于是全县教民大受冲击，打抢教堂的事件迅速增多①。广东盐运使国钧之子“自京抄寄伪上谕，大旨谓李秉衡尽淹联兵，义和团杀尽教民，特此通饬督抚一体遵照云云”，某旗员“见之如 获 珍 宝”，即“飘报馆登之”。“粤人喜看报，于是四、五十州县同时焚掠教堂，劫杀教民。长乐县一见报纸，即装头装脚，出示通饬。于是无赖之民益无忌惮”②。顺德县八月间谣言四起，“谓必尽杀教民而后已”。广州主教因而致函县令王崧，要求保护教堂，王未加理睬。群众开始打击洋 教，王 又 拒 不派兵弹压，相反却违抗督抚的指示，“发差到乡，勒令教士点妥各物，从速离境”，致使四乡遍传“官长已有明文逐教士出境，将教堂封闭入官，教民房屋物产任凭民人抢毁，定无追究之理”③，反洋教斗争立即在全县掀起高潮。安徽祁门县教谕曹笙南见群众反洋教情绪高涨，

---

①《拳祸记》，下篇，第470页；另见《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290页。

②《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③《拳祸记》，下篇，第470页。

遂谋“借此以绝教之根株”，便“将伪谕传播分送，并伪造北电谓西军如何败绩”，煽动群众打击教民，群众受此影响，“大书揭帖，云奉旨仇教”①。湖南、江西、浙江三省中下级官吏因上司倾向于反洋教，所以积极支持反洋教斗争者更多。湖南衡永郴桂道隆文、衡州知府裕庆，“皆满州人，素怀仇教之心”。在反洋教斗争发生前，曾将“宣战上谕”大肆张扬，促使衡州城乡反洋教情绪进一步高涨。7月3日，清泉县教堂被焚后，黄沙湾总堂派教士进见裕庆，请求保护。裕庆拒不接见，“令门丁回言，已奉诏灭教，不能保护”②。衡州全府掀起反洋教斗争后，隆文、裕庆又分别发布告示，“以毁教为义忿，逼民悔教”，“其词意一若教堂被毁，洋人被杀可不追究，从此教士可不回衡，教民尽可劝令悔教者”③，并且封锁教案消息，不许邮局递送教堂、教民往来函件④。当迫于压力不得不“拿办凶犯”时，裕庆又将为首闹教之彭兰生放走，而以在这期间因抢钱店已被处死刑的四名哥老会成员顶替蒙混⑤。江西吉安、赣宁道涂椿年、吉安知府许道培、赣南镇总兵何明亮等，接到刘坤一关于保护洋人教堂的告示后，拒不张贴公布。当群众焚抢赣州城内天主堂时，又拒绝教士的告急请求，任凭反洋教斗争蔓延扩大。并派遣城守营勇丁及地保等通告群众，只许打抢教堂、教民，不许抢错。其他如南丰知县邓宣猷、南城知县翁宝仁、清江知县石守谦、上高知县文聚奎、浮梁知县任玉森、信丰知县李田曾等都程度不同地怂恿和支

①②《汪穰卿先生传记》，第3卷，年谱二，第13页。

③《张文襄公全集》，第165卷，第17页。

④《拳祸记》，下篇，第463页。

⑤《师伏堂日记》，庚子年七月初七日；《英国蓝皮书》，第428页。

持当地的反洋教斗争①。浙江刚刚声明参加“东南互保”，温州知府启续就出示招集拳民，并赏给神拳会首领许阿雷六品军功以示激励，且称系巡抚批准。这一举动使神拳会大受鼓舞，乘机扩大力量，攻打洋教更为活跃②。虽然启续旋因驻上海各国领事不断施加压力而被刘树堂撤职，但温州仍然有不少人，如洋务委员郭钟岳、统领范银贵、署总兵胡硕功等，对神拳会反洋教斗争持明显的支持态度③。诸暨县群众在打教堂时，驻扎该地的副将戴某不设法镇压，却指使部下士兵和群众一起“四处拿教”④。余姚、乐清、玉环、桐庐等县地方官也都“玩误教案，纵匪滋扰”⑤。

有人在义和团运动前夕曾这样描述地方官与洋教势力及反洋教斗争的关系：地方官平时为传教士挟制，对民教交涉之案不能持平办理，往往压抑平民，希图易结；而洋教势力借官之势，益肆欺凌；平民因官不能为其作主，积怨成仇，便起而反对洋教；官吏正苦于无法对付洋教，亦思借民力以图报复，于是就支持平民反洋教⑥。这个描述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上述中下级官吏积极怂恿支持反洋教斗争这种动向是非常有益的。但还应该补充一点，在义和团运动初期，官借民力以图报复的作法，因为符合朝廷的政策而成了一种合法行为，这必然会促使官吏更积极地支持民众反洋教。

---

①《拳祸记》下篇，第482、484页。

②《万国公报》，庚子年八月，第140卷；《平阳县志》，卷18，“武卫”二。

③《汇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23页。

④⑤《汇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第二十七日。

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

地主士绅在反洋教运动中历来很活跃，几乎每次大的斗争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中有散布传单、揭帖、流言、书刊，鼓动群众起来反教者，如江西新昌、湖南衡州、广东新会、香山等；有指使他人纠众打教者，如江西南昌、吉安、广东陆丰、浙江玉环等；还有在群众行动起来后，便立即参加，推波助澜者，如江西南昌、湖北襄阴等；最普遍的还是直接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反洋教斗争，这种情况以浙江衢州最为典型。浙江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及刘家福反清起义爆发后，衢州团练头目罗楠、举人郑永禧、提督罗某之子罗道权等，便与城守营都司周之德积极策划发动反洋教斗争。他们先散布谣言，煽起群众的反洋教情绪，随即带领团练武装及大批群众，“大索城内传教西士，不论男女老少，尽皆杀之”①。当然，没有罗楠、郑久禧的支持，衢州可能同样会爆发反洋教斗争，但罗、郑等人的领导和组织，无疑是衢州成为中国反洋教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的重要原因。

地主阶级中下层的这种动向，对这场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但哪里有地主阶级中下层积极参加，哪里的反洋教斗争就掀起高潮，而且凡是反洋教斗争最高涨的地区，都是地主阶级中下层最活跃的地区。当然，地主阶级中下层中也还有一部分人同洋务派一样，站在斗争的反面，甚至竭力镇压群众斗争。但和任何复杂的事物一样，地主阶级中下层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也必须分为主导方面和非主导方面。地主阶级与洋教的矛盾，决定了反洋教才是地主阶级本质的表现，因而，反洋教这一方面就是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主导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积极参加反洋教斗争是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突出动向。

---

①《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万国公报》辛丑年三月第146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第50页；《衢县志》，卷9，第36页。

地主阶级上层顽固派和中下层所以能参加这场反洋教斗争，除了前面已经指出的那些原因以外，还有这样两个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日益衰弱，吏治不整，纲纪不振，绅权日隆的倾向越发严重。到义和团运动前后，不但督抚大员已经不那么俯首贴耳听命于中央，就连下级官吏对上司也多敷衍对抗，令不能通行、禁不能立止的现象十分普遍①。而绅士势力的扩张，在很多地区又达到了足以使地方官非仰其鼻息不可的程度。例如湖南慈利县“绅权日大，每公事期，辄上座执牛耳，其曰可，人可之；曰否，人亦否之也”②。再如江西吉安府某县，官吏欲支持反洋教斗争，而绅士欲压制，谓官曰：“设异日有赔款办人之大案，亦惟累公独任之，于地方绅士无涉。”官乃惧，允照绅士议办理。这虽是绅士压制反洋教，但同样可以证明他们在地方公务中的作用。绅权扩大的状况，为地主阶级中下层积极参加反洋教斗争，进一步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因此，在南方，虽然热衷于“东南互保”的督抚如刘坤一、张之洞等再三饬令下属认真保护洋教，却仍然有很多地方官站在反洋教斗争的行列。有一些地方官有心保护洋教，却无力制止绅士们反洋教，甚至被其推动亦不得不反洋教。如，衡州团总、绅士在发动反洋教斗争时，先把与教士关系密切的知县吴德潇缚送道署惩办，道台畏难，言“吾力不能遽及，尔自治可也”。迨其杀教士、攻教堂时，道台、知府对坐道署内，听任事态发展③。

第二，戊戌变法以来，新旧势力斗争的影响，又从主观上进一

---

①《光绪朝东华录》。

②民国《慈利县志》，卷15，“人物”，第15页。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360页。

步激发了地主阶级上层顽固派和中下级官吏及士绅反洋教的积极性。被地主阶级绝大多数所恨之入骨的维新派，与某些传教士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特别是在戊戌变法中以及其后的新旧斗争中，二者的关系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曾加入强学会，百日维新期间又被光绪帝聘为顾问。变法失败后，这些传教士及其本国政府仍然明显地站在维新派一边，不仅帮助、接纳康、梁等维新派领袖逃亡，而且干涉、破坏顽固派的废立阴谋。顽固派及多数中下级官吏、士绅本来就对洋教的异端邪说咬牙切齿而又惶惶不安，目睹“大逆不道”的维新派与洋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不能不使他们心中充满疑忌，并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们愈仇视维新派，便愈仇视洋人，恨不得用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大刀将洋人斩绝杀尽。这种心理对推动他们积极反洋教有很大作用。湖南地主阶级中反洋教的呼声很高①，与湖南的顽固派势力很强有着必然的联系。而江苏地主阶级中极少数有参加反洋教斗争者，与江苏始终是维新派占上风不无关系。在这一方面，“衡州教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衡州教案”中被杀死的西安县令吴德潇是个曾参与创办《时务报》，与康、梁等颇通声气的维新派人士。顽固派官绅对他平日与教上交往密切，积极提倡“新学”等作法十分不满，双方矛盾很尖锐。团练、士绅等便趁刘家福起义军逼近衡州时，以“吴令通匪”的罪名将其杀害，又以教士“与吴令同谋”为由，煽起了一股大杀传教士的风潮②。

但是，地主阶级毕竟是一个腐朽没落的阶级，因此，和清政府逃出北京后立即向帝国主义投降一样，地主阶级中一些人在形

---

①《张文襄公全集》，第169卷，第38页。

②林纾：《记西安知县吴德潇全家被难记》。载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360页。

势逆转后也纷纷向洋人教士乞降。如荣铨在八月间还上奏攻击“东南互保”，表白自己的“义胆忠肝”，及至得知各国将其列入“惩办”名单之后，便脸孔一变，苦苦哀求数月前曾被他斥之为“苟且偷安”的李鸿章等“鼎言挽救”①。俞廉三也电恳李鸿章等“向各使及联军各统将代为开脱误奉矫诏，密饬各府州县戕杀教士焚毁教堂诸罪名，且表白不得已之苦衷”。衡阳洋教士到长沙索要赔款，他“特派重兵前往保护，并治番菜请教士入署筵宴”②。衢州团练头目郑锷及举人郑永禧，也指使家属在传教士任芝卿门前乞求“保全生命”③。

综上所述，地主阶级内部对反洋教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分歧。这种复杂的情况与当时全国特殊的形势相结合，就使得地主阶级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反洋教斗争中，表现出复杂的动向。

（二）农民阶级

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受洋教迫害最深，因此在这场反洋教斗争中奋不顾身，表现得十分积极和勇敢。

农民群众与洋教的矛盾是全面而又深刻的，不仅表现为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矛盾，而且同样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对立，风俗习惯的差异，政治生活的冲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农民群众所散发的反洋教揭帖、告白中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口号，始终都渗杂着保卫礼仪、人伦、孔圣正教以及迷信的思想。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亡日益严重，洋教势力对群众的苛

---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06页。

②《万国公报》，辛丑年三月，第147卷。

③翁楚望：《任芝卿与衢州教案》，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02页。

虐凌辱日益加剧，“民教对立”便日益激化，农民群众反洋教思想中的“卫道”色彩也日益减弱，而反侵略、反压迫的自觉意识却日益增多，迷信则逐渐成为组织群众的手段。这些口号、揭帖、通俗图画、歌谣等便也成了号召民众的武器。

1891年，湖南流传着一本用朱墨套印的反洋教通俗图画，题名“天猪教”。“天猪教”为“天主教”的谐音，书中将洋人写作“羊人”、将甘心充当内奸的中国教士，写作“猪羊兔之子孙”。图画上，绘一恶形猪精，三个官吏环向跪拜，旁有一外国传教士侮凌中国妇女；另一类似巨绅的华籍教士匍伏在猪精胯下、手捧元宝；又有一壮汉，手执大刀，刀柄垂红缨，作准备屠猪形状；另一壮汉将《新约》、《旧约》投入火炉中焚烧，烈焰熊熊，观者如堵，无不欢心鼓舞。图两旁，有对联云：“甚至天主教，妄称天父天兄，伤天理，灭天伦，何时遭天谴天诛，天才有眼；这般地方官，都是地棍地痞，抽地丁，完地税，他日看地崩地裂，地也无皮。”图画中猪精的狰狞形象，表达出一切侵略者的本来面貌。同时也描绘出官绅们的媚外丑态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召力。

另外，湖南流传的歌谣揭帖也很多，如：

“睁眼看，鬼子们，狼心狗胆。但邪教，欺骗我，一班良民。说他是，上帝爷，独生爱子。把中国，不当人，任意欺凌。尤可恶，有一些，贪官污吏。媚外人，欺己国，秀士良民。更可叹，居然有，一班痞棍。拜奉他，猪羊鬼，作子亢孙。三顶拐，上衙门，冲进撞出。辱祖先，毁圣道，败灭人伦。引强徒，窥伺我，廊房财宝。三分人，七分鬼，丧惑人心。”①

正是这种与洋教势力全面而深刻的矛盾，以及日益增多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自觉意识，促使农民阶级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投身到

---

①《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4期：《周汉与反洋教斗争》。

这场反洋教斗争中来。无论地主、官绅对斗争采取什么态度。农民始终是这场斗争坚定不移的主力军。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行动，才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规模；如果没有他们的参加，就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反洋教斗争。

（三）会　党

会党对洋教的态度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地说，会党是反洋教的，但又有若干特殊性。会党主要是游民无产者互相扶持、休戚与共的组织，到十九世纪末，不少会党已渗透到乡镇、农村甚至基层政权及营伍之内。由于游民无产者是非常“动摇的阶层”，“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①，所以会党成员的作为也就很复杂。按《江湖汉留宗旨》这本会党自己的文献所言，“要分几等”：一是有政治抱负者；二是只求生活上互助者；三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四是横暴乡里惹事生非者；五是专门以偷抢为职业者。会党的游民无产者性质及其成员的复杂状况，使得它在政治上缺乏明确的原则和目标。但是，它又是中国下层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最能联系社会地位低下的贫苦百姓，代表他们的利益。由于会党是中国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一个部分，因而它也必然受洋教与中国社会矛盾的一般规律的支配而反对洋教。但由于游民无产者阶层的特点，会党的反洋教态度又有不同于其它阶级、阶层的特殊性：第一，会党不一定都反洋教，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有的会党就站在反洋教斗争的对立面；第二，洋教与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对会党影响不大，因而会党之反洋教，很少或全无“卫道”的成分；第三，会党反洋教的动机和目的多种多样，有从民族危亡出发；有借以制造事端，争取和发动群众，以掀起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反清斗争；有由于身受洋教势力的压迫，冀图反抗报复；亦有专为抢夺财物者。

会党反洋教态度上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在这场反洋教斗争中表现的多样性。

第一类中，投靠封建统治者，充当镇压人民的鹰犬。长江下游哥老会宝山堂主徐老虎，手下拥有十数万人，是这一带会党中力量最大的一支。1900年6月间，各地反洋教情绪日益高涨以后，刘坤一和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等为了稳定局面，防止会党起事，在张謇的积极策划下，设法招抚了徐老虎，命其部下选送五千精壮士兵，配给三十艘炮艇，组成了“新胜营”，全部由其统带。徐老虎深感刘坤一“破格之恩，力图报效”①，不仅在镇压自力军和别支会党中十分卖力，“颇多缉获”②，还严禁部下反洋教。当他闻知手下人在芜湖以义和拳名义散布揭帖名片时，便立即“亲往向众说法”，予以制止③。

第二类，为其它社会力量所利用，充当了政治工具。这主要是长江流域各省参加自立军的哥老会、红教会等。秦力山在《黄帝魂》的第三十八篇《林锡圭》一文中记述说：

> “林初至汉口时，仅识数人。所有者，不过三数百金。而招集各会头目，激之以义，动之以财，感之以信诚，饵之以爵位。其后北至河南，南至湘桂，西至巴蜀，东至九江，为时不出一年，所费不过三万，终能屈服数百万杀人行劫之无赖游民于指挥号令之下。”

此处说的数百万人，显然是夸张之词。据自立会所散发的

---

①《万国公报》庚子年八月，第140卷；庚子年冬月，第145卷。

②《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334页。

③《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富有票”数来看，当在三十万人上下①。这三十万会党改易宗旨，“一切听自立会之指挥”②，因此也不反洋教，而注目于赞助武装维新变法。

第三类，竞起滋事，极为活跃，但并不参加反洋教斗争。如在长江下游，除被招抚的徐老虎一支及参加自立会者外，其它青帮、红帮、小刀会等自“北方拳匪事起，闻风蠢动”，抢财劫物，掳人勒赎，强贩私盐，开堂放飘，聚赌抽头等无所不为，“虽经地方官随时拿办，此风仍未稍息”③，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截掳道员，格杀营官，毫无忌惮④。再如浙江，虽然反洋教斗争甚为激烈，几遍全省，但各属会党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并不多见。台州府各属纷纷打击洋教时，曾有会党进入新昌县城，“连劫店铺十九家，饱掠而去”，并未动教堂一砖一瓦⑤。刘家福领导的终南会起义，虽然是在义和团运动和本省反洋教斗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下展开的，但并没有完全把教堂、教士作为攻击的目标⑥。甚至同在宁海县，这边伏虎会四处打击教士、教民，那边会党横行劫杀居民、行客⑦。这种反洋教斗争与会党起事各自为战，互不相关的现象，在其它各省还有不少。

---

①《张文襄公全集》，第51卷，第25页。

②《平等阁笔记》，卷4。引自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第288页。

③《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854页；《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十八日、二十九日，八月初八日、十二日、十五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

④《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355、1372页。

⑤民国《新昌县志》，卷7，“大事记”；卷17，“寺观”。

⑥徐和雍：《刘家福起义与衢州城乡的反教会斗争》，见《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⑦《万国公报》，辛丑年三月，第148卷。

第四类，积极参加反洋教斗争。会党参加这场斗争的也很多。北方的联庄会、梅花拳、大刀会，四川的哥老会、红灯教、嗰噜党、顺天教及浙江诸暨白旗党、温州神拳会等，还有江西吉安府的龙虎会，临江府、南昌府的拳会，建昌府的斋会，湖北当阳、南漳的刀会，沙市的海湖会，以及广东南海、顺德、番禺，福建邵武、安徽青阳、江苏徐州等地的各种会党，都积极发动领导或参加了当地的反洋教斗争。

会党的反洋教斗争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首先，因为它是有组织的行动，所以往往聚而不散，比较持久，当统治者镇压时，一般都以武力坚决抵抗。如广东南海、顺德的会党，先是在两县交界处攻击教民、教堂，及至清军前来镇压，“始犹拒捕，继乃逃至甘竹里乡又抢毁教民数家。比营救到县，匪又渡河窜入南邑界内，连日在余村、沙头北村等处闹教。余村教民素有防备，当匪来攻时放枪拒御”，但“仍被其攻入拆毁房屋数间”①。江西南城县会党焚抢教堂、教民，“地方官闻信驰往弹压，该匪党敢与官兵开仗，因之城门紧闭数日”②。安徽青阳县会党发起反洋教斗争后，青阳、铜陵、南陵三县合力攻剿，仍为会党所败，“得安庆援兵大力四面合围攻击”，才将其镇压下去③。浙江诸暨会党在打毁教堂后，还对清军发动攻击，将守城兵勇缴械④。其它各处会党的反洋教斗争也莫不如此。

会党反洋教斗争的第二个特点是，会党的反洋教斗争往往带有其它政治色彩。如更多的在打击洋教的同时，也打击地主绅商和官吏，甚至有乘机设立名号竖起谋反大旗者。如安徽寿阳县会

①《拳匪纪事》，第3卷，第95页。

②同上，第82页。

③《北清事变》，第146页。

④宣统《诸暨县志》，卷15，“兵备”。

党在反洋教起事时，就立有皇帝、皇后、元帅等名号①。浙江诸暨会党的反洋教斗争得到群众支持以后，其首领王绍桂也自称“南越真帝”，以手下陈概等十余人为开国大将军②。正因为如此，史料中在记述会党反洋教时，总是冠以“借仇教为名”之类的词句。而官吏也总是将会党的反洋教与普通群众的反洋教区别对待，视会党为莫大危险。张之洞就认为“仇教并非谋反，且数必不多，又无枪械，官兵一到，自然解散”，所以得出“闹教之匪不足患，造谣之匪（指会党——引者）乃可虑”③。又如，台州知府徐某认为，“百姓闹教”与拳会“迥不相同”，因而不主张严办④。这也正是那些即使支持反洋教斗争的地方官，对会党反洋教仍然竭力镇压的主要原因。

会党的这些不同表现，对这场反洋教斗争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积极参加斗争者，不论其动机如何，对斗争都起了程度不同的直接推动作用。没有参加反洋教斗争但滋事活跃者，由于更加剧了社会的动乱，牵扯了统治者的精力，所以客观上对斗争也起了一种间接的推动作用。至于徐老虎之流投靠官府，充当爪牙，对反洋教斗争只能起反面的影响。而那些参加自立军者，应该说也是对这场斗争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因此，会党在此时期内，不是南方反洋教运动的核心力量或领导力量。

（四）资产阶级

由于洋教对资产阶级没有产生多大的直接危害，因而资产阶

---

①《北清事变》，第146页。

②宣统《浦阳县志》，卷15，“兵备”。

③《张文襄公全集》，卷175，第22页。

④《万国公报》庚子年冬月，第145卷。

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来看，对反洋教斗争是持否定态度的。虽然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政治代表维新派，对教会恃仗强权，横行不法，一直表示谴责，但这主要不是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而是基于反侵略的民族感情。即使如此，由于他们作为近代中国先进阶级的代表，对世界大势及中国所处的形势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更致力于通过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来从根本上抵制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所以，对洋教的谴责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主要声音。正因为资产阶级与洋教的直接矛盾不大，而出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种种原因，这个阶级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与许多传教士往来密切，保持着比较友善的关系，加之群众斗争所带来的社会不安定，会使资产阶级的眼前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这就使他们一般不但不反洋教，而且反对其它阶级的反洋教斗争。因此，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南方反洋教斗争开始掀起之时，张謇、汤寿潜、汪康年等维新派人士就频频奔走于上海、南京、武昌之间，往来联络，纵横捭阖，竭力策划促成“东南互保”的局面。他们不仅积极设法从上面压制反洋教斗争，还用釜底抽薪之计，力图从下面防止反洋教斗争。张謇就曾力倡刘坤一招抚长江下游一带会党首领徐老虎，以收约束乱萌，“苟弭内患”之效。维新派在国内的喉舌——《中外日报》曾连篇累牍地大造支持“东南互保”、攻击反洋教斗争的舆论①。

属于资产阶级的基本群众的那些工商界人士，大都压制反洋教斗争，对教会、教士采取保护的态度。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曾组织“东南救济善会”，“厚集资斧，多方保护”，协助东南各省当局压制反洋教斗争，保护教堂、教士②。浙江南浔大丝商周庆云等主动捐款筹设团防局，置飞划八艘，水勇四十名，以资巡缉保

① 《拳匪纪事》，第5卷。

② 《中山翠微韦氏族谱》，第7卷，329页。

护①。广东大埔、肇庆两帮商人“联合为一”。“竭力举办团练”②。厦门巨商傅孚伯、杨砚农等也出资募集三百人设立团防③。资产阶级更普遍的作法是从财力上支持地方官府压制反洋教斗争。如六月间，清廷命江淮商人捐银一百万两，许照“新海防例奖给实官，体恤不为不厚”，但因明言“此款专备北省军饷”，地方不得截留，各商便纷纷借词推托，拒不从命④。而此后不久，江苏地方当局为添募兵勇以防止群众反洋教，也向商人“劝捐助饷”，商人却“勉力报效”，“各属捐有成款解赴省垣者不乏人”⑤。浙江商人因省中大员对反洋教斗争态度暧昧，执行“东南互保”协议措施不力，却积极派兵北上“勤王”，便心存观望，任凭官吏再三邀劝，“皆互相推托”，“吝惜慳囊”⑥。而湖北“张香帅筹办鄂防，用心良苦；经费亦为支绌”，乃“集武汉各巨商筹捐军饷。各商急公好义，因筹得银十八万两，呈交核收。香帅大喜，面赞不已”⑦。这一拒一从之间，商人们敌视反洋教斗争的面目暴露无遗。资产阶级的反对，对这场反洋教斗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增强了压制反洋教斗争的力量，为反洋教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更多的困难。

---

① 《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第13页；民国《南浔县志》，卷2，“公署”。

②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③ 《北清事变》，第270卷。

④ 《刘坤一遗集》，第3册，1249页。

⑤ 《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⑥同上，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⑦同上，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八日。

第十一章　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的教案

（1902——1911年）

义和团掀起的救亡风暴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后，但中国没有出现有如历代农民运动失败后常见的长期沉寂局面。随着民族和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及清政府“洋人朝廷”嘴脸的彻底暴露，在这个末代王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间，人民群众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地发生于全国各地，最后终于酿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些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各种斗争形式出现的民众反教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后的反教斗争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源泉之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教士、教民的复仇活动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震撼了全世界，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英勇反帝的革命精神及其巨大的威力。

这次运动“犹如暴风雨一般”，横扫了几乎整个中国境内的外

国侵略势力。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据点——洋教堂一个个地被摧毁了，许多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洋鬼子”包括传教士及其他侵略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当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帝国主义又活跃起来。他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件》，人民承担了远远超过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各地的帝国主义分子也趁机纷纷以征服者的骄横姿态无理要求额外的地方赔偿。天主教传教士和基督新教传教士更是穷凶极恶地大肆讹诈，掀起了一次索取金银、牲畜，掠夺土地，霸占房屋田产的狂潮。

（一）继续进行抢劫活动

八国联军下令大杀、大抢、大烧三天之时，北京出现一片“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的惨象①。上自皇宫、王府，下至居民住宅，都遭到侵略军的洗劫，连平时那些伪装成“劝人为善”、教训教徒“不可偷盗”的传教士，这时也四出进行抢劫，搜杀义和团众。

法国北京主教樊国梁通过抢劫，个人获一百余万两珍宝。在他的带动下，天主教传教士不但在京师大肆抢劫，而且还到各个县去勒索巨额赔款。为了复仇，教士们提出了“用人头抵人头”②的口号，并且对每一个被杀的教徒还要求百姓交出几百两银子，作为抚恤。

基督新教传教士也参加了抢劫活动，他们伙同侵略军搜索义和团和勒索赔款。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是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在使馆解围时，他脱去了道袍，背起了步枪，

---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见《义和团》，第2册，第470页。

② 博恒理：《梅子明传》，第224页。

参与射杀义和团的复仇活动，并一再叫嚷瓜分中国。

另一个典型是美国传教士梅子明，他在使馆解围前就已策划要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城，使馆解围，梅子明立即纠集几个传教士一同到北楼府抢劫，并占领了该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梅子明唯恐这座王府被别的强盗抢占，决定当夜独自一人在这座王府过夜。次日一清早，梅子明带领二百多名教徒抢占了这座王府。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富户抢劫。

传教士们到处勒索赔款，杀害无辜人民和索取银两的罪行，引起国外舆论的谴责。1901年1月9日，美国《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报道了传教士在北京劫掠珍宝的罪恶行径。《纽约太阳报》记者钱伯兰曾以采访报道的形式，谴责了美国传教士梅子明于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在北京各地勒索、抢掠的罪行。他写道：

> “美国公理会的梅子明牧师已从外地旅行回来，他是去为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的。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者索取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声称：他所索取的罚金将全部用来宣传福音。所索取的赔款，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还算是适度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个被害者索取五百两银子。在任邱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杀害，为此，这里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要求赔款七十五串现款（三十四万两银子）和六百八十个人头。…

[redacted]”①。

如果说1900年以前，天主教教士抢掠土地的侵略活动还象窃贼鬼鬼祟祟地“从死尸上偷窃东西一样”，那么，1900年以后，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基础上，这些天主教士便是一群在光天化日下公开进行抢劫的强盗。他们神气十足地返回教堂，召集教党武装，恃强专横，“每天都要开设临时公堂”②，对非教百姓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稍不遂意，即诬以私通“团匪”，非倾家荡产不能保其性命。一些教民也借教会势力的复炽，伺机复仇。教士唆使教民抢劫，教士率领教民“向各家搜索”。天主堂公然称之谓“发洋财”。怀来县灰窑子庄的人民，“大伙打定主意不吃天主教的亏”，群起抵抗。苏家房子庄天主堂的神甫“就下旧保安见州官，手中拿六轮子，又要人，又要钱，畅大老爷（州官）当下给神父赔偕，又赔银子二百”。后来勒令灰窑子村给天主堂银一千两③。这一群洋恶霸的抢劫和八国联军的抢劫同样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账。

（二）霸占估买民产

传教士除继续抢劫外，又用刁钻刻薄的手段，霸占民田民产，或用低价估买，使非教百姓大受其害。在河套地区，传教士乘机向过去与教堂有矛盾的汉族地主进行报复，蛮横地将当地杨、刘二姓地主的土地二千余顷和河套人民辛勤开凿成的一条大渠道黄土拉垓河（又称黄济渠）霸占了。在阿拉善旗的三盛公一

---

① 《纽约太阳报》，1900年12月24日。

② 《梅子明传》，第224页。

③ 《保安传教》，宣化双树子天主堂印刷。

带，传教士除了取得无租息的熟地二百余顷外，又恃势强占了七十余顷熟地①。法国天主教主教杜昂，在四川成都平原诸县强占良田三十万亩②。四川彭县白鹿场的一个天主教修会，竟侵占良田一万多亩。此类情况，在义和团运动后，屡见不鲜。

以河北、山西为例。邢台天主堂在邢台县共有土地五百一十八亩③，在尧山、广宗、巨鹿等县还有大量的田产④，仅尧山一县即有三百亩以上⑤。正定天主堂在藁城、邢台、任县、内邱、尧山、柏乡、宁晋、正定、栾城、元氏等县有大量的田产⑥，只藁城一县即有二百四十处以上⑦。长治天主堂在临汾、襄陵、襄宁、曲沃、翼城、浮山、安泽、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新绛、闻喜、绛县等十五县中有田产一百七十处，其在长治、潞城一带（即旧潞安府各县）的田产，尚未计入⑧。由此可知，天主堂就是大地主。

曾自称“并非剥削群众”的天主堂，出租土地，逼迫农民

---

① 1916年2月，阿拉善札萨克致蒙藏院报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代号1045，档号83。

② 《四川农村经济》，第90页。

③ 1946年《邢台市群众处理天主堂恶教士葛乐才等罪行材料汇集摘要》。

④ 邢台天主堂有尧山、广宗、巨鹿等县《田契钞本》。

⑤ 《尧山田契钞本》。

⑥ 正定天主堂存藁城、刑台、柏乡、宁晋等县《田契钞本》、《藁城县地契》和《地亩租粮簿》等。

⑦ 《藁城县地契》，正定天主堂1940年钞。

⑧ 长治天主堂《田产登记簿》残本，仅有十五县田产份数。据调查旧潞安府各县都有天主堂的田产。

“每届秋成，慎选乾圆好米送仓（缴租）”，“如有拖欠，任凭扣顶（扣押租）另佃”①。农民租种天主堂的土地，租额是很重的，十二亩地，每年缴租棉花大秤二百一十斤，或者谷子五石②。

天主堂田产的来源，据长治天主堂《田产登记簿》来看，一百六十八处田产（原簿载一百七十处，删去记载不明者二处）中，“买”的一百处，“典”的三十六处，“献”的二十处，“让”的七处，“送”、“换”、“布施”、“补足”、“罚”的各一处。所谓“罚”就是霸占。所谓“献”、“让”、“送”、“换”、“布施”、“补足”等等，多数也是霸占。沙河县南王庄王林说：“我的房子，叫我献到堂里，他（指邢台天主堂）管我吃穿到老。但我献了以后，我的吃穿一点也不管。”③有的“献契”上还写着：“占与不占，随本堂神父自便，不许庄窠主（原所有主）反口。”④上述“买”和“典”的田产价格统计如次：

价格（以钱计价）	田产数
无代价	1
二千文以下	5
四千文以上	7
六千文以上	8
十千文以上	19

① 《契券汇式》中的“认田契”和“佃约”。

② 《地亩租粮簿》中的“油通裴洛英”与“油通蔥洛进”二条，正定天主堂光绪二年。

③ 1946年《邢台市群众处理天主堂恶教士葛乐才等罪行材料汇集摘要》。

④ 《藁城县地契》，二百一十七号契与二百一十八号契。

二十千文以上	10
三十千文以上	21
五十千文以上	17
七十千文以上	5
一百千文以上	9
一百五十千文以上	7
二百到六百千文以上	7
一千到一千五百千文	2
小计	**116**

价格（以银两计价）	田产数
四两以上	5
十两以上	2
二十到四十两	3
一百到一百五十两	3
四百到五百两	3
小计	**16**

价格（以银元计价）	田产数
三十元	1
四十元	1
小计	**2**

总计	136

上述统计可知天主堂“买”、“典”田产，大多数价格是极低的。下面，再看一看上述价格最低的五处田产：

置产年代	性质	价　　格	原登记号
1903年	地	一千一百八十文	K12号

1903年	地	一千五百文	K23号
1903年	窑院	一千八百文	I2号
1863年	地	一千八百文	K14号
1902年	窑院	一千文	M7号

一块田地或一所窑院，仅能换得六斗到一十斗玉米①。价格低得使人吃惊。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低呢？一句话，“天主堂霸占田产”。所谓“买”和“典”不过是霸占的别名。不仅长治天主堂如此，邢台天主堂也是如此。邢台天主堂的《田契钞本》里，价格最低的几处田产是：

置产年代	田产数目	价格	田契编号
1914年	宅一所，内有房一间，大堂一所	一千文	广宗6号
1901年	宅一所	一千文	尧山8号
1901年	宅一所	二千五百文	尧山17号
1901年	宅一所	二千五百文	尧山16号
1901年	宅一所，内有井一眼。	二千五百文	尧山19号
1918年	地四亩	四千文	尧山7号
1917年	地二百一十八亩	十三千七百文	尧山1号
1917年	地八十九亩	二十千零八百文	尧山4号

最低价格仅为六十二文半一亩（如尧山1号），仅为1901年地价的三百六十分之一，1911年地价的四百八十分之一②。由此

① 长治天主堂“帐簿”记载，1901年玉米价格是一百八十文一斗。

② 巨鹿《田契钞本》8号契载，1901年地价二十二千五百文一亩；巨鹿14号契载，1911年三十千文一亩。

可知，天主堂的田产，多数是霸占来的。

天主堂霸产的方法很多。凡是恶教士想要霸占的土地就得给他，如不给，他就在你的田地上栽种树木，使你不能生产，如霸占邢台张祥的土地；或者把河挖开，淹没你的庄稼，冲毁你的房屋，如霸占邢台白塔村的土地；或者向反动的政府报告，说你“家里窝藏枪枝”，如霸占邢台赵书礼的土地，“通匪”、“偷盗”，如霸占刑台朱宝珍的土地。总之，逼迫着人民非把土地给他不可①。

恶教士霸占田产，却不负担赋税。长治天主堂一百八十六处田产，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钱粮；有十五处虽有钱粮，但数目很少，如“L11”号地1902年买的，买价四十千文，按最高地价计算，二十二千五百文一亩②，最少应是两亩多土地；按最低钱粮数计算，九分银一亩③，二亩多地的钱粮最少应是一钱九分。但是《田亩登记簿》上所载的钱粮数，仅仅是银五分。可知天主堂最少逃避赋税十分之七。天主堂的田产，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赋税。恶教士又借口“教会为以慈善为目的之社会法团，所有土地，不应出捐”④，干脆一毛不拔。

总之，传教士的复仇和霸产罪恶，中国人民要比义和团运动前“更深千百倍蓰”痛恨洋人，人人“痛心疾首”，“有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之意”⑤，最终必然导致中国人民反抗的再起。

---

① 1946年《邢台市群众处理天主堂恶教士葛乐才等罪行材料汇集摘要》。

② 巨鹿《田契钞本》中8号契所载的地价，但河北平原地价比山西山地地价高。

③ 潞县微子镇《九天圣母庙碑》载1890年当地钱粮数。此碑为官立，当为最低数目。

④ 1946年9月邢台天主堂《致沙河县政府公函稿》。

⑤ 刘大鹏：《义和团运动史料·退想斋日记》，下册，第825页。

二、危害亿万生灵的“庚子赔款”

《辛丑条约》后，中国人民负担着巨额赔款。除按条约规定的赔款外，伴随着教士及教民的复仇活动，赔款种类及数目多种多样，名目繁多，数额惊人。

（一）大赔款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海关两，从1902起到1940年付清，年息四厘，总计本利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海关两，以关税、盐税作担保。这一笔账当时叫做“大赔款”。实际上中国付款的数目，远不止于此。另外还有从19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一笔“利息”九百万海关两。这一笔利息，从1902年起，三年付清，也要按四厘付息，即所谓利息的利息，又是一百万海关两。因此，1902年这一年第一次支付大赔款，名义上是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海关两，实际上却是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九千两。这一笔巨款，“就中国目前（1901年）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而和议既成，赔款已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①。因此，全国每年应筹集赔款二千三百零五万零五百两。清政府即将分摊数字，划到各省，计：

江苏省	297.25万两
四川省	261.8万两

① 1901年9月28日户部奏，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广东省	231.9万两
江西省	216.6万两
湖北省	167.4万两
浙江省	156.4万两
河南省	126.8万两
安徽省	125.7万两
山西省	116.3万两
湖南省	100.4万两
山东省	99.3万两
福建省	99.0万两
直隶省	85.8万两
陕西省	70.4万两
新疆省	40.0万两
甘肃省	30.0万两
广西省	30.0万两
云南省	30.0万两
贵州省	20.0万两
总　计	2305.05万两

这个摊派数字到达各省后，又由各省分摊到州县，解省后，还有增加。如广西省本来是30万两，“加以补平、补色、汇费各项”，就增加为“三十四万余两”①。福建省在分派数额以外，又“加以商号汇费，办捐经费”②等四万余两。四川以开办“新捐输”办法，筹集赔款，仍按丁粮加派一、二两不等，农民负担又增加一倍。各府州县为如数申解省摊大赔款，可以各种名目勒索花户，甚至无田亩者亦不幸免，造成“不肖州县，挨户摊派，甚

① 1902年7月11日丁振铎奏，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1903年7月25日崇喜奏，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至侵蚀入己；而劣绅胥吏，需索中饱，均所不免”①，“朝廷未受小民一文之捐纳，而小民早出十文之花销矣”②。各省为了摊派赔款，名正言顺地加重了旧捐税，又增添了许多新捐税，名目很多。“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③，甚至“见农民入城挑粪，每担取数文，每厕取数百文，税至于粪”④。真是闻所未闻。各省增税情况见下表：

① 1902年6月17日上谕，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吕海寰奏，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③ 《宣统政纪》，第11卷，第24页。

④ 《民报》，天讨，“四川革命书”。

1601年起各省增税名目表

省名	加重的旧捐税	新增捐税
直隶	鸦片税、糖税、茶税	派捐印花税、酒税、烟税
山东	鸦片税	烟税、酒税
山西		地亩捐、绅富捐、煤税、土盐厘
河南	鸦片税、盐税、税契	赔款捐、地捐
湖南	鸦片税、印花税、盐税	派捐
湖北	鸦片税、印花税、盐税、税契	赔款捐、派捐、烟酒糖税、彩票捐
四川	鸦片税、印花税、	赔款新捐、输房捐、肉税
广东	鸦片税、厘金	按粮派捐、房捐、彩票捐
广西	鸦片税、税契、蓝靛税、蚕丝税、牛皮税、糖税	地捐、官捐、赌博捐糖酒油房捐、押店加锅
福建	鸦片税	赔款捐、地捐、随粮捐、铺捐、坐买捐、纸税、窑税、果税
江西	鸦片税、丁银、漕米	地捐
安徽	鸦片税、粮银、漕米	地捐、铺捐、房捐、酒税、肉税、彩票捐
浙江	鸦片税、粮银	赔款捐、地捐、房捐、酒税、丝落地税、彩票捐
江苏	鸦片税	赔款捐、地捐、房捐、彩票捐
新疆		赔款捐

四川峨眉县“田房契税，原征银八十两零六钱……〔光绪〕二十七年，加增至一千五百六十二两一钱”①；屏山县“……又加洋药、厘金，随地酌派，民困不支”②。是时苛捐杂税之多，不胜枚举，故梁启超说：“其余各种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百数十，今未有确实之调查，不能悉举。”③

（二）地方赔款

大赔款之外，还有由地方官和教士议定、地方自筹款项，“赔偿”教堂、教民之“损失”，此款称地方赔款（表见下页）。下表中的数目是不完全的，因为：第一，省份不全，如陕西省宁条梁教堂，我们知道有赔款，但是还未找到具体数字；第二，各省赔款数目不全，如湖南、浙江、安徽等省教案甚多，未一一收入赔款数额；第三，各省宣布的数字，常少于实际数目，如直隶省宣化府，地方赔款名为一百五十万两，但另外尚有现银八千两、谷一万石，并未列在赔款数目之内；江西、浙江建立教堂的土地和费用，也未算在赔款数目之内；各地未结教案，以及“由绅董与教士议结”之案的赔款，都未计算在内。

地方赔款数额之大，超过地方年财政收入。在1901—1902年度，北京城、直隶省自筹赔款达11124012两④，“山西二百二十余万两，山东八十万两，山东八十万两，四川八十万两，湖南

---

① 《峨眉县续志》，第3卷，“食货志”。

② 《屏山县续志》，上卷，“官绩”。

③ 梁启超：《中国国债史》，第4页。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0页。

1901—1902年部分地方赔款略表

地　　名	赔款总数	备　　注
北京与直隶省	1112.4万两	尚有未结者在外
奉天省	290万两	
山西省	194万两	
山东省	57万两	
湖南省	38.6万两	只有衡州天主堂，其他在外。
江西省	30万两	建堂在外。
吉林省	22万两	
河南省	19万两	
浙江省	18万两	建堂与土地在外。
伊克昭盟	14.35万两	
湖北省	3.6万两	只有来阳、蕲州、广济、黄梅四县，其他在外。
广东省	1万两	只东安一县，其他在外。
四川省	30.43万两	1900年四川二十三个州县教案总赔款数。
内蒙西部	70.2万两	
总　　计	1900.58万两	

三十万两，浙江二十万两……”①。四川赔款超过年地丁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花户无形增加负担一倍多。各级官吏，为搜刮这笔巨额赔款，不惜“百事俱废，专凑赔款”，动员一切权力机构，发布几十道上谕、札文，真可谓“穷搜恶索”。地方赔款不仅实际数字超过议定的数字，而且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假公济私，藉端鱼肉”。如“直隶全省教案赔款清单”规定邢台县“共赔天主教堂银一万四千两”，“共赔天主教民京钱三千六百二十九吊（合银一千四百五十一两六钱）”，总共赔款数是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一两六钱；而“当时分配邢台全县包赔洋款现银二十万两，商三民七，强行勒索”②。又如，新河县在“直隶全省教案赔款清单”中，规定赔款京钱二万二千四百吊，而清河县派给农民的数目却是二万八千四百两，合京钱七万一千吊③。广宗县规定地方赔款京钱二万吊，由书院存款及商民缴纳八千吊，又将县署所存帐银二千两（折京钱五千吊）全数支用，不敷之数只有七千吊，知县魏祖德竟“令各村每亩摊京钱四十文”，共为二万三千吊，多收二倍以上④。“各州县办理教案赔款，每于议定之外，任意加派，有多至倍蓰者”⑤。四川地方教案赔款，总督奎俊规定，凡发生教案的州县，不仅地方官“听侯查办”，而且要分担赔款，“其坐视不救之团保，将来亦由该道府查明，分成赔偿”⑥。1900年7月，名山教案议结地方赔款十二万五千两，府、县官及地方团保均“分成赔偿”⑦。四川不少官吏的“赔偿”，

① 《义和团》，第1册，第40页。

② 《邢台市县群众处理天主教恶教士葛乐才等材料汇集摘要》。

③ 《新河县志》。

④ 《广宗县志》。

⑤ 李鸿章：《通饬直隶札》。

⑥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奎俊：《开导士民说》。

⑦ 《名山新县志》。

不少又转嫁到人民的身上。京师一处的地方赔款中就有教堂赔款、坟地赔款、教民抚恤赔款等名目，皆不在大赔款之内。其中的教堂赔款，仅英、法、美三国即达银二百四十八万一千四百七十八两；坟地赔款，仅法国的七处即达银九万两；教民抚恤，法、美、英、俄国即达一百四十三万两。三项合计为银四百万一千四百七十八两①。而这些巨大的勒索，又被贪婪的各级官吏成倍地转嫁到贫苦的人民身上。因此，所谓二千万两的地方赔款，实际上农民负担却远远超过此数。

（三）无名的赔款

除地方赔款之外，还有一种没有名目的赔款，即教堂借口“赔偿”教堂、教民的“损失”，直接向本地人民勒索。山西潞城县西天宫村，在义和团运动中烧毁了名为“教堂”的三间草房。教堂便强迫本村农民重修了一座很大的天主堂，为此砍伐了农民二百棵大松树，拆毁了十几家农民的房屋。直隶省邢台县城内一座天主堂，在义和团运动中只遭受一点破坏，教堂就强迫邢台人民“拨给四千两现银重修”。

大赔款也罢，地方赔款也罢，无名的赔款也罢，总之，“凡抚恤教民粮食银钱”，都“被教士等领回教堂，并不能均匀散放。及教民等向伊求乞粮食银钱，隔了多日稍给些许，如同化子乞食一般。又教士唆令伊等自行寻找有钱人家，令其罚赔，否即强取”。“教民一经抢劫”，就“将脏物送归教堂”。弄得“合境良民，稍有饭吃者，几无一村一家不被教民讹诈殆遍”②。

1901年到1902年间，大赔款、地方赔款、无名的赔款和教士

---

① 刘赖孟多：《义勇列传》，第3册，第183—190页。

② 1902年绥远《托克托城通判林开荣禀文》。

教民的抢劫，以及官绅的中饱勒索，总共在一万万两以上。这些巨款压在人民的身上，“小民无辜，何以堪此”！何况又值兵乱之后，“穷民始被团匪之乱，继被溃勇之扰，又被洋兵之抢掠诛求”①；再加以天灾严重，直隶及“秦、晋一带，时若旱灾；东南则江、皖数省，皆被水患”②。四川“光绪二十七年……川南北旱，三、四月无雨，斗米千二百文”③。人民忍无可忍，于是在1902年各地普遍展开了反抗庚子赔款的斗争。

三、清室覆亡前的重大教案

《辛丑条约》签订后，教会的复仇与侵略军对中国的占领，“庚子赔款”的巨大危害，“洋人朝廷”及其臣僚的腐败无能，全国水灾旱祲的交替降临，大量洋货对自然经济的瓦解，社会失业人口的增加，使中国的民族、信仰、生存三大危机愈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激化了。当时民间流传的“大清亡，中国强”④的歌谣，反映了下层人民思想认识的提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也逐渐向全国传播，成为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强烈呼声。

但是，在这漫长的十年中，大多数百姓最深恶痛绝的，仍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特别是对传教士的反攻倒算，对教会势力的恶性膨胀，对不法教民的胡作非为，惶惶不安，以至百姓

① 李鸿章：《通饬直隶札》。

② 《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八年一月条。

③ 高枏：《高给谏日记》。

④ 《义和团》，第2册，第516页。

“如防大寇，如御劲敌”，每时每刻都要提防“教祸”临门。朝廷的父母官又“袒教抑民”，人民受冤无处伸，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许多人家被教会势力弄得倾家荡产，妻散子亡。百姓只有在秘密会党或地方士绅的组织下，集团自卫，以保护身家性命。基层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必然会与教会势力进行严重对抗。

此时，许多幸免杀害的义和团众，纷纷潜回故里，或向外省转移，和当地会党结合在一起，串朋约伙，或准备打教，或准备起事。在四川，“有平会、成会、江湖会、孝义会等名目……窜匿滇黔边境，乘间啸聚，无所不为，甚或仇教为名，肆行焚掠”①。义和团成员入川与红灯教相结合，操练神拳，蔚然成风，并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崭新口号，准备起义②。在东北，义和团首领王和达、董老道率余部联合抗俄义军，发动起义，焚教堂，杀教士，“御俄寇，复国土”。在直隶，部分义和团众归附武举田玺经，联合联庄会，发动起义；著名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的部队在广宗县景廷宾的领导下，与联庄会众相结合，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在巨鹿县欲打教起事。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再次形成一个短暂的高潮。

（一）广宗教案（1902年）

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以后，直隶省广宗县知事王宇钧和传教士议定要广宗人民负担“教案赔款”京钱两万串（合制钱一万串，或合纹银一万两有奇）。他们要农民在“正差正粮”外，按亩加派“杂差”，以支付赔款。群众听说这次的“差”，是赔偿教堂和教民的，一致表示反对，声言“中国人不纳洋

① 《朱批档》，农民运动类，第1003号，藏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第57页。

差”，并推举东召村素有“英雄义士”名声①的武举景廷宾为首，“两次聚众”抗拒。1901年10月（阴历九月），新任广宗县知事魏祖德到任，指令每亩摊派京钱四十文以偿付教案赔款，浮收却在二倍以上；同时，魏祖德以景廷宾抗拒官府，将全县捐款责令景廷宾一人缴纳，并把东召村的地保拘押起来。于是，景廷宾聚集各村联庄会（即民团）武装自卫。清政府以“民怨沸腾，几至激变”，把魏祖德革职，改派赵锷（绰号赵二铲子）继任广宗县知县。赵锷到任以后，仍然强逼团民交纳“洋差”，并且用金钱收买民团中的坏分子，以瓦解联庄会的团结。1902年2月19日，赵锷带了二百名练勇到东召村找景廷宾谈判，企图胁迫景廷宾屈服。景廷宾派东召村秀才刘永清会见赵锷。刘永清态度坚决，声称“中国人誓不交纳‘洋差’，钱是不能掏的”。赵锷大怒，愤然回城。3月3日，清政府从大名、正定调来练军，攻打东召村。广宗农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敌人不单是侵略中国的“洋人”，还有压迫人民的清政府，于是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景廷宾在巨鹿县沙头寺村建立“龙团大元帅”名号，在寺前插着镶有白边的两面大旗，一面写着“官逼民反”，一面写着“扫清灭洋”，公开举起反帝反清的战斗旗帜。袁世凯在1902年7月23日（六月十九日）《复陈广宗等处剿办情形并自请严议折》中称：“景廷宾……竖旗造反，皆称伪号，甚至有扫清灭洋字样。”②这是“扫清灭洋”口号最早的记载。

景廷宾的起义队伍里，有参加过义和团起义的成员。其中的骨干分子，如广宗的郑安治（即《汇报》所说的郑某）、南和的郝振邦、成县的赵老朱等，都是原来义和团的头目。可见，景廷宾起义军实际上是义和团的继续和发展。这支起义军仍采用符咒

① 上海《汇报》，第376号。

② 此件藏北京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

的办法来组织群众，所用的旗帜画有八卦、金鸡、五爪虎、按“金、木、水、火、土、中等字，编列营伍”。义军“呼官兵为贼，长官为狗”。起义军首先在沙头寺村解除了武卫右军营管带鲍贵卿所招募的新军武装，杀死士兵、随从等五十多人，鲍贵卿仅以身免。又宣布“格杀一洋人，偿钱一百吊，杀一教中人，偿钱十吊”。景廷宾亲自率领起义队伍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义军还在威县鱼堤村外杀死法国天主教神甫罗泽溥。景廷宾“扫清灭洋”大起义，焚烧教堂，诛杀教士，抗击官军的行动，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要求，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起义军的势力迅速发展。据载，“各县商民竭力供应匪饷，景廷宾颇得人心，皆肯容留，缉获殊非易易”。

景廷宾起义军最初的人数不多，曾在广宗城外召集联庄会演武操练。到1902年3月官军进攻东召村时，起义军发展到几千人。东召之战后，官军洗劫东召、板召、西召三村，村民死伤极惨。并劫走东召村少年妇女转卖他乡，因而激起当地人民更大的愤怒，纷纷加入起义军，扩大了景廷宾的队伍。到4、5月间，起义军转移到巨鹿沙头寺村和广宗县的件只村时，已经是三四万人的大军了。如果把巨鹿县的四万人，威县三万人的联庄会和响应景廷宾起义的冀南平乡、南和、任县、曲周、唐山、永年、南宫等地的农民以及河南、山东边界的义和团，统统计算在一起，这支队伍不下十六万人之多，形成一支地跨直、鲁、豫三省，包括二十四个县份的浩浩大军①。

由于起义军声势浩大，吓得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张惶失措。清政府除了悬赏三万元缉拿景廷宾以外，并严谕直隶总督袁世凯，“饬分庞（鸿书）、倪（嗣冲）、袁（大化）三观察，务将景廷宾拿获解省，不得该犯，该道不得回任”。又说：“匪党起于

①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第379号。

铁路、矿山附近，关系交涉事宜，设法从速扑灭。若一时难平，须扼守东北两隘，俾其窜向西南，既安京师，又免外人借口。”①帝国主义各国军队六千余人，也从北京开往冀州、广宗等处堵截镇压②。

起义军自3月在东召村战斗后，5月又在广宗县件只村同大批官军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战斗。由于力量悬殊，起义军牺牲很大，许多起义军的骨干如赵洛贵、张学逊、祝洛超、孙洛法、吕老修、祝人杰等都壮烈牺牲。景廷宾为了积蓄力量，率部突围撤退到成安县北漳村，并准备向河南边界临漳县转移，不幸在成安县郭家小屯被清军追捕，壮烈牺牲。

在镇压景廷宾起义过程中，袁世凯是最凶恶的刽子手，是帝国主义和清王朝最忠顺的一只鹰犬。当清政府中有人奏参袁世凯屠杀无辜，造成“冤滥之象”，应该“自请议处”时，袁世凯竟为自己屠杀人民进行公开狡辩，声称他是为了“以遏乱萌”，是为了清朝的江山；是为“保教”而动“兵威”。他还恬不知耻地说：“利害有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当止及计一身，区区之心，但知国利，不知其他。”③袁世凯这番表白，深得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的赏识，因而清政府在他的奏折上批道：“该督办事实心，勿庸勒部核议。”④

景廷宾领导的广宗人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义军提出的“扫清灭洋”口号和英勇斗争事迹却载入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史册，久久地为人民怀念。现在冀南一带还流传着“景武举抗洋

---

①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第379号。

②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第380号载，德、日四千余名，法国二千三百名。

③④ 袁世凯：《复陈广宗等处剿办情形并自请严议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差”的传说。

（二）辰州教案（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帝国主义的势力伸进了湖南辰州(今沅陵)这个偏僻的地方。当时到这里来的有两名传教士，化名胡绍祖、罗国全，他们受所在国的派遣来华，以办教会、“办医院为手段，进行活动。但当地百姓并不理睬他们。既不信洋教”，有病也不愿去“洋医院”诊治。这两个传教士无计可施。

同年七月间，当地忽然出现了一种怪瘟，患病的人上呕下泻，两脚抽筋，腹中绞痛，高烧不止。并且，朝患夕死，夕得朝亡，死后一身青紫乌黑，不及一月就死去近千人。百姓以为洋人来了不吉利，还传言他们捣鬼，支使寡妇肖张氏于八月十五日在井边、塘边投掷毒药。群情鼎沸，怒不可遏，先将张寡妇痛打一顿，然后将胡绍祖、罗国全毁毙。

其时，知县陈禧年刚到任才一天，事发后张惶失措，无计可施。知府吴某立即申禀请兵镇压。巡抚俞廉三以清廷“圣旨”名义，将保护不力的辰州都司刘良儒处斩；知府吴某也受到革职永不叙用、流放边地五年的处分；前任知县万某，则充军极边，永不释回。还有一些小官吏被革职、流徙。省内大员会同外国领事捉拿“凶手”，百姓被抓入狱者三百多人，惨遭严刑拷打，甚至把一个只踢了洋人死尸一脚的十四岁小孩，也判为主犯。最后将判死刑的二十多人，绑赴天宁山上，用大炮轰成肉酱。

清政府杀了百姓，还向洋人赔礼道歉，赔偿白银八万多两，并把天宁山前后大片土地划给洋人建房、经营、使用。从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辰州，在这里办学校、医院，盖洋楼、教堂，还修建了一座公墓，竖立了一座刻着帝国主义的“抗议书”和清廷“上谕”的石碑。

（三）第二次宁海教案（王锡彤起义，1903年）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宁波天主教主教、法国人赵保禄派朱国光到宁海当神父。这时，宁海天主教徒的气焰更嚣张了，他们依仗教会势力，作威作福，并以民众曾经参加过反对教会的斗争为借口，大肆敲诈勒索①。其中尤以从教地主分子阎永康、罗仁寿、王加团等最为凶恶，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阎罗王”。宁海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派人去请王锡彤回县，领导他们进行武装反抗。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正当宁波的教徒为主教赵保禄庆祝五十大寿的时候，宁海吹响了反帝斗争的号角。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以王锡彤为首的伏虎会。

王锡彤从外地回乡以后，号召“剿灭天主教”，各村人民踊跃参加。1903年9月26日聚众祭旗起义，“从者如云”。当天会合附近反教会群众，攻打县城，分路烧毁城内外两处教堂，处死神父朱国光。宁海人民的起义，得到各地人民的响应，海门、黄坛、新昌、台州一带都有群众起来反对教会，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击毙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教民罗仁寿、王加团等人，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清统治者派大军前来镇压，几经战斗，终因兵力、火器悬殊，义军重要首领礼释和尚、周参贵等战死。叶名秀、陈阿三和王锡彤之子王幼生等先后被俘，王锡彤被迫逃往嵊县，清政府以八千金悬赏缉拿。

宁海教案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往宁波进行恫吓、要挟、开报失单索取赔款“竟至三十六万之巨”②。1904年，浙江地方

---

① 伊苏：《王锡彤闹教始末记》，载《宁海文献》，第3期。

② 《光绪朝东华录》，总5210页。

官吏与驻浙江天主教主教赵保禄拟订宁海教案议结十一款。其主要内容是：1、赔款十三万两；2、在杭州、定海两地允教堂置田地房屋；3、保护教堂，严办闹教首领和群众（由教士开列名单命地方官捕拿）；4、凡民教纠纷，地方官需商问教士查案了结；5、查办保护教堂不力的官吏；6、抚恤被杀教士（按山西被杀洋教士成例，厚礼安葬，并建纪念碑）。还对参加反侵略斗争的群众，进行疯狂镇压，“被焚数百家，被杀数千人”①。造成闹教所在地大里村，“数月不见人烟，稻熟无人收割”的悲惨景象。

宁海人民反侵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在群众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民间仍到处传布着“锡彤不死，教门不起”②的揭语。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也起来指责屠杀人民的地方官吏，他们开始认识到，“庚子以后不可无排外，因为排外思想是民族主义所由生”，“并号召群众‘移闹教之心，而为排满思想’”③。这说明群众的自发斗争，推动了一部分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逐渐走上推翻清统治者的革命道路。而这场斗争的首领王锡彤，在宁海反教会斗争失败后，也立即进入徐锡麟举办的绍兴大通学堂担任教职，投身于反清斗争。

（四）桐庐白布会起义（1903年）

1903年浙江桐庐濮振生领导的白布会起义，是浙江人民在直隶景廷宾起义后，规模较大的一次反帝反清斗争。

濮振生，浙江秘密会党白布会的首领。他在义和团时期，曾以会众为基础，组织团练，名为“宁清团”，又叫“宁清会”，

---

①③ 《浙江潮》，第10期。

② 1902年重修《宁海大里王氏宗谱》，卷105，“世略”。

“言欲以缓靖清室，盖为掩盖耳目计，其实意则在反清”①。1903年夏秋间，因天主教民专横，濮振生立即组织会众起义，并言“禁部下军士不得轻毁教堂，以罪不在教士，而在官吏也，即教民也不得无辜杀害，仅取其家中粮食充军需，以示薄惩”②说明这次起义已认识到反帝必须同时反清的道理。桐庐白布会起义得到附近人民的热烈响应，建德县北乡农民韩小堂“集当地群众，参加起义”③。于是，濮振生整军攻克桐庐、分水，长驱直入严州。

清统治者派兵进攻起义军，激战于潜横村百岁坊。首领朱阿牛、马金奎等战死，起义军败退。濮振生带领余众逃匿山中，被围数日，知不能胜，便投案自首。反动派以濮振生“素得士民心，杀恐激民变”④，不敢加害，遂禁于仁和狱中，1907年3月在狱中病死。

1904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在浙江的成立，是浙江反教会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浙江会党曾单独领导了许多气势磅礴反教会斗争；在这以后，由于社会矛盾的变化和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等在会党中从事组织宣传活动，会党斗争的主要锋芒，开始转为反清革命。原来处州王金宝的双龙会，衢州刘家福的终南会，浦江杜永康的[illegible]，严州濮振生的白布会，“绍兴竺绍康之平阳党，嵊县裘文高之乌带党、金钱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八旗会等皆以仇洋为主义，以愤耶稣之跋扈故也。自近日革命党人入其中，说以洋教之跋扈，由于清政府之恶劣，遂一变而为倾复满清政府，

---

①②陶成章：《浙案记略》，《辛亥革命丛刊》（三），第50—53页。

③ 《建国县志》，第12卷，“武备志”，第10页。

④ 重修《浙江通志稿》，《癸卯桐庐之教案》。

仇洋主义转以消灭”①。浙江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濮振生“仇教起义”的影响下，建德、龙泉、庆元、余抗、东阳、天台、玉环、镇海、新城等县先后发生了教案。

（五）四川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1902—1903年）

北方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部分成员便秘密地进入四川，在川北、川东、川西各地同各种会党联合，并于1901年5月，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革命口号。接着在各地进行多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形成四川义和团运动。1902年，这个运动出现了高潮，而且持续数年之久。这个斗争高潮的中心就是打教斗争，在四川盆地中部三十多个州县的教堂、学堂及“慈善机构”全部被捣毁，数千名不法教徒受到惩处，数百名护教的清军官兵被击毙。清廷连下十几道谕旨要“尽绝根株”，并调一半以上的驻川清军进行围剿镇压，帝国主义各国驻渝领事、驻川三大主教也纷纷向本国政府和驻京公使告急，要求速派侵略军进驻成都，进行武力恫吓。

但是，四川义和团运动并没有镇压下去，反而越来越发展。团众们使用原始的武器，起资阳、战金堂、乱三台、破太和、围成都，进而，击犍为，攻剑阁，打开县，闹川南，坚持斗争达十年之久。其中，以1902—1903年义和团民众的打教斗争最为激烈，影响甚大。

1.资阳安岳首义后的打教活动

四川义和团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到1902年初，川省大部分州县都有了义和团。其中有十多个州县的义和团发展了武

①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料》。

装力量，置备旗帜、刀枪，刊印匿名揭帖，发动群众，准备打教堂，抵抗清军的镇压。

资阳、安岳的义和团最先举起打教的义旗。资阳县义和团在首领李南山、李冈中等率领下，于1902年5月31日（阴历四月二十四日）黄昏，率众一千余人攻打资阳城，“意欲打毁教堂”。同时，从资阳习拳归来的安岳县民杨祖平，奉命在安岳杨家坝地方率众响应。6月17日，将当地的不法教民杨绍榜等八人杀毙，又击伤十个教民，传教士毕伯禄逃到安岳城中才得幸免。清廷为资阳、安岳“仇教”事件十分震恐，慌忙“著奎俊督饬各属，迅即严密访拿，认真查禁，务期净绝根株”①。不久，杨祖平等人被知县唐枝中擒杀。

在安岳杨祖平打教之时，活动在资阳县东及今资中县西的义和团，在凌天顺、曾洪春、何耀山的领导下，势力发展极快，“樵夫牧竖多有练习，号称灭洋仇教”②。6月17日，何耀山等率义和团数千人，三面攻入天古庄（县东二十里），毁教堂及教民房屋，击毙击伤作恶多端的教民七人，其中华人牧师鞠成叠也被击毙。义和团所到之处，“寻觅教民首领，欲得而甘心”，并声言“须索出该处洋人二名，并须戕官”。川督急忙从泸州、成都调兵前来镇压，义和团损失很大，何耀山被捕牺牲。这支队伍转移到别乡，继续活动。

1902年8月底，在资阳县东活动的另一支义和团在刘精忠领导下，转战到安岳县周礼场（今周礼乡），与乐至开来的义和团首领陈联三会合，声势大振。随即向安岳县城进军，毁沿途教堂，驱不法教士、教民。清军提督丁鸿臣率大军前来镇压，对义和团驻地用火炮猛击狂轰，致使山头一片火海，安岳县境内义和

① 《德宗实录》，卷498。

②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兵燹》。

团被清军打散。事情结束后，天主教会借机讹诈赔款五万九千两，并乘机进行报复，他们

“令奸民设辞连引……于是邑东南百余里间之良民，皆匪类也。狱既成，先令具悔状，然后籍没其财产，迫令富民买之以自赎。通计所得，不下十余万金，本地奸民亦有因此致富者。”①

2.成都、华阳、仁寿义和团打教

资阳、安岳义和团首义的影响极大，“蔓延成都、资、潼各属，近且至于重庆、眉州等属”②。成都附近的义和团首领廖九妹（人称廖观音）率领群众打教，并与清军激战于成都附廓地区。华阳县其它各乡场人民为“洋人所逼，无以自存”，纷纷参加廖观音的队伍。之后，义和团即“向各村招募游民，一同入会，各以红袋悬腰，袋中贮存号记，编为一队若干人”③。义和团首领除了向信徒传授“符咒”、“拳术”之外，还向人民群众揭露教士、教民的罪恶，并说，由于洋人虐杀儿童、霸占房产、灭祖欺佛，因而天神震怒，不降甘霖，只有“打了教堂，就要下雨”。这虽是封建迷信，但却起了激励和动员群众的积极作用。7月21日义和团在龙潭寺（城东二十里）的文昌宫习拳。华阳新任县令带领练勇前来拿办，哨官某打破庙门，被义和团登时杀死。翌日，奎俊派兵往剿。义和团奋起抗击，大挫清军，并乘胜毁华阳县福音堂一所，“杀教士一名，教民四名”④。不久，各路义和团对成都形成包围之势，当时的《汇报》报道说：

“四川拳匪滋蔓难图，已成不可收拾之势，与

---

① 《安岳乡土志》。

②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③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六日。

④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庚子年北京无异。近日全股逼及省城矣。”①

洋务总局也通知各国驻渝领事，“转饬通商传教洋人，勿轻进省”②。

义和团围攻成都之时，派人与仁寿县义和团取得联系，约定“会攻省垣”③，共同打教。仁寿义和团系由资阳传入，首领是熊青禾，部下习拳者数千人。1902年7月，为配合攻成都，熊青禾率众焚毁仁寿县境内法国天主堂，杀毙不法教民多人，并将彭山县江口小教堂捣毁，“烧尽三堂及教友之屋八十余家，杀毙教民三人”④。英国圣经会设在仁寿县治北各处的教堂全部焚毁，教徒百余家受到惩罚。清军“水陆并进”，前往镇压。熊率部众转移，官兵竟然“毙无罪乡民六人”。此事激起邻县——眉山义和团的愤怒，当即焚毁教民村庄三处。

仁寿义和团在熊青禾率领下转移之际，廖观音正集合附近各地义和团，从北面攻打成都，并于8月26日在龙潭寺再次大败清军。川省大吏大恐，据《亲督师》一诗所云：“拳民近郭，声打教堂，人言啧啧，官心皇皇。众聚督署，强颜筹商。不闻谋略，惟馀恐惶。”⑤大批清军由按察使陈璚带领扑向龙潭寺。义和团众毁焚附近法国天主堂一所而去。

3.义和团金堂打教

清代金堂县有两座大教堂，一是川西最著名的舒家湾（亦称苏家湾）天主教堂，另一个天主堂建立在高板场（今高板乡）七堆瓦地方，俗称七堆瓦教堂。这两座天主教堂是帝国主义在川西

---

① 《汇报》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② 同上，七月三十一日。

③ 《新世界学报》壬寅四期，“川中两愚童传”，

④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⑤ 《聊园诗存再续》，壬寅年。

的侵略据点，“地方莠民作奸犯科者……每依之为逋逃薮”①。教徒仰仗洋人势力，欺压善良，人民恨之入骨。

1902年7月下旬，廖观音率所部义和团由成都石板滩撤到金堂的肖家坪，随即展开了反洋教斗争，“拆毁金堂县属教堂，并杀教民多命”②，进入金堂县东二十余里的清江镇。清廷将原任知县杨昱被革职，代理金堂知县丁良干也受“摘去顶戴，撤任留缉”的处分。不久，义和团在清江镇大获全胜，清二品大员孙烈全（孙得胜）所部军队覆没③。

廖观音大败清军，随即开始了摧毁川西著名的舒家湾教堂的战斗。苏家湾天主堂建于十八世纪中叶，当初，法国传教士迭某，没花多少银子就霸占了舒家湾地方，修建起占地数十亩的大教堂及其它附属建筑，并用条石砌成一道环绕教堂的护墙，俨若一座城堡。教堂广为发展教徒，不少“作奸犯科”的莠民率相来投，成了传教士的忠实走狗，干了许多坏事，人民无不痛恨，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打教事件。1902年9月上旬，廖观音、熊青禾等指挥数路义和团，毁护城，迅即占领教堂。随后，大批清军围攻教堂，用大炮轰击，屠杀义和团众达一千余人，熊青禾等三十余名首领被捕牺牲。其他义和团用炸药将教堂全部炸毁后撤走。唐顺之率义和团经过淮口镇高板场时，又与当地义和团会合，捣毁刚在修建中的七堆瓦教堂。

在清江镇打教风潮影响下，川省各州县义和团纷纷活跃起来。巴县“谣传日甚，以致人心惶恐”④。荣县义和团骤起，毁天竺桥教堂。邛崃王登武“藉词仇教”，惩富室七十五家之多，

① 《金堂县乡土志》，第1卷，“历史”。

② 《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上谕。

③ 《金堂县采访录·兵事五》。

④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川东道札巴县文”。

庆符、筠连义和团都在聚集力量。眉州、嘉定因之“闭门严守，旦夕可免”①。在新津县城外，义和团百余人与“教党”武装发生冲突，互有伤亡。

1902年10月2日，唐顺之率义和团协助廖观音所部毁掉舒家湾、七堆瓦两处大教堂后，攻入简阳县三星板，配合其他义和团，毁教职徐韫璞家而去。同月，华阳义和团攻入半坡寺（今简阳县建国乡），“焚毁教堂，杀教民而去”。

4.义和团再围成都与彭山、灌县打教

廖观音率所部义和团众从舒家湾撤出，经过月余休整后，又联合各路义和团围攻成都。此时包围成都的义和团已“多至三万人”。上海《汇报》惊呼：“青羊宫、白马寺各处，无在无匪”“城外附近，则草木皆兵”②。10月15日夜，团民攻入通惠门，城守清军惊魂未定，双方接仗，城中武官皆“仓惶失措，左哨李某上马，三次皆堕”③。

义和团进入成都，帝国主义者一片惊慌，忙从江口（今彭山县双江镇）调兵前来成都，清兵也来援救成都。义和团得此消息，才由南门撤出。

在义和团袭击成都的同时，彭山县义和团也积极活动，焚毁东山教堂三处及教民住宅数户④。在眉山，义和团亦“经毁下西街福音堂”⑤。由广汉、金堂开来的义和团，进驻彭县思文场，欲捣毁白鹿山修道院，未成。12月，温江义和团在首领吴直三率领下进驻灌县崇义场（今崇义镇），与灌县义和团汇合，毁教堂

---

① 民国《简阳县志·灾异篇》，第22卷。

②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③ 汪海如：《啸海成都笔记》，“红灯教进城三则”。

④ 《重修彭山县志》，卷8，通纪。

⑤ 民国《眉山县志》，卷8，兵防志。

而去。

5.潼川、太和、蓬溪等处的打教活动

清代潼川府治在今三台县，下辖射洪、中江、蓬溪、遂宁等九县。这里主产井盐、蚕丝、棉花，久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垂涎。教会势力遍布市镇，并与豪绅、富贾、地棍相勾结，左右市廛，鱼肉百姓，人民无不恨之入骨。四川义和团起事后，三台县东路义和团首领是徐机匠、范石匠，他们以两河口为基地，宣传打教灭洋反清主张。1902年9月，他们进入射洪县观音阁，天主教民均被驱逐，或受惩处。之后，又折回攻占景福院，杀死了一贯作恶害人的吉姓教民全家，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激战。不久，义和团在川北占领重镇太和以后，将境内所有的外国教堂统统捣毁并将为非作歹的教民母庆兴夫妇处死，悬首示众。接着，义和团拟定了袭取遂宁的作战计划。10月10日，沿涪江东下，攻破洋道溪（今游溪），与乡团练勇激战，焚毁射洪县最大的天主堂——正本堂，烧掉当地教棍喻原新等人的房子，传教士、教民逃窜一空①。义和团声威大振。

在三台县东路和射洪县两支义和团奋战之时，以下村一带为根据地的中江义和团在首领倪开调的领导下，驱逐了胖子店（今胖镇）巡检汤鉴铭，并惩教民，战团练，毙丁勇。接着又攻入蓬溪县蓬莱镇，逐县丞夏侯治及胥吏兵差②，并“入居丞署，日坐堂皇，理讼事”③，严惩不法教民，人民沉冤得以伸雪。

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于1902年9月25在晋军的簇拥下，抵达成都。他玩弄剿抚两手，一面截断义和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一面令清兵和团练疯狂镇压和搜捕团民，屠杀习拳百姓。致使义和

① 《华西教会新闻》，1902年11月号。

② 《德宗实录》，卷506。

③ 民国《蓬溪近志·兵事篇》，卷9。

团活动在很多地区受到严重挫折。义和团逐渐向川北、川南边远的州县转移，并在那里动员群众，组织力量，攻打教堂，顽强战斗。

在1902年到1903年的四川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各地有组织的义和团人数达三万余人，另有数十万贫苦百姓是义和团的热情支持者。他们在成都府、潼川府、顺庆府、嘉定府、重庆府等属三十多州县进行了上百次武装斗争，夺隘攻城，中外震惊，给帝国主义在川的侵略势力及清王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据《东方杂志》所载：四川义和团在1902年“迭酿巨案，蔓延广远，逼近省垣，用兵几及一年，为祸甚烈”①。在奎俊督川之时，他调集十几个营的兵力，进行残酷的屠杀。及到岑春煊带晋军入川，手段更加毒辣，杀人如麻。义和团众先后共牺牲数千人，被株连而倾家荡产者竟达数万户。帝国主义各国勒索教案赔款银693366两，相当于全川一年田赋的总和。而这些赔款又采取“就地筹集”的办法，川省人民遭受的剥削比以前更加严重。

（六）施南教案（1904年）

义和团运动以后，湖北省反教会事件仍在不断地发生。但这时的反教会斗争，已经和反封建压迫、剥削结合起来，成为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湖北各地革命党人“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两社会矣”②。这种转变，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1904年发生的湖北施南（今恩施）教案，就是这种革命高潮到来的先兆。

湖北施南是法国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教士、教民平时为非作

① 《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第6号，“军事”。

② 《辛亥革命丛刊》，第3卷，第50页。

歹，人民忍无可忍。1904年7月19日（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七），向燮堂率领一批群众，包围了法国天主堂。法国教士鸣枪对群众进行恐吓。愤怒的民众便拥进教堂，打死了管理湖北、西南一带天主教教务的法国主教德希圣和法国传教士德希贤、董明德，同时打死了不法教民贾澄清、黄朝炳、何登玉、黄张氏等人。

教案发生后，法国出动军舰进行威吓，迫使清政府答应“赔款”、“惩凶”、“抵命”、“割地”等条件。在武力的威胁下，清政府派员与法国使馆参赞达成协议，并于9月30日签订了《施南教案善后条约》。清廷以“惩凶”为名杀害了向燮堂等十二名善良百姓，另有二十五人被判军徒。法国教会勒索赔款白银145000两，并勒限当年交清。对办案不力的官员，一律给予处分，其中：

“……前任恩施县知县王鸿宾，应请革职；代理施南知府何锡章，摘去顶戴三个月；现署恩施县知县王祜，应请记大过□次，俟补官日罚俸三年；署巴东县知县田芸生已奉调省，应请记大过□次，俟补官日罚俸二年；署施南协副将吴友贵，获犯甚多，应请开复摘顶处分。”

法国参赞对这种处理办法仍不满意，又提出寻地建堂、立碑纪念的要求。清廷一概允准，并在条约上写着：

“自签字之日起，一年之内，在荆州府城内，由地方官代觅公私两无窒碍洁净相宜基地一处，以工部尺牵算，见方长二十丈、宽二十丈为限，建立医院一所，以永远追念德主教；又在施南府城内，代觅基地一处，以工部尺牵算，见方长十丈、宽十丈为限，建立天主堂并司铎住屋各一所，以永远追念德司铎。所有地价及迁移民房并建造医院教堂及医院常年经费，均在前开赔偿银十万两及善举银二万五千两之内，唯地价，应须公道，不得任业户抬价居奇，亦不得稍有抑勒；又在利川县李子槽

地方建造教堂及司铎住屋各一所，规样仿照施南教堂，以永远追念董司铎，所有地价、迁费、造资，亦在前开赔款之内。至李子槽地方基地，教士已先自购，无须地方官代觅，其医院、教堂三处，均请督部堂奏敕建，并饬地方文武员弁照约妥为保护，将来医院、教堂落成，三年之后，如欲自行价买基地扩充，地方官无不帮同照料。”①

（七）霍山教案（1905年）

1905年初，安徽省霍山县西乡教民郑长应，因不满当地法国天主堂传教士违背天主教义，超越传教范围，包揽诉讼的行为，与法教士发生口角，声明退出教会。法教士当场把他撵出教堂。郑长应一怒之下，打烂教堂门窗而出。该堂教士不但要求霍山知县秦达章强迫郑长应赔偿损失，还诬郑长应反教是受霍山西乡张正银的唆使，无理要求知县拿办张正金。张正金因教士的控告不符事实，故知县数次差传，均拒不到案。知县遂将其弟张正银及其妹夫戚显俊一并羁押。教士的无理要求与霍山知县无故拘押张正银等人，引起霍山西乡群众不满，遂自动前往教堂，要求教士函请县署将被捕者释放。法教士见势不妙，便逃往上海，向上海领事申诉。而上海法总领事却听信教士一面之词，电请保护，于是，安徽抚臣诚勋急调寿春镇马队前往霍山西乡镇压，又派大挑知县余鼎镛、六安直隶州知州熊祖诒前往查办。1905年4月，安徽新任巡抚恩铭上任，法领事数次要恩铭迅速了结该案。当时，霍山各乡绅士，皆以张正金唆使郑长应反教并无事实根据，愿共凑银洋二千元，恳请教堂免于追究，并保证各乡群众不赴教堂捣

① 《施南教案善后条约》。

乱及欢迎教士回县。但教士却执意要张正金到案。而余鼎镛一意取媚外人，竟派差役将张正金的幼子及其父张芝兰锁逮至县。而差役狐假虎威，乘机四处滋扰，鱼肉人民，于是群众由不满转为气愤。恩铭为了消除民愤，便将余鼎镛调回。

张正金因受教堂及官府迫害，弄得家破人亡，乃愤而回湖北原籍，邀约多人返回霍山。1905年5月18日，到诬控他的教民李万生家，捣毁器具。随即又赴教堂，将教士住宅及教堂家俱一并捣毁。由于清政府下令通缉，张正金被迫回湖北罗田、麻城，联合当地秘密组织白莲教领袖李仕英等，遍贴“辅清灭洋”告示，并筹集粮草，发动武装起义。

1905年6月14日，张正金、李仕英等复回霍山县千罗畈，将该教堂焚毁，并与搜捕他们的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因众寡不敌，又回至湖北安徽交界的瓮门关，并派人重赴罗田、麻城及河南商城等地联络白莲教等反清力量，扩大起义队伍，约定以英山、霍山为根据地，进行反清反教斗争。这使清王朝大为震惊，安徽巡抚恩铭一面增调寿春镇步队一营至英霍地区保护教堂，一面又电请湖北、河南两省巡抚，派兵协同镇压。

1906年5月28日，起义军约二千余人，打着“辅清灭洋”旗号，由湖北罗田进至霍山黄石河。清兵闻讯，连夜前往兜剿。经过一夜血战，起义军因武器低劣，不能抵敌，乃分兵两路向麻城、商城突围。恩铭下令穷追，认为“该处界连豫、鄂，窜扰堪虞，非将匪首弋获，三省边疆皆难安谧”①。同时，为缓和民愤，将霍山知县秦达章、大挑知县余鼎镛革职，六安直隶州知州熊祖诒撤任察看；并将滋扰群众的差役，提省究办；对受害之户，给以抚恤②，企图以此来瓦解起义军队伍，诱骗起义军“归顺”。

---

①② 《光绪政要》，第22卷，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安徽巡抚恩铭奏陈办理霍山教案折》。

张正金起义队伍中，有不少人受骗，斗争情绪低落，有的放下武器，返回家乡。但起义军的绝大部分群众仍坚持斗争，他们在张正金、李仕英的率领之下，化整为零，深入英霍山区，神出鬼没，给予清军以沉重打击。其时，恩铭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既无力消灭起义军，又不敢将张正金领导下的起义队伍斗争的实况呈报清廷，只有任其消亡，不了了之。

（八）巴塘教案（1905年）

1905年爆发的川边藏区巴塘县的教案，是当时震动全国的藏族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大事件。

（1）教案发生的背景

最早进入川边藏区的是法国天主教会。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国教士就在达林埠（今汉源县化林坪）建立主教府，作为教会势力伸入川康藏区的前哨阵地。随后在康南各地修教堂十三座。罗马教廷派遣法、奥、意、德等籍教士三十余名到这里来传教。基督新教的内地会、美以美会也随之传入。他们侵略的方式、方法、手段、策略都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有一套缜密的计划。英国侵略者积多年侵略西藏的“经验”。尽力避免触犯藏族上层喇嘛教徒的宗教情绪，同时也不主张教会从西藏与外国接壤的边界地区传入，而应根据“自由传教”的特权，从内地进入四川，再入川边藏区，这样既可达到在西藏传教的目的，又能挑起中国内部的民族纠纷①。而美国基督教教会则主张：

“当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我们的传教士看来有义务进而打开这个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宗教民族（藏

① 〔英〕贝尔：《西藏的过去与现在》。

族）的大门，把她引向世界之光和基督之进步。”①

基于这个目的，美国教会势力循着法国人走过的路线，于1903年第一次进入巴塘县，在那里建立教堂、学校、医院等。他们一方面通过这些机构向藏民灌输亲美的思想及基督教教义；另一方面通过说教挑拨民族关系，对藏民、羌民说他们“在宗教方面的造诣很深，非常接近天主教教义”②，而在汉民的教民中间却说，藏民“不象中国人，却十分象美国的印第安人”③。挑拨民族关系，破坏中国的统一，为其本国政府的侵略活动制造借口，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少数民族地区惯用的手法。

这些传教士还霸占土地，勾结官府，进行掠夺，成了当地最有特权的地主。法国天主教会将康定所属的榆林沟、孙家湾、磨房沟的良田五百亩，据为教会所有。后来，法国教会又把泸定所属的沈村、冷碛、磨石的土地千余亩窃为教会私有财产，超过当地的土司头人。法国教堂在巴塘占地近三百亩。美国教会最贪得无厌，他们在巴塘以年租仅为170个藏洋的价格，强行租用巴塘南门外架炮顶地方的55亩土地，不久又扩展为700多亩，而且自行规定租借时间为139年。他们把这些土地视若租界，构筑高墙，修建教堂楼宅，守以恶犬，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④。

从传教士进入川边藏区开始，就与千百年来“信佛深笃”的藏族人民发生了尖锐的文化信仰的冲突，严重地挫伤了藏族人民的民族感情。虽然同是宗教，但许多藏民已经看出西方教廷推行“基督教化”的目的是要吞掉佛教，所以，藏族各阶层人民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始终存在着戒心，深感不安与忿恨。一旦矛盾激

---

①③〔美〕奈考尔：《高原之顶》。

② 张良春：《解放前西方人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活动》。

④ 任乃强：《泸定大教堂》，载《康导日报》，1940年4月期。

化，自然会导致“仇教”运动。巴塘教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2.教案的经过及结果

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与西藏紧邻的川、滇、青等省受到严重威胁。清政府急忙筹划“经营”川边藏区，加紧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同年12月，清廷下令注意“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今新龙县）收回内属”①。同时谕令四川总督锡良会同驻藏大臣有泰，帮办大臣凤全“妥筹办理”。凤全一到巴塘，即发布谕令，限制喇嘛权力和喇嘛人数，限制开垦荒地等，并着手部署实行改土归流。这就引起了喇嘛寺庙和土司头人的不满。加之凤全对教会势力“力为保护”、“袒庇洋人”，藏民看他“所带卫兵习洋枪，用洋鼓，……疑为洋官”②，认为他“办事悉为洋人来”，更激起了藏民的愤恨。

1905年3月23日，在喇嘛、土司头人的带领下，爆发了有三千多藏民参加的武装暴动。起义军所到之处，“外人、教堂亦被毁，并杀毙两司铎”③。凤全及其所带清兵50余人几乎全部在鹦哥嘴地方被击毙。只逃脱一名厨师向外报信。这就是巴塘教案。

巴塘的反教风潮很快波及到里塘和川滇交界地区。盐井县藏民焚上坝天主堂，道孚等地区也发生了“焚教堂、戕教士”的打教事件。川滇藏邻封为之震动。尽管藏族上层僧侣及土司利用群众的反教反清情绪，但就事件本身来说，这次教案是有着鲜明的反帝反清性质的。

---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273页。

② 傅嵩炑：《西康建省记》。

③ 《西康建省记》；又据《赵尔丰公牍奏议》载，被杀两牧师为牧守仁、苏烈，还有三名中国籍教徒亦被击毙。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打箭炉主教倪德隆向清廷及川藏大员发出照会，要求赔款、惩凶。清廷慌忙道歉议结，并派四川提督马维琪、建昌道赵尔丰进剿，以致引起藏、汉人民长达数年的反抗。在这起事件中，教会勒索了白银九十万两，并扩大了教堂占地面积九十余亩，藏、汉人民被杀数百人。

（九）犍为教案（1905年）

1904年春夏之交，四川省五府（保宁、潼川、顺庆、绥定、重庆）、三州（夔、资、泸）等六十余州县接连天旱，“愆阳连月，田畴荒涸”。这是继“壬寅大旱”后有名的“甲辰大旱”。局绅借平粜中饱，地主收租仍毫升不让。百姓遂相率离乡背井，或投靠亲友，或乞讨为生，或参加义和团以自保。各州县到处都是习拳练武的人群，外国领事在给川督的信函中说：“仇教仇洋之广告，几于无地无之。”①川督锡良对打教灭洋的言论和行动，一律以“忤旨”罪拿问，无数习拳的群众被投入监牢。人民群众与四川反动当局的再一次武力较量不可避免，于是在犍为县爆发了一次教案。对此，《东方杂志》载：“川南隐患，酿久而发，胜于粤西。”②

1905年3月，犍为出现了红灯教，民众纷纷入教。入教者以“仇教为名，或以防变保家之说”来动员群众，鼓动人民打教灭洋。清廷派兵镇压，犍为红灯教徒被迫举行起义。因犍为各处教堂都有清军团练防守，起义军便先将各处的教会学堂捣毁。清政府洋务局赶忙通知各国领事、主教，知会上下游牧师、教士、司铎“切勿冒险轻进”。之后，起义者在荣县织席工人黄某率领

① 《巴县档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洋务总局致巴县文”。

② 《东方杂志》1905年第2期。

下，袭新桥场（今新桥），毁教民住宅十余户，退守龟头寨和罗城场两地。

清军尾追而来，用炮火攻占了龟头寨和罗城场，扑灭了犍为境内的义和团。外国主教乘机大起交涉，强索赔银8500两，教民也“动以仇教为名”，迫害非教百姓，“寻仇报复”，冤狱遍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

（十）南昌教案（1904—1906年）

南昌教案是义和团运动后发生的众多教案中的一个颇具典型的教案。以往的教案多是教民、教士为非作歹，致使民众闹教，而这次历时两年之久的教案，却起于县吏持平办理民教纠纷，因而引起教士的不满；过去传教士对官吏的不满大多采取胁逼清廷或大吏对其衔恨的官吏革职拿办的作法，而这次却是传教士亲自动手把知县杀死。

南昌教案起于1940年，当时，

> “新昌天主堂教士方安之（法国人），因教民二人往棠浦久未回，认为棠浦的龚姓人谋毙，报县会营拿办。并滕电九江总主教郎守信（法国人），电迫巡抚委派知府曹树藩、统领廖名缙督兵查办。该龚姓人闻大兵将至，密派族绅二人私至南昌，泣求知县江召棠代白奇冤。召棠即面禀各上宪，求以和平办理。江西巡抚夏时，即派委召棠前往新昌会同办理。召棠请以单骑先之。抵棠浦，沥诚告棠民。棠民泣服，遂将当事人龚耀庭、龚栋、龚祥三人带回南昌究办，会审廉得其情，各拟三年监禁之罪，兵未动而事已寝。王安之因压民之~~计未遂，乃深~~恨

召棠。”①

这就是南昌教案的起因。事隔两年后，法国教士方安之升迁南昌主教，即要挟知县江召棠重审两年前的教案，遭到拒绝。方安之威胁说：“如不允，……则电请公使派兵轮来省督办，”威胁不成，方安之竟以宴请之机用刀杀死知县。人民闻讯，怒不可遏。1906年2月25日，南昌人民于“百花洲畔民众蚁集。忽焚教堂、杀教士之声作，群众相率结队示威，争以雨具作武器。方安之等九人性命与天主教堂霎时同归于尽，民愤大伸”②。

但是，腐败的清廷既不问是非曲直，也不究肇事祸首，便与法国公使于1906年6月20日签订了五条“善后条约”。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　应给被害教习五人家属抚恤银四万两，另给一万两作为后来新教习等川资经费之用。其款应以库平库色兑交驻沪法国总领事收领；

第二条　新昌等旧案及南昌新案所有被毁教堂、学堂、养济院等处，及教内之人房屋，并一切物件，总共赔偿银二十万两整，交由教堂提款偿补。各案教内之人损失，作为一律了结；

第三条　第二条所载库平库色银二十万两，分为十次交付，每三个月一期，每期二万两，交由法国主教在九江收领；

第四条　所有被毁教堂各红契，应由地方官从速补给管业执照。并在南昌县城内借予教堂房屋一所，以待教士盖有房屋，即行迁移；

第五条　江西巡抚应行从速出示晓谕，其告示底稿，

---

①② 江西省文献委员会主编：《清季江西交涉要案汇编》，1949年3月油印本。

已经外务部与法国驻京钦差会订。”①

此次教案原本由传教士杀人所引起，理应对侵略者进行惩处。可是，最后的议结却对侵略者有利，说明清政府已经成为仰人鼻息的“洋人朝廷”。

（十一）开县教案（1907年）

整个四川义和团运动时期，川东一带尚无大规模的人民武装起义。其原因，一是因为重庆是四川唯一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集中，清军防备森严；二是由于大足教案以后，各州县都建立了一支反动的地主武装，成为官府监视和镇压人民最凶恶的鹰犬。

开县位于川东偏北地区。1904年遭受严重的旱灾，以种植罂粟为主的农户生计困难，而官府又实行土药（鸦片）统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因而打教、毁厘金局的事件经常发生。四川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开县的传教士、教民更加耀武扬威，肆无忌惮地欺压善良百姓，人民无不切齿。榨井坝（今达进）的恶霸地主刘彬然，平日作恶多端，横行乡里。后因有人告以“通匪”罪，为了避官府缉拿，他便跑到万县参加了天主教。之后又把无恶不作的外国传教士吴本馥请到开县，建立教堂，广招教徒。一时间，开县无赖之徒纷纷入教。“这些入教者中，有恶霸地主、地方绅耆，更多的是涌入了大批的地痞流氓，他们仗恃洋人势力，互相勾结，包揽词讼，胡作非为，大肆欺压人民”②。他们把教会的魔爪伸向四乡，广设教堂，招徕教徒，结成党羽。教徒“一入洋

① 《东方杂志》，1906年第7期。

② 《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开县的罪行》，1961年稿本，现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门，身价百倍”，动辄向非教百姓寻仇起衅，占田夺地，致使民教关系日趋紧张。

1906年春，红灯教在开县以拳术广为传徒，群众纷纷加入，并逐渐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与“教党”及胥吏相抗衡。

恰在此时，天主教会以筹款办学为名，苛派勒索，引起人民愤怒。红灯教遂在开县跳蹬场（今合力）举行起义，提出了打尽“三堂”（天主堂、福音堂、洋学堂）的口号。1906年7月22日，首领韩洪顺等率领数百人，将岳溪场的土行、学堂及教士、教民住房全部捣毁，继而将南门场教堂、学堂捣毁。吴本馥逃到万县求救。万县知县侯昌率练丁前来镇压。双方激战，大败练丁，侯昌只身逃走。民众乘胜又焚毁了陈家场的教堂、学堂和土行。义军发展至数千人，兵分两路：一路攻占新场（今石山），拟夺取万县城，闻有备，毁该地学堂、教堂、土行后，撤回开县；另一路由陈家场、铁桥镇北上，“势将围攻县城”。至此，县里各场镇皆被义和团占领，所有教堂、学堂、土行及厘金局卡均被捣毁，不法教民都受到惩处。人民扬眉吐气，纷纷参加战斗，起义军发展到万余人。

清廷命署川督赵尔丰，急调各州清兵进行围剿，用大炮向起义部队轰击，民众伤亡惨重，为时一个多月的开县人民大暴动。失败了。此案以赔款白银21000两议结。赵尔丰饬令地方官自筹，官吏除藉没义和团成员的全部家财外，不足之数就向人民摊派。差役胥吏却从中磕索，数倍于赔款。教民因获得大量赔偿，竟有因此而发家致富者，气焰更行嚣张，人民深受其苦。当时开县流传着一首民间谚语，说：“宁赴东海死，勿为今日开县民。”

（十二）大凉山教案（1911年）

1860年（咸丰十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把天主教传入四

川大凉山的会理县，在彝汉杂居的红布所地方建立教堂，并以此为据点，向冕宁、金矿、越西及大凉山腹心地带发展。到1875年，红布所教堂已有教徒二百余人，1893年达六百余名。1890年在西昌设立宁远教区，建立大小教堂二十余处，并建有教会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等多所。同时，英、美的基督新教教会也相继传入。由于教会、教士的横行，凉山彝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屡次发生。1908年，英国传教士布洛克等人由马边入大凉山“探险”。行至美姑时与彝族人民发生冲突，布洛克用手枪击毙阿侯家青年。“彝众惊哗”，愤而将布洛克杀死，于是引起对外交涉。次年清廷以剿办为名，令赵尔丰派兵数千，从马边、西昌分东西两路进军，企图扑灭彝族反洋教反清的烈火。但适得其反，人民的反教怒火却越烧越旺。

1911年，凉山会理彝、汉族人民出于义愤，将作恶多端的法国神甫贾元贞杀死。天主教宁远区主教光约翰派副主教蒲恩友与法国驻成都的领事甘某，一道赶赴会理强迫西昌知府索取命金白银十万两。知府以姜舟、木洛寨子的土官衙门作抵偿，并在铁匠村与会理县郊各割地百亩供建教堂和教会学校使用。同时，将十余名奋起反抗教会侵略的农民斩首示众。

但是，富于斗争精神的彝、汉人民没有被吓倒。这事件发生不久，西昌汉、彝人民在张耀堂领导下举行起义，提出了“杀贪官、灭洋人”，“推翻满清”，废除“新政”的革命口号，响应者风涌云集。连一些彝族土司如普格土司都龙光、披沙土千户也被卷入起义洪流。义军攻入西昌城，处决县令。10月25日，义军在黄水塘截击了法帝国主义分子吕真达等。最后，宁远主教光约翰与西昌县令勾结，联合镇压了这次起义。知府为酬谢教会“剿灭”张耀堂起义之功，将西昌的黄水塘和马脚店两地作为谢

礼①。西昌教会借此占地竟达一万多亩。

张耀堂起义对安宁河两岸的彝、汉、回、藏诸民族留下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起义口号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清性质，大大鼓舞了凉山地区各族人民，并有力地声援了与此同时出现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

四、这一时期教案的性质和特点

义和团运动后的反洋教斗争不论是在出现地区、斗争方式、斗争性质上，还是在参加成员、斗争目标及思想动向方面，与以往的相比，有着鲜明的新特点。

（一）斗争口号和斗争方式的变化

从各地反洋教斗争提出的“扫清灭洋”、“反清灭洋”、“锄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等口号看，这次斗争的对象和目标是很明确的，既反教士、洋人，又反贪官、朝廷，因而具有挽救民族危机和反对封建压迫的双重性质。

1901年春夏之交，四川出现的“灭清剿洋兴汉”和同时在直隶深州联庄会提出的“扫清灭洋”，以及翌年春季直隶广宗景廷宾起义提出的“扫清灭洋”的口号，标志着中国人民在英勇斗争过程中，首次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这两大斗争任务并列起来。它反映了近现代捭阖交替时期的中国人民对民主革命对象认识的深入，反映了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复

① 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四川彝族近代史调查资料选辑》，第26页。

杂性和特殊性，也预示着更大的革命风暴将会把这些发自下层民众的呼声作为政治号召和政治纲领而为之奋斗。

这些口号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艰辛和痛苦的认识过程，并且是用千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仅从字义上看，它是对义和团运动时提出的“扶清灭洋”和明末清初以来士人团体、宗教结社所倡行的“反清复明”的两个旧口号的扬弃和综合。然而，把那种隐晦曲折的宗教预言，改换成鲜明清晰的政治口号，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必经的、痛苦的历程。在此之前，各阶层人民包括革命党、改良派和秘密会党在内，还没有从社会实践中认识到反帝必须同时反清这一客观真理。就连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有一个认识提高的过程，当他千里迢迢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要求改革失败后，才开始朦胧地意识到挽救中华不能依靠清政府。更何况，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清王朝统治阶级勾结，也有一个暴露过程。历史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对人民疯狂的镇压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深入，受害最深、反抗最烈的下层民众首先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肮脏关系，才把反洋人反朝廷作为自己的斗争对象。在这点上，连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前面提到的几个口号的出现，就是下层民众民主革命思想的萌发，毋庸置疑，它为中华的觉醒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斗争形式的多样化及爆发地区的广泛性

从斗争形式多样化，涉及地区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来看，这一时期的反洋教斗争是大革命的前兆，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如前所述，义和团运动所采取的斗争形式是单一的、原始的、落后的。斗争形式的单一，说明了意识的保守和思想的愚昧。新的反教斗争既汲取了义和团的群众性的积极的一面，又摈

弃了那种没有计划、没有统一领导的群殴式的消极的一面，而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武装起义，拿起原始的枪械，与清军、外国军队、教会武装对峙，这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清政府的震慑最大。其它的方式还有，组织庄会团社，发动民众起事，焚教堂、打县城，都是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而且起事的庄会团社彼此联系，互相配合，呼应作战。1901—1902年四川的各次打教活动就是这样的。此外，还有以民众抗捐形式出现的反抗，如山东莱阳人民1909—1910年的斗争；还有以抢米抗捐形式出现的反教堂、反洋人、反官吏、反朝廷的斗争，如1911年湖南长沙民众的抢米风潮；还有以宣传鼓动形式出现的斗争，如1901年夏，在四川东部出现的“灭清剿洋兴汉”的揭帖，给正在进行斗争的义和团及民众以极大鼓舞，使川东大吏和清廷大为恐慌，等等。尽管斗争形式不同，但目标却是不约而同的。

这次斗争波及的地区之广和持续的时间之长，都超过了义和团运动。北部的蒙古地区有士兵的反教活动，南部的桂粤有散兵游勇的打教抗官事件发生，西部有川陕边的反教会霸占良田的民众斗争，东部沿海地带回荡着反抗清廷摊派赔款斗争的呼声。广大的中国中心地带，斗争更是绵延起伏，仅四川一处，1902年的反教抗官斗争活跃地区即达70余州县。

（三）参加阶层的广泛性及与民主革命的关系

从参加反洋教斗争的成员十分广泛的特点来看，它反映了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反映了不同团体和政治思潮的逐步接近，从而为倾覆清王朝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疯狂地宰割中国，清王朝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这不仅激怒了下层民众，而且也损害了官吏、士绅、商贾、士子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封建统治营垒内部出现了裂

痕，而且越来越大。清王朝依照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惩办了一大批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官吏和士绅，强行摊派“庚子赔款”、教案赔款、教堂赔款和地方赔款，这就使地主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迫使相当一部分官吏乡绅利用义和团运动的余波，参加、组织并领导了新的反洋教斗争。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蒙古塔拉特旗王爷率众怒杀教士、教民八百余人；江西近二十个州县的知府、知县纵容民众攻打教堂、杀教士，甚至特意为民众“闹教”创造条件。除官吏、乡绅外，参加并领导斗争的还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有进士、举人、贡生、秀才等。他们起来反抗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官吏乡绅，其原因除不满洋人横行外，再就是因家居“闹教”省区，身家性命受到威胁和损害，或者因“闹教”省区停止文武考试，断绝了他们的仕途；其中也有不少人由于受义和团的牵涉而被革掉功名。值得注意的是，反教抗官的参加者中出现了清王朝的士兵，他们在军中倒戈预示着统治阶级国家机器已到了坏死的程度。后来在清政府新军中竟出现了不少革命党人。当然，这一时期反洋教斗争成员的主体仍然是饱尝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下层民众，他们在斗争中是中坚力量，对斗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封建官吏、士绅和知识分子、士兵参加并领导反洋教斗争的动向，反映了当时中国阶级关系的重新组合和统治思潮朝着一个固定方向发展。社会各阶层对这个“洋人朝廷”的新仇旧恨，对外国列强吞噬中华罪行的愤慨。很自然地首先在矛盾最尖锐最突出的民教问题上表现出来。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打倒卖国政府，赶走侵略者。

新的反洋教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源泉之一和组成部分。

新的反洋教斗争出现之前，下层人民反侵略、反清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救国思潮是完全脱节的。1894年，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组织了兴中会，但他们在国内并没有群众基础。直到1900年以后，他们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少数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面攻击中国下层民众，说什么“开一般人的普通知识，使一般下流社会的人，不为吃小儿采红丸的谣言所惑”①，足见其早期亦不反帝；一面又撰文大声疾呼，号召人民丢掉对清政府的幻想。但当时的下层民众在反帝的同时，也已广为流传着“大清亡，中国强”的舆论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派会员到四川，与反洋教斗争的团社取得联系，加强革命活动。不久，又以反洋教斗争的成员为基础，发动了永宁等地的武装起义。同时，大量的事实证明，反洋教斗争和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反洋教斗争中的许多参加者后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和领导者。1901年在东北出现的反洋教、反侵略斗争的成员就是后来资产阶级领导的“抗俄义勇队”、“铁血会”的成员。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时，它的中坚力量就是四川反洋教斗争的民众，多达二十余万，成为拥有武装的同志军。曾于1902年发动反教斗争的余栋臣旧部张桂山，率众参加辛亥革命，攻入四川富顺后，就任富顺都督。这就说明，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斗争中感到下层民众的巨大反抗力量，“他们从推翻清王朝的立场出发，进一步考虑了如何借助‘下层社会’来扩充革命实力的课题”②。所以，他们利用自己创办或控制的所有刊物，“向民众灌输自由平等的学说，把下层人民的力量引向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③。致使这一时期的反洋教斗争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使前者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源泉之一和组成部分。没有群众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政治的要求，没有这个时期人民提出的“灭清”、“扫清”、“锄清”的口号，资产

① 《鹃声》杂志，第1期：《瓜分中国之原动力》。

②③ 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12页。

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也不能深入人心，并被广大人民和会党所接受，所以，二者的结合，就在十年后倾覆了清王朝。

综上所述，义和团掀起的救亡风暴过去之后，迅速拉开新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帷幕的大事件，便是新的反洋教斗争。它与资产阶级革命在一段时期内交叉进行，互相影响着，直至最后反洋教斗争成为辛亥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第十二章　中国教徒的自立运动与西方传教政策的变化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义和团运动，确实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吞噬中国的阴谋，从而迫使侵略者及传教士们不得不考虑今后该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此时，一种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思潮正在中华大地兴起。受这股新潮流的影响，中国天主教教徒的上层人物发起成立了“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会”。进而，一些爱国的中国青年教徒也纷纷成立“公教救国团”，号召教内同胞“奋发风云，誓保国土，……为全国之一助”①。在这种情势下，为了对付中华民族新觉醒，外国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教士们，一面用基督同盟运动对抗、抵制、融合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运动，一面用天主教的“中国化”与基督新教的“本色运动”继续维持其在华的势力。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教训，改弦易辙，还是死死地抓住“迅速传播基督教”才能征服中国这种侵略理论。然而，历史恰恰证明，他们的理论不过只是一种“单相思”而已。

① 天津《益世报》，1919年6月11日。

一、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运动与非基督同盟运动

《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坏事，但它从反面又在中国引起了以下一些反响：第一，使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组合，预示着新的革命斗争在酝酿、在发展；第二，巨大的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久已存在的民族、信仰、生存三大危机中，尤以生存危机更为突出；第三，侵略者的暴行暴露无遗，这对于富有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华民族来说，打击的对象更加明确；第四，帝国主义吞噬中国过程中，一些教士干了许多与他们身份不相称的坏事，不但一般的百姓看清了，就连那些具有爱国之心的基督徒们也觉醒了。基于上述几点，人民的新反抗，不可避免。这种反抗的形式也必然是多样的，除了人民的继续反洋教斗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外，中华民族的新一代——同时受着西方先进思想和孔孟礼教影响的青年学生和被外国传教士欺骗的爱国教徒们也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后两者的反抗形式，就是“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运动”和“非基督同盟运动”。

（一）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运动的兴起

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外国传教士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促进了爱国基督教徒的觉醒。尤其是到了1904年，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实施的迫害华工条款、规定后，加深了中国人民反帝的仇恨，增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观念。在这种情势下，产生了1905

年全国范围的反美拒货运动，也产生了1906年兴起的中国基督徒爱国自立运动。

1906年，俞国桢（宗周）等爱国教徒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设办事处于宝山路，创办机关报，《圣报》，宣传该会的宗旨和主张①。1906年出版的《中外日报》刊载了这个重要的事情：

“耶稣教②自立会为宁波俞君国桢诸人所创设，近者复拟于上海县之闵行马桥中西塘及奉贤县之南桥、徐连桥、青村港等处，分设自立会教堂。

此会命名及宗旨为：

命名：本会由基督教各会华教，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侵，为国消弭挽救而组织。具有爱国爱教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故定名曰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宗旨：本会既命名自立，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俾教案消弭，教旨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国家体面为目的。各会华教友无分彼此，不限区域。以期联合同志，鼓舞自力之精神，建立自强之基础。

记者按：耶稣之流行中国，近已如百川之东注，非复人力所能阻止。吾人对于耶教，当视为世间宗教之一种。故不必存震惊之意，亦不必存阻止之思。惟与其中西人深入内地传教，则诚不如由华人自行传教之为愈。传教者既为华人，则同居天覆地载之中，即同在中国子民之列。即猝有事故，要非他国所能干预。而割地失权

① 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42页。

② 路德新教传华后，各省呼名不同，如耶稣教、基督教、福音教等，本书统称基督新教。

偿费赔款之事，应可不致再见。识时者忧国家之多故，为未雨之绸缪，将以惩前毖后，正本清源，则自立会之设，应亦未可缓耳。”①

这个运动很快就得到各地教徒的支持，许多报纸进行了广泛宣传。北京彭翼仲主编的白话文的《京话日报》在1906年3月刊出一篇题为《自立教会的所以然》的文章：

“上海耶稣教友，不受外人的庇护，自立教会，这是顶好的消息。北省天主耶稣两教，自立教会的大英雄不知是谁？报上登了问题，现在还没有信息。我今天把宗教的本意，说给大家听听。是不是当自立教会，仔细想想，诸位也就明白了。……用宗教灭国最容易，比方著说罢，这一国想要灭那一国，先派些个教士，往那一国去传教。面子上还有好话可说，告诉是替他教训人民，凡来入教的人，加意保护。这么一来，入教的人必多，收一个入教的人，就是笼络一个人的心。一来二去，那一国的人民，自然彼此离散。入教的教民，跟不入教的平民，必短不了闹麻烦。这一国趁势来干预，从中就得了便宜。闹不上几回，把那一国就给消灭了。……庚子年起祸的根由，就是民教结怨太深，才激出那个大乱子。议和之后，除去赔款，还失了好些个权力，……所丢的利权，那一样不是教案闹的？再不想法子呀，嗳呀，中国真要不能立国了。想甚么法子呢？莫非叫他们反教？那又是作不到的事。最好的法子，只有自立教会。……

第一，中国教士先愿意。平日在外人翅膀底下，事事不能自由，……。想要不服人家的压制，本国没有教

① 《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号第4卷，第6—7页，引自《中外日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堂，无处去讲道。如今自立教会，岂不是个好机会么？第二，外国教士也愿意。万水重洋，来到中国传教，费心思，费劳苦，……如今能够自立教会，实是各教士们的功劳，有多么体面。第三，明白教友更愿意。平日担了随外国的名字，人人拿着当汉奸。……说外国人不是外国人，说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你想够有多么难受？自己立教会，脱离外人的牢笼，必不能再说是随外国了。从今以后，好好修德行，好好守规矩，按着教理说，活着作一个完全国民，死后好享天堂的幸福。岂不是件大好事吗？

……

我劝各教的教友，赶快自立教会。诸位既是中国人，不可不爱惜中国。圣经圣书里头，也曾说过：‘求主保佑本国太平’。有这样的道理，不可不遵。目下中国大势，总不能算是太平。你们心里，何妨替本国求保佑。要求保佑，先得尽人力。尽人力总得从根子上入手。中国不太平的根源，就是外人干预教案。我们自立教会，以后再有事情，他们便不能干预。果真如此，中国还能不太平吗？中国还能不强胜吗？我说一句归总的话罢：教会能自立，国家便能自立；教会不能自立，国家必不能自立。国家若不自立，一旦灭亡，无论是平民、教民，都得给外人当奴才哟！快自立教罢！快自立教会罢！”①

经《京话日报》这一番宣传之后，一星期内，“就纷纷有人来投信，都说是很愿意自立”。该报又在“要紧新闻”栏内刊出

① 见《京话日报》，590、591号，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题为《爱国的教民真要出头自立》一文，略称：

“听说东直门外，早就有中国教会，知道官场不认许，至今总没有出头。自从本报上提倡了两次，就纷纷有人来投倍，都说是很愿意自立……。趁此机会，大可提倡起来罢。这件事如果办好了，可以永远不再出教案。耶稣教能自立，天主教自然也要出头。无论信那教，谁不是中国的子民呀。”①

接着，华中的爱国教徒也起来响应，除成立自立教会之外，还办报进行宣传。《京话日报》在“各省新闻”中载称：

“汉口耶稣教，已经自立教会。又因外人干预教案，要办中国教会报，他们的宗旨，就是劝人自立，并劝民教和睦。教民也罢，平民也罢，生在中国，都是中国的国民，总要联合一气，不可彼此猜疑。这等宗旨，正合我们的意思。将来一出版，必定可以畅行。”②

这个运动虽然获得各地爱国教徒的拥护和广大人民的赞助，反映了中国人民高度的觉悟和自尊，但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正是气焰甚高、力量最强的时候，因而不容许中国教徒轻易脱离他们的控制。而懦弱的清政府也不敢支持中国教民的爱国自立运动，生怕得罪了外国主子们。所以，北京“东直门外，早就有中国教会”，但是，“知道官场不认许，至今总没有出头”。当时的人民也认识了这一点，在舆论上要求政府对运动加以支持。《福建日报》“尝著一论，极言华人宜设立是会之故，并及官长宜保护是会之理由”。该报说：

“独是文武官吏见所属地方有耶稣教自立之设，务

---

① 《京话日报》，596号，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② 《京话日报》，638号，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宜极力保护，俾得安然传习，以遂其信仰之自由，而后我国凡有耶教处所，当必转相仿效，勉求自立，而倚势营私之伪教徒既无所遁其私，则民教冲突之案自必随之而潜消渐灭矣。倘或地方官保护不力，办理不善，彼自立会必至左右为难，上下交困，势不至归泰西保护权之下而不得，则将来之教祸恐愈难言矣。”①

但是，清政府不但不支持当时普遍高涨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包括反美排货运动，留日学生反迫害运动，以及教会自立运动等），反而诬蔑陷害爱国的人民，说是“奸人播弄，匪徒煽惑”，要人民“断不可有仇视外洋之心”②。

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高压下，教会自立运动的困难是明显的，完全按照自主的道路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也曾利用过它，搞什么防止中华民族新觉醒的所谓“本色运动”。但，这个教会自立运动的出现，标志着爱国基督徒的觉醒，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这个运动必将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非基督同盟运动的产生

这个运动的兴起，除了前面所说的情况外，尚有以下两个背景：（1）新思想的出现，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2）中国政府外交方面的影响。

新思潮运动是随着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的出现而出现。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的科学思想渐渐传入中国，尤其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中国社会影响颇深，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古有的

---

① 《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三十二年七月，第4卷，第7—8页。

② 《京话日报》，547号，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由此而产生了革命思想的萌芽。洪秀全的民族平等思想、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思想，都已植入进中国一些人的脑海。可惜，这个时候的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皇恩浩荡，为清王朝效忠，如曾国藩等人，就是中国旧礼教忠君主义的奴隶，犹抱着天下之大，中国独尊；西学之入，是用夷变夏，当加以严厉拒绝。在封建官绅、士子当中，这种人是很多的。但更多的中层人民却把帝国主义侵略和科学技术看成是帝国主义一家独有，仿佛谁掌握了资本主义国家传来的科学技术，谁就会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到了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的思潮中，出现了媚外的态度，处处以摹仿为事，主张全盘地接受外来的一切，以为凡属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动。迨至辛亥革命消灭帝制，成为五十年来新思想运动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实。此时政治上虽有这一大建树，而于社会思想方面，仍复蹈常习故，因循敷衍。于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六人发起了新思想运动的团体，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主张破坏旧礼教、旧思想，青年人受其影响者尤众；同时，胡适等提倡白话文，吴稚晖等提倡注音字，实质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对于一切旧思想、旧理论、旧制度、旧学说，皆加以价值上的重估。所以它不单是影响到中国整个文化，也促进了对西方宗教的再认识，如，陈独秀所著《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所著《不朽》、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等。对于中国思想界发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人，莫过于美国的杜威与英国的罗素博士，他们应中国教育界领袖邀请，来华演讲。杜威主张实用主义，罗素主张经济的社会主义，都对基督教持反对的态度。杜威认为宗教不应当占学校课程，罗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给新思潮运动以莫大影响。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所以实用主义成了他的中心思想，处处叫人抱着“为什么”的怀疑态度。他们以为，凡不能用理智分析的所谓形而上学部分，都是非科学的；非科学的东西，都在排斥之列；只有科学才是正确的。这

六个人中，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其次是钱玄同的疑古。当时青年学生界所兴起的非基督同盟，可以说是新思潮运动中的一种结果。

除上述而外，这个运动兴起还有其政治背景。1919年巴黎和会有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决定，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使人们认识到，依靠帝国主义来富强中国，其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只有将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赶出中国，才能保卫国家的独立。从此，“非基督同盟运动”出现了。

1922年4月4日—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参加者来自三十多个国家，传教士穆德为会长。会上讨论了六个问题：(1)国际与种族问题；(2)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3）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学生；（4）学生生活之基督化；（5）学生在教会中之责任；（6）如何使女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在世界中成一更强有力之团体等。消息传出后，清华大学的非教徒学生便联合起来反对，并先于3月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原文如下：

“我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现在把我们底真态度宣布给人们看。我们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曾制造了许多罪恶，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现在正在那儿制造或将制造的罪恶，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堕落的人，决不能容忍宽恕彼。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

遣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桀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溃了。各国资本家——不论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拥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种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产物。他们预备于下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污辱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们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学生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底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不久，清华学生在校方支持下，把《清华周刊》第33期改为《铲除基督教专刊》。接着，全国诸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支持，由此而影响全国。广州尤为激烈。《国民日报》还专门办了一个《反基周刊》。时值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广州又发生“六·二三”事件，非教运动愈益发展。教会中的爱国之士，也对于基督教国家产生不满，主张中国教会脱离帝国主义，因而引起内部纷争，欲谋教会革命。闽、浙、湘、苏、赣、鄂等省，常发生捕捉传教牧

师，反缚鼓纸帽，游行示众之事；许多教会机关被占，有的教会学校停办，在校学生放火捣毁学校。如福州的协和大学、格致中学被焚毁一部分。当时的国民党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站在非基督教同盟一方。例如江苏省党部有这样的议案说："基督徒须声明脱离所信仰之宗教方可入党。"上海学联会呈中央党部说："基督教徒不得任国民政府之政务官职务。"但，那时主持国民党政府工作的蒋介石却站在反"非基督教同盟"一方，连发命令，制止人民反对基督教。如，1926年潮梅（潮州梅县）警备司令部奉蒋介石的电报，发出一布告说："现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皓电开，查年来各属，有扰乱教堂情事，其发生于12月25日者尤多，殊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仰该司令严饬所属军警，切实维持，免滋纷扰。"广州公安局同时通告所属一体保护教堂、学校。但也有完全和蒋介石命令相违，而支持这个运动的。如汕头市公安局政治部，以福州天主教堂惨杀婴孩事，出一布告，中有"民众呀，拔剑奋起，杀呀！"等语，遂酿成福建，汕头反教大风潮。

学生首先发起的"非基督同盟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外国传教士为了防止全中国人民起来驱逐他们，于是就利用1906年出现的"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会"，也搞了一个基督教的"本色运动"。

二、天主教的"中国化"与基督新教的"本色运动"

1919年《巴黎和约》草签的消息传来，爱国的青年学生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这对"基督教爱国自立会"起到了激励作用，严重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教会势力。广大的天主教徒，特别是教会学校中的爱国的青年学生纷纷投身到运动中去，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天津的天主教徒是最先的倡导者，是年6月

10日，他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公教救国团”，发表了宣言。接着天主教徒聂醒吾等又在6月12日的《益世报》上发表了《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指出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教案一起，非丧权即失地”，我国的一部分领土“遂随保护之声而长逝矣”。最后他们号召天主教徒应立即行动起来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数日之内，天津各天主堂相继组成了“公教救国团”。他们和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一起上街头，下农村，到处演讲和参加示威游行。

天主教在天津的洋教士们眼看使用明显的镇压手段不能达到目的，于是采用了“打进去”的办法。到7月间，天津各教堂的公教救国团的领导权逐渐被一些传教士的代理人所控制。他们借口宗教的原因，禁止爱国教徒有“激烈的行动”，并规定出发宣传必须有神甫或“老成持重者随行，如讲员讲演时有出话激烈或刻薄者，须听领袖人制止”①。传教士又在8月4日举行了一次“大祈祷”，以转移爱国教徒的反帝目标。

罗马教廷得知中国天主徒纷纷参加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后，立即派遣教务巡阅使光若翰前来中国。他在10月20日抵达上海后，即与徐家汇耶稣会的传教士研究中国天主教会的形势，指示立即在《圣教杂志》上发表一项所谓“特别声明”②，竭力为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辩护，攻击天津爱国教徒的正义行动，并重申“迭次表示反对此次学潮”，教徒“如果违犯，应得神罚处分”，以此来恐吓教徒。

接着，光若翰又到北京活动，并于1919年11月16日至23日举行华北主教会议。会议首先听取华北各主教汇报各地教徒反帝爱

① 天津《益世报》，1919年7月14日。

② 上海《圣教杂志》，1919年11月。

国斗争的情况，特别着重讨论了天津爱国教徒的行动。在会议期间，光若翰还以巡阅使的身份发表了“致直隶司铎书”，居然说：“因有人痴心梦想以为既已推倒中国旧政府之秩序，君主政体改为共和政体，则以为圣教会之体制，亦宜受同似之改革，谬念妄想，莫若此也。”①光若翰竟命令中国教徒说：“汝曹万不可有人为公共表示举动之首领，汝曹万不可容准天主教公教之男女学生结队游行，参与其事。”他还吩咐传教士，如果教徒坚持爱国立场，“则汝曹与之隔绝，……勿因稍事宽柔”②。

（一）天主教的“中国化”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天主教为对付中华民族的觉醒，决定采取使天主教所谓“中国化”的措施。这个措施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使天主教教义儒学化，以适应中国的习俗；其二，尽快培养中国的神职人员。用教皇本笃十五的话说，就是“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③。

为了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第一个方面，教士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狭隘教义，收敛起胜利者的骄横气焰，伪装成亲善的样子，在口头上附和儒家的教义，企图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拼合一起，以便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在他们创办的《教会新报》总述中写道：“耶稣圣教与中国儒教各虽迥别，道本同源，皆存心养性之学，非诡僻怪异之

① 上海《圣教杂志》，1920年4月号。

②③上海《圣教杂志》，1920年4月号。

言”，并认为“儒教法本其才，专与耶稣教异同”，“祭礼正宗论西学祭天”，“儒教言道不可离与耶稣教同”，“儒教中庸与耶稣教同”，“儒教不怨不尤与耶稣教同”，“儒教时习而说与耶稣教同”①。又说：“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为己，同出一原”②。《教会新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调和两种思想矛盾。当时，从所有传教士的口头上也经常可以听到：“上天无亲，中西万国，一视同仁。”更可笑的是，传教士还到《圣经》中去找理论根据，谓《圣经》耶稣之训曰：“天下一家也，众人兄弟也。所谓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③硬把两种格格不入的教义说成是相“同”，以此来转移统治阶级的视线，消除儒学士子的排斥和民间的反抗，以便更有利于他们深入内地进行传教活动。

但传教士们所采取的这种措施，并不是意味着他们真正向儒学屈服，而是为了要以基督教思想为工具来麻痹中国人民，最终目的是取儒学而代之。但由于当时的条件、基础都未成熟，他们面临如此强大儒学势力，因而只好暂时地与儒学妥协，作为缓兵之计，以争取更多时间，来扩大他们的影响，为以后同儒学最后争夺领导权准备好先决条件。

为了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第二方面措施，教皇庇护十一先后于1922年和1932年两次派教皇钦差到中国活动，以尽快实现天主教的“中国化”。为达到此目的，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首脑墨索里尼在1924年签署命令，拨给在华天主教各修会一千万里拉作为

---

① 《教会新报》，创刊号，“总述”。

② 《皇朝经世文新编》，中第40页。

③ 《中东战纪本末》，卷6，第16页。

这一年使天主教“中国化”的活动经费①。

为了把中国籍的神甫推到第一线，教皇首先于1923年12月12日确定以湖北省的蒲圻为“国籍宗座监牧区”，任命中国神甫成和德为监牧。1924年4月15日，教皇又确定河北省的安国为“国籍第二宗座监牧区”，任命中国神甫孙德桢为监牧。1926年2月，教皇庇护十一发出“谕旨”，明确指出“不得阻碍中国司铎担任司铎区及大主教区之主教”。1926年10月28日，有六名中国神甫由各修会送到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由教皇亲自为他们“祝圣”，升为主教②。

1933年6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又在罗马为三名中国籍主教亲自“祝圣”，他们是：河北省集宁（今属内蒙）的樊恒安，永年的崔守恂，四川省雅州的李容兆。

到1936年，中国籍主教已增加到二十三名。

增加中国籍神甫是天主教“中国化”的又一重要措施。最初在十八世纪时，中国籍神甫只有十五人，到十九世纪初增加至三十三人，鸦片战争时期全国天主教中国籍神甫共约一百三十人，到1900年增至四百七十人，而从1920年起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九百六十三人。经过有计划的培训、提拔，到1930年中国籍神甫已达一千五百人，到1933年达到一千六百人。与此相应增加的中国籍修女，到1933年约达三千六百人。

1927年时，天主教又将原来划分的十七个大教区中的苏皖教区分成江苏、安徽二大教区，黔桂滇教区分成贵州、广西、云南三大教区，一共划为二十个大教区。

这二十个大教区又划成一百二十九个教区，其中有一个是大

---

①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739页。

② 河北安国的孙德桢、宣化的赵怀义，江苏海门的朱开敏，浙江台州的胡若山，山西汾阳的陈国砥，湖北蒲圻的成和德。

主教区　在澳门。另有代牧区或称教皇代牧区八十五个，监牧区或称教皇监牧区三十六个，自立区或称独立区七个，分由大主教、教皇代理主教、宗座监牧和自立区主教管辖。

到1936年，在中国活动的天主教主要的大小男修会共有三十一个。它们是：耶稣会、奥斯定会、重整奥斯定会、多明我会、会外神职班、巴尔玛圣方济各会、圣方济各嘉布会、圣方济各住院会、圣方济各会、米兰外方传教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白冷外方传教会、圣高龙庞外方传教会、玛利诺外方传教会、魁北克外方传教会、苦难会、圣心司铎会、伊苏登外方传教会、比布斯二心会、慈幼会、救世主会、司格包拉埠夫外方传教会、圣母玛利亚圣心会、圣言会、圣痕会、本笃会、奥斯定常律会、主徒会、赎世主会、圣若翰保弟斯大小兄弟会等。

女修会在1920年以后来华活动者有：山林圣玛利亚会、罗马联合会、方济各会服务医院会、匹茨堡圣若瑟修女会、俄亥俄若瑟山仁爱修女会、本笃会修女会、耶稣会孝女会、善牧会等。连以前的共约有四十六个女修会。

各天主教修会在各省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福建省：多明我会分布于厦门、福州、福宁、建宁、汀州；救世主会分布于邵武。

安徽省：耶稣会分布于安庆、蚌埠、芜湖。

河北省：遣使会分布于安国、正定、北京、顺德、天津、永平；教区附司祭分布于赵县、保定、宣化、永年；耶稣会分布于献县、大名。

广东省：巴黎外方传教会分布于广州、北海、汕头；教区附司祭分布于澳门。

湖南省：方济各会分布于长沙、常德、衡州、永州；美受难会分布于沅陵；奥古契诺会分布于岳州。

山东省：方济各会分布于张店、烟台、益都、济南、威海

卫；教区附司祭分布于临清；圣言会（德国）分布于曹州、青岛、兖州。

云南省：巴黎外方传教会分布于昆明；圣心会分布于大理；教区附司祭分布于昭通。

河南省：巴尔玛外方传教会分布于郑州、洛阳；教区附司祭分布于驻马店；米兰外方传教会分布于开封、南阳；圣言会分布于新乡、信阳。

四川省：巴黎外方传教会分布于成都、重庆、宁远、叙府、打箭炉；教区附司祭分布于顺庆、万县、雅州。

陕西省：方济各会分布于凤翔、三原、西安、同州、延安、榆林。

山西省：方济各会分布于潞安、朔州、太原；教区附司祭分布于汾阳、洪洞；圣母圣心会分布于大同。

浙江省：遣使会分布于杭州、宁波、台州。

江苏省：耶稣会分布于上海、徐州；教区附司祭分布于南京、海门。

湖北省：方济各会分布于汉口、黄州、宜昌、老河口、沙市、武昌；教区附司祭分布于蒲圻。

江西省：遣使会分布于赣州、吉安、南昌、余江；圣高龙庞外方传教会分布于建昌。

贵州省：巴黎外方传教会分布于贵阳、朗洞；伊苏登外方传教会分布于石阡。

甘肃省：圣言会分布于兰州、新疆；嘉布会分布于秦州。

宁夏省：圣母圣心会分布于宁夏。

绥远省：圣母圣心会分布于绥远。

广西省：巴黎外方传教会分布于南宁、梧州。

察哈尔：圣母圣心会分布于西湾子。

蒙古：教区附司祭分布于集宁。

天主教使教会“中国化”，实质上是把中国神甫推到第一线，外籍传教士在幕后指挥操纵，它的目标是要使天主教能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更有效地扩展其势力。为此，天主教提出了一个口号：“通过中国人为基督对中国进行和平的和精神的征服。”①过去主要是由传教士直接出面扩展教会势力，依仗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军舰大炮的支持，虽然屡遭中国人民的反抗，但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所使用的斗争方式又很落后和分散，因此，斗争都失败了。如今时代不同了，中国革命已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人民的觉悟程度大大提高，斗争的方式也与以前不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正在逐步地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因此帝国主义还想利用从前老一套的侵略方法已行不通了。只有“中国化”才可能是维持和发展教会势力的唯一办法。因此，在华各修会遵照教皇的“谕旨”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

天主教徒的增加速度从“五四”运动以后已逐渐减慢。1928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天主教在华事业虽曾受到相当影响，但比基督新教所受冲击要小一些，估计1936年天主教在华教徒约有二百八十万人。它所采用增加教徒的办法基本上与以前相同，所不同的是尽量利用中国人发展教徒，包括给予一定的小恩小惠吸引穷困者入教。

（二）基督新教的“本色运动”

什么是“本色运动”呢？根据美国基督新教差会负责人穆德主持召开的1922年全（中）国基督教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称：

---

① 德礼贤：《天主教会在中国》，第68页。

"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

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①

为什么要搞所谓的基督教"本色运动"呢？这是因为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迫使传教士们不得不改变在中国的传教方法，使他们不得不把传教的重点由知识分子方面，分出一部分力量转向下层的民众，特别是把力量集中在农村，要使"活的基督"能深入人心。这正如一个传教士在他的回忆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过去曾一度严重地脱离了平民和中等人，除非他们有时好奇地来窥探我们或向我们求得医疗或其他帮助。……当人们来到我们面前，欣赏并称赞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基督的人格和基督教义的胜利，甚至表示愿意参加我们的行列，这虽然很好，但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些与衷心信仰基督混为一谈。如果我们工作的结果只得到人们对基督的称赞而不能征服人的生命，感化人的思想，则对这样的工作，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表示，只有'失败'二字。……我们所要给人的不是一种制

① 穆德，《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1922年。

度，也不是一种教义或学说，而是基督——一个新的生命。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活的基督。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赖我们正确的表达基督和我们对真理坚定不移的态度。中国人所需要的不是西方文明，他们能够改变任何外来的文明去迎合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因此，应使他们得到基督为根基，他们就会在这上面为自己建立一种仿造的而适应中国环境的新文明，在上帝征服宇宙的计划中，占适当的地位。”①

他警告传教士不要满足于吸引人的手段（如用西方文明）和因此有人接近基督教的现象，而是要达到用基督教征服人的生命感和化人的思想的目的，以征服中国的人心，把中国的基督化纳入征服世界的计划。

另一方面，1922年3月爆发的“非基督同盟运动”，揭露了教会被帝国主义利用的本质。教会在近代史上本来就是外国侵略者的一个工具，所以被称为“洋教”。为了摆脱这个不光彩称号，有必要涂上一层“本色”，让中国人出面，“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西洋的色彩”。于是，他们利用了1906年中国基督徒上层分子组织“基督教爱国自立会”，以此作为掩护。他们纷纷把差会冠以“中华”二字，似乎这样一来，就换成“中华牌”了。与此同时，还鼓励一些中国传道人成立“中国自立会”、“中国基督教会”、“国内布道会”等名目繁多的所谓“三自”教会或传教团体。可是这些自称爱国的自立会却没有一个不接受外国津贴，为外国服务的。

随着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深入，广大群众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收回教育权的口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也曾发表

---

① 1962年天津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确选辑》第35册，第21—26页。

过宣言表示“赞成”，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联络一部分传教士还向美国政府提议脱离传教条约的保护。这些都不过是欺骗性的表面文章。

基督新教把“本色教会运动”的重点放在农村，这明显地和天主教一样，企图同共产党争夺农民。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专门设置了一个“乡村工作特别委员会”，首先对农村作进一步的调查。它要求：（1）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农村教会和以农村教会为生活中心的活动现状；（2）搜集和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宗教改革实验的情报①。也就是说，要对中国农村中国民党的、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的所谓“乡村建设”和教会活动以及共产党的农村工作进行全面的调查。

192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又与南京金陵大学联名召开了所谓“农村工作会议”，有十五个省的十六个基督教差会的二百十七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要根据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对乡村活动的决议，在农村推广“本色教会”，并以农村教堂为中心，开展一系列的情报调查和农村改良活动，以扩大农村教堂对周围乡村的影响，把农民吸引到教堂中去。但是不久由于活动经费缺乏，此项活动并没有全面铺开。

到193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决定选择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进行农村实验试点区，由金陵神学院和金陵大学农科具体负责试行，主持人为美国传教士毕范宇。毕范宇在1931到1933年连续三年带了学生到淳化镇“实习”，驱使他们到当地周围农村搜集情报，并在1932年在该镇设置了“乡村训练中心”，侵占了三十六亩土地，种植试验作物，设立乡村服务，办理乡村合作信贷，并与国民党合作对农民进行“党化教育”，宣传宗教，且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进行攻击和造谣诬蔑。这是基督教

①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报告》，1922—1923年，第19页。

建立以农村教会为中心的“社会服务点”，利用小恩小惠，实施一些改良主义措施，进行反共说教，企图把农民拉拢到教会周围的一个“实验”。所谓“本色教会”已经远远地离开他们自己下的定义了。

此外，在三十年代里，基督教搞“乡村建设”试点的地方还有河北的定县、滦河、保定，山西的太原、新德，江苏的唯亭、大场，山东的福山，湖南的汉寿，湖北的皂市，四川的成都、重庆、璧山、潼南，浙江的上虞，福建的福州以及上海等地。

基督新教势力的发展从1922年起开始速度减慢，到1926年约有四十万基督教徒，比1918年净增约五万人。到1937年共有教徒约六十五万人，主要在1932年以后的五年间发展速度比较快。传教士人数在1926年约有四千余人，美籍传教士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五十。1927年3月，由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使二千余人伤亡，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外国传教士吓得纷纷逃跑。可是不久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采取了屈辱妥协的解决办法，传教士们又大批地涌到中国。到1937年，在华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共约六千名，其中，美国传教士的比重上升到约占百分之六十。到三十年代后期，美国基督教势力已占绝对优势。

说到底，“本色运动”的本质是针对共产主义的。美国传教士龚斯德在他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书中说：

> “我是来向东方宣传基督教的，必须以解释基督为任务；后来更加知道，以解释基督去对付共产主义，也是我的任务。
>
> 基督教已经临到重要的危机，也许是一个决定生死关头的危机了。
>
> 要胜过共产主义，唯一的方法，乃是使基督教的天国，先入为主。
>
> 中国的前途，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呢？还是建筑

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呢？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在中国有一个竞赛，而其影响之所及，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我们必须用天国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超过他们的主义。

在世界的选择还没有决定以前，我们还可以有这个仓促的时间，整顿我们的内部，联合我们的势力，实施我们的计划，……去对抗共产主义。”①

这些赤裸裸的反共言论，在三十年代的基督教各教堂、各类学校和出版物中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传教士就是寄希望于中国的反动派，支持他们的一切反共活动，并亲自进行喋喋不休和连篇累牍的反共说教，企图取消中国革命。至此，基督教的所谓“本色运动”已完全暴露出来，它原来是一个反共运动。

三、教会征服中国的新策略与中国民众的抵制

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教会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外国侵略者为了防止义和团的再起和人民的反抗，为了加紧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他们决意不仅要恢复而且要大大加强和扩充教会势力。

（一）“迅速传播基督教”

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得以恢复，如何制止类似义和团这样的事件再度在中国出现呢？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说：

---

① 龚斯德：《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序言。

“（义和团）的狂潮将继续蔓延，在今后两、三年内可能扩展到二千万人。唯一根治的办法是迅速地传播基督教。……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需要对付的“黄种人”问题——也许就是“黄祸”问题——就象太阳明天一定会出来一样。怎样能推迟或阻止它的出现，或现在应采取什么行动使它转移到无害的道路上去呢？倘若各国之间能取得一致意见立刻瓜分中国，……那就有可能使爱好和平的、守法的、勤劳的中国人受到管束。……或者是，不管中国官方的反对和百姓的愤怒，使基督教来一个强有力的扩展，从而传遍全中国，使中国变为最友好的国家，在一切有利于和平与友谊的事业上成为最积极的拥护者，就可能戳破义和团的气球，把球中所鼓起的民族仇恨和危害世界前途的毒气放掉。除了瓜分（这是一个困难而不大可能达到的国际协定）或是基督教取得奇迹般的广传（这是一个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也很少有希望的宗教胜利）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推迟或避免那个结局了。……”①

赫德在中国活动四十八年，熟悉中国情况，他的意见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估计“瓜分”不大可能，只有依靠迅速传播基督教，以软化中国人民的斗志、避免类似义和团运动再起。美国国内有十七个重要的基督教差会负责人于1900年9月21日在纽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不撤退在华传教士，而且一旦局势许可，立即把在华传教事业迅速恢复，加派传教士前往中国，积极地扩展教会势力。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决策，内容如下：

“（1）中国目前的骚乱当然给传教事业带来了一

①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第2卷，第739页。

些限制，在某些地方甚至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使我们沮丧。传教事业应当而且必须在可能与适当的情况下尽早恢复。……上帝一定会使这次骚乱有利于福音的广传，正如印度在1857年发生叛乱之后传教事业出现了一个最成功的纪元那样，中国在1900年发生义和团骚乱之后，也必将出现一个新时期。因此，不仅每一个被毁的传教站应该重建，而且还应当制订增援人力和增加支出的规划，以便上帝的教会可以抓住来临的战略时机，达到中国归向基督的目的。传教士们特别要团结一致，并且热切盼望明年将能有大批新的传教士到中国去，正在神学院受训的青年应当鼓励他们申请这项任命。

（2）鉴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兴趣，对整个传教事业的作用往往加以否定，传教事业在美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注视，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应在国内采取一项积极的政策。……

（3）各差会代表一致认为将传教士全部召回既无必要，也不适当。……因此一致同意除因健康原因或神经衰弱必须立即回国者外，仍在国外者必须继续留在高丽、日本和认为是安全的中国沿海港口，等待形势的发展，准备及早恢复工作，看管与重建差会产业，尤其是指导和安慰中国教徒。……

（4）会议在赔款问题上讨论了很多时间。八个差会总部，就他们已知的产业毁损情况提出了报告，有些地方的毁损是巨大的。其他大多数差会，估计也都有不同的毁损。……北长老会将仿照工作年度预算的办法，请每个传教士和每处传教点造一份清册，由在华差会审核，然后邮寄纽约总部。这样，对于复杂的赔款问题，

就可以有秩序和慎重地进行。我们将避免使整个传教事业遭受非议，也不要使中国人认为我们是欺侮他们因而激起他们的愤恨。

（5）……有几个差会总部，接到了从中国打来的电报，要求向华盛顿提出抗议，反对联军撤出北京和让慈禧太后复位的建议，认为如这样做，对传教事业将是一种灾难。有些传教士坚持提出这个抗议，因为联军如果撤退、慈禧复位，中国人将会理解成这是他们的胜利，而占领北京城的精神影响会受到破坏，甚或导致骚乱的再起。但这次各宗派的会议一致决定，对这种提案不采取任何行动。……

最后，全体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本会议的意见，认为在中国传教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工时，正是实行传教士和差会早已同意的有关传教区域分工合作原则的良好时机，尤其是在划分传教区域和进行印刷、出版、高等教育和医院的工作上。大会建议各差会总部和它们所属的传教士，对此问题给予同情考虑并采取相应的行动。”①

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这样要求的，传教士们也是这样希望的，而且近代百余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从资本主义列强注意中国之日起，就一直把“迅速传播基督教”作为征服中国的一种手段，其结果都不断遭到上自清政府，下至“愚民”百姓的一致反对。而到了二十世纪时，基督教果然在中国传播，并且达到惊人的地步。这是靠强权政治作为后盾所取得的。当然，教士们吸取血的教训，稍稍收敛跋扈行为，改变了他们的形象也有一些关系。

---

①亚瑟·布朗：《在中国的未来传教政策》，《教务杂志》，1901年8月，第398—405页。

（二）中国民众为何要抵制基督教

中国民众对外来宗教的抵制是有历史根源的。许多中国人对外来宗教的教义、仪节和传播方式有意见，很难于接受，但这是形式问题，反映的本质问题还是外来宗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不相容，这一点是民教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从文化和政治两种社会现象上考察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这个矛盾实际上有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二是风俗习惯上的差异；三是政治生活上的冲突。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说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信仰、生存三大危机。

但作为反洋教斗争发生的起因，这三者却依时依地有所侧重。

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指基督教教义与儒学的对立。基督教思想虽然曾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但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思想体系，又带有浓厚的为庄园制经济基础与领主贵族政体服务的神学体系的痕迹。而儒学则是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二者服务的对象不同，强调和维护的东西也必然不同。基督教以一个虚幻的上帝和天国来统治一切，它的基础是创世说，宣称全智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主宰世界，人们必须敬畏它、顺从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有高下。与此相应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原罪与救赎说，认为人生来就有罪，唯有信奉救世主耶稣，靠耶稣为人赎罪，才能求得死后永生。这样的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求人们不重视世间的人际关系，而把感情、精神导向冥冥之中，去追求天堂的幸福。儒学的核心却是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巩固专制的宗法制度，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至上君权，强

调“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在这个基础上，它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大讲“人之初，性本善”，“意诚心正，修身齐家”，着重于个人的自我反省，把“不朽”和“拯救”都放在此生的世间功业文章中，而不去追求来世拯救、三生业报或灵魂不朽。儒学不把人们的情感心理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用一整套“礼”将其消容、满足在以宗法、家庭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

很清楚，二者的整个思想体系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因此，传教士认为“吾非除旧何由布新？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①。要扩大在华教务，就必须使“儒学这个梦魇消除”，否则“毫无希望”。于是他们从各方面对儒学肆意诋斥，“尽情抨击”②。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经过几千年不断改造的儒学，在中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从古至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者”③，任何“非圣无法”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对。

必须指出，基督教与儒学的对立，根本不是不同社会性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间的对立，因而人们决不能把这种对立和带有不同社会性质色彩的“西学”与“中学”之争简单地等同起来，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也不是次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相同的经济基础，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可以存在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④。在世界思想史上，为同一经济基础服务的不同意识

---

①丕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

②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1860—1870年的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哈佛大学1963年版，第80页。

③《啸古堂文集》，卷3，《拟与英国使臣威妥玛书》。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形态体系间的激烈斗争，也屡见不鲜，何况中西封建社会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何况此时基督教又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鸣锣开道，就更使儒家之徒群起而大张挞伐，进而影响一般民众。

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比之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广泛。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以儒家影响为主，并吸取了佛、道等各种因素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代代相传，陈陈相因，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而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基督教，其教规和仪节则带有浓厚的西方社会的特点。二者之间差异颇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洋教与中国社会的又一对立。我们略举几例试加比较：（1）基督教禁止崇拜偶象，而中国社会特重祭祀祖先，即使一贫如洗，祖宗牌位也不可不设。（2）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而中国社会中“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溷莫不有神”，不仅“因时致祭”，还随时祈祷，求福、求寿、求雨、求晴、求子女、求太平等等，无一事不求神。（3）基督教对男女交往持比较随便的态度，男女同堂听道聚会等，并无忌讳，而中国则非常注重男女之大防。（4）中国社会上下很讲究风水，而基督教全无此说。（5）中国社会普遍闭塞寡闻，昧陋多怪，而基督教的仪式如圣洗、终傅等与中国常情多有扞格，于是就对其产生了很多敌意的猜度。

当然，风俗习惯上的差异，绝不仅仅是上述几点，其它还有很多。洋教对中国的一切风俗习惯都“极口诋诃，谓为绝大罪业，上帝所不容”，而中国民众，本来就对洋教“不敬祖”、“不祀神”、“男女混杂”、“破坏风水”等“皆所深恶”①。又“见自父祖以来素所敬奉悦服之事，素所目为甚美可愿之端，一

①乔松年：《乔三格公奏议》，卷10，第39页。

旦被外国男女学语未成，嘲弄侮骂，其一腔怨恨洋人积火，自尔有触斯然、不可抑遏”①。这种普遍的怨恨反感情绪，持之日久，就形成为一种排斥洋教的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极大，而且相当稳固。某一具体的反洋教斗争，可以并不源于风俗习惯上的差异，但这种社会心理的支配作用，对于斗争的爆发，可能成为引爆装置。

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这些文化上的不相容，已经使洋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而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冲突，愈益把这个矛盾推向了不可调和的激化程度。政治生活领域中冲突的核心，就是洋教具有的侵略性。首先，洋教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辅助工具，是靠列强的武力输入和保护的。“西人传教支那，固是取之以力，聚国兵於城下，书之约为专条，而中国莫敢谁何。自是以还，凡有约之邦，皆护法者也”，每遇教案发生，“则群起大声疾呼，不为动干戈不已”。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里，洋教总是与“丧权辱国之意胶结而不可分”②。其次，洋教势力依靠资本主义侵略强权，横行不法，作奸犯科，网罗痞赖，欺压百姓；掠夺财物，剥削群众；侵越权柄，包揽词讼，留下狰狞可怖的坏形象。再次，洋教遍布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与中国社会的接触最广泛、最直接，因而往往被视为外国侵略者的代表。

综上所述，所谓洋教与中国社会矛盾的三个方面，实质上就是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冲突；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强权与被侵略的中国社会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之间的联结物，乃是一系列强迫输入基督教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保护传教政策，以及洋教势力以强权为后盾的飞扬跋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洋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的全部内容，那就是：仰仗强权侵略的基督教

---

①《支那教案论》。

②《支那教案论》。

文化与遭受强权侵略的儒家文化的冲突。在这里，只要中国还在遭受着强权侵略，洋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就不会向非对抗性转化，更不会消失；同样，只要儒家文化尚在中国占居统治地位，洋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就不会向非对抗性转化，更不会消失。尽管他们改变了传教手法，努力使教义与儒家学说统一，并招揽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信徒，其结果，对立和斗争犹如弓在弦、刀出鞘。因此，尽管天主教的“中国化”，基督新教的“本色运动”，赫德的“迅速传播基督教”等西方传教政策的变化，企图改变西方教会的侵略形象，用较温和的办法，在中国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它遇到的是古老的、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有民族自尊心的东方大国，从康熙皇帝，到农民领袖洪秀全，再到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都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体系。各阶级、阶层的抵制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基督教在中国没有取得惊人的突破，只是教堂、教徒的人数增加了一些而已。更何况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先进的知识界和工农大众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这种非宗教的、有实用价值的、富有革命性的学说，就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挤进了死胡同。

第十三章　1912—1949年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各国在华传教士们为了实施他们的“迅速传播基督教”以征服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广泛兴办起“慈善”事业来。从客观上讲，也确使教会事业有了一定发展，给中国也带来了一些科学教育的进步；但是，传教士从来没有放弃过征服中国的意图。他们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随着中国革命的步步深入，他们的反面作用就愈加明显。到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又制定和实施了应变计划。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在旧中国横行的日子就宣告结束了。

一、教会兴办的“慈善事业”

教会的“慈善”事业包括教育、医疗、救济和慈幼教育。传教士们兴办“慈善”事业的宗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传教，

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在兴建教堂的同时，兴建了一批修道院、学校、医院（或门诊所）和育婴堂、孤老院等。这些名目动听的所谓“文教”和“慈善事业”，是帝国主义在思想阵地上侵略、奴化中国人民的工具。

（一）教会学校的宗旨、目的及其发展

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督新教曾把西方的教育体制和制度传入中国，连分科考试的办法也是由西方传到日本，并于1902年再传中国的。从前，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的私塾、学馆制和用八股试帖、开科取士的办法。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势力的深入，教会学校到处林立。在庚子赔款履行不久，美国人又发起“退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建立学校”的风潮。他们真是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吗？根本不是。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控制中华民族，才重视对中国人的思想奴化教育，重视占领中国古老的教育阵地。他们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是很明显的，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1907年写给美国总统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们在中国办学的宗旨、目的。他说：

> “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青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得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方式。”

这位校长还做了这样一个结论：

“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是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①

这一段话不仅说明退还庚子赔款的真实意图，也可一般地解释为所有教会学校建立的真实含意。这就是说，办学是为了要麻痹中国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变成美国的代理人。

传教士们毫不隐讳他们的观点，甚至公开宣传创办教会学校的目的。1909年11月17日，传教士穆德在他的一封募捐信中透露了他的意图。他认为，“中国几十万的官立学生”、“在东京的五千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的几百名中国留学生”、“群集于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将来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认为要“使这些人受着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他还说：“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望，因为恐怕我们失去这种卓绝的机会。”②穆德的企图是显然的，他想把中国学生训练成为美国型的知识分子，并依靠他们控制整个中国。

为了达到上述“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的目的，洋教堂一方面对教民子弟进行强迫教育，规定凡教徒子女“必入教会所办之学校，苟子女于相当年龄不受教育者，不能向教堂租地”③；另一方面严禁教民子弟进入非教会学校读书，他们假借神的名义威胁教民，“如有将子女送进国家学校

①引自《人民日报》，1951年4月14日。

②③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编：《中国经济年鉴》，1943年，第7章，第G266页。

者，是丧失子女的灵魂，是犯‘背教’的大罪，即施以渎圣事之‘绝罚’”①。

当时，教会学校所用的教科书，完全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而编写的。在抗战爆发前夕，曾有一个新闻记者参观了洋教堂所办的学校之后，写了如下的一段感想：

> “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表面上很好，令我们感激，但是你看看教的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明白。记者在三盛公时（今河套一带），看过他们的‘国语教本’，是他们教会自己编印的，里面虽是汉字，但是有两种思想让人看不懂：第一，它说中国之所以穷，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由于大家‘懒’，即是‘不知振作’……第二，它说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那么，……像我们这样被人压迫的民族，也是造化主先定好了的，我们大可以安心被人压迫，被人欺压，不要起来作什么反乎天意的解放运动。”②

由此可见，传教士在他们办的学校里所进行的教育内容，第一是：诋毁中国贫穷和落后，宣扬西方“文明”和强盛，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培养青年们的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企图扼杀和消灭他们的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第二是：宣传唯心主义宿命论，要青年们听任外国侵略者的奴役和摆布，而不准有丝毫的反抗。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力进行反共、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在爱国即犯罪、革命即叛逆的罪名下，紧紧地捆住教民青年的手脚。在修道院里，他们更变本加厉地进行奴

---

①巴盟天主教爱国会编写：《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罪行》（稿本）。

②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348—349页，1936年6月。

化教育，要青年修道生们“听命要如同瞎子”。在“弃绝世俗的学问”、“专心天上的事理”的欺骗口号下，引导修生们背叛祖国和民族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走卒。

我们不妨再举几个教会学校实际办学的例子：

> “最初之教会学校实为辅助传道而设，传道者既不能得成人之信仰，乃开设学校，俾得集孩童于基督教教义影响之下。迨教徒团体日渐发达，教堂渐已设立，于是乃不得不推广学校，以为养成教师牧师之基础。”①

1925年，广西梧州建道学校的美国牧师对学生说：“我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其他中国学生往来，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地来爱我们的美国。”同年，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教师也对学生说：“你们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的余地。”②

从教会学校安排的课程也可看出他们办学的目的。例如1925年的上海一个教会女子中学，四年共修课程208学分，其中英文与神学共占70学分，中国史仅4学分，地理课无③。

虽然中国政府于1925年规定了教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不得把宗教课程列入必修课，但在1929年浙江蕙兰中学却以宗教课为更替选修；浙江秀州中学规定宗教课为选修课；上海沪江大学则托词宗教系与神学系为另一宗教机关所设；华东基督教教育会议则议决以“耶稣教训之研究”等代替宗教课，这样来绕过中国政府的规定。

在校的中国学生，尽管是基督教的崇信者，他们心里很清楚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学之真谛所在，因而自1906年开始，学潮就开始出现。仅1924年，全国就爆发过十二次大型的教会学校风潮。

---

①②杨效春：《基督徒之宣传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③舒新城：《收回教会中学问题》。

1925年的“五卅”运动期间，教会学校的罢课风潮即达四十四次之多，以此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表达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

最早创办的教会学校，要算1817年马理逊在马剌甲所创办的“英华书院”，后来于1842年迁到香港。美国传教士也于1850年在上海开始创办“徐汇公学”，1903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1922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1925年创办“辅仁大学”于北平。经考查，各教区中，教育最发达的是南京、北平、香港、汉口、兖州和天津等处。

基督新教教会学校，到1914年止，美国在中国开设的初等教会学校已近2000所，学生45000名；中高等学校共286所，学生23000名。其次是英国，初等教会学校1400余所，学生32000名；中高等学校共241所，学生7800名。德国最少，初等教会学校有164所，学生近5000名；中学15所，学生有500多名。在中国从事教会教育的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比例，在1905年是7.7比2.3，美国占压倒优势①。以上是基督新教开办的教会学校。

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到1914年共有8034所，学生总数共有132850名，绝大部分为初等学校或理学校。而当时基督新教开办的学校共有4100余所，约为天主教的半数，但学生总数共约113000名，已接近天主教的数字，这是因为基督新教比较重视发展中高等学校，特别是大学。两者相加，1914年共有12000余所教会学校，学生总数约250000名。而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有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是，学校5比1，学生6比1。可见当时教会学校势力之大②。

---

①柏锡福：《中国，一个说明》，第114页；另见明恩溥：《今日之中国与美国》，第232页。

②柏锡福：《中国，一个说明》，第113页。

现就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中学生人数和教徒数量略加比较，以观其发展情形的一斑：

年份	学生数	信徒人数	百分比
1877年	5917	13035	45
1899年	16836	37287	45
1910年	102533	195905	50
1915年	169707	268652	60

教会学校的人数迅速增加，收进的学费与中国人的捐输，可以供给学校的一部分开支，一部分教员的薪水，也可以从收入的学费里支付。有些学校，渐渐达到了经济自立的地步，不必仰赖教会的支持。当时办小学比较普遍，差不多每个教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小学，男女学生并收。中国女子向来是不受教育的，随着教会女学的发展，女学生便一天天的多起来，甚至连云南的苗族也设立起学校来。同时也普遍地开办幼稚园．数量的增加，尤见迅速。据1934年统计，天主教及基督新教在中国办学情况是：

大学	13所	学生	5718名
医学院	3所	学生	182名
神学院	7所	学生	188名
总共23所		**学生6088名**	
男中学	115所	学生高中	6892名
		初中	12187名
女中学	102所	学生高中	2919名
		初中	6890名
男女同校中学	43所	学生高中	1448名
		初中	6663名
总共260所		**学生36999名**	

又据1922年《中华归主》中的统计：

高小	956所	学生	32899名

初小　　5637所　　学生　　151582名

总共6593所　　学生184481名

关于大学部分见下表：

天主教
- 北平辅仁大学
- 上海震旦大学
- 天津工商学院

基督新教
- 华北区
  - 北京燕京大学设文、理、法三院
  - 山东齐鲁大学设文、理、医三院
- 华东区
  - 南京金陵大学设文、理、农三院
  - 苏州东吴大学设文、理、法三院
  - 上海沪江大学设文、理、商三院
  - 上海圣约翰大学设文、工、医三院
  - 杭州之江文理学院
  -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华南区
  - 广州岭南大学设文理、农、工三院
  - 福州协和文理学院
  - 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 华中区
  - 湖北华中大学设文、理、教育三院
  - 湖南湘雅医学院
- 华西区—四川华西协合大学设立文、理、医三院

上表共有11所大学，6所学院，1932年统计学生总数有1834人，其中男生占79%，除了天主教学校不收女生外，其余都是男女同学。其中基督新教教员550人，内中国人356人，西方人168人。历届毕业生总数，大约有7千人，以职业论，服务于教育界的占40%，经商占12%，从事宗教及社会事业的占10%，从事政界的占7%，出国深造的占7%。1934年2月9日，《申报》发表教育部统计全国私立各大学沿革，兹摘录其关于教会大学的一部分于下：

“一、东吴大学，初为教会人士为扩充教育事业，将苏州博习书院、上海苏州两‘中西书院’合并而成东吴大学，民国前1901年3月正式开学，1929年7月呈准立案。

二、震旦大学，初为蔡孑民、马相伯两氏，以京师译学馆因戊戌政变停办，商请耶稣会创办震旦大学，逐年设科，民国前1891年12月呈准立案。

三、沪江大学，初为浸会大学，民四改为沪江大学，1929年三月呈准立案。

四、金陵大学，由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而成，民三东方医科大复并入该校，1921年7月经前教育部核准立案，1928年9月经大学院复准立案。

五、岭南大学，初美人创办之格致书院，民国前二年改为岭南学堂，民国1927年国人接收自办，改名岭南大学，1930年7月立案。

六、齐鲁大学，该校初为广文学校，与济南共和医道学堂合并，称以齐鲁大学，1921年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学校，复并入该校医科，1931年12月呈准教育部立案。

七、燕京大学，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组而成，民九女子协和复并入，1927年春，经前教育部认可，1929年6月呈准立案。

八、武昌华中大学，为教会所办武昌文华大学，博文书院之大学部，长沙雅礼大学三校合组而成，1927年政变停办，1929年恢复，加并湖滨大学，1931年12月呈准立案。

九、辅仁大学，为公教学校，初为辅仁社，嗣更名为辅仁大学，1927年6月经部批准试办，1931年8月准予立案。”

其余如协和、华南、金女大等，亦相继立案，惟圣约翰大学除外。

关于中学部份。基督教所办中学全国约有240处，有34081名学生，其中30%系高中，70%是初中。各省教会中学如下表：

省名	学生总数（名）	学校总数（所）
江苏	7 337	40
河北	6 849	19
福建	3 963	52
浙江	3 249	20
山东	2 827	20
广东	2 394	21
湖北	1 810	11
四川	1 656	16
湖南	1 048	8
安徽	695	7
东三省	671	14
山西	558	3
江西	554	4
河南	472	5

至于小学，因数量太多，没有准确的统计。1930年北长老会报告他们一会中，有高初小学383处，学生14 693人。美以美会报告他们一会中，有高初小学551处，学生29 372人。

值得提及的是，教会学校自1922年起，由于爱国学生的斗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1929年起又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外津贴显著减少，使教会学校不能迅速发展。估计到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约有100万名，其中大学生8千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和其它神学院校学生。天主教与基督教所占的比重，小学约为三比一，中学约为四比六，大学约为一比九。基督新教的重点放在大学，而天主教的重点仍放在小学和神

学。美国势力在教会学校中已是独占鳌头，英、法势力相对削弱。与中国的官私立学校从数字上比较，教会学校已不到1%。因此，教会学校一般都根据“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策略从“质”的方面与公立学校进行竞争。教会学校已不局限招收教徒子弟，特别是基督教大学，非教徒学生的比重逐渐超过教徒子弟，而且从1931年以后，一般教会学校表面上已不再强迫学生上宗教课和入教了，而是从别的方面加强宗教的影响。

（二）教会医疗事业的大发展

传教士们所经营的医疗事业，自从庚子赔款以后有较大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夕，单是基督新教创办的医院分布在全国各地，竟多如乱麻。

基督新教创办医院一览表

会名	医院或分院名
中华基督教会（共67院）	苏州福音医院、更生医院、妇孺医院、江阴福音医院、宿迁仁济医院、嘉兴福音男女医院、余姚惠爱医院、武昌仁济男医院、仁济女医院、汉口协和男女医院、皂市仁济男女医院、宜昌仁济女医院、普济男医院、黄陂仁济医院、孝感仁济医院、衡阳仁济男女医院、郴林惠爱男女医院、湘潭惠爱医院、桃源问津医院、常德广德医院、辰州宏恩医院、宿州民爱医院、寿县春华医院、江门仁济女医院、仁济医院、广州普惠医院、柔济医院、阳江化民博济医院、连县惠爱医院、嘉积基督医院、琼州那大福音医院、海口福音医院、汕头福音医院、中华男女医院、潮安念宾男女医院、揭阳福音男女医院、汕头汕尾福音医院、福州塔亭医院、圣教妇幼医院、长乐圣教医院、久泰亭通医院、邵武耶稣教医院、泉州惠世医院、厦门救世医院、惠安仁世医院、漳州协和医院、平安

（续前表）

	救世医院、漳浦漳梁医院、重庆仁济医院、仁寿仁济医院、荣县仁济男女病院、自流井仁济男女医院、乐山仁济男女病院、涪陵仁济男女医院、彭县仁济医院、忠州仁济医院、泸州仁济医院、济南德邻医院、青州广德医院、周村复育医院、烟台毓璜顶医院、北平道济男女医院、邢台福音医院、东鹿耀西医院、漳德广生医院、汲县惠民医院、牯岭中华普仁医院
圣公会（共29院）	上海同仁医院、广仁医院、无锡普仁医院、杭州广济男女医院、宁波仁济医院、慈溪保黎医院、临海思泽医院、桂林道生医院、武昌同仁男女医院、宜昌美华医院、北海普仁医院、福州柴井医院、福清惠爱医院、普爱女医院、连江普济医院、霞浦圣教医院、屏南潘美顾女医院、宁德妇幼医院、建瓯基督教男医院、建宁妇幼医院、莆田圣路加医院、华实产科医院、仙游圣路加医院、保宁仁济医院、绵竹教会医院、云南府惠滇医院、平阴广仁男女医院、兖州广仁医院、归德圣保罗男女医院
美以美会（共25院）	镇江保黎医院、芜湖芜湖医院、平潭基督教西医院、古田怀礼医院、福清和新田医院、闽清善牧医院、沙县美以美会医院、延平吐哄哩医院、涵江兴仁医院、仙游美以美会女医院、永春永春医院、成都存仁医院、重庆宽仁医院、宽仁女医院、资中宏仁医院、北平同仁男医院、妇婴医院、张家口惠济医院、昌黎广济医院、遵化同仁医院、天津妇婴医院、山海关普济医院、南昌南昌医院、九江生命活水医院、但德福医院
浸会	扬州浸会医院、宁波华美医院、绍兴福康医院、金华福音男女医院、西安广仁医院、太原博爱男医院、汕头益世医院、桂林浸信会医院、广州两广浸会医院、潮阳潮光医院、揭

（续前表）

（共20院）	阳真理医院、雅安仁德医院、叙府明德女医院、平度怀阿医院、黄县怀麟医院、掖县梅铁男医院、爱怜女医院、胶州瑞华医院、亳县福音济生医院、开封济汴医院
循道公会（共16院）	温州白累德医院、宁波普仁医院、梧州西医院、汉口普爱医院、德安普爱医院、武安普爱男女医院、大冶普爱男女医院、钟祥普爱医院、零陵普爱医院、邵阳普爱男女医院、佛山循道医院、曲江循道西医院、昭通府福滇医院、朱家寨循道施医院、惠民如已男女医院、永平循道医院
内地会（共13院）	兰州溥德恩医院、临海普济医院、龙泉路加男女医院、长沙德生医院、洪江爱邻医院、平阳教会医院、潞安鸿恩医院、迪化内地会医院、元江哲理医院、贵阳福音医院、开封福音医院、烟台体仁医院、鄱阳教会医院
长老会（共11院）	徐州基督医院、坤维女医院、清江仁慈男女医院、海州义德男女医院、怀远民望医院、民康女医院、九龙江教会医院、济宁德门男女医院、沂州教会医院、潍县教会医院、保定思罗医院
中华圣公会（共7院）	大同首善医院、安庆同仁医院、妇孺医院、罗源圣教女医院、河间圣安得烈医院、永清圣司提反男女医院、安国圣巴拿巴医院
公理会（共7院）	太谷男女仁术男女医院、清源仁济医院、汾阳汾阳医院、临清华美医院、德县卫氏博济医院、北通潞河男女医院、定县教会医院
信义会（共7院）	长沙信义女医院、益阳信义男女医院、津市津兰医院、新化信义会男女医院、潢川信义女医院、确山慈仁医院、信阳协和医院

（续前表）

安息日会（共5院）	上海圣心医院、疗养院分院、南宁安息日会医院、惠州惠安医院、鄙城鄙城疗养卫生院
行道会（共5院）	沙市康生医院、监利瑞华医院、襄阳同济男女医院、麻城福音男女医院、贵州鄂东医院
伦敦会（共4院）	上海仁济医院、天津马大夫纪念男医院、沧县博施医院、萧张萧张男女医院
监理会（共4院）	上海妇孺医院、苏州博习医院、常州武进医院、吴兴福音男女医院
友爱会（共3院）	平定友爱医院、寿阳友爱男女医院、辽州友爱医院
贵格会（2院）	南京贵格医院、六合和平医院
遵道会（2院）	醴陵遵道医院、铜仁铜仁医院
基督会（2院）	南通基督医院、合肥基督医院
美以美会女布道会（2院）	福清惠乐生女医院、南昌妇幼医院
美道会（2院）	成都仁济男医院、仁济女医院
友谊会（2院）	遂宁博济男女医院、濑川仁慈医院

（续 前 表）

崇真会（2院）	梅县德济医院、河源仁济医院
约老会（2院）	罗定博爱医院、德庆惠爱医院
北长老会（2院）	峄县瑯门德男女医院、滕县华北医院
南长老会（1院）	镇江基督医院
安息浸礼会（1院）	漯河惠中男女医院
德华盟会（1院）	松阳博爱医院
伯特利会（1院）	上海伯特利男女医院
路得会（1院）	老河口福民医院
来复会（1院）	巢县普仁医院
礼贤会（1院）	东莞普济医院
通圣公（1院）	南管陶教会施医院
清洁会（1院）	濮阳清洁医院
坎拿大联合会(1院)	沁阳恩赐医院
学校的（3院）	长沙湘雅医院（雅礼学校）、广州博济医院（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医院

（续 前 表）

协和的（共5院）	福州协和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蒲台鸿济医院、泰安博济医院、北平协和医院
中华麻疯救济会（1院）	上海中华麻疯疗养院
无会的（1院）	盐山道生男女医院

这个表是根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年鉴》编成的。表里所列入的差会有三十四个，加上教会学校附设的医院及其各差会合办的医院，共有260个，此外尚有许多小规模的医院并未列入。此表没有东三省的医院，因为从“九·一八”以后，关于东三省的基督教现状，非常模糊，所以在这期《年鉴》里便没有东三省的记录。据后来有关报道，1947年东三省有十八个教会办的医院。

应当指出，医疗机构是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利用医疗手段和略施小恩小惠企图赢得中国人民对外国的好感，实施精神侵略。当然，也必须承认，传教士医生在客观上曾把西医的科学技术知识引入了中国，也曾为中国训练出一大批西医及护士。所有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外国医护人员，也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分子，真正推进侵略政策的传教士医生还是少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有许多是抱着人道主义精神或是为了个人宗教信仰的原因到中国行医的。况且，利用医疗事业对华实行侵略并不是如同传说的那样，使用“挖眼珠做药”或配制“红药水”直接杀害病人的手法，而是通过医治好一部分人的肉身痛苦后给以精神的控制，以解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情绪。这种侵略是无形的，它如同其它文化活动一样，最终目的都是要奴化中国人民。教会医院庸医杀人的医疗事故也是屡见不鲜的，也有个别外国医生在病人身上进行新医药或其它诸如细菌试验

的，也有给病人使用假药或过期失效药品的。因此，把教会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救死扶伤的程度看得神乎其神，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创办“慈幼事业”的目的

教会的慈幼事业主要是举办育婴堂和孤儿院，这是为了增加上报教徒的数字以邀功赏。孩子如能幸存，可以从小给以宗教的灌输和提供无偿劳动力，充当教堂的摇钱树。中国著名画家丰子恺曾画过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含着眼泪的穷困母亲，抱着一个新生婴儿，把他送到天主堂的育婴堂接婴房的窗口，由里面的嬷嬷从窗口抱进去的情景，旁边地上蹲着一条育婴堂里养的肥胖的大洋狗，作为对比。此情此景，凡是在旧中国生活过的人们是能够体会到其悲惨痛苦的。多灾多难的旧社会，加上人民的迷信落后，往往对生下来的女孩加以抛弃，有些不忍心抛弃的母亲就把孩子抱进育婴堂。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一万八千具童尸。遇到灾荒 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育婴堂就趁机收进。由于一般教会开办的育婴堂容量有限，设备和保育措施不足，在大批婴儿拥进时就不能有足够的照料，遇到发生传染病就难以控制。许多年轻的嬷嬷是由于各种原因出家修道的，既缺乏必要的保健知识，又没有多大耐心保育婴儿，所以死亡率高，成了教会慈幼机关的普遍现象。当一旦发生大量死亡情况时，他们往往掩盖真情，以致激起人民的疑窦和愤慨，这是十九世纪后期大量发生教案的重要导火线之一。

对于教士在华开办的慈幼机关，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属于法国系统的天主教办的较大育婴堂或孤儿院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南昌、青岛、武汉、重庆、贵阳、长沙和广州等地。据1937年的报告，上海一地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开办的慈幼机关，

有土山湾孤儿院、圣母院育婴堂和一所聋哑学堂，其中以土山湾孤儿院开设最早，1855年即由耶稣会传教士设立，1864年确定收容六至十岁孤儿入院。规模较大的圣母院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一万七千余名。属于英国系统的天主教会所办慈幼机关，据1934年的统计仅有三处，地点在汉阳、建昌（江西）和威海卫（山东），收容孤儿一百余名。属于美国系统的天主教会仅在武昌有一所聋哑学校，在湖北则有沈垭天主堂的慈育堂。

基督教传教士所开办的慈幼机关远比天主教少。据1935年的不完全统计，属于英国系统的基督新教教会办的慈幼机关，主要分布在太行、长沙、保宁（四川）、新安（河南）和宜昌一带。另外在汉口、北京和福州几处地方开设了盲童学校，其中以福州的盲童学校规模最大，招收近百名女盲童入学。其它一些慈善机关的规模都很小，一般仅有数十名孤儿。属于美国系统基督教会的慈幼机关则分布在上海、广州、宁波、福州、武昌、长沙、兴化和烟台等地，规模都很小，其活动方式和天主教办的慈幼机关基本相同。例如，在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孩子入院后就必须受该院传教士的支配，除了接受宗教灌输外，全部要参加无偿劳动，十岁以下要糊火柴匣和编织鱼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后来又发展一种出口商品，编织金丝草帽。孤儿们仅仅是吃一口饭，并无分文工资可得，但却给传教士们赚来大量的金钱收入。孤儿们如触犯了法规，就要受到体罚。孤儿们在被送进该院时，家长要在预先印好的所谓“养身书”上画押，其内容是：“某某因无力抚养，愿将女儿送给伯特利妇女爱养所收养教育，迨至长大，任凭主理婚配。倘有不测等情，决无异言。恐无后凭，立此养身书存照。”

“慈善”机关不慈善，这是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所共知的。北京西什库美、法天主教合办的“仁慈堂”，说明了这个问

题。在解放前八十多年里，“仁慈堂”共收养两万五千多名孩子，其中91%强，即两万三千多孩子，是活着进来死着出去的。帝国主义是怎样虐待摧残中国儿童呢？就连“仁慈堂”院长、法国修女雷树芳也不得不这样招供：

“我任院长二十八年内，在八千名儿童中，被我虐待致死的儿童在五千五百名以上……

我承认，我给仁慈堂儿童的饮食在质和量上都很不够，并经常强迫她们干力不胜任的活。……残废者那怕只有一只手也要工作。儿童不听从时，就加以几个钟头禁闭的处罚，或以木棍、木板、毛掸子等毒打。我承认，儿童患病时，我不曾给予适当的治疗，我曾纵使狗咬女孩。我承认，死亡儿童是无棺埋葬的，死婴则集体坑埋。

我承认，仁慈堂十七岁或十七岁以上的女孩，在结婚时并无选择丈夫的自由，而是被强迫的，他们在结婚前夕或结婚当天，能看到我们指定给她们结婚的男人。我承认，每出嫁一个女孩，我都要索取一笔款，在日寇入侵以前是六十元，以后视……物价和币制而定。……”①

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不仅残害中国儿童，而且通过慈幼事业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这方面的情况，实例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

① 《中国妇女》1964年第1期：《帝国主义的“仁慈”》。

二、大革命时期教会的破坏活动及北方人民的收地运动

（一）传教士破坏中国革命的活动

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在华传教士在中国玩弄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被中国人民识破，他们便采取新的对策，于1922年于上海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纠集了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些被他们培植起来的中国教会的中坚人物参加这次会议，经过讨论，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 “全国基督教会议怀着希望观察了正在中国发生的新事件及其在基督教运动中所引起的反映。中国基督徒完全认识激进分子使教会本身和教会事业将经历的危机。教徒并非不与中国怀有统一中国在国内建立正义、自由、平等的同样愿望。……基督徒已经准备接受由于他们的态度所能引起的危难，甚至可以面临逼迫而绝不能反对现代中国所发生之深孚众望的运动。”

殊不知，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深知其用意之所在，纷纷予以揭露。如当时在美国人创办的东吴大学任教的一位中国教授，写了一封题为《致在华传教士》的公开信。他说：

> “我们深深地尊重传教士在声明中洋溢着的超国籍、超民族的公正和博爱精神，我们不只一次地看到过这类崇高的原则。然而我们承认，现在已经来到我们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这里，话语如果没有实际行动来作证，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希望能够确切地知

道，所有在华的传教士诚然是有他们公开表示过的那种观念。”①

在这次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上，产生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联合机构目的是要使全国各教会在“中华自立”的骗人口号下，不分宗派地采取同一步伐来反对革命。帝国主义利用这一机构为工具，在中国搜集情报，反对工农革命运动，搞“本色教会”，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革命。

在对待孙中山先生的问题上，他们先是抱以极大希望，后来便持敌对的态度。曾到中国访问过的意大利传教士斯伏尔匝在他所著的《中国之谜》一书中，责难传教士及教会对孙中山寄以希望。他说：

> “基督教的传教士在他们聚会和布道的时候，对国民革命缺乏足够的谀扬和赞赏，而这些参加革命的信徒几乎全部都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并且注定是这个阶级的代言人，孙中山本人不就是教会教育的光辉和成果吗？这个广东的煽动者，在他一生中最险要的关头，不只一次受到传教士的保护。但他有实力以后，就抛弃了他的信教的妻子，放弃了和基督教的友谊。可是教会却仍然在他身上继续寄托着希望。”

其实，基督教传教士并不象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对孙中山寄予莫大希望。他们最初对孙中山寄予希望，但后来，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符合了当时人民要求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愿望，因此从孙中山先生搞革命的初期，传教士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他们辱骂革命群众是“暴徒”、“土匪”，污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对社会和幸福的“严重威胁”，歪曲革命的性质，阻碍革命的进行。帝国主义传教士李提摩

① 〔意大利〕斯伏尔匝：《中国之谜》。

太(Timothy Lee)曾几次劝孙中山先生放弃革命。李在他所著的《在华四十五年》一书中，叙述了他在1896年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被捕释放后去劝孙放弃革命的经过。他说："照我的意见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改良，不是革命。"1900年，他在日本横滨再次遇到孙中山，发现孙正在集中全力计划推翻清朝，下了决心要倡导革命。他对孙说："如此看来，我们二人要分道扬镳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之所以对国民革命不谀扬，不赞赏，是因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1927年以前，国民革命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是反帝反封建的。

教会和传教士不把希望寄托在"忘恩负义"的孙中山身上。那么，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帝国主义们最大的阴谋是扶持他们认为得心应手的工具——窃国大盗袁世凯，以便保持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而帝国主义传教士们就随声呐喊，到处制造"非袁莫属"及攻击孙中山的言论。李提摩太说："孙中山先生辞总统职而让位给袁世凯是他一生中最聪明的一件事。"①又如，美以美会会督杨锡福诽谤孙中山是一个"梦想家"、"阴谋家"、"无正确知识和行政能力"的人。捧袁倒孙是当时帝国主义传教士的主要活动之一。谁都知道，孙中山先生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而袁世凯是出卖民族利益的窃国大盗，在他们两者之间，虽然孙中山先生是基督教徒，但帝国主义宁可选择非基督徒的袁世凯而摒弃孙中山。到了孙中山先生晚年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更使帝国主义及传教士恨之入骨，那就更说不上什么对他寄予希望了。帝国主义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是他们的幌子，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他们对待基督徒冯玉祥的态度也说明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

① 李提摩太：《在华四十五年》第35页。

度。起初他们认为：

“对‘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兴奋则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为这位‘中国的克伦威尔’（Cromwell）而轰动出版界，这应当单独归功于基督教的传教士。……这是真的，有一个时期，连外国商人也染上了传教士的幻想。当时冯玉祥有意远征，他的士兵中少数人因抢劫而被杀头。没有一所外国人的住宅向过路的军官纳税，没有一座城市遭到士兵抢劫，奶是留给官长去挤的，这就是进步。”①

可是，当冯玉祥吞并了吴佩孚的部分势力范围后，消息在欧洲的报纸上传了出来，传教士发出呼吁，通电反对，向他“开了枪”。为什么帝国主义传教士看到使他们为之“兴奋”的“基督将军”吞并了另一个军阀吴佩孚之后就感到恼火而向他“开枪”呢？原因就是吴佩孚是英、美帝国主义在直系的北洋军阀中所选中并豢养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他们虽然因冯玉祥入了基督教而对他寄予希望，但在冯与吴二人之间，他们认为吴比冯要驯服得多，所以当事件发生后，传教士们也随着外国侵略者一齐咒骂冯玉祥了。

当北伐军胜利进军时，美国基督教福尔德主教为美帝国主义刺探情报。在北伐军由广东出征前的一个多月，汕头的美国副领事柏兰曾致函福尔德，让他提供有关北伐军的人数和行动的情报。下面是1926年5月18日柏兰给福尔德的信：

“阁下：

整个潮梅地区显然将有重要的军事行动，本领事馆深切地注意到有关的发展，你可能注意到部队的行动，特别是它的人数和方向，设若能够及时通知我们，我们

---

① 斯伏尔匝：《中国之谜》。

非常感谢。关于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合作，谨预致谢忱。

C·B（签名）”①

随着革命深入，以福尔德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和他们的教会，给美国政府搜集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情报。递送情报的方法，除了经常在信件中、在教会年报中夹递、与其它教会互相传递，以及福尔德本人或其他传教士定期回国报告以外，还用密电码与美国领事馆秘密通报。1935年1月24日，驻汕头美国领事辛克给福尔德的一封信中，透露出了他们借用汕头浸信会的密码互相通报的情况。1936年4月18日，辛克寄了一份由他亲自设计的密码给福尔德，他在信上说：

“这里我寄给你一个电报密码，给你作为与本领事馆秘密通信之用。这个密码是我专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②

（二）北方人民的收地运动

由于全国人民反帝情绪的高涨，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与蒋介石反动派合流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曾具有一定的革命朝气，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其中在河套地区所进行的一件重要活动，是收回一部分教堂霸占的土地。

1926年秋冬之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主力从五原进入河套西部，随即在那里设立临河设治局。这时，临河南北广阔的土地上，原属于达拉特、杭锦二旗的大片牧场，都被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霸占了，教堂多达十余个，成了侵略者的天下。临河设治局

①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

②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

采取和平协商的办法，向教堂提出了“放地”的方案：将原教堂地保留一半，另一半交出，由教徒备价租种。这本来是一个软弱和不彻底的妥协办法。但是一向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的外国传教士，竟悍然抗拒交地。最后，迫使设治局下令将那一带被教堂霸占多年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由“绥远垦务总局”发放给当地群众，备价认领。

对于这个断然措施，这些蛮横到顶的帝国主义分子自然是不甘心的。他们一方面阻挠和严禁教民前往认领购买，威胁教徒说，谁如要买，即“施以绝罚”，企图以此抵制垦务总局命令的执行；另一方面，他们指使一些爪牙“擅将地户已领之地，强夺耕种，或率领区兵（即教堂反动武装——引者）持枪抢夺，或派人擅捕地户，并作种种谣言，谓杭（锦）旗地亩已归教堂等语”，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大肆进行破坏①。

与此同时，宁夏教区主教费达德（G·Frederix，荷兰人）一方面派遣传教士向临河设治局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又派专人去北京，通过法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②。

这时，北洋军阀集团在北伐军的致命打击下，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国民党新军阀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它的反动秩序，帝国主义列强一时失去它在中国的支柱，而北伐军所到之处，即开始没收教会土地。各个教堂假冒教民名义而隐瞒下来的土地也为数不少。据驻内蒙的一个传教士当时的记载，仅内蒙巴盟三道桥一

① 民国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绥远垦务总局布告》（抄件），见《巴盟神职人员和修女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附件。

② 参看1929年9月26日法国公使馆致平津卫戍总司令部“节略”（抄件），见《绥远垦务总局关于蒙汉解教纠葛卷宗》原件；另见《巴盟教区历史沿革》。

个教堂。就隐瞒下三十八顷以上的土地①。这个教堂在河套地区说来是个较小的堂口，1923年才开始有本堂神甫，比它大的一些教堂，可以隐瞒下来的土地就更多了。当然，就全国说来，北伐军及国民军所到之处，这些教堂所占的土地数量是大大减少了，其侵略势力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削弱。因此，国民军这一次对河套地区天主堂进行“土地国有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外国侵略分子，大大缩小了这个地区洋教堂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运动进行的不彻底和外国传教士采用化整为零的隐瞒手段，留在洋教堂手里的“黑地”依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就地区说来，它仅仅包括河套的一部分，阿拉善旗所属的三盛公一带并不包括在内，伊盟的其它各旗即整个鄂尔多斯草原及三边地区的教堂也没有受到影响。

由于被迫交出了不少的土地，许多教堂再也不能继续象从前那样主要依靠土地收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了。他们便在新的名目下向教民进行勒索，其中主要项目之一是所谓的“献仪”。洋教士把“圣教四规”搬出来，以其中规定的“当尽力帮助圣教经费”为名，于每年秋收时，“薄设酒席，将该堂教民之富裕者，请到教堂，在酒醉时，（迫其）面对广众许纳‘献仪’粮，一般都在几石或几十石”②。有的地方，例如蛮会，更用一种名为“拉黑牛”的办法，事先串通几家亲信爪牙，在席间带头多认，迫使其它教民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着多认。对于不认或交不起粮的，教士便以“不满四规”、“天主不降福”、“犯大罪”给以

---

① 《巴盟各堂简史》，拉丁文原稿，巴盟天主教爱国会译稿。这个材料记载三道桥教堂在1936年到1939年四年内即出卖土地3867.66亩。

② 《巴盟教区历史沿革》。

惩罚①。因此，尽管有的教堂没有地租收入了，但他们仍然粮谷满仓，富埒王侯。

除了征纳“献仪粮”之外，传教士还借此时机，以开门诊、立善会、实行高价的弥撒献仪等办法大事聚敛。仅通过门诊得到的收入，教堂就诈取了蒙汉人民大批的银元、银手镯和大量的粮食、绵羊等。而他们所付的代价却是些低劣的、甚至根本不是药品的“汽水针”②。

在内蒙古地区，自“五卅”惨案发生后，攻打教堂和反对洋教士的斗争，也形成了此伏彼起的群众运动，这引起了河套、鄂尔多斯等地传教士的极大惊慌，但是他们的气焰仍极为嚣张。1926年秋，当奉、直、晋各系军阀的联合势力把当时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后称“西北军”）排挤到河套地区的时候，一路上各个天主教堂的反动武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督率下，不断给国民军以伏击。其中尤以集宁一带③和河套地区的各个教堂最为猖狂。

在河套，1926年12月初，国民军的主力何基沣旅到达乌兰脑包（即乌兰淖）。因为天色已晚，“无处可得饮食”，想进入教堂城堡里的村庄休息。他们向传教士一再“善言恳求”，可是并没有打动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善心”。国民军大队人马只好在瀔洌的西北风里饿着肚子过了一夜。第二天，国民军“请入城造饭。拒绝如故”。这就激起了士兵们的义愤，“皆以外人在吾国地方喧宾夺主，蛮不讲理”而发炮击之，教堂才被迫开门④。

---

① 《中国人民最痛恨的人——外国传教士及其爪牙》。

② 《巴盟教区历史沿革》。

③ 详见《天主教集宁教区的武装活动》（打印材料），内蒙古天主教爱国会藏。

④ 《冯玉祥日记》，第二编，第101页。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记事。

从上述可知。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教会及传教士的作用是反动的。

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及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传教士们又对蒋介石寄予希望，而且付出更大的代价培养他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代理人。蒋介石统治中国人民的二十多年的血腥罪恶历史，就足以证实了这一点。

三、天主教、基督新教在华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比较

（一）天主教、基督新教势力的发展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改变了在华的传教手法。但由于条约的签订，人民的反抗斗争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教会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清王朝覆亡，袁世凯窃国独裁，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新军阀投靠美英帝国主义，给了教会以大发展的机会。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间，其发展速度极为迅速，倘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在互相厮杀，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扩展将是不可想像的。据载，1901年全国天主教信教人数：

“……今之从教者，实繁有徒。据罗马教王所开教单，计直隶九万三千五百三十人，满洲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人，山东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九人，福建三万二千四百人，台湾三千六百八十五人，山西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人，江南十万三千八百十五人，浙江七千四百八十人，湖北三万三千三百零六人，湖南五千一百人，河南六千二百三十五人，江西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人，四川七万

二千八百七十九人，广东二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广西一千零十三人，云南一万一千二百零七人，贵州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二人，陕西三万三千三百人，甘肃一千五百人，蒙古一万七千五百人，西藏九万零十一人。”①

1917年军阀政府调查天主、耶稣(基督新教)两教在华势力，其数字令人瞠目，兹录如下：

“天主、耶稣两教在华之势力

确闻外交内务两部，曾会同调查天主、耶稣两教在华所设之教会机关及教徒、职员数目，其详列后，想亦为国人所注意者也。

（甲）、教会：礼拜堂二千七百十七处；传道堂四千二百八十八处；布经会社八处；青年会九处；教育会社三处；医院及医校一百六十一处。

（乙）、学校：外国男教士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外国女教士二千七百十六人；中国男教士九百零二人；中国男副教士八千三百八十一人；中国讲道妇女一千一百零八人；学校教习二千七百九十九人；学生十八万六千一百三十人；医生三百八十八人；教友三千五百二十八万七千八百零九人云。”②

这些数字中，基督新教教会势力居强。因为“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是十九世纪末基督新教国家的美国准备向东方扩张时所发出的一个信号，故此基督新教的发展大大超过天主教。然而，天主教势力的发展也是相当可观的。

据外国传教士德礼贤说，中国天主教信友人数，1900年是741562人；1907年，初次达到100万人；1910年增加到1292287人；

---

① 《教案奏议汇编》，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② 《东方杂志》，1917年4月号，第169页。

1920年增加到1994483；1921年约略超过200万人（确实数目是2056338人）；1930年，有2498015人；1932年，有2562742人①。可知从1900年起，天主教信友人数在十三年中增加了一倍（1914年是1509000人），二十三年中增加了两倍（1923年是2233000人）；三十二年差不多是四倍（1932年是2562742）。可是1900年以前，要三十年才得增加一倍（1870年的数目是369441人；而1900年是741562人）。

另外，在1900年，中国全境的天主教传教区，分别由10个传教会控制，即：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耶稣会、遣使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以及巴黎、密良和罗马三处的外方传教会。1900年以后，其它修会的传教会士相继来华，络绎不绝，各省修会林立。如慈幼会士们（The Salesians）于1902年到了澳门；巴尔玛外方传教会士们（The Parma Foreign Miss—ion Society）于1904年到达河南；伊苏登外方传教会士们（Issondum Fathers）1917年到贵阳；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士们（The Maryknoll F．M．Society）于1918年到广东江门；圣高隆庞（ST．Columban）外方传教会士们1920年到汉阳；苦难会士们（The Passionists）1921年到湖南辰州；比布斯（Picpus）二心会士们1922年到琼州；圣心司铎会（Betharr-amites）同年到云南大理。此外，如本笃会（Benedlictine）士们先后分三次来华；美国本雪尔凡尼（Penssylvania）的本笃会士们1925年到北平；洛本修会（Lophem）1926年到四川西山；圣奥迪尔会（S．T．Odele）1928年到吉林延吉。1923年，救世主会士们（The Salvatoians）到福建邵武；1925年，印五伤等会士们（Stigmatins）到河北易县；司格包罗勃堺夫（Scarboro Bluff）外方传教会士们到了浙江处州，开倍克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14部分。

（Quebec)外方传教会士们到了辽宁四平;1926年,方济各特规会士们（ Conventionals）到兴安，白冷（Bethlehem）外方传教会士们到齐齐哈尔；1928年，奥斯定重整会士们（Recollects）到河南归德，赎世主会士们（Redemptorists）到河南驻马店；1933年，奥斯定常律会士们（ Canons Regular）到西藏，圣母心子会士们（The Missionary Son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到了安徽徽州，等等。

这些来华的传教士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国。他们的国籍，各国都有，不论南美、北美、澳洲、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等等。他们的人数：1900年，有886人；1910年,1391人；1920年,1364人;1930年，2068人。这里不包括这几个年份的宗座代牧，或是监牧。

中国人自己也创立了两个男修会：一个是1928年在安国成立的，定名“圣若翰保弟斯大小兄弟会”；一个是1930年在宣化成立的，定名“主徒会”。

二十世纪头三十年，各国天主教女修会，在医药界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因为中国在废除旧式教育以后，亟需学校教育工作人员，便把职任传教的修女们，陆续派到中国，设立分会。因此，除了前述十九世纪中来华的修女们以外，又有许多修会的修女们络绎来华。如上海的安老会修女们(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是1904年来的；山东兖州的司带尔圣神忠仆会修女们（The Servants of the Holy Ghost)是1905年来的;加拿大乌德蒙（Outremont）的始孕无玷会（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tate Conception of Canada）于1909年来广州；埃及方济各女修会（The Franciscan Missionary Sisters of Egypt）1910年到湖北老河口；美国玛利诺多明我外方传教会女修会士们（The Mary Knoll Foreign Mission

Si sters of ST·Dominic）1920年到香港；山林圣玛利亚（ST·Mary—of—the—Woods）上智会修女们（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同年到河南开封；包勒杜(Boisledue)玛利亚若瑟女修士（Daughts of Mary and Joseph)1922年到了热河；勒奴维尔（Lennoxville）天神母会的修女们（Sisters of Norte Dame des Anges）同年到贵州贵阳；圣若瑟小姐妹会（The Little Sisters of Joseph）到山西潞安；罗马的圣乌苏拉（ST·Ursula）罗马联合会（ST·Roman Union）也于同年到了广东汕头；南林（Nerinx）劳莱笃修女们（Sisters of Loretto at the Foot of fhe Cross）于1923年到汉阳；尼闸蒙弗拉笃（Nizza Monferrato)的进教久佑会修女们（Daughters of Mary Auxifliatrix)同年到广东韶州；鲁文（Louvian)奥斯定会传教修女们(Missionary Canon Nuns of ST·Augustin)也于同年到了宁夏；加拿大宝血会修女们（The Adorer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于1924年到了河北献县；洛劳诺（Logrono）奥斯定第三会教学修女们（The Teaching Sisters of thc Third Order of ST·Augustin）1925年到了湖南常德；孔万（Convent Station N·J·)仁爱会修女们（Sisters of Charity）同年到湖南辰州；斯不飞林耳（Sprinfield）方济各会服务医院的修女们（The Hospital Sistere ot ST·Francis）也于同年到了山东济南。1926年，加依根（Cahircon）圣高隆庞会传教修女们（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Cebumban）到了湖北汉阳；美国毕资堡（Pitts）圣若瑟会修女们（Sisters of ST·Joseph）到了湖南辰州；贝来（Borry）圣母赎掳会传教修女们（Missionary Sisters of Keray）到了安徽芜湖；匈牙利加罗萨圣母会（Sisters of Our Lady of Kaloka)教学修女们到了河北献县；耶稣圣心会到了上海；圣心会修女们（Religious 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到了浙江嘉兴；救世主会修女们（Salvatorian）到了福建邵武；1927年，巴尔玛乌苏拉圣心会修女们（Ursuline 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到了安徽蚌埠；卢森堡(Luxemberg)方济各第三会仁爱会修女们（Sisters of Merey）到了湖南永州；1928年，奥斯定重整会修女们（The Recollect Sisters of ST·Augustine）到了河南归德。拉克劳司（La Crosse）卒世朝拜方济各会修女们（Fransiscan Sisters of Perpetual Adoration）到了湖北武昌。1929年，美国沃海洼州若瑟山（Mount ST·Joseph Ohio）仁爱会修女们到了武昌；英琴波（Ingenbols）圣十字架修女们（Sisters of the Holy Cross)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巴伐利亚（Bavaria)圣方济各沙拉诺修女们(Sisters of ST·Francis-Salano）到了山西朔州；奈缪圣母修女会修女们（Sisters of Notre Dame de Namur.）到了武昌；1930年，美国本笃会修女们到了北京；嘉布遣会第三会，圣家女修会修女们（The Third Order Capuchin Nuns of the Holy Family）到了甘肃平凉；1931年，门斯德（Münster）始孕无玷会修女们，到了山东济南；耶稣孝女会修女们（Daughters of Jeansis）到了安庆；1933年，善牧会修女们（Sisters of the Gordhep）到了上海。

到1930年，中国境内共有48个外籍天主教女修会，修女人数是2 460人，外籍916人，中国籍1 544人。这一年里，委托修女们料理的医院，或是留养院等，共有232所，收容病人计80 142人。老人计5562人。所有施诊所由她们经营，计785所，1930年一年中施诊给药，共有7 061 492起。同年，由于中国女教徒的赞助，圣婴会有孩子52 894人。又360处孤儿院中，孤儿有21 858人。

（二）天主教侵略手段的改变

天主教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估计教堂损毁约有四分之三，特别是在华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此，鉴于中国人民的力量不可侮，天主教不得不改变一些手法。

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和德国解决了“保教权”的争执，于是法国政府决定改变手法，1905年颁布了“政教分离法令”，这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是有利的。但是，法国政府对传教的保护和干预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只是有些变更而已。

第二种手法是对传教士的活动作了一些限制。各个修会的负责人训令传教士今后要少管或不管教徒诉讼的事，尽可能地不要再触怒非教徒，以免引起本来可以避免的民愤，因为尽管各国政府仍继续保护传教士，但等到军舰开来，传教士的性命恐怕早已不保了。所以，归根到底，帝国主义最害怕的还是人民。

第三种手法就是不但继续加强对教徒的思想控制，而且还强调对教徒的训练，要他们为发展势力出力。天主教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训练教徒的组织，发动他们去劝人信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领一人进教。有的地方则开展所谓“全家归主运动”，利用教徒劝说尚未信教的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进教。在训练期间，教会拨出大量的经费，给予慕道者以一定的津贴，有时利用赈灾的机会，吸引许多灾民接受宗教的灌输，给以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救济，要他们成为教徒。

第四种手法就是扩大慈善事业，并在做法上尽量避免引起群众的怀疑和激愤。如定期邀请当地士绅到慈善机关参观，甚至要他们捐输；孤儿长大婚配时，邀请族长和有权有势的人赴宴，以进行笼络等。

第五种手法是大力培植中国人充当神职人员，由中国人去解

决中国人的“纠纷”，外国传教士尽量不出面。

由于天主教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手法，在清王朝灭亡前，天主教所制造的教案确实是显著地减少了，而教徒的人数得到了相当快的增加。当然，天主教自1901年至1930年总的政策依然不变，但在手法上有了改换，并且利用了动荡不定的中国政局和当政者对帝国主义的屈服，竭立扩张在华教会势力，继续为帝国主义宗教侵略服务。

（三）基督新教扩大教会势力的花招

自1807年基督新教从英、美等国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不平等保教条约，更乘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淫威，其势力逐渐扩张，已成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其发展速度之所以快，主要是由于用“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业，从而迷惑了一部分中国人。

山西浸会首先以其“赔款”创办山西大学，而美国乃主张退还“赔款”，创办清华大学。各国多亦效法，均将“赔款”退还。遂使相当多的中国人仇教心理为之一变。其次是在中国广设学校中，算术、英文及各学科教员和教材大都取材教会。尤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中，有不少基督信徒。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基督教徒充任政府要职的更不乏其人，单在广东首府中，当时任职的信徒竟占65%以上，并且基督教所办各种“慈善”事业，每每能骗取一般社会人士的信任，以此来改变中国人对教会憎恨的心理。所以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能获得一部分人的谅解。

教会自身因遭遇许多困难，也力谋改弦易辙。例如教会搞的“自立自传运动”。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中国自立会，创办机关报《圣报》。到1910年，浙江平阳内地会首先响应，宣

告自立。自立的风气遂渐渐普及到全国，如上海的罗店，浙江的镇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广东的南澳，湖北的京山、天门，湖南的常德……等处，皆先后成立自立教会；并设总堂于上海闸北，1920年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当时报告有八十多处自立教会。此后历年增加，1921年增至一百五十余处，1922年增至一百八十多处，1923年增至二百九十处，1924年增至三百三十多处。在这四五年之间，自立教会增加得特别快。同时上海又有高凤池、谢洪赉等办起中国基督教会，不久在香港设立了支会，逐渐在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处，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在天津则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

1910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苓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徒，发起组织一个自立教会。1918年又有长老会教友刘寿山等在山东烟台组织中华基督会，青岛、济南相继成立分会，推及到山东全省以至于直隶、山西等处，进而形成华北的自立系统。同时，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庄、李逢谦等组织一个自立教会，名为基督徒团契，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处致力于自立自养自传，后改称为中华基督教会。这十年中，全国教会差不多都有谋求自立的计划，即使那些未完全自立的教会，也将其原有名称，其首加上“中国”字样，或改称为中国基督教。而在传道工作方面，则逐渐实行华洋教士结合。

其次，在外国传教士的操纵下，全国各地的自立会谋求全国教会的大联合，不但在传教上消灭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运动，归主运动，国内布道会，信仰自由请愿等等，都不复有宗派的区分。他们于1907年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百年大会。该会自4月25日开会至5月8日闭会，以上海青年会新建的殉道堂为会场，各教会、各机关所派出席代表，共有六百多人，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教会”。结果，有人主张组织一个无宗派的基督教协会，也有人主张各省组织省基督联会，然后由省联会合成全国基

督教议会。此后，各省基督教纷纷组织了省联会，地方教会亦组织了许多地方联会。不过这次大会闭会以后，因没有负责推行的中心机关，故进行得很慢。直至1913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全国大会，美国传教士穆德任主席，组织成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关，名为中华续行委办会。它的任务是：(1)执行全国大会的议决案；（2）作中西沟通的机关，与爱丁堡方面通声气；（3）提倡通力合作的事业；（4）发表教会公共的意见；（5）为各教会的咨询机关。并设立事务所于上海昆山花园五号，由外国教士诚静怡为总干事，开始做调查与研究工作；把调查全国各方面的情况印成《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在1914年出版，到1933年底已出至十三期。1922年5月间又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中西教士出席代表有1 180人。上次华人占三分之一，而此次则占二分之一。会议开了八天，对于布道、医药、文字、教育、工业、妇女等问题都有详细的计划。大会决定改中华续行委办会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选举中西会员百人，仍以诚静怡为会长，提倡本色教会，编成中西文《中华归主》两巨册，全国各教会的工作情形，均详细记载。由是各教会咸谋联络或合并，除长老会曾于1907年成立中国联合会，并与公理会伦敦会合并组成中华基督教联会外，全国信义宗教会亦联成中华信义会，全国圣公宗教会联成中国圣公会。后来，属于卫斯理宗的监理会、美以美会、美道会三派也合并为一会。可见中国教会在外国教士的操纵之下，日趋于联合而统一了。基督新教信徒的人数则远远超过了天主教修会的信教人数。

（四）天主教、基督新教侵华活动的比较

不论是天主教的神甫或是基督新教的牧师。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口头上标榜“超政治”的，但从来也没有脱离过中国的政

治。他们总是劝导教徒，对“在上有权柄的人，你们要顺服。……因为权柄都是上帝所赐的”，以此来维护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统治。他们还喋喋不休地向教徒灌输：“要爱你们的邻舍”，“要爱你们的仇敌”，“敌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转过来也给他打”，“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等等说教。这些都是明显地利用宗教语言的政治宣传。他们不但这样讲，而且还督促教徒照着这些宣传去做，要教徒们甘心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忍受反动政府的统治，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人间的一切痛苦；不仅忍受，而且还要爱仇敌。

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华活动的做法上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

从组织上看，天主教的组织系统比较紧密。1900年以前，在华天主教各修会虽然国籍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以法国为“保教国”，同时接受各自政府的节制；1900年之后，罗马教廷加强了对中国天主教的直接控制，各修会也同时受派遣国的节制，后来虽然利用了一些中国籍的神甫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但组织系统未变。因此，天主教在华活动时，行动比较一致，在教区划分上都有比较长期固定的活动范围，较少互相干扰。各个修会的行政、经济都是独立的，但各个修会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一般都能互相配合，特别是在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侵略时都把矛头一致对准中国人民。

而基督新教的差会在组织上是相对独立和各自为政的，它们没有一个中心，但是各个差会还是要受派遣国的节制，听命于驻华公使馆和领事馆。各个差会依照它本身的实力自行划分传教区域，在行政上、经济上独立行事。因此，在中国的一百多个大小差会不免出现有臃肿重叠、以致力量分散和抵销的现象。有时为了争夺地盘、争夺教徒而闹矛盾，这是1900年以前的基本情况。

进入二十世纪后，基督教各差会意识到各行其是并不利于教会势力的扩展，所以在1907年、1913年的基督教各差会举行的会议上，提出要搞联合和协作，特别是在互通情报、合办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方面开始有了联合的趋势。但是，从组织系统来说，基督新教始终没有象天主教那样紧密。

在经费方面，天主教一部分依靠在中国的大量房地产的剥削收入和教徒的捐献，一部分来自国外的捐款，另外附属事业也有一些收入。在1901年以前，还勒索到大量的教案赔款。

基督教从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就接受资本家的捐款，包括在华各国鸦片商的捐助。各个差会主要依靠募捐和教徒的捐献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1901年以前还勒索到少量的教案赔款。进入二十世纪后，垄断资本家为了逃税，便对教会“慷慨解囊”，于是教会的收入大大增加。各个差会与垄断资本家所掌握的银行挂上钩，把钱存入作为“基金”，提取利息，再加上教徒的捐献和在中国所办附属事业的收入及中国工商业者和官僚的捐款，使各基督教差会拥有大量的金钱。因此，各差会总部有专门聘请的会计师和律师，而且还把资本家、信徒拉进各种“董事会”，帮助差会用这笔资金进行市场投机活动，以赚取更大的利润。因此，基督教与天主教传教团体从经济来源相比较，前者明显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后者则带有一定的封建性。

在发展教会势力方面，天主教以吸收大量教徒为主，给以一定的金钱收买，一般都以整个家庭一齐入教，有的甚至整村人被吸收入教，在灾区还利用出租土地收买佃农入教，育婴堂用低价收购婴儿和贫穷百姓送进的婴儿或弃婴给以领洗入教，另外就是那些世代相传繁衍的新生教徒。

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比天主教晚，一般以吸收成年人入教为主，不为婴儿施洗。进入二十世纪后，基督教虽仍注意吸收教徒，但却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上。例如举行大规

模的布道大会，广设教会学校和“青年会”等。

教徒入教后就受到传教士的“保护”，传教士享有的治外法权也给教徒分享，教徒往往凭借教会势力可以逃避国家规定的或不成文的习俗所要求承担的义务，犯了罪可以受到教堂的庇护。民教相争引起诉讼时，往往可以在传教士的出面干涉下取得胜讼，即使遭捕获也可设法通过传教士的疏通获得释放。教徒甚至可以抗租，教徒居住的村庄可以成为不受中国政令管辖的“租界”，条件是教徒必须首先听从神甫或牧师的命令。这种情况，天主教比基督教更为明显，也就是说更为明目张胆。因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频繁出现的教案，多数是发生在天主堂内。在教徒遇到服从国家利益与服从教会利益有矛盾时，传教士要求教徒首先服从教会利益，利用宗教语言对教徒进行欺骗麻醉，使个别教徒往往丧失民族立场，供其驱使。有些地主、资本家为了依仗教会势力保护其个人的权势和经济地位，往往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教徒是受传教士愚弄的，他们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

在“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方面，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做法却有所侧重。天主教会一般只给教徒子女以小学教育或给以一定的职业训练，中高等教育机关很少，只有两、三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对于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小学毕业后就让他们进小修院，以后再进大修院，再从其中挑选忠诚可靠的尖子派送到罗马或巴黎的神学院深造，回国后主要担任神职。天主教对教徒子女从小就进行宗教灌输和“爱教宗、爱教会、爱天主”的所谓“忠诚”教育，并用种种教会仪式、教会习俗框住青少年的思想，以宗教教条为紧箍咒，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住，并且挑拨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矛盾，视不信教者为异教徒，魔鬼之子。煽动教徒中的青少年从小敌视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一切从教会利益出发，不分

敌我友。如此世代相传，形成了一股势力。但是，尽管天主教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广大的天主教徒，特别是青年教徒，一旦明白事实真相之后，联系到切身受到的中外反动派的压迫和欺骗，也会参加到反帝爱国的行列中去，与全国人民一起斗争。

基督教则侧重于训练教徒子女，不仅担任传教工作，更要求他们能打入政府机关、公私企事业和各种文化教育团体中去担任“领袖”。因此，从1900年之后，基督教更加注重开设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吸收教徒和非教徒的子女入学，给以一定的训练，使他们毕业后能占据关键性的位置，以便影响中国的政治朝着有利于传教士所属国家在华利益的方向发展。基督教同样地要对教徒子弟灌输宗教，但除此之外，还着重灌输西方的影响，教给他们西方的习俗和有关殖民地情况的知识，以便可以将他们输送到外国人办的企事业中去，介绍他们进入中国政府机关中去，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

在旧中国的最后二十余年里，全国各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共约十八万人，教会大学约占十分之一，即大约有一万八千人。其中除一小部分到国外去之外，在国内还有万余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真正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则是极少数。

在干涉中国政治方面，天主教与基督教是一致的。大量教案的发生就是因传教士干涉中国政治引起的。中国进行维新运动时，传教士也插手干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传教士除着重推行文化侵略外，还对各自的政府表达对中国政局的意见，提供情报，供政府参考。

教会本身不是情报机关，但是由于传教士的触角可以伸展到中国的穷乡僻壤，教堂网点遍布全中国各战略要地，最了解中国的情况。传教士有意、无意地定期和不定期地送交上级差会和所属领事馆的各种有关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报告，是欧美各国政府获得中国情报的重要渠道之一。其它

渠道是外交使馆和商业机构，而传教士所提供的情报却远比外交官和商人的详细和广泛。早期传教士的情报活动虽也披上宗教外衣，但毕竟是比较公开的。进入二十世纪后，传教士使用了现代化的手段，如电报（密电码）、照相机等，三十年代后还使用电台等，要比以前传递得更迅速，而且还有实证照片，这种做法更隐蔽，不易为人们所察觉。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禁止教徒参加爱国运动方面，两者也是一致的。天主教对爱国教徒往往以不准享受宗教崇拜和死后下地狱相威胁，重者则开除教籍，收回土地以断其生路。有的天主堂还私设公堂和监狱，对爱国教徒进行迫害。基督教在1907年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上为此曾专门通过一项决议："我们传教士要经常告诫中国教徒做忠心的国民，要尊敬他们国家的统治者，要爱他们的国家，要按期纳税。我们一概地阻止他们与政治的和秘密的团体所有的一切联系。"①基督教虽然在手法上要比天主教"开明"一些，但在镇压教徒的爱国运动上却是一致的。

四、土地革命时期外国教会的反共政策

（一）天主教的"反共扶蒋"政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时，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传教士站在反动立场上，配合蒋介石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及革命人民发动了进攻。1929年8月1日，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一

① 《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大会记录》，1907年，第393—403页。

向中国天主教发布了一个“特别通谕”，明确宣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天主教“中国化”的措施，支持新上台的蒋介石政府。这一“特别通谕”的全文如下：

“圣父以强烈的兴趣关注过并继续关注在中国的事变进程，不仅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关注，而且也以真挚的态度和最显著的同情，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亲手为第一批中国主教祝圣以示关注。对中国内战的止息，圣父衷心地高兴并向至高上帝报以感恩。祝愿在那个国家里得以从此恢复持久的和卓有成效的和平，不仅国内保和平，国外也有和平，并且是建立在仁慈与公正原则基础上的和平。为了达到这样的和平，圣教父表示希望，将给予中国人民的合法愿望和权利以完全的承认。这是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又具有古老的文化、世世代代都有伟大和光辉业绩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们能沿着公正和有秩序的轨道百折不回地前进，是不会缺乏一个伟大的前程的。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进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1926年6月15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领袖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的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基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最后。圣父重申他对中国和平昌盛的希望和祝愿，恳求全能的天主将他丰盛的祝福给予一切圣民。

1928年8月1日于梵蒂冈”①

天主教在华各修会根据教皇的“通谕”，布置各天主堂传教士实施“反共扶蒋”的反动政策。在农村，要与地方上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一面进行反共宣传，一面搞一些“改良”措施以笼络人民，其主要目标是与共产党争夺农民；在城市，天主教会要对教徒进行“反共扶蒋”的毒素灌输，并且指使一些反动的中国籍神甫直接帮助和支持国民党政府。

（二）基督新教反对中国革命

基督新教也站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立场上。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为例，1925年5月30日由于上海英国巡捕枪杀爱国同胞而制造的“五卅”惨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次血腥大屠杀。标榜基督爱人的“协进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召集在华各基督教差会传教士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支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镇压行为，并派代表到上海各报馆进行恫吓，要求各报馆“对此案发生的经过事实记载力求审慎，若事非确凿，不要妄加论断”②。同时立即组织所谓“工人临时教育委员会”③，派人分头到工人群众中去做瓦解工作，拿出一些钱，企图收买和劝诱工人不要反帝，不要罢工。在工部局会审公堂审讯爱国志士时，又指使两个美国传教士出庭作证，一个是上海慕尔堂的安迪生，一个是前任东吴大学校长葛赍

① 《教务杂志》，1929年1月，第36—37页。

② 《字林西报》（周刊），1925年7月25日。

③ 《申报》，1925年6月26日。

恩。他们为巡捕开枪杀死中国志士进行辩护，为英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出庭后他们又写信给上海英文《大陆报》，公然声称："我们应当向巡捕、万国商团和各机关为阻止和镇压这些暴动行为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①6月初，"协进会"又公然出面提出所谓"沪案调查"的建议。这是企图帮助英帝国主义推卸罪责和故意拖延时日以冷却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一个阴谋；同时还发表了一篇《告全国同道书》，对教徒进行欺骗性宣传。

在以往，不论是天主教或基督新教，对于爱国运动一贯是抱反对态度的。但是，处在这样一个新时期，再要使用故伎，就很难达到镇压的目的。于是他们表面上也装作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基督教爱国主义"的新口号。其内容是：

> "（1）基督教徒不仅要寻求本国的利益，还要寻求别国的利益；（2）基督徒应先是教徒而后是各自国家的公民。"②

这两条很重要，它反映了基督教会对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基本态度，企图迷惑一部分中国教徒脱离反帝爱国的轨道。后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又接连提出了所谓"读书救国"、"人格救国"、"人才救国"、"奋斗救国"等口号。从1927年起，它和天主教一样，要求在华各基督教差会"反共扶蒋"，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后来的"新生活运动"，提倡读经尊孔和进行反共事业。

1933年夏天，大批基督教上层传教士到庐山避暑。他们一面纳凉，一面开会，议题就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策划对江西的红军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传教

---

① 《大陆报》，1925年6月13日。

② 《字林西报》（周刊），1925年7月25日。

士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在中国只有基督教可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还认为，这次“围剿”在军事上是占绝对优势的，问题是在红军撤走后如何消除共产党的影响。传教士们认为，只有推广基督教的活动才是唯一的出路。会议期间，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曾到会演讲，表示如果传教士们同意，国民党可以考虑划出一些红军撤退的地区给基督教作为农村服务实验区。

1934年秋，中央红军撤离了江西根据地，开始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是基督教方面便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数次磋商。蒋介石的本意是想划十个县给基督教搞“实验区”，但是由于传教士们力不从心，决定先选择红军闽赣边区政府所在地的黎川县作为“实验区”，组成“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待黎川的“实验”取得经验并有足够受过训练的农村工作人员投入此项“实验”后，再在其它各县展开活动。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被推举为“实验区”的总干事。蒋介石在接见牧恩波等传教士时对他们说：“这是给你们一个表现基督教怎样能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机会。请你们和我合作，筹划一个详细的复兴程序。”①黎川实验区共分教育、妇女、卫生、农业、新运（即新生活运动）五个部。教育部的活动首先是接办民众学校，以江西国民党省政府所编印的《平民千字课》为基本教材，配以各种幻灯演讲，向成年农民进行反共宣传和宗教灌输；在农业方面进行了一些农作物的改良试验，并把原来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发还给他们，要求一般农民忍受地富的继续剥削，同时对他们略施小恩小惠，提供一些农业贷款和贷给他们种子、农具等。实验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反共为中心，乘机扩大农村教会势力。后来传教士们的实验区宣告失败。

基督新教并不因在江西活动的失败而停止活动。1936年，传

① 《女铎》，1936年2月号。

教士们决定在华东一带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抢先扩大基督教在华东农村的影响，进行防共、反共的灌输。他们首先进行情况调查，由教士毕范宇负责，对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农村进行广泛的调查活动，并指定七十三处乡村教会作为重点调查的对象。

据毕范宇称：他这次负责此项调查，一是发出了二百多封调查信给在华基督教各差会，要求他们提供一百处有代表性的乡村教会情况；二是发给直接参加调查活动的人员每人一份“对调查人员的指示”，提出具体的调查项目和要求；三是对金陵神学院参加这次调查活动的学生们以具体指导，要他们重点深入调查二十处乡村教会。毕范宇要求调查人员提供三个方面的情报：一是农村社会状况，包括该地区的政治、历史、地理、地形、人口、工农业、经济、商业、交通、卫生、社会、宗教、文化、娱乐、领导因素、文教因素等，要提供详细地图；二是乡村建设事业情报，包括政府办、地方办和其它非基督教办的乡村建设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三是乡村教会的活动状况。

毕范宇对政治调查一项内容还具体规定：要求调查清楚当地政府的变迁，县和县以下社会服务的规模和内容，政府机构及税务机构对农民的影响，盗匪骚乱和治安情况，群众组织及活动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活动情况，农民的民族感、排外感和反对宗教感，政治宣传的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影响，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在农村中与基督教的相互影响等等。单从这一项调查要求就可看出他的矛头所指了。

这项情报调查活动从1936年12月正式开始，截至1937年5月28日，毕范宇已收到十六个省的三十六个基督教差会送给他的一百二十二份调查报告。可是还来不及从事正式的反共活动，抗日战争就爆发了，这项调查也不得不停顿下来。一直到1948年，毕范宇才把搜集到的一部分可以公开的报告编印成《中国的乡村教会——一个调查》出版，书中还附上了一些抗战结束后的基督教

概况①。可是，他的“乡村建设”的美梦始终没有能够实现。

为了配合基督教的反共活动和扩展教会势力，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从二十年代后就大量地出版反共书刊。据《广学会年报》（1921年至1922年）称：“布尔什维主义受到北京的一批过激分子所欢迎，但一个苏维埃中国的幽灵却足以能在最勇敢的心灵里产生恐怖”，它声言“无神的唯物主义”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宣传。在1924年举行的广学会年会上，当时任代理总干事的教士莫安仁公开扬言：“当前排外与反基督教的精神正在发展，广学会必须使用一切力量来与这个祸害作战。”他说：“基督教的出版物是他们所能使用的最有力的一种武器。”②

从1927年起，广学会连续大量地出版了《公民常识小简》十种，积极地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共和宗教宣传。

从1933年起，广学会又出版了大量《农民宗教课本》，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配合基督教和国民党搞的所谓“乡村建设”活动对农民进行毒化。例如，在高级课本第六册第二十七课讲到“爱国观点”时写道：“武力抵抗敌国，……经济绝交，……都是不妥当的、不彻底的。”在第二册第九课中又鼓吹“地主与佃户彼此都应该亲爱互助，公平相待。”

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广学会还出版了日本贺川丰彦所著的《爱的科学》一书，并且还邀请贺川丰彦到中国演讲，鼓吹“中日提携”，要求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象对待“主内兄弟”那样“爱”他们，要为“中日和平”而合作③。

---

① 毕范宇：《中国的乡村教会——一个调查》，序言，第7，51—52页。

② 《广学会年报》，1924—1925年。

③ 《广学会年报》，1932—1933年。

从1933年起，广学会又陆续出版了牛津团契的十四种书籍。牛津团契是1921年由美国传教士布克门在英国牛津大学发起的．它的信条是："绝对诚实，绝对纯洁，绝对无私。绝对的爱。"后来在1938年改称为"道德重整运动"。牛津团契的书，主要根据其信条鼓吹"化仇恨为互爱"，要求中国人民对当时日益加紧的日本侵华持投降态度。此外，广学会还把反共布道家龚斯德等人的反共演说汇编出版，一共出了十一种，其中包括龚斯德所著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书，企图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共说教。

（三）外籍教士刺探红军情报及三边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帝国主义政府和反动教会的唆使下，外国传教士们还从事特务间谍活动。如美国传教士福尔德接到美国驻汕头领事馆的命令，令他担任他所在地区的对红军的全面侦察工作。1929年10月14日、30日，福尔德先后致函汕头美国领事史密斯，报告红军的移动方向。他在10月30日的信上说：

"我知道你愿意得到这一带目前局势的信息，我可以满意地将迄今为止的我所知道的消息告诉你。……二十日那天，共军从福建到镇平城，随即去了松源，但又在那一星期内退回镇平。……二十五日（星期五）他们进占了嘉应城，我们的修院在城郊，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在星期六四点钟的时候，政府军赶到击溃了敌人。……据报告红军已溯江撤向畲坑和丰顺……。"①

1929年11月4日汕头美领事史密斯令嘉应（即梅县）美国天主教会供给关于红军解放嘉应的情报，原信称：

"我们听说共军攻陷了嘉应，……我希望你们能供

①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

给我关于最近这次共军占领的任何消息。

同时，我还希望能由你们取到关于现在共军移动及嘉应一般形势的任何情报。”①

1929年11月13日，福尔德函复美领事史密斯称：

“……你本月四号的来信，问我关于共军最近占领嘉应的消息，我在十月三十日的信里已经预先说到了。……此后在十月三十一日，共军曾再一次试图攻夺这个城，……在城内的军队虽然只有五百人左右，而红军据说则有六、七千人。政府军打得很好，及至黄昏，终于把敌人击溃，当然，他们并不是全都有武器。……”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教士们不但搜集提供有关红军的情况，而且他们还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的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各种各样的情报。如法国和比利时联合派出的国际间谍在内蒙古的活动就是这样。

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士一直是在法帝国主义支持与庇护下进行侵略活动的。因而他们与法国侵略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十九世纪末以来，以法国为主的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分子、野心家曾经络绎不绝地以所谓探险、旅行、游历、考察等名义来到河套和鄂尔多斯等地从事勘察资源，收集矿石标本，测绘地图，搜集气象情报资料，拍摄山川形势照片，盗掘古代文物，搜集动植物化石以及调查风土人情，探取地方军、政、工农牧业生产等情况。在进行这些活动时，当地的传教士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帮助。许多传教士为这些活动作向导，教堂成为这些“不速之客”的居留所和休息站。三十年代以后，这种活动愈来愈频繁了，大批的西方侵略分子来到河套三盛公一带进行有组织

---

①②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

有计划的调查勘察。例如1931年来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法国考察团，携带了各种测量仪器，驾驶爬山汽车十九辆，在三盛公教堂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电台，测绘了附近一带的地图，调查地质情况，挖掘矿石标本等，而且还拍了电影①。1932年更有所谓“国际地理杂志考察队”在三盛公一带进行“考察”，以教堂为据点开展活动②。此后一直到解放前夕，还不断有外国侵略分子进入河套三盛公与洋教士联系。

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和文化特务，河套、鄂尔多斯各教堂的教士们，经常借学术研究、考古为名，到处进行深入调查，然后向他们的国内和罗马传信部提供详细的情报资料。在他们向罗马传信部作的所谓“传教事务报告”中，包括了内容极为广泛的种种资料和情报。例如1925年“绥远教区”主教葛崇德的“传教事务报告”就列述了河套、鄂尔多斯、土默川等地的历史、地理、天灾人祸、风俗习惯、行政区划、气候、交通、卫生条件、民族情况、居民、人口、商业、农业生产、矿藏等等调查资料③。长期在河套地区“传教”、1931——1944年充任宁夏教区主教的帝国主义分子石扬麻，一直到处搜集中国古代文物和矿石标本，窃取河套、鄂尔多斯等处的资源情报。另一个传教士康国泰，在他来到河套地区以后，长期往来中国西北各地，调查“风土人情和地方各种情况”，“写了很多地方志，绘了很多地图”④。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传教士还特别注意从事于蒙古语

---

① 《外国传教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稿本）。

② 《过幽谷》，载1932年11月《国际地理杂志》，第565—566页，巴盟天主教爱国会译稿。

③ 《绥远教区葛崇德主教向罗马传信部作五年传教事务报告》，1925年。

④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巴盟的侵略罪行材料》，第7—8页。

言、文字、史地、民俗的研究。传教士田清波（A•Mostaert）在鄂尔多斯住了十九年，编纂了《蒙法大词典》、《蒙语集》，被称为“蒙文和蒙古史的世界权威学者”。传教士彭嵩寿（A•Van Oost），“经多年辛劳，曾搜集汉蒙民间歌谣多种，配谱刊印”，并辑注刊印了《土默特民间谚语》。另一个洋教士龚德华（J•K1er）编纂了《鄂尔多斯蒙民礼俗》。他们所以要从事这些研究和著作的目的，自然不是他们自己吹嘘的是“以期于中国的学术的发展有所补益”，而是为帝国主义侵华提供各种详细资料。

为了侵略的需要，这些传教士还在河套、鄂尔多斯的一些教堂里，设立搜集气象情报资料的机构。萨拉齐的巴拉盖，河套的三盛公、蛮会，以及鄂托克三边地区的小桥畔等教堂，很早以前就设有气象测候站，专门搜集中国西北地区的气象情报，逐日地记录气象变化情况，向法帝国主义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所设立的天文台汇报，为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活动作了重要的准备①。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这对于一向极端仇视和害怕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它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传教士来说，自然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消息。于是他们纷纷进行破坏活动，如盘踞在陕北三边地区和鄂尔多斯南端的侵略分子，在三盛公主教府的指导下，曾一再指挥教堂反动武装阻拦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并伤害抗日人民

① 《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109页；《访问巴盟教区郝威主教记录》，1946年1月29日。关于徐家汇法国耶稣会天主教堂天文台为法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事实，参看《传教士为谁服务？》一文，载上海《信鸽》报，1959年7月2日。

多名①。1936年4月，三盛公宁夏教区主教石扬麻（Gaspar Schotte）在给河套各教堂神甫函中大肆叫嚣道："共产主义的危险来近了，在全世界是普遍的，在中国是严重的，在咱教区是特殊的……"②为了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夹攻工农红军，他们用几十只骆驼，驮运大量的军火弹药以及其它物资到三边的小桥畔教堂③。并且，一方面加紧和大军阀、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相勾结；另一方面又积极布防，准备死守④。

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影响和不断发展中的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中国各族人民反帝抗日的情绪大为高涨。可是，传教士为了继续霸占中国人民的土地和房屋，不断改变手法。如，三盛公一带的教堂，在中国人民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声浪的不断冲击下，看到继续无代价霸占土地已不可能，便企图改变方式，以向当地旗政府缴纳少量"租金"为幌子，继续维持他们霸占大片土地的侵略特权。

但是，不管传教士们怎样狡诈、阻挠和破坏，由于这时广大群众与教堂的矛盾更尖锐化，人民的反教情绪越来越高，整个土地革命这十年间，在人民反抗浪潮中，出现了很多收回"租地"、"教产"的事件。陕北三边教堂的传教士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勾结在一起，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武装活动。三边地区的天主教领堂堆子梁教堂以武器支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攻打人民军

---

① 《樊静安由三盛公呈报罗马书》，1936年8月10日，见《巴盟神职人员和修女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文件抄）。据这封信透露，当时教堂向工农红军偷袭，红军死伤达二百五十名之多。

② 《石扬麻致宁夏教区神父函》，1936年4月11日。见《巴盟神职人员和修女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文件抄）。

③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巴盟的侵略罪行材料》，第6页。

④ 《樊静安由三盛公呈报罗马书》，1936年8月10日。

队。他们遭到人民军队的反击后，仍拒绝缴出枪械，最后堆子梁被攻破。接着，三边地区教堂所霸占的大片土地，由蒙汉人民代表组成的“三边收回教堂土地委员会”接收过来。从此，三边地区被教堂霸占了数十年的土地全数收回。帝国主义传教士在这里的侵略特权被彻底摧毁了。

三边地区的胜利，鼓舞了城川等处的教民佃户。他们从1946年秋天起，都拒绝向洋教堂缴纳地租，摆脱了外国侵略分子长期以来对他们的经济剥削。在河套，阿拉善旗政府也于1946年8月收回了被三盛公等三教堂以包租的方式侵占的大部分土地。这样，传教士在西北许多地方以各种侵略手段掠夺强占的大量土地基本上被迫归还了。

所有这些，说明了随着中国人民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外国传教士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五、抗日战争中传教士是日军的帮凶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日军大举进犯华北，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由于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迅速地占据了中国大半江山。从此，中国美丽的河山遭受日寇野蛮的蹂躏，中国人民惨遭涂炭。此时，基督新教、天主教及在中国的东正教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了本国利益，充当了日本侵略军的帮凶。

（一）基督新教教会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成立了伪

满洲国。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首先攻陷平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统治，并在华北站住脚跟，也想利用和控制基督教来为自己服务。但开始时英、美势力仍然控制着中国教会，中国教牧人员还把外国传教士当作应付日本人的护身符。因此，日本虽然在中国建立了属于其本国教团系统的日本教会，但只能在日本侨民中活动，很难打入属于基督教差会系统的和所谓"自立"的中国教会。

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结成轴心国，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开火，掀起了太平洋战争。从此日本便与英、美直接处于敌对状态，形成日本与英、美争夺亚洲霸权的局面。这时，日本在其占领的地区封锁了所有英、美系统的教会、医院、学校和企业、机构，并把英、美侨民及传教士集中起来。当时中国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中，少部分人是死心塌地地愿为日寇效劳，但另一部分人则既慑于日寇的压力，又想替英、美看守摊子，就以出卖中国民族利益来应付日军。他们自动解散了原来英、美差会控制的基督教联合会，并宣布成立基督教联合促进会的组织。

日本为了要把基督教控制在手，便以支持"中华教会自立"为饵，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最后竟然成立华北基督教团，达到"支持中国教会脱离英、美羁绊，实现自立"，并把教会房产也交给了中国牧师，借以收买了很多的以传教士身份出现的中华民族败类。

教团成立后，日本利用这一组织形式，通过教会向信徒宣传"大东亚圣战"、"日华亲善"、"强化治安"、"反共剿共"，并用"祈祷和平"、"感恩礼拜"等宗教活动的名义麻痹中国信徒思想，使之不知抗日，甘作顺民。另外还通过教团在教牧人员和信徒中，展开"献铜献铁"、"粮食增产"等运动，直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罪恶的侵华战争。教团实质上成为了日本侵华的

得力工具。

例如，在教团成立大会上，原天津英、美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刘修斋讲话说，中日两国既是邻国，又是多年亲善的友邦，中日两国的教会，也应当合作互助。日本教会已经比中国教会先行一步，成立了教团，也具备了相当的经验。随时可以伸出友谊的手，协助天津中国教会脱离英美的统治，建立中国本色教会，达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目的。日本华北特务机关头目长宫雨主持了大会，国民党汉奸、伪市长温世珍致词。英美基督教联合会华北总会负责人周训、冠卿等在会上发言说："……切盼诸君能善体斯旨，充分发展我会之机能，并为求民心之安定及反共起见，在宗教立场上，向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上迈进，实至望也。"会后，许多中国教徒向日寇提供情报，做了帮凶①。

除了中国基督教徒充当日寇的帮凶外，英、美在华传教士也成了日寇的"情报员"。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寇侵占汕头一带，梅山地区成为日寇下一步的侵华目标。这时，美国政府以作《公路年报》为词，命令福尔德主教进行这一地区公路交通的情报工作。福尔德还直接担负了供给日本侵略军情报的任务。汕头美国领事杨格曾于1939年12月4日以保护美国人财产为名，写信给福尔德，称：

> "汕头日本领事来函要求搜集美国产业所在而尚未被日军占领之澄海、潮阳、揭阳和汕头四周其他城市乡村或内地地方之地图与平面图，他要求在地图或平面图上要精确地标明美国产业的位置，这类材料搜集好之后，将送交日本军事当局。
>
> 本函的目的就是请你协助把本领事区内的美国天主

① 参见1962年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第28册：《华北基督教团——彻头彻尾的日寇侵华工具》。

教会产业所在地的材料尽量地提供给我。你大概晓得本领事区是指广东省东经度一一五度以东的地方，日本领事称，自空侦察，在各城镇上有很多第三国的旗子和标志，难于辨其真伪。

依此要求请即将你所有的材料迅速寄来，以后如有，亦希陆续告我。”①

这封信是一个罪证。不难想见，有许多情报是由福尔德转经美国领事送达日本侵略军之手。

（二）天主教教会为日本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在中国人民抗战期间，控制在梵蒂冈教权下的中国天主教会大力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它一方面压制一部分天主教教徒的抗日救国活动，另一方面又积极与日本携手合作，不仅以欺骗宣传来麻痹教友们的爱国思想，还广搜情报，供给日本特务机关。梵蒂冈教皇驻华代表蔡宁于1939年3月14日竟公开地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出“中立”的命令，要中国教会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抱“不偏左，不偏右”的态度，禁止中国爱国教徒的抗日活动。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日本天主教会便于1937年10月16日派日本神父田口芳五郎来中国北方进行特务活动。田口芳五郎曾在罗马受过训练，是梵蒂冈一手培养起来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伊始，他便在东京出版了一本题为“《中日战争的公教观》的小册子，极力粉饰日本的强盗行为，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由于受到共产党的“威胁”而进行的“自卫”。书中写道：

“中国共产主义日益发展，日本不能容许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包围。共产党在邻国渗入，对日本是一个很

①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

大的威胁，……日本没有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只是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向远东伸张……只有一个途径能终止当前的战争，就是结束中国同国际共产主义的合作。这种合作是远东和平的主要阻力，是战争的根本原因。”

接着他又荒谬地举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个“理由”：

“1900年，日本人口是四千五百万，至1937年就增加到七千万。日本不能维持自己的需要，日本迫切要求工业原料及生活原料，要求开辟市场，以维持自己人民的生活……我们确信，当一个国家的命运受到威胁时，通过战争来加以解决，是符合公教教义的。按照公教道德的原则，一个国家在它的生活权利方面非理地受到威胁，而以战争作为预防，这种战争表面看来是侵略战争，实际上却是防御战争。”①

日本传教士不愧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谋士，他不打自招地供认了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对中国进行掠夺。但是他们却硬把这种强盗行为说成是符合“公教教义”的。上述这些荒谬的论调正是田口芳五郎来中国宣传的中心内容。这个日本神父来天津向天津教区兼正定教区法国主教文贵宾推销了他的侵略理论以后，又把文贵宾介绍给日本侵略军驻津军官。1937年12月25日，田口乘飞机返回东京，文贵宾在他行前交给他一封信，带给东京总主教，信上满意地说：“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衷心感谢你派了田口芳五郎神父到中国北方来，使教会和军队便于发生关系。”②从此，天主教教徒中的民族败类在法国主教文贵宾带领下便开始与日本侵略军狼狈为奸。

---

① 〔日〕田口芳五郎：《中日战争的公教观》。

② 1962年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

抗战期间，中国天主教上层分子中一部分人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但多数有民族气节的中国神职人员和广大的爱国教徒是拥护抗日的。因此，华北地区有些神父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动员和协助青年教友参军抗日，作些宣传工作。为了阻止教友参加抗日活动，文贵宾于1938年3月16日以正定主教的身份发出了一个通知：

“我知道在我省某些教区有神父参与军事活动，他们发动或帮助教友参军。这种活动固然出于善意，但是很不明智，对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危害。

据我了解，正定教区的神父目前尚未参与这极不明智及被教会禁止的活动。由于事关中国教会的存亡和发展，为了避免这种不幸，我不能不禁止我们的全体司铎参与军事活动。

我信任你们的服从精神，我且不向违反这条命令的任何司铎提出所应受的教会惩罚，我仅向你们说：亲爱的神父们，你们只注意一件事，就是光荣天主，拯救与圣化人灵。

我祝你们平安，在困难中有神圣的愉快，并在司铎的职务上取得伟大的成绩。”①

在这封公函里，文贵宾以“事关中国教会之存亡和发展”为借口来阻挡爱国神父们抗日活动，并把这种活动说成是“被教会禁止的活动”。文贵宾下了这道禁令之后，便向日本侵略者去表功。1939年12月14日，文贵宾写给日本领事馆一封信，信里这样写着：

“我曾经劝戒属下司铎避免一切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专心致力于传教工作……，不愿意有人视教士为抗

① 1962年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

日人员。”①

由此不难看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给正定教区神父的禁令，根本不是什么“教会之存亡”问题，而是在扮演着日寇帮凶的丑恶角色。

1940年4月9日，日本领事馆曾给文贵宾一封信，信中说：“我要求您遇便来领事馆，您可以同一位有权威的军官交换意见。”②这就进一步证明文贵宾已经和日寇高级军官接上了线，成了日寇间谍网中的一个枢纽。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对文贵宾这样重视呢？当然，文贵宾对日本唯命是从，甘心效劳，会受到日本的欢迎。更主要的是，在天津教区所辖各大城镇都有帝国主义传教士盘踞的情报站。国际特务司义芳在天津专门从事间谍活动，静海县的荷兰帝国主义分子杨仁址、沧县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贾国安、盐山县的南斯拉夫传教士叶利普等，都是天主教内比较老练的国际间谍。他们借“传教”的名义，搜集八路军在农村抗日活动的情报。身为天津教区主教的文贵宾自然是这些情报活动的中心。同时，文贵宾本人也经常向从农村来天津的神父探听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并且以“传坚振”和“视察教务”为掩护，亲自到农村搜集情报。

他们的另一种活动是替日本进行宣传。1943年，日本天主教神甫、特务岩下庄一到华北，他们就把反动的宣传品在教徒内散发。现摘录其中一篇，即可见出端倪：

“为了远东的和平与繁荣，我们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荣幸地向你们谈几句适合于中国人呼声的意见。

我们祈求天主使真理照耀我们两个民族。并通过这封信最终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的。显然，只有为合法自

①② 1962年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

卫而诉诸武力才能被允许，天主造人的目的不是彼此仇恨和残杀，而是相爱和互助。若使暴力停止，人们在各国之间应在政治、外交的范围内致力于建立合法的往来。为了避免民族之间的误解，光空谈正义是不够的，还应当懂得实行。人们被导致错误，多次是由于固执己见。

这样，对目前的中日战争，一方（指日本——译者）说是合法的自卫，另一方（指中国——译者）却坚决否认，若双方单纯看问题，无疑地一方是错误的。为了改变这种痛心的形势，我们想提醒两国教会的仆人和终生献身于天主的人经常诵读这句话：你为爱天主爱你的近邻吧！

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目标，当作虔诚的祈祷，好使我们给你们提出下列建议：

我们主张当前的讨伐（即日本侵略中国——译者）是符合正义的，其理由蕴藏着在中国中央政府允许由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发生的事实里。尤其自西安事变以来，中国同苏联的合作更为密切了，这种合作以一股极端的力量掀起抗日运动，最后导致今天的战争。在中、日之间挑起战争，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散布灾祸，使我们两国沦于灭亡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者图谋的目的，这种灾祸是国家政治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相反，日本所追求的是避免这种灾祸，并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真实持久的和平。

两国命运应通过下列原则取得保证：

1.建立一个好的行政，为能使中国人民生活在和平中，在整个中国应统一和繁荣。

2.动员两国的一切行政、外交及经济机关，贯彻切

实合作的精神；无此，最崇高的目的不能实现。两国应追求一个理想，即建立在爱德基础上永久的和平。我们相信依靠公教司铎的帮助是最适宜的。因为司铎只能以牺牲和仁爱的崇高精神从事光荣天主及帮助近人的工作。

3.在灾祸蔓延的地方创造幸福，抛弃武力而采取仁爱，避免仇恨而产生爱情。这种感情应当在我们的奋斗中指引着我们。

虽然我们不断地作了耐心的努力，不幸的意外每天还要发生，为此，我们号召天主仆人的合作……”

这一文件通篇充满了侵略者的论调，完全暴露了教会在抗日战争中的反动立场。

当时日本实行所谓“强化治安”，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终日以豆饼、糠菜充饥，敌占区到处可见饿殍，而教会人员每月可以从日伪机关领得五百袋白面，冬季用煤也很充足。俨然是两个天地！这些卖国传教士神父可以持护照自由出入军卡口①。

在外国传教士中，还有很多为日寇充当特务的。雷鸣远和雷震远就是其中十分著名的两个。雷鸣远和雷震远都是美籍比利时人，在抗日战争以前，即潜入中国传教，经常搜集中国各种重要的情况，供给帝国主义。由于他们给了帝国主义许多重要的情报，因此获得了“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他们为了便于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加入中国国籍，广泛地利用天主教，建立特务组织，并以某些天主教教徒为骨干，发展反革命武装。抗日战争初期活动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华北战地督导团”，就是雷鸣远一手组成的。1938年夏天，雷鸣远从华北跑到

① 以上均参考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

武汉，经于斌介绍，会见蒋介石及特务头子戴笠。蒋介石和戴笠想借雷鸣远在华北天主教中的影响，发展特务组织，于是首先把雷鸣远拉入军统特务组织，进一步让雷鸣远组织“华北战地督导团”。

“华北战地督导团”是军统特务、三青团员、天主教徒联合组成的。该团下设三个大队、九个中队、二十七个区队，分布在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南省北部一带，配合国民党军队，勾结日伪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雷鸣远死后，该团续由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蒋氏政权国防部保密局华北地区总督察）及新乡教区美籍主教米甘领导，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华北战地督导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在解放区和沦陷区建立特务组织及特务武装，搜集解放区的各种情报，制造谣言，破坏解放区内各种建设。雷鸣远曾亲自带领该团第一大队二十中队，住在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驻地（邢台县河家坪），利用鹿的电台，向蒋介石拍发情报。二中队三区队队长孙启之（天主教徒），以传教为掩护，主持平汉线邢台、沙河、永年、邯郸等地的特务工作。他在各地教堂内设立情报站，利用教徒搜集情报。孙启之经过永年马固村天主教会会长郑国栋的介绍，和盘踞永年一带的伪军头子许铁英勾结，供给许铁英情报。1939年底，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一部在沙河渡口围攻沙河抗日县政府，即是从孙启之处取得情报的。雷鸣远并曾命令天主教徒李仲三组织以天主教徒为骨干的十字军，以李为司令，以太原日本宪兵队特务范振东（天主教徒）为副司令，进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华北督导团科长刘诚奉雷鸣远之命，在邯郸一带勾结日本陆军联络部中将、天主教北平西什库总堂顾问木村（日籍），组织了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特务武装“冀南剿共军”①。

---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1年4月14日、24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各地的俄国东正教会也成了日本反苏、反华的工具。日本以东正教为核心，把流亡在华的白俄组织起来，在华北等地成立了所谓“俄侨防共委员会”。北京的“防委会”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直接控制下，组织了外事警察班等等，专门为日本搜集情报，维护交通治安，镇压和监视中国人民和苏联侨胞的反日爱国活动。上海的白俄反共组织还利用教堂充当招兵站，在俄侨中为日寇招募炮灰。

总之，在抗战时期，教会始终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他们的侵略伎俩经常是“首先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再后是殖民地总督”。传教士是殖民主义的先锋，他们走到哪里，火和剑就伴随到哪里，痛苦和灾难也就降临到哪里。上述只是日本侵华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但是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六、解放战争中传教士的罪恶活动

抗战胜利后，外国传教士在本国反动政府支持下，与蒋介石反动政府勾结，把教会、教堂变成向中国革命进攻的桥头堡，传教士则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别动队。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传教士福尔德曾回国作了一次报告，不久便赶回中国，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人民。他在1946年2月25日写给鲁巴（Robba）神父的信中说：

“海丰的政府官员（指国民党）们现在似乎更加感谢天主教传教士所给予的反共援助。”①

①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

当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以后，福尔德对国民党的溃败感到十分焦急，他大写反共文章，向所属的教徒发出疯狂的叫嚣。他在1948年的复活节那天，规定每年的5月2日（主日）“为着拯救俄国和反对共产主义而举行一次特别仪式”，利用这种仪式“作广泛的宣传”。

这个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曾经替宋子文拟了一个所谓“广东省共乱解决办法”。这是从他在1949年1月31日给香港华南总修院赫利斯神父的信中发现的。详细内容至今未查获。那封信上说：

> “上星期本地有一个官员请我草拟一个‘广东省共乱解决办法’，他想把这个办法送呈省主席宋子文（当然用其本人名义），……我犹豫片刻，但终于答应了。草拟本地区之共乱解决办法，这就给了我一次对现势发表我的意见的机会，事后我觉得痛快多了。……我常想找机会能够影响些官员，使他们认识到我所想的。”①

象福尔德这种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国间谍不止一个。美国籍比利时传教士雷震远在华北组成的特务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就是由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指挥的。“公教青年报国团”是保密局的一个隶属机构。早在1945年12月，戴笠在北平亲自召见雷震远，指示建立特务组织的“机宜”。此后，雷震远和保密局特务、天主教徒习化仁等积极活动，搜集苏联及解放区的各种情报，供给保密局。同年7月间，戴笠派著名特务陈镇华协助雷震远等建立特务组织，即“公教青年报国团”。该团以保密局北京站的电台与保密局本部联络，并直接从保密局领取特务活动经费。“公教青年报国团”为了便于进行特务活动，先后和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及河北省政府建立联系，并成立了“民众自卫总团”和“民众建

① 《人民日报》，1951年4月24日。

国协进会”两个外围组织。他们还企图利用“民众自卫总团”扩充特务武装。当时，他们曾收容日伪治安军的散兵游勇及一部分天主教徒，组成一支三、四百人的反革命武装，由骆毅宾率领，与国民党第三军联合行动。这一支反革命武装在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全部被歼灭。

1947年7月间，雷震远又联络了一部分天主教徒，先后在华北各地建立“公教青年报国团”分团，加紧进行搜集情报、策反及武装破坏等反革命活动。河北分团以刁化仁兼主任，毕卓云任书记。在分团以下，还设立了许多工作队。1951年初，天津市破获的“公教青年报国团”、“民众建国协进会”等特务组织的主犯金玉培，就是当时河北分团天津工作队队长。1948年4、5月间，金玉培曾经组织地主、恶霸，配合蒋介石军队进犯冀中解放区。金玉培所带领的一股特务武装，曾大肆杀戮、抢劫任邱一带的人民。天津解放后，金玉培充任“公教青年报国团地下工作总队平津区队”队长，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

1950年10月16日，石家庄市破获的“公教报国团”特务组织案，主犯吴雅阁（天主教正定教区神甫）于1946年参加国民党，曾任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1947年参加“公教报国团”特务组织。同年8月，吴在北平接受特务任务后，返回石家庄，利用教会发展了70余名特务，分别在石家庄、平山、灵寿、正定、无极、藁城等十六个县市、三十七个村庄活动。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他即潜伏在正定、藁城一带秘密活动，建立谍报组织。1948年1月，他逃往北平，并派遣特务来往北平、石家庄间，刺探和传递军事情报。他曾绘制平山县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机关驻地详图，指挥敌机轰炸，计炸毁民房709间，死伤34人。他还绘制中国共产党石家庄等地党政机关驻地地图，转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红白被单及放火为号，便于敌机轰炸。从1948年9月13日起，敌机连续轰炸石家庄等地，仅石家庄市即死伤135人。他还指使传教士宋

本笃潜入解放区，谋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首长。解放区各地还破获了许多以天主教为掩护的特务案，如齐齐哈尔天主教内的间谍案、河北献县天主教内的间谍案等。

齐齐哈尔天主教内的间谍案，是1947年7月24日破获的。据该案主犯胡干普的口供及公安机关所获材料，齐市天主教堂很早就进行特务活动。1935年胡曾组织齐市中华公教青年会，演出宣扬“皇道乐土，日满协和”的戏剧。1936年出版《锋声月刊》，为日本作宣传。1937年，胡获得了溥仪的奖状和奖金。1938年5月，胡派遣该会神甫到日本召集的反共会上讲演，散发反共传单。1945年日寇投降后，该天主堂曾与日本特务李次二勾结，为日寇伊藤隐藏物资，并藏匿东北著名的土匪华文东。

1946年，胡干普与国民党嫩江省主席彭济群接上关系，接受彭给予的“帮助中央接收”的任务。同年4月，由神甫博施德购置电台，秘置天主堂内。同年8月，博施德与军调部执行小组美国代表巴劳夫中校取得联系，向巴劳夫供给解放区的各种情报。这些传教士还积极破坏土地改革，命令教徒不准参加群众斗争，散布“中央军秋天一定要来，八路军胜利不了”等谣言。破获此案时，计搜出电台两部，小型收报机一部，大小型发报机各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美制雷管两盘，及武器、反革命文件等物证。

河北献县天主教国际间谍案于1947年10月21日破获。当场搜出发报机及短波收报机各一部，美制电池多件，还有国民党高级官员孙连仲复该堂主教赵振声的“相智字三二二字三寒”代电一份，及1947年7月12日首犯法国传教士尚建勋签名发出的禁止教民参加土地改革的通知等罪证。这些特务私设电台，供给美蒋情报，并组织教会反动武装，勾结蒋介石进犯解放区。1947年1月4日，主犯尚建勋等曾派遣廖逻迹秘密赴北平，要求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派兵进犯冀中解放区。孙连仲于14日复文说：“已酌派部队前往进剿。”这些特务对解放区人民参军、支援前

线等行动，极力进行破坏。如煽动战士逃亡，禁止教民抬担架，组织青壮年逃亡蒋管区，并令教民偷窃秘密文件等。1947年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时，他们曾作了一台大弥撒，为蒋介石的“胜利”祈祷。

其它省天主教、基督教神甫、牧师的罪恶活动被揭露的也很多。如宁夏教区主教王守礼是美国远东特务机关的特派员，他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特别就近与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同时，与帝国主义分子、罗马教廷公使黎培里和大特务“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交往频繁①。在他的主持下，河套地区的教堂成为当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堡垒。

解放战争初期，以王守礼为首的河套各教堂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一方面大肆活动，妄图“重兴教务”，恢复与扩展他们在河套等地区的殖民事业；另一方面打着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十分猖狂和嚣张。当时，王守礼布置了河套一带的“传教”发展计划，并亲自赴银川欢宴马鸿逵，进行密谈。同时还派遣教徒多名到外地教会大学和医院进修，作为以后大发展的骨干力量。

但是，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揭露了传教士的阴谋，粉碎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扩张计划。于是他们便加紧利用各个教会学校开展大规模的反共宣传，建立反动组织，制定“应变”计划，图谋作垂死的挣扎。

---

① 参看《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巴盟的侵略罪行材料》，《天主教传入后套简史》。

七、大陆解放前夕外国教会的“应变计划”

1947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旋即以雷霆万钧、横扫残云的磅礴之势，由东北转战华北，蒋介石反动政权溃在旦夕。于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一边继续协助蒋介石“戡乱”，煽动教徒仇共反共，一边制订“应变计划”，着手进行撤退的准备。

（一）天主教的“应变”手段

1948年底，战犯于斌匆匆飞往梵蒂冈，向教宗庇护十二世汇报了中国天主教的情势。教廷根据于斌的汇报，指示中国各教区的大、小修道院撤退，神职人员当中“少数有特殊危险者”也应撤退。在梵蒂冈驻中国的代理人黎培里的指挥下，中国天主教会的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教徒的反动上层积极着手进行所谓“应变”部署，准备在蒋政权崩溃之后，隐藏下来继续从事反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就在当年，美国红衣主教史贝尔曼飞往中国，部署应变措施后离华，由华理柱主教坐阵指挥应变。其应变内容归纳起来有：

1.成立特务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

1947年夏，雷震远携其走卒金玉培来天津建立民众建国协进会，以便公开活动，受到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金玉培首先去津沽大学找校长刘乃仁，以便通过刘积极拉拢各堂口的上层教徒。一个星期以后，民众建国协进会在天津正

式成立，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胡梦华和稽查处长白世维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在文贵宾的赞许下，天津教区许多上层教徒和少数神父加入了这个组织。实际上民众建国协进会是“公教青年报国团”的外围组织，依样干的是特务活动。

1948年底，解放战争的烽火弥漫在华北上空，教会内的反革命势力也随之越发嚣张。有些天主教神父竟然放弃原来的宗教职业与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网罗逃亡到城市的地主恶霸之流的所谓教友，搞起了反动武装部队。是年十月，在北京出现的所谓“守护第七团”，就是这种性质的反动武装组织，天津教区的刘益民当时担任所谓随军司铎。其后，刘返回天津，成立“民众服务团”，在公信大楼设立招兵站，到处游说演讲，欺骗教友充当美蒋炮灰。文贵宾等帝国主义分子对刘益民的活动非常赏识。刘益民去望海楼招兵买马，该堂神父、国际间谍司义芳就亲自为他召集教友开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教友以刘益民为榜样，踊跃参加反动武装。甚至还有人用帝国主义分子雷鸣远的旗号来给刘益民扩张声势，称之为“雷鸣远的继承者”。刘益民在天津发展了三、四百名反动武装力量，然后亲自率领他们到津西稍子口一带驻扎。行前，教区组织了盛大欢送会，赵振亚在会上讲了话。至天津解放后，刘益民隐蔽在西开神父楼，由文贵宾资助潜至西北，后为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华北解放前夕，国际间谍雷震远从青岛赶来天津布置潜伏活动，会见教区主教文贵宾和副主教赵振亚。后“公教青年报国团”即转入地下，成立了地下工作队，仍由金玉堉任区队长。文贵宾又以天津西开中学董事长身份，将“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特务王际五及荷兰帝国主义分子满济世安插在这个学校，分别充任校长和监督司铎，借职务之便搞特务破坏活动。直到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时候，潜伏地下的“公教青年报国团”在天津还有所蠢动，结果被公安机关破获。

2.成立反动组织“圣母军”。

反动组织“圣母军”在天津的成立，不仅是本教区的一项重要“应变”措施，而且是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里和美国间谍华理柱等策划的全国性反共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天主教中央局”的下层的秘密组织。1948年，黎培里调爱尔兰帝国主义分子莫克勤来华。当年8月就派他到天津去发展反动组织“圣母军”，然后由天津向华北、东北各地扩展。

“圣母军”是一个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操纵的极端反动的秘密组织。它以“敬礼圣母”为招牌，“打进每个角落”，“选择具有价值的对象”，“千变万化地工作”。“圣母军的工作，根本是隐而不现”，其主要目的，是要和人民民主国家“作殊死的斗争，以推翻它的基础，在它的残碑断碣里树立起基督神国的旗帜”。这个反动的圣母军内部有极严厉的“禁诫”和“军纪”。“团员”要“绝对服从”，并须“迅速地、高兴地接受任何所不愿意的位置与命令”，“以求名符其实，真正成为一个军队”①。

解放初期，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圣母军”这个名字的反动性过于明显，容易引起人民政府注意，于是改名为“圣母御侍团”。在解放后“圣母军”的反动活动相当猖狂，针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造谣破坏。特别是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圣母军”展开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积极配合美蒋政权复辟。他们还从事收集情报的活动。

“圣母军”特别注意腐蚀青年学生的心灵。天津的津沽大学、西开中学、圣功女中等处的“圣母军”组织由帝国主义分子卜相贤、满济世、郑化民等直接负责。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阻止青年教友和中国共产党接近，向青年学生散发的百余种反动书籍，其中竟有题为《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的小册子。这些帝国主

① 《圣母军手册》。

义分子甚至利用参加“圣母军”的青年学生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青年团团员的黑名单，侦查、监视进步青年的行动。

其后，帝国主义分子们有些作贼心虚。1950年，“总部”召集各“区会”指导司铎和骨干分子会议，根据黎培里的指示，将“圣母军”二次改名为“圣母慈爱祈祷会”，转入地下活动。1951年3月，文贵宾命令张济众神父接替柏恩担任“总部”指导司铎。不久，郑化民对张济众说明了文贵宾采取这项措施的意图，他说：“我们外国神父吃不开了，你们中国人得出出头。”这主要是受到天津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冲击，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叫中国神父支撑门面，他们自己却退居幕后操纵。张济众识破了这一阴谋，遂向人民政府作了报告。在人民政府宣布接受外国津贴的宗教团体及文教单位应进行“专门登记”以后，“圣母军”企图通过登记取得“合法团体”地位。

当反帝爱国运动开展以后，“圣母军”的破坏活动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甚至发展到使用暗杀恐怖手段。1951年5月，荷兰帝国主义分子满济世在天津小白楼天主堂纠集特务分子王克明、三青团员李绪武和伪军官张子成等“圣母军”骨干饮血结盟，随即向爱国教友发出十三封恐吓信，接着又购买尖刀，准备向爱国教友住所投掷，当晚即被公安机关破案。至1951年7月，天津市军管会明令取缔“圣母军”，彻底粉碎了“圣母军”在天津背城一战的阴谋。以后，“圣母军”的反动骨干将反动文件销毁，将团员分散，还企图用化名、化装、代号以及“单线联系”等秘密方式进行地下活动。但是公安机关及时地逮捕了首要罪犯，教育了广大教徒，“团员”向政府进行了登记，纷纷退出了这个反动组织。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华北地区的这项“应变”部署破了产。

3.颁发反动命令，破坏革命政权。

1949年8月，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曾经颁发了一个极端反动

的、直接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干涉中国内政的手令。这是根据梵蒂冈的指示进行的。1949年7月13日，梵蒂冈颁发了一项天主教友应如何对抗共产党的命令，规定：凡积极坚持及追随共产党的主张的人，都要被开除教籍；凡接受共产主义学说或阅读共产党书刊的人，都要被停止圣事。文贵宾接到这个反动命令后，立即召集教区咨议会及各修会驻津办事处的中外神父十余人，集会研究在天津教区具体执行的方案。8月15日，文贵宾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方案行文签署颁布了题为《如何遵守罗马教廷1949年7月13日的命令》。文贵宾在这项手令中规定："凡接受共产主义道理的，……当然要给予革除教籍的法定处罚"，对一般教友"解释共产主义道理的书是被禁止的"，连报纸也只能"每个人应当按照良心看自己需要知道的"，而不许看"理论方面的东西"；他还禁止教友参加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公安大学、军政大学、职工学校，甚至连青联、妇联都在被禁止参加之列，如果参加，就"不能给他听神功及赦罪"。为了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还禁止教友参加南下工作团和人民解放军，如果参加的话，同样"不能给他赦罪听神功"。文贵宾将上述手令秘密发给各地传教士，要求他们在"圣母军"集会时，或讲道的时候逐条贯彻。文贵宾等帝国主义分子曾多次利用听"告解"的机会，用威胁恐吓等手段，禁止教徒接近共产，党禁止教徒参军、参工。然而，由于广大爱国教徒的觉悟日益提高，他们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4.举办"讲习周"。

举办"讲习周"，是帝国主义传教士在解放初期为了从思想上对教区神职人员进行反动训练所采取的一项"应变"措施。例如，天津刚刚解放的时候，津沽大学的卜相贤、西开中学的满济世等传教士就成立过所谓"圣奥斯定要理研究所"，对象是在各学校任教的教徒，神父参加的不多。他们在每周星期日的晚上，在西开"研究要理"，实际上是以反动书籍《现代问题解答》为

教材，由牧师们灌输反共思想，再通过信奉天主教的青年学生进行广泛传播。“讲习周”结束后，他们还曾命令各本堂神父继续准备讲题，准备再开“讲习班”。这一计划因各地天主教教徒们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而被迫中止。

5.对反帝爱国运动的疯狂破坏。

1950年底，全国各地的爱国教友已经开始酝酿以自养、自治、自传为宗旨的三自革新运动，北方以天津为倡导发起地区。消息传来，教会当局大为震惊。文贵宾先后数次召集教区咨议会与各修会驻津办事处的帝国主义分子研究对策。最后由郑化民起草了一篇题为《天主教对于自养自治自传运动的观点》的反动文件，于1951年1月13日派教区副主教赵振亚潜赴南京，送交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里审查，同时串连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教会当局采取一致步骤来抗拒反帝爱国运动。该文件后经上海“天主教中央局”署名为《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声明》印出，秘密散发各地。

就在赵振亚动身去南京的同一天，报纸上出现了《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这是继四川广元王良佐神父发表天主教革新宣言后，反帝爱国斗争在北方响起的第一炮，它唤起了许多爱国教友的觉醒。在宣言的号召下，广大教友纷纷要求在革新宣言上签名。文贵宾等经过反复计议，竟悍然宣布：“神父签名者摘权，教友签名者停止圣事。”与此同时，文贵宾在各堂口贴出布告，扬言中国天主教会根据梵蒂冈的指示已经成立“圣统制”，早已实现了自养、自治、自传，无庸再谈三自革新云云。广大爱国教友并没有受他们的欺骗。有的直接找上门去，质问文贵宾，爱国是否有罪。文贵宾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签名运动随即迅速展开，几天之后，在革新宣言上签名的教徒就达一万五千余人。1951年4月，天津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促进会宣告成立。文贵宾悄悄地在西开总堂的小堂门口贴了一张拉丁文公告，大意

是：促进会人员，无教区正权主教许可，擅自成立危害教会的组织，依照圣教法典条例，应受到开除教籍之处分。这张布告贴了一个星期，由于用的是拉丁文，除神父而外，教徒们都不清楚其内容。接着，文贵宾等帝国主义传教士向三自革新运动发起了新的攻势。首先是他们动员反动组织“圣母军”的成员在各堂口和学校里的教徒中间散发攻击三自革新运动的文件，并且散布谣言，说什么“革新就是背叛”，“促进会是魔鬼”，“天主教内没有帝国主义”……文贵宾甚至企图利用宗教恐吓手段，强迫签名的教徒向政府写信声明签名无效。他还指使荷兰帝国主义分子宁守道撕毁革新运动布告。帝国主义分子这样露骨地仇视反帝爱国运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罪恶目的，反而激起了广大教徒的无比愤慨。他们用控诉和驱逐的实际行动给予了天津教区的帝国主义分子以有力的回击。

（二）基督新教的“应变”措施

基督新教的“应变”措施，是设立应变咨询会议。应变咨询会议的负责人有英帝国主义分子海维德、白约翰、美帝国主义分子摩天恩和美国特务毕范宇，毕是掌握大权的人。委员中经常到会的有协进会总干事吴高梓、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前总干事蔡葵和其他基督教团体的负责人。在他们自己不能出席会议时，就叫其他工作人员代表出席。

以上各委员都是全国性机构的负责人，领导各地方教会、各地市会或分会工作。他们了解全国各地人事、经济、工作等情报，每周利用午餐时间聚会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召集。经常互相汇报各单位所掌握的情况，假若某单位召开了会议，就将会议的目的、内容、到会代表人数、代表的区域向大家通报。他们经常请各单位的旅行干事报告访问经过。曾经参加过应变咨询

会议和活动的中国教士高仁瑛于1962年写了《帝国主义分子在解放前设立应变咨询会议的阴谋》一文。他说：

> “1948年初夏，我从重庆、成都访问回来，蔡总干事就约我去该会报告了两个市会的工作情况、会员动态、募捐计划、工作人员短期训练的经过和各地与女青年会有联系的机关、团体、教会、学校等等情况。他们一面仔细听取，一面提出问题，还写下了详细的记录。”①

解放前，毕范宇曾在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是没有信仰的，解放后教会和宗教团体不可能照常工作。因此他提出教会要强调家庭礼拜，把礼拜分散到各个家庭里去；又主张把宗教团体化整为零，将全国性机构的工作集中到区，一切行政工作由各区负责。这种用家庭礼拜和设区的方式，可以保持各单位活动的继续进行，可以作攻击共产党的宣传。此外，帝国主义分子分散到家庭或区后，在必要时，他们可以逐步地退出中国。女青年会协会执委、英帝国主义分子白约翰的妻子曾说：“插一只脚进去，总比退出来的好。”

1948年秋，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驱使下，组织了应变委员会，委员由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和各部执行干事组成。当时决定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设立区办事处。王秀卿负责华西区（包括重庆、成都、昆明、汉口），办事处设在重庆女青年会。韦增佩负责华南区（包括香港、广州、澳门），办事处设在香港女青年会。高仁瑛负责华北区（包括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办事处设在北京女青年会。蔡葵总干事负责华东区（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办事处设在协会内。当时除华北即将解放未作安排外，其它三区都作了安排：美帝国主义分子韦安德在华西，斐容思、邢丽亚、达美灵在华南，英丽生、柏克德和

---

① 天津图书馆藏，1962年天津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第12册：高仁瑛《帝国主义分子在解放前设立应变咨询会议的阴谋》。

英帝国主义分子甘仁佩在上海。她们分散到各个区，占据了立足点，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华北区的应变计划的实施由应变委员会指定美帝国主义分子来其英做咨询人。她是一个美国记者，父亲是个传教士，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自称是个“中国人”。她曾任驻美的“中宣部”董显光的秘书。宋美龄在美国为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宣传时，来其英帮助她安排旅行日程。1946年，女青年协会募捐时，她走遍了各地女青年会，拍了二百多张照片，歪曲渲染中国人的贫病、无知，到现在，部分照片仍留在美国国务院，部分送到国民党派驻美国的“中宣部”，后转到台湾。

全国各区办事处的工作是在应变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那时沈、济、京、津四个市会的费用由区按月补助。各市会活动情况需要向区汇报，人事训练和人事调配也由区负责。应变咨询会议负责人之一的高仁瑛说：

> “我经常到来其英处了解一些时事和各地女青年会的消息，那时北京女青年会的董事、委员、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有去美国的、有去香港的。作为一个咨询人，我也和来其英谈了谈。我经常把四个市会的消息和华北地区办事处的工作情况写信向蔡总干事汇报，她把我的信和报告又汇报给在协会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各部执行干事。华北是解放较早的一个地方，所以一切消息帝国主义分子都视为珍宝，我的报告就成了她们的情报资料，被译成英文，寄往外国女青年会。”①

解放前夕，女青年协会除设区办事处外，还在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下，把相当于50亿人民币的存款买了美国政府的公债，企图打击中国经济。

解放前夕，女青年协会还策划了一个在台湾设立女青年会的

① 同前页注①.

阴谋。美国传教士邢丽亚在谈话中，一再强调共产党是不信宗教的，女青年会将来的命运如何是难以推测的。在她的影响下，1948年夏，学生部主任干事黄秀玑就去了台北，初步了解当地妇女工作情况，和设立女青年会的可能性。回来后，邢丽亚就倡议在台北设立女青年会，并在董事和委员中广泛散布反动言论。她说：

> “共产党是无神的，解放后宗教信仰一定会失去自由，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前途是可怕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不理想，但和美国政府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台北靠近日本，在那儿有美国驻军和美国新式武器，可以随时得到美国的保护。将来，协会在解放区不能继续工作时，可以把台北当作女青年会的根据地。”

在应变期间，华南区办事处就派她去台北成立女青年会。上海解放后，她与世界女青年会挂上了钩，一切人事和工作等直接向该会汇报，为世界女青年会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创造条件①。

（三）外籍传教士撤离大陆

天主教、基督新教的撤退是从1948年11月开始筹划的。1948年11月1日至9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召开了全国会议，专门讨论应变计划的实施和传教士的撤退问题。大部分基督教差会决定把传教士陆续撤退到香港和离中国较近的东南亚一带去。同时把领导班子分成两套，一套由少数留下的老一辈的传教士和中国籍教会领袖组成，一套由撤退到香港的差会总部组成，对中国教会继续进行控制和接济。传教士家属则全部撤退。当时美国卫斯理公会和美国南长老会决定多留下一些教士，在南方的四川等地的传教士暂时不撤退。教会学校有一小部分决定迁往香港或广州开

---

① 参见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第12册。

办，大部分决定留在解放区进行反控制工作，外籍教师大部分决定回家。慈善机关的传教士决定大部分留下。司徒雷登还给各教会大学发了一个指示，要各校制订“铁幕落下后应采取何种办法”，“有多少基督教工作可以进行”的计划；还要各校向美国大使馆上报“有多少教会大学毕业生或肄业生在共产党政府里工作”等情况。

1949年2月，即在南京解放前两个月，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驻上海的代表方威廉召集在华东的教会大学的校长和一部分教授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南京如果解放，教会大学应如何对付的问题。方威廉要求各教会大学继续执行托事部和各个差会的既定方针，不要与共产党合作，强调教会大学有其“独立性”，共产党不能干涉教会大学的校政。他在会上还说，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愿意继续津贴在华各教会大学，但有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保持教会大学的行政权和人事权；二是必须允许教会大学有宗教自由；三是必须维持教会学校的学术研究自由。依了这三个条件，美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汇来。

天主教方面也决定撤退一部分从战区逃出来的传教士，但是绝大部分传教士却打算仍留在中国。罗马教皇庇护十二给中国天主教各修会下达了一道“紧急指令”。内容是：

> “（1）参加共产党或对共产党表示热忱，是不合法的；（2）出版、宣传或阅读载有共产党人的理论或行动的书籍、杂志、报章，或在那些刊物里撰写文章，是不合法的；（3）凡任意作过上两项事情的教徒，照通常原则，情性不正者，不得参与圣贞祭礼；（4）信仰共产党唯物主义，反宗教理论的教徒，尤其是那些为这种理论去辩护和宣传，作为天主教的信徒，无条件地要

受到被教廷驱逐出教的特别处分。”①

教皇颁布的这个“紧急指令”，全名为《天主教会应当如何对抗共产党》，它是在1949年7月13日发出的。在华各修会收到命令后，都立即召集紧急会议传达和部置执行方案。华理柱要求所有教区都必须将传达和执行情况向上海汇报。例如在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在收到教皇命令后，立即开会传达，并拟订了一份手令，叫做《如何遵守罗马教廷七月十三日的命令》，于8月15日分发给该教区所属的各教堂、各学校和慈善机关。并且还作了若干附加规定，如，“凡接受共产主义道理的，要开除教籍”，“禁止向教友解释共产主义的书籍”，“禁止阅读共产党报纸上的理论文章”等等。后来，文贵宾又规定不准天主教徒参加政府工作，不许同共产党合作，还禁止中国神甫穿人民装（中山装）。他说：“外表的变化会引起内在思想的变化。”他要求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绝对服从他的命令，绝对效忠教皇。

但是天主教的这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措施，虽曾蒙蔽了一些天主教徒，但骗局终究被拆穿了。在人民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爱国一家的感召下，许多教徒包括一部分中国籍神职人员开始识破了帝国主义的阴谋。

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4月5日，穆德突然又来到上海。穆德在上海只停留了二十个小时，进行着非常紧张的活动。他首先召集留沪的各基督教差会的主要传教士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的外籍负责人听取汇报，要求他们稳住局面，强调基督教的“普世性”，中国教会必须与世界的基督教保持联系，不能单独行事。随后由“协进会”出面召集各差会中外领袖举行“紧急会议”。当时一共出席72人，其中外国传教士24人，中国籍各教会和附属机构的主要负责人48人。会议开了七、八个小时之久，讨论和布

① 《新华月报》，第4卷，第5期，1951年9月。

置了上海解放后基督教应如何行动问题。归纳起来，穆德在这次“紧急会议”上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现在看来，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国民党虽然打算住长江以南地区，但估计无法抵御共产党的强大军事攻势。面对这种情势，必须准备在共产党新政权下尽最大的努力，继续推进上帝的教会。

（2）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它所许诺的‘宗教自由’可能是一种宣传攻势。中国教会的领袖们要有忍受苦难、坚守职责、背起自我牺牲的十字架精神。

（3）要尽可能地稳住教徒，不要让他们被共产党的宣传所欺骗，要对他们进行“顺从上帝”以及“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教导，让他们永远忠于上帝，忠于教会。一旦不能在教堂做礼拜，可转入家庭，并保持联络。

（4）你们若忠实执行以上三条，我们美国教会决定继续支持中国教会，包括道义上和财力上的支援。

（5）目前国际局势非常严重，美国不会容忍中国被俄国所控制。估计中国教会忍受苦难和迫害的时间不会太长，我们还会回来的，愿上帝与你们同在，我们在祈祷中将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教会。①

会议一散，穆德又到新天安堂公开讲了一次“道”，主要目的是企图稳住局面，给基督教会打气，一再强调教会的“普世性”，要求不论遇到任何环境都能在宗教信仰上不动摇，并公开表示美国教会决不抛弃中国教会，要在各方面想尽方法支援中国教会。

当时穆德已经是八十五岁了，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给在华传教士和教会领袖打足了气。

---

① 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26页。

1949年4月21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横渡长江，随即解放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作鸟兽散。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观望。五月间，当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的时候，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5月16日又召集在上海的各基督教差会的传教士举行了“紧急应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所谓“基督教紧急委员会”，部署了上海解放后各差会的应付办法。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南下，1949年7月8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广东分会在香港召开了所谓“宣教同工夏令会”，对基督教在广东的活动进行所谓“检讨”，研究如何应付即将临到广东省的所谓“共产党的挑战”，要求在华南各基督教会“坚持信仰”。这个分会早在4月间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上即已决定传教士“不论时局如何变迁，决不撤退”。他们一直到解放广州时大部分都还留在那里。因此，传教士的撤退虽然是从1948年初就已经开始，但一直延续到1951年春才从大陆全部撤走。他们对于在中国经营了一百多年的传教事业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都向中国教徒表示：撤退是“暂时的别离”，“时间不会很长”，“我们还要回来”。美国传教士柏仁生甚至把自己比作耶稣，向中国教徒宣称：“我必再来。”

这就是传教士在中国大陆上所表演的最后一幕：撤退。司徒雷登在南京因无事可做，终于在1949年8月2日悄然离开南京。公安部门于1951——1953年间，先后把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

至此，以传教为掩护的西方殖民者全部被赶出了中国。历史上经历近四百年之争的教难、教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一去不复返了。

附录：

中国教案及民教纠纷简表

年　代	地区	参加者	原因和结果	史料出处
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	全国范围	皇帝颁诏令	“岂西方之教与我抗衡乎？”从此基督教终止在中国流行近四百年。	《旧唐书·武宗本纪》。
元末	全国范围（蒙古除外）		朝代更迭。从此基督教在中国湮灭近三百年。	《元史》卷134、143等。
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	浙江宁波双屿岛	朝廷军队	帝令荡平葡萄牙盘踞的双屿岛。杀葡教士、教民八百人。	《历史知识》1983年第6期。
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	广东肇庆	民众	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初入中国，欲在肇庆建堂。民人以破坏“风水”为由，反对建堂，驱逐教士。	《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2卷，第11章。

（续 前）

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	江西、江苏苏州等地	官绅、士子、民众	宣教内容与儒学相悖。全国发生五十四起驱逐教士案。	《利玛窦中国札记》；曾德昭：《Semedo Histoire》318页。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	南京	礼部侍郎、御史沈潅发动官绅	宣教内容与儒学相悖。大部分教士被逐，囚禁二十五人于广州。	曾德昭：《Semedo Histoire》，第310——318页。
1633年1月（崇祯六年）	台湾淡水	高山族人民	西班牙神父到淡水传教，被杀死。	《台湾通史》，卷22，《宗教志》，“景教”。
1633年8月	台湾附近海面	台湾水手	爱斯基妥等二教士乘船赴日本。教士被杀死，割耳、鼻示众。	《台湾通史》，卷22，《宗教志》，“景教”。
1633年	西藏	喇嘛	五位耶稣会士进入泽不兰地区传教，并和西藏土王勾结，企图使喇嘛还俗。五名会士被喇嘛扣留，死人三人，其余二人于1635年被驱逐出西藏。	Desideri：《An Account of Tibet》，George Rontledge and Sons Ltd, 1937年伦敦本，第8页。
1636年7月（崇祯九年）	台湾淡水	高山族人民	神父基洛乘西班牙军舰调查资源。人民用弓箭进攻军舰，杀死神父。	《台湾通史》，卷22，《宗教志》

（续 前）

1640年（崇祯十三年）	西藏	藏民	印度果阿主教派马柯斯等三名耶稣会士潜入西藏阿里地区。藏民反对传教，拘留教士二人，逃跑一人。	Descdrei：《An Account of Tibet》，George Rontledge and SoneLtd，1937年伦敦本，第17页。
1659—1665年（清顺治十六年—康熙四年）	北京	钦天监官杨光先发动在朝官吏	历法之争，制造冤狱，教士多人被囚禁。	阮元：《畴人传》卷36。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	全国范围	广东碣石镇总兵奏请驱逐天主教，康熙帝发上谕	在华天主教各派“礼仪之争”，清廷改变了支持传教的政策，从此开始了清代的禁教时期。	《圣祖实录》卷272；王之春：《国朝柔远记》。
1723年（雍正元年）	全国范围	浙闽、两广总督奏请再禁天主教	继续执行康熙末年的教禁，除老年教士在京效力外，余者皆驱往澳门。	《世宗实录》卷37；《朱批谕旨》，雍正元年。
1726年（雍正四年）	山西	上谕	耶稣会士与教徒苏努参与谋立皇位事发。狱案大兴。囚苏努全家族。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

（续 前）

1729年（雍正七年）	山东历城县、临清州等	布政史费金吾发动	执行教禁谕旨，天主堂一律改为公所。	《朱批谕旨》，雍正七年。
1730年6月（雍正八年五月）	浙江杭州	兵部尚书李卫发动	执行教禁谕令，刻石立碑永行禁教。	杭州天后宫《灭教碑记》，载《越风》杂志，第廿三、廿四期合刊。
1745年（乾隆十年）	西藏	藏民	罗马教廷四年前派九名传教士入藏传教，藏民反对传教，教士全部被驱出西藏。	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第7页。
1748年4月（乾隆十一年五月）	福建省福安、福宁	巡抚周学健发动	曾被押到澳门的教士费若用，又潜往福建传教。所有被抓获的外国传教士全部被杀。	《高宗实录》，卷267。
1746年10月	湖北襄阳、江夏等地	湖广总督鄂弥达奏报	教民旷云章等被捕，拟定“律斩监候”。	《高宗实录》，卷275。
1747年（乾隆十二年）	江苏苏州	知州上奏	“洋人散布邪说，煽惑良民”，传教士黄安多、汉方济被绞死。	《高宗实录》，卷288。

（续 前）

1747年	江西鄱阳、山西、陕西、直隶、京师、南京、湖北谷城、四川、山东、湖广等省	江西鄱阳县知县奏疏，各省大吏奉命禁教	外籍教士李世辅抗旨潜赴各省传教，事发，各省教士及所有被牵连教民都被逃往南昌“永远牢固拘禁”。在南京囚五名传教士，定绞罪。在湖北谷城，教民一百五十多人被捕。在川、晋、陕、鲁、湖广等省大吏奉旨禁教，搜捕教士、教民数百人，押解南京监禁。	《高宗实录》，卷288、463。
1753年（乾隆十八年）	福建龙溪等县、湖北襄阳	两广总督陈宏谋派兵查拿教士	传教士潜往内地传教。张若瑟等五名教士被监禁，所获教民枷号、军徒。	《高宗实录》，卷429、440、491。
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	湖北沈垭地区	当地人民	沈垭地区人民反教，逮捕洋教士及教民一百零五人。	《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784年	全国性大教案。由于地方官在湖北襄阳查获潜入内地的传教士四名，牵涉到江南、江北各省潜入内地的数十名教士，清廷下令在全国各地进行搜查。			
1785年乾隆四	湖北襄阳	鄂省大吏	传教士吧地哩呋等四人及刘绘川等教徒被查拿，并供出湖	《高宗实录》，卷1213。

（续 前）

十九年—五十年）		南、西安传教情况。上谕查拿湘、陕两省的教士、教徒。	
湖南湘潭、武陵、沅江等县	湘省奉命查教	襄阳被获之教民供出广州及湖南湘潭、武陵县教民活动情况。其中，教民李大供出广州及四川教民情况。	《高宗实录》，卷1214，第4—5页。
广州	粤省大吏	巡抚孙士毅奉旨按名查拿，查获广州主教罗玛当家、教士艾球三及教徒蔡伯多禄、谢伯多禄等多人。	《高宗实录》，卷1214，第19—20页；卷1218，第18页。
四川眉山县、成都、	省、县官吏及兵丁	奉上谕，按湘潭教徒李大供词查拿。在眉山和成都抓获传教活跃、刊刻《圣经》、《圣母玛利亚》画像的教士、教民数十人。	《高宗实录》，卷1215，第1—2、7—8页。

（续 前）

浑沅县等			
西安	西安官吏	根据襄阳教民刘传盛等人供词。在西安发现天主堂多处，教徒焦振纲父子供出山西、陕西渭南传教士、教徒多人。	《高宗实录》，卷1216，第18—19、33—35页；卷1217，第4页；卷1218，第18页。
山西祁县、洪洞县、大同、潞安府等地	山西官吏、兵丁	奉上谕，根据西安焦氏父子及渭南县杜兴智交待，查拿意大利传教士安多呢等人及教徒秦禄等。	《高宗实录》，卷1219，第3—4页；卷1218，第20—22页。
陕西渭南县	陕西官吏	奉上谕，根据西安焦贵明供出教徒名单进行搜查。捕获中国教士数名，外国传教士呢吗·方济格等三名，教徒数十名。	《高宗实录》，卷1218，第20、22、26、27页。

（续 前）

四川全省范围	官吏	杜兴智交待数十名传教士已潜入湖广、川陕、直隶、山东等地。搜出西班牙冯若望、李多林、吧地哩呋哂等三名教士和教徒多名。	《高宗实录》，卷1225，第3—4页；卷1227，第12、13页、15页
甘肃凉州、甘州	官吏	奉旨查拿，搜出教民张继勋、刘志虞等。	《高宗实录》，卷1221，第3—4页。
江西临川等地	官吏	奉旨查拿，抓获法国天主教教士方济觉（即弗兰斯葛）及教徒多名，并发现广州教士在临川有大量田、房产业。	《高宗实录》，卷1229，第31页；卷1254，第1页。
湖广	官吏	奉旨查拿，搜获意大利传教士吧地哩呋及教徒多名。	《高宗实录》，卷1221，第3—4页；卷1227，第12—13页。
直隶	省大吏及知州、知县	奉上谕，据各省教士、教民交待，在涿州、冀城等地大搜捕，拿获传教士汉色勒木及多名教徒并中国神父数十名，牵涉全省各地。	《高宗实录》，卷1218，第26—27页；卷1219，第3—4页；卷1221，第1页。

（续　前）

	山东全省	官府查拿	奉旨在全省搜查，抓获雷西泽诺等意大利教士四名，并供出广东教徒多名。	《高宗实录》，卷1221，第15页、第28—29页。
1805年（嘉庆十年）	北京、江西	京都官吏及江西大吏	罗马教廷收书出教徒陈若望递交在京传教士，陈若望南归时被抓获，搜出中国地形路线图一张。清廷认为此图系罗马教廷所要，之后转给英国作为进攻中国的路线图。绝大部分在京供职的传教士被押送回澳门。	《仁宗实录》，卷142；《清代外交史料》卷1。
1811年（嘉庆十六年）7月——1814年3月（嘉庆十九年）	北京及全国范围	官吏奉皇帝上谕查拿	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嘉庆上谕，查拿在京供职以外的西方传教士，发现大量旗人习教，各省都有习教者。遣传教士四名回国。	《仁宗实录》，卷243、246。
	西藏	地方官	“夷人马齐，串同通事汉人赵金秀到藏传教”，奉旨查获。	《仁宗实录》，卷251，

（续 前）

〃	贵州省城、思州、平越等地	地方官吏	给事中袁报贵州传教、习教者近千余名，上谕严惩，拿获教徒百余名。	《仁宗实录》，卷254，第19页。
〃	湖北京山等地	地方官吏	全国查拿教士、教徒，京山县教民刘义等九人投案自首，牵涉教徒多名。	《仁宗实录》，卷269，第9页。
〃	广东香山等县	总督	据报发现粤省信奉天主教者多人，尤以妇女为多，督抚下令严查，并制定除邪恶、安良善的政策。	《仁宗实录》，卷272。
1815年11月（嘉庆二十年十月）	湖南	官吏	传教士继续潜入内地传教。湖南抓捕教士兰月旺等，后被杀。	《国朝柔远记》，卷7，第10页；《仁宗实录》，卷300，第23—24页。
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	四川巴县	地方官吏	嘉庆十六年教案余波，川省逮捕教徒何深海等。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3—12页。

（续 前）

1839年（道光十九年）	湖北	地方官吏及人民	鄂省查拿传教士，逮捕外籍教士董文学，解往武昌处死。	《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浙江定海上海	当地人民及官吏	法教士顾铎德潜入定海建堂传教，遭人民反对。上海发生“还堂”事件引起中外交涉。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第178—179页。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西藏	地方官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约瑟则噶毕等二人赴藏传教，被拿获，押送回澳门。	《宣宗实录》，卷430，第11—12页。
1846年初	全国范围	清廷	法教士二人潜入内地，游历十二个省，被查获，引起交涉。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76。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湖北	官吏及清廷	西班牙天主教士纳巴罗潜入湖北传教，被抓获，押解至广东。	《宣宗实录》，卷438，第3页。
1847年	上海徐家汇	民众	法教士强占民田公地建教堂，人民愤起围攻教堂。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江西鄱阳吴城镇	官吏	教士公开设堂传教，知县派兵弁拆毁教堂。	夏燮：《中西纪事》，卷21。

（续 前）

1848年	四川	官吏与民众	法教士罗启桢潜入四川传教，被驱逐出境。	《筹办夷务始末》。
1848年	江苏青浦	民众	英教士麦都思等三人擅自入青浦传教，无故殴打中国百姓，激众怒，群起痛打三名教士。英驻上海领事令英舰封锁上海港。清廷逮捕中国百姓十名，枷号示众，赔银三百两。苏松太道台咸龄被革职。	《筹办夷务始末》；夏燮：《中西纪事》。
1848年	福州黄竹岐	民众	法国教士借口“还堂”强占黄竹岐地方，并侵占茔地。人民与教士发生冲突，互有伤亡。清廷持强硬态度，使法领事自知理亏作罢。	《宣宗实录》，卷451—455。
1850年11月（道光三十年十月）	内蒙翁牛特旗	巴林札萨克多罗郡王那木楚克呈报	法教士二人被该郡王盘获交热河都统衙门，转解广东饬交该国领事，并向各国声明：除五口外不准洋人潜入内地传教。	《文宗实录》，卷18。

（续 前）

1850年	福州	民众	英教士借口条约中有“侯官县田印”，强占神光寺，遭到人民反对。此是近代史上最早因教士“租房”引起的教案。当年，在全国共发生三十五起。	《道光三十年七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奏折》。
1851年（咸丰元年）	松江府华亭县	民众	教士赵方济讨还教堂旧址。清官吏认为“只给还该处奉教之人”，“法兰西不得过问”。引起交涉，传教士讹诈没有得逞。	《文宗实录》，卷41，第2—3页。
1852年（咸丰二年）	浙江定海	民众	法教士、教民霸占庙宇、寺院六处，官民与“天主堂”交涉，夺回庙宇。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第178—179页；卷7，第225页。
1853年5月（咸丰三年四月）	直隶安肃县（今徐水）	官吏	总督讷尔经额奏报该县尖家庄习教达数百户。奉旨严查，下狱多人。	《文宗实录》，卷89，第32—33页。
1854年4月（咸丰四年三月）	直隶安肃县（今徐水）	于总薛五堂	法教士孟振生在安家庄传教，被查获，将孟振生解回广东。	《文宗实录》，卷126。

（续 前）

1856年（咸丰五年）	江西鄱阳县吴城镇	知县派兵	再拆毁教堂改建龙王庙。	夏燮：《中西纪事》，卷21。
1855年8月	湖南衡州	民众	法教士强迫教徒按天主教“初夜权”举行婚礼，女方反对，群众殴打教徒，法教士逃往汉口。	《衡州府志》。
1856年（咸丰六年）	广西西林	知县张鸣凤	法教士马赖潜入西林传教，为非作歹，奸污妇女，被知县处死，法国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订立《天津条约》，赔银二百万两。	《文宗实录》；夏燮：《中西纪事》。
1857年10月（咸丰七年八月）	热河朝阳县	咸丰帝	外国教士违约潜入松树嘴子地方建堂传教，谕旨不准建立天主堂。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7，第591页；卷20，第706页。
1858年4月（咸丰八年三月）	天津	咸丰帝	法教士孟振生派人到天津传教，咸丰谕批“禁止”。	《文宗实录》，卷234，第4—5页。

（续 前）

1860年（咸丰十年）	天津	民众	法国教士在望海楼建教堂，并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众的愤怒，遂成为1870年天津大教案的导因。	《文宗实录》，卷1—10。
1860年	北京	官府及民众	法主教孟振生讨还“旧址”，索还教堂，英、法联军进行威胁，达到了目的。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58—259页。
1861年（咸丰十一年）	山东济南	民众	德主教江类思索还西门内废弃教堂旧址，低价强买民房，用暴力驱走居民数十家，引起民愤。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山东巡抚清盛奏折》。
1861年	山西绛州	官府	教会讨还“旧址”，非法强索绛州书院，最后以绛州东雍书院作抵，另强占土地四十三亩。	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恭亲王奕䜣奏折》。
1861年	湖北省城	官府	法国主教徐伯达讨还教堂“旧址”，官府据理力争，无效，教士野心如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法国照会》。

（续 前）

1861年	直隶各地	官府	法国教士借口“还堂”，要求还堂十二处，总理大臣奕䜣满足教士无理要求。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卷第24页。
1861年	山东济南	民众	法官员指定某地为教堂旧址，要求“还堂”，引起群众反抗。总理衙门退让应允。	咸丰十一年四月十日《恭亲王奕䜣奏折》。
1861年4月	贵州青岩	贵州巡抚何冠英等大吏支持人民。	法国教士胡缚理乘坐紫色大花轿，招摇过市，激起民愤。省巡抚及提督派兵搜查天主堂。贵州各阶层人民起来，处死教士三人，引起中法交涉。	《穆宗实录》，卷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39、43页。
1861年	贵州贵阳	候补道台缪焕章号召群众。	“屏黜异端”，群众起反教，清廷派兵镇压，赔银一万二千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7。
1861年	湖南湘潭	绅士、民众、考生	公议驱逐天主教，并撰写檄文，教士逃匿他处。	夏燮：《中西纪事》，卷21。

（续 前）

1861年	江西南昌	民众及士子官绅	法国传教士罗安当恃《北京条约》横行不法。民众驱逐罗安当，拆毁教堂，后赔款二万元。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
1862年（同治元年）	江西南昌	民众及士子官绅	继上年民众反教、毁堂，后赔款二万元给九江琵琶亭地方建教堂。民众再起反抗。	《沈文肃公政书》卷1；夏燮：《中西纪事》，卷21。
1862年	贵州开州（今开阳县）	知州及民众	法国教士寻衅报复青岩教案之事。民众祭龙神，教士文乃耳搅乱。知州戴鹿芝下令处死教士文乃耳等四人。法纠合美、英、俄公使以武力要挟。交涉三年，赔款白银一万二千两，另外拨地建堂，处死无辜百姓八人。	《开阳县志稿》第9章，“宗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第46页；《穆宗实录》卷35、41。
1862年初	湖南衡州（今衡阳）	乡试考生及民众万余人	教会“邪妄奸污，肆无顾忌，士民受害最酷”。考生焚毁教堂，拆毁教民房屋。	《穆宗实录》，同治朝；牛应之：《雨窗消意录》。

（续 前）

1862年	贵州遵义等处共九起教案。	民众、知县曾璧光	教民挟嫌启衅，民众愤而令教民“跨越十字架”，囚教士三人，杀教士两人。百姓数人抵命，赔款三万元。	《穆宗实录》，卷262、264、286、290。
1862年	四川酉阳	民众	教民龙秀云逼村民朱永泰退婚；杀、掠、烧朱家。人民愤起，杀教士李国及教民一百余人，焚毁教堂。	《穆宗实录》卷250。
1862年	江西南昌	民众	受湖南人民反教影响，大吏夏廷矩、刘长浔鼓动人民反教，毁教堂数处。	《沈文肃公全集》。
1862年	上海	民众	传教士讨还“旧址”，强占关帝庙。清廷使用武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将关帝庙交给教会。	〔法〕史式徽：《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第34页。
1862年	山东济南	民众	教会讨还“旧址”，引起纠纷。赔款三千余两，强迫村民数十家搬迁。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4。

（续 前）

1862年 5月1日	湖南 衡阳	民众	法教士借口查康熙时所设各州县教堂堂址，侵占民地，重建教堂。民众愤而焚毁教堂。	王闿运：《衡阳县志》；《湘军志》。
862年	浙江 宁波	民众	传教士为扩建教堂，强拆教堂附近民房，引起民教冲突。清廷妥协，允教士建堂。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76年第2期。
1862年	浙江 湖州	官吏、 民众	美教士韩明德伪造地契，强占地基二十余亩，引起官吏民众的强烈反对。清廷为避免事态扩大，承认伪造地契。	同上。
862年	浙江 海门	民众	教堂强占一寡妇的养老田，民人反对。最后教士阴谋得逞。	同上。
1862年	西藏	官吏 民众	法教士罗勒拿等欲入藏传教。驻藏大臣奉谕旨“不准来藏”。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24—25页。
1862年	黑龙江 三兴	官方	法教士至三兴传教，清廷禁止，押教士回广州。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0—21页。

（续 前）

1862年	江西南昌	民众、考生	法教士在省城传教，教士谒见当地大吏，用平行礼，绅民不服。拆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数十家。后赔银二万两。	〔德〕花之安著：《民教相安》；另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
1862年	直隶正定	民众	法教士索要“正定府城内崇因寺或曾为行宫之房基”。清廷令将该地交法国教会。	同上。
1862年3月	江西进贤	民众	受南昌教案影响。惩办教民陈姓等数家，法国教士逃走。	夏燮：《中西纪事》卷21；《直省洋教成案》，第33—36页、53—54页。
1862年	直隶唐山	县吏、民众	教民“拖欠银钱”，县令催款，“教士怒骂不止”。激成教案，县令被革职。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监察御史华祝三奏折》。
1863年（同治二年）	台湾高雄	民众	神父桑英去屏东传教，百姓刺伤桑神父，剥其衣服示众。	林子侯：《台湾涉外关系史》，第4编，第5章。
1863年	四川遂宁等县	民众	教民逞凶，诉讼官府，教民反胜，民众被残害数人。	民国《巴县志》，卷16。
1863年	江西南昌	居民	反对教士罗安当入城。打伤县役。	《穆宗实录》，卷67。

（续 前）

1863年	四川重庆	民众	教士范若瑟蛮横拆除长安寺，修建真原堂。人民捣毁真原堂及教士住宅，争回长安寺。	民国《巴县志》，卷16，“交涉”；《清档·教案档》，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1863年	云南昭通	总兵之子及部分军官	法籍教士田希嘉入城传教。总兵福陞之子率数十人，入田希嘉住宅，捣毁什物。昭通知府及参加人员受处分或查办。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3。
1864年（同治三年）	山东登州	民众	美教士梅礼士强占民房，人民反对，遂成教案。	同上。
1864年	台湾万金	民众	群众在万金天主堂前放火，教徒救火，群众殴打教徒，并将教徒烧死。	连横：《台湾通史》；林子侯：《台湾涉外关系史》。
1864年	山东蓬莱	民众	美教士密尔斯横行乡里，强占黄寡妇产业，引起冲突。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2，第258—262页。
1864年	湖南湘潭	士民	传教士方安之横行不法，士民拆教堂，焚毁有关书籍。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三年元月湖南巡抚恽世临元月二十八日奏。

（续 前）

1864年	西藏	官方发动，僧侣参加	“藏中因洋人传教，人心惶惑”，官方在全藏查拿入藏传教士。	《穆宗实录》，卷90，第12、14页。
1865年2月（同治四年正月）	四川酉阳	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及乡绅士子	教士、教民横行，奸污妇女致死，教士玛弼乐支持教民横行。人民愤起拆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杀死法教士玛弼乐，打死教民一人。议结百姓抵命，赔偿白银八万两。	《穆宗实录》，卷15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1865年	四川彭水	民　众	受酉阳人民反洋教斗争影响，抢毁教堂及教民数百家。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1。
1865年	四川重庆	民　众	川东主教范若瑟再次强占崇因寺（长安寺）改建教堂，群众打毁天主堂及教民房产多处。后赔银十五万两，川东道吴镐降级留任。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1。

（续 前）

1865年	贵州 永宁	民 众	教士、教民恃势为非作歹，民众杀教士一人、教民五人。官府捕谋众二十九名，十五名群众死于监狱。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8；《穆宗实录》，卷163。
1865年	贵州 普安	普安厅同知钱墉	张贴反教告示，法教士胡缚理指控钱墉。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7。
1865年	贵州 贵定	民 众	教民黄丙扬杀死李老大之子，并殴打李老大。激起众怒，将黄夫妇杀死。教士胡缚理袒护教民，为之代诉。清廷偏袒，教民胜诉。	同 上。
1865年	贵州 大定	练 勇	法副主教梅西满过境时，被云南练勇抢去行李。后，三名兵丁被处死。	同 上。
1865年 11月	台湾 万金	民 众	英国教士调查当地民俗。民族首领懿耶率数百群众，焚毁万金教堂。	同 上。
1865年	台湾 凤山	民 众	当地民众反对传教，打凤山沟仔乾天主堂，及长老会教堂。	同 上。

（续 前）

1865年	浙江会稽	居民商友生、地方官	法教士田某利用《梧德固协议》强买居民商友生房产，发生争讼。李鸿章通饬传教士在内地买房置产为“合法”。	《直省洋教成案》，第33－36、53－55页。
1866年（同治五年）	直隶、宁晋	张洛代父子	教士艾某同教民四人到张洛代家“诵经治妖”。张洛代父子炸伤教士及教民四人。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
1866年	福建厦门	民众	教士抢劫店铺，枪杀店主。民众焚教堂，殴打教士。	同上。
1866年	河南南阳	乡民、士子、官绅	传教士“索堂”，遭人民反对。教士强占府城内江浙会馆。	同上。
1866年	贵州永宁	民众	新寨地方洋教士及教民焚掠烈山村，杀群众百余人，激起了民愤。烈山村村民杀死洋教士三人，清廷派兵镇压。	同上。
1866年	陕西西安	官吏、乡民	教士称“陕省所定交还天主教堂，必须出银取赎”，激起民愤。交涉五年，教士取胜。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45。

（续 前）

1866年	江苏南京	民众	交涉还堂“旧址”，教士强占新地，引起民愤，酿成事端。法国军舰围城，清廷屈服。以小挑地方抵作堂基。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穆宗实录》，卷168。
1866年	安徽安庆	民众	法教士买双莲寺房产，民愤而反抗。迫使法教士退田，另外择地建房。	《曾文公全集·批牍》，卷6，第78页。
1866年	河南南阳	民众	教士强行在城西十二里村庄里“修筑圩寨，既易建堂，又可自卫”。民众反对，但清廷确认了传教士在中国“享有收藏军器，进行武装割据”之权，开了教士在内地建寨筑圩的先例。	《直省洋教成案》，第35—47页。
1866年	北京西山	官府 民众	教士指要民人陈文林私人田产。法国公使出面要求京西山林一处，四面以巅为界，周可五十余里。悬案未决。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樊国梁：《燕京开教略》。

（续 前）

1867年（同治六年）	台湾凤山县	民 众	民众反对传教，火烧长老教会，杀死一名传教士。	林子侯：《台湾涉外关系史》；《台湾通史》，卷22。
1867年	台湾台南	民 众	教士马雅各到台湾传教，人民毁教民住宅。	同 上。
1868年（同治七年）	台湾凤山	民 众	传说教士拐骗儿童，破胸以制药，民众拆毁教堂，打死教民二人。	同 上。
1868年	台湾台南	民 众	受凤山教案影响，焚毁小东门教堂。	同 上。
1868年	江苏扬州	民 众	法国教士金缄三创办慈善堂，虐杀儿童。仅1868年被虐待致死的婴儿就有“四十多个”。人民怒烧教堂。	《穆宗实录》，卷243。
1868年	河南南阳	民 众	受扬州教案影响，传帖集众，烧毁教堂。	同 上。
1868年	直隶献县	官 兵	天主教法国教士徐博理运送军火，并拦截民车。官兵打伤教士，劫走军火。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1。

（续 前）

1868年	四川 酉阳	团民何彩、民众	法教士李国组织教民武装奴役人民，教民勒索百姓，强奸妇女，抢劫财物，激起众怒。群众奋起与教党武装相抗。教会杀群众145人，伤700余人，烧民房100多户。群众攻入县城，打毁教堂，杀毙李国及教民多人。清廷处死民众二人，流徙十人，赔银三万两。	古洛冬：《圣教入川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5；《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第78页。
1868年	酉阳 纸房溪	乡民受县城影响	民众打毁纸房溪教堂。传教士指挥教民武装杀毙百姓多人。当地县吏命令教堂拆毁炮台、寨堡。法国使臣以带兵入川相要挟。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
1868年	贵州 永宁	民众	受酉阳教案影响，民众攻打教堂。	《穆宗实录》，卷266。
1868年 11月	四川 秀山	民众	响应酉阳人民反教斗争。民众攻打教堂。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1868年	四川 黔江	民众	受酉阳教案影响，民众攻教堂，惩办不法教徒。	同上。

（续 前）

1868年	南京下关	民 众	法教士估买陆姓房产，清廷不顾民愤，满足了教士欲望。	《曾文正公全集》，第6卷，第78页。
1868年	湖北武昌	民 众	英国福音堂收买土地，引起民教纠纷。	《直省洋教成案》。
1868年	盖州	民 众	法天主堂勾结税务司马某买地。天主堂如愿。	李翰章：《通商章程·成案汇编》。
1868年	江苏镇江	民 众	英教士强行租地建堂，曾国藩强迫人民让地，建筑教堂。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1868年	江苏扬州	民 众	英教士戴得生租地建堂，民众烧毁教堂，赶走教士。	《清季教案史料》第5—15页；《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1868年	台湾凤山	民 众	英教士马某在埤头购地强行建堂。民众毁堂，赶走教士，中英交战。	《清季教案史料》，第16—26页。
1868年	河南南阳	民 众	英、法、美教士进城建堂。人民反对，使教士不得进城。清廷派兵保护教士进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法国照会》132号。

（续 前）

1869年（同治八年）	安徽安庆	乡试考生	法教士韩石贞、英教士唐道生、卫养生强买民房十五间，并乘轿招摇过市，激起民愤。考生烧毁天主教堂、耶稣福音堂及教士住宅、围墙。法军舰威协，最后赔款五千元。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9；《穆宗实录》卷269，第10—11页。
1869年	江苏淮安	民众	法国传教士强占地基。清廷压制人民，以遂教士之心愿。	《教务纪略》。
1869年	贵州遵义	民众	教民杨希伯纠众打毁类帝庙神像，民教争殴。群众打毁天主堂及教会医院，打死教士一人，群众被打死20多人。清廷处死民众一人，四人判徒刑，赔银三万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7、70；《穆宗实录》卷266，第10—11页，30—31页。
1869年	贵州兴义	官绅	知府孙彦清号召人民反教，团首刘观得杀教民。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4。
1869年	贵州安顺	民团团首文际昌	民团仇教，攻教堂，杀教民。	同上。

（续 前）

1869年	贵州独山	民众	受遵义教案影响，阻拦教士进城。教士不得入城内。	同 上。
1869年	贵州绥阳	川省营员刘子贵等	受遵义教案影响，毁坏教堂什物。	同 上。
1869年	湖北武昌	民众	民教争殴，毁教堂及教民房屋。	同 上。
1869年	福建福州	民众	英教士强买土地，人民反对，激成教案。	同 上。
1869年	山东冠县梨园屯	村民、士绅	教民拆关帝庙改建教堂，民教争讼，教民胜诉。	《冠县志》卷10。
1869年	贵州桐梓	团首王大珩	民团仇教。攻教堂，杀教民。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4。
1869年	贵州都匀、普安	同知、民众	受遵义教案影响，同知钱堉号召反教。都匀、普安地区人民群起反教。	同 上。
1869年	直隶永年	武生魏长庆为首	乡民求雨途经天主堂，指责教会不奉神明，将教堂屋顶十字架锯毁，砸烂堂内家具。魏长庆被治罪，赔银一百两。	《教务纪略》，卷4。

（续 前）

1869年 | 1870年	江西 建德	民众	教士、莠民欺压非教百姓，官吏袒教抑民，民众久思打教。安庆教案传来后，建德民众聚起打教，杀教民20人，住宅亦被焚毁。法使罗淑亚以兵舰威胁，要求惩凶、抚恤。后赔偿了事。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第36页。
1869年	贵州 仁怀	民众	受遵义教案影响，民众攻打教堂，怒杀梅司铎。	同上，卷70。
1870年 （同治九年）	上海 宝山	民众	美国侵略者威逼乡民去美国“服役耕作”。宝山聚众数百人，焚毁天主堂。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95页。
1870年	天津	民众	天津地方官与法领事交涉，教堂拐卖民家子女问题时，领事丰大业持枪击伤天津知县及仆从，激起民愤。群众打死法领事丰大业，放火焚毁西开、望海楼等多处教堂。清廷处死百姓20多人，徒刑25人，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被撤职流放。	《天津政俗沿革记》卷16；《穆宗实录》卷29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3。

（续 前）

1870年5月，	贵州遵义	清军团勇	法国教士罗伯恩来贵州接教士，“又被团勇欺凌”，纠纷再起。此为1869年遵义教案余波。	《穆宗实录》，卷281，第11－12页。
1871年（同治十年）	福建古田	民众	英国传教士马约翰以建堂为借口，进行掠夺。人民驱走马约翰。	《清季教案史料》第1册，第59、109页。
1871年	内蒙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蒙汉牧民	教士掠夺、抢垦土地，一年之间，教堂抢占土地四千五百亩。	《中华归主》（英文版），第458－465页。
1872年（同治十一年）	四川重庆	官民	教士讨还“旧址”，引起“还堂”交涉。奕䜣根据1871年总理衙门奏报，使教士的企图得逞。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58－259页。
1872年	安徽铜陵	民众	教士强占公地建堂。民众殴教士，焚教堂。	冯照：《皖省辑要》。（安徽省图书馆藏）。
1872年	江苏南京	官民	法国教士强迫“还堂”。清廷以“唯恐事机决裂，难以收拾”，满足了教士的要求。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58－259页。

（续 前）

1872年	四川黔江	民众	法教士私入黔江，传教建堂，激起民愤。民众殴毙教士余克林、戴明卿。	同 上。
1872年	广西	民众	广东福永的中国牧师陈长兴、庄满和，受德国教士派遣赴广西传教，陈、庄二牧师在途中被杀。	《进步日报》，1951年10月12日。
1873年（同治十二年）	四川巴中	民众	平民董郎贤与团众赴教民杨明玉家搜捕窃匪李大春，被诬董偷杨钱物。断决董给杨钱二百四十千文。	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14。
1873年	山东即墨	民众	美国教士考比特为非作歹，引起民愤。县城人民攻教堂，考比特连夜逃走。	《北华捷报》1874年6月13日。
1873年	江西瑞昌	民众	美国教士欺压良善，人民愤恨已极，群众捉拿洋教士，教士跌入湖中毙命。	《清季教案史料》第2册，第120页。

1873年	湖北沈垭地区	民众	外国教会强占该地名胜玉皇顶，竖立十字架，改名“十字山”。民众捣毁天主堂十字架。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78年第1期。
1873年	四川黔江	士绅民众	法主教范若瑟派教士私买民房。士绅、民众反对，击杀教士三人。后群众被处死刑二人，徒刑二人，知县受处分，赔银四万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艾学：《帝国主义与宗教》。
1873年	山东冠县	民众	教士在梨园屯建堂，民教争讼，教民胜讼建堂。	《教务档案》，第4辑（一），第263页。
1874年（同治十三年）	福建延平（今南平）	绅民	美国传教士在延平强行建立教堂，当地绅民反对，引起纠纷。清廷压制民众，教士阴谋得逞。	《清季教案史料》第59—61页。
1874年	江西瑞昌	民众	美教士海格思、帅马德企图潜入瑞昌，人民驱走二教士。	《清季教案史料》第125页。
1874年	浙江平阳	民众	英国内地会教士侮辱人民。人民围攻教堂，赶走传教士。	《北华捷报》1874年11月12日。

（续 前）

1874年	浙江 湖州	民众	传教士为非作歹，人民痛恨，围攻教堂，赶走传教士。	《北华捷报》1874年12月24日。
1874年	四川 南充	守备高武三、文生肖用谦号召群众	教民横行，激起民愤。民众数千人捣毁教堂，打死教徒一人。后赔款数万，迁堂城内，高武三被撤任。	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6，第15页。
1874年	台湾 嘉义	村民吴志高等四人	反对教士传教，烧毁店仔口教堂，砍伤教士甘为霖。	林黎：《台湾名人传，识时俊杰——吴志高》。
1874年	四川 遂宁	民众	教民种鸦片滋事，民教争讼，清廷无可奈何。	《德宗实录》，卷2*
1874年	四川 南充	民众	法国教士建教堂，“地棍从之，借势凌人”，民众在肖用谦带领下，再次围攻、焚毁教堂。	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6，第15页。
1875年 （光绪元年）	四川 营山	民众	孩童观看修建教堂，恶教民逞凶。众怒，攻打教堂。	《丁文诚公奏稿》卷14。

（续 前）

1875年	四川内江	民团	教民彭志顺私押百姓杨正楷，并勒索银两。团众不服，将彭志顺、邹贤贵杀死，并焚毁教堂。交涉后，赔银四千两。	同 上。
1875年	四川邻水	民众	教民王同兴纠集同党黑夜抢劫民户，杀死百姓三人，杀伤一人，引起民愤，毁教堂五处，焚教民住宅百余户，杀死教民一人。	《丁文诚公奏稿》卷14、15；《光绪朝中法交涉》，卷1，第10页。
1875年	云南	民众	英国武装探险队自缅甸入云南，教士马嘉理前去迎接，途中欺压百姓。群众怒杀马嘉理。	《德宗实录》，卷3—5。
1875—1876年（光绪元年—二年）	福建延平	绅民	1874年延平教案发生后，人民积恨。绅民带领民众两次拆毁福音堂和教堂，教士被驱逐出境。闽浙总督被清廷革职，赔款修建教堂。	《清季教案史料》第59—61页。

（续 前）

1876年（光绪二年）	福建建宁	民众	受延平教案影响，毁教堂及洋楼，殴打教士。	同 上。
1876年	四川江北厅	民众	团首于领香集合四十八乡近万人进攻教堂。境内教堂尽毁，杀教民数人。	《丁文诚公奏稿》卷14、15；《德宗实录》卷40，第6页。
1876年7月	四川巴县白市驿	民众	受江北厅教案影响，民众仇教，打毁董家湾等处教民房屋。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378，399页；《德宗实录》，卷40，第6页。
	四川涪州	民众	先在初等效江北厅民众反教，当地教堂皆毁，惩恶教民百余家。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第10页。
	四川涪陵	民众	受江北厅教案影响，打毁清溪武隆等场教堂。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第30—32页。
12月	四川邻水	民众	受江北厅教案影响。教民杀团民。	《德宗实录》卷40，第6—7页。
	四川南充	民众	受江北厅教案影响。民教相争，伤毙教民二十余人，焚毁二百余家。	同 上。

（续 前）

1876年7月皖南教案	安徽建平（今郎溪县）	民众	皖南风传剪辫子系教堂所为，教民朱某为非做歹，民众杀死教民黄之绅等人。教案波及皖南。	《筹办夷务始末》；《沈文肃公政书》卷6，第83、87页；《清季外交史料》，卷9。
	安徽宁国府（今宣城）	民众	受建平教案影响，当地民众烧毁教堂，扒教士之坟，抛尸。	《清季外交史料》卷9；《德宗实录》，卷38。
1876年	台湾淡水三里埔	村民	歹人冒充教民强奸幼女，村民愤怒打毁教堂。	《台湾通史》，卷22；《台湾涉外关系史》。
1876年	江苏苏州	民众	反对法国天主教教士在当地传教，民众胜利，教士逃离苏州。	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
1877年（光绪三年）	湖北武昌	武童、民众	英国教士骄横，引起民愤，武童殴伤传教士。武童数人被捕。	《德宗实录》，卷60，第23页。
1877年	江西贵溪	民众	教民桂冬喜等盗卖沙滩石土地给教会，民众上控教民胜诉，交白银一百六十两。	王九鹏：《交涉约案摘要》，卷2，第56页。
1877年	江西鹰潭	官绅、民众	教民冯东初、桂良才等把胡家井公地变卖给教堂，民众上控大吏，清廷硬性将该地派给教堂。	同 上。

（续 前）

1878年9月（光绪四年八月）	福州乌石山雀舌桥	民众	英教士侵占乌石山雀石桥，建造楼房。英教士胡约翰谩骂群众，激起民愤，烧毁楼房三间。后，将百姓治罪，地方官受处分，赔款。	《德宗实录》，卷77、90。
1878年11月	奉天海城	官兵、民众	盗首张成谦逃匿教堂，通事王荫槐保犯抗官，王荫槐被海城县责罚，从宽免究。	《德宗实录》，卷80、82。
1878年	山东德州	民众	美国教士明恩溥强占石家塘庙宇，阴谋得逞。	《教务杂志》1878年11月—12月。
1878年	内蒙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	蒙民	教士低价勒索蒙族人田地七十顷，仅付银二十五两。蒙民开展斗争，最后失败。	林亮：《西北丛编》，第52、60页。
1879年（光绪五年）	福建延平	民众	美国传教士以开书店为名，办福音堂，民众围观，教士开枪。民众二次捣毁教堂、书堂。清廷赔款，“惩凶”。	《清季教案史料》，第59—61页。

（续 前）

1879年	福建	民众	受延平教案影响，民众到处张贴禁奉教者买食物的传单。	《清季教案史料》，第61—62页。
1879年	福清	民众	受延平教案影响，群众围攻教堂。	同 上。
1879年	台湾台北	高山族人民	人民反对教士马偕传教，殴打马偕夫妇。	马偕：《台湾六记》，第68—69、143页。
1880年（光绪六年）	广西南宁	民众	教士购地建堂，群众群起攻击。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2，第8页。
1881年（光绪七年）	山东德州	民众	传教士在第七屯骗吴寡妇房地产，民众上告，无济于事。	《清季教案史料》，卷2，第198页。
1881年	广西南宁	民众	群众张贴告示，揭露洋教与殖民主义的关系。	《清季教案史料》，卷2，159页。
1881年	广西梧州	官绅民众	桂省大吏发布告，限制教会置产，并报总理衙门。经过交涉，法国教士置产权力无限增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法国照会》。

（续 前）

1881年	山东 济南	乡绅、 秀才、 生员	美教士占民房改为教堂，乐源书院师生要求收回，教士借口教堂被毁，勒索房子六十四间。	《清季教案史料》，卷2。
1881年	安徽 广德	官绅、 民众	教士购买房屋土地，建造教堂。民众反对，清廷屈从，使教士企图得逞。	同　上。
1881年	云南 浪穹	民众	民教相争，仇教情绪高涨，到处张贴反教告示。	同　上。
1882年（光绪八年）	黑龙江 呼兰	民众	法教士贡罗斯强占郭定恒“产业”，并开枪打死交涉官员，抢了四户房产。后反由郭定恒赔款三千两。	民国《呼兰县志》卷7，“地方案件汇编”。
1883年（光绪九年）	福建 龙岩	士民	乡绅订条规组织“平夷灭番”，反对法国侵略，攻打教堂，驱逐教士。	《清季教案史料》第107—109页。
1883年	浙江 温州	官绅、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捣毁教堂。	《德宗实录》，卷194，第21页。
1883年	湖北 武汉	官府	在教士支持下，教民潜谋起事，反抗清廷，教民王觉一被处决。	《德宗实录》，卷163，第16—17页。

（续 前）

1883年 8 月	广州	民众	洋人无故杀死百姓二人，民众冲入沙面，烧毁洋人及教士房屋。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卷14，第35页。
1883年 10月	广西 贵县	团总、民众	援越抗法，捣毁三板桥等地两处天主堂。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第173、279页。
1883年 10月	广西 上思	民众	受贵县影响，进攻教堂，法教士纷纷逃到香港避难。	同 上。
1883年	江西 鹰潭	民众	教民盗卖土地给教堂，民教发生纠纷，清廷保护教士。	《交涉约案摘要》，卷2。
1883年	云南 浪穹	民众	法教士张若望抢县民吴大发之妻、女奸淫，并开枪伤人。人民毙教士、教民十余人，后赔银五万两。	《德宗实录》，卷161；《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5，第16页。
883年	黑龙江 呼 兰	官兵、民众	法教士贡罗斯强占民地，枪杀地方官吏，兵民反对。法教士反诬“旗兵滋事”，驻京法使要挟清廷“查办”。	《呼兰府志》，第4卷。

（续　前）

1884年3月（光绪十年二月）	山东荷泽	民众	教民李某奸污妇女，德国教士庇护，激起民愤。民众捉住教士安治泰殴打，并张贴告示　反德国天主教。	《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283、285页。
1884年8月	福建宁德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和教士传教。殴打教民，用石块攻打教堂。	《字林沪报》，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884年	福建福州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民众焚烧洋行、教堂。	《中法战争》（五）第36—37页。
1884年8月	浙江宁波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拆毁教堂。	《浙东筹防录》卷1，上，第40页。
1884年8月31日	广东广州	官绅、士民	反对法国侵略，卖麻街天主堂被封，北门外陶金元天主堂及教民房屋二十余处被焚，法领事、教士坟墓被掘毁。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4，第35页；《张文襄公全集》，卷93，公牍8；《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18—23页。
1884年9月3日—7日	广东顺德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堂九间、教民房数百间被拆毁，田地被占。	同　上。
1884年9月3—6日	广东东莞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县城天主堂被查封，乡、镇教堂、教民房屋被毁多处。	同　上。

（续 前）

1881年9月2—6日	广东南海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沙头、神安等天主教堂及教士、教民房屋大多被拆毁。	《张文襄公全集》，卷93，公牍8。；《中法战争》(五)。
1881年9月初	广东番禺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民五间房屋内的物件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7—17日	广东博罗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县属天主教堂被封，十八村乡教堂多被拆毁。	同 上。
1884年9月14日	广东遂溪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圣三村教堂、书馆被毁，教民房屋里的什物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14日	广东海康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烧毁教民房屋一间，物件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14—15日	广东河源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毁天主教堂一间，打死教民一名。	同 上。
1884年9月15日	广东南雄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马径司、杨梅坑等地天主堂、育婴堂、书馆及教民房屋三十余间被拆毁。	同 上。

（续 前）

1884年9月15—16日	广东龙门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殴打一名传教士，几毙。教堂、教民房屋数十间内物品被“搬光”，有的被砸烂。	同 上。
1884年9月15—16日	广东新宁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三洲、圣人山天主堂二间、教士及教民房屋数间被毁。	同 上。
1884年9月15—16日	广东龙川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打死教民一名，教民房屋二十三间、店铺一间被毁，物件全部“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15—16日	广东嘉要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民房二十间，店铺一间物品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19日	广东嘉应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堂房二间，育婴堂一间及教民房屋三间被拆毁。	同 上。
1884年9月19日	广东潮州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天主教教士全被驱逐出境，各处教民房屋皆被拆毁，教民纷纷潜往汕头躲藏。	同 上。

（续 前）

1884年9月19日	广东普宁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八十家教民的物件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19日	广东茂名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堂、教士房屋被拆毁，教民房数十间内物品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20日至10月14日	广东揭阳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堂七间、教民房三十余间被毁。	同 上。
1884年9月20日至10月14日	广东澄海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堂一间、教民房三十余间内物品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10月8日	广东广州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广州教堂被看守清兵焚毁。	同 上。
1884年10月15日	广东高州府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化州教堂二间、教民房三十余间内物品被搬光。其中二间被毁，教船二只被拖走。	同 上。

（续 前）

1884年10月23日	广东南海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百胜乡教堂、教民房数间被毁，数十间房屋的物品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10月23日	广东龙川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民房五十余家物品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	广东清远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凡法人即杀，凡教堂即毁。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公牍7。
1884年9月21日至10月3日	陆丰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天主堂一间、书馆一间、教民房屋四十余家被毁。	同 上。
1884年9月22日	丰顺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堂、教民及教士房屋十二间内物品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24日	合浦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西茶村教堂一间、教民房屋二间被拆毁。	同 上；

（续　前）

1884年9月28日	广东兴宁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堂一间被拆毁，教民房屋一百余间的物品被“搬光”。	同　上。
1884年9月	广东赤溪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万属天主堂杂物被“搬光”，田兴天主堂及房屋全部被封。	同　上。
1884年10月23日	福建永安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教堂二间、教民十余家物品被“搬光”，内有数家被封。	同　上。
1884年10月	浙江温州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毁税务司海关房屋和教堂。	《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二），第993—994页。
1884年11月	浙江温州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福建，焚教堂。	《德宗实录》，卷194。
1884年	安徽建德	官绅、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福建，驱教士、教民，拆毁教堂。	《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
1884年	云南省永北厅（今永胜）	村民	反对法军进攻福建，毁堂，“凡西教人俱杀害，天主堂房屋、西学堂及教民房屋，数处俱焚毁”。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317—318页。

（续 前）

1884年	贵州 桐梓	村民	教堂门首贴上谕告示，说“法人背盟肇衅”。民众义愤，毁教堂，杀教民。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
		官绅、民众	中法战争影响，法教士横行。驱教士，攻教堂。	《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28页；(三)第1725页。
1884年9月	贵州 遵义	民众	教堂门上贴告示，反对法国侵略。教士寓所六处，教堂育婴堂各一处被拆毁。	《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16、24页；(三)第1725页。
1884年10月	四川 綦江	民众	受遵义教案影响，“县乡天主堂皆遭毁劫”。	《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17页。
1884年10月	湖北 宜都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毁天主堂，驱教民。	《教务教案档案》第四辑(一)，第17页。
1884年10月	江西 九江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焚毁天主堂，殴法国教士。	同上。
1884年10月	山东 烟台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毁教堂，驱教士。	同上。

（续 前）

1884年10月	奉天	民众	反对法国侵略。民众围攻教堂。	同 上。
1884年	内蒙亚伦巴地区	蒙、汉人民	教堂抢占扒子城以西一万顷地。清廷保护教堂，人民失去大量土地。	《中华归主》（英文版），第458—465页。
1884年	内蒙阿拉善旗	蒙、汉人民	教堂抢占一个城镇及周围万顷土地。清廷保护教士、教堂。	同 上。
1884年	台湾基隆八里坌	高山族、汉族人民	中法战争中基隆失守。人民驱逐洋教士，殴打教士，烧毁七座教堂。	马偕：《台湾六记》第79、83页；林衡道：《台湾古迹概览》第44页，连横：《台湾通史》。
1884年	台湾淡水大稻埕（今台北市内）	高山族、汉族人民	受基隆教案影响，打毁大稻埕教堂，驱逐长老会教士。	同 上。
1884年	芦洲（和尚洲）	高山族、汉族人民	受基隆教案影响，打毁和尚洲教堂。	同 上。

（续 前）

1885年5月（光绪十一年）	黑龙江齐齐哈尔	官员与民众	副都统饬令该地方官民驱逐所有德国传教士，焚毁教堂。	《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一），第27页。
1885年7月	台南利伦	官民	教民横行，民教冲突，人民痛殴教士巴复礼。	林子侯：《台湾涉外关系史》，第353页。
1886年（光绪十二年）	四川重庆	市民、商人	英美教会强行修教堂。居民联名向大吏控告，要求停止修建。大吏对教会无可奈何，民愤沸腾，散发揭帖，商人罢市，武生罢考，烧美国教堂和英国洋房。教民罗元义组织武装枪杀民众三十余人，市民三千人愤起焚毁城内所有教堂，并捣毁英国领事馆。英、法、美三国武力威胁清廷处死“凶手”二名，赔银二十三万五千两。	《德宗实录》卷231、234；《巴县档案》；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7。

（续 前）

1886年	四川 江北	民众	受重庆教案影响。教民逞凶，民众烧教民房店铺四百余家，捣毁境内所有教堂。议结，赔白银三千两。	民国《巴县志》；
1886年	四川 铜梁	民众	受重庆教案影响，民众围攻教堂，殴打恶教民，焚烧教堂。议结，赔白银三千两。	民国《巴县志》；《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1886年	四川 綦江	民众	受重庆教案影响，民众焚毁境内教堂。	民国《巴县志》。
1886年	四川 永川	民众	受重庆教案影响，民众捣毁教堂，烧教民房屋九十八家。	同 上。
1886年	四川 大足	民众	受重庆教案影响。余栋臣率众打教，毁龙水镇教堂。议结，赔银一千八百两。	《巴县档案》；《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卷，第129—130页。
1886年	陕西 西安	民众	法传教士随意指定教堂旧址。受清廷胁迫，省大吏屈从传教士要求。	《德宗实录》，卷294。

（续 前）

1886年	陕西 咸阳	民众	教民横行，激起公愤，伤教民二十二人，杀教士十一人，打毁教堂。	《德宗实录》，卷231。
1886年	江苏 扬州	民众	教士在东乡占田建堂，姜三娘等发动七十二乡人民驱教士，毁教堂。	《益闻录》第8册。
1886年	内蒙 集宁	蒙、汉人民	法天主教会教民抢占七苏木滩地方，蒙、汉人民联合反抗教堂开垦，烧掉禾苗。比、法公使进行威胁，清廷将此地方交教民耕种，被教堂霸占。	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220页。
1887年（光绪十三年）	山东 济南	官绅、民众	美教士李佳白盗买大批土地，民人愤而上诉。清廷缔结协议，交出原地并赔款。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0年，第148页。
1887年	山东 济南	民众	美教士霸占民房开医院，绅士带头反对。清廷出兵镇压。教士抢占民房，清廷又拨一块土地给教堂。	《北华捷报》1887年6月17日—7月1日。

（续 前）

1887年	山东冠县	村民	教士、教民在梨园屯占民房建教堂，引起民教纠纷。教士获胜。	《冠县志》卷10。
1887年	四川大足	民众	法教士重建教堂，民众又趁迎神赛会毁之。此为二打龙水镇教堂。	《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1887年	台湾淡水	知县、民众	仇恨法国发动侵华战争，驱逐教士，拆毁教堂。	《台湾省通志》卷2，“宗教篇”。
1887年	内蒙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	内蒙人民	经十年的掠夺，二十四顷教堂抢地一万亩。法教士陆毅英骑马圈地成功，清廷承认。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13页。
1888年9月（光绪十四年八月）	重庆	民众	美国传教士建房占据鹅颈项地方。民众拆毁洋房、法国教堂和医馆。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475页。
1889年（光绪十五年）	江苏扬州	民众	英国巡捕无故殴打民人。人民反抗，被打死多人。民众怒烧英国镇江领事署及教堂共十五处。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95页。

（续 前）

1889年	四川重庆	民众	民教不和，攻打城内教堂。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328页。
1890年7月（光绪十六年六月）	四川巫山	民众	受上年重庆教案影响，出现反洋教揭帖。清廷派兵镇压。	同 上。
1890年	四川奉节	民众	受重庆教案影响，出现反洋教揭帖，清廷查拿“肇事者”。	同 上。
1890年	四川云阳	民众	受重庆教案影响，民情激愤，反教。清廷镇压。	同 上。
1890年	四川大足	民众	龙水镇教堂被毁两次后，教士、教民仍继续修建教堂。余栋臣率众三打龙水镇教堂。清廷采取分化政策，余栋臣被迫退出龙水镇。清廷赔偿白银五万两。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四。
1891年（光绪十七年）	四川大足、铜梁、永川	余栋臣起义余部	由于清军镇压，起义部队转移到三县交界处，经常打击不法教民。清军镇压，起义失败。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四“寄译署”。

（续 前）

1891年	安徽芜湖	哥老会	市民流传教士拐骗幼孩挖眼，引起人民愤恨。民众五千余人围攻鹤儿山天主堂，怒烧教堂、育婴堂、教士住宅，并攻打海关。后被清军驱散，赔银十三万两。	《光绪政要》第17卷；《芜湖县志》卷3。
1891年	江苏丹阳	哥老会及市民	法国教士办育婴堂，虐杀儿童近百余名。民众愤而攻打教堂，对抗清军，并毁教堂及洋房二十余间。	王仁堪：《王苏州遗书》卷6；《丹阳教案始末》。
1891年	江苏无锡	民众	法教士彭安多虐杀儿童，奸污妇女多名，民众怒烧三里桥教堂，毁教士墓地。接着，堰桥等多处教堂皆被焚。	《益闻录》，第1册。
1891年	江苏金匮	哥老会与民众	受芜湖教案影响。哥老会和人民与清军对抗，冲进教堂发现童尸，即焚毁教堂，毁屋三十余间。	《益闻录》第13册；无锡地方志编委会：《无锡人民反洋教的斗争》。
1891年	江苏扬州	哥老会与民众	群众贴出反教揭帖，“官府受贿，保护洋人”，五、六千人攻教堂，遭清廷镇压。	《益闻录》，第13册，第200页。

（续 前）

1891年	湖北武穴	民众	教士虐待幼童。民众千人烧教堂，打死英教士一名。判民众死刑二人，徒刑七人，赔偿白银六万五千两。	《德宗实录》，卷298，第3—4页。
1891年	江苏如皋	哥老会与民众	受芜湖、扬州、丹阳等教案影响。“毁堂三十余间”。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1，第50页。
1891年	江苏金陵	哥老会与民众	受芜湖、扬州、丹阳等教案影响。英国教会学堂被烧，其它教堂“亦有滋扰。”	《益闻录》第13册。
1891年	湖北宜昌	挑夫、水手、游勇、哥老会成员	法教堂拐卖儿童，家长寻找，被枪伤数十人。民众愤怒。凡有教堂处皆受冲击。英、法、美等九国公使武力威胁，迫使清廷判徒刑十二人，赔偿白银175771两。	《辛亥革命》第3册，第404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第38页。
1891年	江苏阳湖	哥老会、民众	反对法国教会，毁境内教堂。	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
1891年	江苏江阴	哥老会	反对教会暴行，捣毁教堂。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3；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

（续 前）

1891年	江苏 如皋	哥老会 与民众	受长江沿线教案影响，攻教堂，杀教民。	同 上。
1891年	江苏 海门	哥老会 与民众	受长江沿线教案影响，纵火焚烧教士住宅。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第66页。
1891年	湖南	哥老会 及散兵 游勇	受长江沿线教案影响，大量反教宣传品从湘省发向全国。	《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36－57页。
1891年	上海 徐家汇 及租界	民众	受扬州教案影响，民众在徐家汇及租界到处张贴反教揭帖。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2，第601－602页。
1891年	热河 朝阳	金丹道 及当地 人民及 部分江 南参加 反教者	教士、教民“所做所为实多横恣”。江南反教成员到朝阳举行大起义，提出“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贪官”的口号。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3063页；《军机处录副奏折》542－6、542－3、392－3；《德宗实录》卷303－308。
1891年	直隶 建昌	金丹道	教堂秘密从天津运来枪支，准备镇压人民。民众夜入教堂，与教士激战。	《军机处录副奏折》542－6。
1891年	热河 平泉	金丹道	民众攻打教堂，见地窖里有无数幼孩尸体，人民遂起事，与清军、教会武装激战。	《德宗实录》，卷303；《朝阳县志》。

（续 前）

1891年	内蒙敖汉贝子府、土默特旗、奈曼旗、翁牛特旗、扎萨克旗	金丹道	教会强占土地，官逼民反，教首郭万昌率众数千起义，攻下各县城，建立开国府。	《军机处录副赛折》542－6；《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306页。
1891年	热河赤峰	金丹道起义军	义军分兵攻占赤峰等地。	同 上。
1891年	直隶永平、滦州等以及奉天、锦州、等地	金丹道起义军	受清廷洋教压迫，义军与清政府军激战，将境内教堂全部焚毁。	同 上。
1891年	热河喀喇沁旗	金丹道起义军	暴雨成灾，地方官贪婪成风。群众激变，以“杀贪官”之名起义，焚烧教堂。清军镇压，首领等被捕。	《德宗实录》，卷302、303。
1893年（光绪十九年）	湖北襄阳	会党	1891年全国反教大风潮余波的影响，会党攻教堂，与清军对抗。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2。

（续前）

1893年	湖北麻城	会党	教士捆殴民众。人民怒杀教士。清廷处死民众二人，徒刑七人，赔款四万二千两白银。	同　上。
1893年7月	湖南临湘	民众	法司铎安熙光强占县东关汪昌太住宅，建天主堂。群众毁堂。事悬三载未决。	《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4期，第36页。
1894年（光绪二十年）	江西庐山牯牛岭一带	官绅、民众	英教士李德立买通匪绅万和庚出具“租约”，强占牯牛岭高冲、长冲女儿城、教厂讲经台等一大片公有土地，建造房屋。当地群众起来阻拦，引起中外交涉。传教士迫于人民压力，将长冲三百丈以外地方退还，但无理索价四千一百一十五元。	王鹏九：《交涉约案摘要》，第12卷。
1894年	四川西宁（今雷波县）	彝民	法国教士游历此地，勘察地形。彝民反对，把教士投入通天河（今金沙江）。	《德宗实录》，卷344，第18—19页。

（续 前）

1894年	奉天辽阳	清兵	驻吉林清军路过辽阳，毁坏英教堂，打死英教士一名，伤一名。后，佐领革职，处死兵士一名。	《德宗实录》，卷345、346。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浙江定海	僧人	教士垂涎僧人涂田四千亩，以教堂起火，诬僧人所为。巡抚廖寿丰不问原因即命僧人赔送涂田二千亩。	民国《定海县志·故实志》，第17页。
1895年	福建古田	斋教及民众	斋教首领刘祥兴准备率菜农起义。美、英传教士协助闽浙总督镇压刘祥兴起义。斋教群众杀死传教士等洋人十几名，烧毁英、美教堂。英国兵舰开进福建威胁。清廷杀害民众二十六人，抓捕二百余人，十四名地方官被革职，赔白银三十万两。	《德宗实录》，卷371；《教案奏议汇编》。
1895年10月	四川重庆	民众	苍平巷教堂门口，出现反教揭帖。传教士恐慌，清军搜查周巷。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487页。

（续 前）

1895年	四川 成都	民众	五月端午节掷果会，人民在东教场撒李子。英美教堂捕捉小孩入教堂。8月，民众三人被扣压，激起民愤，群众捣毁四圣祠及平安桥北门外诸法国教堂，教士逃走。	《清季外交史料》卷175；李希圣：《庚子国变记》；《教案奏议汇编》。
1895年	四川 新都	民众	成都教案后，教士逃至该地。民众围攻教堂，知县保护教士脱逃。	《德宗实录》，卷367、369。
1895年	四川 新津	民众	受成都教案影响，遗失幼童，人心浮动，民众围攻教堂。	同上。
1895年	四川 彭山	民众	受成都教案影响，打毁天主堂。清廷杀百姓一人。	徐元烈：《彭山纪年》上卷，第25页。
1895年	四川 眉县	民众	受成都教案影响，民众攻打教堂。	同上。
1895年	四川 邛州	民众	受成都教案影响，群众围攻教堂。知州周凤藻保教不力，被罢职。	《德宗实录》，卷369。

（续 前）

1895年	四川 巴县	民众	受成都教案影响，民众在邹素其、林益臣等率领下，携带武器围攻教堂。清廷派兵逮捕三十余人。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478—479页。
1895年	四川 宜宾	民众	受成都教案影响。攻打教堂，清廷派兵镇压，与美国使馆议结，赔白银一千五百两。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493页。
1895年	四川 崇庆、 什邡、 阆中、 泸州、 冕宁、 大邑、 乐山、 雅安、 仁寿	民众	受成都教案影响，攻打教堂。	《德宗实录》，卷369。
1895年	湖北 沈垭 山区	民众	天主堂以民众推倒了十字架为借口，强迫地方官将木盘山区划为天主堂与地方官府共同管辖区，人民群起反对。后，沈垭地区的行政权落入侵略者手中，教士甚至向地方官发布命令。	《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续 前）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四川重庆	教民与民众	法天主教霸占教民捐款修建的重庆爱德堂。教民、民众上诉川东道，要求主持公道，大吏偏袒法国教士。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48页。
1896年	江苏江阴	民众	美教会杀儿童，民众烧毁教堂，教士逃跑，清兵镇压，群众回击。	沈松涛：《江阴闹教记》。
1896年	山东兖州	民众	教士、教民恃势逞凶，民众焚教堂，引起中外交涉。	《德宗实录》，卷387，第14页。
1896年5—7月	山东曹县	大刀会	教民刘荩臣抢麦，大刀会聚众千余人，毁教堂二十所。	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卷12。
1896年	山东城武	大刀会	受曹、单大刀会攻打教堂的影响，聚众攻打教堂。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
1896年	山东丰县（今属江苏）	大刀会	受曹、单大刀会攻打教堂的影响，焚境内教堂。	同 上。

（续 前）

1896年	山东沛县（今属江苏）	大刀会	受曹、单大刀会攻打教堂的影响，围攻教堂，拆毁房屋。	同 上。
1896年	山东萧县（今属安徽）	大刀会	受曹、单大刀会攻打教堂的影响，围攻教堂，拆毁房屋。	同 上。
1896年	山东砀山县（今属安徽）	大刀会	受山东单县大刀会影响，数千人起义，毁掉几乎所有教堂。	《山东近代史料选集》。
1896年	山东考城县（今属河南）	大刀会	受曹、单大刀会围攻教堂的影响，焚烧境内天主堂。	同 上。
1896年	山东兰仪县（今属河南）	大刀会	受曹、单大刀会围攻教堂的影响，起义军攻打教堂。	同 上。
1896年	山东宿迁（今属江苏）	大刀会	受曹、单大刀会攻打教堂的影响，会众围攻教堂。	同 上。
1896年	江苏徐州	大刀会及民众	受单县大刀会影响，数千人起义，境内教堂几乎全部被拆毁。	同 上。

（续 前）

1896年	山东平度	英雄会	千人聚集，声言杀尽洋鬼子，反教斗争持续很久。	同 上。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四川崇庆	民 众	成都教案余波，打毁教堂。清廷下令凡毁损教堂之地，由该管官偿赔，其事遂息。	《崇庆县志》，卷3，第15页。
1897年	山东威海	民 众	英教士霸占民产，七百余名群众愤怒毁教堂。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
1897年4月	山东临清	民 众	英教士霸占庙屋建教堂。群众千人包围教堂。打死教民三人，伤三十四人。	同 上。
1897年	山东汶上	平 民	教中恶棍歹徒，横行乡里，聚百余人，捆绑平民，送济宁教堂，并对平民殴打勒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39页。
1897年	山东冠县	梅花拳	是1869年和1887教案的继续。拳民聚集千人，攻打天主堂。教民死五人，伤七、八人，俘四、五人。	《冠县志》，卷10；《教务教案档》第五、六辑。

（续 前）

1897年11月	山东巨野	民众	教士、教民横行。人民杀死德国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德国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	《清史稿·邦交志》；赵琪：《胶澳志·德国租界始末》。
1897年12月	山东曹州	民众	受巨野教案影响。百姓聚众驱逐教民，欲杀洋人。德使据此要挟，达到了强占胶州湾的目的。	《德宗实录》，卷431。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山东兰山	大刀会	受巨野教案影响。五千人反教，德军出兵镇压。	《教务教案档》第六辑（一），《山东教务》，第353页。
1898年	山东沂水	大刀会	受巨野等教案影响，群众五百人打教堂。	同上。
1898年	山东莒县	大刀会	受巨野等教案影响，万余人打教堂。	同上。
1898年	山东濮州（今属河南）	民众	崔楼村教民抢占百姓郅某房屋。人民毁教堂，反洋教斗争持续很久。	山东社科院：《近代史资料》，“有关义和团资料”。
1898年 1899年	山东沂州	民众	受巨野教案影响，两万人打教堂。	《山东时报》

（续 前）

1898年	山东日照	民 众	群众万余人反教，痛殴教士薛田资。德军出兵，行凶杀人。	《教务教案档》第六辑(－)。《山东教务》第353页。
1898年	山东嘉祥	大刀会	“此次滋事由教中菜民煽布流言”引起。大刀会众“将教民之家毁扰”。德国干涉。	《教务教案档》，第六辑(－)；《山东教务》第240、382、402页；《笔偶存》，第12—13页。
1897年	安徽宿迁	教民阎军与教民周乙等	地主教民闫军收农民、教民地租，每亩七斗半，周乙等无力负担。教士倪某、沈某竟令周乙等交罚款一百三十千文，并制匾一方，酒宴五席，送进教堂。	《益闻录》1897年12月5日。
1898年10月	山东冠县蒋家苑地区	义和拳	成县赵三多发动义和拳，攻教堂，杀教士，聚千人，蔓延十余县。	民国《冠县志》，卷10。

（续 前）

1898年	山东冠县梨园屯	义和拳民	1869和1887年两次教案后，村民与法国教会、教士、教民的土地之争仍未解决。教会在玉皇阁旧址建堂。冠县“十八魁”领导梅花拳起事，举起“扶清灭洋”大旗，拆毁各地教堂，杀毙教士、教民多名。邻县民众纷纷响应。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义和团》，第4册，第460页等。
1898年	保定	义和拳民	教士、教民强迫民众为教堂服役。民众起而拆教堂，殴教士，驱教民。	《德宗实录》，卷420，第10—11页。
1898年冬	山东威海	民众	英国租借威海湾沿岸，民众与英军战斗，并攻打教堂。	《筹笔偶存》，第245页。
1899年2月18日	浙江海门	农民应万德之子应再庚带领群众千余人反教	教士横行。法神甫李思聪欲抓应万德，民众围困海门教堂，并毁洋屿地方全部教堂，把华司铎阮小本“撬眼，削足”，驱逐出境。	《录副奏折》，浙江巡抚刘树堂片。

（续 前）

1899年	浙江 太平	民　众	受海门教案影响，太平县城内、三荡庙、新河、隘顽所、石桥头、蓍横、温岭、泽国等处教堂被烧毁。	《汇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三日。
1899年	浙江 黄岩	民　众	应万德领导反教，毁井泉、茅林、路桥等处教堂。	同　上。
1899年	浙　江 宁　波 西　乡、 大　桥 等　地	民　众	受海门教案影响。反教“声势巨大”、“焚拆教堂”，“洋教士逃亡”。	《申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1899年	浙江 余姚	民　众	受海门教案影响。“二千人声讨洋教”，毁教堂，洋司铎不敢在教堂内居住。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899年	浙　江 台　州 乐　清 临　海 等　县	民　众	受海门教案影响。民众到耶稣教堂声讨，教士惊呼：“四方都有反教斗争运动，教堂孤立可危！”	同　上。
1899年	浙江 海门 棚桥	夏铺李会众四百余人	应万德被官杀害。群众将“当地教堂围困，把教堂司铎克忠（奥国人）杀伤，教堂杂物捣毁一尽”，且痛打洋教士李思聪。	同　上。

（前　续）

1898年	四川大足龙水镇。	余栋臣起义军。	余栋臣兄弟、蒋赞臣等率众起义，抗官打教，与清军作战，没收教堂与教民的粮食，抓捕法国教士华芳济，发“檄文”和“告示”。清军镇压，并与各国公使议结，赔款1186100两白银。	《清季外交史料》，卷133；《德宗实录》，卷427—428、431—432、457；《大足县志·余栋臣传》。
1898年	四川铜梁	余栋臣余部及民众	响应大足起义，义军迫使大地主向义军交粮，并强令地主教民退教，对恶教民劫其财产，焚其居室。围攻焚毁教堂多处，抓捕中国教士黄用中等。	《清季外交史料》，卷123；《奢经馆遗集自叙》，“年谱戊戌”。
1898年	四川永川	余栋臣余部及民众	响应大足起义，焚掠教堂，劫恶教民财产。	同上。
1898年	四川璧山	余栋臣余部及民众	响应大足起义，毁坏教堂。清廷与教士议结赔款。天主教会借机扩充田地1000亩。	同上。
1898年	四川南充	余栋臣余部及民众	响应大足起义，毁福音堂及天主堂，教士避难。	《南充县志》，卷6第16页。
1898年	四川江津	余栋臣余部及民众	响应大足起义，唐翠屏率义军攻打十都和大平场等地教堂。	《江津县志》。

（续 前）

1898年	四川 荣昌	团 民	响应大足起义，攻打教堂，殴打教士，驱逐教民。	《德宗实录》，卷421，第3页。
1898年	四川 合川	民众与义军	受大足余栋臣影响。合川莱里民众毁教堂。	《合川县志》，卷5；《德宗实录》，卷426。
1898年	四川 江北	袁海山率县民	响应大足起义。与余部呼应反教。	《江北县志》。
1898年	四川 武胜	邹南山、雷德安率众起义	响应余栋臣起义。焚兴隆场等处教堂数所。	《武胜县志》；《畲经馆遗集自述》，“年谱戊戌”。
1898年	四川 长宁	义军刘昏王部	配合余栋臣部，策应南充反教斗争，攻打教堂。	《长宁县志》。
1898年	四川 遂宁	余栋臣余部与民众	响应余栋臣起义，义军占磨溪乡，声言攻打县城，并焚掠教堂。	《遂宁县志·纪事》。
1898年	四川 潼南	民 众	受余栋臣起义影响。数百人打毁双江镇教堂。清廷镇压，杀起义领袖二人。	《潼南县志·纪事》。
1898年	四川 南溪	义军与民众。	响应余栋臣起义。义军刘昏王聚众千余人，在安产桥与清军对抗，攻打教堂。	《南溪县志·武备志》。

（续 前）

1898年	四川 广安	义军与民众	响应余栋臣起义，义军一部与民众结合，掠焚教堂。	《广安县志兵戎志》。
1898年	四川 大竹	义军与民众	响应余栋臣起义。攻打、拆毁教堂。	《大竹县志·武备志》。
1898年	四川 安岳	义军与民众	响应余栋臣起义，义军首领蒋赞臣攻打天林镇、李家街，焚毁教堂。	《安岳乡土志·纪事》。
1898年	湖北 宜昌	民　众	受余栋臣起义影响。“教民迁避，处处惊忧，洋人尤甚”。民众焚教堂、育婴堂，杀教民多人。	《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至十月；《德宗实录》，卷434。
1898年	湖北 长阳	向策安率县民起义	天主教霸占长乐某人之妻并抢夺其田产。人民愤恨已极，杀法神甫一人，并捉长乐知县。清兵镇压，向策安被杀。	《近代史资料》，1957年2期第131页；《德宗实录》，卷434，第341页。
1898年	湖北 沙市	民　众	假借余栋臣之名起事，拆毁教堂，“焚毁英署、洋房”。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314页。

（续 前）

1898年	湖北麻城	民众	假借余栋臣之名起事，驱逐瑞典教堂的教士，并焚教堂。	同上。
1898年	湖北长乐	民众	响应余栋臣起义。聚众二、三千人，焚长乐县教堂，并毁传教士董某经营的长乐堂。	《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
1898年	湖北利川	民众	借余栋臣之名起事，民众打教，焚烧教堂。	同上。光绪二十五年二月。
1898年	广东博罗	民众	民教互斗，县令袒护教民，拘拿百姓，激起民变。百姓拒捕，杀死教士。	《德宗实录》，卷429。
1898年	广西永安	民众	教士、教民建堂，人民反对传教。传教士滋事，打毁民人店铺。群众杀死传教士苏某，另外两个传教士并教民多人被杀。结果百姓三人被处死，赔银四万两。	《德宗实录》，卷417、420；《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永安县志》。
1898年	云南个旧	矿工	反对法国破坏矿山，修铁路，群众攻打教堂，烧海关、领署。	《筹笔偶存》。

（续 前）

1898年	浙江严州府建德、桐庐	民众	教士为扩建教堂，强拆教堂附近住房，同时，教士、教民践踏。民怒不可遏，在三个多月时间内，烧毁了两县之内的大部分教堂。	《浙江学刊》1963年第2期，第41页；陶成章：《浙案纪略》。
1898年9月——1899年10月	山东沂州	民众	德军侵占山东后，为非作歹，传教士气焰嚣张，教民为虎作伥。于是引起沂州大教案。（以下莒县、沂水、兰山、费县、即墨、德州、砀山、营庄、丰县、郯城、高唐等地反教斗争总称为“沂州教案”）。山东沂州人民愤起反抗，仅1899年就发生教案数十起。清廷及地方官除了勾结传教士杀害了许多无辜百姓，还赔银八万四千二百余两。	《山东近代史资料·义和团资料》；《等笔偶存》，第245页；《德宗实录》卷439、447。
1898年9月	莒县	民众	与诸城、日照民众联合，三县共二万人攻打教堂，焚教堂数处。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

（续 前）

1898年12月	沂水	民 众	境内圣母冢集民教相争，民人田庄太被打死，西北乡二百人攻打教堂。	同 上。
1899年1月（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	兰山	民 众	小太平庄民教相争，民人郭某被县令打死。城东人民集众五千人攻教堂，打县城。县令下令开枪打死、打伤民众数十人。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九日。
1899年3月	费县	民 众	民教相争。村民余四等率众数百人，焚教堂。与官兵接仗，民众被杀数十人。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1899年3月	即墨	大刀会	大刀会员王义顺率众反教，攻烧教民五十九家。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
1899年5月	德州	民 众	大刀会众声言“将洋人一扫光，逐出中原”，群众起而打教。	同 上。
1899年6月	山东砀山（今属安徽）	民 众	民众反教，五千人攻打教堂。	《山东时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页。

（续 前）

1899年6月	砻庄	民众	民众反教，一千人毁教堂。	同上。
1899年6月	丰县（今属江苏）	民众	民众反教，二千人攻教堂。	同上。
1899年	郯城神山	杨清贤等民众	教民横行乡里，包揽词讼，县吏勾结教士奴役人民，引起民愤。民众扣押教民，清兵镇压。一万人攻打教堂，抢光教堂存粮，二百三十二户教民遭“抢”。	《山东近代史资料·义和团资料》，《山东时报》。
1899年10月	山东高唐	义和拳	拳民仇教。拳民在州内打击恶教民数十家，并火烧教民房屋十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全宗代号1522，卷号300。
1899年7月	黄岩	民众	应万德反教失败后，黄岩群众第二次竖起“除教安民”大旗，烧教堂及教民家。	《拳匪纪事》卷三，第69—75页；《拳祸记》下，第447—448页。
1899年	宁海	伏虎会	王锡桐领导伏虎会将县境内三座教堂焚毁。	《辛亥革命》第三册，第18—19页。

（续 前）

1899年	江西瑞安	神拳会	响应义和团，除灭洋教。在许阿雷率领下，祭旗反教。	同 上。
1899年	江西平阳	神拳会	响应北方义和拳，除灭洋教。县境内教堂尽毁。	同 上。
1899年	江西仙居	神拳会	响应北方义和拳，除灭洋教。驱逐教士，焚烧教堂。	同 上。
1899年	浙江诸暨	白旗党	民教纠纷，知县镇压，捕无辜乡民四人。聚众二千人，以“助王灭教”为号召，全县各处教堂尽毁。	同 上。
1899年	山西	官 民	英教士强行低价购买百姓土地，遭到人民反对。光绪谕曰：“洋人购地，愿否应听之民间，岂容地方官加以胁制？”。	《德宗实录》，卷455，第10页。
1899年	保定安肃（今徐水）	民 众	教民反对当地人民搭棚庆祝神州。双方纠纷，教士席宾等干预。	《义和团》，第1册，第448页。

（续 前）

1899年	直隶涞水	民众	教民挑衅滋事，村民阎老福等怒焚教堂。教士教民呈控县衙，令阎老福等赔银二百五十两，置办酒席二十桌，给教堂赔礼。	同上。
1899年	山东莘县	义和拳	因屡受教民欺侮，拳民枪杀教民。法国教会干涉。	《筹笔偶存》，第41页。
1899年12月	山东禹城	义和团	团民仇教灭洋，在首领王自隆、孙志太带领下，掠毁耶稣教民数十户，并攻打教堂。	《筹笔偶存》，第54页；《拳祸记》第354页。
1899年12月	山东肥城	义和团	石头沟团民焚教民房，杀死英国教士。清廷赔款白银九百两，抓团民五人。	《筹笔偶存》，第60页；《汇报》第152号，第3册，第461页；第163号，第2册，第503页。
1899年12月	山东夏津	义和团	团民在董洛四率领下，焚掠东乡教堂，杀恶教民。	《筹笔偶存》，第60页。
1899年12月	直隶景州	义和团	团民仇教灭洋，武修率团民与清军作战，焚掠教堂。	同上，第62页。

（续 前）

1899年	四川巴县	民众	教士横行，余栋臣余部数百人，焚毁毛货铺教堂、真原堂等。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47页。
1899年秋	山东平原县岗子李庄	朱红灯率义和团起义	岗子李庄民教不合，激起起义，教民二、三千家被毁。县令镇压，团民与清军在青罗店大战。后义和团三首领被害。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35～38页；《筹笔偶存》，第54页；《汇报》，第153号，第2册，第422页。
1899年	山东聊城蒋官屯	义和团	教士赵锡爵抓团民，团民毁教堂。教士勾结清政府屠杀义和团民。	《山东县志资料》，1960年2月编。
1899年	山东冠县	义和团梅花拳	教士横行乡里。杀教士、教民五人，毁教堂。团民被清军杀害百余人。	《汇报》，第146号，第3册，第367页；《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1899年11月	山东茌平	义和团	仇教。张家庄教民四十三户、三百多人受扰，并毁该庄大教堂。	《拳祸记》，第346页；《筹笔偶存》，第42页。
1899年11月	山东博平	义和团	仇教。城北玉皇庙和教堂及十九户教民住房被焚。	《筹笔偶存》，第42页。

（续 前）

1899年冬	贵州仁怀	会党首领陈玉川等	受余栋臣起义影响，焚毁教堂数处，占领仁怀县城，猛攻桐梓，波及川黔数县。后被两省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失败。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
1900年1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	山东堂邑	义和团	团众三百余人，惩办恶教徒十四家，烧房六间，焚教堂一所。	《筹笔偶存》，第63页。
1900年1月	山东平阴	义和团	团民数百人攻打英法教堂十七所，焚毁三所。	《筹偶笔存》，第74页。
1900年1月	山东德州府吴桥	义和团	团民在庞家桥焚毁教堂，掠惩教民，与官兵接仗。	《筹笔偶存》，第106页。
1900年1月	山东邱县	义和团	义和团首领王洛金率众焚毁该县法国教堂一所、房十一间、教民十三家七十几间房屋。	《筹笔偶存》，第117页。
1900年3—8月	山东寿张	义和团	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攻打教堂，境内教堂悉被焚，绅士教士被掠一百零四户。	《筹笔偶存》，第169页。

（续 前）

1900年7月	山东巨野	大刀会、义和团	陈照学、陈照房率领大刀会攻入张庄教堂，焚毁教民房屋一百余间，分发教堂、教民财产。清兵镇压，被大刀会挫败。	《筹笔偶存》，第291页。
1900年	山东临清	义和团	教民倚仗教会横行乡里，激起民愤。义和团烧毁教堂、教会医院，教士逃跑。《辛丑条约》签订后，教士重建教堂，官府杀义和团众四十人。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2期；《筹笔偶存》，第380页。
1900年8月	山东乐陵	义和团	教民倚仗教会横行乡里，激起民愤。沧州义和团进入乐陵李名扬庄，焚教民房外，斩首教民十数人。	《筹笔偶存》，第305页。
1900年8月	山东泰安	义和团	团民仇教，攻打教堂，杀教民八人，焚教堂瓦房八间，胡家庄高司铎带教友六、七十人解围，杀义和团四、五十人。教堂被围困三昼夜。	《拳祸记》，第358页；《筹笔偶存》，第405页。

（续 前）

1900年	山东平度	义和团	团民反教，攻打两处美国教堂。	《汇报》，第193号，第2册，第742页；《万国公报》，卷138，第28页。
1900年8月	山东冠县、威县、馆陶县	义和团	灭教反洋。团民将小里固、孙家庄、固献林、蒋家庄、陈固、陈家庄、红桃园、梨园屯、宋家屯、中兴集、赵林、小王曲、小家、鸭鹅等处教堂全部焚毁，教民房屋也全被焚毁，一间无存。	《笏笔偶存》，第355页。
1900年8月	山东沂州	义和团	灭教反洋。团民率“陈镇凤楼队伍毁坏教堂”。	《笏笔偶存》，第387页。
1900年6月14日—7月13日	天津	义和团	曹福田率领义和团在天津烧教堂，杀不法教民，全部教堂皆毁。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第5页。
1900年6月	直隶永清	义和团	反洋教。杀死洋教士孟努、孙宾铙，焚毁大王庄镇教堂。	吉理斐：《基督教在中国一世纪，1807—1907》。

（续 前）

1900年5月	直隶保定	义和团	义和团提出“保清灭洋”口号，杀教士，毁教堂。	《义和团》第1册，305页。
1900年5月	直隶涞水	义和团	义和团数百人烧杀高洛村教民三十余家。	吉理斐：《基督教在中国一世纪，1807—1907》。
1900年6月	直隶清苑	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烧杀张登地方教民数十家，攻东留村教堂，烧杀教民二、三十家。	同 上。
1900年	直隶唐山	道台郑文钦	道台郑文钦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令官军杀传教士一名。西太后下谕，将郑革职处斩。	《德宗实录》，卷479。
1900年	云南昆明	民 众	法官员方苏雅横行，激怒民众，将省城教堂拆毁。法领事往云南运军械。民众怒焚教堂，聚众七、八万，筹备快枪数千枝准备抵抗。后，赔银九千五百两。	《德宗实录》，卷471；《义和团档案史料》，第625页。
1900年	湖南衡州蕲州等十余县	民 众	反对洋教，烧毁教堂数十处，杀死洋教士数人。后，地方官受处分。	《德宗实录》，卷474；《拳祸记》下篇，472页；《张文襄公全集》等。

（续 前）

1900年5月	陕西靖边县宁条梁	民众、义和团	张德成、青山道人自山东到此地发动群众打教。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初稿），第124、127页。
1900年7月	陕西宁强燕子砭	乡民	受义和团影响，打教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20—122页。
1900年	辽宁辽阳等县	民众	反洋教。辽阳城内二十四处英德教堂被焚毁十七处。	《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3页。
1900年6月28日	黑龙江爱珲	义和团民众	仇教。千余人高喊灭洋人的口号，烧教堂、杀教士。	同上。
1900年6月30日—7月20日	辽宁奉天（今沈阳）	义和团	首领刘喜禄、张海率团民杀洋人，烧教堂、学堂、育婴堂。	同上。
1900年	辽宁盖平县	义和团	响应义和团起义，白旗屯团民烧毁于园子天主堂。	《辽宁日报》，1961年5月10日。
1900年7月	营口	义和团	沙俄进攻营口。团民焚毁教堂后，抗击俄军。由于清廷实行投降政策，营口失陷。	同上。

（续 前）

1900年	凌源县	义和团	团民“打教灭洋”，在邓莱峰率领下，千余人攻松树咀子教堂。	《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8页。
1900年	铁岭	义和团	团民“打教灭洋”，毁南关南大岭教堂。	同 上。
1900年月2日—19日	浙江诸暨	白旗党杨柳春、王绍桂等。	民教纠纷，清兵镇压，人民义愤而竖旗起义。群众烧毁牌头镇教堂，焚毁耶稣像及洋人住宅。清军镇压起义。义军首领意见分歧，遂被击破。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9900年	浙江西安县	会 党	受浙江其它教案影响，杀教士一人，知县被杀。	《德宗实录》，卷471。
1900年	江西吉安	士 绅	反教。吉安府许道培允许绅士攻击教堂、教民。	《德宗实录》，卷241、460。
1900年	江西景德镇	民 众	反洋教，焚毁教堂。赣州府武官何明亮等拒绝保护景德镇教堂，致教堂被焚毁。	《德宗实录》，卷241、460。

（续　前）

1900年7月	浙江衢州	民　众	知县与教士勾结欺压百姓，群众毁教堂。知县出兵保护，被群众打死，并杀英教士石马戴等人。又杀常山县逃来的传教士二人。法军镇压，杀爱国群众二千多人。	《浙案纪略》，载《辛亥革命丛刊》（三）；《义和团档案史料》。
1900年7月2日—8月9日	浙江平阳	神拳会	神拳会在首领金宗财率领下，受北方义和团影响，提出除灭洋教的号召，烧毁平阳县西门、煞江、肖家渡、北港等处教堂。8月6日，首领金宗财被清军杀害。	《平阳县志》，卷19。
1900年8月	陕西靖边	义和团	传教士横行霸道。义和团杀教士，烧教堂。	《定边县志》第二编，第89—91页；《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17—122页。
1900年8月	陕西安边	义和团	传教士横行霸道，义和团杀教士，烧教堂。	同　上。

（续　前）

1900年8月	陕西定边	义和团	传教士横行霸道，杀教士，烧教堂。	同　上。
1900年	广西府城	义和团	团民仇教，拆毁大小教堂。	《拳祸记》，第366页。
1900年	湖北沈垭山区	民　众	老河口主教以防义和团为名命令襄阳总团组织了二、三千地主武装，残害人民。人民围攻天主堂。地方政府派兵镇压。	《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900年8月19日	热河朝阳	义和团	天主教堂组织土匪五百多人进攻花子沟。团众打死土匪五十多人，打死传教士几十人，击毙主教二人。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1900年	内蒙萨拉齐旗	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烧毁教堂数十所，杀教民数百家。	《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
1900年	内蒙宁远	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教堂被毁，教士被驱逐出境。	同　上。
1900年	内蒙小桥	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围小桥教堂四十多天。	同　上。

（续 前）

1900年	内蒙土默特旗	义和团	毁富裕教民数家。	《拳匪祸教记》，“蒙古教难篇”。
1900年	内蒙古四子王旗	义和团	毁两座教堂，毙教士教民。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660页。
1901年1月5日—7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七日）	浙江瑞安平阳	伍正熙组织的拳民、农民	仇洋教，攻占三黄寨，烧毁教堂和教民房屋，打“番人教”（指洋教；温州土话），又打毁杜山头莘瞳镇外国教堂。清兵镇压。	《平阳县志》卷18，“武卫志”；《神拳会调查材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存）。
1901年1月	黑龙江	抗俄义军、义和团余众及农民军	沙俄军队血洗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引起当地二万余人起义，焚毁教堂，杀教士，将东北人民掀起的“御俄寇，复国土”的反侵略斗争推向高潮。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154页。
1901年夏	四川泸定	民众	县民祝华山受北方义和团影响，率众起事，毁冷碛教堂，劫法国传教士牧守仁。	《锡良遗稿》，第1册，第371页；《汇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第281号。

（续 前）

1901年夏	四川綦江	义和团众	基督教士王济安在青羊市传教遭抵制，王勾结保正萧际云诬告陈秀俊主使。义和团首杨瀛峰、封百川会同陈秀俊率数百人焚毁萧际云房屋，王、萧逃遁。陈秀俊被官府处死，封百川判处终身监禁。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民国《桐梓县志·军务志》下。
1901年4月	贵州思南府龙泉县	被革武员罗林芳等	教士、教民横行，侵占民产、田产。罗林芳率众攻打、焚烧教堂，杀死教民多人。	《德宗实录》，卷480等。
1901年4月	江西	民众	“赔款”摊派数目巨大，教士专横跋扈，教民横行乡里。全省范围内，人民攻打、拆毁教堂，怒杀教民。府州县吏及士子乡绅加入反教行列。	《德宗实录》，卷480、481、500。
1901年4月	南城	进士黄熙祖、举人谢甘棠等及民众	教堂藏匿军火。南城知县翁宝仁命拆教堂，群众焚毁教堂。	同上。

（续 前）

1901年4月	南丰	民	众	民教相争。民众焚拆教堂，“南丰县知县邓宝献不收教民是词，忿愚民人收害”。	同 上。
1901年	河北新河县芝芳头村	民	众	英教士唐智多率教徒抢割村民麦子，激起众怒。焚毁唐宅，将唐夫妇打死。	《北围春秋》，1960年第2期。
1901年7月	江西南昌	教	民	在港的天主教、耶稣教两教教民互殴，耶稣教民多人被杀。	《德宗实录》，卷484。
1901年10月	广东兴宁	会	党	反洋教，焚抢德国教堂。清军镇压。	同上，卷486。
1901年12月	甘肃平罗（今属宁夏）	民	众	教民殴打乡民，勒索银钱，教士行凶。群众起来反对教士反攻倒算，抗交洋捐。民众数千，进入下营子，毁教堂，杀伤教士及教民，打死法国天主教士多人。与清军交战，翌年九月起义失败。	同上，卷490、504。

（续 前）

1901年6月	直隶深州	联庄会和拳民、溃勇等二万多人。	反抗教堂复仇，反抗教案赔款和摊派庚子赔款。竖起“扫清灭洋”大旗，攻打教堂，反对摊派，“抗不承捐”，与清军激战。	《闻见录》，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德宗实录》，卷483。
1901年—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热河朝阳	邓莱峰率民众起义	“教堂欺凌平人”，日俄军队横行，官吏庇佑，迫使民众抗官仇教。华子沟一带民众在邓莱峰领导下，组织“拒洋社会”，以“排教灭洋”为宗旨，不认赔款，攻打教堂。翌年，发展成为反洋人、反贪官的大起义。	《朝阳县志·纪事》，卷23；《德宗实录》，卷453—494。
1901年4月—1902年11月	内蒙伊克昭盟萨拉齐旗	伊盟萨拉齐王爷率官兵及义和团众	教民带牧地“投入天主教，遂以地契捐送教堂。蒙众不服”，酿成事端。蒙古兵民及义和团众围攻小叫盘地方教堂，杀教士一名，怒杀“教民八百余人”。清廷将萨拉齐王爷革爵查办。	《德宗实录》卷480、481、482、483、485、486、490、506、509等。

（续 前）

1901年 1902年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蒙古士兵	同上，“调兵仇教”。	同上。
1901年1月—1903年9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七月）	浙江宁海	县民王锡彤组织伏虎会	庚子赔款及教堂赔款。教士横行乡里。人民愤怒，多次攻打教堂，怒杀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并导致1903年9月的反教起义。	徐和雍、郑云山：《浙江近代史》，第196—197页。
1901年6月	四川东部	川省会党与余栋臣旧部	川省出现了义和团的“灭清剿洋兴汉”的揭帖。这与北方直隶深州联庄会提出的“扫清灭洋”口号南北呼应，四川出现了反洋教斗争的高潮。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七日。

（续 前）

1902年春（光绪二十八年）	四川安岳县	义和团	团员詹洪顺等“欲打毁教堂”，被捕，激起民愤。遂爆发资阳义和团反教大起义。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八年四月。
1902年1月	广东南雄州始兴县	民众	法传教士在马市墟民人家夜宿不轨。法教士及同行三人皆被杀死。	《德宗实录》，卷491。
1902年1月	云南	散兵游勇。	因难以生存，抗官打教，到处抢劫教堂，焚掠富室。	同上。
1902年	桂粤边界诸县	滇、桂、粤清军散兵游勇	教士、洋兵在桂、粤横行。滇、桂、粤清军散勇在南宁府持枪起事，攻打教堂，并与外国侵略军对峙激战，击毙敌军官士陆等数人。	《德宗实录》，卷494—495。

（续 前）

1902年3月	河南泌阳、唐县、桐柏等地。	大刀会及民众	教民横行乡里，“倚势作威”，地方官偏袒教民。平民被抑，“激成事变”，民众抗摊赔款。大刀会众在张永清、席小云、罗振杰领导下，组织泌阳百姓起事，进攻县城，焚毁教堂，杀死教民。附近团社民众纷起响应，波及唐县、桐柏等地。最后迫使清廷免除三县摊派的赔款。	《锡良遗稿》；《中外日报》，1902年4月12日；《德宗实录》，卷497、498、500、505。
1902年3月	直隶广宗	景廷宾率联庄会和赵三多等义和团余部	地方官借摊派赔款肆意勒索，“擅自派捐，物议沸腾”。人民无以为生，被迫起义，提出“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口号，三省边界人民纷纷加入义军，杀教士、毁教堂，屡败袁世凯所部清军及德、日、法侵略军。	《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6；《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第108页；《广宗县志·大事记》；《德宗实录》，卷499、512。

（续 前）

1902年	巨鹿	景廷宾起义部众	义军转战巨鹿，杀死官兵五十余人，并焚境内教堂。清廷派袁世凯等出兵镇压。	《德宗实录》，卷497。
1902年	威县	联庄会众	响应景廷宾起义，攻毁教堂，杀死法国教士罗泽溥等。	《德宗实录》，卷497、498。
1902年4月	浙江宁波	民 众	传教士在“慈善堂”、“育婴堂”残害儿童。人民聚众攻打教堂，殴打教士。	《德宗实录》，卷479。
1902年5月	江苏徐州	大刀会余众	官吏杀害大刀会首领孟传礼。清廷赏山东传教士安治泰头品顶戴，陶万里三品顶戴。大刀会攻教堂，杀教民。	同 上。
1902年	内蒙土默特旗	旗 民	反抗摊派捐款，攻打教堂。	《德宗实录》，卷509。
1902年4月	四川资阳	义和团	义和团首领李冈中等在资阳首义，揭开了四川义和团大起义的序幕。后李冈中等八人皆牺牲。	《资阳县志稿·拳匪纪事》。

（续 前）

1902年6月17日	四川安岳	义和团	首领杨祖平率义和团众仇教。杀不法教民多人，毁教堂一所，教民房屋四百余间。川督奎俊杀杨祖平等人。	《德宗实录》，卷498。
1902年6月17日	四川资中	义和团	义和团首领何耀山率众仇教，毁天主教堂，杀牧师一人、教民七人。清军捕杀何耀山等百余人。	《资阳县志稿》。
1902年7月	四川华阳	义和团	义和团大败清军，毁县内福音堂一所；各路义和团形成对成都的包围。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1902年8月	四川仁寿	义和团	熊青禾率团民仇教。焚法国教堂，并毁彭山教堂三处及教民八十余家。清军捉不到团民，竟“毙无罪乡民六人”。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1902年8月	四川眉山	义和团	团民因愤恨清军屠杀无辜，焚毁教民村庄三处，并焚毁教堂。与清军激战后转移。	同上。

（续 前）

1902年 8月	四川 成都	义和团	廖观音率团民起义。与清军激战后，毁天主堂一座，随即转移。	《聊园诗存再续》，壬寅年，“感事”。
1902年 8—9月	四川 金堂	义和团	廖观音率团众至境。“拆毁金堂县属教堂，杀教民多命”。数路义和团合攻并摧毁舒家湾教堂及七堆瓦天主堂。杀教士、教民千余人。清军屠杀义和团众达一千人。	《德宗实录》，卷501，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上谕；《聊园诗存再续》，壬寅年，“感事”。
1902年 9月	四川 荣县	义和团	受金堂群众打教影响。毁天竺桥教堂，击毙教士、教民十人。	《汇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号。
1902年 9月	四川 邛崃	义和团	受金堂打教影响，王登武“藉词仇教”，惩富室七十五家。	同 上。
1902年 9月	四川 新津	义和团	义和团与教堂武装激战于断石桥，互有伤亡。	同 上。
1902年 9月	四川 资阳	义和团	刘精忠率义和团向安岳进军。围攻州城，捣毁教堂，击毙英教士鞠成垂及教民四人。清军杀团民，教民乘机勒索赔款白银五万九千两。	《安岳乡土志》。

（续 前）

1902年10月	四川简阳	义和团	几路义和团进入县内，焚教堂，杀教民。	民国修《简阳县志》，卷22。
1902年10月	四川彭山	义和团	配合义和团攻成都，焚东山教堂三处、教民住宅数户。	重修《彭山县志》，卷8。
1902年10月	四川眉山	义和团	配合义和团攻成都，毁下西街福音堂。	民国修《眉山县志》，卷8。
1902年9—10月	四川中江三台蓬溪	义和团	三台徐机匠、范石匠、中江倪开调、蓬溪陆大帅等义和团首领，与射洪李青山、税玉堂汇合，毁各地教堂，与清军激战。	《四川义和团运动》，第99—107页。
1902年10月	太和镇（今射洪）	义和团	焚毁镇内所有教堂，杀无赖教民。	《华西教会新闻》1902年11月号。
1902年10月	四川温江等县	义和团	义和团首吴直三在温、郫、崇、灌、新繁等县活动，欲毁彭县白鹿场修院。与清军激战，败退。	《四川义和团运动》，第97页。
1902年12月	四川灌县	义和团	温江与灌县义和团会合，毁教堂，击溃前来镇压的清兵，生擒把总任某。	《清档·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第793号。

（续 前）

1902年	广西全境	民 众	抗拒摊派赔款。全省“见于无人不匪，防剿俱穷”，影响波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柯逢等奏折”。
1902年	云南南雄	民 众	群众抗洋捐。民众潜入教堂杀死法国天主教教士二人。	《德宗实录》，卷491。
1902年	吉林伯都那（今扶余县）	民 众	农民抗捐，反对教士勒索，攻进县城焚烧教堂。	《黑龙江志稿》，卷32。
1902年	陕西略阳	会 党	反抗清廷镇压，痛殴洋教士。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
1902年	四川叙永	汉族、苗族人民	因天主教、基督教矛盾，挑起群众间仇杀，众多百姓死亡。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
1902年	湖南辰州武陵县	乡 民	湖南灾荒，教士沿街撒放药物，乡民数千人捣毁教堂，怒杀法国传教士薛亨、胡绍祖、罗国全等。	《德宗实录》，卷503、504、606。

（续　前）

1902年9月	湖南邵阳	贺金声民团及哥老会会员。	教堂赔款、教案赔款造成民不聊生。民众反抗摊派赔款。反教会，打教堂，杀教士，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的旗帜，发出“命令各国洋人撤出湖南揭帖”。省内民众响应，旬日间拥众二十余万，奋起抗击清军。	《湖南省志》第190—191页；《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79页。
1902年10月	陕西宁羌州等地。	蒙族人民	教民占蒙族部落土地，使世代居于此地以土地为生的蒙族人民失去生存条件。攻打教堂，杀教民。	《德宗实录》，卷506。
1903年5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河南武陟、孟县	民　众	地方征粮，任意加派，数量较前增一倍半，加上教堂赔款，引起民变。两县人民抗捐，打毁教堂，扒掉铁路。	《德宗实录》，卷515。
1903年5—6月	陕西平利	民　众	河洛镇人民不堪教会欺凌，捣毁教堂，杀死教士、教民七人。清廷杀害百姓三十余人。	《陕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续 前）

1903年7月	热河赤峰	义和团	受朝阳人民反教斗争影响。伤毙教民多人。	《德宗实录》，卷516。
1903年12月	江西分宜	乡民	教民、教士勘基建堂，乡民反对，引起诉讼。县衙畏惧教会势力，将教民无罪开释。	《东方杂志》，1904年第1期。
1903年12月	江西安福	民众	反洋教，攻打教堂。县令派兵弹压。	同上。
1903年	江西临江	鞭团会	民教相争，官府拘押会员。会众劫狱，杀伤兵役。天主教士索赔三万元，赔土地若干。	同上，第2期。
1903年	安徽宿县	民众	教民跋扈横行，民众反抗，民教争讼。	同上。
1903年	广东广州	民众	街头出现反教传单，引起中英交涉。	同上。
1903年	陕西宁条梁一带	民众	仇教。向洋教展开猛烈进攻。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20—122页。

（续 前）

1903年	陕西定边	汉、蒙人民	三边教案余波。教会占地数十万亩。汉蒙人民被逼反教。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20—122页。
1903年	陕西靖边	汉、蒙人民	三边教案余波。汉蒙人民生活所迫，被逼反教。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20—122页。
1903年	江西临江	义和团	团民仇教，酿成民教纠纷。后“教士索赔款三万两黄金，土地若干”。	《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
1903年	湖北黄冈	天主教民与基督教民	两教教民因租课相争，发生斗殴，“致六起冲突”。知府派员调停。	同上。
1903年—1906年（光绪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十二年）	浙江桐庐、建德县	濮振声率白布会起义	天主教民专横，濮振声率众起义。“义军取教民家中粮食充军需”。义军攻克桐庐、分水，入严州（今建德）。清军镇压，首领朱阿牛、马金奎战死。	《浙案纪略》；《建德县志》，卷12。
1904年7月	浙江龙泉	民众	反洋教起义。杀死教士三十三人，拆毁教堂。	《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丛刊》（三）。

（续 前）

1905年10月	浙江庆元	民 众	反教会、反官府。“与外国教会为难”，冲进县衙把门窗家具捣毁。县令逃走。	同 上。
1906年	浙江新城	民 众	反洋教起义与宁海反教群众联络，进行反教活动。	同 上。
1904年3月	四川简阳	民 众	教民欺压百姓，行凶，烧毁民房。群众欲毁教堂，官府调停。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1904年3月	四川冕宁	民 众	人民声言“打教”。官吏派兵保护教堂。	同 上。
1904年3月	广东新安	民 众	教民袁仁原等聚众结伙扰乱乡里。群众打教堂，杀教民。	《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1904年3月	贵州遵义温水	民 众	数千群众起义，声言“仇杀西人”。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黔北某俄国教堂及教民住宅均被焚毁。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续 前）

1904年3月	四川富顺	民 众	受义和团影响，攻打教堂。	《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锡良遗稿》，卷5。
1904年3月	直隶宁晋	民 众	教民寻衅，无故杀害百姓。地方官畏惧教会势力，遂酿成民教冲突。	《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1904年5月	奉天宽甸	义和团余众	义和团余众坚持反教斗争，杀教民数人。	同 上。
1904年6月	浙江归安	民 众	县令朱懋清“曲循教士之请，逼卖民地公产”给美教堂，激起群众反抗。	《德宗实录》，卷530；《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1904年6月	直隶定兴、安肃（今徐水）	民 众	定兴县教民刘花依仗教会，渔肉乡里，民众愤怒，掳刘花之女。安肃县安庄外国神父狄宗瀛干预，遂酿成事端。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1904年9月	河北、河南、山东	联庄会等	联庄会等会门继续反教，会党率民众起事，响应者数千人，	《德宗实录》，卷534。

（续 前）

	三省交界处		揭露教士、教民的罪恶及贪官污吏的恶行，打教堂，打官府。三省大吏派兵镇压。	
1904年9月	江西新昌	民 众	群众反教，杀毙教民二人，焚毁教堂。清廷赔款八万元。	《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
1904年10月	云南永善	义和团红灯教	四川义和团成员钟悲受会同永善县红灯教徒丁棕匠聚众举事，声言“打教灭洋”。川、滇两省调兵防堵。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
1904年10月	浙江湖州	民 众	官府逼卖祠堂给美国教士办学堂。美基督新教侵占孔庙，酿成交涉。	《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第5期、第11期。
1904年11月	陕西城固周至	教 民	官府征税、派款，引起教民变乱。某教民在征税人家中自杀，两县教民闻讯，持械闹事。	《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
1904年11月	广西桂林	民 众	反对外国教士到桂林传教，两个外国传教士被杀死。	《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

（续 前）

1904年12月	江西赣县江口塘	民众	教民曾衍优房屋被同族中人焚毁，当地绅士出面调处，赔款二千元。	《东方杂志》，1904年第5期。
1904年12月	江西赣县大湖江	民众	教民陈子元转卖房产给教堂，遭本村武生陈启麟等人反对。陈子元被打伤，落水而死。县官将百姓五人处徒刑。	同上。
1904年	陕西延安	汉、蒙人民	义和团余波。人民攻教堂，杀教士。清廷派兵镇压，首领任汉龙等被捕遇害。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1904年	四川富顺	蓝俊章率众	在朝天寺“聚众结盟”，托名“仇教”，攻打界牌等处教堂。后被官兵镇压。	同上。
1904年	四川荣县	士民	天主教士霸占文庙，改修教堂。“群士争之”，使其阴谋未逞。	同上。
1904年	湖北施南府恩施县	民众	天主教主教德西圣路经花背地方，随行教徒阻拦百姓围观，并借机欺凌、敲诈百姓。激起众怒，将德西	《德宗实录》，卷5；《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

（续 前）

			圣等三教士杀死，杀毙教民四人。清廷处死百姓十二人，军徒二十五人，赔银十四万五千两，官吏数人被革职。教士觅地数处建教堂、医院。	
1904年	奉天怀德	“胡匪”	仇教。杀死法国教士顾天性。清廷处死三人。	《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1904年	福建泉州	陈从率众	乡民陈从率众捣毁日本教堂，引起中日交涉。“因督以日设堂未载约章”，令其撤除教堂，“争执数次，遂结案”。	同 上。
1904年	湖北京山	民 众	仇教。焚毁法教堂，杀死教民。清兵镇压。	同 上。
1904年	浙江会稽	寺僧、民众	地方恶棍串有银匠结教民毁坏显圣寺神像，抢掠财物，破坏千年古树。寺僧呈控县衙，教士出面干预。	《东方杂志》，1904年第5期。

（续 前）

1904年	直隶遵化	皇 室	皇陵附近土地被旗民卖给俄国主教。清廷赎回土地，旗民被治罪。	《德宗实录》，卷537。
1904年—1905年（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川边藏区巴塘	藏 民	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袒庇洋人”欺压百姓。三万人起义，杀死凤全及随从五十人，毁教堂三处，杀死法教士二人。最后议结赔银十二万一千五百两。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273页。
	四川里塘	藏 民	受巴塘教案影响，烧教堂，杀教士。	傅嵩炑：《西康建省记》。
	四川道孚	藏 民	响应巴塘人民反教斗争，烧教堂，杀教士。	同 上。
	四川盐井	藏 民	响应巴塘人民反教斗争，焚毁上坝天主堂。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
1904年	湖北利川	民 众	反教。杀教士二人、教民二人，焚毁教堂三所。	《光绪朝东华录》。
1903年9月—1904年	浙江宁海	革生王锡彤率众	大裘村教民王品松夫妇勾结官府，依恃教会势力作威作福，敲诈勒索乡民。王锡彤	《德宗实录》，卷520、523；《浙江潮》第10期；《东方杂志》，1904年

（续 前）

			率众起义，杀王品松夫妇后，进攻县城，焚毁教堂二处，杀教士一人，教民五人，抢毁教民二百八十余家。清廷派兵镇压，处死民众五名，赔白银十三万两。	第10期。
1904年	浙江绍兴	士绅、民众	教士强租大善寺，遭士绅、民众反对。	同 上。
1904年	湖北黄冈	民 众	因民间灯会，教民拒不出资，引起民教争执。将教民房屋拆毁。清兵镇压群众。	同 上。
1904年	广东饶平	双刀会	林能才等率众反教。毁抢教民五十余家。	同 上。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山西绛州	民 众	因田产引起民教争讼。地方官袒教抑民，民众杀清官吏一名。	《东方杂志》，1905年第2期。
1905年	湖北黄陂	教 民	天主、耶稣两教教民因争水塘起诉，县令会同两主教和平解决。	《东方杂志》，1905年第12期。

（续 前）

1905年	湖南沅江	民 众	天主教士贺鸿宾强占白玉庵，建教堂，毁神像，驱尼姑，激起民愤，焚毁教堂。	同 上。
1905年	广东普宁	民 众	法天主教士樊志超干预讼事。广东大吏照会法驻广州领事将该教士驱逐出境，不准再在广东各地传教。	同 上。
1905年	山东招远	民 众	民教争殴。民教争讼于大吏。	同 上。
1905年	山西万载	教 民	天主、耶稣两教教民殴毙。焚毁房屋，死数人。	同 上。
1905年	直隶定州	民 众	民教因争夺物产相斗。击毙平民四、五人，伤数人。群众怒焚教民房屋。	同 上。
1905年	河南鹿邑	教 民	两华籍教士被杀，凶手系教民。洋教士不允许逮捕，故成悬案。	同 上。

（续 前）

1905年	浙江余杭	民 众	美教士盖怀德被打伤，索赔洋元七百二十五元。	同 上。
1905年	安徽太平县	教 民	松门地方天主、耶稣教民聚众滋事斗殴。天主教士干预。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
1905年	福建漳浦	民 众	教民抢掠平民，官府袒教抑民。民众群起仇教，烧教堂，攻县城，破监狱。官兵镇压群众，枪杀十五人，赔英教会白银三万两。	同 上。
1905年	云南维西厅	民 众	法教士魏雅丰横行乡里，奸污妇女，杀害百姓。中国官府追究、查办。该犯潜逃。	同 上。
1905年	浙江安吉	村 民	当地村民求雨路经教堂，与教民发生口角，教民将神像毁坏。群众怒毁教堂。赔银洋一千五百元。	《东方杂志》，1905年第10期。
1905年	广东博罗	民 众	法教士冯舜生干涉词讼，咆哮公堂。清廷外务部照会法领事将该教士撤回。	同 上。

（续 前）

1905年	安徽舒城	民 众	教民借教堂失火，诬陷平民所为，引起纠纷。教民打毁平民家具什物。经查此事不实，官府饬令教民赔银五十两。	同 上。
1905年	浙江宁海	民 众	民教相争，民众捣毁教堂及教民房屋。	同 上。
1905年	浙江天台	陈凤仪等	民教相争，陈凤仪等焚毁天主堂一座，毁房五间，赔款三千元，陈凤仪被清廷杀害。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
1905年	浙江天台	民 众	县民陈立鉴与教民因土地买卖发生口角。美教士干涉，并开枪伤人。激众怒，打伤美教士。官府将陈立鉴枷号示众，向美教士赔款。	同 上。
1905年	云南顺宁府	寺院喇嘛聚众	洋八景寺喇嘛聚众七百余人，围攻澜沧江沿岸法国教堂，焚烧教士房屋。清兵镇压。	《东方杂志》，1905年第10期。

（续 前）

1905年10月	浙江庆元	民 众	王锡彤起义余波，“与外国教会为难”。群众冲击县衙，捣毁家具、门窗。县官逃跑，群众攻教堂。	同 上。
1905年	四川犍为	义和团再起	川南大旱，局绅乘机中饱私囊，地主催租毫不相让，教士乘机作恶。团众愤而起事，捣毁各处学堂。外国主教强迫赔款八千五百两白银，清军镇压群众，十余人被杀。	民国《犍为县志》；《东方杂志》，1905年第2期。
1905年	四川荣县	义和团	受犍为群众反教斗争影响，当地贡高工人吴某引犍为义和团数百人袭击新桥场教堂，毁教民住宅十余户。	《巴县档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东方杂志》，1905第2期。
1905年	广东连州城	民 众	群众举行民间赛会，教士挑衅，激怒群众。村民焚毁美教堂，杀教士五人。后赔银四万六千一百两，并将该地寺庙改为学堂，地方官被革职。	《德宗实录》，卷550；《东方杂志》，1906年第10期。

（续 前）

1905年	广东连州菜园坝	民 众	美教士干涉村民民俗活动。激起众怒，冲入教会医院，又发现童尸二具，遂聚众二千余人打教。毁医院、洋楼，并打伤美教士、医生五人。	同 上。
1905年	陕西宁强	会 党	1900年燕子砭教案余波。攻打教堂，将燕子砭石碑抛入江中。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
1905年	浙江慈溪	乡 绅	教士强租大慈庵，引起纠纷。因绅士抗议，教士被迫归还该庵。	《东方杂志》，1905年第7期。
1905年	四川宁远	教 民	天主、耶稣两教教民互殴，双方伤亡多人。	同 上。
1905年	山东胶东	民 众	德国牧师二名，中国教士一名，在传教途中被劫并被枪伤。引起中德交涉。	《东方杂志》，1905年第10期。
1905年	湖北	民 众	天主教士威罕干被杀。后，赔一万四千两白银。	《东方杂志》，1905年第12期。

（续 前）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浙江镇海	民　众	小港地方回民同迎会，教民拒不捐款，民教相争。民众捣毁教堂及教民店铺各一所。赔洋银一千元。	《东方杂志》，1906年第4期。
1906年	河南陈州府淮宁县	民　众	苑庄教民抢邻村村民水牛数只。该村民众攻打苑庄，将教民苑氏全家杀死。陈州府派兵镇压，逮捕群众三人。	《东方杂志》，1906年第7期，
1906年	浙江台州	民　众	天主教教民恃教欺压乡民，与一农民因买卖争议，将其捆入教会关押。县令再三与教堂交涉，才将农民放出。	同　上。
1906年	热河朝阳	蒙、汉人民	教堂压迫人民。人民焚烧“天主教堂瓦草房三千余间”。	《德宗实录》，卷560。
1906年	安徽颍上	官　府	教民孙国栋恃教横行，打死百姓一人。官府议罪，孙仅赔款一千五百元。	《东方杂志》，1906年第4期。

（续 前）

1906年	河南遂平	会党	苗金声“竖旗起事”，号召“毁堂杀教”，与官军激战，起义失败。清兵轰毙义军三百人，逮捕百余人，处死数十人。	《东方杂志》，1906年第7期。
1905年｜1906年	安徽霍山	张正金领导民众起义	因教民私伐祖坟大树，族长张正金制止，教士将其私押于教堂。官府偏袒教士，欲治张正金罪。张正金率数百人杀向县城，与官兵激战，毁教民、教士房屋。起义被清兵镇压。张正金于1907年在安庆就义。	《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2期。
1906年2月	江西南昌	民众	传教士横行，知县公平持正，传教士竟杀死知县江召棠。全城因传教士暴行，而民情激愤，聚众数千“毁法国教堂三处，伤害法人六名，波及英国教堂一处，被害英人二名，受伤一名”。处死百姓六人，地方官十二人被参革。赔款银三十五万两。	《德宗实录》，卷555、557；《清季江西交涉要案汇编》，1949年3月油印本。

（续 前）

1906年	江西 上饶	民　众	耶稣教士带教民赴县属士泸坂地方传教，村民阻拦，发生争执。民众殴伤教民。“县令饬差往捕”百姓。	《东方杂志》，1906年第10期。
1906年	浙江 山阴	官　府	天主教民韩午其借教堂名义招摇敲诈，数月得银二千元。绍兴府查办此案。	同　上。
1906年	浙江 仙居	官　府	教民王洪藩揭批县衙告示，寻衅闹事。县警熊士果前去提讯，反被教堂司事纠众殴伤，并拘押在教堂。县令与教堂交涉，教堂拒不放人。	同　上。
1906年 1 1907年	四川 开县	义和团	教会势力横行，导致民众以义和团名义起事，各处教堂、学堂、教士及教民住宅被捣毁。义和团势力发展到数千人。后遭清军镇压，首领全部牺牲，团众八十余人殉难，与洋教士以赔款议结。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第125页。

（续　前）

1906年	安徽建德	洪莲会首黄淑性等	会众仇教，焚烧教堂三座，杀教民一人。官府杀百姓一人，徒刑数人，赔款二千七百余元。	《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
1906年	浙江海门	教　民	天主、耶稣两教教民因筑墙界，互相械斗，各有死伤。当地官府弹压。	同　上。
1906年	湖南常德	民　众	县衙拘捕赌棍刘某等，刘某之叔（系教民）借教会势力咆哮公堂。县令与教堂交涉。	《东方杂志》，1906年第10期。
1906年	广西贵县	民　众	天主教民吴秀芳恃教横行，被县衙提讯，法教士丰永超闯入县衙，将该犯带走。广东洋务局照会法驻粤领事，交出吴犯，驱逐丰永超出境。县令被摘顶记过。	同　上。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浙江湖州	民　众	美监理会教士占湖州海岛公地。前后交涉五年。	《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

（续 前）

1907年	河南 信阳	民	众	美教士在鸡公山盖房。官府令其撤房退地，美教士不听，遂成交涉。	同 上。
1907年	江苏 青浦	民	众	教堂私买河港，官府勒令卖主赎回。	同 上。
1907年	江苏 东台	民	众	镇江天主教堂买东台县王铺地方民宅一所，欲建堂传教。被东台县令拒绝，引起交涉。	同 上。
1907年	江西 奉新	民	众	教士安汝东辱骂县令。法使在地方官民强烈抗议声中将传教士撤换。	同 上。
1907年	直隶 沧州	民	众	民教不和，群众声言“拆学堂，焚教堂”。清兵弹压。	同 上。
1907年	云南	民	众	教士魏雅丰杀死平民十人，掠其牲畜、食物，激起民愤，攻拆教堂。	《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
1907年	四川 盐井	民	众	美教士德门途经此处，被新军营管带拦阻，该教士放枪伤一	同 上。

（续 前）

			士兵。民众将该教士拿获，交重庆美领事。	
1907年	湖北蒲圻	教 民	天主、基督两教发生冲突，地方官派兵弹压。	《东方杂志》，1907年第9期。
1907年	河南泌阳	民 众	宋庄教民宋福桂借教会势力，横行乡里。同族宋清云将宋福桂全家杀死。宋被清廷逮捕。	《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
1907年	江苏、金山（今属上海）	民 众	教民姚阿生等打死平民王阿小。姚阿生被天主堂藏匿。	同 上。
1907年	福建漳浦	民 众	1905年教案余波，为被清廷处死的起义首领蔡熙复仇，杀教民三人，与官军激战。	同 上。
1907年	直隶武安	民 众	民教不和，相聚斗殴。死平民一人。	同 上。
1907年	四川灌县	民 众	反对洋教士占地毁林，危及都江堰水利工程，书写揭帖："定期七月廿晚，杀洋人，恨在此战。"	《清档·赵尔巽全宗》，第361号。

（续 前）

1907年	四川开县	义和团	教士、教民作恶多端，鱼肉乡民。义和团将岳溪场等地教堂、学堂尽行捣毁。赵尔丰血腥镇压，传教士勒索赔款二万一千两白银。	《揭露帝国主义在开县的罪行》，1961年稿本。
1907年	安徽建德	民众	天主、耶稣两教相争，双方各聚千人械斗。耶稣、天主教各伤一人、死一人。清廷派兵弹压。	《东方杂志》，1907年第2期。
1908年1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	苏、浙交界地区海宁、桐乡、海盐等地	民众	灾情严重，教会横行。十几县人民相约“同时起事，至六、七处之多”，“毁厘卡、学堂、教堂”。民众在生家角与官军激战。甘肃提督姜桂题率清军十二营前往镇压，赔银八千元。	《德宗实录》，卷584,585。
1908年4月	四川安县草鞋街	义和团余部	义和团举事，毁教堂。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

（续 前）

1908年5月，	四川绵竹	义和团余部	义和团举事，毁通场口教堂。	同	上，
1908年	四川凉山	彝民	彝民拉小被洋教士布洛克杀死。彝族人民奋起击毙布洛克。	同	上。
1908年	广东琼州海口	官府	日本人传教设堂，教民借机捉人勒索。琼山县令照会日领事，将该堂查封。	《东方杂志》，1908年第2期。	
1908年	江西南康	民众	教民抢夺村民耕牛，枪杀村民数人，引起民愤。杀意大利教士一名，毁抢天主堂三处、修女院及育婴堂二处，毁教民房屋，杀伤教民。后，赔银六万六千两，枪杀群众十余人。赔款一万六千九百元。	同	上，
1908年	江西赣州	民众	受南康教案影响。毁抢教堂三处、育婴堂一所，并毁教民房屋六处。赔银元九万二千元，银六万六千两。	同	上。

（续 前）

1908年	湖北枣阳	教民、官府	天主、耶稣两教不和，引起械斗，酿成巨案。清廷地方官调解了结。	同 上。
1909年（宣统元年）	四川盐井	官 府	藏民售土地给法国教堂。法国教堂在此设立多年，贪占土地，遭清廷拒绝。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158页。
1911年（宣统三年）	陕西西安	哥老会	洋教士欺压人民，枪杀数人。哥老会烧毁教堂，打死美国教士拜克曼等五名外国人。	《民主报》，1912年9月10日。
1911年	四川会理	彝、汉人民	教士横行，人民杀死法教士贾元贞。议结赔银十万两。	任映伦：《大小凉山倮倮族通考》、
1911年	四川西昌	彝、汉人民	张耀堂率众起义，提出“推翻满清”，“杀贪官，灭洋人”口号，处决县令。	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四川彝族近代史调查资料选集》第26页。
1911年	四川松潘茂州叙永古蔺彭水等地	各族人民	反抗清廷统治和洋人横行。民众组成武装团体，攻打县城，焚烧教堂，“伤害洋人”，和官军对垒，掀起保路运动。	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帝国主义对四川藏区的侵略，藏汉人民的反抗斗争》；《宣统政纪》，卷68。

（续　前）

1911年	陕西长安	民	众	反清起义系西安南关教案继续，烧毁教堂，杀死从南关逃出的男女二人。	《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教案述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
1911年	陕西礼泉	民	众	响应西安反清起义，毁教堂。	同　上。
1911年	陕西宝鸡	民	众	响应西安反清起义，毁县内全部教堂。	同　上。
911年	陕西千阳	民	众	响应西安反清起义，烧毁教堂。	同　上。
1911年	陕西长武	民	众	响应西安反清起义，烧毁教堂。	同　上。
1912年1月	山西太原	群众团体		当地人民组织武装团体反帝反清。队伍达千余人，四处打击清军，“焚杀教堂教士”。	《宣统政纪》，卷68。
1912年	河南东南部	白朗起义军		反对袁世凯统治。抄教堂，掳教士十名，波及皖北。	《国民日报》，1922年12月30日。
1914年	陕西佳县	民	众	不满教士劣行。杀死天主教士二人，与教会交涉。赔银二千四百两，并立碑一块。	《陕西佳县教案》。

（续 前）

1914年	内蒙阿拉善旗	中国政府与比利时	比利时教堂勒索庚子赔款，该旗无力付清，以地抵押。是时，比利时教堂占地，抵赖不还。遂成中比交涉，致成外交悬案。	《外交部政务司各国悬案·中比悬案》。
1914年	云南中缅边界澜沧等地	中国与英国	美教士由缅越境传教，遭地方当局拒绝。	《外交部政务司各国悬案·中美悬案》。
1916年	湖南长沙等地	当局政府	外国教会置田，买土地，当地政府限制取缔。	《外交部政务司各国悬案》。
1927年	湖北沈垭山区	教士教民	传教士侦察工农红军的住地、人数及行动等。勾结土匪，杀害中国共产党漳县县委书记胡子荣和竹山县委负责人杨楚南等。	《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931年	湖北沈垭地区		贺龙率中国工农红军途经沈垭，发动群众揭发控诉天主堂罪行，镇压罪大恶极的神甫，搜出大批枪支弹药，没收教堂财物	同上。

（续 前）

			发还群众，使帝国主义巢穴遭到毁灭性打击。		
1944年	湖北沈垭山区	教士教民	艾国梁组织了三十多人的“民卫队”与国民党第五战区、鄂北行署和伪县署勾结，镇压了以丁江兴为首的农民起义，打死起义军24人，杀害了张队长、唐耀彬和刘春山。	同	上。
1944年—1946年	湖北沈垭山区	农民武装起义	反抗国民党统治，多次攻打沈垭天主堂。	同	上。
1948年12月	湖北谷城沈垭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8年底，谷城解放后，天主堂勾结一小撮逃进沈垭山区的匪徒，成立反革命武装“马嘉伯义”（意文译音，即教会的武装）发动反革命暴乱，进行垂死挣扎。人民解放军查封天主教堂。	同	上。
1949年3月	湖北沈垭	教士土匪	天主教实施反革命暴乱及“应变计划”。“1949年3月，中共区	同	上。

（续 前）

				长冯明道到沈垭进行征粮支前工作，天主教勾结匪徒加以杀害。几天以后，当解放军进山寻找冯区长遗体时，天主堂又指挥土匪袭击，使解放军伤亡十九人”。	
1949年4月	湖北	沈垭	教士 土匪	天主教实施反革命的暴乱及“应变计划”。“四月初，天主堂纠合土匪两千多名，攻打石花煤矿，杀害共产党的公安民政助理员二人，抢劫国家粮食十六万斤。”	同上。

后　记

编著一部有关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在华传教及其引起纠纷的教案史，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的愿望。但是，由于先生过早地谢世，这部书未能在先生指导下问世。为实现先生生前的遗愿，我们积数年之努力，编著成了这部《中国教案史》。本书倘能为中外史家、宗教界人士及爱好者在研究、学习中起到作用，将是我们的快慰。

参加本书整理工作的有刘建国、杜尊者、胡志远、翟庆德、杨慧生、刘建有、刘鑫、勒克钧、陈桂群、宋广平等，尤其是刘建国、杜尊者、胡志远、翟庆德、杨慧生五位同志从始至终参加了本书的整理工作。

在本书编著和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天津市冶金机电学校王义智、刘典诚、宋德真等几位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陈生玺同志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彭朝贵同志为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天津图书馆刘荣华、王向峰同志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书中照片及插图承特级摄影师陆宏慈同志予以特技处理。在此，对上述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漏误在所难免，敬请教正。

张　力　刘鉴唐

一九八七年四月